

蔡和森文集

DZ/8/16 I216/6

蔡和森文集

人民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750345



750345

蔡和森文集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7印张 574,000字
1980年3月第1版 1980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0,000

书号 17001·58 定价 2.95元

目 录

蔡林彬给毛泽东(一九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1
出处问题	
蔡林彬给萧旭东(一九一八年七月).....	3
讨论会友进取及同志互相协助的问题	
蔡林彬给罗学瓚(一九一八年八月九日).....	6
蔡林彬给毛泽东(一九一八年八月二十一日).....	7
手段与目的	
蔡林彬给陈绍休萧子暉萧子升毛泽东 (一九一八年八月二十七日).....	9
京保留法预备班的创设及新民学会的大计	
蔡林彬给邹彝鼎(一九一八年).....	17
留法勤工俭学问题	
蔡林彬给陈绍休(一九一八年).....	19
留法勤工俭学问题	
少年行(诗一首)(一九一八年).....	20
蔡林彬给毛泽东(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四日).....	22
大规模的自由研究	
寄自法国的家信(一九二〇年三月八日).....	24
蔡林彬给毛泽东(一九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	27
研究社会主义	

希望实现小学计划,劳动教育,合作运动,小册子,亲属合居等 我们须于文化运动更进一步	
蔡林彬给萧子暉、彭璜(一九二〇年六月一日)	31
绣业公司问题	
法国最近的劳动运动(一九二〇年六月十三日)	33
蔡林彬给毛泽东(一九二〇年八月十三日)	49
社会主义讨论	
主张无产阶级专政	
附:毛泽东给萧旭东蔡林彬并在法诸会友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一日)	54
蔡林彬给毛泽东(一九二〇年九月十六日)	63
共产党之重要讨论	
附:毛泽东给蔡和森(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	72
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一九二一年二月十一日)	74
附:陈独秀答蔡和森(一九二一年八月一日)	79
中国劳动运动应取的方针(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	81
一、劳动运动的目的与原则	81
二、中国资本主义可怕的形势	83
三、劳动运动应取的方针	84
法兰西工人运动的最近趋势(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	86
在封建的武人政治下废督裁兵不可能的铁证 (一九二二年八月十日)	92
现在还是政治战争时代并不是“法统”战争时代 (一九二二年八月十日)	93
基督教徒在政治上的大活动(一九二二年八月十日)	94
统一、借债与国民党(一九二二年九月)	95

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军阀专政与军阀割据

(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日) 101

一、乱源的分析 101

二、封建残局下的政治问题 102

三、军阀所要的统一与联治 103

四、中国唯一的出路 105

中国国际地位与承认苏维埃俄罗斯

(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107

祝土耳其国民党的胜利(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112

南通借款(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117

请看私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害处

中德俄三国联盟与国际帝国主义及陈炯明之反动

(一九二二年十月四日) 119

孙吴可在一种什么基础上联合呢?(一九二二年十月四日) 126

日本帝国主义与张作霖(一九二二年十月四日) 131

外交团劝告裁兵(一九二二年十月四日) 133

请看英美帝国主义怎样在北京巩固他们雇用的

外交系政府(一九二二年十月十一日) 135

目下时局与国际帝国主义(一九二二年十月十八日) 137

批评汪精卫君赴奉返沪后之谈话(一九二二年十月十八日) 140

吴佩孚真会拣择便宜货(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142

中山先生的兵工政策是为军阀说法的吗?

(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144

迎合英美意旨的就不要注意其行动吗?

(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146

- 国际帝国主义老实不客气了(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147
- 福建人民当助革命军复建革命政府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日) 148
- 国人应当共弃的陈炯明(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日) 150
- 北京政府也向德国索赔款吗?(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日) 153
- 评《商报》与《时事新报》(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日) 154
- 法西斯蒂与意大利资产阶级专政(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八日) 156
- 土耳其与国际帝国主义(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八日) 158
- 国会对于宰制中国的九国协约取何态度?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八日) 161
- 国人对于苏俄的同情(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162
- ✓ 赵恒惕与湖南省自治(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164
- 一个希望赵恒惕“提倡劳工”的工会!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166
- 唐山学生援助罢工之模范(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167
- 红军在海参威胜利后的远东时局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168
- 美国机关报所说的中俄时局(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170
- “须与美国亲善”(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173
- 请看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捣些什么鬼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174
- 蒙古王公与外国资本家的勾结(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176
- 英国与威海卫(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177
- ✓ 近日政潮的内幕(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六日) 178
- 由汪大燮内阁到张绍曾内阁(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六日) 181

洛桑会议中土耳其民族唯一的帮助者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六日) 183

法日美资本家都要与苏俄恢复关系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六日) 186

可惊可骇的交还威海卫条件(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六日) 188

爱尔兰依然为英国的殖民地!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191

革命中的希腊(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193

巴尔干新形势中的保加利亚(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196

代答读者(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199

附:读者来信(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八日) 201

万国公民大会与上海的裁兵运动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 203

双管齐下的国际帝国主义(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 206

舒尔曼、陈炯明、张绍曾与联省自治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 208

英国资本家退款兴学的用意(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 209

洛桑会议与土耳其(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七——三十日) 210

国民运动与太上国民运动(一九二三年一月十八日) 222

外力、中流阶级与国民党(一九二三年一月十八日) 224

美国资本奴隶中国的新计划(一九二三年一月十八日) 226

美国供给奉张军械与上海总商会的希望

(一九二三年一月十八日) 228

全美舰队集中太平洋(一九二三年一月十八日) 230

关税主权与外人代管(一九二三年一月十八日) 231

陈炯明的失败(一九二三年一月十八日)	232
赔偿问题与帝国主义(一九二三年一月十八—三十一日)	233
赵恒惕降北与借款(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四日)	243
各国供给中国军械的互哄(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四日)	244
四派势力与和平统一(一九二三年一月三十一日)	245
反对“敦请一友邦”干涉中国内政	
(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	250
克门案与运送飞机案(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253
孙中山南下与英国(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255
中日交涉与中俄关系(一九二三年四月十八日)	256
外国帝国主义与军阀协同压迫革命的真势力	
(一九二三年四月十八日)	259
辟孙曹携手(一九二三年四月十八日)	261
西南形势之进步(一九二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262
外国帝国主义者对华的新旧方法	
(一九二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263
“以后一切对华侵略皆将以教育的形式出之”	
(一九二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266
外交系与吴佩孚(一九二三年五月二日)	267
中国革命运动与国际之关系(一九二三年五月二日)	268
一、世界资本主义与民主主义之崩坏	268
二、殖民地的革命运动与中国	271
三、革命党之谬误观念	272
全国人民应起来反抗英国帝国主义鱼肉租界	
同胞的惨刑案(一九二三年五月九日)	276

大借款之内幕(一九二三年五月九日)	279
三千万垫款与英美之阴谋(一九二三年五月十六日)	281
香港政府与粤乱(一九二三年五月十六日)	285
英国海军工程案(一九二三年五月十六日)	286
日俄谈判(一九二三年五月十六日)	290
洛桑俄使遇害与资本主义国家之“文明” (一九二三年五月二十三日)	293
德国赔款新提案之失败(一九二三年五月二十三日)	295
英人中国协会主席之演说(一九二三年五月三十日)	298
英俄渔船交涉(一九二三年五月三十日)	301
日俄谈判之进行(一九二三年五月三十日)	304
英国内阁之变化(一九二三年五月二十三日)	306
日俄谈判再进一步(一九二三年五月二十三日)	308
北京政变与英美(一九二三年七月十一日)	310
北京政变与吴佩孚(一九二三年七月十一日)	316
北京政变与克利斯浦借款(一九二三年七月十一日)	318
北京政变与各政系(一九二三年七月十一日)	320
中国人应这样孝哈定吗?(一九二三年八月八日)	322
各省联席会议(一九二三年八月八日)	323
江浙弭兵运动(一九二三年八月八日)	324
外交团正式提出之临案通牒(一九二三年八月十五日)	325
国人还不急起抵制英国亡我的侵略吗? (一九二三年八月二十二日)	327
护路案与各国间之利害冲突(一九二三年八月二十二日)	330
法国复英之牒文(一九二三年八月二十二日)	332

“德国中等社会总理之最后一人”

(一九二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334

洛桑会议后近东危机第一声(一九二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337

非正式谈话可解决赔偿问题吗?

(一九二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339

国民党应号召国民反对英国的侵略

(一九二三年九月八日) 342

一片欢迎苏俄代表声(一九二三年九月八日) 344

大元帅赞助何东爵士吗?(一九二三年九月八日) 346

日本大灾在国际上的意义(一九二三年九月八日) 348

哈尔滨撤销地亩运动与列强之干涉

(一九二三年九月十六日) 350

美人私运军火与临城土匪军火之来源

(一九二三年九月十六日) 353

德法间快要成熟的买卖(一九二三年九月十六日) 354

呜呼! 英国侦探的和平运动(一九二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357

国民党本部不应招待美国侵略家

(一九二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358

欧洲的土匪世界(一九二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360

什么缩减军备会议——大家愿意战争

(一九二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361

今年双十节应注意的四大事(一九二三年九月三十日) 362

曹锟与外交团(一九二三年十月十七日) 364

吴佩孚硬要外交系组阁(一九二三年十月十七日) 366

这又是美人对华人的亲善(一九二三年十月十七日) 368

商人感觉到外国帝国主义助长中国内乱的第一声 (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七日).....	370
美国帝国主义帮助赵恒惕之确证 (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七日).....	374
德国的分立运动(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七日).....	375
美国机关报辩护承认北京政府的理由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七日).....	377
外舰联防之另一用意(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七日).....	380
单独侵略与协同侵略(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七日).....	382
山东人民为威海交涉之奋斗(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385
原来是吴佩孚委托外舰运军火(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387
何东的狐狸尾巴现出来了!(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389
被外国帝国主义宰制八十年的上海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390
华人营业的自由也没有了吗?(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392
赴洛赴日请示之王正廷(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395
外国帝国主义者果为维护内债基金而反对国立八校的 俄款运动吗?(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396
美国奸商又在张家口横行(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399
外人替曹锟策升平(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401
英国的政争(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402
由华盛顿会议到何东的和平会议(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一日).....	405
为收回海关主权事告全国国民(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416
英国选举中工党之胜利(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420
苏俄在欧洲国际地位之复振(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424

又是一个乐志华案(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425
东南大学要圈民田五百亩(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426
国民党大会宣言与国民(一九二四年二月二十日)·····	428
外国帝国主义最近进攻之一览(一九二四年四月二十七日)·····	430
何以救济智识劳动者?(一九二四年四月二十七日)·····	433
英美协会欢迎太戈尔(一九二四年四月二十七日)·····	436
社会进化史(一九二四年八月)·····	437
绪论 有史以前人类演进之程序 ·····	437
A 野蛮时代·····	438
B 半开化时代·····	440
第一篇 家族之起源与进化 ·····	444
第一章 原始家族史之概要·····	444
第二章 家族发生之理由·····	448
第三章 家族形式与亲族制度·····	450
第四章 血统家族·····	455
第五章 伙伴家族·····	456
第六章 对偶家族·····	460
第七章 一夫一妻的家族·····	464
第八章 宗法家族·····	471
第九章 三大时代之三大婚制·····	473
第十章 母权与父权之争斗·····	476
第十一章 一夫一妻之实质·····	480
第二篇 财产之起源与进化 ·····	485
第一章 个人财产之起源·····	485
第二章 氏族共产制·····	488
第三章 共产社会之风俗·····	496
第四章 土地财产最初之形态·····	498
第五章 村落集产制·····	501

第六章	秘鲁及印度之村落社会	507
第七章	村落社会在中国之遗迹	510
第八章	宗法家族与集合财产之性质	512
第九章	土地私有财产之起源	515
第十章	集合财产之分裂	517
第十一章	动产之发达	520
第十二章	封建财产之起源及其性质	523
第十三章	商业之起源及小工商业之发展	528
第十四章	近世资产阶级财产之发达	532
第三篇	国家之起源与进化	535
第一章	伊洛葛人之氏族社会	535
第二章	希腊人之氏族	550
第三章	雅典之国家	556
第四章	罗马之氏族与国家	568
第五章	凯尔特与日尔曼的氏族	578
第六章	日尔曼国家之形成	586
第七章	由封建制到近世代议制的国家	595
第八章	氏族与国家之兴替	601
第九章	各种政治状态与经济状态之关系	616
第十章	近世社会之必然崩溃	623
	义和团与国民革命(一九二四年九月三日)	636
	商团事件的教训(一九二四年九月十日)	641
	北伐呢? 抵抗英国帝国主义及反革命呢? (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七日)	644
	警告国民党中派诸领袖(一九二四年十月一日)	647
	南洋烟草资本家打破罢工之恶辣手段 (一九二四年十月一日)	649
	护党(一九二四年十月一日)	652

护党与护卢(一九二四年十月一日)	653
亡党之痛(一九二四年十月一日)	654
军阀战争之一幕(一九二四年十月十五日)	655
广州反革命之再起(一九二四年十月十五日)	656
对于广州印刷工人二次罢工的感想(一九二四年十月十五日)	660
商团击败后广州政府的地位(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663
北京政变之内幕及其结果(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669
北京政变与国民党(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674
欢迎孙中山先生离粤来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679
段、张、冯三派军阀暗斗之北方政局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681
地方的政治争斗与全国的政治争斗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689
近代的基督教(一九二四年)	692
一 资产阶级反对基督教时代	692
二 资产阶级利用基督教时代	693
三 资产阶级信仰上帝的根源	694
四 文明时代的基督教与科学	695
五 资产阶级的社会学与基督教	697
六 无产阶级的进化论与基督教	698
七 无产阶级不信上帝和基督教之成为侵略主义的先锋队	699
八 美国、基督教、中国	700
九 结论	701
孙中山病后帝国主义与军阀之阴谋(一九二五年二月七日)	702
段祺瑞的假和平主义与战争(一九二五年二月十四日)	704

段祺瑞执政后军阀与帝国主义的新攻势

(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一日) 706

河南战争的祸首——段祺瑞(一九二五年三月七日) 713

江苏人民怎样解除军阀的宰割与战祸?

(一九二五年三月七日) 715

广东反革命势力的覆灭(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四日) 717

孙中山逝世与国民革命(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 719

(一)国民革命不会随孙中山之死而消灭么? 719

(二)孙中山死后中国一般的情形怎样? 721

(三)孙中山死后国民革命的方针怎样? 726

(四)孙中山死后目前具体的政治奋斗 728

金佛郎案与国民党(一九二五年四月五日) 730

安福政府对于舆论的摧残(一九二五年四月五日) 733

卖国备战的金佛郎案(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二日) 735

冯自由派反革命运动的解剖(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九日) 736

(一)反革命势力的渊源 737

(二)中山主义的社会基础 737

(三)老党员之叛逆与改组 739

(四)改组后反革命的内容 740

(五)阶级争斗与肃清内部之必要 741

今年五一之中国政治状况与工农阶级的责任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六日) 743

今年五一之广东农民运动(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六日) 747

(一)省农民协会将于五一开成立大会 747

(二)打倒陈炯明后的东江农民 749

(三)广东农民之概况·····	751
(四)农会被摧残之一斑·····	753
(五)广宁农潮之回顾·····	756
何谓国民党左派?(一九二五年五月三日)·····	761
五七纪念北京学生奋斗的意义(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七日)·····	764
在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欢迎会上的讲演词	
(一九二七年四月一日)·····	766
代表中国共产党向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四次	
全国代表大会的致词(一九二七年五月十日)·····	769
代表中国共产党向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的致词	
(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九日)·····	770
国家统一与革命势力的联合(一九二七年七月八日)·····	771
国民党反革命统治下的辛亥革命纪念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一日)·····	776
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一日)·····	783
资产阶级革命与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	783
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与社会革命·····	785
中国革命是不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	788
资产阶级叛变后革命性质没有变化吗?·····	791
社会主义的前途及其转变的条件·····	794
资产阶级曲解中国革命的企图·····	796
论陈独秀主义(一九三一年九月十日)·····	804
蔡和森同志生平年表·····	833
编后记·····	850

蔡林彬给毛泽东

(一九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出处问题

润之兄：

第二十三日开船，二十四日在汉口搭车，二十五晚抵京，共经三日三夜，晴雨参半，一路颇适。兄事已与杨师详切言之，师颇希望兄入北京大学。弟以一面办报一面入学为言；师甚然之。前亚细亚报薛某者，今欲重整旗鼓，请师担任学术上之撰述，师颇有羞与为伍之意，辞之；然可荐言介绍，师言惟欲屈节。弟思大仁大勇，普渡众生，非入地狱不行，究无所谓屈节。尝与子升言，吾之积极思想，谓以吾国今日之情势，即娼优盗贼界中，亦须加入正人君子，况元勋报界乎？吾人今兹之所急者：一方要有适当之储养，一方要有适当之练习；得同时行之者，上也；一先一后者，次也；终于一才者下也。旷观前辈名人，疏空罕成者，多矣！此非其才之不足，智之不逮也；无充分之练习故耳。弟年来深以此惧，形格势禁，亟欲自致于最宜，而不可得。（中略）大学蔡校长，弟会见一次，伊正谋网罗海内人才，集中一点，弟颇羨其所为。觉吾三人有进大学之必要，进后有兼事之必要，可大可久之基，或者在此。储养练习，或可同时并得。望兄细与子升讨论研究，定其行止，复我一函，是所至盼！顺问

近祉！

弟彬肃。七年六月三十夜在北京。

（载《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1集）

蔡林彬给萧旭东

(一九一八年七月)

讨论会友进取及同志互相协助的问题

子升兄：

弟今天会见石曾先生，除以前所闻皆得证实外，又知借款机关亦已组织，我省为熊秉三章秋桐二氏担此义务，筹有的款，以辅助绝无自借能力之士。此好消息出于意外，子民先生亦云然，尤足信实。今特将简章及说明书寄上，请细与章、赞、芝、鼎四兄详细讨论。璋兄已否到省？南洋消息如何？如不可靠，则来此亦为上策。芝圃本有做工意，弟为彼设想，于此亦实相宜。鼎丞则往日之希望反多，弟尝思为在那方进行，似不必为此。然若以其尚无何等把握，不如此方现在之有形可捉，则投此亦未始不佳。赞兄往南洋本最好，然似乎筹川资，等消息，难得充分把握，此间现有陆军大学招学消息，(尚在调查中)未始不可作一箭双雕之想。总之如四兄皆有意于此，当速寄文凭相片来京，然后等弟之信，再定直往保定之期，方为稳妥耳。三十夜之信，想已接阅，与润兄详议答复矣。二兄行期，似可从速。罗君到省未？大学报名，在本月二十五截止，请电话通知其尊人，速定行止。盖罗君于此必须另辟住处，则后来者愈有地步也。李耀先行未？如未，亦可联络，一可使彼不走歧路，二可在此处多一殖

民地，以便援引后来者，交利之计也。

弟颇恨行色仓忙，殿后种种任务，未与兄一一陈之。日来愈益有感于吾国社会之晦盲否塞，为正人君子心量不大，孜孜然聚其聪明才力于为己，而不肯旁通一点之所致（此其说甚长待面陈）。窃意吾会须八表同营，以一人之忧共诸天下，以天下之忧纳诸一身。其入手办法，则自会友相互间为始。诸自有志以上，即当忠为之谋，解其一人内顾之忧力智力，以利用于共同大目的之上，夫然后天下事始可为也。吾等皆有心人，然只恐心量不大，有“苟能是是亦足矣”之心，则群治之昌明愈益无望，此弟最近之瞿然猛觉者也。心智旁通，则仁不可胜用，有“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之妙味。民包物与，立人达人，尽性赞育，胥在于是。会友叶君，竟尔死去，每一念之，辄愧悔其未尝一为之谋。现学友中之失所者实繁有徒，不可不略尽心力，为之筹画，殿后办此者，惟有兄与润之。弟前与兄言旧友黄受松，此君识力陷于悲观，意志困于境遇，理解一切而气弱不振，常有途穷之叹，久为忧之。兄如慨然举之以进，一面拔一人才，一面得一人才，实为双美，请更商之邹张，嘱二君觅其通信处，早通一信，以免祛其穷愁潦倒之忧。不然，忧能伤人，彼方久撻恶疾，倘有意外，弟更何以为情？其余如贺梯亦弟所信实，一士虽微，百年赖之，祈与王先生言焉。此外如新识中之有可谋者，亦祈兄一一加意而后行。书籍要多带，弟太带少，此地无处有借，准备工夫竟不能做。二三人另合一担，虽费八元，亦为值得。弟寓中之书，请兄检阅一次，如其可带，请拣选带来。兄岳山之游，或可俟诸他日，能于短期间同润之一往章甫处最好，一可促进其行动，二可为往西往南往东者略筹川资。保定亦须百元，如赞周鼎丞筹此，皆为难也。润兄重要笔记亦带

来为好。润兄归家一行否？如皆会行动，会事如何善后？二兄当为熟筹。陈君书农来省否？周君世钊有信否？鼎兄如不走动，则如何设法之处，须过月写信。润兄及鼎芝诸兄见易先生时，请代致意，此时不遑作书也。升兄字帖可带来。顺问教安。润兄处未另肃。

彬肃。七年七月，在北京。

（载《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1集）

蔡林彬给罗学瓚

(一九一八年八月九日)

荣熙学兄足下：

弟此来目的全为组织勤工俭学事，四旬之中略得头绪，所有消息亦能概达左右矣。前曾开一名单(与李石曾氏)，即冒昧列入尊名，今接二次来书，知兄于此亦甚有意，此弟更可劝进旨也。兄似乎现在虽得家庭同意，预备费无从索取，此则舍却来否问题外，弟可为兄解之。弟已与李石曾先生再三交涉，现侨工局业已答应借五、六千元与吾辈，限额约在二十五名，兄业已在二十五名之列，此全解决是之所难也。弟三日的(?) (月内)本欲成大组织，今于限额之外，另有大办法寄在长沙诸友处，烦兄即日晋省与诸友会商一切，一以穷其真相，一以协定行止。最先行得快的则子升，润之当未起程，尤可多得消息也。黄君弟甚欢迎其入组，请兄与萧毛接洽即可定矣。高小资格正如入初级预备班，惟需自己筹费，兄如能为我组织一班初级者来此，亦所切望也。兄如迟来，文凭须早日寄来为要。

八月初九^①

彬白

(载《新民学会资料》)

^① 一九一八年。

蔡林彬给毛泽东

(一九一八年八月二十一日)

手段与目的

润之兄：

前复一片，未尽所怀，今补呈之。（中略）兄若以此为暂时的手段，则何如借路过身，一入地狱（若弟自观之实不是地狱）。弟尝慨世之君子，为种种的舆论律道德律所束缚，只能为伪善，不能为伪恶，是以使小人得积极横行。枉尺直寻，弟实主张。窃以为人不能有善而无恶，正人之恶，即是善之变相，求全则难免不为乡愿。弟内有恢恢之志，外殊不尚硿硿之行；自信其心既正，将来有恶当前，必不少避而勇为之；恶经正人君子为了一回，则其阶级，就要演进一层。尝耻吾国之思想圈及善恶圈，只有一个铜钱大，窃欲扯直而延长之，善恶俱进，无甚轩轻。现为一恶，而将来能得十善之结果，何所顾恤而不为之！吾人若从一身之利害及名誉计算，诚有不宜屈节者，若从全体之利害计算，可以杀身成仁，况不可行伪恶以得权乎？（兄以时未至为言，我以为此正其时，此时稍为一枉，其所直不知几万万也）。君子无弹性，此乱之所以不止也。弟意现在当得一班正人立恶志（杀坏人），说恶话，行恶事，打恶仗，争恶权，夺恶位，加入恶界，时时与恶为缘，时时与恶战，时时与恶和，操而纵之，使自我出，支而配之，使自

我生，演而进之，使自我发；然后将万恶纳入袖中，玩之掌上。我果小人乎？则将此万恶顶之头上，以为护符；散之天下，以为走狗，无不可也。我果君子乎？则将此万恶捣之碎之，烧之熔之，锻之炼之，淬之磨之；神而化之使成美质之原子，新而明之，使成优秀之国民，尤无不可也。若天下治乱，其转移在于一心，人之贡献于人道，其功过不在形迹之上。果为君子，无善不可为，即无恶不可为，只计大体之功利，不计小己之利害。墨翟倡之，近来俄之列宁颇能行之，弟愿则而效之，虽于兄意未有当，亦聊以通其狂感耳。至于蔡松坡，松坡少时不屈节为满清官僚，安得致后此之地位，而成一战之功哉？凡此梦呓，兄可驳骂而痛斥之，匪以言事，以当论学可耳。至兄之行止，尚待自为斟酌，私心以为兄有来此之必要者数端：（一）既不往东，又不往南，自以来京为最宜。（二）吾辈须有一二人驻此，自以兄在此间为最好。（三）自由研究以兄为之，必有多少成处，万不至无结果。至现在情形，杨师自是喜兄来寓，每日可以学习英日文。弟事殊不好为计，故亦望兄来指教。至佃屋请工二事，亦祈兄斟酌弟之家情，为我主张，实不胜感激盼祷也！顺叩
暑安。不具。

弟彬白。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在北京。①

（载《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1集）

① 写信时间应为一九一八年七月二十一日。

蔡林彬给 陈绍休萧子暉萧子升毛泽东

(一九一八年八月二十七日)

京保留法预备班的创设及新民学会的大计

赞暉诸兄转升润二兄：

弟间接闻听欲往保定预备之人，颇繁有徒；此万不可以“人数有限”遏其动机，绝其希望；当另筹一调剂办法，尽量容收，成一大组织，然后始符初心，始无遗恨。二十五名之额，本为侨工局一面所限定。至同乡（熊等）之辅助，尚属另一一时不定之生机。弟前财团之条呈，即于二十五名之外，隐示可来额外之多数，此等弟筹之熟，思之深，而且身经其间已久，极悉此事之性质，原属不拘一定。可靠不可靠，有把握没有把握，全在自己创造。弟所怕者，是小结果之可靠与把握，全不虑其不好下台也。弟于侨局一方得有把握之后，即思所以推广调剂之方，只虑来者未必果多，遂于前书不敢明言。现在多少与否，弟究不得而知，只以既有此层意思，便当奉呈来前，以备采择。至其方法之可言者，约有三端：（一）侨局借得二十五分款，就可额外容纳得几个至十个；因我们有最简单之生活，得节省借款几分之几也。（二）熊章此时行止虽不定，然正大有无把握中之大把握在；因有一年预备期间，足容吾辈运动游说，以造出几个可靠也。（三）就是

组织财团。如有三十人来，就要夹三分之一之有钱者及有借贷力者。如有四十人来，就要夹十几个之有钱者及借贷力者。如有六十人来，就要夹二三十个之有钱者及借贷力者。（一）之可能，已不待言。（二）之可能，弟甚信之；只要我们在实际上造出一个形势，迫向人家身上走，使其不得不负维持之责，使其不得不乐于负维持之责，然后为得耳。（三）之可能，亦非梦话；往南洋者果能出其往南洋之川资于此（如璋兄及罗学瓚等兄），在雅礼者果能出其在雅礼一年之费用于此（雅礼有几个要来），往上海者果能出其往上海之费用于此（如李耀先君等久闻彼往法川资已筹足五六百元，弟早有牵入之意，虽不深知，然非不可与言者，请勿全忘。），则不但一方可纾借款无着之忧，一方尤可造成一大形势，以迫出一个大借款。至竟有几个意外的富家公子及借贷力大者参加走来，或能在何处以团体名义借款，则来八十人，虽六七个是穷措大不妨也。换言之，弟以（三）为达到（二）之手段，为造成一大形势之手段；是以（三）之性质为“当有可无”的，大形势之起首，则不得不有。（二）既达到，则可以无，有又不必皆有，无又不必皆无，此其为说，须兄等推想，然后一句可以说明。盖二处之辅助，皆是借款，苟能勉强自备，何必多此“借”“还”之手续。然不过属于个人言，若属团体言，则是混合分配，只要有借，总是一共同借为好。财团只是壮胆，只是促进大形势之一种手段，资本金并不要如何雄厚，又并不要如何可靠，此又须活看活做者也。总之，此事全在人做，初无可靠与着落之可言，必欲穷其可靠与着落，则莫如吾辈之自身。至弟之僻性，尤不喜小结果之着落与过早之可靠，此则于实行上或云难，然自弟视之究甚易。今使弟再大放其浮词，将青年界全体煽动，空全省

之学子以来京，此在旁人视之，必以为不好下台，不知此正是好下台处：在正面言，形势愈大，愈好着手，退一步言，湖南学子，竟大多数患了一个勇猛轻率的神经病，此病甚于此回之水灾，而赈济之效亦大于水灾之赈济；则熊氏等自不得不负维持之责，自不得不乐于维持；亦要如此始可以责人维持，始好责人维持也，然弟亦非专门拘于如此浮泛之想，苟在现在能干造出几个大着落，亦断不肯放松而不为，因此本为我素愿也。自侨局之小着落成后，弟即探问熊氏之行止，行止无定处，不好投书。前闻其返湘，现闻其在津，若其来京，则拟往会。盖熊氏有为本省筹一百万元善后款之说，弟想从此中抽借几千，当亦为彼所乐许。且彼欲广设平民工厂及银行等，尤非预储人才不行。弟前旬写信与石曾先生，谓兄等于二星期内可到，请伊早向侨局接洽。彼即与蔡先生商量，蔡即有信致杨先生，谓熊章行止不定，向侨局借款，李意想请杨先生作保证人，且谓李不日会至杨寓商量。现在尚未见李来，大约李之如此促进一步者，因二星期内可到之信也；今仍未来商量者，因兄等犹未到也。李意必以人与凭到，始好直截了当，一画做好；弟前此之所以促升兄早来者，全为此也。究竟杨师个人尚是难得保证，弟与师议请师联络熊，一面同作保证，一面向他借款，师已谓然。弟欲其早写一信与熊，师则谓须李来京商量及兄等到此，究是实情。升兄如果持重难发，请诸兄向学校催出文凭，即日邮来，以便在此进行。人稍迟究无不可。升兄在省时，请将此事始末，与陈凤芳君一言，强伊写一封信与熊秉三氏。盖此事欲得多人打水，始有饱鱼吃。无论陈为何如人，彼既尸教育会长之职，此事即为当为应为之事。至其信中之理由，由彼写之，或不免照例敷衍，此则须升润二兄讨论

商量，自己起草，交彼照制盖印，其他言词，或可不周到，理由则万宜充足，或专交一理由草与他，他之情必相安也。至此回大组织若能成立，弟思以后将成一继续援引之团体；或应时势之要求，竟在长沙组织高初二等预备校；此亦须与陈等言之，以促其注意。总之弟对于此等人，只要强迫他此后不至漠视青年之需要，即为得了，其人之可与言否，不必论也。润兄七月二十六之信，已经收到，所论才财学三事，极合鄙意。究竟我们现所最急者，是一财字；而才次之；而学则无处不有，无时不可以自致。然非学无以广才，非才无以生财；此所以学会之会员，为须加以充足的物色与罗致，不当任其自然发展也。（中国万恶万罪，及不进化，皆起于任自然。）兄自由研究及私塾之说，是弟中层之目的。此时之所急者，欲得二三人在家里经营基础，欲得一些人四出觅供给之货物；是以弟于留京往法而外，又有组织一些人去吉黑新疆之想（此等处确可发财）。到了明年，往法者果已成为事实，则后年之往边地者，可得开办费之援助，诚能如此做去，则财之解决，谅非绝不可早，绝不可能。至南洋广东而犹有生机，则愈为多得几着，此则通同所患，仍是人数不供支配耳。至于求财，其方亦自多端：（一）遇，（二）访，（三）造。遇中得人，一见倾心，此属特别少数。访中得人，其数不定，自身之吸力大同化力大者，所得必多，反是不得不少。至于平常观察，弟颇厌旷日持久，为不经济，吾辈总可发明一短期有效的方法，多与言谈，多与尝试，亟与从事，虽不中，必不远也。造之一层，尤为必要，尤较可靠。今日欲访求已经成德之好人，诚是凤毛麟角。湖南而外，外省尤其难得。造分两号：一是造相遇相处之同辈，二是造幼龄之小学生。前者如兄来京时，便当施行；后者则

弟甚望同辈中多出几个小学教员，万勿以个人暂时之不经济，忘却远大之举。来书“失此不为，后虽为之，我等之地位不同，势不顺而机不畅，效难比于此日矣，”弟深以为然。三年以来，每觉胡林翼之所以不及曾涤生者，只缘胡夙不讲学，士不归心，影响只能及于一时，故弟住刘家台时，未尝不想当教员也。自信小当小效，大当大效，惜无人达我之意而推荐之耳。尝思所以补救，故公然不逊，以与子升之学生接近。至对于会友之分途四出，或觅闲散事情，或情愿经商，意颇忧之。久思所以补救之方；故前有怂恿升兄荐教员之言，而意中尤望鼎兄略为牺牲，以屈就不经济而实经济之事；又想升兄写一信与何先生，以坚其志，不必欲往东洋。然此皆支节也。若其大意，则在“吾辈总要如何秉了现在之志向，于现在立一可大可久的基础，以为后来活动地步”。吾兄颇以去长沙为遗憾，弟则久思所以补救之方；其方若曰：如得鼎兄出以挥霍旁通之才，广联高小中学专门之学生，而且介绍京湘之常常通信，实无异亲炙也。前于楚怡诸生，欲其通信，即是此意。前将起程时，与家母商议，谓三年之内，必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并且要使女界同时进化，是以舍妹有邀友自读之意，弟又有决意留京四年，每年回长沙一次，以与各界联络之宣言；故其置重长沙之处，亦复大略与兄相同。前与升兄书，谓恨行时不及将种种善后方法与商，即指此等。此等不只一方，不只几人，不只一事，弟皆欲熔成一片，以为必如此始能宏济宏成，作始时即宜运思及之。弟现对于自身及同辈中，又有几句直觉的谬语：即“往京考公费学校，乃随俗的迷梦也，于吾辈并无甚么必要；往西洋进大学，亦随俗的迷梦也，于吾辈并无甚么必要；必要只在通其语文，悉其种种之真象耳”。此如杨师东奔西走，走了十年，

仍不过是能读其书而已，其他究何所得！故苟有方法能免去随俗迷梦如勤工自学者，吾人必怂恿而力赞之。弟觉立己立人，划分先后之阶段者，谬也！为学为事，划分先后之阶段者，尤谬也！谬之实例，就在前辈之空疏无用；谬之影响，竟使小人尽进处于有权。盖事不素练，情不熟悉，徒恃其空疏无用之学，以自逸自喜，舍却山林僻隅，安有容其立足存在之地哉！曰鸿炉大冶不可入，曰鸟兽不可与同群，皆惰性无能之遁词，经千古之士君子“兢兢拘拘”而不自觉者也。弟感此极深，知此极切，其言万端，猝莫能尽，且亦吾兄所洞悉矣。弟愿今日之中国，多出做事之人；其未做事时，稳立做事之根基，不妨与鸡鹜争食，不妨与猪狗同槽；对于首恶则奋斗，对于从恶则收容，以万恶为肥料，为化学原料，而我辈为农夫为化学家；失败则于志无伤，成功则万世蒙其利。持论固是太激，倘亦时势之所要求乎？鼎兄本有教育研究所之议，弟思此亦是善后之一种必要，会友中诚能有几个当教员，或于他校联络得几个教员，则尽可一二星期联合讨论一次，以创成湖南之精神的系统的教育，此亦莫大之事业，会中所应做者也。兄对于会务，本有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的意趣，弟实极其同情，且尤不讳忌嫌疑于政党、社会党及诸清流所不敢为者之间。以为清流既无望，心地不纯洁者又不可；吾辈不努力为之，尚让何人去做？尚待何时去做？此区区之意，相与共照者也。弟对于章甫兄之往东，又生异议，除“无必要”之说外，尚有二事：（一）自费七八九年，其田价六七百元尚是不敷。（二）回国后果能作何等活动？以现势揆之，殊无可说。此二理由虽不充足，然如加以家庭之万难远离，弟以为不如仍毅然决然，就省中教席，以与鼎丞提挈会中大事，三四年后，必有可观。为会中立

其基础，即为个人树其风声，此迂缓而未必有失者也。至长、京之五六留者，三四年后之学问问题，弟亦略为计及，以为只要法之财团，边之财团以及其他财团，能如愿而偿，则我五六人者，可于彼时交换往返接触考察一次，然后回国，大开其世界自由研究社。此幻想或亦有万分一之可恃，惟在努力做去耳。不然，我二三人之留京，为财乎？我不敢承认；为学乎？我亦不敢承认；为基础乎？则我略为承认之。以才为基，以财为用，以学为体，此万世之业，不必忧其一时无成也。兄以为如何？望与章甫兄商量之。

罗学瓚君来片，谓现在不能得家中同意以索预备之资；至川资二百，则明年尚可设法；此则舍来而外，全无问题之可言。罗君又言有黄守垣君欲来，此亦无所不可。又问高小毕业者可入初级预备班否？此正可，惟须自费，想此信到时，罗君或已在省，故未另复。蕴真兄信，甚有来意，极其欢迎。周明谛君来书，虽有意，而无凭，甚为恨事。此外有杨师之堂侄杨楚君欲来，师欲其带足几百元来，不必靠到此借；因如此则到法即有钱回家也。又雅里之杨焱君欲来，伊住下学宫街十一号醉香书屋，请诸兄一往联络为要。刘国司确在家中，请告以预备费有地方借，彼必然来也。彭璜亦请带一笔为幸。写至此，师写就与熊氏信来阅，略谓侨工局允各借二百元，请同为保证，又恐来者逾限，祈另组一款，以辅助之云云。此书即可发。并且另向熊之亲信人加番力，事当无甚难也。升暉赞诸兄平素所用之伙食饮料器具，请一皆带来。弟寓有饭盒两个，请择带一个；因弟即就图书事，亦须自办伙食也。保定亦定须此等。其他书件有用者皆可带，不要怕火车上只能带五十斤，两手提得起者，彼不干涉也。又纵无一二人

早来，亦须速将文凭寄来，以免贻误事机。从经济上打算，又不必一齐来京亦可。图书事虽微薄已甚，然颇以为宜，仍然舍不得造友之一方面也。请将此意告知家母为盼。其他种种，皆祈诸兄善为料理。感冒中，言无伦次。

彬。

七年八月二十七日在北京。①

（载《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1集）

① 时间应为一九一八年七月底。

蔡林彬给邹彝鼎

(一九一八年)

留法勤工俭学问题

鼎兄：

我接尔两封长信，详哉其言之！会事待后商量。至往法普通之疑问，则无当于弟之所持也。然究无意劝兄；兄一年中不可离长沙一步也。此回所来分子，主体太少，六人中尚有三人要考军官学校，令我寒心！升兄坐误事机，弟对之殊不欲再发一言，所最可感者，闹成一事机非常之不易，而赴事机者愈亲切愈熟知之人，则愈漠视愈犹夷而不可动。老成审慎，诚有异乎常人！究亦何敢多赞。兄之所疑，不可不于此略祛一二，以壮芝赞诸必来者之胆：一则工之性质，不可看得太拘，须知十五六万华工，消纳五六十教员及翻译，当不为那样不可能。二则不要将进学堂看得那样要紧；此外尚有其大者远者重者。且即就甘心于进学堂言，一有组织，形势便变，万无不能达目的之理，尤且有早入早达之望也。三则明年之能往与否，一审世界大势便可知，尤令人怀疑者在此点，尤不成问题者亦在此点也。再，开边事，想先觅一人托人荐到吉省办点事情，然后徐图发展。润兄说有湘乡黄君（农校毕业）可当此任大约近日即有信去。若其来省，定会来访兄，当接洽留住也。驻京惟有润兄最宜，弟则反恐不经

济，且形格势禁殊甚，兄将何以再教？

彬白。^①

（载《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1集）

^① 时间大约是一九一八年。

蔡林彬给陈绍休

(一九一八年)

留法勤工俭学问题

赞周兄：

奉来片，敬悉。此在兄不妨细心。在弟不妨卤猛。弟以为吾人行事，只可得半行半，万无全势，亦万无全理。凡弟前之所呈，似已过于得半之数。虽粗枝大叶，稀疏处多；然总不至误人太甚。即其对于李石曾先生等之信念，亦只如此而已。今谨择要条答，有不到处，请参查前信，便知消息。（一）战后尚可往，尚须人。（二）并不是专怕潜艇，只是现在船要装兵，不暇装工，李去一年以后，船行约可如常。（三）想不至延三四年。李等办有孔德中学，对于毕业生之不升学者，尚有介绍于中法合办各机关录用之语。（四）月薪不可知，想不至无。（五）只要同人来得五六七八九，定会开班。（六）只要文凭，取录不成问题。（七）育德中学为保定之学校，李等为保定之人。（八）英亦须工；但无此种组织。（九）自以李等为中坚。（十）天津工厂内容不知道。（十一）不入预校，诸公无格外资助之能力。余容润升二兄到时商量报告。顺问近祺！

弟彬复。二十四日。①

（载《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1集）

① 大约是一九一八年。

少年行^①

——北上过洞庭有感

大陆龙蛇起，
 乾坤一少年。^②
 乡国骚扰尽，
 风雨送征船。^③
 世乱吾自治，
 为学志转坚。^④
 从师万里外，
 访友人文渊。^⑤

- ① 这首诗是蔡和森同志在1918年所作。那时毛泽东同志和他在湖南青年中倡导和组织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并召集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共同商讨，提议由蔡和森同志先到北京去了解情况和取得联络。蔡和森同志便在1918年6月下旬离长沙去北京，坐船过洞庭湖，有感而作了这首诗。原稿散失，现在根据刘昂同志的记忆录出。
- ② 大陆句：指当时国内各种派系的政治力量正展开激烈斗争。乾坤：天地。一少年：作者自指。
- ③ 乡国：指湖南。骚扰：指军阀的扰乱地方、迫害人民。在1918年前后，湖南为北洋军阀汤芑铭、傅良佐、张敬尧所统治，成为南北军阀长期拉锯的战场。兵祸天灾，连年不断，人民所受的灾害极其深重。
- ④ 世乱句：上承风雨句，犹《诗经·风雨》篇中所说“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言国内的政局虽然混乱，但我自是清醒地从事学问。
- ⑤ 从师：作者去北京访问他的老师杨昌济先生。杨先生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时是毛泽东同志和蔡和森同志等最敬爱的教师。人文渊：指北京是人文渊薮，即人文汇聚的地方。这句后面，根据刘昂同志的记忆可能还有两句，但她已记不起来了。

□□□□□，
 □□□□□。
 匡复有吾在，
 与人撑巨艰。①
 忠诚印寸心，
 浩然充两间。②
 虽无鲁阳戈，
 庶几挽狂澜。③
 凭舟衡国变，
 意志鼓黎元。④
 潭州蔚人望，
 洞庭证源泉。⑤

一九一八年

(载《革命烈士诗抄》1959年4月版)

-
- ① 与人句：言与同志共同担负革命的艰巨任务。
- ② 浩然句：言浩然正气充塞于天地之间。浩然，指正义感。两间，天地间。
- ③ 鲁阳戈：《淮南子》里说，鲁阳公跟韩国军队作战，到太阳落山时，他用戈一挥，太阳倒退了三舍（一舍为三十里）。后人用鲁阳挥戈来指使敌人倒退。这句是说自己没有掌握军权。挽狂澜：本于韩愈文“挽狂澜于既倒”，是指要把国内军阀所造成的战乱平定下来。
- ④ 衡国变：衡量国内的变乱。鼓黎元：鼓动人民的革命热情。黎元，人民，百姓。
- ⑤ 潭州：指长沙。蔚人望：蔚，蔚然，状丰盛繁茂。这句当指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新民学会”，人才济济，为青年所仰望。洞庭句：从洞庭湖的浩渺广大证明它的源泉的深远众多，这句当指“新民学会”等湖南进步思想取得众多青年的信仰，有深厚的群众基础。

蔡林彬给毛泽东

(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四日)

大规模的自由研究

润之兄：

昨夜奉读来示，极忠极切！本以待兄主张然后定计，今计定矣。只要吾兄决来，来而能安，安而能久，则弟从前所虑种种，皆不成甚问题；盖所仰赖于兄者，不独在共学适道，抑尤在与立与权也。大规模之自由研究，最足动吾之心，慰吾之情，虽不详说，差能了解。兄之“梦吃”，尤其是弟之兴味，通我智核，祛我情膺，其为狂喜，自不待言。前者对于大学之兴味，全在制造友生；对于往法兴味，全在团结工人；二皆不适，亦既耿耿于心。只以事不称意，遂思超脱原计，另辟一路；实则又入网罗，此运思不缜密之过也。自由研究社，略分内容与外延。今兄于外延已略揭其端，远矣大矣，只有巴黎一处，当加矣！至其内容，弟尝思非财力差厚不举，非通一二外国文字不行。故前有虑其太早之说，又有往法做三五年工即行回国开馆延朋之想，由今思之，此亦似太早计。着手办法，惟有吾兄所设之“乌托邦”为得耳。且同侪既有一队往法，则凡所以调剂利用之者，正大有方法可想，是以前之异议，又已神而化之矣。私窃以为不但本国学校无进之必要，即外国学校亦无进之必要；吾人只当走遍各洲，通其语文，读其书

报，察其情实而已足，无庸随俗拘苦为也。吾人之穷极目的，惟在冲决世界之层层网罗，造出自由之人格，自由之地位，自由之事功，加倍放大列宁与茅原华三（此二人亦不审其果有价值否，暂以为近人近事而假借之。）之所为，然后始可称发展如量。然有时为达此穷极目的计，不必要中亦有必要在；是以本来厌恶学校也，而竟又欲入学校；本来痛恨万恶也，而竟公然主张主人君子要为恶。然此实一时之直觉，未经师友之讨论，是以前书略吐之，明知此等为兄脑中所含弘，特欲借此得丰富之反响耳。兄之行止，幸已确定，无犹夷，前书斟酌之说，实无所用其斟酌也！熊希龄氏若抵湘，请兄为往法事往会之，问其答应筹款若何，其详在致升兄书中，请查阅。谨此顺问行期。

蔡林彬。八年七月二十四日。①

（载《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1集）

① 写信时间应为一九一八年七月二十四日。

寄自法国的家信^①

(一九二〇年三月八日)

我别你们三个多月了，现在真是天各一方呀！你们大约都还在长沙。我们到法国蒙达尼的地方，恰好一个月了，共计在船上住了三十五天，在马赛住了两天，在巴黎住了五天，到蒙达尼又住了三十二天。（这七十几日中有三个特别可喜的事情可以告慰你们。）

蒙达尼是法国的一县，隔巴黎约二百里。我们正住在县城里。我所住的学校是这地方的中学校，（李石曾、蔡元培、汪精卫俱在此毕业）母亲他们住的学校是地方女子中学校，两校相隔二三百步，所以我们日日可以相见。我们的学膳费极其便宜，三个月内预备每人只费四百佛郎，现在中国的一块袁头洋，在巴黎中法实业银行可兑得二十个佛郎，故我们在学校内每人每月只费得六块多钱（洗衣等费都在内）。法国普通一般的生活，以现在看来，比较中国差不多，每人每日只能吃一个佛郎的面包，再买一个佛郎的菜，就够了。法国乡中的生活，可说比中国还便宜。每人每月包房租伙食，四十佛郎已足。我们拟在学校住足三个

① 原《湖南大公报》编者按语：“蔡君系高等师范毕业生，去岁偕其母（年已四十余岁）及其妹赴法留学。来函尚欲其父及兄姊全家赴法，可见其志趣之远大。读此儒夫亦有立志矣。”

月，然后咸熙他们就到豆腐公司去做工，我也要至工厂去做工。

豆腐公司做工的情形如下：每星期做工四十八点钟，每星期只做五日，故每日要做九点钟。工价系论货给钱，每人每日自六七佛郎至二十佛郎不等。工作有三种：（一）做干饼。干饼有两样：一样是圆的，用模型印出来的（同打粑粑一样）；一样是方的，系将和好的粉子在一块平滑的大铁板上滚平，然后用刀子切成方形。（二）包干饼。将圆形方形的干饼包成二寸半长的筒子，外面贴个封条。（三）上箱子。上到长一尺宽六寸的纸箱子内。我们三月四日到豆腐公司参观，看见三十多个法国女工和一个中国女工（四川的），年龄十三四岁的有七八个，其余或十七八岁或三四十岁不等。以上三种工作，都可不学而能。参观的那一日，向警予和我们已与该公司的经理齐先生订定，以后只须去做工就是了。齐先生极言中国绣业在法国可以畅销，问现来八个人可以刺绣否，并问将来如有能刺绣的人来，他愿介绍出货。女子勤工俭学会将来要靠绣业来发展，所以我们极望阿姊良姊早点来。溆浦女校的任培道先生今年暑假定来。我想最好全家来法为妙。（中略）总之第二次的女子勤工俭学者任先生是已决定了的。他很能干，一切都请他为首经理。然而第二次来的人（指女子）纵多不过八位，因为事实上只能如此，其余想要来的人最好是等到第三次。

华法教育会在巴黎买进一栋房屋，高大华美，如在中国，纵少也要值五万元，今进价只七万多佛郎，尚且分作十年交付。我在上海时每百元兑得千二百佛郎，后来听说兑得一千五百佛郎。现在巴黎中法实业银行，每百元兑得二千多了。所以以后带钱来，不要在上海换，到巴黎换还值价些，但以带袁头洋为最好。

阿姊如能在田产上拿出二千元来到法国，就可值四万多佛郎的产业，就可以成个中等的资本家。现在此间的勤工情形，大略还好。做苦工的每日可得二十多佛郎；做机械工的每日可得十几佛郎以至二三十佛郎。现在张昆弟每日可得十四佛郎，除伙食外，每日可剩十一二佛郎，一年可余四千佛郎，等到以后佛郎值价时，也是很有钱了（值价时大约二十个佛郎可值一元）。鹿兄如来，苦工机械工皆有做，因为机械工可以入厂学习三个月，学习时也有八九个佛郎一天，所以良姊田事如成，父亲庆兄都可来法。有个布里村的裁缝，是为我挂皮袍子的，他是去年七月到了法国，现在巴黎开了一个协和饭店，生意很好。鹿兄如来，这样事情是很多的。

我们希望阿姊、良姊以及黎泽芬、刘警余、胡意诚诸位第二次均能来就好。前头想向聂云台先生借一千元的教育费，以便诸位到沪学习，不知王季范先生进行否？今仍想请王先生至沪一行，望催促王先生早日赴沪为要。又诸位均系衡粹健将。一旦通同出来，于衡粹将来当有莫大的好影响，但于现在却是问题，所以我极望黄先生能亲自来法一游。（中略）来时，多带些米粉子干菜干肉，船上的面包不如法国好吃。无论如何晕船，总晕人不死，所以初晕时不要怕。我的苦朋友陈绍休他还未来此，问问何叔衡或陈启民先生。如果能同他一路来。是很好的。（下略）

阳历三月初八日和森谨上^①

（载《湖南大公报》1920年5月13—16日）

^① 一九二〇年。

蔡林彬给毛泽东

(一九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

研究社会主义

**希望实现小学计划,劳动教育,合作运动,
小册子,亲属合居等。**

我们须于文化运动更进一步

润之兄:

我到法约近五月,时常想写信与你,又时常按住。我和母亲及警子、咸熙等以二月二日安抵巴黎,母亲心力颇强,故船中困疲皆已矜持过去。我初到时,因旧病复发,甚为痿弱,旋偕母亲及警子、咸熙等来蒙达尼地方,分入男女中学校,补习法文。母亲与咸熙等同起居,同上课。我则决定恢复体操游息,略如麓山故事。每日生活,全在公园空旷中,不上课,不看书,惟饱吃面包。而如此一月余,体气大健。日看法文报一节,因校中功课浅,及求知欲切,决不上课,日惟手字典一册,报纸两页,以为常。情形如此,故一切无所活动。所以常想写信与你,又常常按住。

我现在还是聋哑兼全,(因不注意语言,又没有直接和法人接近,)不过不尽为瞎眼耳。看报渐有门径,各国社会运动消息,日能了解一二,颇思综合写来,以作我与你通信资料,(因此外仿佛无甚可告)这也是我写信与你迟迟复迟迟的原因。近正汇译

德国政变与其社会、共产、工团各党消息寄你，起自社会民主党之分裂，以迄此届选举终结，故须等至六月中旬始能告竣。（德国此次选举期为六月六日）而你四月一号与四号的信，均由子升转来了，因此赶紧先行写了此信。

我在法大约赖五年，开首二年不活动，专把法文弄清，把各国社会党各国工团以及国际共产党，尽先弄个明白。一面将社会、工团、无政府、德谟克拉西（基尔特社会主义，即综合此四者而成一调和，近德国多数社会党，显然立足于二个主义之上——社会主义与德谟克拉西，以与中产阶级联盟。）加番研究，一年中以蛮看报章杂志为事，一年后兼习说话听讲。现一切住校费用，皆由华法会借出，（勤工学生皆同）或者还可续借数月，至没有借的时候，才去做工。警予等皆同。如有他法可想，成权其轻重，把工按住，若能，则当然经济得多。以现在俭学费用之廉，实足以加增俭学之动机。警予已决计俭学数年，将语言习好，情形习熟，设法大辟女子外出之路。勤工俭学生近千人，好分子占极少数，暂不多加组织，（现只有工学励进会，为李和生、罗学瓚等所组，潜在进行。）新民分会亦暂按住，俟机会成熟，将来自有办法。

兄留湘两年，极为重要。我意章甫于兄在湘之时，亦不必外出，可在长沙极力教小学。两年之中，会友能办到百人教书，最好没有。启民、惇元宜久在湘，主持教育，不动。兄如不办报，于自修外，宜紧张教书。少年互助团大好，两年中能鼓舞其增至千人以上，更好。诸兄在湘，宜于此团体大加提挈，启发。叔衡似永不可离湘。去俄不如留湘之重要。如何？（就他一人及会务言）犹望能将小学计划实现。此事比之出报更重要。学会办文化运动本为应有之事，我们既不为浮游于大码头的文化运动，则

根本上的组织和训练，比之出报、出杂志更重要。现少年中国学会（此会在四川本地无根据）专以办文化运动为事，我以为好，但是我们的须更进一步。湘事定后兄首先聚精会神，将小学实现为要。有暇则从事《湘江评论》亦好。不过两年中总不宜因出版而碍会务进行。（指被封而妨学会等）

我以为我们于文化运动，大可仿照李石曾贴邮花的办法。此时我以为新民学会宜办三种邮花，以扩其用：一种贴于男女各师范学校，其法在办好会中学术演讲会及以个人与师范生之优秀者往返。一种：贴于各县各乡的小学校，其法以上之联络师范生为根据，俟他们返乡办学校，即可实行。或择现任各处之小学教员通信及介绍书报启发之。一种：贴于现行之各出版物上。此三种邮花，皆可济会中经营之穷。（因会没有钱）而其作用与自办差等。兄以为如何？

现在中学以上的文化运动，要算各处都已迸发了，新民学会所宜注意的，自小学文化运动以外，应注意劳动的文化运动。但是如何办呢？一，我以为你的小学计划成，同时应筹划劳动教育。二，应鼓吹各种合作运动。（消费组合贷借组合要紧）三，应出一些小册子（仿新生活）。四，好小学能设法多收农家子弟更好。五，聚会友中之兄弟讨论，如鼎丞之兄，你之老弟，我之兄，警予之兄，（经商能手，现在乡经商，且极可与谈）叔衡、瑾玎亲属、教新会友之亲属，都可以约聚，启发一下。我对于会中意见，大略如此。

咸熙答应入会。溆浦女校教员任培道女士，今年夏秋间来法，警予甚称其为人，（问陶女士知道）我们想介绍入会，此人道经长沙，请邀聚讨论女子事宜。又溆浦女校长吴家英女士，（溆浦女校教员大概皆好，问陶便知）亦很好，如来省，可与谈。溆浦

女校为警予及伊等极力经营之学校，我意学会当郑重贴几分邮花于其上，请酌之。此校太僻处，当设法传递新出版物。又溆浦女生，（问陶便知）在省垣女师范者很有几人，此皆百经训练，有如子升之学生，其中有警予侄女，极好，极好，请邀同陶斯咏极力加以提携，将来必有可观。

我写至此处，发了狂热，希望陶女士和启民久顿周南，惇元久顿修业，叔衡久顿楚怡，兄与章甫于两年中将小学校办好，然后赴俄，则根深蒂固矣。

新民学会尽其可能扩大，同时尽其可能严格，这是我的总意思。

我与警予有一种恋爱上的结合，另印有小册子，过日奉寄（现未印出）。家母甚好，惟间有旧病复发，惟不如在国内之甚，他诚挚的希望你，致意你。警予忙课，未另写信，也致意你。国内新出版物，请设法多寄（过日议）。现在我们定了的为《时事新报》，《解放改造》，《建设》，《新潮》，《新青年》等，中华馆新出版之世界两种图，有钱请买寄，《时事旬刊》还出否？

刘清扬女士弟曾介绍入会，此人现往南洋，不知兄有机会见之否？此人很可以，弟又曾与兄言王启润女士，在京见之否？新会友之性格，请随时介绍一二。邹蕴真兄如何？宜使其来长沙，或在乡办学校。杨师遗眷，弟主张来法，兄以为何如？忙问安好。

弟彬。 一九二〇，五，廿八号。

与弟信，皆由子升转。

此信请转启民、惇元、叔衡、殷柏诸会友未另，乞恕。

（载《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3集）

蔡林彬给萧子璋、彭璜

(一九二〇年六月一日)

绣业公司问题

子璋兄殷柏兄：

接二兄各一信，喜如面见。工读互助团此时谅已就绪。女子留备，最好是暑假起程来法。弟见与璋兄同来时，须带材料与丝线，此间皆系人造丝，货坏价贵。家姊及千昂能同来更佳，不然，亦请璋兄商之良权姊，设法携千昂来，此间生活不成问题。聂云台、陈子绶、张默君既皆预闻绣业组织事，我们可以不必求备，只须尽其可能，使他们能直接间接帮一点忙就是了。绣业公司虽一时难成，惟上海方面不可不置一联络通气的基础，望璋兄注意。殷柏兄能久在沪，愈久愈好，两年中不必他往，与清扬久顿各界会，奔走联络。此时清扬已往南洋，润之来沪，不知能否会见，如清扬已返沪，润之还在京，殷柏兄应邀润之再来沪一行，与清扬协商一切。弟前数日有长信与润之，系由李著尚处转，见润之时，问其到否？今不另写信。沪上俄人甚多，海参威亦须设法联络，置一基础，请注意。致清扬一信，请转，敬问近安。

康白情见时，希代致意。

子暉兄以來法為好。

彬

九年六月一號。

(載《新民學會會員通信集》第2集)

法国最近的劳动运动

(一九二〇年六月十三日)

凡稍微研究社会学的，莫不知道德国马克思的学说与法国蒲鲁东的学说，显然分为两大学派，而法国异军特起之 Syndicalisme 实受蒲氏学说的影响，才立为确定之主义，三十年来，以工人阶级之自觉与团结，于现政治之下取得法律上的地位，而成实现之组织，即结合同一区域同一职业的工人而为工团(Syndicat)；联合各处工团而为工团联合会，联合全国工团联合会而为劳动联合总会(Confédération Generale du Travail)简称为 C. G. T. 他的性质为经济的而非政治的；他的组合为职业的组合而非工业的组合(工业组合本为后起的新组合主义)；他的制度为联合的而非统一的，劳动联合总会到现在有二十五年的历史(一八九五年成立的)，有二百五十万会员，为法兰西工人阶级行动的中枢。假如那一个行业要罢工，就可提议于劳动联合总会，如经总会认可，总会就与之负那运动和指挥的连带责任；或令其他之一行业或数行业或所有各行业同盟罢工，以厚其运动之势力；或一行业单独的无限制罢工，而令各行业维持其罢工费用。工团、工团联合会、劳动联合总会，都不设会长，工团的会务由执行委员会行之；联合会的会务由联合委员会行之；总会的会务由行政委员会行之。书记为极重要之职，可算为会中主干。近年工人

经济问题，自增加工钱逼到国有的问题了，故劳动联合总会设有劳动经济会议(Conseil économique du Travail)。

按照工团主义，各种产业支配管理权均应归于各行业的工人之手。大战以后劳动运动的新趋势，就是挨着这种目的而进行。自从去年二月底英国三角同盟产业国有的运动发了端，到今年二月底法国路工也要求铁路国有了。产业国有计划，劳动联合总会会计之已久，不过到最近才大大地见诸实际运动。然而现在的国岂不是中产阶级的国？从资本家的公司里移到资本家的政府里去，究竟有甚么多大的分别呢？所以按工团主义而要求国有，初听之不免有点疑怪。其实现在劳动界的国有运动，不过在现政治之下不得不以所有的名词归之国家，而支配管理的实权，纵少也要一半握于工人代表的手里。这就是国有运动的要点。三角同盟所争的在此，劳动联合总会所争的也在此。

今年二月底法国路工罢工，为要求铁路国有之头一声，不久政府即答应将拟定铁路改组计划，提交议院，并交劳动联合总会经济会议审查。故这次罢工于三月二日即终止。三月四日，劳动联合总会宣布其国有之根本观念说：

要使全国铁路变为社会的集合产业，应为全般社会的利益而经营之；不应由几个特许专利的公司为资本家惟一的私利而经营。……经营与管理此集合的产业，完全由集合的团体主持之，而不由政府主持。我们曾再三宣言绝对的拒绝官营(L'etatization)，……惟由集合团体的代表，生产机关的代表，消费者的代表所组成之自主的机关主持之。……撮要言之就是：排除一切的私利和资本家的垄断。以全国铁路为国家所有，而其管理权一付之上列三种代表所组成的自主机关，此机关对全社会

负责任，一切行政与管理的方法均为自动与自发。

政府于三月九号，打电话给劳动联合总会总书记 Jauhanx，请其供给关于铁路改组的新意见。三月十五，劳动部送一信给劳动总会，说该部于三月十八召集一个会议，请劳动经济会议派代表来部，以备顾问。Jauhanx 复他一信，说那日总会自有会议，不能派人来。四月二日，劳动部又有一信给总会。总会因为不满意于他的计划没有答复，于是这个问题就搁起了。不久路工联合委员会改组，新委员均为极端派。

五月一日，为万国劳工会议所规定的劳动节，每年各国工人，例于这日休业，做一个阶级的大表示或大示威。上年法国这一日的示威运动，很为厉害，与军警冲突，牺牲多人。至是新路工联合委员会，对于国有计划要积极进行，拟乘五月一日的机会，做一个无限制的总罢工。四月二十七日，路工联合委员会以二十八票对二十四票通过从五月一日起无限制总罢工的议案，四月二十八日提出于劳动联合总会。是日总会行政委员会与路工联合委员会开联席会议，决定路工于四月三十夜十二点钟起无限制总罢工。于是无限制的大罢工与劳动节的大表示合而为一，就成了最近劳动运动的伟观。今把各种重要宣言撮要写出，以见这次运动的伟大精神。

路工联合委员会的宣言：

铁路工人啊！以前政府许多的预许，答应改良你们的地位，现在不但一个没有解决，而且你们必要的生活，时常觉得不可能了！在这产业私有经营的时代，日常生活之昂贵，我们已饱受了中产阶级资本家的惨苦。而他们正努力保护其私利，欲关住一般人民于穷困祸患之中；他们正围困你们的奋斗者，敢于遏抑你

们的正当要求；他们正努力控制工团的自由，他们的脚老踏在工人极神圣的权利之上！路工联合会决定以路工惟一之行动，进而为全工人阶级之行动，向那新刺戟做个大反响，以求达到我们生命改良的目的。五月一日你要表示你们愿得的东西：（一）铁路国有；（二）因罢工而失职者复职；（三）释放叠次被捕之奋斗者；（四）尊重工团的权利。铁路工人呵！此时不应迟疑了，五月一日开始你们的行动，继续到完全胜利的时候才止。各行业的工人呵！切莫忘记了罢工的权利，这是工团的权利，不要惊惶失措呵！铁路工人保护你的权利和奋斗者；压胜你的威迫者；你的威权在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明日呵！

塞纳工团联合会的宣言：

同人呵！五月一日为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劳动纪念日，我们每年要庆祝他的……五月一日又是宣布中产阶级一切罪恶的机会。中产阶级的倒帐，是不可免的了。他已犯了腐败社会的罪恶，他那筋挛挛的凶势，几使社会成了尸僵。若是我们没法子诊治，他的凶症将充满于全世界。……五月一日为我们极光明极好表示的日子，我们用体力用脑力的工人一律反对政府对外对内的政策，一律反对他们那反革命的举动。他们或明或暗，不知发出了几多反动于全世界，比方在匈牙利那种残酷的反动，就是个明证了！……我们一律反对那无廉耻的自私者，不劳动而把持生产的富源，横行他们那贸易主义和特许专利！……我们一律反对那祸根的帝国主义，他们还日日在那儿增加税项，募集新债！……我们惟有大同盟罢工以致他们将来的命。罢——罢！无限制的延长罢下去……欲使世界真正和平，我们应得做到下列几件事：

(一) 复审要死的凡尔塞和约；

(二) 抛弃一切反对世界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反动：如最近与德政府协同压灭鲁尔区域之劳工革命，与几年来对于俄罗斯革命运动的反动；须正式承认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

(三) 消灭军国主义，全国解除武装；

(四) 男女完全平等：如正义的努力，幸福的努力，市民权与政治权，均应有同一之机会；

(五) 无限制的全体大赦：如一九一七年下狱之黑海水手，屡次罢工之被捕者，均应全体释放，因为这些罪恶都是资本主义犯的；

(六) 铁路、矿业、水运，以及一切中等的生产，均应收为国有，最好言之就是社会有。

最后就是在法兰西全国内，推行现行于俄罗斯而革新俄罗斯的共产主义。换言之就是要使统御宇宙的社会主义从此登基！……我们今日所努力的：在确定人民的经济，以救此太不公平的穷困和惨苦！

塞纳工团联合会又有一个布告：

今年五月一日的表示，用全般一致的方法，要比上年的更厉害更可怕！……一九一九年克列满梭政府剧烈的反对塞纳工人，今年各行业应一律参与，没有例外。……离开你们的工厂、局所、码头、矿山、店子，结合你们全体的同人，要求：大批公众应用的产业，直接收为国有；尊重八点钟制；扩张工团权利；实行全体大赦；承认社会根本改造之必要，建筑一新社会于劳动基础之上，以谋全般的利益和幸福。……五月一日都不要去做工，马克思有言：“谁要吃谁应生产”。

社会党宣言：

上年法兰西无产阶级于劳动节日做了一个总罢工，以答复劳动联合总会的请求，这在我们国内为未有的盛举。今年这种表示，应得更严肃而一致。用个全体停止经济生命的方法，以表示工人阶级的志愿是要急切达到他们的要求：（一）全国大赦；（二）扩张工团权利；（三）与俄国和平；（四）全国解除武装。当此国内国际紊乱无序的经济政治，血淋淋的中产阶级的倒帐之前，工人阶级所郑重肯定的，是要以生产国有、贸易国有的方法达到其奋斗的共同目的。……社会党以百七十万选举权者，敬请工人阶级于五月一日恪守劳动联合总会所布告的极严谨的方法与教训。“联合的秩序”这句话，全体工人应予以最好的答复和勇健的突进。社会党是相信工人阶级于这次大表示不会有缺憾的！此时政府与议院的反动，正在那里舍死保护他们的特许专利。那负大战责任的资本主义，已致全社会于破产，而使起国际永远不安宁，每日生活腾贵的困难有进无已。……五月一日来了！工人动员了！应有个可惊的团结可怖的纪律，这是新社会秩序的发端呵！

此外还有许多极激烈的揭帖，都是一片“穷困”、“破产”、“中产阶级倒帐”、“革命”、“苏维埃”、“无产阶级的迪克推多”的呼声。法国工团主义本有“革命的工团主义”之称，这种呼声当然是应有的，不过从前没有这样厉害罢了。假使上年苏维埃的匈牙利不被他政府绞死，今年三四月间德国反动革命后的劳工革命能告厥成功，那么，世界头一个敢作敢为的法兰西无产阶级，当然还不止是这个样子。

这次表示的方法，与从前大不相同，不游街，不示威。劳动联合总会三令五申，说：此次的运动不是游街示威的运动，惟须于

寂静严肃中表示其坚决勇敢。惟一制胜的方法，在完全停止全国的经济生命。绝不要稍授人以口实，犯那久已准备好了的军警的锋，坠到他们奸计里内去，使这回运动软弱无力。

到了五月一日，全国工人——自各大行业以至演戏者、图画师、咖啡店、饭馆——通同停了工作。一遵劳动联合总会的命令，不游街、不示威，集会演说，多于郊外行之，惟在巴黎因军警故意寻衅略起冲突。这一日的组织力和纪律，要算如量表现了。虽政府的机关报加以称许，说是和平合法的表示，得了“德谟克拉西”的真精神，不知这乃是民众运动处于暴力压制下不得已的一种变形，不然他们何以要全国解除武装呢？那中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他们早已宣言与他们没有关系。

四月三十日，劳动联合总会已议决令矿工、船渠工、水手，三大行业与铁路工人一致行动。五月一日，路工联合委员会与总会行政委员会联席会议，路工委员提议，说北方各路罢工者只四分之一，东方各路形势更为恶劣，这两大部分游移不决，外间很有总会与路工联合会不和的风声。路工联合会代表希望总会决定一广大的连带负责的行动：令矿山工人、海上工人、船渠工人即刻大同盟罢工，以消灭外边谣言。于是总会发出三大行业罢工命令，从五月三号起（因二号系星期日）。

五月三号四大行业——路工—矿工—船渠工—水手——同盟罢工。罢工者号五十万。这四大行业可说为国有运动之主干。如路工要求铁路国有；矿工要求白煤国有；船渠工要求港埠改组；水手要求海上运输事业改组，并反对船主于德国赔偿法国之海船内分了十五万吨船位的赃，约值二十万万以上，这都是他们水手的性命兑来的，理应退出，收为国有。

五月二号内阁总理米勒兰对报界代表说：不幸的大战，法国虽获胜利，但和平时需工作与生产更甚，若是照常的运输作用停止，那末，又不能工作又不能生产了。为问路矿各工，把手靠到背上，岂不是要更加重生活昂贵的危险么？也没有个甚么要求不可以和平请愿的。并且昨日参众两院，已再三向矿工表示其诚恳，接受他们的要求，即承认扩张矿工养老金的法律。他们口口声声要国有，不知政府正忠于他的预许，将在议院中通过其铁路改组政策。当此宣布同盟罢工之下，政府绝不见得是一般的公意，愿和他们做这种革命的运动。公众的意见，显然反对这种革命风潮与示威。公众实一致要在和平中工作。政府对此惟有尽其职分：维持秩序，保障工作。应合以其威信与善意，请求大多数工人始终爱国，离绝那犯罪的煽动。

中产阶级各报载各业罢工很不一致，劳动总会罢工命令，在 Nord, pas-de-calais, Loir 各大矿区，没有发生效力。当罢工命令到那里时，参议院恢复工作的命令也到了，所以仍照常工作，大多数矿工，以为北方路工尚没有罢工，他们很不愿维持路工的运动。四号劳动会长 Trocquer 对报馆记者说：中部大多数的矿工，没有加入罢工者达百分之三十五。Nord 的矿工不罢工，其影响很大，法国每日矿产总额为四万吨，而 Nord 日占二万七千吨。各大港埠的工人，大多数也还没有离开工作。至于路工，罢工者不过百分之三十云。

六号五金工人加入罢工，九号劳动联合总会出一布告说：政府拒绝考虑工人阶级的要求，劳动联合总会不得不扩张其运动，从明日起，运输工人、河道工人、五金工人、快车工人（电车摩托车工人）、房屋工人，一律加入大同盟罢工。……自从几月以来，

工人阶级所设定的条件，政府老不承认，我们工人惟有用手取之耳。工人阶级有全般利益的自觉，绝无自私的意见，为问铁路改组的计划，怎么不承认生产者的地位呢？这个布告又向工人说：总会免避可以给人口实，惹起暴力压制的举动。须知现在的运动不是街上的运动，他的目的，是要使政府承认劳动社会的势力，并使他知道继续他那顽固的态度之不可能，及劳动者在全国经济活动之必不可免的改造中，所应占的地位之为必要。总会决定战争到酣足满意的地步。今特提出注意之点于同人：（一）反对一切可以发生冲突的行动；（二）反对不由责任机关发出的揭示。

到了十号共有九大行业——路工—矿工—水工—船渠工—五金工—房屋工—快车工—运输工—河道工——罢工，总额号百万。劳动联合总会又发出通告说：行政委员会考虑此次运动之目的，郑重请求各业同人聚精会神于惟一的共同目标，不要为别种目的分了心，比如工钱之增加，工作条件之满足，此时皆不宜提出，因为这些特别的要求可以分散大运动的势力，减少其达到目的的效率。此次运动的目的，全在应用产业国有的原则，来做铁路改组、矿业改组、港埠改组、海上运输事业改组。

十一号政府发出通告说：政府已向法庭提起诉讼，司法部开了个审查会，按照一八八四年三月二十一的法律第三、五、九各条，劳动联合总会应得解散之结果，此项法律只赋与工团及职业的工团联合会以研究及保护其经济的利益之权。比晚，劳动联合总会发出通告说：劳动联合总会为合法存在的机关，他系由法律承认的工团及工团联合会所联合而成的，已经久历年所。政府要逞凶来解散他，不但不行，而且负了否认法律的责任。十二

号，社会党与社会党之议员及社会党各报，皆大声疾呼，反对政府。北方路矿各工，至此也一致罢工，以答解散总会之刺戟。

此次政府外面虽然强硬到底，自拒绝谈判以至示威解散，似乎愈接愈厉，不稍让步，但骨子里的三魂七魄，实被劳动运动的势力征服了。劳动会长 Trocquer，于十三号在《小巴黎人报》宣布其铁路改组计划，其重要之点为：于铁路公司之上建设一铁路最高会议，以铁路公司代表二十四名、职员及全国一般利益者——工业—商业—农业——代表二十四名组成之。最高会议握全国铁路之管理权与行政权。此计划最后重要之点为：劳动与资本应得同样的红利，他规定劳资分配的数目系以三分之二分给职员，三分之一分给股东。十四号劳动总会的布告说：昨日劳动会长在某机关报所公布的计划，是工人要求已经立了根据的证据。总会副书记 Dumolin 在《人道报》上发表一篇论文，也说这种计划是三年以来不能由平常方法得到的，今日已由直接行动得到了。

九大行业罢工，到十四号加到十二大行业。即电灯工人、煤气灯工人、家具工人，亦次第加入，但均不能持久与一致，如巴黎煤气灯工人罢工者不过百分之四十；电灯工人，至十三号又纷纷上工；运输工人罢工者日见减退；五金工人上工者日多；电车摩托车仍通行如常；路矿各工原先即不一致，至十四五更停滞不进；法国全国工人本还有大多数未入工团，即入工团者亦未能一致罢工。此次罢工人数已达会员总额之半数，而又支持如许之久，劳动联合总会要算尽力盘旋了。十六号总会行政委员会与路工联合委员会联席会议，讨论至半夜，决定于五月十九号在劳动联合总会开全国联合委员大会，审查罢工情形。

十九号既为全国工团联合委员大会开会之期，又为众议院

开会讨论罢工事件之期，各讨论三日之久，才行解决。今先把众议院讨论的大略写到下面：

关于罢工事件，各党议员提出质问十一种，阁员均出席于议会。第一日共和党议员Taittinget大声祝贺此次罢工之失败，他以为这是政府对付得法，他更希望大多数工人以后如这次一样的尽忠于政府，以确定政府的威信。次急进社会党议员Deura-four说劳动联合总会并没逾越法律，国有运动即根据于保护工人经济的规定而来，政府改组铁路计划，应与劳动总会通力合作。次民主共和党议员Rallin说他考究此次运动的原因是带有政治的革命的性质。他考究此次运动的失败有三个原因：一是幸得大多数善意的工人很聪敏，他们晓得人家是要他们干革命，故不肯信从，所以此次运动小产了；二是幸得一些青年学生抛弃学业，和他们的教员来担任一国生命枢要的服务（指铁路），故此次运动触了礁；第三就是幸得政府贤明有识。次民主共和党议员Engerend说路工联合委员会完全是一运动革命的机关，十六个新委员均是极端派之最激烈者；又有一人说劳动总会为革命的总机关，他有个反对国家的阴谋。第二日社会党议员Cahin说罢工运动全世界都有，在法国不算甚么希奇。他的总原因是起于不公平，而在法国这种原因为尤甚。他历数资本家之垄断自肥，生活之昂贵，以及政府拒绝劳动总会为不应当。内务会长Steeg说他反对此项政治性质的罢工。平常的罢工本为应有的本分，但此次乃系极端派路工委员胁迫劳动总会所致，意在继续停止国家经济的生命，以推倒政府，其目的全在内乱，政府不得不为内乱之打破者。次社会党议员Pauil Boncour有极重要的演说，全场都向他拍手。他说：劳动总会是合法的，罢工也是合法的。

在他的计划内，在他的方法内，在他的目的内，都没有不合法的地方。他是合法的工团的集合体。人人都知道工团主义是革新法国的工具。至于罢工，本没有在那个律例内有规定他的明文，现在要分出那种罢工为正当，那种罢工为不正当，乃是不可能的事。劳动总会为维持路工国有的要求，这不是政治的性质，乃是经济的反响。正为按照法律为保护工人经济起见，工团不仅只能从事于职业的问题，又可从事于经济的问题，明为法律所规定。国有运动，完全是经济改造运动，故只有政府解散的诉讼乃真不合法。他又说：凡不完全的改良，好如一把连环的铁锁，但社会改造，终须从此连环的铁锁内打破出来。况且今次运动，谁分得出是改良，或是改造的革命。其实今日有个极伤人的事体，就是生活困难，工钱总赶不上物价的抬高，把无产阶级压迫的如关在铁桶里内一样。现在人人要从那铁桶的环境内打破出来，只有用这个广大的社会的经济的改造来打破他。第三日社会党议员 Brack 质问停止许多学校的功课，驱使学生抵制罢工，他说政府犯此不法的行为，不独使许多青年学生为罢工之破坏者，而且有几个很大的学校因此关了门。并闻政府将给敌对罢工之学生以奖章，实为挑拨内乱之萌芽云云。这日米勒兰说明他对付此次罢工运动的政策，他说路工过激分子推翻委员会取而代之之后，专意弄成这次的大风潮，故这罢工的原因，一不是为得行业的利益，二不是为得国有，乃专为过激的几个路工委员要捣乱。他又说此次政府所以拒绝劳动总会的原故，因为劳动总会仅五月五号在《战争》（工党机关报）报上向政府公布一个宣言，要政府承认审查他那与政府相矛盾的规定（即劳动总会的铁路改组计划）。政府对于这种间接的请求当然不与以答复，倘若稍

微让步，那就是政府软弱无能了。他又说此次罢工乃是一个革命的军队，政府按照法律，当然用其合法的军队维持秩序，保障工作。他又说这种革命的运动，料想与俄国鲍尔雪维克无甚直接的关系，至于拘捕与搜查，乃为政府防护国家应有的事。次劳动会长将他历次请劳动总会派代表来部的信札说了一些，以明此次曲在劳动总会。最后共和党全体议员及各党连署之议员提出赞成政府社会政策，信任政府案。分作四次投票：

(1)关于尊重工团的权利，以五百二十一票对七十八票通过。

(2)填谢不罢工之工人，以五百十八票对八十四票通过。

(3)信任政府，以五百三十一票对八十八票通过。

全案以五百二十六票对九十票通过。全案原文是：

众议院决以平等的精神担保劳动之自由，与工团权利之尊重，反对各种迪克推多的倾向，维持共和国家法律之尊严。众议院谨贺大多数自由意志的工人能抵抗反乎国家生命利益之行动，重谢诸君在其本分中尽其情愿帮助国家之义务。众议院赞成政府之宣言，并信任政府于秩序与自由之中执行全国与社会的公平之建设。

统看议院中各种议论，我们可以知道这次运动多方面的消息。今再把全国工团联合委员会的大略写到下面：

十九号劳动联合总会开全国联合委员会，审查罢工情形，共计全国联合委员会代表三十八名，各州联合会代表七十二名，亚尔塞斯、劳兰二州的代表亦在内。由塞纳工团联合会总书记 Plrret 主席，由总会总书记 Jauhanx 报告罢工之历史，然后投票通过下列之议案：

全国联合委员会，以各州工团联合会代表及全国工业联合会代表组织之，以保护劳动联合总会反对政府之压迫为鹄的。

关于政府反对全国无产阶级之总机关而提起诉讼之行为，全国联合委员会宣布劳动联合总会为合法的机关，他的行为亦极合法。此机关既为全国工团与工人所组成，故全国工团与工人一律反对推翻他解散他者。

全国联合委员会反对政府滥捕罢工之战士，加以无根据之罪名。

第二日主席报告万国工团联合会致法政府之电报。大意是：法政府以解散威胁劳动联合总会，而罢工之战士亦多被牺牲或拘捕，法政府对付工人之行为，一反从来极其高雅之法兰西人民的习惯；万国工团联合会以最后之努力反对法政府对于其无产阶级之压迫；法兰西无产阶级应取得地位以保障工团运动之自由，应如在他各国一样云。次由多数委员提出即刻恢复工作的议案；由路工委员提出继续无限制大同盟罢工的议案。

第三日以九十六票对十一票通过上列第一议案。由全国联合委员会发出停止罢工命令，于五月二十二号，除路工外，一律恢复工作。路工联合委员申明，路工联合会须按照本月十八号的决议，继续（无限制）罢工，不达目的不止。全国联合委员会为尊重联合的自主起见，予以承认，并予以费用上之辅助。最后全国联合委员会抄录其各种议案提交于议院说：“改变路政，不应屏除工人阶级的代表于事外，不应置那极合法的工人的热望于不顾。”路工继续罢工，罢到五月二十九号，亦已恢复工作。于是轰轰烈烈的大运动至此告一段落。一诉讼案，法庭于五月十四号曾传讯劳动总会重要人物 Jauhanx（总书记），Lanrent, Damou-

lin (副书记), Calveyrac (会计), 至六月六号又传讯一次, 现还没有解决, 大约解散是必不会有的事了。至于政府对付罢工的方法, 除武力弹压外, 就是以“阴谋反对国家”的招牌, 四出搜查与拘捕。劳动运动中重要的指挥人物以及社会运动中重要人物, 均被捉去。共计捉去十八名, 今把其名字列下: Pierre Monatte (《工人生命报》的主笔), Henri Sirolle, L'èveque, Monmousseau (三人系路工联合会的书记, 为此次运动之发动者), Loriot (为C.A.P. 党创造人), Delagrangé (工党中人物), Rey (Allier工团联合会的书记), Sigrand, Gauthier, Cour age (皆为重要的铁路工人), Totti (马赛铁路工团的书记), Chaverot (巴黎p-L-M工团的书记), Hanot (《苏维埃报》的主笔, 此报为共产党之机关报, 共产首领为Girault云), Lebourg, Giraud (二人为《苏维埃报》发行人), Boris Souvarine (此系假名, 他的真名叫Liftchitz, 他是一个珠宝商人的儿子, 现年二十三岁, 他系第三国际社会党——又叫第三国际共产党, 即中国报上所常见的莫斯科劳工党——的书记, 又为法国《人道报》及《平民报》的主撰人), Chauvelon (为青年补习大学的文学讲师, 常常在《工人生命报》上做文章), 此外被搜查或没有捉到的, 还有许多。许多政府说他们是与俄国鲍尔雪维克暗通, 谋革法兰西的命, 使法兰西变成为苏维埃共和国。在法国内阴谋的机关有三个: 一是莫斯科第三国际社会党的委员会 (所以Boris Souvarine被捉); 一是加入第三国际共产党的法国那一部分的共产党; 一是苏维埃共产党联合会 (La Fédération Communiste Des Soviets); 并说: 在Monatte的屋里搜得两个电报, 一个是Trotsky (脱伦斯基) 的; 一个是Dridzo的, 他是一个社会民主党的老战士, 在巴黎很著名, 一九一七年已离

开巴黎了，因此疑鬼疑神四出搜查，大有超过莱茵河搜到俄罗斯去的样子。但是他那百七十万的统一社会党，今年三月在Strasbourg(亚尔萨斯首府)会议，已决定脱离第二国际社会党，加入木斯哥第三国际社会党了，又将怎么样呢？

一九二〇，六，十三，写于法国蒙达尼

(载《少年世界》第1卷第11期)

署名：蔡和森)

蔡林彬给毛泽东

(一九二〇年八月十三日)

社会主义讨论 主张无产阶级专政

润之兄：

湘局定，想已归。前见改造宣言，如能照行，甚善。来法会友上月在蒙集议一次，详情子升报告。我到法后，鹵莽看法文报，现门路大开，以世界大势律中国，对于改造计划略具规模。现搜集各种重要小册子约百种，拟编译一种传播运动的丛书：

(一)世界革命运动之大势。

分四种形势：

1. 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地方——俄。
2. 无产阶级革命已发动或小产地方——中欧及巴尔干战败诸国。
3. 阶级革命酝酿的地方——五大强战胜诸国。
4. 阶级觉悟发生后由爱国运动引导到布尔塞维克上去的地方——诸被压迫之民族、保护国、殖民地，如波斯、土耳其、印度、埃及、朝鲜、中国等。

(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之四种利器。

1. 党。(社会党或共产党)发动者、领袖者、先锋队、作战部，

为无产阶级运动的神经中枢。

2. 工团。先的作用为实力的革命军，不可破获的革命机关。后的作用为生产组织。

3. 合作社。先的作用为劳动运动革命运动的经济机关，进而打消贸易主义，为消费组织。

4. 苏维埃。无产阶级革命后的政治组织。

(三)世界革命之联络与方法。

1. 万国共产党(本部在俄)之计划与方法及新旧国际党之经过。

2. 万国工会组织、作用、最近之举动。

3. 万国同盟罢工(如最近万国矿工会宣布如协约对俄再战则下令英法矿工罢工)。

4. 万国同盟结交(如今年六月万国工会宣布与虐杀工人及社会党之匈牙利反动政府同盟绝交，电邮路船，都不与通，结果被捕之人民委员得减死刑)。

(四)俄罗斯革命后之详情。

这四种东西，现已搜集许多材料，猛看猛译，迟到年底，或能成就。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缔，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

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

我认为现世革命唯一制胜的方法。我现认清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的反映。其重要使命在打破资本经济制度。其方法在无产阶级专政，以政权来改建社会经济制度。故阶级战争质言之就是政治战争、就是把中产阶级那架机器打破(国会政府)。而建设无产阶级那架机器——苏维埃。工厂的苏维埃、地方的苏

维埃、邦的以至全国的苏维埃，只有工人能参与，不容已下野的阶级参与其中，这就叫做阶级专政。无产阶级革命后不得不专政的理由有二：

无政权不能集产，不能使产业社会有。换言之，即是不能改造经济制度。

无政权不能保护革命，不能防止反革命，打倒的阶级倒而复起，革命将等于零。

因此我以为现世界不能行无政府主义，因为现世界显然有两个对抗的阶级存在，打倒有产阶级的迪克推多，非以无产阶级的迪克推多压不住反动，俄国就是个明证。所以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

我想编的“四种利器”，亦是我这一回要与你具体商量的。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但是宜急宜缓呢？我以为现在就要准备。现在红军已打到波兰而压入波斯，这种情形你必熟悉，而中国摇身一变的政客和武人（如陈炯明）正在准备做列宁，我预料三五年中，中国必有一个克伦斯基政府出现。换言之，必定有个俄国的二月革命出现。主持的人必为一干摇身一变的旧军阀、政阀、财阀，而结果产生一个不牛不马的德奥式的革命政治。这样一回事，我预料有少数的青年也会参与其中，但我不愿你加入。我愿你准备做俄国的十月革命。这种预言，我自信有九分对。因此你在国内不可不早有所准备。

然则这种党如何的准备组织呢？照旧组织革命机关，是不

中用的。我以为要邀一些同志跑到资本家的工厂里去，跑到全国的职业机关议会机关去。去干甚么？去做工、办事、当代表、做议员。我望你物色如殷柏者百人，分布全国各处，不必他往，亦不必另组机关，即以中产阶级现成的职业机关、议会机关做革命机关。这种方法，我得之于布尔塞维克。二月革命后，布党遍布全国各机关，列宁亦入了克伦斯基政府，所以十月革命一举成功。

我在这面业已酝酿组织，将于此早组一整队赴俄工作（二年内）。将来以俄为大本营，至少引一万青年男女长驻工作。拟于今冬联络新民会友、少年学会友、工学励进会友、以及赴德之王光祈、赴英之某某，开一联合讨论会。我将拟一种明确的提议书，注重“无产阶级专政”与“国际色彩”两点。因我所见高明一点青年，多带一点中产阶级的眼光和国家的色彩，于此两点，非严正主张不可。此意已与曾慕韩深言之，彼甚为感动，预料不久将与少年学会中人发生影响，将来讨论如得一致，则拟在此方旗鼓鲜明成立一个共产党。

木斯哥万国共产党是去年三月成立的，今年七月十五开第二次大会，到会代表三十多国。中国、高丽亦各到代表二人，土耳其印度各有代表五人。据昨日报土耳其共产党业已成立。英国于本月初一亦成立一大共产党。法社会党拟改名共产党。现在第二国际党已解体，脱离出来者都加入新国际党，就是木斯哥万国共产党。我意中国于二年内须成立一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这事关系不小，望你注意。

徐彦之等赴日，不知如何联络，现在中国不明俄国及各国社会情形，所以一切运动都支节无大计。朝鲜、日本、波斯、印度、

土耳其都应有人去，尤以日本为重要。我意日本要去一个极重要的人。与去俄国一样的重要，望你注意！我意中日间要两国无产阶级联络革命才能解决。只要有成熟的联络，谁先谁后不成问题。如果中国革命而日帝国政府未倒时，我们量力之所能采两个方法对他：

（一）我意我们的运动成熟，必与俄国打成一片，一切均借俄助。如日出而干涉，则如俄之对波兰者对之。

（二）万不得已，则以列宁之对德者对之。

以我观察，中国行俄式革命，反动必较俄大。其因有二：

（一）大资本家大地主少，而十万二十万之身家多，故反动数目必多。

（二）中国自来政治影响于个人经济者很少，个人经济极自由，一旦集产，反动必大。

有人以为中国无阶级，我不承认。只因小工小农不识不知，以穷乏惨苦归之命，一旦阶级觉悟发生，其气焰必不减于西欧东欧。

共产党的原理和方略，我须先研究清楚，现已译《议院行动》（系万国共产党之魁作）一篇，及列宁等重要文字数篇，拟续译《俄国共产党大纲》。

俄十月革命共产党仅万人，现尚只六十万人。一九一七年俄工党只百五十万人，现四百万。

现在内地组织此事须秘密。乌合之众不行，离开工业界不行。中产阶级文化运动者不行。（除非他变）

我拟在此组织一整队赴俄做工。法语于俄甚行，勤工可得川资。将来以俄为大本营，纵少要有青年工人万人在俄。国内

往俄难，请先鼓人来法。

你前要我做通信，现因有系统一点的编译计划，无暇作此。

改造地图，请买一部寄我。

你如对于上列意见表同情，或即潜在运动，则有两点应注意而不可游移：

无产阶级专政。

万国一致的阶级色彩，不能带爱国的色彩。

叔衡、启民、惇元、殷柏诸友均此。

彬。一九二〇，八，一三。

（载《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3集）

附：

毛泽东给萧旭东蔡林彬 并在法诸会友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一日）

赞成“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

赞成马克思式的革命。

学会的态度：（一）潜在，（二）不依赖

旧势力。会员的态度：（一）互助互勉，

（二）诚恳，（三）光明，（四）向上。

共同研究及分门研究。

学会的四种运动：

联络同志之重要。

和森兄子升兄并转在法诸会友：

接到二兄各函，欣慰无量！学会有具体的计划，算从蒙达尔尼会议及二兄这几封信始。弟于学会前途，抱有极大希望，因之也略有一点计划，久想草具计划书提出于会友之前，以资商榷，今得二兄各信，我的计划书可以不作了。我只希望我们七十几个会友，对于二兄信上的计划，人人下一个详密的考虑，随而下一个深切的批评，以决定或赞成，或反对，或于二兄信上所有计划和意见之外，再有别的计划和意见。我常觉得我们个人的发展或学会的发展，总要有一条明确的路数，没有一条明确的路数，各个人只是盲进，学会也只是盲进，结果糟踏了各人自己之外，又糟踏了这个有希望的学会，岂不可惜？原来我们在没有这个学会之先，也就有一些计划，这个学会之所以成立，就是两年前一些人互相讨论研究的结果。学会建立以后，顿成功了一种共同意识，于个人思想的改造，生活的向上，很有影响。同时于共同生活、共同进取，也颇有研究。但因为没提出具体方案；又没有出版物可作公共讨论的机关；并且两年来会友分赴各方；在长沙的会员又因为政治上的障碍不能聚会讨论；所以虽然有些计划和意见，依然只藏之于各人的心里；或几人相会出之于各人的口里；或彼此通函见之于各人的信里；总之只存于一部分的会友间而已。现在诸君既有蒙达尔尼的大集会，商决了一个共同的主张；二兄又本乎自己的理想和观察，发表了个人的意见；我们不在法国的会员，对于诸君所提出当然要有一种研究、批评、和决定。除开在长沙方面会员，即将开会为共同的研究、批评、和决定外，先述我个人对于二兄来信的意见如左。

现在分条说来。

(一)学会方针问题。我们学会到底拿一种甚么方针做我们共同的目标呢？子升信里述蒙达尔尼会议，对于学会进行之方针，说：“大家决定会务进行之方针在改造中国与世界”。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并且我料到是与多数会友的主张相合的。以我的接洽和观察，我们多数的会友，都倾向于世界主义，试看多数人鄙弃爱国；多数人鄙弃谋一部分一国家的私利，而忘却人类全体的幸福的事；多数人都觉得自己是人类的一员，而不愿意更繁复的隶属于无意义之某一国家、某一家庭、或某一宗教，而为其奴隶；就可以知道了。这种世界主义，就是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凡是社会主义，都是国际的，都是不应该带有爱国的色彩的。和森在八月十三日的信里说：“我将拟一种明确的提议书，注重‘无产阶级专政’与‘国际色彩’两点。因我所见高明一点青年，多带一点中产阶级的眼光和国际的色彩，于此两点，非严正主张不可”。除无产阶级专政一点置于下条讨论外，国际色彩一点，现在确有将他郑重标揭出来的必要。虽然我们生在中国地方的人，为做事便利起见，又因为中国比较世界各地为更幼稚、更腐败应先从此着手改造起见，当然应在中国这一块地方做事；但是感情总要是普遍的，不要只爱这一块地方而不爱别的地方。这是一层。做事又并不限定在中国，我以为固应该有人在中国做事，更应该有人在世界做事，如帮助俄国完成他的社会革命；帮助朝鲜独立；帮助南洋独立；帮助蒙古、新疆、西藏、青海，自治自决；都是很要紧的。以下说方法问题。

(二)方法问题。目的——改造中国与世界——定好了，接

着发生的是方法问题，我们到底用甚么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呢？和森信里说：“我现认清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的反映。其重要使命在打破资本经济制度，其方法在无产阶级的专政”。和森又说：“我以为现世界不能行无政府主义，因在现世界显然有两个对抗的阶级存在，打倒有产阶级的迪克推多，非以无产阶级的迪克推多压不住反动，俄国就是个明证，所以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与方法。……我以为先要组织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据和森的意见，以为应用俄国式的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是赞成马克思的方法的。而子升则说：“世界进化是无穷期的，革命也是无穷期的，我们不认可以一部分的牺牲，换多数人的福利。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为人民谋全体福利的革命——以工会合社为实行改革之方法。颇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于无政府——无强权——蒲鲁东式之新式革命，比较和而缓，虽缓然和”。同时李和笙兄来信，主张与子升相同，李说：“社会改造，我不敢赞成笼统的改造，用分工协助的方法，从社会内面改造出来，我觉得很好。一个社会的病，自有他的特别的背景，一剂单方可医天下人的病，我很怀疑。俄国式的革命，我根本上有未敢赞同之处”。我对子升和笙两人的意见，（用平和的手段，谋全体的幸福）在真理上是赞成的，但在事实上认为做不到。罗素在长沙演说，意与子升及和笙同，主张共产主义，但反对劳农专政，谓宜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不至要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但我于罗素讲演后，曾和荫柏，礼容等有极详之辩论，我对于罗素的主张，有两句评语：就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

不到”。罗素和子升和笙主张的要点，是“用教育的方法”，但教育一要有钱，二要有人，三要有机关。现在世界，钱尽在资本家的手；主持教育的人尽是一些资本家，或资本家的奴隶；现在世界的学校及报馆两种最重要的教育机关，又尽在资本家的掌握中。总言之，现在世界的教育，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教育。以资本主义教儿童，这些儿童大了又转用资本主义教第二代的儿童。教育所以落在资本家手里，则因为资本家有“议会”以制定保护资本家并防制无产阶级的法律。有“政府”执行这些法律，以积极的实行其所保护与所禁止。有“军队”与“警察”，以消极的保障资本家的安乐与禁止无产者的要求。有“银行”以为其财货流通的府库。有工厂以为其生产品垄断的机关。如此，共产党人非取政权，且不能安息于其字下，更安能握得其教育权？如此，资本家久握教育权，大鼓吹其资本主义，使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宣传，信者日见其微。所以我觉得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以上是第一层理由。第二层，依心理上习惯性的原理，及人类历史上的观察，觉得要资本家信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事。人生有一种习惯性，是心理上的一种力，正与物在斜方必倾向下之为物理上的一种力一样。要物不倾向下，依力学原理，要有与他相等的一力去抵抗他才行。要人心改变，也要有一种与这心力强度相等的力去反抗他才行。用教育之力去改变他，既不能拿到学校与报馆两种教育机关的全部或一大部到手，虽有口舌印刷物或一二学校报馆为宣传之具，正如朱子所谓“教学如扶醉人，扶得东来西又倒”，直不足以动资本主义者心理的毫末，那有回心

向善之望？以上从心理上说。再从历史上说，人类生活全是一种现实欲望的扩张。这种现实欲望，只向扩张的方面走，决不向减缩的方面走，小资本家必想做大资本家，大资本家必想做最大的资本家，是一定的心理。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有拿破仑第一称帝失败了，又有拿破仑第三称帝。有袁世凯失败了，偏又有段祺瑞。章太炎在长沙演说，劝大家读历史，谓袁段等失败均系不读历史之故。我谓读历史是智慧的事，求遂所欲是冲动的事，智慧指导冲动，只能于相当范围有效力，一出范围，冲动便将智慧压倒，勇猛前进，必要到遇了比冲动前进之力更大的力，然后才可以将他打回。有几句俗话：“人不到黄河心不死，”“这山望见那山高，”“人心不知足，得陇又望蜀，”均可以证明这个道理。以上从心理上及历史上看，可见资本主义是不能以些小教育之力推翻的，是第二层理由。再说第三层理由。理想固要紧，现实尤其要紧，用和平方法去达共产目的，要何日才能成功？假如要一百年，这一百年中宛转呻吟的无产阶级，我们对之，如何处置，（就是我们）。无产阶级比有产阶级实在要多得若干倍。假定无产者占三分二，则十五万万人类中有十万万无产者，（恐怕还不止此数）这一百年中，任其为三分一之资本家鱼肉，其何能忍？且无产者既已觉悟到自己应该有产，而现在受无产的痛苦是不应该；因无产的不安，而发生共产的要求；已经成了一种事实。事实是当前的，是不能消灭的，是知了就要行的。因此我觉得俄国的革命，和各国急进派共产党人数日见其多，组织日见其密，只是自然的结果。以上是第三层理由。再有一层，是我对于无政府主义的怀疑。我的理由却不仅在无强权无组织

的社会状态之不可能，我只忧一到这种社会状态实现了之难以终其局。因为这种社会状态是定要造成人类死率减少而生率加多的，其结局必至于人满为患。如果不能做到（一）不吃饭；（二）不穿衣；（三）不住屋；（四）地球上各处气候寒暖，和土地肥瘠均一；或是（五）更发明无量可以住人的新地；是终于免不掉人满为患一个难关的。因上各层理由，所以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的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因此我于子升和笙二兄的主张，不表同意。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

（三）态度问题。分学会的态度与会友的态度两种：学会的态度，我以为第一是“潜在”，这在上海半淞园曾经讨论过，今又为在法会友所赞成，总要算可以确定了。第二是“不倚赖旧势力”，我们这学会是新的，是创造的，决不宜许旧势力混入，这一点要请大家注意。至于会友相互及会友个人的态度，我以为第一是“互助互勉”，（互助如急难上的互助，学问上的互助，事业上的互助。互勉如积极的勉为善，消极的勉去恶）。第二是诚恳（不滑），第三是光明（人格的光明），第四是向上（能变化气质有向上心）。第一是“相互间”应该具有的。第二第三第四是“个人”应该具有的。以上学会的态度二项，会友的态度四项，是会及会友精神所寄，非常重要。

（四）求学问题。极端赞成诸君共同研究及分门研究之两法。诸君感于散处不便，谋合居一处，一面作工，一面有集会机缘，时常可以开共同的研究会，极善。长沙方面会友本在一处，诸君办法此间必要仿行。至分门研究之法，以主义为纲，以书报为目，分别阅读，互相交换，办法最好没有。我意凡有会员两人

之处，即应照此组织。子升举力学之必要，谓我们常识尚不充足，我们同志中尚无专门研究学术者，中国现在尚无可数的学者，诚哉不错！思想进步是生活及事业进步之基。使思想进步的唯一方法，是研究学术。弟为荒学，甚为不安，以后必要照诸君的办法，发奋求学。

（五）会务进行问题。此节子升及和森意见最多。子升之“学会我见”十八项，弟皆赞成。其中“根本计划”之“确定会务进行方针”，“准备人才”，“准备经济”，三条尤有卓见。以在民国二十五年前为纯粹预备时期，我以为尚要延长五年，以至民国三十年为纯粹预备时期。子升所列长沙方面诸条，以“综挈会务大纲，稳立基础”，“筹办小学”，“物色基本会员”三项，为最要紧，此外尚应加入“创立有价值之新事业数种”，一项。子升所列之海外部，以法国、俄国、南洋，三方面为最要。弟意学会的运动，暂时可统括为四：1. 湖南运动；2. 南洋运动；3. 留法运动；4. 留俄运动。暂时不必务广，以发展此四种，而使之确见成效为鹄，较为明切有着，诸君以何如；至和森要我进行之“小学教育”，“劳动教育”，“合作运动”，“小册子”，“亲属聚居”，“帮助各团体”诸端，我都愿意进行。惟“贴邮花”一项，我不懂意，请再见示。现在文化书社成立，基础可望稳固，营业亦可望发展。现有每县设一分社的计划，拟两年内办成，果办成，效自不小。

（六）同志联络问题。这项极为紧要，我以为我们七十几个会员，要以至诚恳切的心，分在各方面随时联络各人接近的同志，以携手共上于世界改造的道路。不分男、女、老、少、士、农、工、商，只要他心意诚恳，人格光明，思想向上，能得互助互勉之益，无不可与之联络，结为同心。此节和森信中详言，子升亦有

提及，我觉得创造特别环境，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大业，断不是少数人可以包办的，希望我们七十几个人，人人注意及此。

我的意见大略说完了。闻子升已回国到北京，不久可以面谈。请在法诸友再将我的意见加以批评，以期求得一个共同的决定。个人幸甚。学会幸甚。

弟泽东。九年十二月一日文化书社夜十二时。

(载《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3集)

蔡林彬给毛泽东

(一九二〇年九月十六日)

共产党之重要讨论

润之兄：

上月寄一长信，大要系主张马克思主义及俄式革命，而注重于组织共产党。今子升归国，再陈其略。我以为现在世界显然为两个敌对的阶级世界，学说亦显然划了鸿沟。自柏拉图统御以来的哲学思想，(人生哲学，社会哲学)显然为有产阶级的思想。其特点重理想轻生活，重精神轻物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显然为无产阶级的思想。以唯物史观为人生哲学社会哲学的出发点。结果适与有产阶级的唯理派(Id'eologic)相反，故我们今日研究学问，宜先把唯理观与唯物观分个清楚，才不至堕入迷阵。我对于人性只认为有“可能性”，比如到了饥的境地，性之可能为吃；遇到困难的境地，性之可能为思(想方法)；处现经济制度之下，性之可能为“人剥削人”；处怒或挑剔(如民族主义军国主义)之时，性之可能为“打”或“杀”。究其极这种可能性，与别的动物一样，没有别的高贵不同。总之人由低等动物进化成的。道德根于先天之说不能成立，成立也无意思。人是一它物质，人是一个消费(吃，穿，住，)才能活动的动物。故人的理想云为乃是吃了饱了之后的物质的化分(或派生)。我以这种

直捷简单的理由，肯定唯物观否定唯理观。唯理观弊病到了化境(助长有产阶级)唯物观才由马克思寻找出来。这真是思想史上一桩大喜事！修正派改良派(即染了有产阶级唯理主义的毒)的考茨基，伯伦斯丁等，好胆大又把中产阶级的唯理主义拿来驳唯物史观，以为“人”“社会”决不是单由物质的条件决定的，还有内心的理想的支配力，唉！这真是为资本家说法。结果是以唯物史观启发阶级战争的动机为卑下为薄弱，(现张东荪也是这样说)而别寻所谓高尚的动机，及寻一劳资调和的办法，故他们最终的结果，主张改良而不主张革命。中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和威尔逊的十四条，是他们叹观止的地方！今日俄德革命之不同，根本即在此点，我今拟二公式：

俄社会革命出发点=唯物史观。

方法=阶级战争+阶级专政。

目的=创造共产主义的社会；无阶级无反动社会组织完成世界组织完成(列宁及共产党屡次如此宣言时)，取消国家。

德多数社会党立足于=修正派社会主义及中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之上。

方法=与帝国政府通力合作(入战时内阁)；利用革命与中产阶级联盟组织政府。

目的=劳资合组的德谟克拉西。

结果=延长资本政治的危险，内乱，破产，反革命，压迫工人，闹个不休。

张君迈以中产阶级的反动眼光及贤人眼光观察俄国革命，对于德叛逆社会党(即多数党)一唱而三叹(见《解放与改造》)。他对于中国主张的八条，不马不牛，这种冬烘头脑，很足误人。阶

级战争的结果，必为阶级专政，不专政则不能改造社会、保护革命。原来阶级战争就是政治战争，因为现政治完全为资本家政治，资本家利用政权、法律、军队，才能压住工人，所以工人要得到完全解放，非先得政权不可。换言之就是要把中产阶级那架国家机关打破（无论君主立宪或议院政治），而建设一架无产阶级机关——苏维埃。无产阶级不获得政权，万不能得到经济的解放，比如生长于现政治下的工团主义（经济的职业的，而非政治的）充其量不过是运动到产业国有，由资本家的“公司”里运动到资本家的“国”里去，这不但于工人无益，而且反巩固“资本家国”的产业组织，以后工人愈难解放。比如三角同盟国有运动，自去年到现在，没生一点效，现在矿工为增加工钱减少煤价争议数月（矿工已发停工预告定期本二十五），政府、公司丝毫不动。所以我们专门经济的职业的工团运动，经久不能超出“工钱物价问题”，如何能得到解放呢？至于现在俄的工团就不然了，“工钱”、“物价”都由工团自定，生产管理与分配，工团与全国经济最高苏维埃共同执行。这才真算是解放。然而所以能达到这一步，因为他获得了政权。现世经济政治早已打成一片，怎么会容许你单做经济解放呢？所以现在有两种说法最足延长现政治之危险而暗杀工人阶级：

（一）反唯物史观。以为以此启发阶级战争的动机太卑下而不高尚！

（二）分离经济与政治，教工人专去做经济运动，做保护职业的运动，使他们永世生息于资本家剥削政治之下！

这两种危险的说话，凡冬烘先生（欧美如此）及资本家御用的改良派社会学者总是瞎眼说去，不怕害死工人！

资本家帝国主义者的世界大战爆发，于是各国不真实的社会党及工党，尽向军国主义投降（即向资本家投降），尽变为叛逆，爱国的社会党和工党，有两个叛逆的总机关：一为第二国际党，一为万国工会。

忠于马克思主义的布尔塞维克，既已把俄罗斯完全彻底的建设其主义，于一九一八年改名共产党。与德李伯克奈希、罗森堡，所手创的斯巴达加斯团（不久亦改名共产党），及匈贝拉庚所组的共产党，组织“第三国际党”（即万国共产党），一九一九年三月四日（正资本家分赃会议在巴黎热闹时），在木斯哥成立，加入的团体共三十五个。高丽亦以劳动联合会的名义加入，波斯、印度、土耳其等，以东亚民族解放大联盟的名义加入，独中日没有团体！万国共产党即世界革命的总机关，这是无产阶级极彻底的、极真实、极具主义方略的、真正的国际组织，与没气焰的资本阶级的国际联盟针锋对立。俄十月革命成，各国犯了罪的革命党及工党又疑又怕，去年二月已死的第二国际党，在柏伦死灰后燃，开了一次大会，赞扬俄革命的占多数，诋毁的尽为犯罪已深（入了战时内阁）及执迷不悟的改良派，不久大多数纷纷宣布脱离第二国际党。其中的大党如德独立社会党、法统一社会党、英独立劳动党、西班牙社会党、瑞士社会左党等等，并宣布与第三国际党商议加入条件。故今年七月万国共产党开第二次大会。中西南欧及美社会党都预会，中国亦有两个代表，但无团体名义。现中西欧各代表已返国，正在开全国大会讨论即刻加入。中西欧各社会党战时屈伏于军国主义之下，多少违犯了主义，此缘于平日改良派及修正派之恶劣影响，现在完全的马克思主义及无产阶级专政既在俄罗斯实现有效。于是各国觉悟的工人莫不醉心

于红色化。而各国社会党和工党大呈分裂之状。从中把持的无非是几个改良派、修正派、中立派的旧首领，这种首领在各国觉悟的工人阶级中，不久即会遭淘汰。现在英、法、美，共产党（英八月成立的）业已成立，加入万国共产党，所以英、法、美的社会党非加入则不能立足（因违反工人的要求故），我今把美、中、西南欧巴尔干、及东亚的已加入或即将加入万国共产党的略举如下：

美，已成立三个共产党，加入莫斯科。社会党（已与莫斯科大会）势力不大，首领为豆伯斯，因反对战争，现还关在牢里。美I.W.W.势力亦弱，但主张阶级战争，为美劳工的真正组织，已参预莫斯科大会。美势力最大的劳动联合会的领袖为刚伯斯，极旧极反动（莫斯科指名排斥）。社会党和I.W.W.都参与莫斯科大会，与第二国际党及黄色的万国工会脱离关系。

英，不列颠社会党与别的三个团体，自去夏商议组织与俄一致的共产党，今年八月一日成立，加入莫斯科万国共产党。英共产党始拟不令劳动党加入（党员已近五百万），列宁力主可容其加入。独立劳动党已宣告脱离第二国际党与莫斯科商议国际改造，现英劳动党阶级战争的色彩益明。援俄及国际运动甚力（近又派代表参预俄波和议）。三角同盟将与俄工团于今秋冬发起红色的万国工会，打破死灰后燃之老的黄的万国工会（他有七千万会员），反动的工党旧首领将被排斥。

法，统一社会党之极左翼，已组成共产党。为万国共产党之一部。统一社会党今年二月宣布脱离第二国际党，与第三国际党协商加入，此次派二代表与莫斯科万国共产党第二次大会。莫斯科加入的条件极严，大略如下：

1. 改名为共产党，以后一切宣传运动皆为共产党性质。

2. 排除右翼的改良派、爱国派、中立派、入阁派的首领，然后才准加入。

二代表已返国，即将开全国大会，讨论加入条件。法工党首领为霞华，木斯哥指名排斥；要法工人将此人驱逐。

德，独立社会党去年十一月大会，宣布脱离第二国际党，与木斯哥商议加入，昨派四代表与木斯哥第二次大会。加入条件与对法略同，要他排除右翼首领才准加入。独党十月将开会讨论此事。斯巴达加斯团改名共产党。为万国共产党主要份子之一。德工党旧首领为莱琴，木斯哥指名排斥。

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已于前二月脱离第二国际党，正式加入万国共产党。

比利时，社会党为爱国、入阁、卖主义的首领所把持。共产党已成立。

意大利，社会党右翼已正式加入万国共产党。劳动联合总会亦加入，社会党右翼的改良派将于下次大会被除名。意近日劳动运动占领工场，管理生产，绝非国有运动可比。

匈奥，其社会民主党与德多数党一样的与中产阶级联盟揽政权，在社会主义上已宣布死刑，匈共产党为发起万国共产党之一，奥共产党也是其中一员。

雅各斯拉夫，共产党运动极得势，此次城邑选举大获胜利，中产党皆失败，去年三月即加入木斯哥。

捷克斯拉夫，共产党去年三月加入木斯哥。社会党团体有八，现组织政府，此次不应法命助波攻俄，社会党政府与有力。

保加利亚，战后破产，共产运动极盛，上次国会选举获选五十名之多。与中产阶级联盟的社会党一败涂地。现俄共产党的

党纲，在保销行八十万卷。去年三月即加入木斯哥。

罗马尼亚，战后军国主义大盛。共产党运动亦盛，去年三月加入木斯哥，此次多瑙河流域三小协约国，不听法命助波攻俄，即三国共产党之力。

东亚，印度共产党已成立，去年即加入木斯哥，我在法报见其宣言。

土耳其，共产党于今年八月成立。昨波斯、印度、埃及、土耳其代表于参与木斯哥二次大会之后，又在巴库开东亚民族解放大同盟的大会。印度又于八月成立八百万工人的联合会。法统一社会党及人道报派代表赴印度祝贺。高丽去年三月以高丽劳动联合会名义加入木斯哥，此次又有二代表与第二次大会，中日亦有代表，但不见团体名义。

以上所举系莘莘大者，观此亦可知世界大势所趋。而中国民众运动幼稚如此，将怎样呢？我以为非组织与俄一致的（原理方法都一致）共产党，则民众运动、劳动运动、改造运动皆不会有力，不会彻底。

布尔塞维克与门色维克（先同属社会民主党）的分裂，开首是争党员加入的条件，布派主张极严格，门派主张宽大。其后布党主张极端的行以下的公式，即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 Soviets，而门派还主张与中产阶级联盟，所以十月革命不得不起。现在布党改名为共产党，加入条件仍极严格，所以十月革命时的党员仅万人（极确实的份子），现在不过六十万。现在入党条件如下：（1）二人介绍于地方支部。（2）入党的实习所受训练三月，作为后补入党之期。（3）实习所的指导员一步一步引导他们到共产主义的生活上来，并令他到共产主义的学校去听讲。（4）

不能确信主义及遵守的除名。(5)如指导员训练未成熟,须再受训练三月。(6)然后具愿书三份,须守党的“铁的纪律”。党的组织为极集权的组织,党的纪律为铁的纪律,必如此才能养成少数极觉悟极有组织的份子,适应战争时代及担负偌大的改造事业。(现全俄政府每部的事纵多不过十余人担任,全国劳动联合总会五人担任)党的最高机关为中央委员会。党中设宣传运动部、组织教育部、调查统计部、义务劳动部,(此部专为党员做星期下午的义务劳动,以为社会倡率而设)。在十月革命前,党的方略为多方面的,无论报纸、议院、团体,以及各种运动绝对受中央委员会的指挥和监督。绝不准单独自由行动,所以议院行动在各国社会党弊端百出,以致工人不信用政治行动,而在布党适得其反,他第一从根本上否定中产阶级的议院主义;第二以为应入到里面去打破他,一面党的群众在外面酿革命风潮,一面党的议员在议坛上酿风潮,队员亦须参预群众行动,利用选举战争为宣传运动,而不在得票多少;第三党的议员一言一语,皆须依中央委员会所授命的态度(革命的),一面在议院内做合法的工作,一面又在议院外做非法的工作,一等运动成熟,即打倒议院和政府,而做完全的革命行动。十月革命时,俄工团份子约百五十万,大多数反对布党的主张。不及数月布党在各工团中都组有党的团体,将反动的首领驱逐,一变而为多数赞成布党的主张。即如十月二十五日,乃是一种定期的革命,是日开全俄苏维埃第二次大会,列宁所提出的议案为将临时政府的政权移与全俄苏维埃。孟党及中产阶级各党和克伦斯基都到会投票,结果工人与兵尽赞成将全政权移与苏维埃,于是克伦斯基只得跑了。这完全是一种组织的革命,绝不是流血的革命。革命的标准在客

观而不在主观，有一干人生怕革命，其实是错了，凡社会上发生了种种问题，而现社会现制度不能解决他，那末革命是一定不能免的了。你看中国今日所发生的问题，那一种能在现社会现制度之下解决？所以中国的社会革命，一定不能免的。不趁此时加一番彻底的组织，将来流血恐怖自然比有组织要狠些。有了强有力的组织，或者还可以免掉。所以我认党的组织是很重要的。组织的步骤：（1）结合极有此种了解及主张的人，组织一个研究宣传的团体及出版物。（2）普遍联络各处做一个要求集会、结社、出版自由的运动，取消治安警察法及报纸条例。（3）严格的物色确实党员，分布各职业机关，工厂、农场、议会等处。（4）显然公布一种有力的出版物，然后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现在组织研究宣传部之外，更可组织一调查统计部，研究宣传部调查统计部与出版物三者现在可打成一片而潜在从事。比如我在外国可调查俄国及各国的情形，你在国内可调查各省情形，将人口、地土、产业、交通、劳动状况、经济、教育等列为统计，此种材料与研究的著作，皆在一种出版物上发表，出版物又须组织一个审查会。凡游移不定的论说及与主义矛盾的东西，皆不登载。

没有纸了，我的意见一时不能写完，再拢统说几句：我以世界革命运动自俄革命成功以来已经转了一个大方向，这方向就是“无产阶级获得政权来改造社会”。不懂的人以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以暴易暴的，不知列宁及万国共产党已再三宣言、专政是由资本主义变到共产主义过渡时代一个必不可少的办法。等到共产主义的社会组织世界组织完成了，阶级没有了，于是政权与国家一律取消。故现在各国的无政府党与工团的见到了的份子，业

已改了倾向，我不信这种倾向会错的。无政府党最后的理想我以列宁与他无二致。不过要做到无政府的地步，我以为一定要经俄国现在所用的方法，无产阶级专政乃是一个唯一无二的方法，舍此无方法。试问政权不在手，怎样去改造社会？怎样去组织共产主义的生产和消费？最大的错误，就是他们以为迟一点就会了，殊不知迟一点儿资本家的大战又起了，伏尸流血又不知几千百万，而战死与破产及生活昂贵的大祸，都是无产阶级受了，战胜的中产阶级又不知道要得到好多的赔款和殖民地，而战胜的国家的托辣斯的组织（指国际联盟）将越发巩固，工人真是动也动不得了！第二次资本家的大战战场必在中国。我们还不准备么？

叔衡、悼元、殷柏、启民、章甫，均此。

彬。九月十六日。①

（载《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3集）

附：

毛泽东给蔡和森

（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

和森兄：

来信于年底始由子升转到。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

① 一九二〇年。

这是事实，不象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摇动。我固无研究，但我现在不承认无政府的原理是可以证实的原理，有很强固的理由。一个工厂的政治组织，（工厂生产分配管理等）与一个国的政治组织，与世界的政治组织，只有大小不同，没有性质不同。工团主义以国的政治组织与工厂的政治组织异性，谓为另一回事而举以属之另一种人，不是固为曲说以冀苟且偷安，就是愚陋不明事理之正。况乎尚有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在手段上又有十分必要的理由呢。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宣言即仲甫所为）。详情后报。

弟泽东。十年一月二十一日在城南。

（载《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3集）

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

(一九二一年二月十一日)

独秀先生：闻公主张社会主义而张东荪欢迎资本主义，两方驳论未得而见，殊以为憾。和森为极端马克思派，极端主张：

唯物史观

阶级战争

无产阶级专政，

所以对于初期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共产主义，不识时务穿着理想的绣花衣裳的无政府主义，专主经济行动的工团主义，调和劳资以延长资本政治的吉尔特社会主义，以及修正派的社会主义，一律排斥批评，不留余地。以为这些东西都是阻碍世界革命的障碍物（其说甚长兹不能尽）；而尤其深恶痛绝参杂中产阶级思潮的修正派，专恃议院行动的改良派，动言特别情形特别背影以及专恃经济变化说的投机派，以为叛逆社会党、爱国社会党，都是这些东西的产物。窃以为马克思主义的骨髓在综合革命说与进化说（*Revolution et evolution*）。专恃革命说则必流为感情的革命主义，专恃进化说则必流为经济的或地域的投机派主义。马克思主义所以立于不败之地者，全在综合此两点耳。马克思的学理由三点出发：在历史上发明他的唯物史观；在经济上发明他的资本论；在政治上发明他的阶级战争说。三者一以贯之，遂成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完全为无产阶级的革命。现

今全世界只有两个敌对的阶级存在，就是中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中产阶级以上没有第二阶级，无产阶级以下没有第三阶级。因为交通发达的结果，资本主义如水银泼地，无孔不入，故东方久已隶属于西方，农业国久已隶属于工业国，野蛮国久已隶属于文明国，而为其经济的或政治的殖民地。因此经济上的压迫，东方农业国野蛮国的无产阶级之所受较西方工业国文明国无产阶级之所受为尤重。因为西方工业国文明国的资本帝国主义常常可以掠夺一些殖民地或势力地带以和缓他本国“剩余生产”“剩余劳动”的两种恐慌，而分余润于其无产阶级（贿买工头及工联领袖，略加一般劳动者的工资，设贫民学校以及可以买工人欢心的慈善事业，使工人阶级感怀恩惠）；因此西方大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常常受其资本家的贿买笼络而不自觉，社会党、劳动党中改良主义投机主义盛行，而与资本主义狼狈相倚，此所以社会革命不发生于资本集中，工业极盛，殖民地极富之英、美、法，而发于殖民地极少，工业落后之农业国俄罗斯也。因为俄罗斯在经济地位上久已隶属于西方工业国，而他那上古式的农业生产法又抵当法（小机械农业）、美（大机械农业）机器的农业生产法不住；所以农产品一入国际市场不能与法、美相竞，因此农民及无产阶级受国际的经济压迫便异常之大，加以大战破产，社会革命遂起。由此就可推论中国社会革命了。中国受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经济压迫到了那步田地？自身的生产方法还是三代以上的，自己不能供自己的需要，五大强的商品，开始由大炮送进来；继之由本身的需要扯进来，这种经济侵略熟能御之。大机器生产品日日浩浩荡荡的输进来，于是三代以上的手工生产者一批一批的失其职业。现在中国失业人数到了那步田地？换言之，就是为

经济压迫不能生活者的人数到了那步田地？我敢说一句，现在中国四万万人有三万万五千万不能生活了。到了这个地步，三万万五千万人惟有两条路走：（一）流为盗贼、土匪、流氓、痞子以至饿死、乱死、战死、争夺扰攘而死……（二）三万万五千万人公然自行提出其生死问题于中国社会，及为中国经济的主人翁五大强之前，请其依革命的意见解决。如其不能，我们恐怕免不了社会革命的命运。到了这个时候，革命之爆发乃是必然的趋势，也如自然力的雷电之爆发一样，行所必然，什么成败利钝都不会顾，什么改造的理想家、大学问家也都把持不下地。这是最大多数的生死临头问题，纵然革命的经济条件、生产条件不具足，革命后会被围困封锁而饿死，但使群众一旦觉悟，与其为盗贼、土匪、流氓、痞子而饿死、乱死、争夺扰攘而死，死得不值；毋宁为革命而战死而饿死，死得荣誉。社会革命的标准在客观的事实，而不在主观的理想，在无产阶级经济生活，被压迫被剥削的程度之深浅，及阶级觉悟的程度之深浅，而不在智识程度、道德程度之深浅。自来一般中产阶级学者或空想的社会改造家，好以他个人的头脑来支配世界，视社会改造或社会革命为几个圣贤豪杰、伟人志士、思想家、学问家的掌上珠、图案画和绣花衣，任凭他们几个人的主观理想去预定，去制造，去点缀，去修饰，去和颜配色，去装腔作势，去包揽把持，去迟早其时，去上下其手，指挥群众如此如彼的做去便是，这真愚妄极了。我敢大声唤破这种迷梦；社会革命与染有中产阶级色彩的思想家和被中产阶级学说、教育、势力薰坏的改造家全无干涉。任凭你们怎样把你们的理想学说绣得好看，雕得好玩，总与无产阶级的生死问题不能接近，不过在资本家的花园里开得好看，在资本家的翰林园内供他

的御用罢了。一旦无产阶级的生死问题迫来，有如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饥民要面包，兵士要停战，工人要工厂，农人要土地，乱七八糟爆发起来，任凭那些中产阶级学者及自命为理想的改造家，凭依军阀、财阀而结为神圣同盟，也是遏制不住的。今日中国大多数的生活问题迫到了这个田地，贤人派的力量纵大，恐怕有点遏制社会革命的自然力不住！马克思的革命说完全立于客观的必然论之上，革命既是必然的，然而我们无产阶级的觉悟者何以要去唤醒同阶级的觉悟呢？（一）因为我们自身既已觉得痛苦之所由来（不由命运而完全由于私有财产制），便谗然不能终日。（二）对于同阶级的人有同病相怜的同情。（三）任其自然实现，时间延长，牺牲数量太大，无产阶级每日直接间接死于穷困者不知若干，直接间接死于战争者不知若干。若过三、五、十年再经一次世界大战，纵少又要死伤四五千万。具此三个理由，所以我们无产阶级早已痛不堪痛（今日由段祺瑞下动员令送到这个战场上去死；明日由曹锟张作霖下动员令送到那个战场上去死！天灾、人祸、穷困、死亡，日日困着我们!!!）忍不堪忍了，还论甚么革命的经济条件具足不具足？不过我们无产阶级革命，在计划上讲起来，殊有于未革命以前，做一个大大的经济变化运动之必要。这个运动怎样做呢？就是我们无产阶级社会党，应亟于各大都会组织同阶级之失业者，最下层的贫困无告者，第一步公然起来向政府论南北要求“生存权”和“劳动权”，迫令政府即向五国银团大借实业外债。第二步要求监督实业借款的用途。第三步要求产业及政治管理权。独秀先生：现在英、法、美、意的劳动运动，刚才接近第三步，还没达到目的。我们若有识力有决心，必可于最短时期突过欧、美的劳动运动。

我以为社会运动为社会革命之起点，社会革命为社会运动之成熟，即综合 evolution et revolution 之意，如此才可立于不败之地，而不致流为鹵莽灭裂毫无计划的感情革命主义，和审时度势坐以待毙的投机主义。我深以上列三个具体步骤，为中国社会运动，社会改造的不二法门。盖承此纷争破产之后，四五年中，资本主义必勃然而兴，与其待军阀财阀勾结五大强来巩固资本主义于中国，不如由无产阶级先发制人，取其利而避其害。盖生产之三要素，中国具二而缺一（有劳力原料而无资本），全国生命遂握于五大资本帝国之手。若我们无产阶级不先发制人之计，则必受制于人，则必坐待资本主义之来而无可如何，则必待五大强国社会革命之后，我们才能革命，那就真闷死人，真不值，真不经济了！先生！劳动解放绝不是一个地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问题，乃是一个世界的社会问题，马克思社会主义乃是国际的社会主义，我们绝不要带地域的民族的色彩。中国的阶级战争，就是国际的阶级战争。说中国没有大中产阶级，阶级战争用不著的，固然是忘记了中国在国际上的经济地位，忘记了外国资本家早已为了中国无产阶级的主人，而说中国的阶级战争就是最大多数的劳动者对于本国几个可怜的资本家的战争，也同是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经济地位，也同是忘记了外国资本家早已为了中国无产阶级的主人。故我认定中国的阶级战争乃是国际的阶级战争。中国已经兴起了的几个资本家，和将兴起的资本阶级，不过为五大强国资本阶级的附属罢了。我认定全国人民除极少数的军阀、财阀、资本家以外，其余不是全无产阶级，就是小中产阶级，而小中产阶级就是无产阶级的候补者。你看现在中国的中产之家有几多能自给其生活，教养其子

女，而不感穷困者。故以我看来，中国完全是个无产阶级的国，（大中产阶级为数极少，全无产阶级最多，半无产阶级——即中等之家——次之）；中国的资本阶级就是五大强国的资本阶级，（本国极少数的军阀、财阀、资本家附属于其中），中国的阶级战争就是国际的阶级战争。独秀先生！我是极端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我的主张不是主观的，乃是客观的，必然的。因为阶级战争是阶级社会必然的结果；阶级专政又是阶级战争必然的结果；不过无产阶级专政与中产阶级专政有大不同的两点：（一）中产阶级专政是永久的目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暂时必然的手段。其目的在取消阶级。无产阶级不专政，则不能使中产阶级夷而与无产阶级为伍，同为一个权利义务平等的阶级，即不能取消阶级；不能取消阶级，世界永不能和平大同。（二）中产阶级专政假名为“德莫克拉西”；而无产阶级专政公然叫做“狄克推多”，因此便惹起一般残人的误会和反对。其实这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的，任你如何反抗，历史的过程定要如此经过的。

以上拉杂写了一长篇，请先生指正，并请交换意见。和森感国内言论沉寂，有主义、有系统的出版物几未之见（从前惟《星期评论》差善），至于各国社会运动的真情，尤其隔膜得很。甚想以我读书阅报之所得，做一种有系统、有主张、极鲜明强固的文化运动。意欲择定论机关之同趣者发表之。

蔡和森一九二一，二，十一，在法国蒙达尼

蔡和森先生：

我前几天回到上海才见着你的信，所以久未答复，实在抱歉之至。来信所说的问题甚大，现在只能简单说一说我的私见。

尊论所谓“综合革命说与进化说”，固然是马克思主义的骨

髓，也正是有些人对于马克思主义怀疑的一个最大的要害。怀疑的地方就是：马克思一面主张人为的革命说；一面又主张唯物史观，类乎一种自然进化说，这两说不免自相矛盾。鄙意以为唯物史观是研究过去历史之经济的说明，主张革命是我们创造将来历史之最努力最有效的方法，二者似乎有点不同。唯物史观固然含着有自然进化的意义，但是他的要义并不只此，我以为唯物史观底要义是告诉我们：历史上一切制度底变化是随着经济制度底变化而变化的。我们因为这个要义底指示，在创造将来的历史上，得了三个教训：（一）一种经济制度要崩坏时，其他制度也必然要跟着崩坏，是不能用人力来保守的；（二）我们对于改造社会底主张，不可蔑视现社会经济的事实；（三）我们改造社会应当首先从改造经济制度入手。在第（一）（二）教训里面，我们固然不能忘了自然进化的法则，然同时我们也不能忘了人类确有利用自然法则来征服自然的事实，所以我们在第（三）教训内可以学得创造历史之最有效最根本的方法，即经济制度的革命。照我这样解释，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什么矛盾。若是把唯物史观看做一种挨板的自然进化说，那末，马克思主义便成了完全机械论的哲学，不仅是对于历史之经济的说明了，先生以为如何？此理说来甚长，我这不过是最简单的解释，很盼望赞成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加以详细的讨论。

独 秀

（载《新青年》9卷4号〈1921年8月1日〉）

署名：蔡和森）

中国劳动运动应取的方针

(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

一、劳动运动的目的与原则

自近世生产的土地、工具、资本日日集中，归最少数人私有后，最大多数的人就不能为他们自己的消费而生产。最大多数的人要维持他们自己的生存，只有向占领一切生产手段的资本家卖力，才能得着少许工钱，去买生活的物质。由此资本主义的工钱劳动制，就成为近世工人的铁锁。工人们不向资本家去卖力就只有饿死一条路！

然则工人阶级的命运，果真只有“卖力”与“饿死”两条路吗？这两条路是谁命定的，是八字或“上帝”命定的吗？不是的；是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制命定的。然则工人阶级要从“卖力”与“饿死”两条路中解放出来，就只有根本推翻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制，将一切生产手段——即土地、资本——收归社会公有，才能打破这把工钱制度的铁锁，而直接过那“为消费而生产”的社会生活。

“一切生产手段收归社会公有”，这就是劳动运动根本的目的。

但是怎样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惟一的方法，就只有实行阶

级争斗与社会革命。请看以下简单的理由，就明瞭这种方法之适当而且必要了。

近世资本主义的社会，是建筑在“以资本掠夺劳动”的根本冲突之上的。这样的冲突是怎样一回事呢？就是最大多数劳动者的生产产品，归最少数不劳动的资本家所占有。近世社会“劳”、“资”两阶级的关系就完全建筑在这样经济事实的根本冲突上面。这样的冲突，只有根本改造社会制度才能解决；调和妥协，是万万不能解决的。

譬如“增加工钱”、“减少时间”，这本是劳动运动迫切的急务；但这不过是工人阶级在社会革命未实现以前，为一天一天的生活所压迫，不得不日日从事这种救急的要求运动罢了。每每要求一次，妥协一次，最好的结果，不过是资本家从这方面增加几个工钱，从那方面抬高物价罢了。所以单靠这样的运动，工人阶级是永远不能摆脱工钱的铁锁，逃出“卖力”、“饿死”的圈套的，换过说，就是工人阶级永远不能超出“工钱奴隶”的地位。

故在社会革命未实现以前，一天一天的要求运动虽然是必要做的，但是要以阶级争斗的精神去做，万不要以阶级妥协的精神去做。敌对阶级之间，只有“战胜”与“战败”可言，没有“调和”与“妥协”可言。譬如这次总罢工，要求增加工钱若干，目的达到了，就是一次小胜利，没有达到，就是一次小失败。失败了，固要抖擞精神再图战争，就是胜利了也更要一息不懈，愈接愈厉。争斗一次，就要把范围扩张一次，性质严重一次，战斗力团整并发扬一次，阶级觉悟和阶级抵抗显著一次。由一地方一行业的争斗，酿成全国全阶级的争斗，由继续不停的阶级争斗，酿成总解决的社会革命，实行取消阶级，建筑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共产

主义社会，工人阶级从此完全解放，人类社会也就从此没有“人掠夺人”的罪恶制度了。

“由继续不停的阶级争斗，酿成总解决的社会革命，实行取消阶级，建筑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共产主义社会”这就是劳动运动的根本原则。

二、中国资本主义可怕的形势

凡工业后进国的经济生活，未有不受工业先进国的操纵、压迫的，至于被侵略的弱国、殖民地就更不待说了。中国无用说是被国际资本主义侵略的弱国，但中国的资本家是不受害的，受害的只有工人阶级。

资本家不但不受害，而且他们所借以上升的楼梯就是国际资本。原来工业后进国的资产阶级不过是国际资本的附属品。他们必须仰仗国际资本，才能开工厂、开公司、开银行。他们的工业资本、银元资本既须仰仗于外资，所以他们的资格无异就是英、美、法、日资本家的驻华代表。最显著的例，就是旧交通系和新交通系。

但他们以怎样的方法取得与国际资本勾结的地位呢？就是尽先占领国家机关，和夺取政权。譬如新旧交通系各首领，类皆为穷鬼、无赖、留学生出身，他们现在的资本和“财神”资格，都是由他们长期在交通部、外交部、中交两银行以及别的政府重要机关中取得的。国际资产阶级要在中国树立一个保护债权，巩固其长久侵略地位的附属资产阶级，就舍却他们莫属了。

中国的资本家，现在虽然不仅只有新旧交通系，但是最近的

将来，一面为国际资本所资助，一面结合野蛮的反动势力，来争夺全政权，以建筑恐怖政治与资本政治于中国的，迟早就是他们。由此中国的资本主义就将完全形成为“恐怖的资本主义”，质言之，就是“张作霖与梁士诒式的资本主义”。

据欧美各国的历史看来，资本主义的大发展，总是在资产阶级获得政权，和资本政治巩固之中及巩固之后。同样的事情，现在就轮到中国来了。中国资产阶级，现在虽然这样微弱、无能，但是他们的第一举必然是掠夺政权，凭着国家机关，吸收外资，以供私人的产业经营；凭着国家权力、军警、法律、议院以高压工人阶级，他们将以“戒严令”统治工厂的工人，以“枪毙”对待罢工者。

总之，在中国现在半封建的武人政治之下，无论那派军阀财阀得势所形成的资本主义，总不外是“恐怖的资本主义”。这样“恐怖的资本主义”正是英、美、法、日国际资产阶级要求在中国赶快建设的。

三、劳动运动应取的方针

然则无产阶级怎样对付这种“恐怖的资本主义”呢？惟一的办法，只有无产阶级起来夺取政权，组织工，兵，农的国家机关，没收一切生产手段——地、大工厂、资本——和交通工具为国有，以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发展中国的大生产事业，以建筑共产社会的经济基础。

原来资本主义在中国，无论如何，是不能充分发达而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这是怎样说呢？分两层解释于下：

第一，就是因为国际资本主义始终是要以中国为原料地和销场，而不容许中国为完全的大工业国。假使中国完全变成为工业生产国，不但根本杜绝英、美、法、日的销路，而且中国加倍的价廉物美的商品反将输出于国外的市场，而占国际贸易的优势，那末国际资本主义无异是养成杀他自己的刽子手了。这是国际资本主义断不容许中国如此的。中国的工业一天发达一天，入口的商品就要一天减少一天；同时英、美、日、法内部的失业问题，便将一天扩大一天。这是英、美、日、法的资本家会容许的吗！决不会的。所以希望充分的外资来开发中国的实业，这不过是一种梦想罢了。

第二，然则中国的资本家，可不仰仗外资，而专靠集中“国内资本”来振兴实业吗？集中国内资本，可以办得几个工厂，可以修得几条铁路？这乃是完全不明国际情形和近世产业性质的稚想。自近世资本主义国际化以来，业已把东方隶属于西方了，农业国隶属于工业国了，野蛮国隶属于文明国了，还能成立锁国自立的“本国资本主义”吗？

国际资本既不容许中国生产事业大大发展，而国家资本又如此微弱不能独立经营甚么大产业，然则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运命就可想而知了。

资本主义在中国之必然的要倒霉，要短命，就是共产主义在中国必然的要行运，要快来的对照。故中国劳动运动的根本方针惟有“早日在中国实行社会革命以促成世界革命，用国际共产主义的资本开发中国的实业”。

（载《先驱》第7期

署名：和森）

法兰西工人运动的最近趋势

(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

法兰西工人运动，自来有两种主要的组织：一种为从事政治斗争的社会党；一种为从事经济斗争的工团。十九世纪末法国社会党有：吉司特(马克思派)、夏赫斯(改良派)、怀扬(蒲兰格派)各大派。一九〇三年，各派统一起来，成为“法兰西统一社会党”。一九〇二年，全国工团的统一运动也告成立，建设“劳动联合总会”为全国工团的联合总机关。

吉司特在法兰西，正如伯伯尔在德意志，普列哈诺夫在俄罗斯一样，他为马克思派头一批健将之一，他在法兰西廓清过去一切遗传的空想社会主义，反对一切方式的改良主义。他在一八七九年创立法兰西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工人社会党”。

夏赫斯在法，也如伯伦斯泰在德一样，他是最先唱修正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他具有伟大热烈的政治天才。他知道在学理上战不胜吉司特派乃专门在行动上想办法来统一各派社会党。他所找出惟一可以统一各派行动的方法，就是：议院行动。在他的指挥之下，各派联合的选举竞争，果然胜利了。于是夏赫斯的权威日高，就成就了“法兰西统一社会党”。

法兰西统一社会党的政纲，虽然大体仍然是吉司特工人社会党的马克思主义政纲；然实际的政策则完全成为夏赫斯的改

良政策。所谓从事政治争斗的社会党，就成为一个专门从事选举运动的现政治下面的政党。革命的工人们，对于他们不满意，就更在工团主义中唱革命的工团主义。

十九世纪末，法兰西工团主义的产生，原来是社会党纯议院行动所惹起的反响。但自他标榜专门从事经济争斗之后工团主义的实际运动，又完全成为苟安于现状之下，一点一滴去改良的经济运动，不过与社会党的议院行动并立而成为改良主义的两面罢了。于是革命的工人又不满意，乃更产出革命的工团主义。

革命的工团主义极力反对一切政治行动的社会党，于是遂成为无政府党宣传的工具。然而在实际上，他们不能拔出改良的工团运动。比如劳动联合总会，最初本是以革命的工团主义名义成立的，但后来完全成为改良主义的中心。支配总会的霞华与美国的刚伯斯、德国的莱琴、英国的妥迈斯（现都成为资本家的走狗）没有区别。

所以一九一四年，资本帝国主义的大战一来，社会党与劳动联合总会，双膝向他本国的资产阶级投降，高唱“举国一致”、“阶级合作”惨杀国际及本国的无产阶级，为资本家争夺商场和殖民地。

在这样惨酷的资本帝国主义的大战之下，法、比、德、奥、……的社会党和工团同时破产，换过说就是由马克思主义和改良主义混合形成的第二国际社会党（法德各国的社会党都是其中的基本单位）完全破产。在这样的破产，流血的大混乱之中霹雳一声，出来反对的，最初就是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在德意志国会里面的反抗（在他两人的感召之下，发生国际非战社会党的秦麦华往和金塔尔地方两次大会）；复次就是俄罗斯工人阶级的

革命。

法兰西社会党和劳动联合总会的内部，在以上两种影响之下，就发生分裂运动。社会党中代表分裂运动的主要人物是罗奚和索怀林；劳动联合总会中代表分裂运动的主要人物是罗斯茂和马兰岱。大战未终结以前，这四人在社会党和劳动联合总会中，各组成反对最大多数叛逆工人阶级利益的少数派。一九一九年三月，俄罗斯共产党发起第三国际共产党。罗奚和索怀林就在社会党中组织运动该党脱离叛逆，破产的第二国际，加入第三国际的“第三国际委员会”，革命工团主义的代表者罗斯茂和马兰岱等也加入了这个委员会。同时，罗斯茂和马兰岱又在劳动联合总会中组织“革命工团委员会”。于是第三国际委员会和革命工团委员会就携手进行，形成以后法兰西工人运动的新生命。在这样的新进步之下，遂发生一九二〇年五月一日，纯政治性质和革命形势的总罢工。

一九二〇年三月，法社会党在斯德拉斯堡开常年大会。罗奚所率领的少数派，主张立刻脱离第二国际，无条件的加入第三国际。朗格特所领袖的多数派，因革命工人的压迫，既不敢公然反对第三国际，乃提出修正案，承认脱离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协商改造一个新的国际。所谓改造一个新国际就是不想老实加入第三国际，谋联合西欧各中立派社会党的势力，要胁第三国际就他们的范围。但这样的企图，因为德国独立社会党左翼制胜右翼，以及意大利社会党不听朗格特派的游说，完全归于失败。于是少数派在党中的势力异常扩张，而成为多数。及从前属于朗格特改造国际派的佛洛沙和嘉香一入俄罗斯便变成为布扎维克后，罗奚的第三国际派在院中的多数地位遂确定。一九二〇年

十二月底，法兰西统一社会党在都鲁斯开第十八届常年大会；第三国际派与改造国际派遂实行分裂。

前者分裂后成为第三国际共产党法国部——即法兰西共产党，分得党众十二万人；后者仍名法兰西社会党，分得党众仅四万人，不久遂与德、奥、瑞士各中立社会党组成第二个半国际。故法兰西统一社会党的分裂，说不上是党众的分裂，实是党魁的分裂：分裂时党中的国会议员（即党中的首领）共五十七名，仅有十三名分属共产党。可见群众多半是革命的，而党魁多半是投机的改良的了。

是最近二十年夏赫斯统御法国工人运动以来，马克思主义在法兰西，是名存而实亡的。一九〇三年统一社会党成立时吉司特派多半变成为夏赫斯派，阶级斗争的原则退于无权，而阶级合作的学说扬帆盛行。一九二〇年底，统一社会党分裂时，情形适得其反，从前的夏赫斯派几乎全体变成革命的马克思派了，阶级合作，业已成为一句大家引为耻辱的话而“阶级斗争”便成为今后法兰西工人运动的金科玉律了。

同样的现象，又发生在劳动联合总会中了。法兰西工人运动新纪元的第一章应大书特书的，就是革命的工团主义，至此渐渐抛弃从前反对的“非政治”的色彩，与共产党——工人阶级最坚决最明智的革命参谋部和先锋队——携手，一面为革命的经济斗争同时又为革命的政治斗争。

法兰西工人阶级党中的改良派既被革命派推倒了，从此，工人群众，最重大的任务就是推倒劳动联合总会中的改良派。这样的事情，本来可以早日实现的，但因一九二〇年五一的总罢工失败，革命工团委员会的首领马兰岱和莫马沙捉到牢狱去了，所

以比较社会党的分裂要迟一回儿。一九二一年四月，马兰岱和莫马沙——他是铁路工团联合会的书记——放出后，全国路工联合会就通过一个脱离亚姆斯德登国际工团（与第二国际并行的叛逆机关）立刻加入第三国际——红色国际工团的决议案。

然则改良派怎样对付呢？当莫马沙等未放出之前，劳动联合总会，在利尔开大会。霞华派——即多数派——主张排除革命工团出会，理由就是因为他们带有政治色彩，违反遗传的工团主义的原则，这样的决议案业已由各省工团的代表通过了，革命工团不服，乃召集各县工团的代表复决，结果，各县代表的最大多数反对中央机关排除革命工团出会。于是革命工团遂得仍在会内运动驱逐霞华一辈改良派的首领（常在内部驱逐改良派首领），这乃是第三国际很重要的方略。

以利尔大会的代表数字看来，少数派变成为多数派的日期又不远了。下次或再下次大会，革命工团委员会，一定要制胜的。

至于党与工团的关系：法兰西自来的工团运动，完全离党而独立。只在各自投机，改良的时代，还勉强可以过去，一到真正革命争斗的时代，这就完全不适时宜了。所以现在法兰西革命运动的惟一要求，就是要求革命工团运动，抛弃素来工团主义对于政治争斗的遗传。但是现在的革命工团委员会方在摆脱这种不适时宜的习惯之中，还没有完全摆脱着。

原来阶级争斗就是政治争斗，工人阶级不从事政治争斗和夺取政权，是决不能达到解放目的。而且政治争斗乃是工人运动必然经过的历程，始终不能以无政府党或工团派主观的理想和志愿超过的。比如法兰西的革命工团主义，最初本想专以经济的直接行动达到革命目的，但是事实上是不行的。你不要政权，

资本家便永远的握住政权以保护他们永远掠夺工人的经济地位。欧洲大战之所以能强奸法兰西革命工人的志愿，就是因为法国资本家握着政权在手里。法兰西革命的工团运动者经过这次惨酷的教训之后，所以素来反政治的革命工团运动，就于不知不觉中完全变成为政治争斗的共产主义运动了。

所以现在法兰西的共产党不是如从前一样，专以议院行动为政治争斗的惟一手段的社会党了；法兰西的革命工团运动，也不是专以“总罢工”为经济争斗的惟一手段的工团主义了，这就是法兰西工人运动最近的趋势。共产党明白的要求在：“无产阶级专政”；而革命工团委员会明白要求也在“一切政权归山第加”^①了。（这是一九二〇年五一罢工运动的标语。）

（载《先驱》第7期

署名：H.S.）

^① 作者注：山第加为工团的译音。

在封建的武人政治下 废督裁兵不可能的铁证

(一九二二年八月十日)

“裁兵废督：非俟统一之后无从着手”这是吴佩孚的个电说的；“废督不成裁兵无望”，这是黎元洪吁嗟叹息向人家说的。

靳云愕旅拥张为第十四师，业已见诸指令，彭寿莘旅也有拥张为师之说，就是吴佩孚自己的第三师，也正谋补充兵士，改称模范军了，并且黎元洪为曹锟所挟持，对于蔡成勋变相的督军令不久会要发表了。可怜的国民！你们还希在封建的武人政治下，废督裁兵吗？我们老实告诉你们罢：废督裁兵，要由革命才做得到，至少也须努力创造一种革命的优势才做得到！

(载《先驱》第10期)

署名：和森)

现在还是政治战争时代 并不是“法统”战争时代

(一九二二年八月十日)

革命胜利的先决条件，就是：完全解除旧支配阶级的武装。这一点做不到革命是不会成功的。

辛亥革命就是没有做到这一点。革命党误与封建的旧势力妥协，以至全政权完全落于北洋军阀之手。

十年以来，北洋军阀，拥兵窃国，蝉联不绝，到了现在，并其“法统”而窃之。然则现在战争的，是“法统”的战争呢，还是政治的战争呢？

这一点，不但全国人民不明了，就是国民党自身也不明了，所以曹吴一唱恢复国会，北自蔡元培南至陈炯明，或文或武，交迫孙中山赶快下野。就是孙中山虞日的宣言，他的立场也是很薄弱的。

所以我们须得警告国人：现在仍然是政治战争的时代，并不是“法统”战争的时代。大家要想有个法治国出现，就应该先使民主革命成功！

(载《先驱》第10期)

署名：和森)

基督教徒在政治上的大活动

(一九二二年八月十日)

政变以来,基督教徒王正廷辈大大的活动起来:亲美的颜牧师内阁成立后,不久,顾维钧出任财政委员会长;不久,王正廷运动余日章为教育总长而王自谋长交通部;不久,他们又寻找武力的靠山而去勾结冯玉祥;不久而广州政府的徐谦牧师又北上做这一类的勾当。

这次政变,把新旧交通系一齐逐出政治舞台,同时遂给王正廷辈以掠夺操纵全国财政的绝好机会。现在继新旧交通系而代兴的财阀就是他们了。他们将来卖国给美国的本领一定不弱于曹陆辈之卖国给日本。

我们要明白告诉中国人:这乃是美国资本帝国主义的雇用人,在中国得势的第一步!

(载《先驱》第10期)

署名:和森)

统一、借债与国民党

(一九二二年九月)

辛亥革命既已成功了十一年，民主与封建之争——在袁世凯时代为共和与专制之争，袁死后为护法与非法之争——何以至今还不能结束呢？主要原因在旧支配阶级的武装并未解除，北洋派领袖且因其武力而完全承袭新政权，政体虽然是新的，而支配阶级则仍然是旧的。旧支配阶级——即封建的军阀与官僚——要扩张并巩固其地位，第一步就不得不增加其武力以压迫革命阶级并解除革命阶级的武装。二年独立失败，革命阶级完全解除武装而被驱逐于政权与领土之外，北洋派乃更进一步，实行推翻共和恢复封建政治。袁世凯死，段祺瑞承继其地位，自此以至于现在的曹吴，政权总不出北洋派的掌握。

由此我们可得一个重大的教训：旧支配阶级的武装不解除，旧军队不完全解散或彻底改组，新支配阶级——即革命阶级——的统治权是不能保持的，他的革命是要被推翻的。所以法兰西大革命，罗拔士比极力破坏旧军事组织，撤换一切封建阶级的司令长官，最后第三共和之所以巩固，也是因为旧军队解体，共和国新军队完全成立之故。最近俄罗斯革命之所以成功，苏维埃政府之所以不能动摇，也是因为在十月革命前，用宣传手段，完全破坏旧军事组织和纪律第一步是废除军队中的死

刑，到一九一八年更完全遣散旧军队而改建工农阶级的红旗军。假使他们在革命中及革命后不完成这种根本工作，他们的新政权也是迟早要落于旧军阀之手，他们的革命也是迟早要被旧势力推翻，如中国辛亥以来的故事一般。

所以从这一点说来，中国现在政治问题，实在去真能解决之时还远，因为全部政权还在北洋军阀手里，北洋派的武力依旧是政治舞台上的主人。在这个时候谋政治上的统一，除彼此把他当作一种暂时的政策之外，真正的统一是不可能的。自孙中山先生由粤来沪，曹吴代表南下，于是孙吴携手之声，甚嚣尘上。此事在形式上看来，吴佩孚之舍陈（炯明）联孙，及孙之弃奉而与之比较好的军阀周旋，不可说不是一种进步的现象。但实质上怎样呢？据曹吴艳电看来，不过是空空荡荡称赞老孙的宣言罢了；至于他们对于江西问题是丝毫不肯让步，不任国民党有立锥之地作根据。然则直系之联民党，不是想利用民党为统一借款的招牌吗？不是与杨度近日对国会问题的主张同样用意吗（大要不外消灭护法名义，以便北洋派统一中国）？曹锟不过是北洋系一个死军阀，值不得我们多说，吴佩孚虽然比较进步一点，但他将来能抛弃北洋军阀的地位加入民主主义的战线吗？他对于曹锟言必称大帅，行必称服从，若长此下去，至多不过是一袁世凯或段祺瑞第二罢了，所以现在革命群众对于联吴之视为有意义，不过在剿灭红胡子之一点，因为张作霖一派野蛮势力之急需剿灭，于革命进程上乃属必要的。至张作霖剿灭后的吴佩孚怎样，乃系另一问题，决不要因此而疑虑张作霖灭亡之不利于势力均衡，因为革命党要靠继续革命才能存在的，靠旧的军阀势力之均衡，是不能存在的。

由上看来，政治上的统一，显就不是混合或调和各大军阀的旧势力可以做成的；乃须经过不停的革命奋斗才能真正成功。若舍却革命的宣传与行动，只与军阀谋统一，结果只有上当。

孙中山先生叠次宣言曾说“政治上之统一，自以国会真正恢复为必要条件，”又说“护法问题，当以合法国会自由行使职权，为达到目的；如此则非常之局自当收束”非常局面虽因陈炯明之变乱而终局了，但政治问题绝不会一下解决，因而革命之局还是不应收束的。比如“国会自由行使职权”一项，看来虽似平常而实际非铲除军阀不能做到，所以孙先生第一次宣言曾说“夫欲约法之效力不坠……在扫除一切不法之武力，否则国会之行使职权，不但徒托空言，抑且供人利用”又说：“故直军诸将为表示诚意服从护法起见，应首先将所部半数由政府改为工兵……其余半数留待与全国军队同时以此改编，”第二次之对外宣言全局和平之第二项办法，也说“必铲除多年祸根之军队势力，非各省督军统治下之兵队悉照予六月六日改编工兵之计划则和平不得而期”这都是些探得病原的说法，但是以大义责军阀是无效的，必须此后继续用革命的争斗的手段才能做到。就工兵计划一项而说，民主革命的胜利确定，采工兵制以改编新军，是很有益的；若在现状之下，各军阀各自采用起来，则不但于时局无益，而且反可延长封建政治的命运，增加武人割据的势力。比如就近日吴佩孚发表之兵工计划而说，他说现在每一兵须费国库银五两，他的计划实行，只需银二两便足，这样一来，吴佩孚有事时，可就原有饷额扩充他的军队到二倍以上，并且军队饷源有生产的经济基础，封建的，割据的局势，不愈加严重巩固吗？各省割据的军阀大大效法起来，将来还了得吗？

所以现在无论从何方面说，革命党当大大宣传民众，大大结合民众，轰轰烈烈继续做推倒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之压迫的民主革命。至于政治上的统一，万不宜苟且将就以上当。

属文至此，偶然检阅本月八日的《民国日报》，看见“美报记孙总统之谈话”颇觉一惊！今把这个新闻抄在下面：

世界新闻社译英文日本《广智报》上海通信员索克思氏八月二十五日通信云，孙中山今日对客谈论中国之国际地位，谓中国之内部政潮欲求解决，必须先从解决财政入手，尤以解决北京政府之对外借款义务为特要，中山之态度，赞成外资继续参加于开发中国富源及建筑道路。彼云“在北京前此开始拖欠外债之前，欲先谋统一然后整理财政，其事虽非不可能，然极困难，今已不复如是矣。”中山谓北京若无一有效力之政府，能实施其命令于全国，并收集各省之税款而不遭阻挠者，则统一之举，徒属空谈。而国家之还债，若不恢复，则设立此种政府显然为不可能之事。中山于未觅到若干解决中国财政问题之方法以前，不准备加入北京政府，彼以为当小数薪金尚不能付之时，断然无法处理北京大局。关于彼有总统希望之说，彼云：“倘余得有美国及其他中国欠债之国之保证，证明中国提出关于归还过期外债借本之提议，将得优惠之考虑，又保证在依据外人良好顾问不久即将实行之整理时期内，新银团将给与垫款，以供寻常行政用途，则余将往北京。”

据这个新闻看来，似乎孙中山先生注意于北上谋统一，而以解决财政为入手办法，倘若得美国等欠债团之保证及新银行团给与垫款以供寻常行政用途，则可以北上。这个新闻确实与否则不可得知，但我对于借款及新银行团颇有点意见，略写于下。

中国在国际地位上早已处于半殖民地地位，最近经过华盛顿的宰割会议，更把他活活地放在英美日法帝国主义协同侵略的“门户开放”政策之下，以为实现“国际共管”的地步。然则自动的借外资以开发中国实业，乃为国际帝国主义者所不愿闻，因为他们所要的，是要以他们本身的利益为准标，而使中国的经济生活永久隶属于他们自己的资本主义利益之下，故决不会容许中国自成为大工业生产国，以谋经济上政治上之自由发展与完全独立。所以中山先生之机械借款说，英美法日的资本家，是不欢迎的。然而这种计划，实为中国民族独立自强的要素，不过其达到之方法，在事实上只有下列二途：

(一)与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之好友苏维埃俄罗斯，及已完全解除武装再无侵略能力并且最富机械与技术人材之德意志缔结经济同盟。

(二)努力完成民主革命，推翻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在中国之特权与压迫，建立完全自主的独立国家，仿照苏维埃俄罗斯之无损主权不受束缚的招致外资及权利让与等等政策，迅速的自主的开发中国大工业。

这两个方法，是最可能最妥当的方法，是经济落后国和半殖民地所应当走的道路，惟有向这样的道路走才有解放的希望，惟有向这样道路走，才能得到独立与自由而不致永远为国际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奴隶。假使我们不察，只知梦想那些要永远隶属我们于他们经济利益之下的英美法日帝国主义者，来借款超渡我们，这不但不智，而且反要误了我们解放的前程。所以在这样的选择之下，国民党的外交方针，有从新估定之必要。

“美国是中国最好的朋友”，换过说，就是最会使掩眼法最会

用宣传术以宰割中国的“好朋友”。他对中国除成功了“门户开放”、“国际共管”的局势之外，更为中国组织一个新式的东印度公司叫新银行团。他口口声声为的是中国好，口口声声非等中国统一后不投资。其实这样不投资的高调，就是要迫使穷极无聊的北京政府早日承认他。现在呢，他的方针变了，想在未统一前借些钱给中国去“统一”了，但是要一切关盐烟酒等税收作“总担保”，并且监督用途，管理财政。因此我们应该觉悟在民主革命未完全成功，军阀未完全消灭以前，中国既无统一之可能，更无借款之必要。多借一笔款，多养几日兵，便多延长封建的军阀几日生命。倒不如餉竭兵变，他们要灭亡得快些。

总之，为中国人民根本祸患的就是国际帝国主义与封建的旧势力，三十年以来的国民革命运动，就是由这两种东西刺激起来的。所以国民党过去的生命在革命，今后的生命还是在革命。为使这种革命运动贯彻成功，便要一面与民众为亲切的结合，一面与苏俄为不二的同盟，大着胆子明白的反抗以上两种恶势力，使革命潮流一天一天涨高，革命行动一天一天丰富，勿以民众力弱而与之疏隔，勿以善邻势微而不与之接近，勿因一时之利害，而忘远大，勿让土耳其基玛尔氏所领袖的国民党专美于前！

（载《向导》第1期

署名：和森）

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 军阀专政与军阀割据

(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日)

一、乱源的分析

一个时代的政治变化，有一个时代的经济变化为基础，所以近世政治史上的民主革命，不过是经济史上产业革命的伴侣。中世纪末，封建制度既成为新兴资本主义大企业的桎梏，所以被桎梏的资产阶级便起来推翻封建而建筑近世的民主政治。

因为资本主义的东侵，民主革命的潮流自然也要随着波及东方被侵略民族的弱国和经济落后国。故中国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数十年严重压迫之下，便发生了“改革内政以图自强”的革命运动。

然国内农业手工业的经济基础虽日被压迫，日见崩坏，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却不容许其起一种强大普遍的变化，因而经济地位上强有力的革命阶级没有形成，不过少数觉悟的革命党，凭借饱受外国刺激的外埠华侨势力，奋斗不息，勉强完成辛亥革命罢了。

故中华民国，乃是革命阶级羽毛未丰，将就封建的旧支配阶级势力，与之调和妥协而后苟且成立的。这样一来，更加以国际

帝国主义扶植旧势力以图自便的捧袁空气之压迫（当时捧袁外论，英美主之，压力极大，对于民党吹毛求疵的疑惧或诋毁，极力制造中国非袁则亡，则惹干涉，则不被承认等空气。），及全国还无革命意识的小资产阶级和平，统一，妥协，等倾向之鼓荡，自然新政权不得不完全落于封建的军阀与官僚之手。由此就形成十年以来军阀专政和军阀割据的封建残局。自帝制，复辟，以至今后假名统一与联治之争，那一役不是根源于未曾解除武装而且反为新统治之主人的封建余孽呢？

所以今日不但直，奉，皖，各系军阀为前清遗下的北洋派之嫡系；就是川，湘，滇，粤等经过民主革命领域的新军阀，也是在这封建政治的残留局面之下孳乳出来的。

由此，我们可正确的肯定中国乱源：在封建的旧势力之继续；而不在胡适之先生那种新发明的“统一”史观（看《努力》十九号）！我们要高声说：他那种牵强皮相的分析是很谬误的。

二、封建残局下的政治问题

由此我们可以推论：十年以来的内乱与战争，既不是“南”“北”地域之争，又不是“护法”与“非法”之争，更不是“统一”与“分离”之争；乃是封建的旧支配阶级与新兴的革命阶级之争。这样的阶级战争，发生于一定的经济情形和国际情形之下，谁也不能否认。假使经济地位上的革命阶级早已成长，假使国际帝国主义不忌革命党统治中国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那末，十年之中民主革命总可完成，把旧支配阶级解除武装而退处于无权。这样，则中国现状早已上了民主政治轨道，由新支配阶级

来制定宪法，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权限，都是容易解决的事体，何至酿成内乱与战争？只缘新旧支配阶级同时并立，旧势力反占优势而握得政权，所以元二年间总统制，内阁制，中央集权，地方分权，以及同意权之争，才成为北洋派与国民党爆裂的导火线。所以这些政制上的争执，不过为内乱的导火线而已，新旧势力之不能两立，才是内乱的真实根源。

所以要国体政体确定，非先确定新旧两阶级的胜负不可，要靠妥协，调和来立国定政，乃是绝对不可能的。只有旧势力完全推翻革命，解除革命阶级的武装，封建政治才能完全恢复；也只有新势力完全制胜反革命，解除封建阶级的武装，民主政治才能真正成立，不然宪法制定也是无效的，政制修明也是徒然的，换过说：新旧阶级的地位没确定，死文字的规定，不能发生作用。

国家政权，系建筑在阶级抵抗上面，为这阶级用以统治别阶级的机关，只能属于一个支配阶级而不能有两；若一国有新旧两个胜负未分的支配阶级同时存在，各据政权或武力以相抗，则其现象必为内乱与战争，或妥协苟安之局，而其政治，必为半新半旧非驴非马的东西。所以中国现在这种半封建半民主的局面，就是新旧两阶级的争斗，还没有达到决定时候的反映。

由此可以断定：在这样情形之下，一切政治问题，不是创法改制可以解决的，换过说，就是非继续革命，完全打倒军阀，解除封建阶级的武装不能解决。

三、军阀所要的统一与联治

假使民主革命成功，民主政治有确立之可能时，政治上的单

一制与联邦制，不过为宪法上一个容易解决或修订的问题；可是这个问题现在横在我们之前，则完全为另外一回事。力能进取的军阀，便倡武力统一，或主张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如曹、吴），仅能自保或希图自保的军阀，便倡联省自治或筹备制省宪，举省长（如川、滇），同一军阀，进攻时宣布武力统一，退守时宣布联省自治（如奉张），位置动摇时改称省自治（如浙）或打算取消省自治（如湘赵），又如湘赵最初之因首鼠两端而宣布省自治，粤陈之想王广东，反对北伐而主张联省自治……凡此种种，无非是封建的残局之下，军阀专政，军阀割据的必然现象和趋势。所以统一派的军阀最忌联治，联治派的军阀最忌统一，换过说，就是为帝者不愿众建为王，为王者不愿奉人为帝，或则为帝不成而思王，为王不愿而思帝，完全为军阀间一种斗剧。

可是在这样武人主倡的联省自治说之下，却激起一部分政论家和智识者“将就现状”，“因势利导”的赞同，认为是解决时局的惟一方针。最近胡适之先生在《努力》十九号发表一篇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他诂定联邦运动的作用为“增加地方的实权，使地方能充分发展他的潜势力，来和军阀作战，来推翻军阀”；他更找得与军阀作战和推翻军阀的工具为省议会。这不可不说是联省自治论中的大进步。

但我要明白告诉适之先生：你这种英国式的议会政策用在政治问题解决后——即封建的军阀被推翻后——是有点作用的；若用来解决政治问题乃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在军阀没有铲除的时代，省议会无法免掉他们的制造，强奸，蹂躏和压迫，如此而可望充分发展地方的潜势力，来和军阀作战，来推翻军阀吗？故适之先生当承认：你这种和平改良的议会政策，原先想借议会

来推翻军阀，结果只有军阀推翻议会，这是武人政治下的必然律，证以过去现在的事实，没有人可以否认的。

适之先生一若承认过去为法治而不为武人政治，故将督军总司令权力扩张之原因归于地方之无“权”；又若承认今后也为法治而非武人政治，故主张赋地方潜势力以合法的“权”，使之到省议会里面去与军阀作战，并“大胆”肯定打倒军阀割据的第一步在联省自治。但我们也可以大胆告诉适之先生：打倒军阀割据的第一步在民主的革命。

四、中国唯一的出路

中国政治的乱源既然在军阀，所以现在根本的问题不在政制而在怎样推翻军阀，换过说就是怎样革命。若忘记现状——封建残局——以为改变一种政制就可以止乱定国，那末，不将乱源嫁于政制，便将政制认为是止乱的方法，胡适之先生便完全犯了这种错误。在今日而讨论未来的政制可以说是无病呻吟，毫无意义；若讨论现实的政制，则决不能置现状于不顾。所以现今的政治问题既非势必成为割据的联省自治所能解决，又非北洋正统的武力统一所能奠定，惟一的出路，只有贯彻民主革命。在现状未完全打破之前，地方政权不能脱离军阀之手，中央政权也不能脱离军阀之手，所以我们现在所需要的不是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但是强有力的革命党，不是武力的统一，但是革命的统一。我们既不梦想一个将就现状或超越现状的宪法来统一，更不梦想大批军阀来统一；我们惟望结合伟大的革命群众的势力，尤其是最能革命的工人阶级的势力来统一。统一的目的要建筑在最

大多数贫苦群众的幸福和全国被压迫民族的对外独立之上，才能够真正的统一。

自来一班与群众隔离的政治家或政论家他们简直不知道或者不承认有群众的势力，所以他们不谋勾结或利用旧势力便想求助于外国帝国主义者，不是发表些蔑视群众，谩骂工人兵士的怪议论，便是想出些上不靠军阀下不靠民众的智识者的纸老虎或乌托邦。所以革命数十年，议论三十载：上不能破坏旧军事组织解除军阀的武装而反使封建残局孳乳延长；下不能将革命潮流普及于全国最深最广大的群众唤起浩大不可抵御的革命势力，而坐失了许多可以扩大兴奋的宣传运动之机会；每每失败一次又踏一次的故辙，萦情于现成的势力及不可得到的外力帮助而不能自己，致使可以膨涨的革命潮常常因而收缩；乃反蔑视群众无力，或诬群众麻木，不知真正为群众的利益而奋斗而革命，群众未有不感发兴起的。这些都是真有改革精神之政治家政论家所应急于觉悟而改变的。可是现象不然，或则仍然梦想借外力以废督裁兵，或则仍然梦想联合几派现存的势力来统一，或则梦想改变一些纸上的制度来和平改良。够了！这些过去都已试验了，现在须得觉悟起来罢！大家试想想：不要以为除革命外还有别的出路；不要以为革命没有办法，假使能将求助于外国帝国主义者的精神去求助于群众，假使能把一部分工夫去做违法的工作，破坏旧军事组织和纪律，激起兵士们的自觉心，假使能够鼓起人民武装的自卫和抵抗，使各大城市的市民全副武装或工人全副武装，那末，民主革命没有不成功，封建的武人政治，没有不崩倒的。

（载《向导》第2期

署名：和森）

中国国际地位与 承认苏维埃俄罗斯

(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自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八国联军及中日战争等役以来，中国已被国际帝国主义夷为半殖民地，人人知道他实际上已不是独立国了！“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协定关税”，“治外法权”这些都是国际帝国主义对于殖民地必要的政策，而中国莫不一一躬受其赐。最近华盛顿会议，承美国帝国主义者特别关照，教中国代表自己提出宰割中国的十大纲，由此中国半殖民地的国际地位就铁案如山了。从前国人一闻“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话，便知道是瓜分宰割的代名词，奔走号呼，以图抵制；可是现在这种政策一经美国帝国主义的运用，亲美派少年外交家的传述，国人都象催眠术中的被催者一般，大家都做了美国和亲美派外交家的留声机，以为“华盛顿会议后，中国国际地位增高了”！

华盛顿会议后，中国国际地位果然增高了吗？我们试看：从前所谓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其含义不过止于商埠，现在则公然规定普及于中国一切工商业，换过说就是中国今后一切工商业均须国际帝国主义共同支配。这样一来，不是于“协定关税”外，更加一层“协定工商业”的束缚，中国国民经济尚有自由发展的余地吗？至于政治方面呢，华盛顿会议，除重新将中国置于英、

美、日、法的保护（美其名为尊重中国主权独立领土完全）之下外，更明白规定他们可以协助中国设立“有效而稳固的政府”，然则中国在国际上，还有政治的独立可言吗？

中国政治上的独立和经济上的自由发展，都是国际帝国主义所最忌刻的，因为中国地大物博，人工又多，假使政治修明，自动的开发实业，必不难在短期间发展为新兴的工业国，不但国际资本主义将丧失其惟一可以延长命运的市场和销路，而且中国更廉价的制造品将与之竞争于世界市场。这种可能的利害冲突，国际帝国主义是非防制不可的，故他们自来对于中国政治革命运动只有压迫（最近如广州英国领事之助陈压孙）而无帮助，对于中国国民经济，更是协同握住其生机——如协定关税——而不容他自由发达。所以华盛顿会议不过是国际帝国主义的强盗，协定一种共同不相冲突的步骤——门户开放，机会均等——来宰割中国，永远使中国为他们商品的尾闾，原料的供给场，瓜分蚕食的目的物罢了。在这样可怕的协同侵掠的政策与羁轭之下，中国国际地位会增高吗？

国际资本主义发达到今日，已把占全人类四分之三以上的经济落后国和弱小民族隶属于英、美、法、日最少数帝国主义的支配阶级之下，几乎可说，全人类生杀与夺的机括完全操纵在这班强盗手里。经济落后国和弱小民族生存于这样可怕的帝国主义国际情形中，除甘愿永远为他们的奴隶及常常被他们不时而起的帝国主义战争牺牲外，只有结合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掀起世界革命。

世界革命的形势，经国际资本帝国主义长期的酝酿，现今业

已成熟了：第一，世界革命的先锋军和策源地——苏维埃俄罗斯——不仅业已诞生，而且渐渐强壮；第二，爱尔兰、土耳其、印度、波斯、埃及、菲律宾，以至朝鲜和安南（本年上二月，曾起了一次革命，因法国帝国主义者严禁此项消息露布，故中国报纸，只纪载一次）等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莫不业已发生激急的革命独立运动；第三，上次帝国主义的大战，和战后协约国倒行逆施的政策，及资本制度本身的不可复苏，业已把全世界的经济秩序紊乱无极，经济恐慌，失业恐慌，生活昂贵，日形紧张，无法救济，因而中欧、西欧、南欧各资本主义的大国，莫不滚入社会革命的最高潮而无法挽回。我们想一想：这样资本帝国主义的世界，他的命运还可长久吗？

现今各资本帝国主义的强国，既没法子解决社会问题，更没法子解决国际问题——因为都要待推翻资本帝国主义的本身才能解决——所以对内对外只有“武力解决”之一法，因而把现在世界造成恐怖，流血，战争不停的世界。但是他们这种残暴的方法，已经渐渐用不灵了：对外既不能推翻不共戴天的苏维埃俄罗斯，对内又不能剿灭革命的工人阶级。结果只有加倍的掠夺弱小民族和经济落后国，协调步骤，向那蚕食了半世纪还没吃完的中国进发。

在历史上必然的历程看来，中国将来真正的独立与解放，非经过世界革命的潮流不能成功；而现在要提高国际地位，更非与业已在国际上占新的重要地位之苏维埃俄罗斯携手，不能为力。我们要了解苏维埃俄罗斯在国际上的新势力与新地位，看看最近资本帝国主义的国家邀请他在柔鲁开对等会议的经过，德俄条约的影响，及土耳其国民党政府提议协约国须会同莫斯科政

府才得谈判近东问题的事实，就明白了。

数十年来，中国包围于国际帝国主义之下，寻不着别的出路，而地理上最密迹的帝国主义恶魔，尤莫如日俄两国。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成功，俄罗斯帝国主义及他与日本所订关于瓜分中国种种密约，随着消灭，不久苏维埃政府更通牒中国，抛弃俄国帝政时代在东三省及其他地方所掠夺之一切土地、矿山、中东铁路、庚子赔款、治外法权，及其他一切特权。这样一来，中国国际地位，确是绝处逢生，理应急起变化，与苏俄联合以抵抗日本及其他英美一切帝国主义的压迫。但事实不然，北京政府，早已成为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外府和支店，故完全以日本政府之对俄政策为政策，不以中国本身之利益为标准，而以日本帝国主义者之利益为标准。最近政变，亲日派下台，而亲美的外交系继之，故对俄政策又完全仰美国帝国主义的鼻息为转移，如顾维钧对于越飞之冷淡无诚意，及委美国顾问辛博森代表中国政府赴长春会议，就是明证。

无论亲日派或亲美派，都是借口“撤退驻蒙红军”为中俄先决问题。他们服从国际帝国主义的指教，认蒙古民族独立自决，为俄罗斯占领蒙古，他们只听说红军驻扎蒙古，而不看见英、美、法、日帝国主义的军队驻扎在中国的首都，并且割据或租借了中国一切重要的军港和商埠；他们只知苏俄不肯轻易撤退红军，而不知红军一旦撤退，日本帝国主义者便将资助白党（即旧帝制党）以遂其反革命的阴谋。更有一层，他们对于苏俄无意占领的蒙古问题看得这样重，同时对于苏俄宣布退回而中国反任旧党霸占的中东路问题何以看得那样轻？这没有别的，不过苏俄为

国际帝国主义所排斥，他们也跟着排斥，旧党反革命党为国际帝国主义所宠任，他们也跟着宠任罢了。这就是他们常常自己所称叫的：“弱国无外交”。

还有一层，国民是应该郑重注意的：以国际帝国主义对于土耳其的惯技看来，常常挑起土耳其民族与非土耳其民族间长期不解的纷争，以坐收渔人之利，故为同隶于一版图的被压迫民族计，惟有互任并互助其各个之自决与独立，然后再联合以抵抗国际帝国主义。最近土耳其国民党，对于纷争最烈的亚尔梅尼就是用这个原则解决的，所以现在亚尔梅尼不仅不与土耳其为敌，而且反与土耳其联盟以反抗英希的侵略。这是我们对于蒙古西藏应当取法的。

总括说来，我们对于中国人民惟一好友之苏维埃俄罗斯，早应立刻承认立刻联合以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并提高中国国际的地位，使中国人民得渐渐跑近独立，自由，和解放的道路。故我们现在主张觉悟的人民，应一律起来压迫那自来亲附国际帝国主义的北京政府，即日承认苏维埃俄罗斯，与长春会议同时开一中俄会议，以解决中俄一切问题。这个目的未实现以前，我们更希望革命的领袖，和各界觉悟的人士，毅然起来促成中俄人民直接的交谊和联合，以纠正附随国际帝国主义的官僚外交！

（载《向导》第3期

署名：和森）

祝土耳其国民党的胜利

(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最近一世纪来，世界上最被国际帝国主义压迫的老大国家莫如土耳其与中国。土耳其与中国的问题，就是所谓近东问题与远东问题。这两个地方，一面成为贪暴无厌的国际帝国主义战争攘夺的中心，一面成为占全人类三分之一以上的被压迫民族最痛苦最被宰割的区域。

一九一四年以前，帝国主义列强在土耳其所造的罪恶，正如在中国所造的一般：除武力侵略，分割土地，勒索赔偿，监督财政，治外法权及酿成分裂与内乱外；并多方制造空气，诬蔑被基督教——帝国主义无形的工具——惨酷压迫而起反抗的回教徒为野蛮排外的民族。他们既把土耳其弄得分崩离析，匍匐于国际帝国主义的铁锁之下而不能自振，乃更把土耳其的支配阶级及各政党化为各自的仆役而使之成为亲英派或亲德派，以图各派帝国主义在土利益之特别扩张。在这样情形之下，土耳其就陷入了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流血漩涡。

大战告终，土耳其随着德意志受协约国帝国主义的宰割；于是亲英派领袖弗力巴赫(Ferid pasha)代亲德派之青年土耳其党秉政，足恭足敬听受英法帝国主义的宰割。一九二〇年八月协约国遂课土耳其以严酷的绥佛尔条约；把他的土地分割了三分

之二，人口分割了二分之一以给希腊及分配于国际帝国主义的代管或共管之下；更规定土耳其的财政受英、法、意三国严密的监督，土耳其财政代表，只备国际帝国主义者的谘询，连表决权都被剥夺；至于治外法权的扩张更不待说了。但是奄奄一息的君士坦丁政府和亲英派以为这种宰割的惨境，是没有方法可避免的，是应当恭恭敬敬承受的；他们对于英法帝国主义的驯伏惟恐不谨，对于摩拳擦掌要与英国来争米索不达米亚石油的美国帝国主义尤想巴结，他们仍梦想巴结一派强盗来抵制强盗，不知这些强盗永远是要协同来打劫来宰割的。

在这样情形之下，就激起了四年血战，疲困不堪的民众的大反抗，最伟大最有革命精神的基玛尔将军统率他的国民党起事于安戈拉，组织新政府和国民军；与希军战于西，英军战于东，法军战于南，竟一战一战的打胜了，于是垂死的土耳其变了一种新局势。

基玛尔国民党当着土耳其这样颓丧，崩坏，被宰割的残局，立脚在一种甚么势力和政策之上，而能战胜国际帝国主义呢？第一，是立脚在被压迫民族的群众势力上面；第二，是改变自来各派政党倚狼拒虎或倚虎拒狼的亲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而毅然决然与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之好友——苏维埃俄罗斯联合。自一九一七年苏维埃俄罗斯出世，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不但去了一个最可怕的帝国主义恶魔，而且来了一个最可靠的救星，因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命运为之一变。这样的转变，于土耳其更足以证明（一九一八年秋季，各回教民族开代表大会于莫斯科，以图抵制协约国对于土耳其的压迫及协定回教民族相互间的问题，并与苏维埃政府联合组织一个“回教解放同盟”；一九一九年秋

季，开第二次大会，成立更坚固的结合；一九二一年，土耳其，波斯，阿富汗与苏维埃俄罗斯更缔结重要的条约；宣布废除国际帝国主义一切强奸三国的条约，苏维埃俄罗斯承认回教诸国之完全独立而帮助之）。

土耳其国民党既借苏维埃俄罗斯的帮助，战胜了协约国，英法帝国主义者一面恐红旗军南下，危及叙利亚，印度，地中海，一面又因希腊政变，前德皇妹婿康士坦丁复辟，形势更不利于协约，乃于一九二一年二月，在伦敦召集近东会议，修改绥佛尔条约；除将海峡管理委员会长归土耳其，许土耳其得派代表参加撤废治外法权委员会，及在财政委员会之代表有表决权等让步外，更规定士麦那——小亚细惟一的良港——之主权属土而希腊得驻军队于其间，以为暂时妥协之计。希腊帝国主义者不服，再动员与安戈拉政府宣战，断断续续，一直战到现在。最近基玛尔的军队乃大破希军，夺回士麦那，以胜利的最高优势，进图土耳其之完全独立与自由，不但要恢复战后所丧失的一切权利与土地，而且要回复土耳其到比战前较优而能解放的形势。这样一来，不独挽回土耳其和近东几千万被压迫回教民族的命运，而且给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以最好的模范和印象。所以历史上最可祝贺的胜利，除苏维埃俄罗斯的诞生外，要算是这一回了！

我们不但祝贺这一次的胜利，而且祝贺他在最短期间完全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建筑土耳其为完全，独立，自由的国家。土耳其国民党能得到这种最后伟大胜利吗？我们可以高声肯定说：（一）假使他仍然立脚在群众势力上面，借这次胜利的优势使被压迫群众对于国际帝国主义的反抗愈益横厉无前；（二）并始终与苏维埃俄罗斯结合，不为法兰西帝国主义虚伪的外交

政策所摇动，那末，土耳其国民党一定能得到最后伟大的胜利。有人以为土耳其现在的形势，法国也与有力，这乃大谬不然：自伦敦近东会议以来，法兰西帝国主义者，一因与英国在近东的利益相冲突，自己的利益落了英国之后，二因希腊前皇复辟，恐德国势力增长，三因土俄结合日密，形势不利于他那始终梦想推翻苏维埃俄罗斯的反动政策，所以便假仁假义标出助土抑希，反对英国的外交政策；其实法兰西帝国主义就是始终宰割土耳其的刽子手之一，除以上三个原因外，他何所爱于土耳其呢？假使土耳其国民党没有胆识，不敢与苏维埃俄罗斯接近或结合，而仍然徘徊于帝国主义者之间，他能得到今日的胜利与地位吗？更进一步说，假设土耳其国民党今后政策动摇，为法兰西帝国主义所欺骗，疏俄而亲法，结果：他不要完全丧失民众的信任，除俯首贴耳受帝国主义的支配外，还能更前进吗？但有胆识的伟大的基玛尔将军决不会如此的，他知道法国帝国主义，美国帝国主义及其他帝国主义的国家，都是一样不可亲近的，他知道今日亲法或亲美，明日英国对法美让步妥协，他们便要协同来加倍宰割土耳其的；他知道惟有与建筑在打破“人掠夺人”、“国掠夺国”之基础上面的苏维埃俄罗斯结合，才没有这种危险，才能得到真正解放。据最近消息：土俄的结合，决不会因法国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而离间，乃是已经证实的。因此我们更信土耳其被压迫民族最后伟大的胜利，是不会很远了。今且把本月二十日《时事新报》所载的消息抄在下面：

十八日柏林电 闻基玛尔将军电致刻在柏林之俄代表齐吉林，渠谓全遵条件行事，安戈拉政府依约办理，仅可与协约国会同莫斯科政府谈判近东问题。

由以上所说的看起来，可知被压迫民族的解放，现在已经发现了一条胜利的大路，就是被压迫民族与苏维埃俄罗斯的联合。这条大路，在一九一四年以前是没有发现的，所以青年土耳其党虽具爱国的精神，仍不免走入迷途，亲附外国帝国主义，使土耳其愈陷于绝境。现在伟大而有胆识的基玛尔将军，既领导土耳其民族跑到这条伟大胜利的路上来了，就是从前失路的青年土耳其党也跟着跑上同一的道路了，近东被压迫民族已由黑暗而渐趋光明了；然则远东被压迫的民族应当作何感想呢？尤其是三十年来，孤军奋斗，异常被国际帝国主义所嫉视所压迫，并且与土耳其国民党处同一地位的中国国民党应当作何感想呢？

四万万被压迫的同胞呀，你们看见了吗：同被国际帝国主义压迫的土耳其民族，他们已经战胜国际帝国主义了！他们的国民党已经领导他们跑上伟大胜利的道路了！我们羡慕他们，便要学他们的好榜样：快快起来促起我们革命的政党统率我们与苏维埃俄罗斯联合，以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压迫呀!!!

我们不要装作没闻见罢：现在近东各处被压迫的民族，正在轰轰烈烈庆祝土耳其的胜利呀！所以我们四万万被国际帝国主义压迫的同胞，也应同时起来表示我们热烈的同情与祝贺，我们应当人人高呼：

土耳其被压迫民族的胜利万岁!!!

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与苏维埃俄罗斯的联合万岁!!!

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万岁!!!

（载《向导》第3期

署名：和森）

南 通 借 款

请看私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害处

(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压迫之下的经济落后国有一种必然律：就是私人资本主义不能独立发展，必须仰仗并附属于外国资本之下才能发展。比如大战以前的俄罗斯私人资本主义，他们每年的生产和收入，百分之七十以上，只能提供英国、法国、比国资本的利息，自己所得的不过百分之二三十；而全国煤业、铁业、石油业，几乎完全成了英、法、比资本家的私产（最近英法比在柔鲁及海牙会议所要求退回外人的私产，就是指这些）。但俄罗斯资本家贪此百分之二三十的私人赢利，不惜将全俄的经济生活附属于国际资本之下。

中国新兴的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也渐渐入了与从前俄罗斯同样的途径：不但“中英合办”，“中美合办”，“中日合办”的大公司、大企业渐渐遍了全国，就是号为中国资本的大企业，那一家不与外国资本发生或明或暗的勾结和关系？所以在经济落后国，不独附属于国际帝国主义之下的政府、军阀、官僚能卖国，而附属于国际资本主义之下的工商业资本家更能卖国。近日南通州张氏父子向日本借款的事情，不过为中国私人资本主义附属于国际资本之下的必然现象之一罢了。假使今后私人资本主义

越发达，中国便只有越陷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附属地位中而不能自拔。结果：全国大产业，不久便会尽变成国际资本家的私产；华盛顿会议所规定之工商业上“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以及隐在这种术语背后的“国际共管”，即使国际帝国主义不作显然出面的催促，也会必然实现起来的！

然则怎样解决中国经济问题呢？只有早日将政治问题解决，采用国家社会主义——就是国家资本主义，与俄、德缔结经济同盟：向德国举行机械借款，与壤地相接二万数千里以上的俄罗斯通商，则中国国民经济没有不日就兴盛，政治经济的独立与自由没有不可得到的。

（载《向导》第3期

署名：和森）

中德俄三国联盟与国际 帝国主义及陈炯明之反动

(一九二二年十月四日)

请看

**国际帝国主义何等妒忌中华民族独立
的外交运动 陈炯明业已成为国际帝
国主义的侦探 国人应一致拥护中德
俄联盟政策,脱离英美法日的羁勒**

前本报主张与俄德缔结经济同盟(见本报第一期),希望民
党从新订定外交方针,不数日乃闻陈炯明将孙中山关于联络俄
德之密函付与香港英国帝国主义各机关报发表,因此,北京美、
日、英、法各公使对于新近来华之俄罗斯代表团及民党行动异常
注意侦察,除由领袖葡使捏造越飞私造公债,宣传过激主义,照
会北京政府严厉监视其行动外,并闻以后对于民党将加以比较
十年以来更压抑的政策,使他在政治上难于活动。今把沪上各
报译载香港英报所宣布之函件及议论抄在下面:

孙逸仙博士崇信过激主义,外间早有喧传,但无确实凭
证,今吾人始能将确证发表,证明孙氏曾以过激主义为基
础,筹划中德俄三国联盟。当叶举等在羊城起兵时,孙氏及

其部下被迫离粤，而财政次长廖仲恺，遗下皮夹一只，内有孙氏秘密信函多封，其中三封，与孙氏有关，表明曾磋商中俄德联盟事，兹将各函披露如下：（一）仲恺亚伯两兄同鉴，兹得朱和中来函，所图各事已有头绪，其有需两兄协办者，特将所关之函付来，此函阅后付丙，共阅便知应付矣。一要仲恺兄照所请发给四千二百元，分寄北京柏林，寄柏林者，要买美金或英镑，不可买马克，因恐马克有跌无起，美金英镑则有起无跌故也。并付来支条一纸，交由会计司出账可也。二要亚伯兄在广州等候辛慈到港，则亲往直接带他来大本营，此事要十分秘密，故接此信后，则要着电报处留心欧洲或欧亚沿途各埠所来电报，如有 H 字样来者，即如期往港候船便妥矣。朱和中处于未接他此信以前，已有信着他回国，然无论如何，此三千元当寄去，汇款时可加一函转属他回国之期，由他自定，如尚有重要事件须办者，当可稍留，如无要事，当以早回为佳，最好能与辛慈齐来，则诸事更为融洽也。又亚伯兄在广州等候时，由会计司每月支公费三百圆，到大本营时，则由大本营支，广州可以停止，并付支令一纸，辛慈之事，愈密愈佳，如非万不得已，则政府中人，亦不可使之知也，此致并候大安，孙文，三月八日（此信看完付丙）。（二）又朱和中有在德致孙文函，大总统钧鉴，谨禀者，自十年七月二十六日领得台银六千二百圆，内有半年安家费（即薪金）一千二百圆，当即汇寄京寓，当支船票费千圆，置装费千圆，尚存三千圆，由德华银行汇兑马克十万二千（当时每圆换马克三十四枚）来德，抵德以后，头一月以各处奔走，四出联络，用去一万二千马克，第二月用去七千马克，

第三月极力撙节，用去六千马克，以后不能再省，因德国工人，每月亦需用三千马克，至今尚存七万五千马克，惟自得辛慈之助，进行愈速，范围愈广，若设公事房，则用费将三倍于前，需要所迫，体制所关，除本人饮食日用之需以外，不能苟简，即请自三月一日，八月三十一日，饬拨半年安家费（即薪金）一千二百圆，但饬秘书汇寄北京礼士胡同九十一号朱子英夫人朱陈氏查收，以安家小，饬拨此间用费三千圆，换成美金或英镑，由广州长兴街华德银行代办处汇来，千万饬勿再换成马克，以免亏累，此间用费，若蒙惠拨，即可度支至年底矣，此间诸事，方得门径，进行方殷，半年期满，决不能中止回国，因此请款饬拨，以后即请示知，肃此叩请勋安，朱和中叩十一年一月一日。（三）前驻华德使辛慈，熟悉吾国情形。曾充驻俄陆军特使八年，与俄人感情亦洽，精通英、俄、法语，且思想新颖，手段敏活，其所主张亦合民治潮流，洵德国不可多得之人材，方中未抵柏林以前。辛慈即主张华德俄三国联合，与钧旨暗合，近自与中接洽后，拟不问他政，专办此事，是以决定同组一公事所，以资筹备，现总定两月内筹备完竣，伊即请命于其国务总理来华，中愚见拟以辛为专理员，其他各科选定主理员，余人员材料办法，由主理酌定，总理专备钧座谘询，主理员筹商何项人员先行来华，何项人员陆续前来，何项材料即日需要，何项材料继续运输，何种办法即日拟定，即日实行，何种办法继续拟定，随后推行，均由钧座与总理员核夺，如此则东西声气互通，纲举目张，进行自速，惟辛慈名望颇重，须用假名，虽一般德人亦不可使知，届时当电报船名，即请于抵港时，派轮密迎入幕

为祷，至来华以后，是否受聘，另是一事，兹不遽赘，来电辛以H代，肃请钧裁，中叩东，

人人知道中山先生所持的主义，为他自己所发明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他的民族主义就是要使中华民族解脱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做到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自由。所以在他三民主义的演说中曾经说道：“今天满虏虽被推翻，光复汉业，但是吾民族尚未能自由独立。这个原因，就是本党只做了消极的功夫，没做积极的功夫。自欧战告终，世界局面一变，潮流所趋，都注重到民族自决。我中国尤为世界民族中的最大问题。在东亚的国家严格讲起来，不过一个暹罗，一个日本可称是完全的独立国；中国……幅员虽大，人口虽众，只可称个半独立国罢了”。这一段话，一点也不错的。中国最近八十年来，与其他一切被压迫民族一样，完全陷于帝国主义四面掠夺宰割的重围中，在一九一四年以前，简直找不到别的出路。经过上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的俄罗斯变成为根本取消掠夺制度的工农共和国，帝国主义的德意志变成为协约国的被征服者，至此国际情形才起绝大变化，一切被压迫民族才有超脱帝国主义的圈套，而联合一切反帝国主义的大民族以图独立自决之可能。在这种情形之下，一切被压迫民族便要必然的一致而形成其民族独立的新外交，于是已经显著而成了功的，就有土耳其的基玛尔，正在酝酿而被国际帝国主义的侦探——陈炯明——告发的，便是孙中山。

中山先生联德联俄的计划完全建筑在民族独立的基础上面，这是毫无疑义的。孙中山之为中华民族独立运动的革命家，正如基玛尔之为土耳其民族独立运动的革命家而不为共产主义

或“过激主义”运动的革命家一样。基玛尔的新外交，为使土耳其民族独立的惟一适当政策，孙中山的新外交也是为使中华民族独立的惟一适当政策。以现在国际情形看来，试问：中国匍匐于帝国主义的英、美、法、日之下为能得到平等地位呢，还是与非帝国主义的德、俄联合为能得到平等地位呢？正谋共管中国，监管中国财政，干涉中国内政，破坏中国统一的是谁，而业已取消在华一切特权，无条件退还一切租地与赔款，及废除治外法权的又是谁呢？我们且将今日（九月卅）《大陆报》（美国帝国主义在沪的喉舌）所载孙先生答复香港《电信报》的话（《字林西报》也有同样记载）译两节在下面，更可证明孙先生中德俄三国联盟的计划，完全建筑在民族独立的基础上面了：

对于德国和俄国，孙博士的意见以为：自德国解除武备和俄国取消在华一切特权之后，在中国看来，这两个国家已成为站在“不侵略”地位的国家了。

孙博士且以为：自苏维埃俄罗斯成立之后，过去对于中国政治独立和领土完全最大危险之一，业已消除。在劳农政府继续和忠于他“非帝国主义”的政策时候，俄罗斯并没有可使“一个民主的中国”生畏惧的地方。

孙博士并说这是他熟虑过的意见：在目下中国“近代化”的当中，中国是很需要能对他平等待遇和承认他有完全统治权的强国的帮助。他信：在现下情形和治理的俄、德是能以平等条件待遇中国的。所以，他赞成有一个倾向中、俄、德三国亲密接近的政策。他并不以为这个政策会违反了愿望中国强盛和统一的列强之条约上的利益。无论如何，这个政策是要尽力于一个非帝制且非反动的中国的最好利益。

帝国主义的英、美、法、日，要永远关住中国于他们的隶属圈套以内，所以最忌中国与那业已成为站在不侵略地位的俄、德和能以平等条件待中国的俄、德联合，换过说；就是最忌中华民族脱离他们的羁勒而独立，因而诬中山先生立脚在民族独立上的中、德、俄联盟政策为以“过激主义”为基础。有人以为这种嫌疑，是关于中山平日标榜民生主义惹来的，其实不然：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不过等于各国通行的社会政策和适于工业后进国之经济情形的国家资本主义。现在资本帝国主义的列强，不但适用这种政策以和缓阶级争斗，而且捧戴这种政策的首领于最高统治地位以延长其末运：如米勒兰，白里安之于法；路易乔治，亨登孙之于英；温德凡尔之于比；爱伯尔，夏德迈之于德；以至碧尔绥斯基之于法兰西外藩的波兰，几乎成了一种普遍的现象。所以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在英、法、美、日的资本家帝国主义者看来，不过家常便饭，有甚可畏？他们所畏的只有中国政治上和经济上脱离他们的羁勒而独立。所以对于中山先生德俄联盟计划，就不得不格外怕起来，而诬以“过激主义”为摧抑他的武器了。

中德俄联盟的政策，不是利于一人一党的政策，乃是利于中国全体被压迫民族的政策；中国民族是否永为英、美、法、日帝国主义的奴隶，或摆脱他们的羁勒而独立，全要看这种政策的成功与失败。所以凡属被压迫的中国人民都应起来拥护这种政策，贯彻这种政策。反对这种政策的（不论个人或党系），不是甘心为帝国主义的奴隶，便是甘心为帝国主义的爪牙。所以这次陈炯明对于孙中山的拆台举动，完全证明他是国际帝国主义的侦探。国民党在被压迫的中华民族地位上不独不会因此而受打击，而且反将因此愈益扩大其革命的基础，和群众的势力，因为这就是

表明他已经不徘徊于英、美、法、日帝国主义的歧路了，已经跑上殖民地革命运动的正轨了，已经领导四万万被压迫的民众到独立运动的初步了。孙先生说：“俄罗斯并没有可使一个民主的中国生畏惧的地方”，我们更可进一步告诉被英、美、法、日帝国主义压迫无已时的国人：苏维埃俄罗斯更没有可使一个半殖民地的中国生畏惧的地方呵！中国独立与平等的国际地位，是要首先联合他才能做到呀！

（载《向导》第4期

署名：和森）

孙吴可在一种 什么基础上联合呢？

（一九二二年十月四日）

孙吴携手的消息，已经沉寂许久了，近旬各报且载曹吴因孙中山中德俄联盟政策暴露惹起外交团注意，因而申明他们上次给孙中山的电报是他人捏造的！但九月二十八日《申报》北京通信又载有孙丹林口中的孙吴联合论，这篇谈话是很重要的，今把他抄在下面，然后发表我们的意见：

此次王内阁之旧店重张，何以必拉一徐谦入阁，吾人即于此点可以窥见洛吴左右之空气，联孙论盖犹盛也。记者昨晤联孙派议员邓天乙氏，彼日前曾访问孙丹林一次（孙丹林旧为同盟会党人，辛亥年孙与邓同在青岛某校运动革命），孙氏以邓为大孙派党徒，遂对邓大唱孙吴携手之论。邓君为记者述孙氏当时之谈话情形云：近来时局纠纷益甚，统一已万不可缓，子玉方面之事予（孙丹林自谓）可以负完全责任，所可虑者，中山先生之态度耳。中山先生为吾党（孙氏自命为老民党，故口吻如此，）前辈，其十年来之政治生涯，虽屡起屡仆，而其精神唯一之表现，则在其拥护主义，坚持不屈，百折而益励，此吾人所共见，不胜钦服者也。若夫北方吴子玉氏，亦能为国而不为私，重实行不重理论。自己

之主张既经决定，则生死以之，必期贯彻而后已，此种精神实有与中山先生相似之处。中山为国民党之领袖，子玉为国家之干城，二人精神上之特征，又相同若此，则吾人欲图孙吴之联合，岂非势顺之事。然事实上却不无难点，盖中山向来不肯舍己以从人；子玉作事，亦把成败利钝关头，看得很清，认得很真，彼虽甚崇拜中山先生之为人，且赞同其主张的（如中山之兵工政策，与反对割据式的联省），然若使彼轻易服从一种之理想，而抛却一己之实力，一旦有事即束手受缚，则彼目前又有万难照办者。以予所见，中山既不得志于南，当然发展于北。时局当前一大问题，在乎全国之统一，苟不能使南北归于一，中山先生之一切理想，将终为理想，无复见诸实施之可能。统一既属目前一大问题，其程序又须列诸凡百问题之先而亟待解决，则中山先生向北发展之途术可以知所本矣。现在北方及长江流域省份，时有段派奉派阴谋之发见；在北京政局上活动者，则不外益友与政学两派。中山果欲为国家谋统一；则对于以上四方面应有彻底之观察。质言之，中山先生如以为当今之中国，非段派不足以谋统一，则应当光明磊落的与段派联合；如以为非奉派不足以统一中国，则亦应当光明磊落的与奉派联合；推而至于益友社、政学会，均宜以明了之考量，决定态度而继之以公开之结合。如中山以为上述之四方面，均为有害国家之政团，不足与言统一大计，则以主张之正当论，态度之光明论，力量之充实论，中山对于“直系中之吴子玉”，允有一致提携协定国是之必要矣。君回上海之后，可将此意径达中山先生。总之，予甚希望中山先生对于“欲谋真正之统

一，应与益友社、政学会、段派、奉派结合乎，抑应与直系中之吴子玉携手乎”一个疑问，加以公正之考量与解决也云云。邓君述孙丹林谈话至此，续告记者，彼（指邓君言）当时曾答复孙氏，谓中山先生之与任何方面联合，向不管人的问题，而纯粹以主义或政治主张为互相提携之标准，如北方传说之所谓孙段联合、孙张联合者，其真相并不如北方报纸记载之诡秘，盖段派或奉张方面，必先有人向中山表示，愿绝对服从其政策，然后始有妥协之商榷，中山又尝对其左右之好谈“利用”者，加以严重之训诫云，吾党无论与何方结合，当先问主义之同否，主义同，即当以诚意相提携，北负救国之责任，若夫利用的阴谋，则万不可尝试以自失信守云云。子玉方面既有阁下（指孙丹林言）负责，则于中山之“以主义相结合”一点，不可不加以注意。邓言未竟，孙丹林以手作式，极言子玉之事，彼可以负完全责任，至于中山之纯重主义，子玉久已了解，而对于兵工政策，尤深表同情，子玉曾谓，将来兵工政策实行著手之时，当以兵工委员会会长一席待中山，而自居于副座云云。

关于孙吴联合的事，在本报第一期（参看《统一、借债与国民党》）业已约略发表过我们的意见了。我们认国民党与军阀，截然为两个新旧不同的阶级。这两个阶级的争斗现在虽还未决定到你死我活，但民主革命的潮流总是一天高一天，军阀的命运总是一天促一天，除了时间问题、新兴的革命阶级总会要战胜封建的军阀的。所以我们根本上主张国民党应极力与民众势力联合以贯彻民主革命，除有意义之单方面的联合外，我们反对混合或调和各大军阀的势力，去谋那不可能的统一。

以现在情形看来，吴佩孚业已轮到北洋军阀之最后领袖的地位了。就他的阶级地位与利害关系而说，他有与民党联合之可能吗？看孙丹林：“子玉作事，亦把成败利钝关头，看得很清……若使彼轻易服从一种之理想，而抛却一己之实力，一旦有事即束手受缚，则彼目前又有万难照办者”一段话，就知道是不可能的了。然则孙吴可在一种什么基础上联合呢？依我们看来，反对联省自治的同点上面建筑他们的联合不住的，“领袖”与“干城”之精神的同点上面更是建筑他们的联合不住的，惟有在反抗国际帝国主义为中华民族之独立而奋斗的基础上面，可以建立他们的联合。

但是吴佩孚够得上说这个吗？就他的过去看来，如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攻击安福系新旧交通系的卖国，无论其动机怎样，这些行为总象是一个未为国际帝国主义所收买的军阀了。但是现在呢，他乃大大引用继新旧交通系而起的新卖国党——外交系，连续组织亲附英、美帝国主义的北京政府，不但任他们引导美国帝国主义的支配势力侵入中国政治经济的骨髓，并且任他们极力排斥中国人民应与急切联合以图增进国际地位的苏维埃俄罗斯，而使中国愈益陷于国际帝国主义的奴隶地位。这种局面若是长久下去，吴佩孚不会成为卖国贼领袖段祺瑞第二吗？所以现在不独孙中山应于皖、奉政益与“直系中之吴子玉”间有所决择；而吴佩孚尤应显然表示外交态度，斥退新卖国党外交系，才配讲到与孙先生联合。因为国民党是运动中华民族独立的革命党，孙先生近日更公然发表其应结合俄、德的政见，吴佩孚对于这个政见赞成呢，反对呢？还是跟着曹锟打那奴隶心肠的否认电报，以避国际帝国主义的嫌疑呢？

孙丹林这篇谈话，算是很胆大的，他胆大的地方就是再三申言“直系中之吴子玉”，我们当然认他的话是足以代表吴子玉，认他对于孙吴联合的热度是很高的；但孙丹林须知道：除了为中华民族脱离国际帝国主义的羁勒而独立之外，实实寻不到孙吴联合之正当的基础，纵然勉强成立了，也是没有好结果而为民众所不愿意有的，因为不过徒看见一个具有光荣历史的革命党，离开群众而与一个纵横捭阖的军阀联合罢了！

（载《向导》第4期

署名：和森）

日本帝国主义与张作霖

(一九二二年十月四日)

本月二十日，《申报》和《时事新报》载日本对俄外交决保海参威政府存在及东三省独立自主，俾远东多设缓冲小国，使“红色主义”不入黄海。又载张作霖于本月初派张宗昌赴威，与威政府为军事上之接洽，其大要为：(一)奉天亟需之各种军用品，望威政府尽量供给；(二)此后奉天与海参威实行互助，如有军事上之需要，应互相援助，并可议订协定。二十五日上海各报更载东京来电道：《国民新闻》载称，海参威狄特里志斯政府与张作霖订成密约，海参威所存大批军火已照约运往奉天。东京陆军当道称日兵退出海参威后，存于该埠之军火不得不入于狄特里志斯将军之手，狄氏大约将与张作霖结合抗拒莫斯科与赤塔政府，陆军当道又谓兹闻狄、张已开谈判云。据二十八日上海各报，则海埠大批军火之运抵奉天者，已经共有二十二列车了，惟最后数车被海关扣留。又《时事新报》载二十九日东京来电道：《国民新闻》复载海参威军火事，谓日本军阀已与张作霖及狄特里志斯商定设缓冲国并组织财政团资助张、狄之计划，参谋部近加派陆军随员八人至关东，名赴关东，实往助张作霖耳。《国民新闻》所引之陆军省人员否认设立缓冲国之计划，惟承认没收之军火一部分不知去向，谓现正由外交部省派员调查运往何处。

由以上的消息，我们可看出下列几点：（一）日本帝国主义这种对俄政策，完全是模仿法兰西扶植波兰与罗马尼亚以反抗苏维埃俄罗斯的古智；（二）今后国际帝国主义者都将借“防遏过激主义”为口实，把中国分裂为各自的殖民地和“缓冲小国”，日本对东三省的计划成功了，英国对于西藏，法国对于云贵……便将取同一步骤；（三）中国封建割据的局势，将因国际帝国主义者这种可怕的政策而愈益严重；（四）张作霖这个红胡子不仅为中国和平独立统一的魔鬼，而且成为国际帝国主义和反革命的凶恶机械。

被两重压迫的中国同胞们，你们看呵：日本帝国主义这种对俄政策的背面，还埋着英、法、美帝国主义的伏兵呀！日本不过是尽先向东三省下手呀！从此东三省割据的形势，将因日本和英、法、美帝国主义者的合作愈益巩固，而那二十二列车的军火，不久又将瞄准中国人开呀！

（载《向导》第4期

署名：振宇）

外交团劝告裁兵

(一九二二年十月四日)

二十八日，上海各报载称日人方面传出消息，外交团决议，由领袖葡萄牙公使提出两项劝告，昨已递到外部，其要旨如下：(一)希望中国即速实行华府决议案，即行裁兵；(二)如中国再不实行裁兵，将来发生兵变各事，列国损失须由中国担负完全责任；(三)中国之财政亟宜整理，而到期之外债尤宜清偿，以重信义。

这个新闻在久处军阀压迫之下，仿佛本身无法解决的中国人看来，一定以为是个可喜的好消息，一定以为军阀非有外力压迫则不会裁兵，而今外交团的警告来了，裁兵一定有几分希望了。

可怜的同胞们！假使你们这样设想，我要老实告诉你们是想错了！外力除了压迫中国人民和贫苦群众外，决不会压迫军阀的。因为军阀大都是他们的驻华武官，是他们十年以来栽培维持出来的产物；中国的内乱与割据，正是他们永远所需要的掠夺时机与情形。他们只有增加并延长这种时机与情形，决不会使之缩减或停止，而任中国得跑向不利于他们掠夺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方面走。倘若这样，中国就不会是他们的殖民地或准殖民地了。试问现在决定维持东三省独立，资助张作霖二

十二车军火的日本，不也是外交团的一员吗？然则外交团何故劝告裁兵呢？第一，就是所谓“实行华府决议”正式的来干涉中国内政。第二，就是伏此一笔，等到“将来发生兵变各事”，如此这般，以达到国际共管。近几月国际共管和干涉中国内政的论调，不独青木诸人倡之；京津《泰晤士报》（英国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机关报）和《顺天时报》（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机关报）等，尤常常制造这种空气来尝试，他们不是旁敲侧击鼓吹请一位外国政治家来统治中国，便再三抬高他们“华府”的无形权威，主张实行干涉中国内政，一步一步来探试无常识而易于欺骗的中国人！

可怜的同胞们！我们真要废督裁兵吗？只有自己起来推翻军阀呵！

（载《向导》第4期

署名：振宇）

请看英美帝国主义 怎样在北京巩固他们 雇用的外交系政府

(一九二二年十月十一日)

画诺短期公债

鼓吹宪期借款

奉直战后，英美帝国主义的势力长足插入北京政府之中，于是他们雇用的外交系遂登台献技。

外交系的拿手戏，人人知道是：运动借款，实现新银行团的垄断计划，巩固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权。为得这个，所以维持外交系政府，巩固外交系政府，乃为英美帝国主义必要的工作。这种工作已经实现的是安格联画诺了一千万短期公债并极力为此项公债票吹嘘；方在探试中的就是芮恩施的鼓吹宪期借款，要使外交系政府“能依此维持八九月”而使“其信用日增”，然后使他与“银行团代表通力合作”以“整理”中国财政。

美国帝国主义者芮恩施在中国的宣传方法是很高妙的，他这宪期借款的主张尤其想得周到，他说：“欲使制宪之事善始善终，则宪期借款必不可缺，此种借款仅乃用为文治之费，如国会及外国债息是也，约而计之，每月四百万足矣”。其实我们可以完

全看出：他不过是要外交系政府向新银行团每月借四百万收买议员先生们，使他们八九月之后不反对大借款罢了！

（载《向导》第5期

署名：和森）

目下时局与国际帝国主义

(一九二二年十月十八日)

**日本帝国主义助安福系在延平发难
英国帝国主义助陈炯明压灭国民党在
闽发展的新形势**

直皖之战，亲日派安福系虽倒，但日本帝国主义在北京政府中的势力迄未动摇；奉直战争的结果则不然，张作霖的势力既被逐出于山海关以外，日本帝国主义在北京政府中的优势也就同时为英美帝国主义所篡夺，北京政府遂完全成为英美帝国主义的傀儡和机械。英美帝国主义趁着这个千载一时的机会，开首本想助吴佩孚一举统一中国（吴佩孚胜奉之翌日，外交团即集议借款助他统一中国），后因日本政府不赞成，且对于吴佩孚还有疑惧之点（因吴素挂爱国招牌且否认借外债），英美帝国主义者自知这样太卤莽了，乃一意以援助外交系登台为方针。由这样的方针做到现在：新银行团的龙门阵渐渐成功，吴佩孚武力统一的好梦渐渐接近；于是生存上受胁迫的日本帝国主义就不得不骇汗失措，急图对付了。他对付的第一手是援助东三省独立；第二手就是遣发徐树铮赴延平发难（安福祸首之逃出日营，当然是连带的现象）。

这样一来，于英美帝国主义好梦将成之时当然给一重大打

击。他一方面，福建目下发展的新形势兼为国民党势力所构成，这种势力之发展乃为国际帝国主义——尤其是英国帝国主义所切忌，英国帝国主义要出一臂大力以对付福建问题，乃是毫无疑问的。所以英国帝国主义者便决定借二百万镑至七百五十万镑的大款于陈炯明，使陈炯明去压灭国民党在闽发展的新形势。至于他对于福建问题惊惶恐怖厌恶的态度，我们一看英国帝国主义所有在华的机关报如《字林西报》等，就完全明白了。

人人知道英国帝国主义是素来反对孙中山的，孙中山的举动无论大细，英国帝国主义都要与他为难，使他不会成就。英国帝国主义何以这样反对孙中山呢？就是因为孙中山是中华民族独立运动的领袖，孙中山势力所及的地方——如广东及长江流域，就是英国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圈，侵略的势力与民族独立的势力不能兼容，所以英国帝国主义便老实不客气的与孙中山作对头。新近孙中山在广东的势力被英国帝国主义与陈炯明通力合作打得烟销云散，广东势已成为香港政府驯顺易御的外藩，加以北京政府的缙勒为英美两国并驾齐驱的执着，所以英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遂将伸张到极度。假使福建完全落于许军之手，孙中山的旗鼓又可在长江流域重整起来；英国帝国主义便要受很不顺利的影响；而南粤王陈炯明也有迅速被推翻的危险。所以现今的形势把陈炯明和英国帝国主义排在利害更加相同的交点上，故英国帝国主义便以这宗大款来资助陈炯明，陈炯明也不惜允许英国资本家将广九铁路延长与粤汉路相衔接（借款条件之一，见近日各报），使将来广州经济上的重要地位让于九龙，俾英国资本家得在九龙控制中国南部数省的经济生命。

现下的局势既把英美帝国主义和陈（炯明）吴（佩孚）排列在

一方；同时又把民党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雇用人安福系奉天系排列在一方。这就是一面显明中国军阀和内乱与国际帝国主义的关系；一面显明民主革命和民族独立运动还在崎岖鸟道的过程之中，一时不得不与利害偶然相同之匪类为缘以抵抗其更迫切的敌人。这种势力交衡的事实虽为还未强壮的革命运动所不能免，但同时国民党须知道一切外国帝国主义和封建的旧势力，都是同样不可恃以为援的，都是没有共同基础可以建筑联立战线的：比如以后段祺瑞再来当道，他压迫民党的恶辣手段会减于民国五六年吗？张作霖与国民党当了头，他与民党的冲突会减于吴佩孚吗？民党的势力若是发展到了北方，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他的压迫会减于英国帝国主义吗？所以无论任何外国帝国主义和封建的军阀都是国民党之敌，都是不可以结合的。国民党真要达到民主革命和民族独立的目的，非急谋强壮运动本身的势力不可，非急谋与反帝国主义的俄罗斯和丧失侵略能力的德意志联合不可。

（载《向导》第6期

署名：和森）

批评汪精卫君 赴奉返沪后之谈话

(一九二二年十月十八日)

本月十四日《民国日报》载汪精卫君赴奉返沪后之谈话云：因孙总统以民治倡于中国，全国民意翕然从同，惟民意虽一致渴望民治，在今日暴力充斥时代，苟无有力之后援终难成功，孙总统此次令余赴奉，实抱一为民意求援之目的，以探问张雨亭意旨者。这段谈话，我们要指出两点重大的错误：

第一在学理上，“以暴力推翻暴力”本是革命的原则，但乃系集中革命阶级的暴力来推翻旧支配阶级的暴力，决不是仰着旧势力去推翻旧支配阶级，因为这乃是不可能的。

第二在事实上，张作霖这个野蛮反动的封建余孽，谁不知道是民治的大障碍物，而可“为民意求援”于他吗？可望他为民治“有力之后援”吗？

我们固然知道现在民主革命本身的势力现还单弱，革命战略中的实际政策不得不有多少伸缩；但我们更应知道还未强壮的革命党只知一味去“求援”于旧势力，便只有使革命的精神日形缩减，革命的地位日形动摇，不但不能使民治成功，而且要使民主革命运动的本身受严重的影响。

主义与政策本来有硬性软性之别，但要政策不影响于主义，

必先图本身势力之强固。我们退一步假设联合一派军阀之政策为可用，但至少也应同时在民众中扩张并巩固其势力（最重要的方法在标明怎样为群众利益而革命及怎样达到民族独立的具体政纲，努力向民众宣传），然后才能免除此项政策之可能的危险而收其利。今民党不然，只知四面“报聘”，“为民意求援”于军阀而不“为民意求援”于民众，误信与红胡子可以“长时合作”，“永久互助”，我们实为民党前途危呵！

（载《向导》第6期

署名：和森）

吴佩孚真会拣择便宜货

(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据《申报》十九日北京通信：吴佩孚对张溥泉君自命为中山先生志同道合之知己，愿中山先生弃却胡匪卖国贼，与他“同立百年之业”。他说：“孙先生之主义我已夙闻之：主张统一，振兴实业，办理兵工。一二两项，我之赞同自不待言，至兵工主义……我既有兵，且已着手实行，我之第三师即可作孙先生主义之试验品也”。

吴大军阀，你的眼色真不错：“统一”，“实业”，“兵工”这三件便宜的假面具，你都挑选着了，真不愧为“识时务”的秀才！但我们要明白告诉你：孙先生的主义是整个的三民主义，你不好只挑选几样便宜货；而且他是要以革命的手段来达到统一的，“实业”、“兵工”乃是由革命胜利而达到统一以后的事业，现在那谈得到呢？你真个要与他“同立百年之业”吗？第一须依照他的民族主义，做点有利于中华民族独立的外交表示，赞同他的中德俄联盟政策；第二须依照他的民权主义，至少撤废治安警察条例，使人民得到各种自由权利；第三须依照他的民生主义，至少现在不要派兵弹压唐山罢工的工人，不要请美国帝国主义的驻兵去压迫中国劳苦群众。这三桩至低限度的事情你还办不到呢，你自己去照照镜子：你好过胡匪卖国贼的地方在那里？已成日本

帝国主义爪牙的“胡匪卖国贼”固然人不屑道；而将成英美帝国主义爪牙的“秀才爱国家”，身分就高得多吗？

（载《向导》第7期

署名：和森）

中山先生的兵工政策 是为军阀说法的吗？

（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现在“兵工政策”，居然成为军阀口中的时髦调子了：无论直系军阀奉系军阀或赵恒惕陈炯明派的军阀，莫不满口兵工政策，一面用为欺饰人民转移人民对于他们厌恶痛恨的策术，一面用为巩固他们武力基础的新式方法（参看本报第一期《统一、借债与国民党》）。

民党要人徐谦牧师，北上“布道”，游说吴佩孚实行“兵工主义”，他说：“中山但为倡议者，实行仍在握有兵权者，甚望提倡，即此是救国”（十九日《申报》北京通信）。吴佩孚亦大言炎炎的说道：“兵工主义，孙先生无兵，不妨纸上谈之，然我有兵，且已着手实行，我之第三师即可作孙先生主义之试验品也”（见同日《申报》）。谁知孙先生原来的三民主义背时之日（张溥泉先生说“遍中国无人服从先生主义者，独胡匪与卖国贼信之”！见同日《申报》），正是他新倡的兵工主义行时之时；我们革命群众倒恐怕孙先生这种新主义在军阀中太行时了，而北上布道的徐牧师反“甚望”军阀去“提倡”呢！我们眼见张作霖提倡于关外，曹、吴提倡于关内，陈（炯明）、赵（恒惕）、唐（继尧）、刘（成勋）提倡于西南，中国马上会太平，国民党的革命救国用不着了，全国军阀便

都是些“救国”者了！难怪汪精卫君在大连青年会说：“我们现在要来改变宗旨”，不做那与军阀战争的事了（见十九日《民国日报》）。

在我们看来，孙先生兵工政策原来的用意，不过是想用这种方法来“铲除多年祸根之军阀势力”，使“全国军队同时以此改编”（见孙先生六月六日的宣言及对外宣言）。根本上改编或解除封建阶级的武装，这乃是革命胜利后最重要的工作；但决不是北伐失败后的现下形势可以做到。在现状下来谈兵工政策，于革命党本身为政策破产，而他方面便无异是代替军阀说法。我们真要以兵工政策来改编全国军阀的军队，第一步还是要先做到革命的胜利。故我们可以断定兵工政策惟有胜利的革命党才能实行，望“握有兵权者”去实行，不但是与虎谋皮，而且是助虎作伥。革命党的朋友们，还是要多做些革命的工作呵！至于改良军阀的军队、巩固封建势力的基础，这种工作，你们不应去参与，尤其不应指教他们怎样做罢！

（载《向导》第7期

署名：和森）

迎合英美意旨的就不要 注意其行动吗？

(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十九日《商报》载北京电说：“吴佩孚电诋王正廷迎合日意，接收鲁案延期，请注意其行动”。这固然说得不错，又可点缀“爱国”门面而获得国人一点同情。但我们要问：迎合英美意旨的顾维钧，天天向新银行团进行几万万的卖国大借款，而且对于有关中华民族独立、平等、前途的中俄会议毫无诚意进行，你吴佩孚何以反那样拚命的维护呢？可见你吴佩孚也只是要利用一派卖国贼为你借款练兵（这就是孙丹林所谓“为国而不为私”！）呵，你的“爱国”门面之内，还充满着更可怕的卖国引线呵！

国人们，吴大军阀一手援引的新卖国贼，只有我们自己起来注意其行动咧！

(载《向导》第7期)

署名：振宇)

国际帝国主义 老实不客气了

(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本月二十二日《申报》载北京专电说：

予闻某公使云……欧战后之中国，为世界最有希望之市场。中国人固不甚爱惜，终日扰攘；但列强不能放任，当策中外互利方法，以免暴殄天物。

表示的好响亮呵！这个“世界最有希望之市场”多承你们的“爱惜”，你们现在是要老实不客气的来动手呵：“终日扰攘”，“暴殄天物”是你们动手的口实；“列强不能放任”是你们动手的决心，“中外互利”是你们动手的假面具。从华盛顿会议之后，我们就看出你们这种“不能放任”的贪欲，是要加劲援助张作霖、段祺瑞、吴佩孚、陈炯明来造成那“终日扰攘”，“暴殄天物”的局面呵；现在这种局面快象样了，你们应得老实不客气了。

(载《向导》第7期)

署名：振宇)

福建人民当助革命军 复建革命政府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日)

自广东革命政府被陈炯明推翻，北京政府卖国借债的勾当和英美帝国主义侵略的阴谋，一天一天的逼紧，一天一天的可怕。新近的历史业已教训我们：中国非如土耳其一样另建革命政府，北京卖国政府是不会消灭，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与和平愈不可期待。从前广东政府的地位正与安戈拉政府相等，假使他能继续存在，中德俄联盟政策是要实现的；为收回主权和为自由与独立而战的将来也未尝不能赶上安戈拉政府最近之胜利的；并且由这样对外的胜利而打消北京卖国政府——如君士坦丁政府在基玛尔胜利之后的凋谢一样——完成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与统一，也是“事有必至”的。不幸这种形势被蠢贼陈炯明破坏了；所以现今力图复建革命政府乃为全中国被国际帝国主义与军阀两重压迫的人民个个应负的责任。现在这种责任尤其到了福建人民的身上了，因为革命军——许崇智、黄大伟、李福林率领的——业已在福建赶走李厚基，挽回陈炯明所破坏的革命形势于万一了。

福建人民应认得清楚：日本帝国主义的爪牙徐树铮、王永泉以及曹、吴派遣来闽的虎狼都是福建人民之敌，福建人民应拚命

的反抗；惟有担任中国民族独立、自由、和平之前途责任的革命军应完全得到福建人民的帮助。福建人民站在革命势力与军阀势力抗争的形势中，决不应取中立态度而以“闽人治闽”为回避参加民主革命责任的幌子；并且要认清这样幌子在现状下为不可能，邻近的广东就是明证。试问“粤人治粤”的幌子内所演之陈炯明“联治”的把戏，广东人民现今能得到和平、安宁、自由，与减轻负担而免除痛苦吗？

不堪外力与军阀压迫的福建人民呵，你们要认清民主革命是解除这把连锁（国际帝国主义与军阀）的惟一方法；民主革命是你们自己的革命，你们应自己来参加；国民党的革命军就是你们自己的军队，你们应参加进去，普遍的武装起来，把革命势力尽可能的扩张。你们切不要把国民党的武力与军阀的武力视同一律；你们若是怕革命军中继续产生陈炯明辈的新军阀，你们可要求国民党把军制改变，仿照苏俄红军，把军队的最高权集中于革命党员与工兵群众组成的监督委员会之手，使司令将官成为纯粹受命作战的机械，那就永不会有这种危险了。

福建人民呵，你们勇猛起来参加革命复建有关中华民族前途的革命政府罢！

（载《向导》第8期

署名：和森）

国人应当共弃的陈炯明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日)

民国二年二次独立失败后，黄克强一时气馁，曾主张任袁世凯专政十年，因而与孙中山立刻继续革命的主张相齟齬。

自从陈炯明反对孙中山北伐计划之初，我们就断定他不是一个人进取的革命党。彼时人多以陈比黄，说他不失为“稳健的革命家”，要把广东打好基础才再进取；我们以为这完全是外行话，革命的战略只有以攻为守，自己不进攻，敌人自要进攻的，所谓“打好基础”不是托词掩饰便是革命思想破产，并且这个时候的形势与二次独立失败后的形势全然两样。

一到今年六月，陈炯明不但不是进取的革命党而且成为民主革命最可怕最反动的叛徒，完全暴露他个人割据自私的野心，不惜将广东革命政府推翻，将民主革命最好的形势扑灭，将孙中山置之于死地。只要他的广东王做得成：谋杀党魁，推翻革命，消灭中华民族一切独立、平等、自由的根本运动，联结强援，私通英国帝国主义而为其爪牙，都是他所做得出的；并且更进而把孙中山联德联俄计划卖给香港政府，借以促成卖省借款。他既然把广东人民向英国人卖了二百万镑的代价，一面便大编其边防军，并且准备自己出兵打许崇智，揭破“内抚百粤与民休息”的假面具。此外枪杀劳工，解散国民大会，压抑民权运动，禁止反对

卖省借款，摧残报馆，骚扰市民，造成广东之恐怖时代，种种罪恶不胜枚举。这样背叛民主革命和全中华民族利益的叛徒，这样割据自私的险恶军阀，这样无所顾忌的英国帝国主义的爪牙，除了“人人得而诛之”之外，没有一人可与他联络，合作的。民国九年陈炯明在漳州的时候，曾在精神和实际上赞助社会主义运动，并为民主革命努力，彼时社会主义者与之发生关系，是极应当的并且是光明磊落的行为。故陈炯明和民主革命势力回到广东以后，社会主义者陈独秀曾到广州去办教育，这也是极应当的，也是极光明磊落的行为。可是现在不但一切社会主义者不应与他合作，就是一切民主主义者和全国人民再没有一人可与他联络合作的。

不意广州有几个所谓社会主义者新近出一种珠江评论，其中署名沉机与G二君的议论，简直荒谬得很：他们教陈炯明“应当落落老不客气实行割据”，不要“割而不据”使“军阀主义自行崩坏”；他们“不敢武断陈氏必想借联省自治以自私”，承认联省自治“未尝不可以整理各省目前内部的纷乱”；他们教陈炯明怎样制造舆论势力，保持在广东的地位，并望陈炯明政府与人民通力合作。这些议论简直不是社会主义者所说的话，简直离开了革命的立场现出严重的反动色彩，而且是侮辱社会主义的卑污行为。我们社会主义者固应极力反对奴隶全国的军阀武力统一，同时也应极力反对奴隶各省人民的联督自治；若是承认这两种封建的主张之一，便是离开了革命立场，附和封建的现状了。况这个罪不容赦的陈炯明，社会主义者除了与国民党共同引导广东人民，并力反抗之外，决不应该发出这样荒谬的议论。广州青年素富革命精神，现在临头的工作应是激烈的反对借款，不但

运动市民一切不与国人共弃的陈炯明合作，还要积极的以革命手段把他推翻才是呵！

（载《向导》第8期

署名：和森）

北京政府也向德国索赔款吗？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日)

战败的德意志，纵然资本主义掠夺制度依然存在，但他从前那身可怕的帝国主义鳞甲完全被解除了，并且自己也沦于被协约国帝国主义压迫的地位了；故中国人民及其他一切被压迫的民族对于德国应相当的改变从前的观念，首先与最可信的劳农俄国（因为他建立在社会主义之上，消灭了掠夺制度一切可能的危险）同盟，再与德国携手来反抗英、法、美、日帝国主义对于弱小民族的侵略与压迫。假使中国有独立而不受国际帝国主义支配的政府或革命政府，一定要采取这样外交方针的；反之，凡不采取这样外交方针的便是卖国政府，便是英、美、法、日帝国主义的机械。现在北京外交系政府就完全处于这种地位，所以近日外交部竟向德国索战事赔偿二万万！一面对德意志民族落井下石，讨好东交民巷的太上政府，一面便是敲诈这笔巨款帮曹锟忙总统，帮吴佩孚忙武力统一。

国人们，我们为中华民族在国际上的独立平等之提携计，应当极力反对这种惹起德意志民族恶感的“洋奴”外交呵！

（载《向导》第8期）

署名：振宇

评《商报》与《时事新报》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日)

近日上海《商报》和《时事新报》对于俄蒙问题颇多捕风捉影之谈，他们的论点大约不外两端：第一以为苏俄国内的经济政策变了，所以对于中国的外交政策也变了；第二便是认俄蒙经济同盟，为苏俄侵略蒙古。

关于第一点，我们要说两报的记者未免太外行了。苏俄新经济政策不过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苏维埃政权之必要手段，换过说就是完成社会主义国家之政策，绝不是甚么“回辕反辙”的“俄国式幻术”。他的外交政策虽然要随着新经济政策变更，但他要做到世界革命与解放被压迫民族的宗旨是更要顺利的进行的。他在柔鲁会议中“颠倒飞箱之外交手段”及对于近东问题的抗议，就是他革命的势力渐渐胜过国际帝国主义势力之表征。即使他对于为英、美、日、法帝国主义傀儡的北京政府“无诚意”，也许是外交上以诈对诈应有的能事罢！

关于第二点，我们要说两报的记者未免太笑话了。如中国这样比较蒙古进步的经济落后国，将来还要望俄、德实力的帮助呢，现在俄蒙缔结经济同盟，就是苏俄“舍己芸人”以助弱小民族提高经济地位的明证。苏俄无“经济侵略”与“向外雄飞”之事实，正如《商报》十月二十三日评论所举之例证即足以反证：（一）

俄若有经济侵掠的余力，何至将乌拉尔阿尔泰四千方里地租于拉卡尔脱；（二）俄如欲求得天然资力为利用资本之地，西比利亚平原所待开发者何限。然则可见他现在“疲精耗力”于蒙古是怎样援助弱小民族的解放之忠诚了。所以论者若有诚心为中华民族前途计，当自明上列错误之论点为中了“怀疑而思中伤者”的暗笑，仍当“准备”与苏俄携手，不应“摇首失望”罢。

末了，我们还要请教《时事新报》的记者：英、美、日本三个帝国主义的国家譬之三个刚柔不同的强盗，先生主张专御一个（日本）而不防备其他两个（英、美），甚至主张与英、美联合，英、美帝国主义者不要高叫“谢谢你的宣传”吗？

（载《向导》第8期

署名：振宇）

法西斯蒂与 意大利资产阶级专政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八日)

最近意大利法西斯蒂(Fascists)的政变,在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状况中,现出一种特别凶恶的变形。这样的变形,乃是由于意大利混乱无力的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之特别情形造出来的。

法西斯蒂运动是随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战产生的。当时意大利农人阶级反对加入战争,资产阶级直接为经济的发展间接为握得全国政权计,主张加入战争,因此农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便发生剧烈的冲突。加以法兰西资产阶级拚命的运动,于是墨索里尼(Mussolini)这个强盗就开始他的参战运动,农人的志愿便为资产阶级屈伏了。

战前意大利资本主义虽然成了一种确定的势力,但他的势力还不足攫住全国政权。由大战的破坏,意大利资本主义和他的国家机关愈益紊乱无力,而工人阶级便成为形势的主人。资产阶级处在这样危殆情形之下,就把法西斯蒂变成为破坏工人运动的流血招惹队伍。他的口号是:“以任何代价恢复国家的威权”。

现在一切政权都归法西斯蒂了,意大利资产阶级专政的目

的达到了，全世界资产阶级的报纸都忻悦的登载一些意大利工人阶级屈伏，共产党社会党退出国会的消息。但法西斯蒂这次的成功，并不是完全由于自身的力量，只是由于工人阶级不一致。所以我们根据事实来推测，这次政变的结果，反会促成意大利工人阶级间的联合战线，意大利的社会革命，快要到催生的时候了。

（载《向导》第9期

署名：和森）

土耳其与国际帝国主义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八日)

(一)英国帝国主义维持君士坦丁政府的理由 君士坦丁政府是土耳其封建阶级遗传的老巢穴，是毫无能力抵抗外国侵略而且成为国际帝国主义御用的机械，这是人人知道的。新近安戈拉政府对外胜利的结果，君士坦丁政府遂完全处于被废除的地位。但这是英国帝国主义最受打击的一桩事，所以他便老实不客气的出来反对。据路透社——国际帝国主义传播消息的主要机关之一——本月五日电说：“前政府虽无权力，然为协约国赖以施行其管辖权之机关，今以轻躁国民党人代之，殊不利于协约国方面之行事”（见本月七日上海各报）。这就是英国帝国主义维持君士坦丁政府的理由，也就是协约国维持其他被压迫民族的卖国政府之口供！

路透社六日的电报又说：“英国高等委员因土皇之请，今日入宫相见，英兵自昨日起，助守皇宫。”这真是英国帝国主义图穷匕见，丑态毕露的时候呀！

(二)美国帝国主义还要以门户开放政策加于土耳其 美国帝国主义从前因为他是“大器晚成”，让世界到处变成为英、法、日的殖民地；现在呢，为资本主义发展上的需要所迫，便只有用国际共管（这是威尔逊发起国际联盟的动机）和门户开放的政策

为均沾利益的方法。这种方法由华盛顿会议的结果，在中国已是成了功；至于在近东呢，因凡尔赛会议鲁易乔治太尖刻了，仅仅让他去代管没大出息的亚尔梅尼，所以他便赌气不加入国际联盟，因而对于近东一无所得，只是暗中帮助法国的近东政策，与英国帝国主义捣乱子。

现在洛桑会议要开会了，美政府决议派观察员赴会。报载美大使答复邀美参与会议之请求并述美国之意见为：（一）保护慈善宗教教育机关，（二）商业完全自由，（三）保护少数民族，（四）制定海峡自由，（五）确认门户开放政策。这就是美国帝国主义对于方在复苏的土耳其民族的善意！

（三）英法对土政策之谅解 强盗们在未完全决裂之前，他们相互间必有无数次妥协谅解的勾当，这是毫不足怪的。这次英国保守党领袖波拉劳蹶起，把鲁易乔治推翻，就是反对鲁易乔治的近东政策而求与法一致来宰制土耳其的。这样的一致，乃是全英帝国主义的机关报，在安戈拉政府所提出的“骇人”要求中，发生乐观的惟一定心丸！

所以除了苏维埃俄罗斯为能始终友助土耳其外，法美帝国主义只有如此如此。

（四）安戈拉政府对于协约国帝国主义提出的条件 本月六日路透电发布安戈拉国民议会交给伊斯美将军在洛桑会议向协约国提出的条件为：（一）土耳其疆界应与国民公约相符，（二）希腊偿付赔款，（三）取消治外法权等优待条约，（四）改定伊拉克边界，（五）土国在财政上政治上经济上之完全独立。又说：安戈拉政府发第二牒致协约国高等委员，声称各国军舰如欲驶过海峡，必须呈请核准，且入口岸时，必须向政府致敬。又谓国民议会

规定驶入土国口岸之军舰，每次仅许有一艘，且须先得正式之许可。又一牒文要求铁路由国家收回。

不知我们中国人看了以上的条件作何感想?!

（载《向导》第9期

署名：和森）

国会对于宰制中国的 九国协约取何态度？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八日)

近日“专制宪法”的国会，竟把日本强奸中国的二十一条议决宣布无效，这要算是一件差强人意的事；并闻华盛顿会议宰制中国的九国协约，也由北京政府提到国会来了，然则国会对于这种“吸血同盟”通过呢，否决呢？

从前日本帝国主义单独来强奸中国，惹起全国剧烈的长期的反抗；现在美帝国主义协同英、日、法各国帝国主义用门户开放、国际共管的网罗来宰制中国，于英、美、日、法四国协约之外，更设九国协约的骗局，使中国自己入瓮，全国人民却被他眼花意迷，入了醉乡，这真是中国民族的大耻辱呵！我们要问胆敢撤废二十一条的议员先生们，对于这个九国协约取何态度呢？

(载《向导》第9期)

署名：振宇)

国人对于苏俄的同情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十一月七日，北京几千学生、工人与市民热烈的举行苏俄革命五周年纪念，高呼：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压迫，中俄联盟万岁，无条件承认苏维埃俄罗斯。因此惹起东交民巷太上政府的特别注意，不到几日，北京城里就布满了搜索过激党的风声。

同日在上列同样呼声之下，山西人民开了一个国民大会，纪念苏俄革命，通电无条件承认苏俄，主张中国被压迫民族与苏俄联合，以摆脱国际帝国主义的羁勒；同时湖北、湖南市民和学生也有同样的大集会，湖南的虽被赵恒惕解散了，但人民对于苏俄的同情却因此更加浓厚。至于公共殖民地的上海，虽然侦探巡捕严密逡巡，然而十一月七日的破晓，“承认苏维埃俄罗斯”的革命五周年纪念帖子，竟贴遍了全街市的门壁。此外更有全体留日学生于十一月七日前，即通电全国，无条件承认苏维埃俄罗斯。由此可见中国人民对于苏维埃俄罗斯具何等的同情了。以中国人民对于十一月七日之热烈和对于十一月十一日——资本帝国主义的休战纪念日兼宰割中国的华盛顿会议纪念日——之冷淡比较，显然可见中国民族的觉悟和择别了。

这种对于苏维埃俄罗斯的同情，极其重要。不但促进两民族

的感情和利益,而且与中国的解放有重大关系,因为我们从世界帝国主义手中解放出来,便非与苏俄联盟不可。换句话说,中国人民能否得到自由和独立,就看中国人民能否与苏俄建立亲密关系。我们希望这种同情不仅仅在十一月七日表示一回就完了,我们希望这种同情能够永远存在和日见扩大,因而得到实际的结果。

(载《向导》第10期)

署名:和森)

赵恒惕与湖南省自治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现在有两个不可为训的民主革命的叛徒，一个是陈炯明，一个是赵恒惕。陈炯明业已逆迹昭彰，人人唾弃，什么也号召不起来了；但是阴险奸诈的赵恒惕反玩弄几千万湖南人于掌上，正在那儿唱“联省自治的模范省”之把戏。这出把戏初打开台，就把劳动运动中的青年领袖杀得血肉横飞，甚么“省宪”，除保障“总座”个人的地位外，其余一切都是不发生效力的。

赵恒惕现在在武人政治上所尽的作用是什么？就是做陈炯明与吴佩孚之间的桥梁。几千万湖南人民被他罩在这个幌子之下，一切买卖当然是任凭“总座”去做的。陈炯明谋“联治”首先要去找这个湖南的“总座”，吴佩孚谋“联防”也首先要去找这个湖南的“总座”；这个“总座”的地位，确实也是要靠陈、吴才得保持，所以陈、吴的支配力可直接达于湖南。这就是湖南省“自治”！

省宪不规定一些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吗？但是十一月七日湖南市民对于苏俄革命五周年纪念之热烈的集会被赵恒惕令军警解散。

省宪不规定客军过境要先得省议会之认可吗？但沈鸿英在赵吴(佩孚)默契之下，已大骚大扰的掠过湘南一带去了。

双十日长沙城内的市民，曾经小孩子一样，向“省长”请求按照省宪施给一些自由。那天这位赵“总座”却为“民选的”省长儿字动了心，假仁假义对市民代表说了一些，市民代表“满意而出”。可是这种“满意”不到一个月就变成军警压迫之下的愤怒了！要争得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才能做到真正的自治。“自治”下面得不到一点自由，不要忘记是一种不好意思的耻辱。湖南人民要从赵恒惕这个军阀的伪自治中洗刷出来，便应猛烈的起来争自由呵！

（载《向导》第10期

署名：和森）

一个希望赵恒惕 “提倡劳工”的工会!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有个甚么安徽驻沪劳工总会，因湖南劳工会恢复的事，送一个作揖打拱的电报给惨杀劳工领袖的赵恒惕，上面说了一些“我公改造社会早具卓见”的肉麻话，下面便接着说“尔后自当顺应潮流，提倡劳工，此次工会恢复，尚祈时加奖饰”（见十日《民国日报》）。

以赵恒惕这样惨杀劳工的军阀，这样摧残劳动运动的军阀，竟有希望他“提倡劳工……时加奖饰”的工会，我们忍不住要说：这是工人阶级的大耻辱呵！

（载《向导》第10期

署名：振宇）

唐山学生援助罢工之模范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近旬唐山四万多罢工的苦同胞，被外国资本家与军阀的压迫和残杀，这样一桩被压迫民族的大事体，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机关报——如京津《泰晤士报》、《字林西报》等——总想捏造一些“红色煽动者”的谣言，来麻木中国人的感觉。所以近在咫尺的唐山学生对于罢工同胞之态度怎样，乃为中国人民是否还有民族感情和义愤的试金石。

据今日消息，唐山路矿大学学生三百余名，为援助罢工于十三日在街市巡游，募集罢工基金。这样的消息不但在劳动运动史上为重要，在民族运动史上尤为重要，而且是中国智识阶级到了真正觉悟的路上之明证。全国压在国际帝国主义下的智识阶级和学生们，都要学唐山路矿大学学生的模范呵！

(载《向导》第10期)

署名：振宇)

红军在海参威 胜利后的远东时局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新近历史上发生两件最重大的事变：一是土耳其民族的复兴，一是红军在海参威的胜利。这两件事情恰好是在近东和远东遥遥相对，把两个最受国际帝国主义侵略的中心变了一种新形势。这种新形势，不是一国一民族的庆幸，乃是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庆幸。

许多年来，国际帝国主义从各方面侵入中国，用武力将他们的商品和资本输进中国，用武力打破中国政治的和经济的独立。

许多年来，国际帝国主义用武力将中国人民屈伏于半奴隶地位，割据中国一切重要通商口岸和军港，驻扎外国军队于中国首都，中国沿海和内江布满了他们监视和威压的军舰。

许多年来，国际帝国主义用武力迫使中国劳动民众为他们增殖财富，他们握住中国一切经济生命，协定中国关税，使中国永远处于贫困和奴隶的地位而不能自振。

远东殖民政策和帝国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经济上奴服的历史，也就是中国政治独立破坏的历史，也就是中国劳苦群众流血，受苦和精神上奇耻大辱的历史。

因为中国有殷富的天产和众多的廉价劳力，所以国际帝国

主义不但把中国弄成为公共殖民地，而且把中国弄成为竞争最烈的战场。以前爆发的日俄战争，和今后必不可免的日美战争，就是国际帝国主义所造成的远东形势。中国、朝鲜、蒙古几万万被压迫民族和日本几千万工人农人都同着处在这种可怕的形势底下，供他们不时的牺牲。

现在我们且来审查红军在海参威胜利后，远东时局会起怎样的变化：第一，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援助土耳其民族复兴的社会主义劳农俄罗斯，现在与我们更接近一步了。他在远东所占的重要地位，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国家没有那一个能推翻他或侮视他的了；第二，远东一切被压迫民族和劳动阶级，若能一致与苏维埃俄罗斯联合，定能打消或抵抗日、美、英、法最近之将来所造成的帝国主义第二次大屠杀。

所以这样与近东变化同时而起的远东时局，倒是使国际帝国主义者笑也不好哭也不好。

（载《向导》第11期

署名：和森）

美国机关报所说的中俄时局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最近《密勒评论》登载一篇论中俄时局的文章，颇可注意。他首先说：自日本撤兵，西伯利亚重归苏俄管理后，对俄交涉之开始，不能复缓。美国处于孤立地位，对于缔约，不妨自择其时机，中国则否。中俄边界相接，延长三千英里，关系至为密切，无论中国是否赞成布尔雪维克主义，势不能再延缓恢复对俄国交之谈判。盖中国今日已为时势所迫，必须起而自保其利益与土地。但对俄交涉，中国显处于不利地位，因俄国已经统一，中国则尚在分裂时期中。

我们由这些话可看出几点：第一，美国帝国主义者知道在现在情势下反对中俄交涉是无效的，所以退一步承认中俄缔约不能再缓。第二，他要防备中俄为根本的结合，所以把中国对俄缔约说成为一种势迫处此而不能自择时机与所谓“必须自保其利益与土地”的苦事。第三，他借此为美国帝国主义和新银行团做借债的宣传，所以把中国的不统一说成为与统一的俄国交涉处于不利地位，看他下文“国际银行团为助中国而设……”的话便知道了。

其实，中国这样分崩的局面，只有与日、美、英、法各帝国主义的国家交涉才是处于不利地位。至于社会主义的劳农俄国，

他与全世界的劳动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同其利害，他的利益就是国际劳动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利益，反过说，劳动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处于不利地位，就是这个世界革命的先驱——劳农俄国——处于不利地位。所以惟有北京政府——就是《密勒评论》所谓“迄今依美、英、法三国之政策维持其对俄地位”的政府——常受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支配，不以中国民族利益为前提，而以美、英、法、日政策为前提，去与苏俄代表开交涉，才真是中国的不利益呢。

《密勒评论》承认中俄关系之重要，与中国政府对俄政策之依附美、英、法各国，及因而中国政府纵容旧党之三事，都还供得真实，今把他引在下面：

中俄除国境相连三千英里外，尚有许多利益共同之点：西伯利亚之一部，赖满洲米谷之供给；蒙古肉类为俄人所需，为时已久，中国北部购用西伯利亚木材颇多；俄人所销之茶，全仰给于中国，中国所用兽皮，多来自俄国。中俄间有条约关系，已数百年，远在他国之先。俄国革命后，中国与其他联合国及共同作战国一致对俄断绝国交，迄今依美、英、法三国之政策，维持其对俄地位。俄旧党曾用中国土地为根据，反抗苏维埃政府，中东铁路之“俄国利益”曾继续为俄旧党所管。

《密勒评论》又说：

中国前此之延缓对俄谈判，盖如休士国务卿之说，欲待俄国有一可与交涉之政府耳。俄国今日已有一中央政府。

外国帝国主义者的论调如此了，然而受其支配的北京政府和顾维钧辈，现在还是满口“红白两党，一无轩轻”的论调，仿佛还不承认俄罗斯有一统一的中央政府！此外，我们还可在他的

论文中寻出几点有趣味的东西：

(一)他以为越飞“天然将利用张作霖以抗中国”，并说张作霖有祝贺红军占领海参威而通殷诚的事。这是真的吗？若是真的，我们倒要灌红胡子一碗米汤。

(二)以为中国“激进学生派人”主张恢复对俄国交，将使中俄谈判多一纠纷，并承认中国学生界之势力，足以转移舆论，“尤以排日运动后为甚”。这倒是外国帝国主义者着急的一桩事，然而这乃是中国民族觉悟的表现。

(三)末了，他把日美嫉妒的贪欲完全暴露，他料日本会与苏俄妥协而深忌之。他说：“由俄国在远东势力复活而造成之新时局，无论如何解决，其中实含有种种之机运复使满洲一隅为世界视线之集中点”。日本与苏俄妥协，确是要使美国资本家不安呵。

（载《向导》第11期

署名：和森）

“须与美国亲善”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辛博森漏泄的外交文件上面说：“中国须与美国亲善，无妨以沿海之海军根据地以及其他利益奉献美国”。

又说：“英日之缔造新约，又予中国以要求俄国援助之机会，此种新约，实有驱中国为波斯、阿富汗之势，因该两国颇得力于劳农政府之关心”。

美国帝国主义打破英日同盟而缔结四国同盟的用心，原来如此！他是最怕中国与俄国结合，最怕驱中国如近东回教民族之“得力于劳农政府”而跑上解放的道路。

四国——美、英、法、日——吸血同盟底下的中国，当然须与美国亲善，无妨以沿海之海军根据地以及其他利益奉献美国！

一些无民族自觉的亲美论者，可以醒了罢！

(载《向导》第11期)

署名：和森)

请看外国帝国主义 在中国捣些什么鬼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津派倒阁，报载背后有外交意味，在防止鲁案届期签字。你看是捣什么鬼？

现在在北京政府中最擅权的美国帝国主义顾问辛博森将运动打消英日同盟的底稿，付与京津《泰晤士报》发表。你看这是捣什么鬼？

“非俟统一不借款”的新银行团，现在一面摆出“总算账”的龙门阵，一面又注意单独的地方投资（见十八日《申报》）。史蒂芬从四川跑转来又申言：“新银团借款，视担保品确实与否为准，铁路管理得法，系良好担保，闽事无妨于借款”。你看这是捣什么鬼？

京津《泰晤士报》、《字林西报》、《密勒评论》，以及其他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机关报，天天为陈（炯明）吴（佩孚）两军阀制造携手的空气；天天想挑剔中国人民对于苏维埃俄罗斯的恶感；天天制造空气，防止国民党帮助各处罢工，使他（国民党）不能与群众接触而缩小国民革命的势力基础。你看这是捣什么鬼？

外国帝国主义者看见中国近来劳动运动的潮流渐渐涨高了，于是他们一面赞美中国的旧行会制度，一面雇用些基督徒到

工会中去宣传他们甚么“英美国际”，而且上海《泰晤士报》的记者，居然写信给一些招牌工会通殷诚。你看这是捣什么鬼？

（载《向导》第 11 期

署名：和森）

蒙古王公与 外国资本家的勾结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申报》十八日北京专电：威廉推勒代表坎拿大铁路公司，与蒙古某爵等订立张家口至库伦铁路借款草合同，总额四千万美金，因张库路定归商办，故蒙爵得依此与推勒接洽，作为中英商人合办方式。

苏俄援助蒙古民族的解放运动，自然要帮助他提高那半原始的经济地位，近日一些反动的报纸和通信社发布种种宣传性质的消息，说苏俄与蒙古订立了种种经济的条约，在我们看来，这倒没什么奇怪；只有这样一二蒙古王公与英美资本帝国主义的勾结，很值得注目。因为前者是蒙古觉醒的民族——由蒙古国民革命党率领的，参看本报前数期的《蒙古及其解放运动》——与社会主义劳农共和国间志愿的结合；而后者乃是一二背叛民族利益的野心王公与贪欲紧张的英美资本帝国主义的无耻买卖。中国人民应当帮助正在解放的蒙古弟兄实现前者的结合，打消后者的买卖。

(载《向导》第11期)

署名：振宇)

英国与威海卫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英国帝国主义所谓自动的退回威海卫，经梁如浩和英委员谈判了这么久，现在英国帝国主义的要求越加显明了，他最近提出的条件是：(一)中国接收威海卫，应将全境辟作商埠，不得保留其一部分；(二)中国应将威海卫定为特别区域，归中央直接管辖，行政长官亦由中央任命，不得沿用旧制，划作山东省属地，所有地方收入，概留地方支用，不得提拨；(三)威海卫开埠后，应设立市政厅，由中外董事会组织之，以英人为董事长，关于地方一切行政，如征收税捐，动用公款，建筑工程，变更现行章程等，须经董事会通过后，方能执行，凡董事会议决事件，行政长官，并应照准办理。

这不但是干涉内政，而且要把威海卫的主权完全操在英国帝国主义手里。这倒值得惊讶呀！

(载《向导》第11期)

署名：振宇)

近日政潮的内幕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六日)

自罗案爆发，“好人奋斗”的王内阁随之而倒。王阁的存在为时亦已数月，他全部的成绩，除为军阀天天进行借款外，一个治安警察条例都不敢主张废除。象这样一个“好人政府”，他的出现与消灭，被军阀利用与被军阀糟蹋，都值不得我们丝毫的同情。

但是这次政潮的内幕极其复杂，被罩在这出幻剧底下的人民，实有明了之必要。

我们在这次政潮中显然可以看出的：一是武人政治下，任何改良主义都无实现之可能，“好政府主义”——改良主义之一种——经过这几月出怪弄丑的试验，现在已完全破产了；一是武人政治下，和平与安宁之无望，不久保洛战争爆发，人民又将受一次大屠杀。以上两点是很容易看出的，但此外还有更严重的两点：一是曹黎拆孙吴联合的台；一是外国帝国主义拟乘此在中国建立一个最反动的武人政府，打破中国一切进步、革新的势力。

孙吴联合，外间早有此种传说，据闻保派府派刺探孙吴间最近曾有几项具体协定，其中一项关系所谓“最高问题”之孙正吴副说，而为之居间缀合者即为王宠惠。所以王阁遂成为保府间共同仇恨的牺牲品，所谓奥款合同，不过是早已安置好了的导火

线(报载此案原为张英华计划报效保曹办最高问题之用,至此罗文干用以报效所谓“国库”,故即爆发)。证以《民国日报》本月二日所载国会议员某君的谈话,益足见以上消息之确凿。某君云:

黎之目的惟在能永久做总统,曹锟势力虽厚,在黎认为不足与彼之虚名竞争,彼所惧者仍在中山先生一派。迩来北方政客盛造孙吴接近之空气,以逼黎氏远吴附曹,今日如此局面,实与此种空气有关……

保派拆解孙吴联合之事,原不始于罗案发生之日,前此张绍曾极力主张讨伐许崇智,即为拆解孙吴联合第一着。素以菩萨著称的黎元洪,前此倚仗洛吴以抵制保曹实现所谓最高问题,故时常挽留屡欲辞职的好人内阁,一旦情形变更,遂顿然大显神通,利用吴景濂告发机会以保全自己的地位。

孙吴联合不但为保派反动军阀所切忌,尤其为宰制中国的外国帝国主义所切忌,因为这乃是进步势力的结合,于反抗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是顶可虑的。国民党数十年的主张和行动既带有极端民主主义的精神,而吴佩孚——进步的军阀——生平常以岳武穆自命,又带有爱国和反抗强邻的色彩。所以自有孙吴联合的传闻以来,外国帝国主义者异常注意破坏这桩事。他们一面计划如何使吴佩孚与陈炯明联合;一面以保派督军齐燮元为枢纽,计划如何捧戴曹锟上台,如何团结一切反动势力以压吴佩孚,如何压迫罢工运动,如何取缔新思潮,如何攻打自主的蒙古民族并破坏中俄二民族的解放同盟。所以这次政潮不仅如报载有某有力的外国顾问和日本的鬼计在其后面,而且有英美帝国主义谋在中国建立一个最反动的武人政府的阴谋在其后面。日本政府不借款给洛派政府的提议,竟得贪欲进发,急要过瘾的英美资

本家与帝国主义者同意；近日英美法日各公使协同向四面楚歌的吴佩孚下警告；以及前此罢工风潮紧张，北京智识阶级对于苏俄表热烈同情时候，一面英美机关报制造“红色煽动者”和苏俄“侵略”蒙古的空气，一面保派军阀高唱征伐蒙古，取缔新思想，并且实行压迫唐山矿工。凡此种种，皆足证实外国帝国主义与反动军阀勾结的阴谋。

（载《向导》第12期

署名：和森）

由汪大燮内阁到张绍曾内阁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六日)

乘机操纵以图保全总统地位的黎菩萨，这次既大显神通，“乾纲独断”，组织一个适合自己需要的汪内阁，这个内阁的组成分子，对于洛吴既保留余地，而且又远结湘皖军阀的欢心，调彭允彝与许世英入阁。这样一来，既借曹以折吴，又弱曹以自固，菩萨的地位，俨然比前巩固多了。

可是汪内阁成立不到几小时，即遭曹锟和议院派无情的反对，充曹锟冬电的口气，大有杀进北京城，灭此朝食之概。这是王阁倒后，由保洛之争回复到黎曹之争的好电影呀！

菩萨与“虎威”既然各显神通，于是举足轻重的议院派遂特别显出他们的重要，菩萨手腕灵敏，再转一舵，遂径直提出吴景濂所借重的张绍曾为继任总理，咨交国会，希图借国会为后盾，使总统瘾急的虎威将军敢怒而不敢言。

此时黎菩萨既挟几百罗汉以自保，罗汉们亦故作拥护菩萨以敲那只贪总统而不肯花钱的人的竹杠。但是一旦竹杠敲得了，菩萨的尊位再也没有人相保了；并且张总理那把拚命夺得的交椅，又将必然的为外交系颜惠庆所夺。封建残局之中，看不尽如此热闹变化的把戏！

汪内阁的命运虽然短促，黎菩萨的政策虽然失败，但是隐在

这次政潮后面的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王正廷等的鬼计，完全成功。汪阁的作用自己承认专是为得鲁案签字，这是的确不错的！日本帝国主义和王正廷，利用这个千载一时的机会抬出汪内阁，于几小时之内忙脚忙手的就签订了鲁约，他们的目的要算完全达到了。

在议员派的竹杠还未敲得，黎菩萨还可与曹虎威暗斗的时候，也许有张内阁存在的余地。但是这个时候一过，快进三海的曹锟是用不着他的，因为这样的“土脚色”没有资格可以拿到洋钱，并且又不中洋意。所以在最近的将来，内阁总理这把交椅必定属于颜惠庆，因为他是英美帝国主义者合式的洋奴、反动军阀中用的走狗。

所以我们可以简单说：现在的汪内阁是为日本帝国主义与黎元洪的需要出现的，将来的颜内阁是为英美帝国主义与曹锟的需要出现的。因为英美帝国主义要颜惠庆而不要张绍曾，所以曹锟必须弃北洋本派的走狗而用外交系为走狗。即此一点就足证明帝国主义与曹锟的勾结了。

（载《向导》第12期

署名：和森）

洛桑会议中土耳其民族 唯一的帮助者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六日)

洛桑会议之中，协约国偏袒希腊和仍图宰制土耳其的态度又一致的显明出来了。土耳其代表被包围于一群强盗的劫掠空气之中，其情形早已异常困难；直等到苏维埃俄罗斯代表团莅会，他们的态度才得忽变强硬（见路透社十一月三十日洛桑电）。但是协约国的强盗们，对于土耳其民族这个唯一强有力的帮助者是很惶恐的，所以正在设法限制苏俄参与会议的范围。这个意义，不是协约国敢于排斥苏维埃俄罗斯，但是想仍然压抑复兴的土耳其民族。由此可见英、美、法、日离间中俄二民族的亲善，或明或暗破坏中、俄会议的进行，也是基于同一意义之上。

法国因为榨取德国的赔偿要得英国的让步，所以关于近东问题自然要对于英国让步以为交换，故洛桑会议开会以前，双方帝国主义的强盗们即宣言英法意见完全一致了。然则可望假仁假义的法兰西帝国主义帮助土耳其民族的解放吗？

至于美国，他对于土耳其的政策和对于中国的政策没有两样，就是所谓“门户开放”与“机会均等”。现在他正挟这种政策在洛桑会议中敲英法帝国主义的竹杠，要求均沾英法在近东所

得的各种特权；如果不从，他便声言美、土将开单独订约之谈判，以办理与近东时局有关之各事（见路透社十一月二十八日华盛顿电）。《纽约讲坛报》宣布美国外交之根本原则为：“美国对于实际上未被兼并之土地，保留要求公正处理之权”（见同社二十七日纽约电）。这是什么意义呢？就是说土耳其还未瓜分的土地，美国帝国主义要求有平均瓜分之权。然则可望假仁假义的美国帝国主义帮助土耳其民族的解放吗？

战后的美国帝国主义，标着“门户开放”政策在远东和近东同时积极进行，华盛顿会议中既拆散了英日同盟而构成协同侵略中国的四国同盟，所以这次在洛桑会议中势必打破一九二〇年英法瓜分土耳其石油的秘密协定，而构成协同瓜分土耳其石油的美、英、法三国协定，这乃是洛桑会议中，业已显明了的形势。所以美国帝国主义不仅不会帮助土耳其民族，而且是土耳其民族最可怕的新敌人。

此外，洛桑会议中日本帝国主义代表的态度很可注意。侵略家林权助——手递二十一条给袁世凯的脚色，居然在会议中发出赞成土耳其撤销治外法权的言论。但他是别有用意的，绝对不是帮助土耳其的，不过借此为敲得英国对于他某项要求让许的外交手段，也如他从前在巴黎和会中提出撤废人种差别案，用以抵制美国的用意差不多。然则可望假仁假义的日本帝国主义帮助土耳其民族的解放吗？

并且法、美、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们，无论他们在与英国帝国主义息息相通的利害关系上不能帮助土耳其，而且根本上，一切帝国主义的强国都是要狠心的压迫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的。所以洛桑会议中土耳其民族唯一的帮助者只有社会主义的工农

俄国。劳农俄国是坚持赞助土耳其民族的独立与自由，强硬的主张完全恢复土耳其在海峡上之主权的。

（载《向导》第12期

署名：和森）

法日美资本家 都要与苏俄恢复关系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六日)

日本资本家对俄通商的要求已非一日，前此迫成的西比利
亚撤兵案和长春会议，就是以资本家这种要求为背影，可是他们
的目的，仍然为军阀侵略政策所阻碍。然而资本家利益上的要
求是不会因此停止的。近日侨居海参崴的日商，竟公然通电要求
政府与苏俄迅速恢复关系，可见日本资本家的主张，不久就要战
胜军阀的。

对俄最反动的法兰西，虽然怀恨“注销外债”的银行资本家
反对与苏俄恢复关系，但工商资本家眼红英德资本家捷足先登，
饱得苏俄肥美的让与权，所以早就与银行资本家冲突，运动恢复
对俄一切关系。自里昂市长赴俄回国之后，这种运动尤突飞猛
进，议院中工商资本家代表和资产阶级急进党，业已在这种政见
上组成多数以变更普恩费这个最反动的强盗之对俄政策，因而
酿成最右翼的反动派国民党提议推翻普恩费内阁的政潮。由此
可见法兰西工商资本家的要求业已成为政治上最高的支配力。

复次就是美国资本家对俄恢复正式关系的要求。一九一七
年三月俄国革命之后，美国资本家即纷纷派代表赴俄，企图实现
其包揽全俄交通和工业的大计划。虽因十月革命受一打击，然自

一九二〇年以来，摩根公司即派代表樊德立普往俄数次，订结多项合同。此外美国资本家或公司之赴俄与英德人竞争投资者，尤络绎不绝。只缘哈丁的反动政策与法兰西同其步骤，所以至今没有恢复正式关系。但是美国资本家已不能再忍了。政府党即因此而分裂，以“承认俄罗斯”为政纲之唯一的新政党业已酿成政治上的大势力，竭力运动反对哈丁为下任总统。

由此可见承认苏俄问题，不独为外交上的紧要问题，而且成为资本主义各强国的政治变化之动力，反动政治家如普恩费与哈丁，也不能逆这种需要与潮流了。

英国既早已与苏俄恢复商业关系，日美不久又将相竞的去承认苏维埃俄罗斯，就是法国至少也要学步英国的政策。这样一来，一切资本主义的强国都非与苏俄恢复一切关系不可，这是事势上不可逃的。但是他们却要禁止被他们压迫的中国与苏俄恢复关系。可见他们不是怕宣传共产主义的过激党——他们各自的国内有几十万的，有几百万的，至少都有几千几万的——但是怕被压迫的民族与苏俄结合以抵抗他们的侵略。

（载《向导》第12期

署名：和森）

可惊可骇的交还威海卫条件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六日)

本报关于英国帝国主义退还威海卫问题，曾经指摘过几次。威海卫在军事上的价值，为北方国防咽喉。自英国帝国主义扼住这个咽喉，中国人民便天然的成为被征服民族。所以这个要塞的完全收回，关于中华民族独立自由的前途极其重大。自梁如浩交涉以来，英国帝国主义者退名不退实的假面具完全暴露。近日各报揭载英国交还的严酷条件，竟多至十五项，一条一字，无不令人怒目惊心；至英国代表的态度“强硬无匹，其所主张，恍如命令，不容我国答辩”（见近日京沪各报）！这就是证明在远东侵略史上最著先鞭，最苛最暴的英国帝国主义绝无放松中国民族之微意。今把十五条转录，望国人留意细看，并望京沪一切舆论家勿因京津《泰晤士报》、《字林西报》——英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机关报——之含默而跟着含默，须知昨日对于蒙古问题向中国人故作挑起爱国感情的英国机关报，今日对于他们自己奴隶中国的企图绝不会作同样宣传的！十五条件附录于下：

一，英国提议要求保留刘公岛海面停泊军舰适宜地点，与中国共有优先权。梁如浩答称英国曾用款浚凿，（英人自称伊初来威时，曾浚凿港口费款二万余镑）中国愿与英国优先权，惟此项与让字间，宜加讨论。二，英国要求保留海面

投锚浮标之投锚所。三，英国要求保留刘公岛之建筑物，如军官俱乐部及网球场，海军场所全部（俗称西局子）兵营，海军司令署及住宅，海军下级官住宅，医院货仓，海军医院，海军医院住所，海军军官俱乐部，皇家商店及住宅，医院地基，军人网球场，运动场，海军村，英人坟地，英海军坟地，打靶场，棍球场，机器井两眼等等。以上各处计占地共约一千八百亩，均在岛前面沿海平原处，此外沿海平原之地，寥寥无几。四，英国要求维持刘公岛现行市政，在未得英领事同意前，不得有所变更。五，英国要求刘公岛土地，不准中国人耕种，并限制中国人居住。六，英国要求外人在威海卫私有之地产，由中国换给永久契约，照中国人一律上税纳捐。梁如浩答称恐外国人不肯纳捐，英国翟委员答称由领事签字强迫执行。七，刘公岛铁码头于前清光绪十四年，（即一八八八年）修筑费湘平银十八万余两，英国声明于一八九八年接收时估价五千元，后经伊修理费十万元（此码头联于海军场所）。八，英国保留威海卫陆上之建筑物及所在地，如操场（甲午以前为中国大校军场，共占地三百余亩，东临海岸，西紧接威海城，为将来商务之中心要点），英办事大臣住宅，华务司衙门，商埠下之医院，温泉汤之医院，辞职军官公共住所，英人坟地等等，约值共四十万元。九，英国声明威海卫二十四年政费共亏一百四十余万元，由中国偿还。十，威海卫官有地，经英国租与外人，有租期五十年者，有二十五年者，均要求按原定条件，继续进行。十一，英国声明刘公岛土地房屋，除保留者外，交还中国者，价值六十万元，（据英人自称伊当初购全岛土地时，所费不过三十余万元，今将

美地要地俱要求保留，将其余之山坡交还中国，尚索价六十万元。）威海卫陆上土地房屋除保留者外；交还中国者索价八十四万余元，共计一百四十四万余元，英国声明有权索价全部价值。（查英国要求保留之土地及建筑物，关系均极重要者，在刘公岛所欲交还中国者，全系山坡不合建筑之地，即有一二处临海之地，因夹于英国保留土地间，亦属无用。）十二，英国希望中国修汽车路，自威海通烟台，并称英人克拉克已画有路线图，并计划该路修筑费，须四十余万元。十三，英国希望中国聘在威海英人为顾问，期限五年，并聘二英人为巡警长。十四，英国要求中国为英人储养老金，每年须六千五百元，无年限。十五，英国要求中国给予英人回国川资十四万镑。

（载《向导》第12期

署名：振宇）

爱尔兰依然为英国的殖民地!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路透社本月五日伦敦电：上议院今日开会，由皇家委员会认可爱尔兰宪法议案，旋乃正式宣布任海莱氏为爱尔兰总督；又电爱尔兰宪法议案既经英皇批准，爱尔兰自由邦乃于今日夜半成为英国之殖民地，总督之职务即于此开始。

英国政府自从武力征服的计划失败后，改变手段，用所谓“条约”的方法来收买爱尔兰资产阶级和大地主，使他们反转来变为英国帝国主义打破爱尔兰独立和自由的机械。爱尔兰资产阶级为他们的阶级利益计，由柯林，柯斯柯莱夫这班叛徒做代表，公然背叛了革命，接受英国帝国主义的金钱和军械，反攻英勇奋斗始终为爱尔兰独立与自由而奋斗的共和军，及百折不回的革命到底的工农群众。他们戴着“自由邦”的假面具背叛革命残杀同类的丑行，已在全世界为民族与社会争自由的人们面前完全暴露了。据路透社本月八日电，这班无耻的叛徒，于“自由邦”变为殖民地之后，又把共和党领袖鄂康诺，梅洛士，迈克尔维，巴莱特四人枪毙了。这就是英国帝国主义借爱尔兰叛徒之手，施于争自由与独立的爱尔兰民族之上的恐怖政治。

他方面，路透社又报告说：爱尔兰共和党发表一宣言，指新任爱尔兰总督海莱氏为爱尔兰民族终身仇敌，爱尔兰苟有一人

生存,必继续奋斗,因此为非死不休之战争云云。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英国帝国主义隶属爱尔兰的鬼计虽然成功,同时爱尔兰民族革命解放的“死战”,从此将愈加严重,势必与世界革命的潮流相会合而达到他最后的成功。下面的决议,是英国共产党最近在伦敦大会通过的,这种决议不久就会成为历史上必然的事实。

“我们赞成爱尔兰共产党帮助爱尔兰共和军,号召劳工群众,按着已为共和党优秀分子所承认的社会政纲,与共和军协力建立爱尔兰劳农共和国。

我们希望爱尔兰的劳动运动,立刻脱离改良派的领袖,集合于爱尔兰共产党旗帜之下,一致参加共和军反对英国帝国主义的战线。

这就是爱尔兰工人农人打败反动势力,建立劳农共和国唯一的道路。为着这个目的,英国共产党愿意尽可能帮助爱尔兰现在的革命势力,第一步就在阻止英国政府运送军械供给戴‘自由邦’假面具的残杀者——爱尔兰资产阶级和他们雇用的军队。”

(载《向导》第13期

署名:振宇)

革命中的希腊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好战的希腊，在小亚细亚失败的影响之下，业已爆发了革命。这次革命的含义：一面是兵士和农民群众愤恨战争的直接表现，一面是两派好战的支配阶级相互间的倾轧。所以康士坦丁与维尼齐洛的冲突，为这次政变的重要原因之一。

康士坦丁与维尼齐洛的冲突，并不是个人性质的冲突。维尼齐洛是希腊资产阶级的代表，尤其是代表海运业资本家的利益，所以坚持海外发展的侵略政策。多年以来，他用最伶俐的外交手腕挑起巴尔干历次的战争，完成他那“大希腊”的好梦；更在一九一七年，贯彻他的参战政策，赶走康士坦丁，以图掠夺小亚细亚，塞拉斯和君士坦丁堡。故在他一方面，维尼齐洛自然老早就英国帝国主义关系最深的同伙了。

康士坦丁，威廉第二的妹夫，他是个把普鲁士军国主义搬进希腊的“好汉”，他也在巴尔干战争中显过他的好身手。但他对于欧战却持中立政策，并想借德国驱逐英国在希腊的势力。因此遂与维尼齐洛相水火，结果，协约国与维尼齐洛就把他赶跑了。

康士坦丁虽然失位被逐，但他的中立政策却引起民众——尤其是农人——间很好的同情，精神上，他俨然成为小资产阶级和平志愿的代表。维尼齐洛虽因参战增高希腊帝国主义和他个

人的权威，但外债由八万四千六百万（一九一三年）增到四十万万（一九二〇年），不停的为大希腊主义和英国资本向小亚细亚发展他的冒险事业，因而惹起民众不可再忍的怨恨。一九二〇年十二月，新王亚力山大——康士坦丁第二子——死后的选举，维尼齐洛遂完全失败，康士坦丁乘机复辟。

但希土战争，久已兵连祸结，康士坦丁对于小亚细亚的冒险事业不能骤然收手，又不得不奉承英国意旨，继续进行维尼齐洛的政策。于是康士坦丁又一变而为英国资本的佣人。他以前在民众和乡村小资产阶级间的同情与信用，因此完全失掉。并且外债增到一百万万之多，民众负担既重，生活程度又不停的增高，厌恶战争，遂达极点。

希军既在小亚细亚屡次失利，于是雅典亲英派的倾向大形动摇，以为希腊在这样形势之下，非与法国妥协不能免避徒供英国牺牲的灾祸。但这个反对参战的威廉第二的妹夫——康士坦丁，他是不能与巴黎接近的；维尼齐洛遂利用这种趋势与法国资本勾结，以谋推翻康士坦丁。至此维尼齐洛与康士坦丁的冲突，就是代表英法资本主义在近东的冲突，换过说，维尼齐洛不过是施内德（Schneider）公司的佣人，康士坦丁不过是柴哈洛夫（Zakharov）公司的佣人罢了。

希腊军队经过上次大战的屠杀，早就不愿再战，所以动员赴小亚细亚，乃是希腊政府最勉强最冒试的举动。兵士既无战心，失败与逃亡，早已无法禁止。最近大败之后，遂自动的复员回国，直接推翻康士坦丁政府。维尼齐洛派乘机操纵，夺取政权，遂形成这次政变。维尼齐洛一面自身出席于洛桑会议，想用外交手腕挽回业已打破的“大希腊”的好梦；一面大杀康士坦丁派大臣

和高级将官，把兵士群众厌恶战争的革命，变成为惩戒“战争不力”或所谓“误国”的相反的性质；一面又维持君主政体，压抑群众革命的倾向。在这样内幕下，希腊革命能否扩张前进，或仅只达到维尼齐洛派的目的而终止，全视民众的觉悟和共产党的势力怎样，才能决定。

希腊人口约六百万，其中工业的无产阶级仅十五万（连其家庭计算约七十五万）。但是从一九一八年起，劳动运动是很厉害的，劳动组合和社会党，都在那时成立了。一九二〇年，希腊社会党加入第三国际，变为共产党。共产党年龄虽幼，但因为他是—切反对战争和罢工运动的领导者，所以他在民众中的信用是很大的。他不但得工人阶级信用，而且得农人、小资产阶级，和—切反对战争的民众的信用。政府虽然不停的高压，但是他的势力愈压愈大。这次政变前两月，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被捕，但他的请求—出，不仅全体工业的工人起来示威，军队和农人都同声响应。这次兵士的直接行动，与共产党的宣传是很有关系的。

希腊资产阶级，经过这次失败，全巴尔干的形势为之一变，希腊共产党的地位，自然格外重要了。维尼齐洛这派强盗虽想借这次政变把资产阶级的威权分外的恢复起来，但是业已戳穿了的纸老虎是吓不住民众势力之发展的；要想把民众愤恨战争而起革命的空气变成为愤恨失败而激起为“大希腊主义”再流血的空气，也是徒劳的。所以这次还算不得是革命，希腊真正的革命将接着这次的波涛大大的鼓荡起来啊！

（载《向导》第13期

署名：和森）

巴尔干新形势中的保加利亚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希腊政变，枪毙阁员六人的消息传出之后，同时保加利亚亦传出逮解战时阁员四人入狱的消息。路透社本月六日保京电：高等法庭审讯欧战发生时拉杜斯拉伏夫内阁诸员误国案，历十四月之久，今已终结，判词尚未公布，目下正在审讯被控负其他战祸责任之阁员多人，一九一二年巴尔干战争亦在其列。十一日巴黎电，又说保京发生大骚乱。可见土耳其胜利与希腊失败后的巴尔干新形势中，保加利亚也起了新变化。这种新变化是很值得注意的。

保加利亚战败之后，与土耳其同样陷于被协约国宰制的悲惨地位。但主持战争的保加利亚资产阶级，却因失败而在政治舞台上站不住脚。因此，保加利亚政权，遂让渡于左翼各党：社会党、急进党，和农党之手。社会党与急进党，曾一度接受政权，不久就狼狈的下了台。代表农人和乡村资产阶级的农党政府，遂维持到现在。

战后，保加利亚资产阶级政权解纽，共产党运动遂异常得势。资产阶级休养了几年之后，深不满于农党政府，他们又渐渐回复夺回政权的勇气。他们不满意于农党政府的理由，不仅因为他是代表乡村资产阶级的利益，尤其因为他不能压灭那危及

他们生存的共产党运动。

保加利亚资产阶级，一面集中他们的势力，形成他们的大团结，等到俄罗斯反动将军篮格尔率其败亡残军逃到保加利亚境内之后，他们便与之结合，密谋举事。由此曾形成过被群众直接打破的第一次政变。

但是农党政府对于资产阶级也同样的不敢高压，他对于取缔资产阶级的阴谋，始终只取些半刚半柔的手段。所以资产阶级于今年九月十七日又举行第二次政变。他们也是用群众示威的方法，自狄洛佛(Timovo)至索飞亚(Sofia)，遍布了资产阶级群众激烈起事的声势。这次运动延长至十月，卒被共产党所领导的工农群众，打得落花流水。结果，资产阶级大团结的领袖们——战时阁员达尼夫等，在群众的压迫之下，农党政府不得不将他们全体逮捕，交付法庭，惩治其一九一二至一九一八年，屡次主战误国之罪。这与希腊民众厌恶战争，惩治罪魁，同一现象。

保加利亚共产党，现在全体动员攻击资产阶级反动大团结。全国各大埠，都发生了流血的大冲突。共产党在政治上的伟大势力，现在谁也不能否认了。支持农党的小资产阶级和农人群众，现正日日跟着他向左跑。换过说，就是农党的广大群众，已被吸收到共产主义的旗帜下了。农党进退维谷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对于群众的许多许诺，常常是不能实践的，所以在民众中也渐渐失掉了信用。共产党一面严厉的攻击资产阶级，一面对于农党政府的怯懦、犹疑，也不停的施以批评。农党因为他的群众日日跟着共产党向左跑去了，所以他现在的政策也不得不向左一点，以图挽回他的信用和地位。

英希资产阶级在近来的失败，也就是全巴尔干资产阶级难于抬头的大打击。横在巴尔干的英法，意希的利害冲突，又永远使他们不会一致。所以在这样情势之下，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是顶好活动的。末了，我们要告读者：从巴尔干的新形势中，可以看出世界革命的消息。

（载《向导》第13期

署名：和森）

代 答 读 者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先礼先生：

辛亥革命后，确有所谓合五族而成中华民国的一种变化。但“政治的组织是随着经济情状而决定的，想将蒙古安放在经济较进步的中国政治管理之下，便不会合蒙古人民的需要，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是会对蒙古生一种高压的势力的”，这种高压的势力，明白的说，就是中国商业资本对于蒙古民族的重利盘剥（参看本报第五期至第七期的《蒙古及其解放运动》），是要借“五族共和”中所占的政治支配地位更顺利的进行的。所以除了军阀的压迫一层不算数，我们在根本上不能承认“五族共和”中占主要地位的中国资产阶级不掠夺或压迫经济落后的蒙古人民。此处我们可举两个例：日本资产阶级掠夺朝鲜为一种形式，英国资产阶级隶属爱尔兰又为一种形式。爱尔兰在英国“宪政”之下，不是老早就有“选举权”、“自由权”吗？我们可以“英、爱互助”、“共同生活”来解释爱尔兰的独立问题吗？

普通的文化程度为一事，一民族的生活行动又为一事。你问蒙古有不有独立的程度，我们可以正确的答应：有。何以有？就是蒙古民族业已产生了一个具有适当政纲、明确学理与坚决行动的国民革命党。本报第五期至第七期的《蒙古及其解放运

动》那篇文章，就是蒙古国民革命党的代表做的。从这一点讲来，恐怕中国国民运动的知识程度还远不及他罢。

蒙古独立与解放的主要条件，就是与社会主义的劳农俄国联盟。劳农俄国的反帝国主义的势力，现在业已伸张到了海参威。所以你末了的问题已有事实作解答。“五族合力来抵制帝国主义”，这是很对的，我们并且要联合全世界的被压迫民族来抵制帝国主义呢。君宇不说过吗：“中蒙终久是会合在一起的，不过他的实现，至少要在中国打倒军阀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势力，能建立一个真正共和国家的时候”。我现在更可申说一句：中国如果一旦有个为自由与独立而奋斗的政府出现，与劳农俄国联盟来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那末中蒙民族马上就到“合力抵制”的阵上来了！

振宇代答

（载《向导》第13期

署名：振宇）

附：

读者来信

君宇先生：

今日的中国，差不多变成一种国际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本国军阀的抢掳场了！什么“平等自由”、“国民自决”，都是一种口头禅，全国的人民天天象在十八层地狱下过生活！贵报同人，竟

能在这黑暗的中国，给人民一个很光亮的道路，创一种向导周报，全国人民没有一个不欢迎，不庆祝！前阅贵报第三期内，先生曾经登载有篇《国人对于蒙古问题应持的态度》，我于先生所主张的觉有些怀疑；但我是一个师范生，关乎普通常识，都还没有完备，那里配谈什么问题，不过我有了这种怀疑，不能不求一个彻底的解释，现在我把我所怀疑的写在下面，请先生指教，更望原谅！

先生说：“眼前我们公道的中国人，对于蒙古问题，应该和公道的日本人对于朝鲜问题一样”，这里我有点不赞成：宣统三年，孙中山、黄克强等大革命家，推翻满清专制帝王，另外合汉、满、蒙、回、藏五族，组织一个大中华民国，族族有选举权，有自由权；这个中华民国，也不能说是汉人的，也不能说是蒙人的……，汉人不能受制于蒙人之下，蒙人也不能受制于汉人之下……，五族互相帮助，作共同生活。日本人待朝鲜，以苛刻的手段，汉人待蒙人，并没有这种情形。由此可知日本对于朝鲜，和汉人对于蒙人，根本是不相同的。至于先生说，“徐树铮取消蒙古自治，官兵奸淫掳掠”，我以为这不过是少数武人如是，难道我们全汉族人民也同他们是一样吗？他们这些武人，不仅对于蒙古凶恶横暴，就是对于内地汉人，也行一样的举动。

依“民族自决”来说，蒙古人本然可以独立，但是我们要问：蒙古有不有独立的程度？有不有自决的能力？蒙古是开化最迟的民族，知识当然不及他国，我们汉族乃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知识比之蒙古，一定要高过几层，一班学者平素所说的“民主共和”，都是一些空谈；新学家所说的新名词，无一不是模仿外人的皮毛，那里有甚么真程度呢？从此也可知道蒙古独立，未必就是

他们的本来面目？

先生说：“中国自己还伏在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交相压迫之下，收回蒙古是不是能保障这位兄弟不遭和他一样的命运？”这几句话，表面上看起来，固然是不错，我们要问：蒙古独立之后，谁能担保蒙古不为帝国主义所侵犯？现在日本无时不在打蒙古的主意，无时不在想吞并蒙古的计策。我想蒙古与我汉族脱了关系后，日本更好施行他的主义，蒙古就难免不为他们口里的肉，到那时候，我恐怕蒙古比现在还要吃苦些！蒙古在汉族之下，固且汉人不能保障他；但是五族合力来抵制帝国主义，那比单独一族要强得多了！所以我不赞成蒙古独立，蒙古独立，只能使我们五族灭亡，不能使我们五族健强。现在军阀虽然专横，五族的人民，可以结一个很坚固的团体，去推翻他们，建一个真正的民主国，这就是我所希望的。

宋先礼，十二月，八日，于常德

万国公民大会与 上海的裁兵运动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

外国资本家的新方法

殖民地政治运动的新形式

中国资本家：

还是跟着外国资本家走呢？

还是跟着中国国民党走呢？

河南土匪架去一些外国人后，旅居汉口的外国资本家曾开了一个“万国公民大会”，电请各国政府质问中国政府有无担保外人生命财产之能力。他们一度与在汉开会的商联合会接头之后，即派代表玛克、密尔等赴上海，要上海资本家和商人推举聂云台、余日章做代表，与他们“联合”对中国军阀作严厉之警告。玛克以万国公民大会会长名义向上海资本家提出下列成文建议：“近来中国财政紊乱，法律与治安不能维持……大会应催促中国政府对于中外人民之生命财产有适当之保障，谋法律与治安之恢复。吾人深信此事之根本原因由于自私的军阀主义所酿成，故大会应促成建设宪法政体，使武力归纳于民治之下……故吾人应努力进行下列二项：（一）军阀主义之消灭，（二）宪法政体之建设，（三）国家财政有适当支配而无侵蚀之弊。吾

人有此确定提议，即要求各地商会、中西舆论界、公私团体及个人，尽力造成公共舆论以达此目的。”（详见十一月二十七日《申报》）

上海资本家在外国资本家这样发启之下，以“主权”“自动”为名，就发动了一月以来裁兵运动的电报呼声。但英美机关报还以为不足，居然主张“革命”。最守旧、最反动的《字林西报》，居然说：“今日之事，非枝枝节节剿除匪党之问题，乃根本上肃清乱源之问题。前数星期之事，大损中国体面，凡自爱之中国人……既深知大损国体，当能唤醒彼等为一致有力之群众运动，使军阀政客不能不俯首听命……中国舆论断然业已激起，惜尚不即为急剧之行动……当满清时代中国人民具有此种确实之权力……民国成立，此权力似已消灭。苟不恢复，则中国之共和制度永为世界民治主义中之最大笑话……”（见十二月十六日《申报》）。

当《字林西报》——英国帝国主义在华的机关报——的记者说这些话的时候，仿佛他是一个主张中国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仿佛他忘记了十年以来英国帝国主义妨害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仿佛他忘记了最近两月《字林西报》屡次劝告中国资本家脱离国民党（因为共产主义者的加入）的破坏宣传。

这不是《字林西报》记者的善忘，也不是英美资本家的善忘；但是他们要用这个新方法——华盛顿会议的产物——把中国幼弱的资产阶级集中于他们号召之下，准备将来代他们掌握中国的政权。这就是帝国主义在殖民地政治运动中的新形式。

口头上还没忘记“主权”“自动”的上海资本家们，你们今后还是跟着外国资本家走呢，还是集中到中国国民革命党——如

我们所要求的，以排斥外国帝国主义压迫为第一任务的党——
的旗帜底下来呢？

（载《向导》第14期

署名：和森）

双管齐下的国际帝国主义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

近日英文京津《泰晤士报》载称，驻京各国使馆，鉴于中国情形之危急，“深为忧虑”。刻已分别致重要海电于其本国政府，略谓：中国政府，缺乏责任能力，在行政财政各方均然。凡在中国国内有利益之各国，当此之时，不能更无所动作，现在中国国内，布尔塞维克主义流行；人民在军阀主义压迫之下，怨声载道；政府所欠各种外债，仍未偿还；政府官吏薪给，积欠不偿；公共事业，废弃不治；兵士被迫，流为盗匪；灾荒深重，账务棘手；国内战事，日有所闻；国会终日争攘政权，不问他事；工人罢工时作；内阁几无时不在变动。使馆鉴于情形之危急，特提议敦请各国合派一委员会来华考察，救济本国之利益，而救中国人民之艰难，俾中国得返其原状。

同时伦敦、东京各帝国主义的机关报齐声动员，鼓吹本华会决定的“共同政策”，迅速到他们所称“为将来世界第一市场”的中国“建立一稳固政府”。并说：“外国或将为势所迫而与督军直接交涉，如此则势力范围又将发见”（见路透社本月十六，十九，二十日等电）。

但是我们试从他方面来审查这几个月内国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行动：资助陈炯明割据广东；大卖军械给张作霖；放出安福

祸首作乱；扶植青岛的土匪；最近美国帝国主义者还密运六架飞机给直系军阀。

他们这种双管齐下的方法，还有“华会决议”做根据呢！

（载《向导》第14期

署名：振宇）

舒尔曼、陈炯明、张绍曾 与联省自治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

民主主义的叛徒陈炯明，近日对粤报记者发表他“改造中国之主张”，主张行联省制度，他要“令各省得竞争于自治一途，俾各省发展其民治之精神”，并说在联治制尚未实行之先，“须由国会制定一种国宪以为之保障，免为破坏联省制度者之借口”。

同时美国公使舒尔曼，在济南演说，鼓吹“好政府”和联邦制，遥遥为陈炯明的声援。张绍曾对议员们宣布的五项政见，也特别标明容纳独立各省份的意见以谋“统一”，所谓独立各省份当然是指广东，湖南，浙江，东三省等。所谓容纳意见，当然是容纳联督割据的意见。这中的消息，读者可以猜着罢。

(载《向导》第14期)

署名：振宇)

英国资本家退款兴学的用意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

伦敦十四日电：《泰晤士报》登载北京访员发来劝英国退还庚子赔款充华人教育经费之文，略谓美所抛弃者，英国必不可再取之。移此兴学，既利人又利己。苟不牺牲，则在此世界最大商场与他人作振兴商务与谋取好意之竞争时，难保不受大影响。吾人无所行动以直接维持英人在华人中之势力，而美、法则以取诸中国之金钱，作大规模之宣传运动……（见京沪各报）。这就是英国资本家退款兴学的用意！

劳苦的同胞们，我们试回想二十几年前的庚子年：英美各国的强盗们屠杀了我们无数千百的反抗帝国主义的苦同胞，又榨取了这笔淋漓的巨大赔款，这笔赔款的来源，就是全国劳苦群众的血汗。他们榨取这么多年以后，现在又相竞拿着在中国的智识阶级中来制造他们各自的奴才，为的是要永远为他们统驭中国的劳苦群众！

（载《向导》第14期

署名：振宇）

洛桑会议与土耳其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七——三十日)

土耳其的胜利——由反抗外国帝国主义的群众英勇奋斗得来的胜利，现在在洛桑会议中完全丧失无余了！

安戈拉国民党战胜希腊之后，我们曾经说：假使他仍然立脚在群众势力上面，借这次胜利的优势使被压迫群众对于国际帝国主义的反抗愈益横厉无前，并且始终与苏维埃俄罗斯结合，不为法兰西帝国主义虚伪的外交政策所摇动，那末，他一定能得到最后伟大的胜利（参看本报第三期《祝土耳其国民党的胜利》）。这种假定的反面，不幸就是土耳其现今复陷于帝国主义恶魔的外交圈套中，以断送其胜利得来的命运之预言！

当希军完全解体时，英国在波斯波鲁斯海岸的军队完全没有抵抗土军前进的能力，君士坦丁堡势已成为安戈拉军队伸手可得的“胜利之果”，急得鲁易乔治魂不附体，乃发出请求各殖民地出兵救援的通牒（九月十六日）。这是何等的好形势呵！据路透社九月二十八日伦敦电：现君士坦丁堡局势，极形危急，土军各师团均聚集于意斯米，进迫该城，城中恐不免响应，且亦不适于防御，如被袭击，协约军或当退至加烈普里，防守海峡云。又柏林电：土耳其陆军约七军团，能战之士十万人，并得希军军械甚多，还可募集精兵五万人。所以鲁易乔治外貌上虽装作准备宣战，

骨子里乃是最怕这一着的。

胜利的土耳其，怎样会丧失这种机会呢？因为基玛尔中了法国帝国主义者波益龙(F. Bouillon)的鬼计，波益龙是携带普恩贲与维尼齐洛协定的计划去运动基玛尔的。试看十月初旬上海《申报》所载君士坦丁电：基玛尔将军，经法代表波益龙之疏通，允于开议和局之际停止军事行动；又巴黎电：基玛尔与波益龙晤谈后，拟于十月三日在墨达尼亚开军事会议，以规定撤退中立区域与塞拉斯军队之进行方法。同时巴黎帝国主义报纸齐声赞颂挽回近东危局为法国“和平”政策之成功。实际就是鬼计无穷、往来巴黎伦敦之间的老妖怪——维尼齐洛的成功。由墨达尼亚会议到洛桑会议，基玛尔抛弃群众所要求之民族独立的军事行动，天天与帝国主义者作公开或秘密的谈判，以为利用英法间的暗斗，可用亲法的外交手段达到他所代表的要求；并且为践法土间的秘密互诺，对于联立战线——土耳其国民党与共产党反抗外国帝国主义的联立战线——中主张反抗一切帝国主义到底的共产党加以尝试的压迫。

英法在近东的利害冲突是人人知道的。英法对土政策那点不同呢？英国是始终要谋分裂土耳其，使他一天一天的削弱，以巩固英国掠夺地位。鲁易乔治虽然下了台，这种政策还是没有改的。法国是操了战前德国对土的政策，要在土耳其培植一支强固的军事势力以反抗英国，并使土耳其外貌上为独立的国家，而实质上为法国的殖民地。英国与土耳其的关系，比日本与中国还更坏；法国对土耳其模仿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故法国银行资本在土耳其占了最重要的地位，土耳其外债的百分之七十借自法国各银行。法国为买土耳其的好感，并为撕破不利于自己的绥

佛尔和约计，曾首先对土撤兵，使土耳其排英空气愈益浓厚。但英国屡次宣言，倘法不停止这种政策，英国亦将在欧洲大陆（德国）制造排法空气以为报复。所以法国近东政策中，也就分了米勒兰与普恩贲两派。米勒兰主张近东问题对英让步，以为榨取德国赔款之交换；普恩贲代表银行资本的利益，所以对于近东问题不肯退让。但巴黎资产阶级的舆论，除《时报》外，多数赞成米勒兰，以为取得德国赔偿比近东利益更为重要。故现在洛桑会议中，英法及其他帝国主义者仍以“协约国”名义，共同宰制土耳其。我们且把洛桑会议中最重要的五个问题分析一下：

第一是摩塞尔(Mozul)问题。摩塞尔问题是君士坦丁堡问题的背影，是英、法、美明争暗斗的中心。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争夺煤油。必须了解这种煤油的争夺，才能了解英、法、美在近东冲突的真相。世界最著名的米索不达米亚煤油，就是属于这个摩塞尔省。

一九一四年开战以前，英国曾与德国资本家及土耳其政府秘密协定米索不达米亚煤油开采的分配：英国得百分之五十，德国资本家和土耳其各得百分之二十五。大战中，一九一六年，英法复订立密约，许法国在摩塞尔占优势。战后英国皇家煤油公司与法国政府曾经长期密商。一九二〇年四月十五，复订立协定，就叫做桑莱摩(Sun Remo)协定。这协定的内容，系按照一九一四年的比例，英国把德国那份送给法国，而自己兼取土耳其的那一份，换句话说就是：英国得米索不达米亚煤油百分之七十五，法国得百分之二十五。但法国是很不满意的，全国资产阶级报纸都动员起来反对，说：英国这样对待法国，简直是把法国当作殖民地看待；法国战前每年须从美国美孚煤油公司买入四十

万吨，战后增至一百万吨，年费二十万万佛郎；今英国缩减大战中的许诺，法国为经济独立计决不能甘休云云。

桑莱摩条约签字，在美国业已退出欧洲政局和威尔逊下台三星期之后，但美孚煤油大王一闻信息，狼叫虎号，立令国务院向英国提出抗议，并反对国际联盟英国代管摩塞尔的决议。于是暗中就形成了“世界的煤油战争”。最后英国只得把摩塞尔油田重行瓜分，令法美各得百分之二十五。但法美依然是恨恨不平的，所以美国近东政策常与法国一致以反抗英国。现在洛桑会议的幻剧完全建立在这种黑幕之上。美孚煤油公司派代表汉米顿(Hamilton)出席于会议。黑幕中怎样瓜分油田，外间秘不知道，惟莫斯科十二月十一日电：据洛桑消息，美国代表对于近东石油问题异常注意。英美双方均欲掠取米索不达米亚油矿，现方暗中接洽，真情无从探悉。惟据报端所载，美国将与英国共同采取摩塞尔油矿。英国可得产额百分之二十。法国态度颇属暧昧，对于英土双方均表示好意云。

至摩塞尔问题关于土耳其本身，就是领土与政治经济独立的枢纽。摩塞尔居民的大多数属于土耳其，但英国乃一刀将他和土耳其割断，建立一个英国保护的小王国——伊拉克(Iraq)，于十一月初结立英伊联盟条约。据路透社十二月十六日洛桑电：“英代表以意见书送交土代表，说明摩塞尔不能脱离伊拉克之原因，谓摩塞尔土人仅占全境人民十二分之一，而经济上惟伊拉克与叙利亚是赖。若以军事言，摩塞尔让与土国，则巴格达(也是英国制造的小保护国)与伊拉克将无险可守，国将分裂。英国受代管之义务不能放弃，而伊拉克不能分割云云。土代表听之大为失望”。完了，土耳其民族独立的枢纽，就被这些“失望”

的官僚送掉了！

第二是君士坦丁和海峡问题。这个问题有三层的重要：第一，他是土耳其民族的咽喉；第二，他是煤油输出的孔道；第三，他是俄土联合的要害。所以这个问题不仅在政治上军事上为重要，尤其因为煤油问题而更重要，因为他是米索不达米亚、罗马尼亚、巴库等一切煤油出口的锁钥。在煤油问题未妥协前，法国自然乐于坐视土军向君士坦丁进逼到某种程度，使鲁易乔治狼狈不堪。但根本上，法国和英国一样，土耳其民族是他们所要永远奴隶的，米索不达米亚煤油是他们所要尽量瓜分的，反帝国主义的劳农俄国是他们所要竭力防御的，所以君士坦丁和两海峡始终是他们所要共同管理的。他们必须永远扼住土耳其民族的咽喉，才能永远奴隶土耳其民族；他们必须不放弃这种共同的管理权，他们手中才有共同奴隶土耳其民族的工具。所以他们在洛桑会议中，板着毛脸，仍以“协约国”名义，坚执共同管理或国际联盟（专事宰制弱小民族的强盗联盟）管理的办法。最初土代表伊斯美自然与苏俄代表拥护土国主权和独立的主张一致，并向克松（英代表团领袖）提出对案：（一）拒绝一切军舰通行海峡，（二）将海峡管理权交还土国。据路透电说：“土代表尚未完全陈述一切，致为克松所呵斥”，这就是表示帝国主义者用“平等”态度对待土耳其的礼貌！美国帝国主义者季尔德更不客气的宣言：“世界各公海，美国皆欲驶入之。凡美国人民或商船可往之地，若不容美国军舰驶往，以行使‘和平’职务，则非美国所乐闻”。准备让步的土代表，经克松“呵斥”和几番秘密谈话之后，便与俄代表携贰，承认协约国所提出的共同管理办法“可据为继续讨论之基础”！十二月十八日，俄代表复提出新对案：（一）外

国军舰不许经过海峡，惟遇特别情形时，土国可准潜艇除外之小军舰通行；（二）土国可埋水雷或施行他种海陆军方法，以确定其主权；（三）国际海峡管辖委员会以土人为会长，而其组成分子应为黑海诸国及德、美、英、法、日、意之代表；（四）签约国须承认黑海诸国非公开之海。这个新对案，据路透电报告，说是惹起克松的“大愤怒”，谓“法意代表皆谓世界正伫俟此会的结果，此会既已进行至日前地位，断不能再从头议起”。

十二月二十日路透电又接着报告说：“洛桑会议决裂之恐慌现已消除，克松回寓时面有喜色。有问其会议将决裂者，克松笑曰，土代表已表示极和顺之态度，俄代表在会议中已默不作声”；又二十二日柏林电：“洛桑会议，自土代表伊斯美对于协约国提议中各要点让步后，该地空气颇呈和平气象。英外相克松云，深望土国与协约国间意见分歧未能谅解之处，能由私人谈判调剂之（注意！）”。这样看来，安戈拉政府关于海峡问题业已“极和顺”的向协约国投降了，英国帝国主义者还有什么不得意呢！

第三是少数民族问题。协约国在近东标揭所谓“保护”少数民族问题，实际就是英国帝国主义分裂土耳其的政策。这种政策，一面因为法国对于英国的让步，一面因为美国帝国主义要步英国后尘，得到某几个所谓少数民族的管理权，故在洛桑会议中格外进行得顺利。我们看看下列路透电的报告，就可知道英、美、法、意各帝国主义者，怎样合伙在洛桑会议中宰割土耳其了：十二月十四日洛桑电，土国已承认协约国关于少数民族之会议，克松强硬之态度得法意之援助，遂得胜于洛桑，土代表伊斯美已依允协约国所要求之各点，惟为阿米尼亚人创一国家之议，则遭拒绝；又洛桑电，少数民族股员会之今晨会议，颇为美满，此乃克

松态度坚定所致，土代表完全改变其观念，而切实允加入国际联盟，克松乃表示满意而退；又电，昨晚少数民族股员会散会后，与会诸方面极为活动，冀免决裂，英、法、意代表出入不息，逾夜半始已，大约美代表季尔德斡旋最为有力，季尔德与伊斯美晤谈良久，力劝其和缓从事，当时伊斯美沉默无多言，并未表示从违，但观今日土代表之依允，则季尔德运动解决少数民族问题之有效，亦从可知已，今日散会后发表公报，谓克松发言，对于伊斯美之言论，颇觉满意，而土国愿加入国际联盟会之说，尤可欢迎，法意代表亦各发言，意思相同，此后股员会乃办理细则；又伦敦电，土国在和约告成后加入国际联盟之决议，已使洛桑之紧张空气大为松动，大会日期可望因以缩短，而完全谅解亦可望速成，盖任何问题如有相持不下之处，可照少数民族问题办法，交联盟会办理也。协约国帝国主义者在洛桑会议席上这样轻轻快快的宰割土耳其之后，还要请土耳其入他们的牢笼（国际联盟）呢！

第四是治外法权和监督财政问题。这类问题，协约国帝国主义者最怕苏俄参加，为的是要把土耳其宰制得无声无臭，所以最先就把洛桑会议的议事日程分成为两部分，只许苏俄参与海峡问题，而不许其参与对土缔构和约问题。因此，土代表关于这类问题在会议所受的欺凌，比较海峡问题更为痛苦。据十二月三日路透电报告：委员会辩论治外法权等优待条件时，土代表伊斯美将军称，土国可自行取消此种权利；协约国代表则谓协约所赋之权利，不能由一方面任意取消，必须有他种担保而后可；美代表季尔德称，如遇法律困难，美国将不得已而与协约国立于同样之地位；日代表林权助称，日本曾久受治外法权之苦，故表同情于土国之要求，但日本筹拟新法律，历二十年始告成功，土国

必须经若干年筹备，方能制定可获协约国充分信用之新法律云；林权助主张土国与他国相互让步。这就是表明协约国帝国主义始终不肯承认土耳其的主权，始终不肯承认土耳其的法律，始终想要以土耳其为他们的奴隶。即如常常带着假面具以欺骗远东和近东弱小民族的美国与法国，对于这问题所发出的无耻议论，与英国帝国主义者没有两样。至于监督财政一层，协约国虽然另提所谓担保条件以代替从前的投降条款，但这种担保条件的苛刻比投降条款还更严厉。我们试看十二月二十八日路透电的报告，就可知道协约国帝国主义者怎样在洛桑会议中合力打消土耳其撤废治外法权和监督财政的要求。路透社二十八日电：第二委员会讨论投降条款问题，已三星期，现竟莫能使土国就其范围，故于今日开全体会议，以意代表嘉洛尼侯爵为主席，会商三小时之久，协约国发明白之言论，美代表季尔德亦发有力之抗议；土代表伊斯美言论激昂，指协约国所拟之担保条件，较原有之投降条款尤为严酷；协约国发言人警告之，谓土国不能恢复第十四世纪之旧状；伊斯美在休会时，允考虑会场之言论；季尔德氏一再声明义务之不可放弃，谓美国表同情于土国主权，并希望土国进步，但主权含有最高之责任，日代表林权助称，伊斯美之态度殊为可惜，须知协约国之拟此计划，颇特别注重，恐伤土人情感，愿土人对于治外法权等事，能以日本为模范；英代表克松称伊斯美言论若斯，和局如何能成；法代表之警告，日代表之劝导，及美代表之声明，皆足动世界之听闻，世人一比较协约国代表与土代表之言，则是非自有公论。克松又痛陈土国司法及警政之缺憾，并劝土国慎思其目前态度及于对外贸易之影响，克松未称，土代表想尚未发其最后之言，如已发出，则进行会议何益

之有，今日会场言论，既非危词恫吓，亦非哀言求情，愿土代表勿轻视之云云。伊斯美在英、美、法、意、日帝国主义者协同的高压之下，已“允考虑会场之言论”了，然则土耳其撤废治外法权和监督财政的前途，又可知道了！

第五是希腊偿付赔款问题。这个问题除路透电报告土代表怨协约国袒护希腊和维尼齐洛提出抵赖的对案之外，还没有别的决定。将来协约国纵有点糖给在会议中甚么都丧失了了的土耳其吃一下，然而味道总是极稀微的。

然则土耳其在洛桑会议中所得的是什么呢？重新得了一副奴隶的枷锁和行将被迫而签字的投降条约！据十二月底路透电的报告，土耳其对于摩塞尔问题海峡问题等最后抗议的结果，已使协约国“忍无可忍”，一面已准备向土耳其下最后通牒，一面已动员令英国地中海舰队于二十八日开赴君士坦丁。胜利的土耳其，现在已是刀下的肉了，还有甚么话可说呢！当十一月六日，安戈拉国民议会议决交给伊斯美将军赴洛桑议和的大纲为：（一）土耳其疆界应与国民公约相符，（二）希腊偿付赔款，（三）取消治外法权等优待条约，（四）改定伊拉克边界，（五）土国在财政上政治上经济上之完全独立。这些条件，原是只有不停止九月间胜利的军事行动，与苏俄和反抗帝国主义的群众并力前进，方能达到目的，大早跑到帝国主义者外交的陷阱中去，结果自然只有陷于现今的悲惨地位。现在安戈拉政府只有两条出路：一是背叛国民公约向协约国重新投降；一是拥护国民公约，与英国决一死战。但是九月底以来军事上的优势英国早已布置妥当了，安戈拉的财政状况现已不能支持了；所以结果是哑子吃黄连，安戈拉政府只有饮恨向协约国重新投降一条路！

安戈拉政府为什么会陷于这样的境地呢？就是因为他前此所以致胜的对外政策和对内政策之动摇。这种动摇的具体表征，就是在胜利后与洛桑会议开会之前，一面显出浓厚的亲法倾向，一面对于共产党——土耳其民族反抗外国帝国主义的真正指导者——翻脸而加以压迫。这种变化表现出什么意义呢？就是表现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中之阶级抵抗。我们为使读者充分了解这变化起见，实有把土耳其国民运动的根源简单分析之必要。

在一九〇八年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以前，在大商业上占主要地位的为西欧资本主义的经纪人之非土耳其分子。革命后，青年土耳其党曾力谋削弱非土耳其分子的地位以巩固土耳其的少年资产阶级，但因屡次对外战争的失败，不能实现他们的计划。及欧战爆发，土耳其加入德奥方面，于是才给青年土耳其党以实现这种计划的机会。一时在“国民经济”的名义之下，以政府的帮助，创立一些雄大的商业组织银行组织；土耳其少年资产阶级在那两年极端发展的情状之下，要算完全战胜了西欧资本主义代理人之非土耳其分子。但战败后，又完全恢复旧态，一切“国民经济”的投机组织皆随着协约帝国主义的压迫而消灭。他方面，劳苦群众经大战破产之后，忽经协约国加以武力占领的侮辱，榨取赔款的重税负担，以及日常生活的昂贵与缺乏，遂激起真正反抗西欧帝国主义的感情；自士麦里为希军占领之后，这种反抗的感情愈益激烈，全国一致，自动的纷起叛乱。聪敏的土耳其资产阶级，遂利用这种民众的不可思议势力以反抗协约国。素来反抗西欧帝国主义的青年土耳其党之旧领袖，既因大战中种种投机与失败的政策而失了民众的信任，于是应时而起的基玛

尔将军遂接着青年土耳其党的遗产，为反抗帝国主义的国民运动新领袖。

因为民众和劳农俄国的帮助，安戈拉政府就到了确定不移的胜利路上。但胜利的形势一经形成，阶级抵抗的意识随着表现；代表土耳其资产阶级的安戈拉政府，以为既借俄国帮助到了这一步田地，全国劳动群众与苏俄的关系日形深切，则于土耳其资产阶级将来的存在终属危险，遂想渐采疏俄亲法之方针，因而深中法代表波益龙的鬼计，不久就有逮捕共产党之事发生。基玛尔这种举动，不但对于共产党为罪恶，对于国民运动也为罪恶，险些儿成了自杀的政策。因为国民军是劳动群众组成的，苏俄与共产党在劳动群众中的影响，已是根深蒂固而不可拔，伤了共产党的感情就是伤了国民运动的中坚势力，因为历史的事实早已证明土耳其资产阶级是没有单独组织反抗帝国主义之势力的。共产党之所以帮助国民运动，就是因为反抗帝国主义于东方无产阶级为重要，于世界革命为重要。安戈拉政府若自己拆坏他的墙脚而与西欧帝国主义妥协，共产党便可用他自己的名义来号召不甘屈伏的伟大群众，一面反抗外国帝国主义，一面推翻背叛国民公约的卖国政府。这样一来，安戈拉政府是没有存在之余地的。

现在洛桑会议，土耳其虽然完全失败，但一面给基玛尔政府领略亲近法国帝国主义的新教训，一面给土耳其民族以重新估定前此致胜的对外对内之旧方针，亦未始非土耳其民族解放厄运中之一转机。据近日路透电的报告，安戈拉国民议会的议员在议会中大骂代表现在对土政策的鲁易乔治与克列满梭；又莫斯科二十一日电，近东会议，法国颇占重要位置，但态度始终暖

昧，暗中与英携手侵略土耳其主权，故土耳其人对法日趋冷淡，土耳其国民党对法尤示愤懑，听称法人每高唱法土亲善，纯系无诚意之论调云云；又十二月二十六日波多电，土耳其代表反对请美国代表团列席少数民族副委员会，这就是表示土耳其人民及安戈拉政府对于英法美国同样不信任的新觉悟。

又莫斯科十二月二十五日电，新任土耳其驻俄大使穆克哈贝氏 (Muktar Beg)，昨已行抵莫斯科，谒见苏俄执行委员长加李宁，呈递证书，并发表意见，略谓俄土两国邦交日臻密切，西欧强国虽竭力从中破坏，但俄土邦交并未因是稍见摇动，一九二一年莫斯科俄土条约已开两国亲善之端，本人将尽力促两国前途进步云云。这就是基玛尔政府饱经国际帝国主义和洛桑会议的欺骗，压迫，屈辱之后的老方针新倾向呀！也就是土耳其民族解放前途的光明呀！只要基玛尔政府反抗帝国主义一日，苏维埃俄国便要帮助他一日的！

(载《向导》第 14、15 期)

署名：和森)

国民运动与太上国民运动

(一九二三年一月十八日)

告沪汉资本家

一月五日,《申报》有两个专电:一个说,汉口青年会干事密尔根据全国商联合会废督裁兵决议案,萧日来津运动各团体协力进行,已得要领,密氏肴日晋京;一个说,各国记者以汉口商联合会等一日通电裁兵制宪理财,认为中国“真”民意,今日分电各国外交团,颇重视此举。前电是继续证明外国侵略家处于沪汉商联合会政治运动的原动地位,后电是制造空气捧台的。中国承外国侵略家的照顾,东交民巷有太上政府,沪汉间又有太上国民运动了!

沪汉商人若还有民族精神和爱国观念,便应尽快从这种可耻的外国侵略家的圈套中跳出来,一律聚集于国民革命党旗帜之下去进行他们种种政治的要求。惟有国民革命党是沪汉商人的政治领袖,沪汉商人惟有在国民革命党指挥之下做政治运动才不丧失国民精神。京沪商人从前反对国民党的态度现在是当改变的,《字林西报》教唆资产阶级分子脱离国民党的鬼计(参看本报第十四期)是不可听从的。

由历年的事实明证:外国帝国主义不打倒,由他们时常售械借款所扶植的军阀势力是不会消灭的,中国民主主义政治是不

会成功的，废督裁兵理财等等也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看得这种道理透彻，所以与国民党成立国民革命联合战线，换过说，就是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这样的联合战线，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以及全国人民，都是必要而有益的。倘若中国资本家和商人不急于了解这种政策之必要，不信从国民党——最近发表宣言，认中国为列强殖民地及主张改正各种不平等条约的党——而信从外国侵略家，这不但羞辱了全中国人民，而且“中流阶级”自身将负经济掠夺与背本媚外的两重怨毒，结果只有迅速的激起无产阶级革命。

（载《向导》第16期

署名：和森）

外力、中流阶级与国民党

(一九二三年一月十八日)

一月七日北京各报载孙中山语往访之东方通信社记者云：最近外国新闻有谓中国统一须加入外力，又有谓须待中国人自身之自觉，如中流阶级之实业家尤须奋起等主张，固不待论；但无论加入外力或实业界奋起，如将予等国民党视为度外，总不能得真正统一。

中山同志这段谈话很有趣，他在这几句话中，不仅揭穿外国侵略家一面高唱外力干涉，一面鼓吹中流阶级奋起的阴谋，而且表现外国侵略家排斥国民党制造变性的国民运动的鬼计。

中国国民运动的真意义在反抗国际帝国主义，因为国际帝国主义既是压迫中国的仇敌，又是军阀存在，国家分裂，内乱永续的原动力。这种运动的要素，除占人口最大部分的工农阶级外，当然同被外资压迫而不能有多大发展的幼稚资产阶级——即中流阶级也是一种重要的要素（如上海在大战期间发展的纺纱业，现在又几乎被外资压倒了）。从旧的历史看来，领导中流阶级向国民运动走的有中华国民党；从新近的历史看来，领导工农阶级向国民运动联合战线上走的有中国共产党。但今后那一阶级为这个运动中的真正主人，便看谁最忠实于反抗国际帝国主义。外国侵略家制造变性的国民运动计划中，不仅是要把国

民党除外，而且是要把国民党根本推翻。这种推翻国民党的方法，比之资助袁世凯、陈炯明的方法还更厉害！所以国民党更应与共产党亲密的联合前进，而中流阶级更应明了大义，焕发民族精神，不要数典忘祖，附属于外力而听其指挥！

（载《向导》第16期

署名：和森）

美国资本奴隶中国的新计划

(一九二三年一月十八日)

纽约七日电：现在美国资本家拟在华发展巨大实业，已组织一商行，名为中国企业公司，该公司将以两种辅助事业，作为先导，一在华设立多数工厂，一在华开办影剧场二千所，工厂当雇用华工，并制造丝线品；影剧场则拟向华人表演西国之生活、职业及管理法云。又华盛顿六日电：六日《纽约日报》载五日纽约中国协会会长加列氏招待周自齐，开晚餐会，席上将美国“治梵特布列的伊”及“丢克”新大财团维持下成立一中国企业大商业公司(资本金未定)之件，为之发表，该公司得□□(电文不明)之特许。由其规定条款，事实上得从事于一切商业的活动，同时并组织优尼巴沙尔织物公司(资本九百万美金)，德拉刚电影片公司(资本五百万美金)为子公司，前者以周自齐为总理，在上海制造绢棉布，贩卖中国各地；后者以佛兰克轻巴廉为主任，拟在中国二千之都市设立影戏馆，并于中国官立学校，说明西洋生活、实业及政治状态。此外尚拟组织玻璃、陶器及汽车等制造公司，由美人监督，而使用中国工人，母公司理事，美人方面为前英美烟草公司之特马斯等五名，华人方面为周自齐、王正廷、张謇等八名云。

这个消息就是表明中国官僚与外国资本的勾结，又是表明

外国经济的侵略主义之另一种方式。外国帝国主义者这种经济侵略的新方式（扶植一班奴性的官僚资本家如梁士诒、周自齐、曹汝霖、王正廷等，使之代替外国资本出面以掠夺中国的财富），与他们在政治上想扶植沪汉资本家的新方式是相表里的。

此外我们还得一种确实消息：美国资本家在新银行团阻难解体的情势之下，业已决定换过方法，扶植中国银行界，组织资本异常雄厚的“本国”银行和银行团，以垄断中国政府借款事业和投资事业，并极力主使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政治运动，由此以“国民共管”的方法代替国际共管（这说已见上月京沪各报），避免能挑起民族反抗精神的恶名，而暗达国际共管之实际。

（载《向导》第16期）

署名：和森）

美国供给奉张军械与 上海总商会的希望

(一九二三年一月十八日)

近日上海总商会拍一请求电给新银行团及各国资本家说：各国政府，前以友爱中国促进和平之诚意，议决在中国未统一以前，勿作政治借款，勿售军用物品，中国国民对于两项决议至为满意，深盼贵银团贵商会转告贵国金融机关及商人，对此两大主义切实履行，视为信誓，本会谨当代表中国最多数人民之心理，向贵银团商会表示无限之感谢。

总商会这个电报发出不到两日，北京各报又发见美国大售军械给奉张的消息。在中国商人看来，美国不是“友爱中国促进和平”之首倡者吗？诚哉不错，他在这两个月中，一面运送六架飞机给直系军阀，一面又接连不断的接济下面所载的军用品给奉张，真不愧为友爱中国，真是有促进中国和平之“诚意”！现在把北京各报所载的消息录下：

日人方面奉天八日特电云，自张作霖积极购办军械后，各国对张氏运动售卖军械之举，已渐次激烈，并愈形露骨，最近张作霖所购之军械，订有十二月八日由天津西门子公司之携带电话机二十六个，包皮露线五千密达，价值总额五千两，又由美国大来洋行购入皮帽及官服十六万件，价值一百万两，不日即将运

到,此外奉天美人经营之某洋行,亦由天津美商惠志洋行购办火药,卖与奉天兵工厂,此事如能成功,今后当陆续运来售卖云云。发出这个消息的中国通信社,加着说道:按此为日人方面消息,对于日本方面供给张氏军械之事实,自然讳莫如深,然而日人与奉张为最接近,其运动之力十倍于各国,其暗中供给张氏之军械军需,自亦较各国多十倍也。

〈载《向导》第16期

署名:振宇)

全美舰队集中太平洋

(一九二三年一月十八日)

当一九二一年华盛顿会议之前，日美战争的形势日见紧张，美国帝国主义者即倡全美舰队集中太平洋之议。但这种计划的实现，首先要打消英日同盟，次之英美间要成立一种默契。华盛顿会议后，英日同盟虽已打消，但英国对于将来日美战争究竟加入那一面，直到鲁易乔治下台时还犹疑没有决定。

英国亲美派的保守党内阁成立不久，现在美国政府决定将大西洋太平洋两舰队合并而集中于太平洋的消息已传出来了（见上年十二月底京沪各报），日本帝国主义者在这种威胁之下又慌忙的筹备抵制了。全美舰队集中于太平洋的事实：一面表示英美间的默契已确定；他面就是表示第二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已紧迫的向远东各民族示威！

（载《向导》第16期

署名：振宇）

关税主权与外人代管

(一九二三年一月十八日)

九日《申报》载一短评云：“甚矣主权不可属于人也！区区一关余耳，既留以抵到期不付之外债，复留以拨争持不决之赔款；且即以庚子赔款言，在我方以参战微劳，意欲求为无期之展缓，而五国促请注意到期之咨催，几若丝毫不容展缓者然，今更以金法郎之争持，致十一年关税余款，政府虽欲希望稍拨，而无可如何，斯亦足以见主权之所在，不容轻让于外人者。而奈何方饮鸩自甘，日夕以客卿代管为得计？曩昔之越俎姑置勿论，近更进而不已，且将于新税则实行，另由债团照会，谓今后外债未结清时，无论任何用途，中政府不得肆意指拨。夫以明明我国固有之关税，而公然假债团之名，行共管之实，以此日代管关税之客卿，异时即司监督外债之职责，且甚其词曰不得肆意指拨，果置我国主权于何地乎！此更足以见久假不归之非计矣！”

这个短评很不错，很足以表现上海一部分商人的民族精神！

（载《向导》第16期

署名：振宇）

陈炯明的失败

(一九二三年一月十八日)

据近日滇桂联军节节胜利的形势看来，陈炯明的失败是一定无疑的了。这个国民革命的叛贼，自上年六月以来，公然背叛革命，借英国帝国主义的后援，拚命的推翻孙中山；并将关系中国民族解放前程的中俄德联盟计划盗卖于香港政府；又极力经营西南各省联督割据的形势，以适合英国帝国主义在珠江流域和扬子江上游的需要。所以这样一个国民革命的叛贼，在我们看来，不仅是孙中山一人国民党一党的仇敌，乃是中国全体人民的仇敌，这个民族的叛贼在广东存在一天，就是英国帝国主义的势力在南中国伸张一天。

上年陈炯明的胜利，就是英国帝国主义的胜利；现在陈炯明的失败也就是英国帝国主义的失败。他的失败影响：第一是国民革命的势力仍得伸张到珠江流域与英国帝国主义直接抵触；第二是打破便利于帝国主义瓜分宰割的联省自治之局势；第三是向目前的反动政局与以间接的打击。所以陈炯明这个叛贼的失败，在中国国民革命史上，值得大书一笔！

（载《向导》第16期

署名：和森）

赔偿问题与帝国主义

(一九二三年一月十八——三十一日)

一九二三年资本主义世界开始的现象：一面美国舰队集中太平洋；一面法国十二万大军进占鲁尔。这种现象，就是表现帝国主义战争在资本主义的旧中心(英、法、德)和资本主义的新中心(美、日)同时抬头向全世界人类示威！

赔偿问题所以至今不能解决，根本原因就在法国帝国主义、英国帝国主义、美国帝国主义之间政治经济的利害冲突。这种冲突，资本主义的自身，是证明没有方法可以解决的。

一九二一年春季，协约国以最后通牒强迫德国所承受的赔款总额为一千三百二十亿金马克。这个数目等于德国全国财富的半数，纵然分为三十年偿付，事实上是做不到的。照伦敦会议的决议，德国每年应付二十亿金马克。以一九二一年五月间每元值六十个纸马克计算，二十亿金马克等于二百八十亿纸马克。德国交付第一批赔款后，纸马克价格异常跌落。开恩斯会议虽把一九二二年二十亿金马克之数减为七万二千万金马克，但以当时跌价之纸马克计算，七万二千万金马克等于五百一十亿纸马克。实际上偿付额不仅未减，而且增加。当时德国希望国际借款成立，但美国银行家宣言：凡尔赛和约中的经济条款不修正，美国拒绝借款。由此纸马克更大跌特跌，八月初，每元值八

百马克以上。即以七月间马克价格计算，七万二千万金马克约等于八千亿纸马克，即偿付额由二百八十亿纸马克增至八千亿纸马克。德国是绝对没有这样偿付能力的，所以法国同时要求偿付货物，先后与德政府及德资本家私人订有威白登（Wiesbaden）和史丁纳（Stine）（德国权倾国家之钢、铁、煤大王）条约，尽量掠夺德国的煤、木、铁等。

当海牙会议还在开会时，德国正式通告赔偿委员会，不能清付到期赔款，请给他一个延期的许诺。那时马克更随着大跌，证据更加充分，使一九二一年三月伦敦会议种种决定，完全成为无效，于是各帝国主义强国间的利害冲突又集注于这点。

取消协约国间的债务问题，早已提出为解决赔偿问题的唯一方法。战前法国债额为二百九十八亿；一场大战的战费为一千七百亿；战后三年，债额总数为三千五百亿佛郎。法国欠美国债额为四百亿金佛郎，欠英国债额为三百亿金佛郎。据上年八月一日贝尔福通牒：德国欠英十四亿五千万镑；俄国欠英六亿五千万镑；协约国欠十四亿镑。英国欠美国的为八亿五千万镑。法国为英国的债户；英国为美国的债户；美国为全世界的债权国。

法国本为大陆上铁的资本主义国，战胜后，由凡尔赛和约掠夺德国煤矿三分之一，铁矿四分之三，于是更由铁的帝国主义兼煤的帝国主义而为欧洲第一等工业国，并且成为英国最可怕的敌竞者。英国经济地位，反降于与德国相竞之域；因为马克跌落，生产费低廉，英国不仅不能恢复德国为市场，德货反畅销于英国及世界各地。所以修改凡尔赛和约，成为英国必争的政策。英国早就对法国说：“或是还我的债，或是修改凡尔赛和约”。同时凡尔赛和约对于美国也发生同样不利的影晌，所以英国常与

美国携手以反对法国。

战后，世界资本主义的中心既由欧洲移于美洲，美国虽然也受凡尔赛和约不利的影响，但因一时国内市场还未恢复，并且即使输出多量物品于欧洲也只换得些不值价的纸币，所以宣言退出欧洲局外，不管他们的闲事。实际，他干与或退出欧洲的态度，全视他资本主义的需要为转移。一年以前，美国失业者曾达六百万以上，他的救济方法有两个：一是巩固国内市场（如增加入口税）；一是输出资本；而救济欧洲一事还非所急。

贝尔福通牒一面表示要索回法国的钱去还美国；一面表示如果美国放弃英国的债，英国也愿意放弃协约国间的债。这个通牒到美国，大受了美国舆论的反对。就是英国国内的意见也纷纭不一，自由党主张完全取消协约国间的债务，保守党也赞成，但有一部分债权者是反对的。美国是完全的债权国，所以反对取消外债；英国债权债务各半，所以主张取消；法国债务超过债权甚远，这种政策于他是很占便宜的。但因为美国反对，则贝尔福通牒无异故意加法国以压迫，所以由此成为美国压英国，英国压法国，法国压德国的形势。

赔偿问题是世界经济恐慌和混乱的主要原因。一面破坏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平衡；一面又为减少工钱，增加时间、失业、罢工、战争等现象的来源。德国在赔款政策之下：资本的蓄积，异常减低，虽无失业者而工人因营养不足、马克跌落、工资增加的比例低于物价增加的比例，生产力异常衰退；工人困苦日甚，几至不能买必需的生活品；马克每大跌一次，外貌上商业反大兴盛一次，但结果吸收不到现金，商人都将所得之现金存于外国银行；加以法国实施直接向工厂取偿货物之政策（法取货物于德工

厂,工厂向德政府要钱),史丁纳权倾国家,国家权力全被破坏。英国在赔款政策之下:失业者常在几百万之上;减低工资,使成本低廉,以与美、德货物相竞;因而罢工常起;工人阶级政治上的倾向日趋于左,如上次工党左翼在选举中的胜利,就是明证。法国在赔款政策之下:虽然掠夺了许多东西,并且失业恐慌不如英国;但因为德煤输入之故,本国煤业遂受严重影响,直至于今,法国北部煤的出产只有战前一半;此外各种偿付德货在国内市场之竞争,很与一部分工业家以影响,所以反对威白登、史丁纳条约的颇不乏人;法国资本家因此更减少工钱,废止八小时制;但这种方法英、德、美也同样的采用,结果仍是抵御不住;他方面,汇兑率常常随著马克的低落而动摇,财政恐慌因此愈益严重。

资本主义崩坏之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信任制度的动摇,现在欧洲各国差不多以纸币代替了金本位。德币不如法币,法币不如英币,英币不如美币。全世界几乎只有金融巩固的美国能买能卖,但美国也难于做买卖,因为美国银价比欧洲各国的高得多,所以出品的成本也高得多,因而在国际市场上反不能与金融低的各国货品相竞争,因此更不能将货品输出于欧洲。并且在赔款政策之下,马克跌价一次,美国的农产品(素来以欧洲为销场)也要随着跌价一次,农人虽然丰收,而穷困比前更甚;因而农党在美国政治上渐渐得势,最近政府党已分裂,而有要求承认苏俄和参与欧洲事件的急进党出现。

从经济的见地上讲,要救济资本主义崩坏,便须恢复国际间的平衡,要恢复国际间的平衡,只有两个办法:第一注销国际间债务;第二财富国(如美)借款给贫穷国(如德、奥、俄等)。但这种根本挽回资本主义颓运的方法,又始终为帝国主义(资本主义

的产儿)所阻挠而不能实现,无论德欠法债,法欠英债,英欠美债,现金偿付都是同一的不可能,所以货物偿付成为国际债务间的原则。假使债权国为生产低的国,那末索还许多货品自然很合经济的需要。现今事实不然,每一个债权国(如美、英)的生产量都比较他的债户高,而且生产过剩,所以索取一次偿付货品便增加一次人家和自己的经济恐慌与混乱。因而国际间的平衡愈益倾畸,即资本主义的本身愈益崩坏。但这种矛盾和危机,资产阶级自身和他们的帝国主义是不能解决的。今再把各帝国主义间的利害冲突详细分析出来:

法国赔偿政策有两种倾向。第一是铁业资本家的计划。这种计划要求占领莱茵河左岸和鲁尔流域,综合罗林的铁与鲁尔的煤,巩固法兰西大工业在全欧洲的优势,并在莱茵建立税关,操纵德货的输出与英、美货之输入;分离占据地与德国的关系,以武力屈伏德国为他的奴隶;最后目的便是分裂德国,使巴维亚等脱离普鲁士而独立,打破德国民族的统一,使德国降为完全无抵抗能力的殖民地,这就是拿破仑式的新计划,这就是从战胜中产出来的法国新帝国主义。

第二是国债票握有者——小资产阶级、农人、官僚们的倾向。这类人所最关心的就是法兰西的财政状况。法国虽无英国一样的工业恐慌,而财政恐慌是顶厉害的。这类人知道要使汇兑稳定而且进步,要减轻军费的负担,只有一个对德和平与亲善的政策可以达到。一部分出口工业资本家也赞成这种倾向,他们主张迅速恢复东欧市场。这种倾向虽遭狂热的帝国主义报纸攻击,却是一天一天的强盛。上年七月中,普恩资虽然凶光霍霍,却是受了这种倾向的支配。那时普恩资颇想用和平的方法,

利用德国工人做修复法国北部的事业，故一时盛传法国有一个和平解决赔偿问题的政策。据英报所传的内容，大约是英国注销法国的欠债（在美国放弃英债的假定上面），法国大减偿付数目，而使德国的国际借款可以实现。但是八月一日贝尔福的通牒一发，一夜工夫，普恩费完全转变到第一种倾向去了。

法国欠英三百万万佛郎（合法国总债额百分之十），欠美四百万万佛郎（合法国总债额百分之十五），而总债额为三千万万佛郎。若是取消了英国债务就等于把法国经济地位增进百分之十；英、美两债都取消就等于把法国的经济地位增进百分之二十五。可见取消国际债务问题对于法国是何等重要了。法国把什么做报酬呢？据坎斯(Keynes)等经济学家说，一点价值的报酬也没有。即使他注销比国欠法国的三十万万佛郎，但这是一笔落水账，本来是什么也还不出；即使他注销一笔相等（与英注销的法债相等）的德国赔偿，但人人知道这笔赔偿，除了不值钱的纸马克外，法国本来索不回这么多的（凡尔赛和约规定法国得德国赔偿总额百分之五十二）。

我们再看英国帝国主义。英国反对普恩费的政策，并不因为鲁易乔治与波拉劳而不同，因为普恩费的政策实现就是法国新帝国主义实现，将来英国工业不仅不能与法国竞争，而且经济上反将成为法国的隶属国。实际，英国帝国主义始终是要独霸欧洲，恢复德国势力至相当程度，防止法国拿破仑主义的复活；并且力谋和美国结合，集中一切生产手段于盎格鲁帝国主义者之手，以隶属拉丁各国、中欧各国及全世界的经济生活。他在赔偿问题中，对于法国虽然不肯丝毫退让，他的政策却是很细心很奸巧的。他一面怕法、德资本间有一种合作与妥协，所以对于法

国的强暴政策，每每故意任令他去尝试；一面又疑虑于德国经济状况太恢复快了英国将反蒙不利，所以对于注销国际债务是没有诚意的。其实从经济的立脚点看来，英国负担一点注销的法国债务，实在不算什么事。但是他决不肯白送这一笔人情，使法国增加一笔武装费，因为法国的大炮多半是准备向英国放的。

至于由大战新兴的美国帝国主义，如英如法都自然的降为他的经济隶属国，他的政策自然在巩固并发展这种世界的帝国主义之无上地位。他不仅要隶属欧洲那一国，并且极力经营下次太平洋战争的形势，因为将来太平洋战争就是决定他奴隶全世界的命运的。以美国的富力说，取消英法债务，真不过九牛之一毛；但美国始终拒绝将赔偿问题与国际债务问题混作一谈。修改凡尔赛和约，减少赔偿总额，是美国赞成并且主张的；但一谈到取消国际债务，他便声色俱厉的拒绝起来。他这种矛盾政策，与其说他是经济的理由，无宁说他是政治的理由。从哈丁、许斯、摩根（银王）及美国各机关报屡次的宣言和论调看来：美国注销区区国际债务与许诺国际借款去恢复德国的市场是可以的；但是间接被法国拿去增加他的海军（法国至今拒绝批准华盛顿海军条约），实现他的拿破仑主义，美国是抵死不会这样慷慨施恩的。

美国现在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债权国，是资本主义旺盛的新中心，他救济欧洲的设定，当然完全建立在自己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利益与需要上面，出于这个原则，他是不管欧洲的闲事的。任令赔偿问题经久不决，任令欧洲终久混乱，任令法国财政恐慌加甚和英国工商业恐慌加甚，于美国总是很有利益的，所以过去四年之中自然乐于冷冷清清的坐视旁观。但现在情形渐渐

不同了，上年下半年五谷丰收，国内市场巩固，不但近千万的失业数目减至零点，而且要修改移民律以吸收外国的劳力；所以农人阶级和出口工业家压迫哈丁政府不得不出来干与欧洲的“闲事”。故上年十二月以来，美政府又出头倡议召集国际经济专家会议以解决赔偿问题，意思是要纯从经济的见地来解决赔偿问题。但美国自身何尝抛弃政治的见地呢？我们试看一月三日华盛顿专电：“美国务卿许斯于新哈文地方演说，主张赔偿问题须委托一各国专家会议处理，由各有关系财政方面谋订适宜条约，勿以政治问题视之，如此方能得最后解决；但国际债务问题与赔款问题则须分别讨论”。这不是表现美国仍然坚持两重不相容纳的政治经济政策吗？

英国为半债务国，取消国际债务，于他本无不利，而且赔偿问题之解决为救济工业恐慌所急需；但他始终要滚着美国在一块，去阻碍法国帝国主义的发展，所以他仍愿永远负担并清偿（以货品偿付为原则，现在财政大臣包尔温亲赴华盛顿谈判即为此事）美国债务，而不愿国际债务一笔勾消以增进法国的财政地位。这就是英国始终保持矛盾的政治经济政策的背影。

法国以债务国地位，在理自然乐于取消国际债务，使德国举行国际借款，解决赔偿问题，救济自己的财政恐慌；但事实不然，他知道在英、美、德协作之下来这样的和平解决赔偿问题，结果一定是修改凡尔赛和约，根本推翻法国帝国主义既得的新基础；所以他紧咬牙骨，一意单独行动，进行他的强暴政策。因为如此可以一举占据鲁尔，再举夺尽占领区域的煤铁森林，三举勒令德国完全承认法国的偿付计划，并完全管理德国的产业与财政；所以他不仅不希望取消国际债务使德国成立国际借款，而且屡次

宣言：“如果国际借款成立，必须促德国将赔偿全额如数照付”。同时美国银王摩根也屡次宣言：“若是德国举行国际借款的意义等于是送给法国，则美国一文也不借给德国”。

由此我们可以断定：英、美、法各帝国主义间的利害冲突，是永远使他们不能操用一种一致的经济政策；资本主义世界的混乱、崩坏、恐怖、战争，是要一天一天严重的。

现在德国工商业的咽喉——鲁尔，已被法国帝国主义扼住了，这不但是扼住德国的咽喉，同时也是扼住英德、德美间经济关系的咽喉。法国帝国主义高声向他联合国宣言：“如果德人对于此次武力压迫依然漠视，协约各国惟有各自单独行动，索偿本国之损失”。这样一来，固然使英美帝国主义者敢怒而不敢言；但从别一方面观察，英国何以这次对于法国的约外侵略行动仍采容忍态度；美国何以仍采旁观态度（并宣言采旁观态度）；英美债务谈判（英财政大臣包尔温现正在华盛顿谈判此事）何以急于此时进行；法国国会何以于此时提议批准华盛顿条约；美国何以于此时撤退莱茵驻军（均见近日京沪各报）。由以上种种的分析，我们就不难推想英、美、法各帝国主义间现在钩心斗角纵横捭阖的鬼计与阴谋了。所以这次德意志民族的蹂躏与世界和平的动摇，不仅法国帝国主义负责任，英美帝国主义都应负责任；同时证明一切帝国主义的强国为全世界的和平与被压迫民族的仇敌。

全世界人民——尤其是工农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要从资本帝国主义战争的恐怖世界中解放出来，惟有促成西方的社会革命与东方的民族革命携手并进，实现世界革命的企图。自上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后，占地球六分之一的那一部分版图——俄

罗斯——已经不属资本帝国主义的范围了；而且苏维埃俄罗斯在这五年之中业已巩固了；同时东方的民族革命（如土耳其、印度、埃及、朝鲜、中国等）也渐渐的起来了，土耳其、印度等处的国民运动已一天一天向胜利和扩大的路上走了。这就是表现旧世界崩溃的历程中新世界一天一天诞生起来。所以中欧无产阶级和近东被压迫民族正在努力进行并巩固德俄土联盟；我们中国一切爱国之士都应起来号召中俄德联盟呀！

（载《向导》第16—18期

署名：和森）

赵恒惕降北与借款

(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四日)

近日京沪各报载赵恒惕派徐子贞赴京，与张阁疏通意见，以地方分权为条件，表示附北。

同时汉口消息又披露赵恒惕派员向英国扬子江银行接洽一千万大借款，允许该银行在湘发行钞票，吸收现金，并以地丁作抵押品。这两件事实，在三千万湖南人面前表现出联省自治的真相，不知湖南人作何感想？

陈炯明和英国资本勾结，赵恒惕也和英国资本勾结；陈炯明近日申明取消自主，赵恒惕也表示附北。真不愧为一对倡联省自治的好汉！

(载《向导》第17期)

署名：振宇)

各国供给中国军械的互哄

(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四日)

近日北京各报载称：“日本暗中运售军械军火于中国军阀，各国屡有烦言，不意日前公使团会议，驻京日本公使小幡氏对于此事竟反唇相稽，谓前者公使团宣言于南北未统一以前，暂不供给中国军械，日本政府守此规约，故将两国曩日所缔结之军械借款，暂断交货，免致使团方面之责斥；乃近据调查所得，近来中国各省军阀，向各国私自购置军用器械，似使团宣言毫不发生效力者，如最近天津英、美、法、意各国商人，皆有贩运枪械子弹入口，售与中国之高级军官情事，此种行为，甚属与国际公法不合；刻奉本国训令，对于日本商人之行动，严加查禁，但其他各国似取开放主义，而各国政府对于在津外商售械与各省听其私行配置，则日本方面亦难限制日商不供给军械与中国云云；各国公使，因此拟邀合各国，定一种协约，严切限制供给中国军械云云”。

英、美、法、意帝国主义者若是没有供给中国军械的事实，何不反驳日本帝国主义者这种“反唇相稽”的话呢？哼！“定一种协约，严切限制供给中国军械”，你们这样用惯了的掩眼法，可以永远欺骗中国人吗？

(载《向导》第17期)

署名：振宇)

四派势力与和平统一

(一九二三年一月三十一日)

本月二十六日孙中山先生发布和平统一宣言，略谓：“文于往年八月十五日发表宣言，对于国事主张使护法问题完成解决，以和平方法促成统一，对于粤事主张讨伐叛国祸粤之陈炯明……今者讨贼诸军已逐去陈逆而戡定粤局，则障碍既除，建设斯易，文于抚辑将士及绥靖地方外，当竭尽心力以敦促和平统一之进行……曩者法统之复亦可为时局一大转捩，诚得西南护法诸省监护匡助以抵于成，此时之中国当已入于法治之轨；徒以陈逆叛变，护法政府中断，而北京政府所为遂致任情而未及彻底，且以毁法之徒谬托于恢复法统，国会纠纷及今未解，而于人民所渴望之裁兵废督诸大端，反言行相违，不复稍应其求，而增兵备战之消息乃嚣且尘上……今之大病固在执政柄兵者未有尊重法律之诚心，而国中实力诸派，利害不同，莫相调剂，亦其致此之缘故。试举今日国内势力彼此不相摄属者率较计之，可别为四：一曰直系，二曰奉系，三曰皖系，四曰西南护法诸省。此四派之实际利害果何以冲突，亦自难言；然使四派互相提携，互相了解，开诚布公，使率归一致，而皆以守法奉公为天职，则统一之实不难立见。又今为救国危亡计，拟以和平之方法图统一之效果，期以四派相周旋以调节其利害。在统一未成以前，四派暂时画疆自

守，各不相侵，内部之事，各不干涉，先守和平之约，以企统一之成。倘蒙各派领袖谅解斯言，文当誓竭绵薄，尽其力所能及，必使和平统一期于实现。而和平之要，首在裁兵……有谓须俟统一始可议及裁兵者，此未免为怙乱之谈。何者？兵不裁则无和平，无和平则难统一……裁兵办法可以坐言起行者，其纲要有三：一，本化兵为工之旨，先裁全国现有兵数之半；二，各派首领赞成后全体签名，敦请一友邦为佐理，筹划裁兵方法及经费；三，裁兵借款，其用途除法定监督机关外，另有债权人并全国农、工、商、学、报各团体，各举一人监督之……诸公朝赞，则夕可商诸施行……统一成而后一切兴革乃有可言，财政、实业、教育诸端始获次第为理，国民意志方与以自由发舒而不为强力所蔽障，其为统一则永久而非一时，精神而非形式，国人同奋于法律范围之内，而无特殊势力之可虞……”

我们从文字上分析上列宣言，可得五个要点：（一）中山认调和四派势力可以立刻实现中国永久而非形式的统一，即所谓拟用和平方法来图统一；（二）中山以周旋于四派之间调节其利害自任；（三）调节其利害的入手方法，为四派暂时画疆自守各不相侵，内部之事各不相干；（四）统一之先决条件为和平，和平之先决条件为裁兵，主张用兵工政策，来裁全国现有兵数之半；（五）主张敦请一个友邦为裁兵的佐理，并举行裁兵借款，债权人参与监督用途之权。

直系、奉系、皖系是什么东西？是前清遗留和外力扶植的封建势力。西南势力是什么东西？除了现还忠于革命的领袖外，都是由封建残局孳乳出来的新军阀（参看本报第二期《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关于统一问题，我们早就从事实上理论上论证

过：“政治上的统一，显然不是混合或调和各大军阀的旧势力可以做成的，乃须经过不停的革命奋斗才能真正成功。若舍却革命的宣传与行动，只与军阀谋统一，结果只有上当”（参看本报第一期《统一借债与国民党》）；关于和平问题，我们认十一年以来民主与封建之争的主要原因，在旧支配阶级的武装未解除，北洋派领袖至今因其武力而承袭政权，所以我们屡次高声肯定，用和平方法去与军阀谋裁兵是做不到的，必须用革命手段根本破坏旧军事组织，由民众武装去解除旧支配阶级——军阀的武装。我们这种肯定是科学的归纳过去十一年的事实之肯定，不如此，和平统一是无望的。现在即使调和四派势力的政策能告成功，结果至多不过是维持半封建半民主的局面（如画疆自守，各不相侵……），换过说即依然是不统一不和平的局面。我们从纯客观的事实观察，从阶级争斗和国际的眼光观察，中国统一的形式只有两样：一是维持现状的封建的协调于内外势力范围的（如联省自治等形式）统一；一是革命的民主的和民族的统一。前样的统一是外国帝国主义和军阀所需要的；后样的统一是中国被两重压迫的人民所需要的。换过说，前样的统一，中国人民应拚命反对；后样的统一，中国人民应拚命促成。现在中山的政策是促成前一种的统一呢，是促成后一种的统一呢？从这点推论，我们不能不说中山现在调和四派势力的和平统一政策没有离开革命立场的危险！

我们固然知道小资产阶级和平空气还布满全国，人民左袒革命的还属极少数；我们固然知道国民党此时若继续北伐等军事行动将愈惹起商民的误解和畏避；但我们所主张的民主大革命并不是要国民党纯粹建立在军事行动上（参看本报第九期

《国民运动革命军革命宣传》），也不是要国民党只做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而不去领导种种零零碎碎的民众运动和政治要求（如裁兵运动等参看本报第十五期《革命党的否认病》）；我们乃是要国民党建立在有系统之革命的群众组织和革命的群众宣传上面；我们不是空想的忽略实际的革命家，对于一时还不能根本推翻的军阀和至今还不感觉革命需要的商民，并不反对用一种适当的政策去证明武人怙乱之下的和平企图之不可能；但我们反对国民党离开革命的地位而以周旋于四派军阀间的调人自处；我们更反对国民党同任何一个帝国主义的“友邦”（或美或日）来合作中国的内政，因为这样一来不仅犯了与军阀妥协的毛病，而且犯了与外国帝国主义接近的嫌疑。

象中山这样太右的和平妥协政策，在上年六月和八月间发表还不失为稍有意义，因为那时全国商民更是死气沉沉，一面又梦想黎元洪鱼电的骗局或能实现。现在民间空气就比较的不同了，纵然商人与虎谋皮的希望还未尽消，但同时他们已觉到和平哀求的手段终难有效，所以准备举行全国的大示威，而继之以罢市、罢税等抵抗；此外智识阶级与工农阶级间的空气更形愤慨激昂。不意国民运动的领袖忽于此时出此右极的政策，简直比民间现在的空气还更右！“打倒军阀”渐渐成了士、农、工、商普通的口号，而国民运动的领袖反高唱与各派军阀大调和！试问革命分子对于国民党将作若何的感想！？我们更要问，现在国民党的民众基础在那里？国民党直到今日还是局促于局部的军事行动而疲于奔命，对于基本的革命宣传工夫一点没有做，就是我们屡次所要求的全国大会至今也还没有召集！国民党长此在无民众后援的空架子上做上层的工夫——而且专门是做与军阀相周旋

的危险工夫，一旦失败下来，不但一个民众的波涛引不起来，而且民众将认他的失败为应得之咎。假使中国有个象俄罗斯共产党一样的民众势力基础的党，于此时采用和平统一的政策号召各军阀，那么各军阀不听从时，马上就有几百万工人几千万农人起来拥护这种政策而与军阀宣战。现在国民党那里说得上这个呢？不久中山这次调和各派军阀的和平统一的号召失败，我们敢说在民众中一个影子也没有。所以象有民众基础的俄国共产党来采用一个这样右的政策或还没有什么大的危险；但象无民众基础的国民党来采用一个这样右的政策，前程是很危险的！

（载《向导》第18期

署名：和森）

反对“敦请一友邦” 干涉中国内政

(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

孙中山和平统一宣言、主张与军阀妥协及与外国帝国主义合作，上期本报曾反对过，不过对于前一点说明较详，而后一点说明较略。他的宣言发布几日后，上海商界总联合会通电赞成，并解释：“……敦请一友邦为佐理，系自动的而非被动的，参加债权人监督用途，系暂时的而非永久的；自动的则他邦不能援以为例，暂时的则异日已无可借口……所敦请者不过一人，于主权何伤，于进行尤便，以视华会向我国忠告，海关、盐务归外人操纵，孰得孰失，不待明辩……”这点关系中国国民运动的生死，我们认为有再加辩明之必要。

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惟一的正轨：对内是打倒军阀，对外是打倒侵略中国、扶植中国军阀的外国帝国主义。军阀不是天上滴下来的，是前清遗留和外力扶植的产物；所以反抗外国帝国主义尤为国民运动根本的重要。外国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关系，就是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甚么“友谊”、“友邦”都是骗人的鬼话。辛亥以前，革命党的目的是肃清内政以御外侮；直至于今，这个目的还达不到的主要原因，就是由于外国帝国主义借款卖械帮助北洋派军阀袁世凯、段祺瑞、张作霖、吴佩孚等以打革命党。

无论那个资本帝国主义的强国，都是中国人民、中国国民运动的敌人。美国对于中国的侵略与压迫虽然遮饰得巧妙，宣传得体面，但他乃是在华盛顿会议确定协同宰制中国的刽子手，他乃是与日本帝国主义相竞抢夺整个的中国隶属于其资本铁锁之下的恶魔；中国人民若是认他为“友邦”，便是认贼为父；国民党若是认他为“友邦”，自动的邀他来公然合作中国的内政，便是教中国人民授权于贼父，公认他为干与中国内政的合法主宰！

屡次倡言与军阀妥协裁兵，已是损伤了革命精神；因裁兵而主张邀请外国帝国主义者干与内政，更是引导国民运动脱离正当轨道。我们固然不承许军阀内阁张绍曾“若径请友邦人士越俎代谋未免有外人干涉内政之嫌”的假话为比中山更爱国；但使中山这项主张实现，国民革命运动的精神便将根本动摇；若不实现，也足迷乱国民对外心理，在一群侵略的强盗英、法、美、日中分恩仇，也足迷乱国民对内观察，在武人纷乱的内政中看不出外力的关系，而且反认求援于外力足以解决时局。当外国帝国主义者假称非废除军阀不足以解决中国时局时，他们又是向容易被欺的中国人民准备一种侵略和隶属的新方式！

我们知道革命是势力的事，但我们反对国民党倚仗三五野心将官乌合起来的军事势力和求助于军阀的旧势力，我们主张国民党必须倚仗民众并组织民众的势力；我们知道革命是国际的事，但我们反对国民党暂时或须臾结纳国际帝国主义英、美、法、日的势力，我们主张国民党必须忠实进行中俄德联盟计划。今年一月一日国民党的宣言，纵然未标明“打倒国际帝国主义”，然而认中国业已沦为列强殖民地及主张修正与列强所缔一切不平等条约，我们方认为是国民党一大进步；最近苏俄代表越飞与

中山在沪接洽的结果及《民国日报》叠次发表中俄亲善的议论，我们方认为是国民运动前途的吉兆；幸望中山先生迅速改变这次宣言与各派军阀妥协与外国帝国主义合作的有害政策，这样的政策，即使不计及将来实现上的恶果，就是现在纸面上的不良影响，也足以损伤国民革命运动的精神呀！

（载《向导》第19期

署名：和森）

克门案与运送飞机案

(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美国驻张家口的领事索克宾与资本家克门，为中国奸商保镖，强运六万大洋出口，并用手枪射击合法阻拦之中国兵士，克门因中国兵士回枪射击以致毙命，因而惹起中美间严重交涉，美国公使向北京政府提出三条最强横最苛刻的条件。索克宾违法庇奸不上算，美国政府反要求中国高级军官张锡元都统同区区一个肇事的领事谢罪，此外还要求将张锡元以下的军官革职永不任用，并要求恤金五万元，其屈辱中国全体之用意，与贵族主人严惩伤害其鸡犬之家奴没有两样！许斯在纽约中美协会演说：“……若对克门案无满意解决，则美将改变对华政策。”同时驻京美使屡次直接找着张绍曾示威，大有不如其命即将下旗归国之势。被外国帝国主义压迫的同胞们！幸喜美国对华政策还未改变，你们多来领略些“中美亲善”的味道罢！

反过一面，我们看美商运送飞机给吴佩孚的案子有如何下落呢？二月十九日《申报》转载《字林西报》云：

“美商施利文氏运送飞机至汉，被美舰查获扣留一案，经美国驻汉按察使罗平杰氏迭次传集人证开庭鞠审，业于十三日宣布判决书，以案中并无充分证据，足以证明该项飞机确供军用，虽据运送该机之船主供称，曾问华经理李某，有此项飞机运汉，

系供吴佩孚军用之说，然传李某质审，又复否认此言，且查本案所控各节，系违犯军火出口律，然‘出口’二字意义，似于飞机运到上海后，其行为即已终了，美国法律固经明定白规，凡自甲国运至乙国，谓之出口，若于同一国内自此口运至彼口，则系转口，而非出口，故被告行为自上海运至汉口，不能目为出口，而谓之违犯军火出口律……因此宣告被告无罪，并取消汉口美领事预审时宣告之飞机暂留，听候美国驻华按察使处分之判决云。”

前案的要求，是美国帝国主义者奖励他们的外交官资本家在中国横行无忌的与奸商们做违法勾当；后案的判决，是美国帝国主义者奖励他们政治侵略的别动队供给中国军阀们的军用品。前者是小题大做，是八十年来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获得种种特权的惯用方法；后者又是从新立了外国帝国主义今后便于供给中国军阀军用品的出口律上之新注解。中国人民须从这些地方领略帝国主义者的本领呵！

（载《向导》第20期

署名：和森）

孙中山南下与英国

(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近日报载英公使语人，彼赞成孙中山日前宣言中之裁兵办法；又广州十八日路透（英国帝国主义传播世界消息的机关）电：孙中山十七日午后八时抵香港，本夕亲临香港总督之招待宴会，有明日来粤之传说，该总督之招待孙中山，或系孙氏对英态度，不无变化欤？故现下内外人士，均注意及之。

这些昨日帮助袁世凯、陈炯明，不久又将帮助吴佩孚、沈鸿英……以打国民党的英国帝国主义者，现在好意思又来吊孙中山的膀子。中国国民党的领袖要当心，不要受了帝国主义者的玩弄呀！

（载《向导》第20期

署名：和森）

中日交涉与中俄关系

(一九二三年四月十八日)

东方社三月廿九日东京电：今日东京《朝日新闻》大阪《朝日新闻》皆揭载社论，标题曰“在改造时期之中、日、俄三国之关系”，大旨谓：近四年间日本已缓和对华政策，废弃强硬对外说，努力于平和主义，已得相当之结果。如更进一步与俄国互相协商，图满蒙势力均衡之策，则必能唤醒中国之梦想的外交论者。华人须知可恐者并非日本，而在俄国传袭的对华政策之复活……惟中国国民力攻日本惟一之弱点，知日本不能不与中国交换物资，而故意提倡经济绝交。若长此不已，则无异驱迫日本，使日本出于不得已而默认俄国之传袭的政策，并将与俄国握手……今日俄国所表示之对华政策上之变调，正在徐徐还复于帝政时代之旧态，同时日本不可不期临日俄国际关系改订之时期。日本当局之意志注及于此处与否，悉悬于中国排日风潮之具有永续性与否……

日本帝国主义者这篇欺骗恫吓的论文，大约可分为两点：第一是说现在中国收回旅大运动，由于日俄协商之未成，如日本侵略满蒙政策已得俄国之谅解，中国必不敢作收回之“梦想”；第二是说中国不要怕日本侵略，但要怕所谓俄国传袭的对华政策之复活，若排日风潮长此不已，则日本惟有被迫与苏俄携手，而默

认俄国之传袭的政策。

第一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者自暴其对华阴谋。年来日本帝国主义者亟谋与苏俄妥协及暗中破坏中俄会议，就是由于这种阴谋的驱使。可是这类阴谋，只能与他协同侵略弱小民族的英美……伙伴互相交换，一遇了劳农俄国就要成为怀恨终身的单相思。当后藤市长与日政府暗中计议邀请越飞游日时，如此这般，发动了满腹春情；及闻越飞迂道赴沪与孙中山协同发表宣言，头上冷水，使他们通身冷了一半；及越飞抵日，严词拒绝其秘密勾结，日本帝国主义者至此固已绝望，然犹在新闻上故意宣传日俄两国关于满蒙一般之协商，大体已得谅解，并闻现犹设法阻止越飞前此在沪宣言两月后赴粤一行之约。

至于第二点之用意亦不难看出：一面欺骗中国，恫吓中国，使其抛弃收回旅大运动；一面破坏苏俄信用，离间中俄两民族的联合。日本及英美帝国主义者年来在中国所用的破坏苏俄信用政策，就是所谓“俄国复活其传袭的对华政策”，只因中国人民缺乏常识，国际帝国主义者这种愚弄政策遂贿坏了全国舆论的空气。《朝日新闻》这篇大胆欺诈的文章，就是完全建立在国人对于苏俄缺乏常识的弱点之上！

读者试想想：假使英美帝国主义的外交家处于越飞的地位，不知几早就把中国的利益拿去与日本帝国主义者作兑了；但苏维埃俄罗斯，他是全世界工人与被压迫民族的保障者，决不会丝毫牺牲弱小民族的利益去与帝国主义国家交换本身利益的。现在国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否认二十一条，收回旅大的运动，不亟谋联合惟一反帝国主义的苏俄，而反去求援于英美帝国主义者或他们宰制弱小民族的总公司国际联盟，这真是中国民族不

自觉的耻辱呵！

（载《向导》第 21 期

署名：和森）

外国帝国主义与军阀协同 压迫革命的真势力

(一九二三年四月十八日)

年来中国最可注意的事实，莫过于劳工运动的发展，全国各产业中心、交通地点，劳动者莫不随着各种大大小小的罢工运动团结起来。劳动者的组织一天天的发达，一天天的集中，在中国社会上已成为一种新势力。这种新势力之重要，不特在劳、资阶级间表显出来，而且将在政治上表显出来，尤其将在反抗军阀与外国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运动上表显出来。因此，就触动了外国帝国主义与军阀们的大畏忌，乘京汉铁路的大罢工，直系军阀及英国汉口领事，英国香烟厂大班等，公然大开会议，相约于二月七日举行大惨杀，以图根本剿灭年来蓬蓬勃勃之劳动运动，与解救全中国人民之革命的真势力。

自京汉路及各处共产党与工人，同时被严重压迫之后，胆怯的上海资产阶级的总商会即向军阀申明没有罢市罢税的举动，此时纵有一班别有用意的外国报纸（如《大陆报》、《字林西报》），学潮中想利用工人余威以达到其非政治目的之先生们，宣传所谓九路罢工，以威吓军阀政府，但其结果，除了增重共产党及各处工人的压迫外，没有别的影响。此外，资产阶级裁兵运动中，更发现一种更胆怯更可怜的哀求倾向，他们简直主张恭叩军阀

门庭效秦庭之哭！由此可见工人阶级的势力不存在，幼弱的资产阶级及涣散无力的小资产阶级，只有愈益匍伏于军阀与外国帝国主义的宰割之下而莫可如何！

现在保洛军阀又要大发杀机了，新的奉直战争又在全国“和平”“裁兵”的哀呼之下发动出来了，假使京汉路总工会能至今存在，不很可以阻止野心军阀的杀伐行动，并帮助那些为国家独立与自由做工夫的领袖与国民运动吗？

国人们！你们要得真正的保障或真正的解救势力，只有充分同情并帮助劳动者早日恢复其组织力战斗力呵！

（载《向导》第21期

署名：和森）

辟孙曹携手

(一九二三年四月十八日)

近来二三热心为北洋派领袖曹锟捧场自谋攫得政权的政客，在京、沪间极力制造孙曹携手的空气，一面进行所谓最高问题；一面进行倒阁，甚至倡言曹锟应为总统，孙曹妥协来统治中国。此外还有所谓某人代表南方某督代表北方的对等会议。

这种空气，一面为军阀政客三梦合一的产物（有梦想总统的，有梦想总理的，如温世霖、杨度等则梦想总长）；一面为北洋派统治中国的弄猴政策，这种政策的内幕，不过是教孙中山向北洋派投降罢了。

孙中山若可和曹锟携手，若可梦想与北洋派妥协来统治中国，那末，早就应该效法康有为、梁启超，何必革命？

章太炎还说得不错：“今日之对于北洋曹吴，犹昔日之对于满清也……其阴为曹吴谋者，虽伪作正言，不得不与之绝……”这却不是疯话。

(载《向导》第21期)

署名：和森)

西南形势之进步

(一九二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自西南诸将或明或暗背叛革命以来，革命势力，濒于破产，不仅不能统率团结，而且互相争杀不休，致令北洋势力颠仆不破，而割据自私诸将，除或明或暗投降北洋正统外，亦几无自存之余地。直至陈炯明失败，形势才稍有转机；闽粤令发后，西南各领袖才有联名之寒电发表。

自孙中山而外，联名各领袖之动机如何，我们不必深究，只就此次行动而言，确系从新进步之表征。但同时有二点须忠告于各领袖：

第一，今后应奉党魁孙中山为西南惟一领袖，而各自居于党员地位不应与中山取自由的联立形式；

第二，应抛弃割据自私的联省自治假面具，赤赤条条在民主革命的口号、纪律之下进行革命。

倘若不能实行上两点，就是没有根本的觉悟，迟早仍不免为革命的叛徒——陈炯明第二！诸君勉之！

(载《向导》第22期)

署名：和森)

外国帝国主义者 对华的新旧方法

(一九二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密勒评论》——美国帝国主义在华的机关报——最近发表一篇对华态度的论文，大略谓：在中国以外国字刊行之报纸，为数颇夥。近来此等报纸除少数外，其批评中国之语词，皆极不满，所持理由为拖欠外债，保持冗兵，纵容盗匪，漠视条约等。除报纸外，各种外人团体亦多通过议案，指斥中国；有一般外人在公共场所或私宅谈话，亦多杂以批评中国之语，近日北京外人宴会席上之议论，至少当有十分之九为讥责国会内阁军阀等者，吾敢断言也。夫此等批评，华人自然知之，然则彼等作何感想乎？亦受其影响否乎？记者欲知其究竟，近曾以质直之语问答于华友云：“君对此外人批评之意见若何，中国又将若何对付之乎？”被问之第一人为一银行家，曾在外国留学，任某有势力银行之经理，历有年所，问答之始，提及与中国久有商业关系之某国报纸批评中国之语，此君之答复曰：“彼所说我国情形，吾人自知之。但彼国百年来在华获利已多，今中国遭此艰境，彼稍感不便，谅能忍受。中国商人银行家尚能忍痛奋斗，向前进行，外人乃不能少安毋躁耶？”第二人乃一新闻家，常投稿于外报，曩在官办学校肄业，未尝出洋，其答复云：“凡此外人批评，有一切实效果，即使

中国各界领袖益加决心，谋使中国脱离外国控制，吾人今正依此旨而进行，必全脱外人势力羁绊，使中国被尊重而后已。”此君虽未言如何达此目的之方法，但吾信其确为由衷之言也。第三人为一日本学堂毕业生，现执业银行界及商界，彼乃反对裁兵者，其言尤堪玩味，其语云：“近来中外人士盛唱裁兵之说，吾顷游东三省，乃悟吾国不当裁兵，特须淘汰老弱耳。今之问题，不在裁兵，乃在设法控制军队而善筹军费，中国欲为独立之国，非尽保存现有之兵不可。裁兵之说独盛于中国，然彼为世人尊重之各国，非保有陆军海军，即具有随时可以召集军队之组织，是固吾人所知也。”记者为显明之理由，不举出上述诸人之姓名，但此三人，外人多知其名，其意见可代表中国智识界，具有甚大势力，吾人味此三人之言，可悟一事：即从前处置中国之方法，今日已不适用，第一，中国已不复如前之易受恐吓。曩时欲恫吓中国政府只须在外报上登一论文或纪事，华人即知为出于北京某使馆或某商埠某国领事之指使，至北京政府接到一外交公文，辄如受电震；今则外报之批评论文，殆已绝少效力。美国人之《华北明星报》，近有一文论此事，其言绝智，大致谓世界大势变迁，中国情形随之而变，在华外商宜熟察中国政局，以调剂其商业事情，庶免铸错。中国今日之政治问题，与曩昔不同，且与一两年前异。故处置之道，亦当更新，不可拘守旧法，徒取纷扰，可谓中肯之谈……然则吾人将取何态度乎？此天然之问题也。对华国际银团中美银团代表司提反氏近曾表示其意见：谓中国目前之困难，非恢复帝制或外国干涉或拥戴一强有力之人物以民治之名施专制之实所能解决，欲救中国，只有发展中国民意之一法。但发展民意，非徐徐从教育上作工不可。今日世界中无一权力能迫中国裁兵

或还债，无论其近邻远邻，皆无此大力……

这篇百看不厌的绝妙文章，不仅那三位代表中国智识阶级的先生所说的话——很足表现中国民族自觉的精神——饶有趣味，我们体察外国帝国主义者觉悟到“从前处置中国之方法，今日已不适用，中国已不复如前之易受恐吓”而亟思换用新的欺骗方法，更觉饶有趣味！

《密勒评论》的记者虽然不便将他们的新方法很具体的说出，但是他既显然引用了司提反的话，我们更不妨替他引用朱迩典（英国帝国主义者，曾做过英国驻华公使）最近发表的话，作个补注：

“……中国全部经济生活大受兵害，华人商会已发起裁兵运动，并请外邦友人合作，以期达其目的，英美舆论颇为中国所重视，今英国之注意中国裁兵运动，当无异于以有力之兴奋剂给与发起此种运动之商界代表也。（见四月十一日《申报》）”

外国帝国主义者知道军阀势力快要崩溃了——纵然由他们不断的供械借款，左顾右盼，急于觅得将来代其统治中国的代理人，于是就光顾到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就想在中国造成一种太上的国民运动（参看本报第十四期及第十六期时事短评）。他们外面上假惺惺替中国高唱打倒军阀，实际上只教京沪及各地商人：“点名就是裁兵”。所以剖破他们对华的鬼胎，不过是为军阀与资产阶级合作，建立附属于他们的“封建资本制度”，这就是他们所视为稳固而可靠的殖民地政治，也就是他们今后对华的新方法！

（载《向导》第22期

署名：和森）

“以后一切对华侵略 皆将以教育的形式出之”

(一九二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关于退款兴学问题，最近《密勒评论》著文云：近来每一星期中，几必有一国宣布其愿还拳乱赔款于中国之意，最近宣布之国，则日本与比利时也。日本议会，于数日前延会时通过一议案，决以日本应得赔款用于中国“文化”事业，比利时之计划，虽无所闻，但谅其目的亦必在用教育方法以增该国在华之势力；英国如何利用此赔款，计议已逾一年，尚未公布办法，预期亦充教育之用。纵此以观，可知以后一切对华侵略，皆将以教育形式出之，各国皆以多教育中国男女青年为竞争，西方对东方之心理，从兹一变，斯诚大佳之事矣。犹忆一九零八年美国将其所得赔款第一批退还中国，一时在华各外报对美国大肆讥评，美竟为众矢之的。今苟能检出读之，当大有趣味。假令罗斯福而犹生存者，见彼所发起之还款兴学计划，数年前犹为侵略中国者所非难，今实际上已为参加各国一致赞同，则其欣慰尤为何如乎！

西方美人对华独到之魔术，英日比帝国主义者翩翩也要竞相学步起来，怎得不大起醋意！

醋海兴波，率性把“对华侵略皆将以教育形式出之”的隐密暴露出来，“斯诚大佳之事矣”！我们读者应当谢谢《密勒评论》！

(载《向导》第22期)

署名：振宇)

外交系与吴佩孚

(一九二三年五月二日)

中国最可怕的恶势力，除北洋军阀外，要算是英美帝国主义培植的外交系。国人对于北洋军阀，虽然渐知深恶痛绝，但是对于外交系的认识，还是很不明白。

外交系一面代表英美帝国主义与吴佩孚结不解缘；一面代表英美帝国主义作合一派中国资本家与北洋军阀间之关系。王内阁倒后，亲日派有抬头之势，故顾维钧辈盘桓留恋于北京而不去。顾维钧、施肇基的留恋盘桓，也就是英美帝国主义的留恋盘桓，英美帝国主义者在北京政府中由奉直战争获得的优越地位，自然舍不得抛弃。

张作霖与吴佩孚的冲突，也就是英美与日本在华利益冲突的反映。现在奉直再战的形势又来了，休戚攸关的英美帝国主义者怎得不关照吴佩孚，吴佩孚怎得不急找外交系做筹饷人？所以从吴佩孚迭催两院迅速通过顾维钧外长的通电看来，从英美驻京公使轻视黄孚等事实看来，便可知道此中底蕴了。

(载《向导》第23期)

署名：和森)

中国革命运动与国际之关系

(一九二三年五月二日)

一、世界资本主义与民主主义之崩坏

自十八世纪以来，人类经济生活演进到资本主义时代，政治组织也就随着演进到民主主义时代；产业革命与民主革命的潮流，在欧美各先进国，次第扫荡农业、手工业与封建制度，而建立了近代资本民主的政治经济组织。

资本主义发达到十九世纪下半纪，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混合，托辣斯与加特尔垄断国际市场，于是遂入于争夺殖民地的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国家，由阶级斗争与国际竞争的结果，一面成为一些托辣斯争夺殖民地之武力的集团，尽量扩张其军国主义与军备，一面渐渐揭破其“德谟克拉西”的假面具，显出资产阶级专政的真相。

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资本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结果：一面酿成俄罗斯无产阶级革命，一面破坏了全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这就是世界资本主义与民主主义崩坏之发端。

现在我们可以简单列举资本主义崩坏之科学的例证：

一、地域上的推广阻止了并且缩小了。以前资本主义之昌盛由于不停的推广殖民地及常常获得新市场；但地球面积有限，

资本主义发达到今日已是无孔不入，亚洲非洲的穷乡僻壤，都有了大工业国的商品；加以劳农俄国成立，占全地球六分之一的地方，已不是资本主义的范围了。

二、有些资本主义国家，回复到资本主义以前的经济状态去了。这种状态在中欧与东欧特别显著：因为纸币的跌落，农人渐渐回复到自给的经济状况，既不愿将其农产品卖于市场，又不愿买市场的商品，而以家庭生产自给；从前以现银纳税，现在以货品纳税，从前用货币交易，现在用谷物交易；资本不投于生产事业而投于不生产的交易事业。

三、国际的分工限制了，世界经济生活的单位摇动了。比如美国从前是农业国，英是工业国，因有这种国际的分工，所以资本主义发达非常畅利。现在不然：美国由大战一跃而兼为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同时英国也高唱发展自己的农业；各大工业国皆极力恢复几百年前的保护政策，增加进口税（如美国新税则），以防外来商品之输入，巩固国内的市场；因为国际贸易额大减，国际经济的协作衰颓。

四、世界经济生活的统一破坏了。战后，资本主义的中心由欧洲移至美国与日本，但以前欧洲的旧中心能借水陆交通，将高量的生产匀送于低量生产之各地，故世界经济生活常呈统一平衡之观；现在不然，因为国际经济的平衡破坏，中欧东欧纸币的跌落，生产高的国家不能将其产品匀送于生产低之各地，高量生产与低量生产遂失其调剂而分为两种半身不遂的经济状况。

五、生产减低，财富的积聚也减低了。战后，中欧东欧完全破产，丧失其购买力，故工业恐慌，在英美特别显明，失业者常自

二三百万至六七百万，所以生产异常减低，财富之积聚自然也要异常减低，这种状况在战败国更甚。

六、信用制度崩坏了。战前欧洲各国皆采用金本位制，纸币与金币价格相等；战后几乎完全变为纸本位，纸币与金币价格相差悬殊；国际间汇率率尤为奇变，国际经济之平衡异常倾畸，国际交易也就异常衰竭。

资本主义这样的崩坏，有方法可挽回吗？这个问题，资本主义的本身是不能解答的（参看本报十六期至十八期的《赔偿问题与帝国主义》）。至此我们更可审查现在还勉强可以维持其存在的政治形势。

现在各大强国的资产阶级，以最少数的人口统治了十二万万以上被压迫民族（占全人类四分之三以上）及其本国几百几千万无产阶级。战前殖民事业发达，经济状况优裕，资本民主国家的统治权威，自然要算是“万能”；可是现在就不同了，经济恐慌、财政恐慌、失业问题、贫困问题，不仅一个不能解决，一纸凡尔塞和约，更弄得破产的欧洲一塌糊涂。不仅国际资产阶级不能协调一致，就是一国的资产阶级，因为利害关系亦常常四分五裂，互相冲突（如美国禁酒案、商船津贴案之争等）。他们再也没有能力解决社会问题了，对于革命的无产阶级，便只有揭破“德谟克拉西”的假面具，野蛮的反动起来。他方面，我们试看各国共产党运动之强大，英国工党左翼在上届选举之胜利，劳农俄国（世界革命的大本营）之巩固，土耳其及东方被压迫民族之崛起，就可知道世界资本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末日快到了。

二、殖民地的革命运动与中国

资本主义与民主主义在历史上虽确已入了凋谢日期，但在殖民地及弱小民族，因为国际侵略的关系，还未充分发达并且不能充分发达，如中国就是一个例。国际资本主义最后生息调剂的源泉，现在可说只有中国，他们若容中国政治经济独立发展，便无异是宣布自己的死刑。中国民主革命至今不能成功，关税至今不能自立，就是因为他们不任中国政治经济独立发展的缘故。他们维持袁世凯与吴佩孚的封建势力，目的就在永远握住中国的经济生命，掠夺中国自然的富源与劳力，以图救济或和缓其国内政治经济的危机，延长其资本主义民主主义的命运。

中国三十年来的革命运动，虽然是幼稚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实际上与十八九世纪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有国际地位及经济地位之不同。在英法各资本主义先进国，资本主义不仅自动的萌芽于封建社会的内部，而且自动的成熟于封建社会的内部，以至打破封建制度狭隘的束缚；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则不然，这些地方的资本主义，乃因国际资本主义之侵入而发生，但在国际资本压迫与操纵之下，决不容独立的发展至于成熟；这些地方的资本主义，在外貌上虽比十八九世纪英法的经济状况更发达（如上海），但这系外铄而非自动，系外国资本之幻影，而非本国资本发展之实质。

各资本主义先进国的民主革命，可说完全是对内的革命，他的敌人只有一个，就是封建阶级；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革命则

不然，不仅是对内的革命而且是对外的革命，他的敌人有两个，一是封建阶级，一是外国帝国主义。当资本主义先进国革命时，国际资产阶级每每能互相援助（如法美）以对抗国际的封建势力；殖民地及半殖民地革命时则不然，国际资产阶级不仅不帮助此等地方幼稚的资本阶级去打倒封建势力，反而援助封建势力压迫民主革命，中国十二年来的往事，就是明证。

资本主义先进国的民主革命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主革命既有如许区别，所以中国革命运动之性质与历程必与从前欧美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大不相同。当此世界资本主义和民主主义业已开始崩坏之时，当此被压迫民族与无产阶级同夷为最少数帝国主义者的奴隶之时，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已不是纯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事实上业已变成为国民革命（亦可称民族革命）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要待列入世界革命的议事日程中才得解决。

殖民地国民革命运动的特性就是：一面打倒国内的封建势力，一面反抗外国帝国主义；在这种立场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所以可与革命的资产阶级结成联合战线。革命党的领袖们如不认清中国的革命运动为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如不认清中国的革命须同时打倒军阀与外国帝国主义，则其方略与趋向必至大错而特错，不但不能达到成功目的，而且将使革命运动中道夭殇。

三、革命党之谬误观念

上述中国革命运动的性质，是由中国国际地位决定的；中国革命运动之动因（因外力侵袭，清庭丧权辱国）与挫折（因各国援

助袁世凯以下的旧势力),自始即具有复杂之国际关系;中国革命运动之成功,亦必成为国际的问题而不是纯粹可由中国自己解决的“内政”问题。资本世界崩坏的现象:在西方业已形成普遍的无产阶级之革命运动,在东方业已形成普遍的被压迫民族之革命运动;两种革命运动的焦点就是推翻国际帝国主义,两种革命运动的成功就是世界革命;必须使中国革命运动与世界革命运动汇合,中国革命才能成功,中国革命问题才能真正解决。所以“联合苏维埃俄罗斯”实成为中国革命运动更向前进之惟一重要的先决问题。

然而,中国革命的领袖人物,常有许多谬误观念:第一,他们认不清中国的革命运动是殖民地的革命运动,所以他们把中国的革命专门做成为一种解决“内政”的运动,他们以为对于外国帝国主义无须倡言反抗,只要内政肃清,强邻自然改颜相向。第二,他们误认革命为纯粹的中国事业,与国际没甚关系,他们以为只须用一种政策阻止外国的干涉,中国革命便可成功,只须声明“承认(或不侵犯)一切条约”,外国防害革命的举动即可免避。第三,他们常常梦想所谓“友邦”的帮助,换过说即一派外国帝国主义者的帮助,虽然事实上常常证明这种梦想得不到什么益处,但是他们心中总还保留这种想头。

其实,外国势力早已在中国内政上支配着:东交民巷的太上政府可以决定北京政府一切动作;外国公使、领事、商人、牧师的态度可以影响一切官吏甚至于国民领袖;不仅北京政府一举一动要仰公使团的鼻息,就是广州前前后后的革命政府对于“如在其上”的香港英国帝国主义者也常常免不掉畏首畏尾呢!况且外力不停的援助军阀们,革命形势常在失败之中,中国“内政”何

日可以肃清呢？国民党因为种了以上的谬误观念，所以对于全国如火如荼的反抗外国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如现在收回旅大的运动）常常缩头缩脑不敢出面领导群众，有时且故意躲避。又如年来工人阶级罢工运动之发展与失败，这在国民革命的意义上何等重要，但是国民党因为避“赤化”的嫌疑——恐怕外国报纸指他为“过激化”，对于被军阀与洋资本家压迫工人的事情一声不响；最近吴佩孚——国民党现在主要的敌人——对于京汉路工的大惨杀，国民党还是一声不响，还是恐怕惹起英国帝国主义的嫌疑，却不顾及因此要减低劳动群众对于他的同情！

因为梦想“友邦”的援助，或者也是使国民党不敢与爱国运动和劳动群众接近的原因之一。虽然，丢开过去的事实不谈，我们且看现在自称对于孙中山改变态度的英国帝国主义：英国帝国主义者，除了敲敲广九与粤汉路接轨的竹杠外，帮助了孙中山些什么？不但没有丝毫帮助，而且香港又成为陈炯明的阴谋窟，英国帝国主义者不日又要资助陈贼回粤发难驱逐孙中山呵！我们试回忆中山先生在香港的演说，有何意义呢？

因为要避外国帝国主义的嫌疑，因为要保持“外交”的面孔，国民党不但不敢与民众接近，更是不敢与苏维埃俄罗斯接近；苏俄革命成功已六年了，土耳其国民党得其帮助（这才是被压迫民族真正的帮助）业已战胜外国帝国主义使土耳其民族朝向解放的路上走了，然而中国国民党至今还未派一个正式代表赴莫斯科呢！

以上种种谬误与失策，实是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损失！这种损失比较军事的失败、地盘的丧失要重大得多！我们诚恳的希望中山先生们迅速估定革命新方针，朝着国民革命的正轨走

去,而且朝着世界革命走去,中国革命才得成功,中华民族才得解放!

(载《向导》第 23 期

署名:和森)

全国人民应起来 反抗英国帝国主义 鱼肉租界同胞的惨刑案

(一九二三年五月九日)

上海自被外国侵略家宰制之后，居住租界的中国人民在国际帝国主义者直接统治和压迫之下，不知受了多少冤屈，多少耻辱。这些外国侵略家、资本家及其鹰犬不仅役使中国人如牛马，而且待遇中国人如牛马，他们公园门边常贴的是“华人与犬不得入内”，他们习惯不给黄包车夫相当的力钱，黄包车夫与之争索，不被痛打即被扭入捕房大罚特罚，此外最黑暗、最残酷、最欺诈并鱼肉中国人民的，尤莫如他们的治外法权。惨无人道的乐志华案，就是此万恶丛中仅获暴露之一案。

请看乐志华案，现在怎样判决呢？两个被告的西探——加布德与鲍尔庆已公然宣布无罪了！这个野蛮凶残的惨刑案，虽经英国按察使、陪审员及被告律师们使了无穷偏袒、曲辩、购买的伎俩，但卒至不得不承认乐志华伤残之系出于虹口巡捕房中；然而何以一面又宣布虹口巡捕房两西探无罪呢？请看《字林西报》——英国帝国主义在华的机关报——所说的话：

“法庭已将加布德及鲍尔庆两探捕被控之可怖罪名注销，外人公众间当无一人不深感安慰者，尤以英人为甚，盖

此等被控情节，关涉一切西方人之‘威信’，假使成为罪案，则决无一人不感觉吾人所自夸之‘文明’已遭污玷矣。”

原来违法注销其鹰犬的罪案，用意是在洗刷英国“文明”的污点及维持英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威信”的！所以《字林西报》接着说：

“陪审员不问本案之政治方面，洵属正当，当此易起扰乱之时，牵涉政治，几势不能免，但此事不因势不能免而可减少遗憾，堂上赞成宁波同乡会之为乐志华援助，当为人人同具之心理，但该会许用其名义与煽动人心之传单发生关系，堂上加以纠责，吾人亦应赞同，近来上海及中国他处，发生许多团体，如雨后春笋之怒苗，此等团体，发与传单相同之言论，自在吾人意中，但不期位尊望重之宁波同乡会而亦被其传染，今已因此引起许多猜疑，吾人信该会将用其势力以阻止任何不合的激昂举动”。

英国帝国主义者利用他的治外法权曲庇其爪牙外，他们还要胆大的教训中国人，教训宁波同乡会，不要对乐案鸣不平，但要“用其势力”帮助英国维持其“威信”呢！

英国帝国主义者对于乐案用了两个方法：第一是以三千元去购买乐志华（见四月十九日乐供词），教他不要戳穿英国的“文明”，可是被乐志华拒绝了；第二就是把罪过嫁到日探与华探的身上。

据五月二日沪上各报消息，乐志华竟因英按察署宣告两西探无罪乃改而控告日探，这不是中了英国帝国主义者的鬼计么？

国人们，你们还视乐志华案为宁波同乡的事吗？宁波同乡们，你们还信任乐志华案可静待法律解决吗？

义愤填胸的全国人民呀，应一律起来：
推翻鱼肉租界人民的治外法权！
打倒英国帝国主义！

（载《向导》第24期

署名：和森）

大借款之内幕

(一九二三年五月九日)

当此奉直再战呼声正高的时候，吴佩孚祸川乱粤正着力的时候，北京政府与新银行团间忽有四万万大借款的交涉。据四月二十一日北京电，刘恩源四月十七日在汇丰银行所提出之借款内容大要如下：(一)名称为整理内外债大借款，(二)款额四万万元，(三)担保品为关余、盐余、烟酒税三项全部，(四)利息周年一分二厘，(五)九五交款，(六)承借银行为汇丰、正金、汇理、麦加利四家银行，(七)借款未偿清以前，担保品交承借之银行管理，(八)每月垫款二百万元，(九)借款四万万元中，以三万万元偿还外债，以一万万元充行政费之用，(十)期限以三十年还清。

这次大借款的内幕是甚么意义呢？上海《商报》说得对：“试观民元至今，无论北京政府之作为如何违宪如何卑劣，而一遇在野势力起而抗持，则外交上之助力必左袒北京到底”。我们再看下列专电：

北京二十一日电，英使专车赴保晤曹锟；二十四日电，刘恩源由保回，颇高兴，当备十万镑支付单交汇丰，晚又与邓某接洽垫款事；又电，顾维钧以外长兼驻英大使名义，向新银团斡旋垫款二千万，备挹注军费，议有把握，再就外长职。

原来牵线者不是别人，乃是英美帝国主义的走狗顾维钧；借

款者不是别人，乃是杨森所谓代表华府会议统一中国之决议的曹吴；承借者不是别的团体，乃是久想共管中国财政永远隶属中国的新银行团！

吴佩孚代表英美帝国主义执行统一中国的决议，张作霖代表日本帝国主义执行独占满蒙东三省的决议；上次奉直战争刚要结束时，英美公使提议借款给吴佩孚统一中国，立即遭了日本政府的反对，现在奉直刚要再战了，英美又要大借款给吴佩孚，所以也就免不掉日本的反对。据北京二十四日专电说：刘恩源向新银行团进行之二千万垫款，因日本反对，将打销。

此外据《商报》所载，黎元洪派恐保派有钱进行最高问题，对于借款条件也不赞成。所以这次的大借款并不是一出单幕戏呢。

（载《向导》第24期

署名：和森）

三千万垫款与英美之阴谋

(一九二三年五月十六日)

本月三日，上海各报登载三千万垫款之由来：

“三千万垫款问题，实出英人方面之计划，其作用约有四点：（一）现时银团对于盐余只有保管权，而无处分权，英国欲攫取盐余之处分权，故乘此垫款机会，要求以盐余为第一担保品（查现在盐余每月约在三百万元以上，六百万元以下，皆指定为政费），盐余既为第一担保品，则为求确实保障起见，对于盐务之监督保管，自不能不有更进一步之要求，于是有裁撤盐务、扩张稽核所权限之条件，并闻现时各省盐运使所管辖之缉私队，以后亦归稽核所管理，此事如果实行，则盐务变为各国共管之局。（二）英国久欲掌握我国内外债权，唯内债问题因与外国无干，故向无容喙余地，现在盐余既作为第一担保品，而关余（二五附加税）又为第二担保品，是内债基金根本动摇，则将来如欲划定内债基金，势不能不与银团磋商，而内外债基金，于无形之中便可合而为一，将来英国及其他各国对于内债问题，亦有发言之权，且将来划定内债基金时，纵使能加我国银行团，而还本付息之事，债权人求为债权稳固起见，势必尽向外国银行支取，而外国银行又以汇丰为领袖，则汇丰自变成独当其冲，操纵内

債之实权，尽在其掌中矣。（三）英国深知我国现时政状大借款不易成立，于是乃自创出垫款名目，款额较少，此事若可成功，则将来尽可根据此项垫款，共缔结四万万大借款，万一不成，而此项垫款，已攫得今日中国政府可以自由处分之盐余关余，足制其死命而有余，外人共管财政之局，当然即可实现。（四）新银团自成立以来，因条件大苛，国人反对，迄无活动，近则故意以各银行出名承借，而所承之银行又尽属银团分子，间接使中国政府陷于不能不承认之境遇，对外扬言系各银行承借，而里面仍为团体的行动，借款既成功，则国民纵极反对，而亦无可奈何矣，此为英国欣然承借之原因也。”

同日又登载某议员关于三千万垫款之谈话：

“余于前日（二十八日）下午二点钟，访吴莲伯议长于其私宅，吴告余云：公来甚巧，余适有一要事，正思与公等三五同志共同讨论，因余于早间往谒黄陂，黄陂告余云，据内阁报告，现与各国公使磋商一笔垫款，为数三千万，此事已将成功，大约明日可签字，余（吴自称）问黄陂此事要否提交国会，黄陂云不知，又询垫款根于借款，借款内容究竟如何？黄陂又云不知，所知者日本公使，颇持反对态度，以为直奉战机已迫，此时借款中国，不免助长其内乱之嫌，嗣经英国公使亲赴保定，询曹三爷直奉是否再战，曹对英使表示极坚决之语，谓无论如何，吾必不先向奉天挑战，英使即据以告日使，日使遂亦赞成，使团中某某二使均极愿此事之成功，自日使谅解后，交民巷遂完全通过，现各公使正在电告其本国政府，回电一到，即可签字云云。此黄陂告余之言也。”

五日，又登载英、美、法、日间意见之不一致：

“刘恩源、杨寿枏、张竞仁、彭解、洪铸所奔走中之三千万元垫款，据昨日所闻，已成绝望，此次英国毅然承受，其内幕之四大阴谋，业经揭破。英国现时金融本极紧迫，似无余力担任此项借款，闻其背后实有美国许为代垫，故敢承认。美国亟欲投资中国，已非一日，史蒂芬来京两年，一无所成，美资本团所费已属不资，是以今兹中国有此提议，美亦欣然来就。唯英美之间，尚有意见相异之点，美欲先商定五万万元，（或四万万圆）大借款后，再交三千万元垫款，英则先主垫三千万元，俟垫款期满，再议大借款。美恐中国政局变化无定，垫款到手，大借款未必即能成功，英则以垫款既成，届时无论何人当局，在势万不能不续商大借款，是两国注重大借款之点虽同，而观察则大异。至法国方面，则因本国经济力，不足担任借款，唯为维持在华势力起见，如各国果行承借，则法为银团一分子，不能自居圈外。日本因西原借款，北庭延不整理，近见财都穷窘万状，若非先得三千万元之垫款，则张阁殊难维持，故乘机要胁，以整理西原借款为唯一条件。但尚有一层顾虑，即此次借款系以英国为中心，如果成立，英必操全权，于日亦殊不利，故尚踌躇未决。”

我们看了以上三节新闻，对于英美帝国主义的对华阴谋自可充分明白。只缘奉张的后台老板——日本以“直奉战机已迫……助长中国内乱”的理由出头反对，于是英美，乃连日宣传须待北政府及直系领袖申明不战才得协商进行。由此就产出曹吴申明不战的通电，俾英美得此“保证”有以搪塞日本之反对，有以掩饰中国人之耳目，而完成大借款之阴谋。英美法三国公使

先后赴保接洽，为的是什么呢？然而他们还要大吹特吹：“决不借款助长中国内乱”；现在直奉既皆申明不再战，所以可以借款给中国了，这就是英美帝国主义者欺骗中国人的逻辑！

（载《向导》第25期

署名：和森）

香港政府与粤乱

(一九二三年五月十六日)

上月二十八日，《申报》北京专电：洛讯，海军北归，第一步需赴港修理，港督默允可入港坞，但英商虑得罪中山，以海员罢工抵制故，请沙面领事征孙同意，孙答反对修理，有五舰将自动赴港入坞，因舰底生锈，不修即烂，闻吴拟再向英使商量。

又三十日北京专电：洛吴电慰沈鸿英，只须韶关与赣南确实连络，进退不成问题，勿急切入省为要，竟予隐青，足以遮断许军入省，外交方面，此间已布置，港援已绝，计划迟早必成。

由此可看出吴佩孚与英国帝国主义的勾结，更可看出自称改持亲善态度的香港政府对于国民党领袖孙中山的“帮助”！

(载《向导》第25期)

署名：振宇)

英国海军工程案

(一九二三年五月十六日)

路透社五月一日伦敦电：海军部国会秘书孟塞尔氏今日在下院提出海军工程请予票决案，谓英国现既采一权标准之制，故今后尤须能迅调英舰驶往世界任何部分。海军部拟在马尔太、阿典、锡兰、仙光、新加坡添置油池。此路极关重要，非至准备完善时，英国不能保障殖民地之安宁，或充分保护英在东方之利益。孟塞尔氏继陈述新加坡筑军港办法，工党某议员问曰，防谁乎？答称并非防人，但不过保险耳。此项计划，国防委员会既主张于先，前内阁与现内阁亦皆赞成于后，而殖民地又催办甚力。华会公约不包括香港之发展在内，故此工程尤属必要。英国在远东领土，目前未有可容一主力舰之船坞。所需建筑经费，已减去一百五十万镑，而为九百五十万镑，大约分十年拨用，深望甚有直接关系之殖民地可通力合作云。工党海氏反对此计划，谓全部问题为英国是否在新加坡设防御工程以制美国或日本，远东人民恐将视此举为直接挑衅举动，日本人尤将有此感想云。自由党兰白特氏提议不投票以示反对，并依据国际联盟会章第八条，质问政府曾否商诸日本，如未，则蔑视联盟。又谓此军港与殖民地甚有关系，政府曾商诸澳洲乎？孟塞尔答曰，商诸澳洲，已得同意。兰白特氏继谓何不稍待至帝国会议之后，盖此军

港不仅费二千万镑，且须驻重兵以守之，费巨款于新加坡，而置帝国中心之伦敦于不顾，无以防天空之攻击，不亦妄乎？自由党爱士葵称，此计划在军略上与财政上，大宜审慎，虽不违背华会公约，但须在道德与精神方面，特考虑之，孰能决定十年之后今日军舰尚为海战中分决胜负之要素乎？从前无远处之军港，未尝不能保护海外商业，今何不仍旧贯乎？兴此费巨而无确实把握，且多危险之工程，实非必要云。自由党贝莱尔斯氏辩称，国际联盟会章第八条之目的，仅欲防甲国向乙国秘密备兵，今新加坡之工程并非秘密，且此问题曾在华会详言之，华会固深知英国可在新加坡筑军事根据地也。日本所最注意者，在军港设立地点，不应密近日本，所应讨论者，惟此而已。商业中心今已移至太平洋，英国苟无大军港，则不能维持其远东舰队。新加坡将来或可为美国所利用，以保卫非列滨群岛，此乃一种弭战之善具。吾人非谓英国或美国拟与日本兴戎，但日本稳健派能否久握政权，而不为军阀所代有，则非英人所能知，如英国将来欲保卫澳洲，则非在远东有主力舰与船坞不为功，新加坡处于帝国之中央，胜于朴资茅之船坞云云。海军大臣爱梅立氏起称，华会明白了解新加坡不在公约范围之内，英国既无危及日本之意，亦无虑及将来日本或与他国邦交决裂之念。此后十年或五十年内军港与主力舰断不至遽成废物，盖海军专家无一不谓战舰在可预料之长久时期内，仍不失为战中之主力也。爱梅立又称，政府拟在新加坡筑一修舰驻舰之根据地，可容最大最新之主力舰，凡各工场及军药库等，当然设备完善。至于驻防一层，现有兵力或须加增，或无需伟大陆军或航空军，因他国大军未必能于海军来援以前，遽即登陆也。不投票之动议，卒以二五三票对九四否决之，

此案遂成立。

英国帝国主义者何以要在新加坡设军港？为的是要保障“在远东的领土”和“香港之发展”；从“新加坡至香港”，全凭他海军的优势来制远东民族的死命，固然日本帝国主义将遭他的打击，而宰割鲸吞的目的物便是中国。英美协力霸占远东宰割中国之局势，是在上次华盛顿会议确定的，故英国帝国主义者在下院再三申明华会明白了解新加坡与香港不在公约范围之内。上几月美国撤回大西洋舰队与太平洋舰队合并而集中于太平洋（见本报十六期）未曾遭英国的反对，自然这次英国要在新加坡建军港，也不会遭美国的反对。英美协同东侵的步骤来得这样凶猛，这样可怕，不仅给感觉敏锐的日本帝国主义者一大惊骇，全中国人民与日本工农群众的觉悟分子也要感受一种可怕的惊骇。

美国帝国主义者用门户开放政策打破了以前“英日霸占中国”的局势——即英日同盟，同时按照美国的计划，完成了“英美霸占中国”的局势。新银行团之组成，北京政权之归于直系军阀，外交系之得势，亲美空气之浓厚，都是这种局势的表现。

所以中国独立奋斗之第一步当用适合于民族独立的外交政策，打破英美在华的霸占局势；第二步当用民族革命手段，完全推翻一切外国帝国主义在华的掠夺权利。在第一步，自然应当尽先联合全世界反帝国主义的领袖劳农俄国；然后以中俄联合为中心，在一定程度内，联及德国，或那被迫而自称“改变对华态度”的日本，纵然日本帝国主义始终是我们主要的仇敌之一，但我们应当利用这个丑态毕露，他日不能在华发生无形权力的仇敌与那两个假仁假义的仇敌之间的冲突，尽可能摇动英美在

华之霸占局势；不过这种政策，惟有首先与劳农俄国密切的结合后，才能有效而无害。孙中山先生以前也曾说过这种中俄德日四国同盟的政策，但他有一点重大的错误，就在重视日德而视苏俄不过为通德之枢纽，这样便要丧失这种政策的真正价值与功效，自他与越飞在沪接洽之后，似乎这种错误已改正了。

故我们要积极的准备干涉下次帝国主义的大屠杀与中国民族的解放，惟有早日联合苏俄。

（载《向导》第 25 期

署名：和森）

日 俄 谈 判

(一九二三年五月十六日)

自苏俄红军扫荡国际帝国主义者所扶植的反革命军——白党余孽并克复海参威后，日本对俄政策又起变化。变化的原因不外经济的与政治的两种。通商与解决滨海省之渔权问题，关系日本经济最巨。日本驻兵北萨哈连（即北库页岛）不但旷日持久毫无结果，而且苏俄已拟将全岛石油租给美孚油公司并拟将全岛让与美资本家开采，日本业已穷于应付；此外日本为对抗美国在远东之形势计，自然要谋联合苏俄，如英国联俄德以抗法国的计划一样。因此日本政府和资产阶级便授意后藤子爵邀请越飞东游。四月二十日日政府议决委托后藤与越飞非正式谈判，二十四日阁议讨论后藤转达越飞所述之苏俄政府意见，并决定开始交涉。越飞所提意见大要如下：（一）北萨哈连日本驻兵无条件撤退，（二）莫斯科政府对于庙街事件之责任以及赔偿等事，无论任何要求皆不能应诺，须日本自行放弃一切要求，（三）莫斯科政府对于正式承认一事不坚持其要求，（四）日俄两国互相派遣使节，正式作为外交官，并以正式外交官待遇之。除上列之外，关于北萨哈连地方之日本既得权问题，俄国亦曾表明相当之意见，日本政府对于撤兵一事似可容纳，惟于庙街事件之解决，因从前曾声明须俄国正式政府成立以后，所以此时还是忸怩，后藤

子爵对于此点亦曾再三质问政府，询其能否放弃责任及赔偿之要求，并询其能否与承认问题分离办理。二十四日后藤子爵往阳河原访问加藤总理，探取切实意见后，同日下午即赴热海访越飞，越飞当即对后藤子爵提出个人意见多端，而对于日本政府之正式意见，则言明须请示本国政府后，再行正式提出交涉。后藤子爵即日复返东京将此事报告日府，并于二十六日再赴热海，与越飞为第二次之接洽。因此外间遂认日俄第三次会议即将开幕，自然要惹起英美帝国主义者特别的猜疑。下列新闻，尤足使英美坐卧不宁。

二十九日东京电，闻俄日谈判之主要点，乃在滨海省之渔权，日本商人极注意此事，西伯利亚政府非俟日本提出含有承认苏俄政府之建议，不允日人享有此权，五月间若无调停办法使日人得享此权，则日本将受财政上重大损失，闻越飞现拟大让步，使日本以一种方法承认苏俄，后藤子爵亦颇赞成此法，俄日谈判现以后藤为中心点，保守党人员现反对承认，谓时期尚未到，消息灵通之官员数人，甚至以为此种谋俄日亲善之企图，已成政局危险之事端，路透访员谒见其他消息灵通之官员，据谓后藤图冒险试其将来政治之野心，使俄日两国成“新四国协商”之中心，惟日本最有势力之各界已决计反对之，保守党公然宣称后藤已不能定谈判之基础，然外间仍谣传如莫斯科能以租借或出售使日本无限期享有萨哈连之权利，则日本或将为利所动，较前善视苏俄政府云。

英美所怕的在那里？自然在“俄日两国成新四国协商之中心”，近来日俄谈判的消息不仅惊动了神经过敏的英美资产阶级，就是麻木的中国舆论界也渐渐惊动了。试看五月二日上海

《中华新报》的时评：“记者所谓日俄谈判必成于中俄谈判之先，今东京电讯传来，果然越飞氏已递觉书与后藤子爵矣，不日即将再开谈判，记者且预料其必有美满之结果，盖日俄间问题，经若干时之犹豫考量，双方当已皆预备妥协，水到渠成，乃自然之势也。然而我国之外交形势，又将陷入孤立之境矣，呜呼！”

《中华新报》代表我国前此忽视苏俄或误听英、美、法、日之离间宣传的舆论，出此追悔的叹声，很值得国人注目呀！但我有句话要安慰同胞们：只要国人觉悟到苏俄是我们唯一的好友，苏俄始终不会与他所要铲除净尽的资本帝国主义强国打做一片来宰割被压迫民族。

（载《向导》第25期

署名：和森）

洛桑俄使遇害与 资本主义国家之“文明”

(一九二三年五月二十三日)

本月十日洛桑电，俄使伏罗斯基氏在薛西尔旅馆被法西斯蒂(Fascist)少年康拉第枪毙，同时并伤伏罗斯基之秘书狄维柯夫斯基氏与阿伦斯基氏。据阿伦斯基氏在病榻对人发表之话看来，此案不仅为瑞士警察放纵法党行刺，实际上含有严重之政治意味。

上次洛桑会议，因为苏俄代表之参加，协约国不得如愿宰割土耳其，以致会议决裂。所以这次会议重开，协约国不邀请苏俄赴会；但是苏俄竟派驻意公使伏罗斯基氏赴会，于是宰割被压迫民族的魔鬼——协约国帝国主义者，图穷匕见，只有出于暗杀之一途。这种卑鄙、野蛮、违法、残暴的伎俩，就是表现资本主义各强国之最后的“文明”！

你看：借着临城劫车案，外国帝国主义者怎样宣传中国为匪世界，为野蛮国家？但是他们文明的国家现在已雇用了几百几十万专门残杀工人遏抑社会革新进化之文明的土匪——法西斯蒂，他们的文明国家现在已次第将统治权委托于一班最反动的匪徒与违法组织之手（自意大利的墨索里尼至法国的普恩费，匈牙利的霍尔第以及行将掌握德国政权的德意志法西斯蒂），他们

的文明国家现在又暗杀了工农共和国的堂堂大使。他们的土匪比中国的土匪文明地方在那里？中国土匪绑票而尚情义（如优待被掠者，以得解剿或赎金为止点）；外国土匪则公开的残杀制造人类生活物资与文明的劳工或暗杀代表新文明之革新领袖。资本国家的文明，真文明得很呢！

（载《向导》第26期

署名：和森）

德国赔款新提案之失败

(一九二三年五月二十三日)

德政府于四月三十日议决新赔偿条件，五月二日牒告协约国，牒文略谓，德国愿付三百万万金马克，分三次筹募国际公债以偿付之，公债之额一为二百万万金马克，二为各五十万万金马克，以全国经济财力为担保品，否则将全部赔偿问题交国际委员会解决。牒文又称，须鲁尔军队撤退后，消极抵抗方可全停，二百万万金马克之借款须在一九二七年七月一日以前发行债券，照协约国金融市场之寻常价格筹募之，一九二九年七月一日以前发行五十万万金马克债券，其他五十万万金马克，则在一九三一年七月一日以前募集之，第一次之二百万万金马克可即招募，一九二七年七月一日以前之债息，可交赔偿委员会收管，作为特别经费，如在一九二七年七月一日以前，不能募足二百万万金马克，则从是日起付息五厘，并付还本准备金一厘，如两次五十万万金马克之借款不能在规定日期以前筹募足额，则应召集国际委员会秉公决定不足之数应于何时及用何法募足之，德国可依照现有条约偿付货物，其额量俟后决定之。牒文声明鲁尔被占后，德国经济组织为之薄弱，今之提议已达德国经济能力之最后限度，且是否超过德国能力，尚属可疑，如他方面尚不以为然，则全部赔偿问题，惟有提交不受政治势力之国际委员会决定之耳，

德国义务之履行，系于德国货币之稳固，故此后不可再施强夺或惩戒计划，任何契约可束缚德法，使两国将外交上不能解决各争端提交公断或调停者，德国准备接受之。牒文末称，谈判之起点，在鲁尔驻军之早退，来因地状况之恢复，被拘德人之释放，及被逐德人之返里云。

德牒送到法国后，巴里资产阶级报纸大哗，他们反对的论旨，略谓德牒虽明为偿付三百万万金马克，实则仅以国际公债方法立即偿付二百万万金马克耳，且此数内尚须扣去五十万万金马克，以作还本准备金与债息，故德国之债权人所可指望者，约一百五十万万金马克，此数尚视法兰西一国所受之损失为少，德国所提以国际公债方法筹集赔偿之说殊为空泛，盖自德国对法宣布消极抵抗以来，迄今四月，德国财政已处于无人信任之地位，不独外款无从举募，即国内公债亦无从募得。他们对于先撤鲁尔驻军然后停止消极抵抗一层，攻击尤力。五月三日法政府发表反对德牒之理由：一为条件不满意，二为担保品缺乏，三为款额不足。区区二三百万金马克何能满足新拿破仑主义的欲壑！他所要求的是鲁尔区域的分割，德意志民族统一的破裂，全德财富的榨取。现在呢，自然隔得太远。

据五月十三日路透电，英意已以同一意旨之牒文驳复德国新提案。但是英法间的利害冲突与两国资产阶级报纸间的互相丑诋，何尝因此减少？“协约国的一致”，早已成为官僚的梦话；同时史丁纳（德国资本大王）与罗奢（法国资本大王）之法德联合（向无产阶级进攻：减工资增工时……）以恢复欧洲资本主义的阴谋，也成了不可实现的画饼。自然混乱无已时的欧洲大陆，现在只看见法西斯蒂与法兰西帝国主义者野蛮残暴的横行。但是

看你横行到几时！

（载《向导》第26期

署名：和森）

英人中国协会主席之演说

(一九二三年五月三十日)

英人中国协会上海分会，十五日午后在上海总会开年会，由马凯氏主席，兹将马氏演说关于中国时局之各节译记要旨如左：

统一外债借款问题，中国政治情形于本会及吾等个人均极重要，因其关系对外商务甚大故也。中国财政渐趋于完全混乱之域，只须观安格联爵士上月在沪上各公团欢迎席上之演说，即可恍然。故苟非成立一种统一外债之借款，则中国宣布不复能还债之日，定已不远。中国反对此种借款，吾殊不解其故。海关盐署，彼均曾许外人管理，且只由外人管理之后，此两方收入始成为中国之真财产，此已不乏证据证明之。统一外债借款决不至影响中国主权之问题，不过为海关盐署管理之扩充而已。但此借款足以巩固目下北京与各省间财政上松动之制度，并使中国得有一相当之预算。若依目前情形，则收入支出，全无确实计算，不肖官员可以任意作弊。吾意时势至此，凡曾贷资于中国之列强，应速决定一种计划，使中国财政从此立于巩固基础之上，此不独为吾人利益计，亦为中国计也。

临城劫车事件，在英国等处之演说家，奋其口辩谓中国如何进步，如何发达，实与事实不符。中国今日中央政府不能管理各省，司法黑暗，苦武人之指挥，官吏贪利好货，腐败已极，号称保

障国家主权，实则徒梗阻外人之经营。凡此皆足使列强觉悟今日中国之政府实不配管理此广土众民。最近且发生世界震惊之津浦路大劫案，其详情诸君已知，无庸多赘。本董事会经详慎考虑后，曾致电伦敦总会，其文云：关于津浦路劫案，应力请英政府设法，会同他国政府，坚持立用有力方法，由外国监督裁遣中国军队，必需之经费，由外国借助。现信外国干涉，将为官员及大部分华人公众所欢迎；本会认目前时局，要求外人管理主干铁路，由外国军官办理护路警察；各国政府不可失此机会，应出要求范围极广之方法，使不独危害生命财产，并根本上妨害一切改良之武人行政从此终止。董事会并将决议及电文通知英商会及美国协会，该两会谅亦已有同样举动。总之，本会以为中国现需三事：

(一)由外国借款监督裁遣军队。

(二)各干路由外员办理警务。

(三)成立一还债借款，由外国监督整理财政的机构。

此等系临时方法，维持至大局巩固，列强认为满意时为止。中国目下之朽腐政府，决无发生新生活之希望。所可怪者，中国商人平时于关涉商业之事辄能一致行动，较任何他国之商人为更有力，何以对于腐败恶劣政府，独不能共起驱逐，而即于商界中妙选人材，另建一干净上进之政府乎？中国商人处理其本业事务，极有才能，在举世商界中殆无超过之者，若能得友邦专家之指导，而谓无管理本国政府之能力者，其谁信之乎？

是的！“今日中国之政府实不配管理此广土众民”，你们列强率性直接来管理好了；何必怂恿那些可怜的中国商人做你们的傀儡，而你们自居于“友邦指导”地位呢！

是的!“现信外国干涉将为官员及大部分华人公众所欢迎”，你们列强率性立刻来干涉好了；何必还要促成五万万大借款，俾北洋军阀无穷期的扰乱中国，无穷期的制造内乱与匪患！

“本会认目前时局要求外人管理主干铁路，由外国军官办理护路警察，各国政府不可失此机会，应出要求范围极广之方法”，你们趁火打劫的贪欲既已如此暴发，同时你们大借款的阴谋仍不抛弃，你们竟能公然对中国人说：“中国财产要待外人管理才算是真财产”！其实你们不过是要多制造些“要求范围极广”的机会罢了。

中国财政何以如此混乱，中国政治问题何以至今不得解决？只是因为你们列强握住中国关税，榨取大宗赔款，帮助北洋军阀及其走狗陈炯明、沈鸿英等攻打国民党，最近复在京汉路与直系军阀合同摧残中国的新势力——这支新势力乃是解决中国政治问题惟一的生力军。

据沪上消息，你们这些戴着“洋商”假面具的外国侵略家又因临城案要开所谓万国公民大会，“另筹方法，重造在华英国势力”（见十八日《申报》专电），你们这些海盗，你们这些英国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别动队，这一年内是何等明目张胆的向中国人民进攻呀！

（载《向导》第27期

署名：和森）

英俄渔船交涉

(一九二三年五月三十日)

英国渔船侵入北海穆尔曼斯克港，事为俄国巡船发见，令英船停止驶行，英船不听，反开枪射击俄船，俄船乃赶捕一艘带回穆尔曼斯克港，听候政府决定处置办法。由此惹起英俄严重交涉；英国一面派遣军舰赴北海，一面向苏俄发出类似哀的美敦书之牒文，要求苏俄将北海十二英里之领海缩小至三英里，并要求苏俄撤退印度、波斯等处领事，此外更干涉苏俄内政，要求撤销前此答复英国抗议处罚教士之所谓“无礼牒文”。

穆尔曼斯克渔产，为该处居民维持生活之唯一物资，只有该处居民有享受此项利益之主权；英国渔船擅行侵入苏俄领海，显然为逾越法轨之掠夺行动；今乃反放泼赖，甚至不惜再起战端！

武力干涉，为资本国家向苏俄进攻的第一步；经济封锁为第二步；柔鲁会议，要求苏俄退回没收之私产为第三步；现在资本国家一面暗杀洛桑俄使，一面借着渔船交涉小题大做，要算是进攻之第四步了。自然，这屡次的进攻，除了证实资本帝国主义不停的扰乱人类和平外，得不到什么结果；事实教训他们，劳农俄国不但推不翻，而且渐入了成长时期。

英国帝国主义横暴无理的要胁，不仅激怒了全俄工农群众，各国工人皆表示愿为苏俄后盾，英国工人阶级尤其激昂。工党

与劳动组合，在群众压迫之下，已一致起来向政府作严重之干涉，我们试看下列消息：

路透社四日伦敦电：职工联合会大会同全国工党代表、国会工党议员今日在下院开联合会议，讨论政府致牒俄国引起之时局，且发表文告，严词反对牒内之条件，谓足使白军反攻俄政府，而复以武力代谈判与公道，今当召集大会，解决此事，或将两国之不平移交国际法庭仲裁，文中并反对与俄断绝商业关系，谓此举之结果将增多失业工人，扩大政治之不安，且有战争之危险云云。

十五日伦敦电：今日俄代表克拉新坐于下院特别外客旁观摩席中，听工党领袖麦克唐纳尔氏攻击外部之议论，麦氏要求承认苏俄政府，并谓英牒中所述种种事项，纵属确实，亦可于其发生时以外交方法解决之，如俄国果在英国或印度东方等处鼓吹革命与暴动，英政府诚有严重抗议之权，但政府须呈出真实凭据，若以为互换措词激昂之文件，即可得美满结果，则殊无益云。外部次官麦克尼尔答称，俄国复文在各点上完全不能令人满意。俄国人民在大战初期，曾有勇敢牺牲，巴黎赖以保全，故英人对于俄人，非无友谊，今亦不欲撕毁商约，但欲俄国遵守此约耳。至于俄人宣传之证据，绝对可恃，除一九二〇年英人台维生被害哈丁女士下狱外，至少尚有英人一百十六人无端系狱。俄牒言渔船事，亦属不能满意，既无损失上之赔偿，亦无对于将来之担保。以言召集会议一层，英政府不愿被曳入复有种种要素之谈判中。如克拉新愿意，则外相克松可与之相晤，且可宽展期限，俾克拉新可与莫斯科接洽，但除允从英人要求外，未有可使英人满意者也云云。前相乔治赞成政府政策，劝政府利用谈话之机

会，并谓世界事态严重非常，幸勿以导火线置其中。爱士葵氏亦以乔治之言为然，主张与克拉新透彻讨论，以期得共同谅解。工党议员特莱夫良氏称，外部次官既有克松可与克拉新晤商及宽展期限之说，工党议员认为工党反对外部之目的，已达到第一步，但若政府后仍欲与俄国绝交，则工党议员将再弹劾云。辩论未毕时，共产党议员纽波尔氏屡次插言，且不从退席之命令，后由下院以三百票对八十八票通过暂停其出席权利之提议（这就是资产阶级专政）。

因为工人阶级的反抗，英国帝国主义的智囊——鲁易乔治已觉悟到“幸勿以导火线置其中”，英政府也声明“不欲撕毁商约”，这一层还是次要；最可注意的是英国工人阶级对于苏俄的同情复见之于行动，换过说即革命的精神与要求从新紧张。自一九二〇年资本向劳动反攻以来（自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至一九二〇年意大利工人占领工厂为劳动向资本进攻之期），各国工人困于减资增时的重围之中，对于援助苏俄之事（即要求革命之表现），一时寂静无闻。直至英国上届国会选举，工党左翼获得胜利（占国会之次多数）成为现政府之主要反对党，这就是表现劳资阵势已入了“工人政府”时期。故近几月中，英国工潮复有由静而动之势：建筑及其他工人之罢工为一次；五一大示威，包围日使馆要求撤退北库页岛驻兵为一次；这次严重的反对英政府向俄挑战，又算是一次。这些都是国际劳资阵势转变的征兆，我们欢迎着罢！

（载《向导》第 27 期

署名：和森）

日俄谈判之进行

(一九二三年五月三十日)

路透社十一日东京电：后藤子爵已于承认苏俄政府之举有所进行，众视承认越飞氏为苏俄政府正式代表，予以签定愿赴滨海省渔民所领执照之权，实为局势变动之证。越飞氏由后藤子爵固请电致苏俄政府，请接受日本所提出交换商业委员之建议。日人在六星期前已有此请，但至后藤出场，始有着落。日政府现承认后藤为居间人，由前伦敦日使署参赞永井氏代表日政府与后藤接洽一切。俄国以滨海省渔权让予日人，启谈判之机，今谈判方在进行中，保守党虽力加反对，但人数不敌自由党、进步党及欲得西伯利亚商业让予权之商业党。承认苏俄政府问题，今在国内政治上占显著之地位，政府与反对党等结合之团体已于四月二十六日签定西伯利亚林木让予权合同，其付俄政府之款有日币二千五百万元云。

据东京各报所载日政府最近表明对俄态度，约有下列七项：
(一) 日本政府此时并不急急以谋与俄国恢复交谊，但两国国交之恢复，从两国国民幸福上观之，有重大影响，故若俄国方面以诚意希望恢复友好关系，日本方面亦无固辞之意。(二) 交涉开始之对手，于越飞氏并无异议。(三) 俄政府之正式承认问题，在大体上，现在列国之对俄政策别无拘束日本者，故日本无顾虑列国意向之必要，日本得完全立于单独自由之地位而决定其意见，

是故日本方面只要俄国表示其在国际信义上为正式国家之诚意，则不妨予以承认。（四）日本于庙街事件，无必须要求赔偿之意，然其责任，当然由俄国政府负之。（五）萨哈连驻兵问题，日本之态度不能变更，故不能容纳俄国方面之要求，但依相当方法而收买之，则有考虑之余地。（六）俄国方面，在原则上应承认战时债务三万万五千万之债务。（七）俄国方面必须承认朴资茅斯条约中之日本渔业权。俄国方面于前述第四项以下庙街事件，萨哈连驻兵问题，对俄债权问题，日本渔业权问题，如大体上能容纳日本方面之希望，则为现在日俄会议再开之困难关头，大部分已得除去，故无论何时，均可任命相当委员，非公式与越飞氏开始预备的交涉。

读者诸君！你们看完了上列记载作何感想？第一，关于正式承认苏俄问题，日本政府自己申明日本得完全立于单独自由之地位，不受别国对俄政策任何拘束，而中国政府则何如？第二，日本郑重宣言交涉之对手于越飞氏并无异议，而中国一般舆论则何如？京沪间无常识的新闻记者，前此受了外国帝国主义者之愚弄，不停的狂叫：“撤换越飞才能表示苏俄对华的诚意”，现在呢，与英美共同运用这种愚弄政策的日本，居然将承认越飞为对手，作为表示其态度之要项！第三，承认苏俄问题，在日本为欲得西伯利亚让与权的资产阶级之利益，而在中国则为全国被压迫民族的利益；在日本已有忠实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故此问题在日本国内政治上占显著之地位，然则承认苏俄呼声在中国还这样低，岂不是证明中国还没有忠实代表中华民族解放利益的政党吗？这一点，我们还希望国民党努力呢！

英国内阁之变化

(一九二三年五月二十三日)

二十二日伦敦电：今日午后财政大臣包尔温被召入宫，未几公报发表被任相职。据今日某独立方面之消息，外相克松侯爵所以未能擢登相位者，因工党声称如以贵族为首相，定用种种政治手腕以推倒之也。而保守党亦有一部分不赞成贵族首相。包尔温在宫约一小时。今晨保守党领袖曾集议于唐林街，一致决定继任人物。包尔温自一九〇八年为下院议员，初不著闻于世，迨五年前入财政部供职时，其名始彰。包属于保守党中主张急进改善税则者之一派，其在卡尔登俱乐部之演说，即混合政府倾覆之动机。包素主张纯粹保守党内阁，故拥护张伯伦者，恐无复入保守党势力范围之望。大约贺恩爵士或可担任财政大臣一席，克松则仍长外交。

现在英国政党的背影，以波拉劳为领袖的保守党代表银行资本，以鲁易乔治为领袖的自由党代表工业资本。上次选举与内阁之变化——鲁易乔治下台波拉劳上台，即银行资本对于工业资本之胜利。这种变化及于国际上的影响其显然可见者为：英国对俄政策之恶化；对法（占领鲁尔）政策之让步。因为工业资本所需要的在恢复国际市场，而银行资本所需要的在恢复其债权，故鲁易乔治内阁对俄软而对法硬（反对法国对德赔偿占领计

划),波拉劳内阁则对俄硬而对法软。

此外保守党内阁及于美国之影响:第一为厉行保护关税政策(增高进口税)以对抗美国商船津贴案,这即间接与美孚煤油公司以打击(津贴商船案如得通过,则美孚油运费减轻);第二即英美债务问题之解决。原来美国银王摩根与英国银行资本渊源甚深(其父老摩根为英国银王并为在美投资于铁路与工业之惟一大债权人),而英国工业资本与美孚煤油公司颇有关系,故鲁易乔治内阁颇有利于美孚煤油公司,而波拉劳内阁颇有利于摩根。

这次包尔温做波拉劳的替身,自然没有别的新变化可言,自然要讨法美五金资本家与银行资本家的惋惜(对于波氏)与喝彩(对于包氏),因为他们同是保守党。然而有一事特别可注意,就是克松——最反对劳农俄国的保守党——竟遭工党的反对而不能组阁,不然,波拉劳的替身还不会轮到包尔温。

(载《向导》第28期)

署名:和森)

日俄谈判再进一步

(一九二三年五月二十三日)

东方社二十五日东京电：今日后藤子爵关于与越飞氏之交涉始末，发表一长文之陈述书，略谓今后之关系，将移于劳农俄国代表越飞氏与日本政府当局之事业，而进行于当然之顺序矣。今两者间已将所有可由非公式交涉前进于公式交涉之条件具备，是诚余为日俄两国由衷心所欢喜不置者云云。后又举出基础私案名目五项如左：（一）萨哈连问题，决定对于卖买或为日俄合办之企业组合，与以特许之利权；（二）国债义务履行问题，除承认问题之外，又保留为将来之问题，以俟国际会议之解决；（三）庙街问题，当由俄国认为精神上并物质上之责任，但在俄国若举出日本军有相同之行为之确证，日本亦认为同样之责任，而抵销其赔款；（四）驻于北萨哈连之军队，基于日本之自由意志，言明撤退日期；（五）承认之声明，不别用形式，由条约批准之日起发生效力。以上五条件，为曾质诸政府者，与越飞氏所提出之三条件一致之妥协案也云云。

东方社二十五日东京电：越飞氏今日对于记者团之质问，为大要如左之解答：（一）余所提出之条件，信可令双方满足；（二）后藤氏与首相会见后，问题已过私约交涉之阶段，由此将入公式之交涉；（三）余渡日之目的在养病，能得今日之政治的结果，殊

非预期，又鉴于四国之事情或尚须留意；（四）经过之发表，须得双方之同意；（五）拘禁之日人虽已接全部释放之电，然大庭氏之居处现尚不明。

我们细审后藤氏所提五项私案基础，若公式交涉完全建筑于这基础之上，我们可信日俄间历年谈判障隔业已大大消除，而正式开议之良好结果必不在远。于此不仅看出日本政府外交手腕远胜英国保守党内阁数筹（其实最近英国克松外相之对俄反动政策，谓为促成这次日俄谈判成功之动力亦无不可），而日本政府善于自谋之对俄妥协政策，亦于远东大局之前途不无裨益。由此更可见苏俄国际地位，绝非英国顽固的保守党与意大利野蛮的法西斯蒂所能撼其毫毛。前此英国工业资本家及其代表者鲁易乔治，要算是世界第一了解苏俄地位之重要的人物（当然他们这种聪明现在还是一样，不过现在是他们的反对党执政罢了），现在以后藤为领袖的日本工商家要算是第二了。我们试看五月二十四日东京来电：

二十四日东京电：联合商会上书政府，要求以切实方法与俄订约，俾借通商而保两国间之经济发展，书中又言两国如辅车相依，急宜恢复商业关系；且俄国国势日见稳固，现需外助及外国资本以图其经济膨胀，各国已均注意及此。

（载《向导》28期

署名：和森）

北京政变与英美

(一九二三年七月十一日)

临城案前不多时，英美公使赴保接洽最高问题与四万万借款，这是阅者还记得清楚的。更前不多时，吴佩孚的灵魂白坚武赴保建议宽和罗案，宴请外交系以恢复英美对曹感情，这也是读者还记得的。

当着洋大人宣传临城案如何严重的时候，保曹居然积极进行最高问题，背后不得到洋大人的默许，不有大借款为后援，敢吗？

这次政变的发难者为亲美派基督教徒冯玉祥，而外交上为曹锟奔走者为顾维钧、颜惠庆。政变中顾颜热中奔走之勤及“顾阁”、“颜阁”呼声之高，就可看出英美与这次政变的关系。据确实消息，这次政变的内幕，确系美国积极帮助曹锟；英国与美国发生利害冲突，英公使态度殊不明了，而英国在华各机关报（如《字林西报》、京津《泰晤士报》、上海《泰晤士报》等）对于曹锟、冯玉祥甚为攻击。试看下引《字林西报》的社论：

“……夫谁人主治中国，列强不应过问，至此人以何方法而获为主治者则为列强所甚宜过问之事。吾人今敢郑重声明曰，曹锟派人所用拥曹为总统之方法，乃不能容许者……
北京使馆间有一派人以为曹锟乃一强固人物，有事时可加

以压迫而取得若干之结果，故曹氏作总统于事为便。此说甚巧，然太谬妄。须知曹锟是否为强固人物乃一大疑问。彼为其弟曹锐一派人所拥戴，锐盖欲借其兄以握大权。闻其计划之主旨，在与张作霖媾和，此举足使吴佩孚与曹锟离异，而直派之最良军队亦不复为曹所有；……倘外交团挟一幻想，以为与此辈周旋，颇为便利，且可谋中国或他人之幸福，则诚大误特误……天津派之所为，不独破坏国宪，并敢漠视临城事件；……吾人以为各使馆今当将此等事实痛切报告各本国政府，打破华会中留遗之迷梦……曹锟谋作总统之无耻勾当，实与列强以大好机会，可以乘此作一正义的伟举，为中国开一新纪元”。又上海《泰晤士报》，显然揭破美使舒尔曼赞助曹锟之态度道：“曹锟将应国会之请，于四十八小时内来京就中央政府之狄克推多任；……惟曹于与其政治身世大有影响之一端未免忽视，此端维何，即外国使署对曹所拟建设任何政府之态度……各公使非盲目无睹者，彼等固尝亲见军阀治制之趋势也。昨日美使与客谈话之际曰，诚然，惟中国乃有元首之政府也；客答曰然则有多少元首耶，此亦可见外人之态度矣”。

由以上的社论可以看出几点：（一）这次政变的后幕美国从中赞助；（二）美国赞助曹锟做总统的目的在有事时加以压迫而取得若干之结果于事为便；（三）英报反对这次曹锐派之拥曹方法，显系与吴佩孚的态度相策应；（四）英报所以反对曹锐派的理由，系因曹锐派计划之主旨，在与张作霖媾和，此举足使吴佩孚与曹锟离异，而直派之最良军队亦不复为曹所有，即曹锟是否为强固人物乃一大疑问；（五）英国帝国主义者之目的是要乘此“大

好机会”，严重处置中国，如设立外员管辖之宪兵队，外国管理铁路等“为中国开一新纪元”。英国这种政策，得不到美国政府的一致，所以《字林西报》另一日的社论，愤愤的说道：

“自临案被掳者释出后，本报曾披露有味之纪载数则，虽其性质为新闻而非意见，但颇有评论价值。其一英伦密特尔斯曰露制造区议员汤森氏于本月九日致电在华营业之英国工程业行家劝告后，在下院质问政府曾以何法保护英人在华生命财产，政府答称已令驻北京英使力主组织一铁路警察队，并取得对于铁路收入之较大管理，以保路警之必得薪给，又谓彼应与他国公使会商，一致行动，按此第二段答词，不啻一人以右手给物，而以左手索回之也。其二伦敦《泰晤士报》于临案发生后，似颇能振振有词，本月十五日社论中又力主设立外员管辖之宪兵队，外国管理铁路及铁路财政。又警告中国，倘华会对华政策中止实施，乃中国自取其咎。其三曼楷斯德《指导报》于十六日报端载称，英国若干最大商业团体对于临案非常注意。其四据今日消息，不列颠工业协会以在华商业受损，正向外部陈述，并条陈应付中国乱局之切实办法，此最后消息颇堪满意，英国在华许多有价值之市场，业已锁闭，而英政府犹以为对华贸易不足注意，至为可怪，今工业协会之陈述或可改正政府之误见乎。英国工商界渐能重视华事，而美国意见，据昨日所得消息，殊令人失望，此消息系五月八日至十四日传出，已逾一月，但其间苟曾有变更者，吾人必得报告。据昨消息称，哈定总统以为中国之混乱，纯由于财政不稳，只须续予以借款，即能成立一有力中央政府，以如是之高级方面而有此言，实堪

悲叹。哈定总统诿不知财政不稳，决非自己发生，在中国则尤为执政者腐败不道德之直接结果，若对此等人续予以借款，则所买得者只有财政愈不稳固全国愈乱而已。又史蒂芬君（美国新银团代表）深信所谓道德化之领袖及耶教学校，不知此两者欲其有效，至少须再经半世纪，此乃宴会中之废话，吾人闻之已熟，谁能信之，但在美国则影响绝巨，十四日华盛顿方面发出一种半官宣言，主张续予借款，波士顿《誊写报》谓‘美国舆论，不许用临城案为侵犯中国主权之借口’。夫美国舆论苟果以华人枪杀美公民雷满德柯尔曼及掳劫其他美人为维持中国主权之正当理由者，则其心理诚难素解矣。”

由此可以看出英美政策不一致的底蕴了，英国欲借临城案完全管理中国铁路及设立洋员管辖之宪兵队；美国欲借曹锟上台成立大借款，完成新银行团管理中国之阴谋（六月三十日路透社：美政府现有鼓励美银行家续借款于中国政府之象，哈定总统近曾表示意见，谓银行团或能收镇静中国之功，有非军事或外交方法所可及者云，美政府定赞成美银行在华之更大活动。英国政策，以英国利益为中心；美国政策，以美国利益为中心。行英国政策，美国在华不能占第一位之优势；行美国政策，英国在华不能占第一位之优势。所以两派帝国主义者对于这次政变钩心斗角，同床各梦。英国《字林西报》专丑诋曹锟这次的篡劫行为，而美国《大陆报》则轻轻为他做了一种奇怪的解释：

“临城案之善后重要谈判正将举行，而黎元洪适于此时被迫出京，此中关系可作数种解释，而最合逻辑者厥为曹锟与直系不欲黎氏参加于谈判是也。曹锟与吴佩孚以直系领

袖地位，现正为众矢之的，盖临地暴举发生地点在曹吴辖境以内，而今之北京政府本为彼等所手造，即黎之复职亦出于彼等劝诱，但黎氏为人懦弱，反对强硬举动（指对临城土匪），此次曹吴既受人攻击，因而急欲拥出一本系有力之人为政府首领，乃意中事。”

《大陆报》除一度为曹锟做了这样一种“最合逻辑”的解释外，以后对于北京政变便不多说话了。而《字林西报》京津《泰晤士报》上海《泰晤士报》等则恰与之相反，他们对于美国雇用的冯玉祥（最近冯玉祥与美国缔订汽车借款，得了几百辆军用汽车）尤其不客气的加以攻击。英报千篇一律将临城案责任加于曹锟一人，而美报则加于曹吴（佩孚）二人，两派帝国主义的报纸钩心斗角，煞是好看！

然则英国果会反对曹锟到底，与美国冲突到底吗？不会的，绝不会的。试看英文京津《泰晤士报》下面一段话：“……列强苟欲诚意扶助中国，今日即一大良机，列强若袖手不顾，交臂失之，罪将不赦，列强应于此时向北京声明，非依某种条件，则列强对于外交团认为临城案负责之人所主持之政府绝对不能承认……。”由此可知只要曹锟依了英国某种条件，英国之承认是不成问题的；只要曹锟屏弃曹锐、冯玉祥、王承斌辈（皆吴佩孚对头）联络奉张的方法而采用吴佩孚先宪后选的方法，英国之承认也是不成问题的。这些不成问题，自然英美协调宰制中国的步骤又可一致；何况临城案前不多时，英美公使赴保接洽最高问题与四万万大借款的阴谋，本是一致的。

据最近消息，津保派第三步方法（先选举）行不通，先宪后选（即吴佩孚的主张）的空气转移以来，英美公使即宴请顾维钧、冯

玉祥及各阁员以示好意；并表示中国中央政府依债约习惯应在北京（即反对反曹各派迁国会移政府之暗示）；同时直派拟承认新银团一切条件，顾维钧已备好就职通电，只待征英国公使同意了。外国帝国主义者与军阀间难圆的好梦也快要圆了。

（载《向导》第31、32期合刊

署名：和森）

北京政变与吴佩孚

(一九二三年七月十一日)

奇怪极了！自北京政变以来，一千人对于阴鸷莫测的吴佩孚有形无形之中竟存一“洛吴反对”的梦想与安慰或欣幸；一些新闻纸对于这个阴鸷莫测的魔王代替他做了许多有利的宣传，这种宣传多少可以增高无政治常识的人们对于这个魔王的神秘同情与期望；此外，黎元洪派更散布“保洛分家”、“吴段联合”的空气以壮虚声，因而国人对于态度不明的吴佩孚更加以莫明其妙的揣测，仿佛狂风暴浪中得了一颗定心丸！

国人不要健忘：去年此时吴佩孚主唱的“法统重光”、“拥黎复位”是什么目的？第一，打倒国民党护法旗帜，使“法统”握于直系军阀之手；第二，利用旧国会制宪，以为征讨西南武力统一的武器。总括一句，仗着他的好身段，足足演了一年“挟天子令诸侯”的拿手戏。

曹锟在当时何以不一定要登“大位”，只是因为“子玉至计”打动了他的心坎，换过说即吴佩孚教他利用黎傀儡，短期过渡，制成宪法，削平西南，然后举“老师”为统一后之合法总统。可是黎傀儡登台后，居然自显神通，“制宪”这种武器转为菩萨所利用。黎菩萨明知宪法不易成立，故意提倡先制宪后选举，宪法不成即黎之地位可以永续不动。至此津保派大呼“上当”，曹锟慌

了，于是制宪经费等问题爆发，遂形成这次的政变。

吴佩孚会反对曹锟做总统吗？他不但不反对，而且是最忠于曹锟的第一人（其实就是忠于他自己），他与津保派不同的，只是要“老师”做各方无词反对的合法总统，五月二十二日《申报》北京专电吴佩孚语孙某曰，予对北京过去之捧场办法实非爱曹，予深致不满，但予为唯一拥戴曹使者，不过所取方法与北京不同。又上海《泰晤士报》北京通讯说：“……至吴佩孚反对曹锟总统运动之说亦非事实，两人举动完全一致，曹氏在北进行，毋使有不虞之事发生，吴佩孚在南进行，使不致有意外之反对，记者此言闻之特别留心时局之中西人士，非敢臆说。”这种消息是很确实的。

榆关奉直和议，确是津保派打击吴佩孚的一种阴谋；吴佩孚对于津保派这次的捧场办法自然极不满意。但现在曹锟已完全采用吴佩孚的办法了，曹锟既电两院，速成宪法，同时津保派与曹家议员三十五政团因他们预定方法行不通的缘故也只得决定变更拥曹步骤：先制宪后选举。

吴大军阀的主张贯彻后，外交团立即表示尊重国会，不干涉中国内政（见二十二日沪报专电）。再过一二月，保证“北洋正统”的宪法告成，“老师”依法正位，外交团表示尊重国会选举之“合法总统”，然后吴佩孚左挟英美金钱之援助，右挟违反国宪之天书，南征北讨，大动干戈，那时候国人们对于吴佩孚之神秘的迷梦便可醒了！

（载《向导》第31、32期合刊

署名：合森）

北京政变与克利斯浦借款

(一九二三年七月十一日)

为筹备最高问题上台的张英华，拟发行二千万元新公债千四百万元盐余库券外，更拟向英国克利斯浦银团借二千万镑。当时双方接洽条件大概如下：(一)借款额为英金二千万镑(合华银二万万)；(二)担保品为盐关两余及烟酒税收全部，克利斯浦银团将派人直接在上述机关坐收本息；(三)期限三十年，年分两次还本；(四)利息全年八厘，先扣半年；(五)实数八四交付，即每百镑交八十四镑，手续费在内；(六)本借款用途，为整理外债和举办实业两项；(七)订立草约后，先付垫款二百五十万镑，以五十万镑偿还马可尼无线电借款，五十万镑偿还维克斯飞机借款，五十万镑偿还芝加哥银行烟酒借款，五十万镑偿还拓业烟酒借款，余五十万镑作为中央政费；(八)二百五十万镑垫款外之借款，由中国开明用途单后，得公使团及克利斯浦银团之承认，即正式签约付现。据各方面证实之消息，所谓十二年新公债与盐余库券皆为莫能实现之画饼，张英华对于财政之把握，只有此克利斯浦借款为有希望。

津保派主持的政变发生后，英国帝国主义者虽假惺惺的声言扣留盐余，但一转移间，吴佩孚先宪后选的主张走上风，克利斯浦借款的声浪随即复活：

(1)《申报》六月二十四日专电：英伦确息，克利斯浦借款已提出对案：(一)借款一千万镑，以半数换给英美旧债票，半数付现金；(二)先订垫款一百万镑；(三)年息八厘；(四)实收九折；(五)无回扣；(六)关盐余担保；(七)先征国会同意；(八)签字日交五十万镑，内以五分三为议员岁费制宪经费，五分一为使领经费，五分一为军警维持经费。九月再交五十万镑，用途由国会议决分配，以国会经费军警维持费使领费政费留学经费为限，余俟债票售出清交。朱兆莘请政府先将大纲通过国会。

(2)又二十五日专电：伦敦电，克利斯浦向朱兆莘声明，百万镑垫款须国会通过，及中国保证不资政争，方可签字(哼！明明借给曹锟做总统，反说这样门面话来欺中国人)。

当今中国人民严重反对猪仔国会之时，当猪仔国会为曹锟制造总统之时，当曹吴加劲看重国会之时。而英国帝国主义者竟亦如此看重国会而以垫款成交之五分三为制宪经费及必须国会通过为条件(猪仔议员那还不通过)，读者诸君试猜一猜，这是个什么哑谜！

(载《向导》第31、32期合刊

署名：和森)

北京政变与各政系

(一九二三年七月十一日)

这次政变中，捧曹派有外交系、研究系、小孙派讨论全民新民各社；反曹派有民党议员、政学系、安福系、民宪同志会。

捧曹派中最可注意的为外交系及进步党之旧侣——即研究系及小孙派，其余无论列之价值。经纪于曹吴与英美之间的外交系，自然成为政变中之红牌，曹吴之总统与统一的好梦，全仗他们在洋大人面前周旋，而英美对于这次政变采用的政策亦全仗他们的献议与报告去决定，吾人已于另篇详言之，此处不必赘说。

年来研究系所号召的是制宪；小孙派所号召的是孙曹携手。这两种奸谋同是建立在捧曹为吴的勾结之上。“法统重光”的政策（年来吴佩孚全仗这种政策逞威风），是去年王家襄辈及在洛阳的小孙派给曹吴计划的，这种政策的里面，就是教曹吴以“法统”，使直系军阀名正言顺的来武力统一。孙洪伊大言不惭的“孙曹携手”策，自以为深得苏张之秘，斗大相印，怦怦然动其心而紫其情，其买空卖空之骗术，曾经本报攻击过几次了。

这次“逼宫”活剧出台后，津保派原定排场大僵特僵，而首先向猪行老板王毓芝献“制宪招徕”之锦囊计的，就是研究系的王家襄、林长民、蓝公武等。他们口头的说帖是：“目下宪法会议法定人数为五分之三出席，如使宪议照常开成，即去选总之三分二

不远。倘宪会停顿，选总人数更属无望，故宜竭力以制宪相号召，诱令出京议员回京，先保住五分三，渐渐引致俾达三分二；然后如何卑辞厚礼设法使之入彀，惟诸公好自为之，不患老帅之大事不成。现在最要者为制造制宪空气，并宜由芝亭（王毓芝）往谒老帅面禀一切，即请老帅发电敦促制宪，佯示并无亟办选举之意，庶声言不赞成选举者可因制宪之名义而回京”。以上是上海《商报》六月三日北京通信揭露的，该通信接着说：“王毓芝袁乃宽等均极口称妙，王并允于谒曹谈到大最高问题时，顺便将王家襄之小最高问题（参院议长）一提，请三爷速为资助以达目的。曹氏敦促制宪之马电，即王毓芝造膝陈词之结果也”。

小孙派在政变中的态度，与研究系完全一致。民治社议员即为最热心拥曹者。黎出京后，研究系议员在国会中提出准黎辞职组织选举会之议案；而小孙派民治社议员即电请曹锟即日入京，后又宣言主张议员不出京努力制宪，孙曹提携可办统一，反对国会迁地。趋炎附势保皇捧袁捧段始终与北洋军阀狼狈为奸的进步党人物，在这次政变中，毅然抛弃其数年来以文化运动欺骗青年的假面具，完全狐狸现本相了！

反曹派中安福系是捧段祺瑞的，政学、民宪是捧黎元洪、岑春煊、唐绍仪、唐继尧、陈炯明的。所以一时国会南迁，多头行政委员会联省自治，孙陈复合的呼声又甚嚣尘上。这些又是要重演广州政府七总裁的故事。国民党若是仍要参与这样军阀（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唐继尧等）及无赖政客（南政北安等）的大团结，结果只有仍如从前一样的上当无结果！

（载《向导》第31、32期合刊

署名：和森）

中国人应这样孝哈定吗？

(一九二三年八月八日)

中国真不愧为一个“伦理”的国，从前会忠孝君父，现在会忠孝洋大人。

现在旧伦理将近崩坏，爹妈死亡不算甚么伤心，同胞罹锋镝被残害更不在意。独对于洋大人则不然。从临城案中，可看出长进的中国人（媚外的军阀、官僚、政客、学者、报纸、商人以至国民领袖）努力建立新伦理（忠孝洋大人）之初步；从哈定之死，更可看出这种新伦理之确立。

哈定死耗一传到中国，中国人如丧考妣：北京两院猪仔停议致吊；上海各马路商联合会提议开追悼大会；各种报纸一律鸣哀颂德；甚么救国联合会、女权同盟等团体以至革命领袖亦专电吊唁；此外外交官地方官奔丧于使领馆，半旗插遍各大都市与衙署。充这般媚外猪仔、官僚、报纸、商人……的心理，纵不寝苦枕块，也要心丧三年（各报多有永毋忘哈定发起华会对华盛德之言）！

这或者不是偶然的事。以前的中国是君父的，所以应当忠孝君父；现在的中国是洋大人的（殖民地），所以应当忠孝洋大人！

（载《向导》第35期

署名：和森）

各省联席会议

(一九二三年八月八日)

唐绍仪、岑春煊、章太炎辈发起的各省联席会议，近日决定两项办法：

(一)由各省代表径电本省长官，陈述召集联席会议之必要，请即派定负责代表来沪洽商时局，规定一省一权，以省区作单位，人员派定后，知照浙江卢督办。

(二)各省代表派定后，由派代表之省区长官联名通电说明集会主旨，并通知国会。

由以上两项办法，可知完全为一种联督会议。而其背幕买空卖空的目的物，就叫做什么中央行政委员会。

金星人寿公司与政学系的老板们，要用这种不费本钱的买卖赢得中央行政委员的地位；差幸“孙中山氏非一省当局”，且其大元帅名义未经奉、浙、黔承认，不得派代表于这样联督会议。同时我们希望汪精卫先生也不要参与这样联督会议的发起罢。

(载《向导》第35期)

署名：和森)

江浙弭兵运动

(一九二三年八月八日)

近日江浙商人由裁兵运动民治运动一退——退到弭兵运动，这个方法倒是便宜极了。裁兵运动至少不费力也须跑到军阀麾下效秦庭之哭（《申报》名人时论栏曾登过一篇这样主张的文章）；民治运动至少不费力也须做到罢税罢市；独弭兵运动只须打一个电报就达到了目的。弭兵运动诸君子打一电报给齐燮元，齐燮元马上答复道：“燮元对于地方人民既以保安为职志，何忍参入政治运动构成军事之原因，耿耿此心，有如皎日，转布惻臆，咸使闻知。”至卢永祥答复之满意，那是更不待说的。齐燮元连政治运动都不参加，弭兵诸君子要算达到了分外目的，世上那里寻得出第二桩这样便宜事？

但是弭兵诸君不要忘记我们的预言：北洋军阀不打倒，兵是永远弭不住的。

（载《向导》第35期

署名：和森）

外交团正式提出之临案通牒

(一九二三年八月十五日)

外交团正式提出临案通牒，内容约为下列三项：

一、赔偿问题——每个捕掳的洋人赔偿八千五百元之数；

二、保障问题——(1)外交团要求中国政府对于负责之人加以相当之罪，外交团又保留在通商口岸之租界内驱逐此种犯罪人员之权；(2)关于护路政策，外交团现在心目中所存之改良案为改组护路警队，以特别编制之中国路警受辖于外国军官之下，此类军官受有保护中国铁路之付托，外交团保留关于路警详细办法之提案权利；

三、惩办问题——(1)山东督军田中玉从速免职，嗣后在中国领土内不得予以任何官职并不得予以任何勋章勋位等项；(2)兖州镇守使兼山东第六混成旅旅长何锋钰免职，嗣后不得予以任何军事官职；(3)津浦路局警务处长张文通免职，嗣后不得予以任何管理路警之职；(4)第四次快车警察长赵德昭免职，嗣后不得再行任用。

自临城土匪闯出这场洋祸，外国报纸及戴着“侨商”假面具的侵略家，在中国境内大吹大擂摇旗喊呐威吓中国人民两三月，吓掉中国人的魂魄，奴化中国的舆论（有向洋大人叩头谢罪的，有请洋大人惩办曹吴的……），使人人存一“洋人圣明，奴罪当

诛”的“待罪”莫测心理；然后千里来龙结一穴，至此才把“常人则以条件和缓为异，……远低于预料”（见《字林西报》）的通牒提出来；果然前此大惊小怪叫嚣不休的中国报纸，现在默若寒蝉，一声不响，大约真是以条件“和缓”、“公平”（见《字林西报》）为远出于其预料之外了！

北京卖国公司的洋奴们在十日临时特别阁议席上对于这个通牒还说了几句“田、何免职事关中国用人行政之权，特别路警关系中国主权甚巨”的官样话；哼！代表舆论的报纸，连这几句官样话也不敢说吗？

（载《向导》第36期

署名：和森）

国人还不急起抵制 英国亡我的侵略吗？

(一九二三年八月二十二日)

威海卫之吞并危在旦夕
津汉租界满期又要续租
借口临案攫夺路权
海军示威将迫我为城下之盟
捕头督路已置我为刀下之肉
国亡在即！
民气何在？
起！起！！
急以对日手段！
抵制英国亡我之侵略!!!

国人们，被英国帝国主义宰割一世纪的同胞们！亡国是在眼前，你们如何还不觉得，日本亡我的危机，仗着你们激烈的反抗已是挽回不少；而英国对我的侵略，你们视若无睹，听若无闻，致令日尝月试，得寸近尺，其胆愈大，其欲愈炽，现在亡国是在眼前，你们还不急起抵制尚待何时？

你们对于青岛和旅大问题是何等的注意何等的表示过呢；

假使对于威海卫之收回予以同样的注意和表示，何致今日成为永租吞并之局，何致前此能去曹章陆而今不能去一梁如浩？

你们坐视威海卫沦丧，一声不响，好似这块肉只关山东人的痛痒；又似乎只认收回旅大为当务之急，而威海卫则可任英国永远霸占。我不知英国在华有何功德，而中国人对他应如此“孝顺”如此“礼让”！

功德是有的，最先是用大炮轰破中国的门户与“体面”，打破中国人民一切抵抗，强迫中国人吃他的鸦片烟，买他的商品；复次是敲诈大宗赔款，割据香港九龙……霸占各大通商口岸，以至划定扬子江、西藏……为他的势力范围；复次是握住关税盐务及中国一切经济生命的最高权；复次是帮助袁世凯、吴佩孚、陈炯明等乱国至今……

英国帝国主义者仗着他这样高功厚德，要求永占威海卫之不足，更以同样态度要求续租汉口天津租界（今年满期）九十九年；犹以为未足；乃借口临城案攫夺全国路权，强迫设全国路警置于其巡捕头（名卜鲁斯，为上海最著之残酷贪暴捕头）之下，也就是将全中国置于其刀俎之下！

刀下的肉是不可逃的。报载：“英国护路提案，志在必行，故现在正从事运动各国，将来中国对于外交团护路之要求，若果出于拒绝，则英国主张用下列方法以强逼其承认：（一）海军示威，即由各国派遣军舰，驰入中国各港，以为示威举动；（二）增加各国驻华之军队；（三）无期限延缓华会条约之实行。现在英国朝野上下公式或非公式鼓吹此说者极为有力云”。

英国帝国主义何以敢于这样坚决呢？英公使宣言：“华人实愿共管，自护路案提出后，华人并无一言”。故积极猛进，必期达

到目的。然则英国帝国主义这样猛进的侵略，乃借口建立于华人志愿之上，人间可悲可愤可羞耻之事宁复逾此！

人若说中国人不甘为日本奴隶而甘为英国奴隶，听者必不愿闻。但事实是不可抗辩的，“华人并无一言”，这是英国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顺民”的写实。假使国人反抗英国侵略之态度能与反抗日本等量齐观，英国帝国主义者敢说“华人实愿共管”而如此无忌的侵略我国吗？

国人们，亡国是在眼前，我们若不甘心情愿为英国的奴隶，我们便应立刻动员排斥英货，以抵制日本有效的手段来抵制英国帝国主义亡我的侵略！

（载《向导》第37期

署名：振宇）

护路案与各国间之利害冲突

(一九二三年八月二十二日)

东方社二十一日所传中美通信云：商业立国之英国，自欧战以后，因失俄国与德国之二大市场，故不可不以中国置诸其管辖之下，以谋商业之发展。然近来因为中国所排斥而受困，故遂嗾使与中国商业关系最薄之意大利及荷兰两国公使提出此次之要求。现在法国尚未赞成英国之主张，日本则对于英国又别抱意见，独美国反对之。然形势极危险。要之昨日之委员会英国案虽有多数之赞成者，然日本公使谓须征得本国政府之意见后始可承认。从而其详细办法，现尚未定。又英国似欲推荐英人卜鲁斯氏为护路警察局长，然以有反对之者，故英国甚困难。征诸此佣人问题，英国之阴谋，近将暴露矣。就此问题，中国政府以英国起草之办法认为侵害主权，故交通部与参陆办公处协议，似拟有自动的设护路总司令部，任曼德中将为总司令云。

欧战后，英国国际地位一天一天跌落，欧洲霸权移于法，世界霸权移于美；自鲁尔占领后，法国经济情形日佳而英国经济情形更坏。“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中国在英国帝国主义者的心目中，自然是他们的“桑榆”。

虽然，中国这块肥肉却不是英国所能独享，英国这次主持的护路案之目的，就是要倚靠他在中国路政上既得的优越地位，借

着临案机会，来确定他在中国的霸权。这样一来，第一受打击是美国，第二受打击的是日本。假使英国护路案能告成功，美国华会政策便尽付之东流。英国若在中国从新建立这种绝对优势，美国新得到的世界霸权便将复返于英，而英日同盟迟早又将复活之日。所以现在美国的反对，比较日本更甚。法国在骨子里，自然也是反对的；不过他知道这项反对的主人是美国（法国在远东地位居第三等），用不着他出面打丑，而对德问题扼英正甚，并且始终要得英国之妥协才能达到圆满目的，所以他对于护路案的态度是很鬼巧模棱的（有传其赞成的有传其反对的，大约不外其在对土问题中所演之故技）。总括一句：护路案中的各国利害冲突，英日英法间是多少可以妥协的，而英美间之妥协则决不可能。

并不因为美国帝国主义者为其自身利益而反对英国护路案之故，中国人民才随声反对；中国人民应自觉的站在自卫的见地上，并且明白英国此时在欧正见扼于法并无多大余力对付远东，而自动的迅速的起来反抗英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才不失为自觉自卫之中华国民！

（载《向导》第 37 期

署名：振宇）

法国复英之牒文

(一九二三年八月二十二日)

路透社二十二日巴黎电：法国致英复文，首言法国之地位，谓有切实解决之要素。法国对于赔偿问题从无自私政策，苟不统筹欧洲全部之利益，则不能解决此问题。法国常考虑及协约国之困难，而尤注重英国可悲之失业状况。法国依据和约立言，凡违反和约之举动将成危险性质之前例。复文继引证在赔偿委员会估定赔款前后法国对德之种种让步，乃此种让步未获报酬，但反招德国之一再违约耳。德国在一九二二年底自使其经济地位愈趋恶劣，从无自行整顿之举。德国所取运输费视他国为低，官吏薪俸则有加增，对于实业家与航业家未尝征税，且予以各种便利而造成新船业，在美国海上与英法航业相竞争。德国开浚运河，增置电话，凡法国所不得已而展缓之工程，德国辄兴办之，代价几何，非其所计。德国情形如此，法国乃依照前所声明夺取保证之意旨，决计占据鲁尔。复文至此遂言占据鲁尔之合法理由。但谓俟消极抵抗停止后，占据情势可以更变。复文请协约国收甲乙两种债券，法国所应有之二百六十万万金马克拨归法国。并收两种债券，法国所应得之任何款额拨入协约国债款项下。复文又谓德国能力与资产应随时占定，到期赔款之偿付可视情形而更变之。此种更变，须由赔偿委员会多数票决定之，人民与

产业所受之损失，应较战费更有取偿之优先权，此为无可疑者。故在德国未开始偿付以前，而协约国彼此欲索取战费，此乃莫可索解之事。法国愿与英国等作友好的讨论，想不难获一种谅解。一面规定第一部分德国赔款等于兵燹区域修复经费之解决，一面规定第二部分德国赔款及协约国战债之展缓。想英国未必欲于赔偿问题未解决时，索取协约国所欠之资也云云。

此牒可注意之点有四：（一）说明德国经济及财政状况之充裕，坐实德国“自使其经济地位趋于恶劣”的赖债政策；（二）申辩占据鲁尔之合法；（三）拒绝决定赔款总额；（四）在德国未开始偿付前，拒绝英国向法国索债。

英国帝国主义者读了这个复牒，自然又羞又恼，然而你怎奈他何？“单是吵嘴有何用处，准备战争罢”。英国帝国主义者纵然无时不有此觉悟，哼！奈何“我们的航空军力远不如法国”！

（载《向导》第 37 期

署名：振宇）

“德国中等社会 总理之最后一人”

(一九二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二十八日伦敦电：《每日图画报》今日载德总理史特莱斯曼博士之谈片，谓今政府如因不能有所成就而倾覆，则恐彼将为德国中等社会总理之最后一人。果尔，则匪特德国，欧洲大部分咸将困于布尔札维克主义。德人如得饱食，则自可无虞。今唯英法德三国之谅解，可恢复欧洲秩序和平与幸福。故当群策群力，以消除此惨烈风潮云云。

上次大战不仅根本上破坏了德国，而且灭亡了德国；现在德意志并没有国家的存在，只有资本大王史丁纳个人的存在。过去的古诺内阁和现在的史特莱斯曼内阁，同一为史丁纳的账房。

大战与赔偿把德意志全国弄穷了，而史丁纳因此而愈富。马克之跌落，一面固然是德国资本主义根本破坏的表征，一面也是史丁纳操纵金融，内以剥削劳工（马克愈贱即工资愈减），外以竞胜国际市场（马克愈贱即商品成本愈低）抵赖赔偿的奸计（上次法国复英牒文所言德国赖债情形，并非全属虚无）。

然而史丁纳并不是反抗法国的；他计划欧洲资本主义的复兴，主唱“法德携手”；他与法国铁业大王罗奢往复勾结，曾经一度订过公式的条约，后来虽然决裂，然而这种计划在他利益的立

场上面是始终不会抛弃的。

史丁纳有名的复兴德国的经济计划是：国有产业卖给私人经营；对法赔偿由他私人与法资本家订立货物偿付条约（例如法施乃德工厂向史丁纳取去煤若干，即为抵偿赔款若干，亦即为德政府欠史丁纳若干）；无限增加消费税、间接税，使赔款负担完全落于一般人民身上——即工人农人身上；极力减少工资延长工时……。史丁纳因为要实现他这种计划，一脚踢倒赖齐诺（外交总长，上年任中被暗杀），再一脚踢倒韦士内阁而建立古诺内阁。

古诺任中一无所成，并不是古诺无能（他是个很能干很智慧的账行司爷），只缘德国资本主义命数快要告终，而法德资本间之冲突终虽妥协，所谓“复建欧洲经济的平衡”，不过是相互间自欺欺人的废话。

从反的方面说：物价不停的增高，工人贫民及一般雇用人员，已不能过活；纸币充满全国，而金货集中于极少数资本大王之手，农人小商人皆破产而不能买卖；消费税征及面包冷水而资本家反日逃出于国家严重负担之外。怨毒斥充，全国汹汹，岂特劳工不平，揭竿而起，即农人及一般平民莫不儻然不可终日，愿与资产阶级（即所谓中等社会）偕亡。

古诺去而史特莱斯曼来，史的本领大过古诺吗？不错，他是人民党的领袖，换过说，他是德国法西斯党的领袖，即此一点看已可出德国资产阶级政象愈趋于尽头。“今政府如因不能有所成就而倾覆，则余将为德国中等社会（即资产阶级）总理之最后一人”，这确是一点不捏白的真话！

史特莱斯曼内阁所要成就的是什么？不用说仍然是史丁纳的计划：对内极力剥削劳农及一般平民，对外再谋法德携

手，——然而这个目的不是从前的抵赖政策可以实现的，只好用投降的方法来实现。史特莱斯曼在上台之前就与史丁纳下了这个决心，故上台没几日即宣布“举德国经济统系之一部而为生利的担保品，并非过大之牺牲”；史氏这个演说自然博了法国资本家的喝彩，二十五日巴里电传法国各报评德总理演说，谓其语调表示较好之意思，并称：“德总理并不坚持鲁尔之冲突，而对于法国黄皮书所载法国之意见以此为解决赔偿之基础者，亦认为德国所不能愤懑之办法”。史特莱斯曼准备向法国投降，多少是无疑的了，我们更看下列消息：

路透社三十日巴黎电：据报纸消息，德代表将赴柯白伦斯与协约国委员会商来因地民食供给问题时，曾与柏林有关系之各部长讨论此事，闻德政府准代表要求法比管辖下，各铁路运输食物之便利，此种消息，甚为反对党所不满，某德报称，此乃对于消极抵抗主义之打击，又谓史特莱斯曼内阁现将投降法比矣云。

前此德国派遣肥微尼求美国予以财政上之援助，肥说美国曰“法为欧洲防遏布尔札维克主义之屏障，美国若坐视不救，布尔札维克主义将不仅泛滥于全欧，而且将泛滥于全世界”；现在史特莱斯曼对法之演说如出一辙。虽然，资本主义的破灭始终是不可逃避的；现在各资本国家的冲突，千方百计莫能调解，最后只好借助“布尔札维克主义”来图相互间的妥协，可见资本世界的末运更是不远了。

（载《向导》第38期

署名：振宇）

洛桑会议后近东危机第一声

(一九二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意大利派赴阿尔巴尼亚勘界代表台里尼将军及随员三人，行至希腊边界遇害，于是近东战云斗然忽起。意政府向希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要求下列条款：(一)希腊最高军事当道须赴雅典意使署，以完全官场之性质陈达款忱，(二)被害者须在雅典大天主堂举行庄严殡礼，希政府全体人员须赴教堂吊唁，(三)驻璧鲁斯之希腊舰队须对特别派往之意舰队举行敬礼意旗礼，放炮二十一门，鸣炮时悬意旗于桅上，(四)希政府须于五日内会同意使署军事参赞在出事地点严密查究，(五)凶手须治以极刑，(六)五日内付赔款意币五千万里尔，(七)遇害者遗骸装船运回意国时，希腊须对于遗骸加以陆军敬礼。同时意军集中于南方并遣驱逐舰哇达斯号驶抵唐吉尔，限希政府二十四小时答复。而借口临城案强暴要挟中国的英国，显然发表袒希意见，攻击“意国行动颇嫌操切，而哀的美敦书之条件亦逾分严厉”。这样小题大做的事变，内容含着什么意义？请看下列路透社消息：

三十一日伦敦电：洛桑和约虽经批准，然土国与希腊皆不完全满意，布国因未得通海之路，亦复失望，而阿尔巴尼亚边界之勘定，又引起仇忌，故今日若以火把掷入巴尔干，则爆裂蔓延之险，正不异于欧战将作时也。伦敦各报社论皆

以此为虑，虽一致表同情于意国之愤懑，但惜意相操切从事，恐将碍及欧洲和平。并谓证据未得，罗状未详，遽令希腊负责，是否公道殊堪疑问。国际联盟会今日适开始集会，此事宜提交之。虽意相或未必实践其言，但警报迭来，谓意国有仇视希腊之示威行动，且有意舰队已奉密令之说，空气愈趋紧张，意相第二步之性质，诚人所亟欲知之者也云云。

英国帝国主义踌躇满志的洛桑和约，内中包含这多不平与失望（这犹是英国机关路透社说的，其实岂止不平与失望）；前此杀人不则声，至此新战争爆发，才令世人领略洛桑和约一点真相！

这还是洛桑会议后近东危机的第一声，并且是与和约批准之日同时发生的；第二声第三声……之来，自然还要更耸人听闻。

资本主义世界之有战争，真如天空之有风雨！

（载《向导》第38期

署名：振宇）

非正式谈话 可解决赔偿问题吗？

(一九二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二十八日比京电：比国致英复牒论占领鲁尔合法之问题，谓比政府不过将协约国政府从前于同样情形下所一致筹定之办法，施诸实行耳，斯巴会议曾有续占德国土地以实行协约国关于矿煤事决议之谅解，且屡次集议，从未发生占领是否合法之问题，法比政府除视德国付款多寡酌定退兵外，决意不让出鲁尔，但消极抵抗停止时，法比可设法恢复，如一月十日所言之鲁尔状况，德国赔款与协约国债务两问题，现已互相结合，协约国所表示之最低数目已使一九二一年五月五日付款表中所开之最低赔款数目有减去若干之可能性，至于德国币制必须固定，财政必须由协约国监督，则早已议定，比国共已收德国一，二九九，〇〇〇，〇〇〇金马克，英国已收一，二九七，〇〇〇，〇〇〇金马克，法国已收一，一七五，〇〇〇，〇〇〇金马克，其他国家共收六三二，〇〇〇，〇〇〇金马克，比国所谓应得付款优先权之兵燹区域，乃指协约国所受之任何物质上损失而言，英国航业因德国行动而遭之丧失亦在此列，比国例此根据，当得德国赔款总额百分之十三，计六，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马克，其中有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马克业已收到，若照赔款表，则规定应给与比国

者，逾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马克，两数相差颇巨，比国为联合迅速解决计，现愿牺牲此相差之数云云。复牒又谓比政府以为今日时机已到，可改变从前所采关于赔偿问题之手续，友好而思虑周密之谈话可在协约国大员间行之，不必有会议之召集，七月二十日英牒亦有此意思，主张开协约国间之谈话，而八月二十日法国复文，亦请以更周密之形式从事谈判，比政府对此两种建议，皆所赞同，而以为将来谈话当可有上述两种建议之效力，国家安全问题，甚关重要，苟被侵诸国之安全未有保证则军备无真正之减轻，此大问题一经解决定可使目前所讨论之各问题发生愉快之影响，比政府愿再声明欲与英政府讨论此问题之意云。

哼！秘密谈话的方法，你们在宰割近东和远东弱小民族各种问题中发生冲突时，是常常奏效的；现在要用以解决这样短兵相接的赔偿问题，恐怕没有如此容易罢（并且这几年中你们往复会议秘商的事情至少也有几百次了！）？不信，请看英国官场非正式的答复：

比牒未使时局稍异于协约国互换牒文以前之状况，比牒对于英国所提国际委员会公估德国付债能力之议，未置一言，徒言各协约国所要求之数，于事无济，以全部赔偿问题必须从对于德国付债能力之观察点而加以考虑也。一九二一年五月规定德国债务为一三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马克，比牒今愿减收，然德国仍须偿付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马克左右，据英国财政界观之，此为莫可实施之一事。

又谓：“英政府对于比国所提协约国间开非正式谈话之建议，以为如此种谈话有成功气象，则英政府愿参加之，但若法比

意见不容更变，则此种谈话不但无益，且有损亏，闻英当轴之意，仍以为将英国地位公布于众，实与英国有益，如协约国明白表示愿有协定，并准备依照时势更变态度之意，英国方允与闻此秘密外交之谈话”。

（载《向导》第38期

署名：振宇）

国民党应号召国民 反对英国的侵略

(一九二三年九月八日)

铁路共管的危机，威海卫丧失的危机，凡有知觉的国民已莫不感觉，难道代表民族利益而革命的国民党反不感觉？

段祺瑞、吴佩孚等军阀尚敢宣言反对铁路共管反对临案要求（无论其动机怎样），难道代表民族利益而革命的国民党反不敢宣言反对？

威海卫的得失并不比广东的得失小，外人统治中国的危险并不比军阀统治中国的危险轻，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并不是只问内政不管外交的谬误观念所能收效，我们不知国民党对于如此严重的英国侵略何以要一声不响？

有人说，孙中山先生要打得广东推翻北京政府，自然不能开罪英国。这完全错了，国民党要无情的反抗英国，反抗一切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才能够打倒曹、吴、陈炯明诸军阀而管理中国。土耳其国民党若不先反抗英国与希腊的侵略，怎能推翻君士坦丁政府（如中国北京政府），怎能管理土耳其？

我们敢断言：国民党不反抗英国，国民党的革命始终不会成功。我们希望国民党本部以招待议员先生同等的时间，在上海

号召一个抵制英国侵略的国民会议!

(载《向导》第39期)

署名：和森)

一片欢迎苏俄代表声

(一九二三年九月八日)

我们试回忆苏俄来华代表自优林以至越飞，一到北京，那一个不受英美报纸总动员的攻击，那一个不受英美派洋奴外交家的冷遇，换过说，那一个受过如今日加拉罕氏到京时的欢迎？

哼！欢迎队伍不仅是学生、人民团体的代表，而且有“西北边防督办”冯玉祥的代表，不仅王正廷奔走殷勤，顾维钧亦派著名英顾问辛博森迎之于奉天，英美报纸不仅在消极方面不攻击，而且在积极方面鼓吹或希望中俄会议之速开。

人民、学生团体方面的欢迎，确是进步的现象，确是中华民族觉悟的先声，并且是十二分的自动的诚意，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冯玉祥、王正廷、顾维钧、辛博森及英美报纸之欢迎与希望，这就很值得注意了。

读者注意：这样的变化并不是起于加拉罕之来华，但是起于越飞之渡日。我们回忆越飞渡日与后藤男爵非正式谈判后所引起英美报纸及路透电之何等的注意与惶恐，便可了解这种变化的起源。

读者诸君如欲得更进一步的了解，我可先设一问：现在的北京政府，除了是曹吴的账房之外，是不是英美的代理机关？如认为完全是的，我便可说下文了。

北京政府现在之断送路权（所谓自动护路案）与断送威海卫，正在半推半就主奴结托的把戏中努力进行；而同时对于外蒙与中东路却象要同时努力，“收回主权”。断送主权与收回主权两种正相反的事情同在顾维钧手腕下进行，这是什么意义呢？为的是英美一面要获得中国的路权与威海卫，一面又要获得中东铁路与外蒙古（自然是委任西北王冯玉祥去代管）。

然则在现在全国否认的英美代理机关的北京政府之下，中俄会议既无意义，中俄二民族的真正联合更谈不到。

（载《向导》第39期

署名：和森）

大元帅赞助何东爵士吗？

（一九二三年九月八日）

九月七日《民国日报》译电栏载有一条顽意儿的消息，标题为“大元帅赞助何东爵士”，其消息如下：

六日香港电：孙中山电何东爵士，谓爵士所建议之会议，如成事实，彼拟亲晤中国其他诸领袖，何已乘亚后号赴沪。

何东是什么东西？是一个香港的富商。他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看他的姓名是中国人，而他的头衔却是英国的爵士。一说他入了英国籍，一说英国赐他这种头衔，俾他以中国富商和英国贵族的两重资格在中国政治上来出风头。

何东所号召的会议是什么东西？据路透社第一次所宣传的是“在西人监督下的全国领袖会议”。

我们再看这位爵士给顾维钧、颜惠庆诸人的一封信：

不佞前与驻港路透电访员谈话，注重于全国领袖人物团聚会议，以期得一彼此相安之方法，想执事披阅报纸，当已鉴及。又北京电称旅京外国人士均以愚见为然，此电想亦经北京报纸揭载矣。此间报纸多赞成愚见，即北京《东方时报》亦表赞同。不佞欣慰之余，不揣冒昧：敬求鼎力助成此举。执事声望隆重，各界推尊，必能调停于党派之间，故执事之能援助无可疑也。不佞于此举现正努力进行，孙逸仙

博士、前总统黎元洪君，已先后复电赞成，若会议竟能召集，则不佞之欣慰，有非可以言语形容者矣。北方领袖诸公，素与执事接近，如能因片言九鼎之力，而赞成愚见，赐以函电，允届时躬临会议或派代表出席，则执事之造福于中国诚非浅鲜。如执事对于愚见所拟办法，能先赐电赞成，实为感盼。至进行方法如何能迅达目的，倘蒙指示，尤所欢迎。不佞深信此举惟求中国大局之底定，人民之安乐，他无所图，想必有成效可睹也。如蒙电复，尤为感幸。何东拜启七月三十日

由此我们可以完全明白了：也不是顽意儿，也不是出风头，原来是英国帝国主义另出心裁的妙计，嗾使一个亡国妖孽来召集中国的亡国会议，轻轻儿把中国置于英国监督保护之下。这种空气的制造到是不费力：路透（英国机关）访员在香港发一电，旅京外人桴鼓相应，《东方时报》（英国机关）亦表赞成。外国帝国主义者愚弄中国人的把戏真不少，这要算是其中最饶趣味之一个。

若说这样的把戏会博革命领袖的赞成，有谁相信？所以何东口中“孙逸仙博士复电赞成”的话，我们可不追究；然而《民国日报》标题的“大元帅赞助何东爵士”，则未免太使人骇怪了，我们相信大元帅不会如此失察罢！

（载《向导》第39期

署名：和森）

日本大灾在国际上的意义

(一九二三年九月八日)

此次日本大灾在国际上发生什么意义？第一是日本国际地位的跌落；第二是苏俄在太平洋地位之增高；第三是此后为中国大患的只有英美。

日本遭了这次大劫，无异天然的解除他与英美抗争远东霸权的武装。此后他不与苏俄联合，便不能消极的保持他和英美的均势。英美在日本这次大变后，对于中国的掠夺，自然更图急进与独占；然而别一方面又要逢着一个根本反对的强敌，——这就是苏维埃俄罗斯。从今以后，苏俄将成为太平洋上惟一保持远东和平与援助中国独立的强国。

前此日本帝国主义过于强盛，不仅是中国的患害，而且也是苏俄在太平洋上伸展其正义与扶助弱小民族之权威的障碍。从这次事变后，这种障碍至少要减去一半。日本军事的势力，今后至多只能自保而不能胁俄；俄于远东问题将渐有优越之发言权，而其红军势力自亦足以与其反帝国主义之正义相伸长；他方面，英美如欲劳师远渡以胁中俄，无论事实为难能，即能亦适足促成中俄日之大联盟。

华盛顿会议，于中国国际地位没有什么变迁；到是这回大灾，于日中俄皆同时起了变化。国人对于这种大变化要有深切

的认识与努力,务期早日完成中俄二大民族的联合;然后再在适当限度内,联合日本以排除盎格鲁萨克逊帝国主义于东亚之外;那时候中华民族才能得到独立与解放。

(载《向导》第39期)

署名:和森)

哈尔滨撤销地亩运动 与列强之干涉

(一九二三年九月十六日)

哈埠市民撤销地亩运动，横受驻哈各国领事越俎干涉，将地亩处文卷一概封锁，并且要强迫取消哈埠中国官厅与市民在特区设立之地亩局。中国人民自动的从旧俄白党手中收回主权，而竟遭第三国如此横蛮侮辱的干涉，他们干涉的借口，说是“违反华会决议”。我们哈埠同胞要算第一次亲切领略华会决议的滋味，这种滋味的甘苦要哈埠同胞自己说出来，用不着我代说。

华会决议岂特是哈埠同胞受外国干涉与压迫的机括，洋大人现在要共管全国铁路，将来要共管全中国，也莫不是根据华会决议为其宰割的根本法规。立这种宰割中国根本法规的发起人，无用说就是素称“亲善”的美国。美公使舒尔曼不先不后，正当哈埠华人受外国领事（美国领事在内）高压时，施施从北京跑来哈埠，哈埠同胞以为他是来施恩惠讲“公道”的，故天真烂漫的欢迎他并向他诉冤。九月八日哈埠各团体代表程小川、陈际青、张维中、李明远、范俊夫往访舒尔曼陈述撤销地亩运动之理由，现在请看这位“亲善”而“公道”的美国公使之答词：“贵代表顷述及地亩处事，纯属行政范围，无外交关系，余不谓然。华府会议，各国承认在俄国无正式政府之前，贵国代管东路，在此管理期

间，自应保持原有财产，地亩处所管地亩，系根据霍尔瓦特与吉、江两省长官订有购地合同，既有此合同，所购之地即为东路财产，此时应予保留，以俟俄有政府，再解决此事。”

这是美国帝国主义者亲自向哈埠同胞揭开他的毛脸：第一，他视中东路为各国共有物；第二，他否认中东路之中俄主权，而以代管之名委于中国；第三，永远不承认俄国正式政府，并使中国也不承认，即为他们攫取中东路的方法。

陈代表驳舒尔曼道：东路财产界限至明，以路线用地为限，若于用地以外任意展放，经营农产，划分街市，移民强占，此亦谓为铁路财产，华会议案，尊重领土主权之谓何？不图贵公使犹不谓然！且华会既承认吾国对于该路之行政权力，国家行政之权不受何等拘束，岂对此无效占有之地亩，独不得行使其权，而必谓此时应予保留乎？舒尔曼咬紧牙根答道：“东路不应有行政权，美国早有此主张，故对于东路由不纳税。至地亩处附带有若何行政权，余此时难以论断，此又涉于法律，言至此可分为两层说法，一俟俄有政府，再以此事有碍行政，和平商酌划分，一按法律组织法厅裁判，余对于贵国行使政权，极为尊重，惟关于东路财产，不能不公共保持。”

共管中东路的主谋不是别一个，原来就是美国。这是美国帝国主义制日制俄侵华的主要阴谋之一种，哈埠代表向他申诉向他论理，除了领略华会决议与中美亲善的真意味外，自然只能辱上加辱受舒尔曼一些蔑视中国人民主权的欺侮！而且是光着眼睛向我哈埠热心爱国的同胞欺侮！

哈埠亲爱的同胞们！你们不要虎头蛇尾，务必坚持你们的运动到底，你们更要了解中国若有真正独立自主的人民政府，早

日自动的承认了苏维埃俄罗斯，何致中东路现在还握在白党手里，各国领事和美国帝国主义者何敢这样的欺侮你们压迫你们？你们现在更要采取必要的手段与表示以反抗白党与各国帝国主义者的干涉。你们的口号应是：

撤销白党把持的地亩处！

反对第三国无理干涉！

承认苏维埃俄罗斯！

（载《向导》第40期

署名：和森）

美人私运军火与 临城土匪军火之来源

(一九二三年九月十六日)

“美人凯奈，前因私运军火进口案被逮，曾由美公堂预审，经美检察官胡萨提起公诉，控以违犯一八五八年及一九〇三年中美条约之罪，十四日下午在美按察使署开审，胡检官控氏于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与停泊吴淞之俄难民舰队司令施德克上将及梅易，霍维兹等，互相勾结，买卖军火，违背中美条约，并于同时以此项军火售与杜海军司令，在南京交货，嗣后此项军火，闻有为临城土匪等所得者，凯氏至少曾以四万元付给施德克上将，有天津盐业银行支票四张，然此仅系实价之一部分，此外尚有米勒炸弹九百枚，及其他小件军火，由俄难民在吴淞及崇明售与华人云。”（见《大晚报》）

这类消息与事实，在中国要算是司空见惯毫不稀奇；中国的土匪与军阀本是外国帝国主义一手所造成也不稀奇；只是临案后外国帝国主义提出共管铁路的护路案，国人至今一声不响，倒是稀奇！

（载《向导》第40期

署名：振宇）

德法间快要成熟的买卖

(一九二三年九月十六日)

路透社十二日柏林电：德总理史特莱斯曼氏向德国新闻记者发言，谓鲁尔问题之解决，非赓续消极抵抗或采用武力政策所能成，如政府能缩短此争端之时期，可谓告成大功。但就已有之探询而言，来因地主权及鲁尔恢复自由之问题，颇多困难，德国准备予以真正之保证。德总理继又声明谓德国现已提出之担保品，确为可变卖之资产，不仅如和约所规定之抵押品，法国即可取得巨资。但德国先须有在鲁尔行政之权，且须恢复来因地主权，苟有让出鲁尔及恢复来因原状之保证，则此办法即可解决消极抵抗之问题。凡德人之有家室于来因地或鲁尔者，若得家室恢复之保证，则当然将复致力于工作。此种解决，度必可能。政府已得实业界与财政界代表之允诺，各愿分认政府所拟计划中之义务。此事能否有谅解，将视能否造成适当空气为定，希望法国当道亦抱必须以公道政策谋取和平之见解，盖惟公道政策，始能消除国家感情而保障永远和平也云云。

又巴黎电：法政府某要人在报端言称德总理史特莱斯曼之对外政策确在改善德法间关系，故法国不当向其作难，惟法政府所根据为政策之各事不能对德国让步；又云德总理请派专门家调查一节，巴黎政府当详为考虑。

然则法德间——史丁纳与普恩贲间的买卖之快要成熟是无疑的了。史丁纳拍卖德国给法兰西的决心，本报早已料其必委托史特莱斯曼内阁死心塌地的进行。自史特莱斯曼上台，即取停止消极抵抗之必要手段，裁减政府对于鲁尔人民之经济辅助，因而鲁尔人民对法消极抵抗之势顿形衰落。现在普恩贲与史特莱斯曼的讲价只有私产担保之一点。史特莱斯曼说：“凡尔赛和约规定德国债务之担保不过为德国联邦之国有产业，今德国之建议愿举私有财产尽为担保，则法所得之便宜实超过和约规定之外”；普恩贲答曰：“和约既以德国国家各种产业为质矣，德国纵有所允，亦无以加此，故法国宁愿有已在掌握中之实际担保，而不愿有此理想上之权利，吾人欲得实质，须俟款到手时，始能离去也。德总理以为法德实业之合作，乃赔偿问题解决之前提，要知此种意见，实与事实相反，德国产煤法国产铁，双方若有谅解，诚为双方利益，但法人所视为第一职务者，乃欲政府获取赔偿问题之结果”（见九日及十三日路透电）。

史丁纳及其他德国资本大王愿意提供私产为国债的担保，这是何等热心的“爱国”，而我反说他们要拍卖德国给法兰西，岂不惹起读者的疑惑？然而这是不难了解的，请看全德工业联合会（史丁纳为领袖）向政府提出的条件：（一）改良国有产业；（二）极力增加生产，取消八小时工作制；（三）取消一切强制经济及对外贸易之检查，即面包亦须改为自由交易（现由国家强制订价）……（见《新闻报》德国通信）。所谓改良国有产业，就是包含国有产业卖归个人经营的意义（参看本报上二期）。史丁纳等借着“私产担保”的政策，不仅获得各大国有产业，而且从此得尽量掠夺工人，抬高物价，自由无碍的操纵全德经济生命；拍卖德国

于他们是这样的有益，只有全德工农小商人及一切工钱生活者遭他们的殃！

法德间这样的买卖不仅要惹起德国工农及一切平民的大反抗，而且要惹起英法间严重的冲突。法德若是这样妥协了，英国在大陆上便将丧失一切经济的与政治的势力。

英国在波纳劳内阁时代，对于法国占领鲁尔取“含默”政策，包尔温内阁则不然，因为他所代表的是英国在大陆上的商业资本及银行资本，所以上台不久即向法国翻转毛脸，而其第一惊人的决心便是增建六十队航空军力。

法国现在的航空军力大过英国十倍以上；英国增此六十队后，还只能赶上法国航空军力之一半。包尔温现在是要等此航空军队完成后，才向法国说响话。英法间的战争迟早是不可免的；而包尔温内阁对于史特莱斯曼内阁的拍卖计划，预料不久必加以严重的干涉。目下呢，英国政府当然是哑子吃黄连，又苦又急。

（载《向导》第40期

署名：和森）

呜呼！英国侦探的和平运动

（一九二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在外国公使监督下召集和平会议的阴谋经本报揭破后，中英合璧的“何东爵士”居然大胆来沪，来沪之后居然大胆向全国国民发出延请外国公使列席和平会议的主张，又居然大得各大绅商及报纸的趋奉与颂祷。呜呼！这是何等亡国的现象！呜呼！这是何等丧心病狂的现象！

悲哉《商报》之言曰：“记者常见沪上商人，每有同业之间发生小小争议，双方必互请外国律师……此种不长进之心理，即民族衰亡之预兆，今若以解决国是之会议，亦必有待于外人之插足，则中国先已不国，毋宁并此种可耻之会议而不愿有之”！

前此所谓“万国公民大会”在沪汉间大吹大擂，测验沪汉商人倚仗外人解决国事之心理，那时候上海总商会诸君颇识大义，婉词谢绝之；奈何这一次竟为一英国侦探所愚弄而不自知！

国民听者：你们若为中华民族争人格，你们应怎样愤怒的崛起答复这个英国侦探可耻的号召！

（载《向导》第41期

署名：和森）

国民党本部 不应招待美国侵略家

(一九二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报载：美人安文士近奉美政府命令来华考察中国财政及商业情形，现安君已偕其夫人抵沪，前晚国民党本部在大东旅社宴请安氏夫妇，并请女宾作陪，张秋白主席，致欢迎词，次张溥泉演说，何世桢翻译，谓中国与美国本为良友，而本党党员与贵国人士，亦颇亲密，今日得在沪相聚一堂，极为荣幸，中国财政混乱已达极点，安君将至北京，届时当可窥见其优劣，而下明确之批评云云，次安文士答称，鄙人极愿与华人为友，来华已历四次，至中山先生之主义，素极敬慕，不日将至广州亲聆其意见云云。

神经系都被美国侵略化了的亲美派外交家基督徒说美国与中国为良友，毫不足怪，民党同志也闭着眼睛瞎说，我真不好意思下批评！看罢：“美政府训令舒尔曼，表示对临案牒无让步余地，嘱催速罢田中玉，”（见《民国日报》二十一日专电）中国的“良友”固当如是！再看罢：现在曹吴的背后是美国，曹锟登了九五后，至少顾维钧（美国的经纪）要组织内阁，至少美国要大借其统一借款给吴佩孚武力统一中国，中国的“良友”固当如是！

我希望国民党本部当此英美侵略异常严重的时候，要多做

些号召国民反抗外国帝国主义的事，以后再不要有这类招待外国侵略家的笑话才好。

(载《向导》第41期)

署名：振宇)

欧洲的土匪世界

(一九二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本月中旬西班牙发生的政变，与上年意大利的政变如出一辙。意大利泛系政变的结果，墨索里尼(意泛系首领)上台组阁；这次西班牙政变的结果，里夫拉将军(西班牙泛系首领)上台组阁。据十七日伦敦电：西班牙里夫拉将军语伦敦《每日捷报》马德里访员，谓约在一星期内，将以十五万兵士至摩洛哥米立拉区域内作大规模之攻势，又谓日后选出之新国会将拟定新宪法，渠拟以四十五万负责国民编成国防军，不名之曰泛系，而名之曰索玛登，现政府将向法庭控诉前相白里吐氏及外相阿尔巴氏云。

然则里夫拉的目的，一面是建立资产阶级反动政治，一面是拚命的侵略摩洛哥，与墨索里尼在意大利的狂叫(这种狂叫现在已震动柯夫岛与阜姆)全无二致。

“穷兵黩武”，“倒行逆施”八个大字，足够显明欧洲资本文明的尽头。资本文明的尽头即土匪世界的开始(泛系为资产阶级化身的土匪)！

(载《向导》第41期)

署名：和森)

什么缩减军备会议—— 大家愿意战争

(一九二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大陆报》十七日华盛顿电：据此间可靠方面宣称，美国已以试拟的提议向英、法、日三国接洽，拟再开一解除军备会议，以补充第一次华盛顿限制军备会议所完成之工作，据云此新会议将专讨论太平洋问题及潜艇与飞机之限制，关于此举之谈判，当哈定总统生时即已开始，据云英国目下态度迟疑，法国则不赞成此举，独日本曾表示愿参加此项会议之意云。

哼！岂特英法愿意战争，即戴着号召和平之假面孔的美国，他的经营珠港，集中舰队，增加航空与水底的军备，何尝不是愿意战争。只有天灾毁坏了的日本，暂时当然是不愿意的。

(载《向导》第41期)

署名：振宇)

今年双十节应注意的四大事

(一九二三年九月三十日)

今年双十节第一桩应注意的事，无用说是曹锟的登台。无论他是用贿选的形式或拥戴的形式而登台，其在中国政治上的影响不仅是加强反动而黑暗的军阀政治，而且一定要加强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权力。曹锟上台之后，不仅吴佩孚得着英美大借款的帮助，武力统一之祸愈遍全国，而英美挟持曹锟这个软弱贪庸的机械于其手，予取予求将无不如愿以偿，中国国权领土之丧失将加倍迅速莫可究诘。所以双十节这一日不仅应有反对曹锟登台的表示，并应有激烈的革命性质的大示威。

第二桩应注意的事，我可说这是一切爱国群众还未注意的事！即威海卫草约业已签字而英国帝国主义攫夺路权的野心并未打消。国人若不急起抵制，一俟曹锟登台之后，护路案势必重提而步威海卫草约之后尘，那时候英美走狗顾维钧又将说“英国坚持某某案，中国对于护路案不能不让步”。所以双十节这一日，国民对于英国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仅应有严重的反抗表示，并应通过全国抵制英货的决议案，予英国帝国主义以实际的打击。

第三桩应注意的事是近日甚嚣尘上的英国侦探何东爵士发起之外国公使列席的和平会议。英国帝国主义这种奴属中国处理中国内政的阴谋屡经本报及《商报》、《时事新报》发奸擿伏严

厉反对之后，而一般倚赖外力解决国事的奴隶心理与昏天黑地恬不知耻的附和声浪仍然日不少衰。这样媚外无耻的恶劣空气若任其长此伸张，不仅民族人格扫地堕落，而且给外国帝国主义以“华人实愿共管”的确证。所以双十节这一日，国人应严厉的反 对英国侦探亡我奴我的和平会议之尝试；同时并应主张人民自动的召集全国国民大会解决国事，建立真正的人民政府与永久的和平。

第四桩应注意的事是承认新俄罗斯，新俄罗斯现在是亚洲唯一反帝国主义的强国，他在东亚的势力之不可侮视与中俄二民族联盟之重要，即外人辛博森所主撰的《东方时报》也十分的承认并主张。只有侵略中国的英美……帝国主义及其机械北京政府千方百计阻止中国承认新俄罗斯及中俄二民族的联合。现在俄国新代表来华，中俄会议虽有复活的呼声，然而北京政府仍然是替英美行事，而英美之阻止中俄二民族联合的鬼计依然如故（见本期另篇）。所以双十节这一日，全国国民注意于上列三事之外，更应以国民名义承认新俄罗斯。

亲爱的同胞们！今年的双十节不啻是中华民族的生死关头，你们应一致联合起来：

打倒国贼曹锟！

抵制英国帝国主义的侵略！

反对英国侦探在中国发起的和平会议！

以人民自己的力量建立真正的人民政府与和平并承认新俄罗斯！

（载《向导》第42期

署名：和森）

曹锟与外交团

(一九二三年十月十七日)

国贼曹锟由贿选登台后，与外交团第一桩交易就是“觐见”与完全承认临案要求。曹锟晋京之第一日，东交民巷的外国帝国主义者便扬言：“为政不在多言，但看对临案实行如何耳”（见《新闻报》）。曹锟嘱英美走狗顾维钧迅速全部承认使团要求后，东交民巷的外国帝国主义者又扬言：“曹锟必如是，始可以得使团之谅解，今后政府必如是始可以商量借款”（见十五日《申报》专电）。

这次曹锟的登台，国人只知归罪于议猪，而不知道主要的原动力乃在外交团。自六月十三北京政变以来，本报即将美国帮助曹锟的阴谋屡次揭破，即稍习北京政情的人亦莫不知道英美公使顾维钧颜惠庆和曹吴之间弄了些什么勾结；只缘京沪各报一般昏蛋的访员记者——或有意媚外不敢将这些真实消息露布，或故意不扯破洋大人的假幌子，反于每次专电中借洋大人敲诈北京政府之一言半语，张大引申以为反曹之宣传，由此鱼目混珠，真相莫明，致国人对于北京城阴谋策源地之外交团常常存一种莫明其妙的希望心理。

现在各方面反曹空气虽然浓厚，然同时又还发见一种请求外交团不予承认的呼声。

这种方法是代表些什么心理呢？第一，以为洋大人这次或者不会帮助民意的仇敌而会帮助民意；第二，以为洋大人若不承认曹锟，中国人不须举手投足之劳便可收倒曹之效。这样昏蛋的心理，一面是苟且侥幸的表现，一面是认贼作父崇拜外力的反映。这样昏蛋的请求每经发现一次即中国民族的弱点暴露一次，中国民族的人格卑污一次。我敢说：这样昏蛋的请求，比较曹贼贿选登台的丑事更为中国民族之耻辱！中国最近十二年的内乱和武人政治完全是外国帝国主义造成的，国人纵然善忘——记不起袁世凯、段祺瑞、徐世昌如何倚仗外力而存在，奈何昏聩到今日这步田地还看不见外交团公然敲诈与援助曹贼的把戏？中国的祸根是洋大人，中国的军阀自袁世凯以至曹吴皆为洋大人所培植，奈何中国人民反日益拜祷于洋大人之前，视宰割与阴谋中国的外交团为国事上诉之最高机关！我愿以后一切民意的表示，绝灭这种不可言喻的可耻请求；而“打倒曹锟”应与“打倒英美帝国主义的阴谋”为同时并用之口号。

（载《向导》第43期

署名：和森）

吴佩孚硬要外交系组阁

(一九二三年十月十七日)

我可说：在十月五日以前，一般人民对于吴佩孚还多少保留一些莫明其妙的神秘与猜想，以为吴佩孚对于“最高问题”始终不赞一辞，而与津派又素相水火，即使不与曹锟分家，亦必不赞成其速做总统。由是一些反直派的人物常常做些联曹反吴的梦想，而一般无政治常识的人民更常幸望吴大军阀或者不会赞成曹锟做总统。

现在这个莫明其妙的神秘到十月五日戳穿了。首先颂扬“有德者正位”的是吴大军阀，首先颂扬议猪“百年大业一旦告成”（指制定伪宪）的是吴大军阀，而硬要外交系组阁的更是吴大军阀。

由“法统重光”到“大法完成”和“有德者正位”正是吴大军阀叱咤风云，一气呵成的幸运；而“外交系组阁”更是完成他这种幸运的要着。没有“大法”，武力统一没有根据；没有“有德者正位”，正式政府的名器不存在；而没有“外交系组阁”，则统一借款和目前穷兵黩武的军饷无从筹措。现在呢，顾维钧于交涉发放盐余之外，又进行七百万借款；颜惠庆进行整理财政的鬼计以外，又加以外国公使团整理外债化零为整的督促，在这样顺利的情况之中，吴大军阀怎得不心马意猿急于要外交系出台

组阁？

(载《向导》第43期)

署名：和森)

这又是美人对华人的亲善

(一九二三年十月十七日)

增加长江驻舰

《字林西报》北京通信云：近数月来，旅华美人对于美国驻华内河舰队军力之不足一问题，颇多讨论。远东美国政界，于此问题已讨论有年。按之近来中国不稳情形，美国舰队在事实上不能不增加，因其驱逐舰毁灭舰等仅能保护较大口岸，而此等口岸实无需保护。至如重庆、长沙等变端时发，外人财产必须保护之地，此等大舰反缺乏保护能力，至其炮舰，仅有两只于浅水时在长江可驶至汉口以上，在珠江可驶至广州以上。但现均在长江任务，不能远离该处。惟即此两舰，建筑亦殊多缺点，驶行甚缓。其他各舰则尤不适于急用，于数年前即可拆毁。新近复有一船，其初以为足以担任重务，乃测量结果，既不适宜于傍他船或沿船坞停泊，而一小时复不宜行驶八英里以上。若由该舰甲板发炮，船身同时可以震坏云。美人鉴于此种事实，屡有增舰建议，惟华盛顿未许。此后远东海军继续陈请，加以中国不稳消息纷纷传入，美政府颇觉为难，近始闻海部已决添高速浅水兵轮四艘，用款已计入本年份预算。最近又闻以临城案及长江轮船被击等原因，美政府已咨请议会加增特别预算，改建筑四舰之议为改筑六舰。同时声称将再由檀香山调鱼雷艇二只及小舰两只加

入长江舰队云。

从此沿江的中国人民完全在美国炮口底下过生活，领略美人亲善的滋味！

（载《向导》第43期

署名：振宇）

商人感觉到外国帝国主义 助长中国内乱的第一声

(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七日)

全国商人应立起响应南京商联会的通电

南京商联合会江苏事务所通电外交团云：北京领袖公使符公使转各国公使钧鉴，中华民国成立十二年来，军阀争雄，内乱不已，内外债总额，已增至二十五万万元，大半用于兵费，现役兵额，多至一百三十余万人，占世界各国常备兵额之第一位，而土匪如麻，且在军阀领袖之辖境内，危及外人生命财产，我商民不胜遗憾，若一任政府再借外债，中国内乱之延长，不知何时始止？本事务所为江苏全省商民最高法定团体，特开干事大会议决，本主权在民之意，向贵公使团郑重声明，在中国内乱未靖，裁兵未实行，政府行政权未统一以前，贵各国银行团，不得再与中国政府暨任何方面缔结借款契约，各军装洋行，亦不得私售军械，以期缩短中国之内乱，即所以保护各国侨民之安全，若贵各国银行及军装洋行不能谅解此意，违反中国商民之公意，接济中国任何方面之军人，以助长内乱之借款与军械，则是贵各国自贻其戚，嗣后贵各国侨民设有不幸如临城事件发生敝国国家及人民实不负责也，掬诚奉布，尚祈察纳。中华民国商会联合会江苏省事务

所叩号。

这个通电要算是中国商人感觉到外国帝国主义助长中国内乱的第一声。这个通电与从前各团体所致外交团一切通电，性质上和价值上皆大不相同。从前一切致外交团呼吁或请求的通电大都是不自觉的，无价值的，甚至其中充满了媚外与崇拜外力的劣根性。例如明明白白望着外交团借口临城土匪掳去几个外国人，狼叫虎号，大敲中国的竹杠，攘夺中国各种权利，而中国一切报纸一切社团，丧心病狂，为之附和，为之摇旗呐喊，不仅纷纷通电谢罪慰问，并纷纷请求外交团来干涉中国内政？又如明明白白望着外交团帮助曹吴扰乱中国，而请求外交团撤销承认的呼声与心理，还是没有绝迹。

南京商联会这个通电，要算是中国一部分最进步的商人在不堪再忍的状况中觉醒起来向东交民巷“主乱”中国的外国帝国主义者说几句硬话的第一次。他们知道中国十二年来的内乱，无一次不是外国帝国主义在军阀背后借款卖械助成的，中国的内乱史不过是外国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中之一段；他们知道为中国政治阴谋之中枢的外交团，于帮助曹锟上台之后，不久即要举行所谓整理外债或统一借款，把中国内乱延长至于共管可以实现的时机；他们知道在外交团帮助曹吴“统乱”中国的局势之下，更将给外国帝国主义造成许多如临案一样的机会以至实行共管中国；总括一句，他们知道破坏中国和平自由独立安宁生活的外患与内乱，此后更要狼狈为奸方兴未艾，他们于忍无可忍之中始发出这个通电来。

自然这个通电在吞噬中华民族的魔鬼——外交团是不会发生效力的；临城案，护路案，威海卫案，金佛郎案，……完全满意

之后，大借款与军械的买卖只是指顾问的事。所以这个通电的最大意义与价值，不在对于宰割与阴谋中国的外交团发生效力，而在中国商民对于外国帝国主义主乱中国的祸患发生正确的觉悟和莫可再忍的表示。

“中国现状莫可再忍”这不是英美侨华商人——侵掠中国的别动队——在华大吹大擂，鼓动其政府对华采取断然处置（如增兵来华，共管中国等）的狂吠吗？其实主乱中国的外国侵略家（自东交民巷的公使以至各埠的外商牧师……）那里配说这句话，只有中国商民应齐声起来向外国侵略家警告一句：“由你们外国帝国主义主乱中国的现状，已使我们全中国商民莫可再忍了！”南京商联合会这个通电，我希望就是全国商民总动员反抗外国帝国主义主乱中国的起点。

在莫可再忍的外国帝国主义主乱中国的现状之下，各地和全国商民对于政治万不能再守含默，尤其在曹贼登台后大借款一定要实现之前，不能再守含默。现在各地商会与全国商联合会应立即响应南京商联合会的通电，召集大会讨论此事，对于正在准备以大宗借款与军械帮助曹吴的外交团，不仅在消极方面表示以后不负一切借款与匪案的责任，而且要在积极方面表示经济绝交的決心。

全国商界同胞——你们看呀！分担侵略中国主乱中国的侨华英美商人，他们今天在汉口召集一个大会，高叫中国现状莫可再忍，鼓吹各国增兵来华，共管铁路，取消二五附加关税，永远延长治外法权……；明天在上海召集一个大会，又是高叫中国现状莫可再忍，鼓吹各国组织大规模的长江联合舰队，共管全中国的江河与铁路，延长关税会议，不许考虑撤销治外法权……，魔鬼

们已经弄得人家鸡犬不宁，血肉横飞，倾家荡产，而反向人家科罪反坐，这是世界上何等不平的冤枉事！全国商界同胞——你们甘心永远屈伏于这种奇冤大辱和外力的压迫之下而不与以反响吗？

（载《向导》第44期

署名：和森）

美国帝国主义 帮助赵恒惕之确证

(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七日)

二十七日北京电：前路透社十月二十四日电传美政府以训令致长沙美炮船，如华兵以枪炮损及美侨之产业，尽可回击一节，兹据美当局声明，美使署得长沙最近消息，觉该城将有被轰之虞，因照会广州政府，谓如轰击长沙通商口岸，则驻泊长沙之美炮船维拉洛波斯号，须发炮回击云。

前此蔡巨猷的军队，要乘胜渡河入长沙城，领事团为赵恒惕保镳，严厉阻止，致赵恒惕死灰复燃，三湘七泽，糜烂至今。

现在谭军大捷，直捣长沙，赵贼狗命，危在旦夕，而美国帝国主义者遂屁滚尿流显露镰客的真面目，公然照会广州政府：“如……则驻泊长沙之美炮船……须发炮回击”，这不是美国帝国主义明明白白向广州政府和湖南人民宣战吗？

只此一端，足够证明美国帝国主义怎样帮助曹吴（赵贼不过是曹吴的走狗）；而以后曹吴及其走狗，炮火所及的地方就是美国帝国主义炮火所及的地方。呜呼！美国帝国主义与曹吴合作之下的中国人民！

（载《向导》第44期

署名：和森）

德国的分立运动

(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七日)

德国的分立运动，近日急转直下，已在巴伐利亚和来因流域开始。以德国战后的破坏凋残及其被外国帝国主义之宰割与高压，正宜团紧整个的民族势力以资抵抗，而竟丧心病狂发生如次的分立运动，以便外国帝国主义之宰割，与中国政客军阀丧心病狂的联省自治运动如出一辙。

法国帝国主义进行分裂德意志的阴谋已非一日，本报曾经屡次说过，现在爱拉夏贝尔（在来因）起事宣布独立的消息一传出，巴黎的五金大王与普恩费辈自然要喜得通身畅泰。但是无论在来因的法比军队怎样宣布中立（实际为帮助分立派），分立派终敌不住共产党领率的工人阶级与其他爱国人民之反抗。据最近路透电，分立派已被工人与反对的人民打得落花流水，逐出一切被占领的机关之外，并且完全失势。巴伐利亚反动领袖嘉尔博士，在这样的影响之下，也只得宣言“巴邦绝无分立意思”了。

德国帝国主义者虽然空欢喜一场，但是他们始终不会抛弃分裂德国的毒计。其实这不但是毒计，而且是加倍扰乱已经破坏的欧洲经济生活的癫狂政策。换过说，也就是加速已经破坏而莫能复兴的欧洲资本主义的灭亡之政策。

上次的世界大战并不是别的原因，只是欧洲资本主义发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即便是德系资本帝国主义统一全欧洲的经济

生活与全世界的经济生活，或是英系资本帝国主义统一全欧洲与全世界的经济生活。资本主义发达到帝国主义的程度，是要求撤销一切国界一切关税的，没有国界与关税的抵抗，才能使他如愿发展，所以列强对于工业后进国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必须设法破坏其政治与经济的独立，而握住这些地方的关税于外国协定或完全被动的形式之中（如中国），才能使这些地方完全变为他们的销场。上次大战也就是这个目的，英系帝国主义与德系帝国主义之间，不仅争相统一弱小国与殖民地，而且是德欲统一英法，撤除英法的国界与关税，英法欲统一德奥，撤除德奥的国界与关税。但是大战结果，不仅没到达这个目的，反而由凡尔赛和约分裂中欧与东欧——建立一些小国，增加许多国界与关卡。由此已经破坏的欧洲资本主义，加上这许多新障碍新束缚，不仅永绝复兴之望，而且使欧洲退步到三百年以前的状态。这种状态的具体表征就是经济单位随着国界而复杂而狭隘，使弹丸欧洲关卡林立，不仅大协约国之间各自采取保护关税政策以相抵抗，就是小协约国之间也各自返于中古的自给经济时代，而莫能合作。由此，所谓欧洲复兴，完全成为欺人的。“欧洲成了疯人院”这是英国经济学家坎恩斯反对凡尔赛和约的话。现在法国帝国主义者更要实行把德国分裂，原是疯人院中的疯举，值不得我们的奇怪。我们所要了解的：第一，这样的疯举足以使欧洲要死不活的资本主义迅速灭亡，而社会革命愈益难缓；第二，只有中欧西欧革命成功后，与东欧俄罗斯合组欧洲工农合众国，撤废一切资本主义遗留的障碍与束缚，才能复兴欧洲的经济生活与和平生活。

（载《向导》第44期

署名：和森）

美国机关报辩护 承认北京政府的理由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七日)

曹贼登台，暗幕中的动力为外交团，而外交团中尤其以美国帝国主义为曹贼之主要镰客，本报曾经屡次揭破过了。自曹贼登台后，美国帝国主义明目张胆在湖南大帮曹吴走狗赵恒惕以压迫谭(延闓)蔡(巨猷)军队；而由他(美国帝国主义)主倡的长江联合舰的用意，一半亦是为曹吴巩固长江势力起见(见另篇)。现在更加以美国机关报——《大陆报》对于承认北京政府的辩护，美国帝国主义“对华亲善”的假面具，更一天一天的揭露无余了。

《大陆报》对于承认北京政府的辩护是由卢永祥和《芝加哥日报》远东访员胡特的谈话引起的。这位美国访员往访卢永祥的目的，似乎只在探询孙中山、张作霖、卢永祥等是否将结合俄罗斯建立第二政府以反抗北京政府之一点(《大陆报》载：记者——胡特——又以据迭次广州传来消息，卢于建设第二政府对抗政府之运动为一有力之领袖分子，因询其真相，且谓俄国因其本身国际外交之原因，对于第二政府当首先承认)。卢永祥借着这个机会，对于列强承认曹锟政府发了一片牢骚。这位反直派的督军，未免给主谋助曹的美国人太难过了，于是美国机关报

《大陆报》便于翌日答以下列的辩驳：

“卢责列强对于无论何派得入北京者，均承认其为中国政府，以为此乃酿成中国扰乱最有力原因之一，同时又谓北京之统治中国，并不能有过于奉天广州或杭州，列强承认北京政府之任何方针，皆足以使其他在反对各派之眼光中增其价值，此其所言之确不可易，正不亚于其谓中国今日所需要者乃一单独之政府，而非目下无所统属之若干政府；然而卢氏之意，列强于受彼批评之方针外，应取何种行动，则诚我人之所亟欲闻者也。此其解决之法，不外两途：一，取消承认中国，俟有足以号令全国之政府成立再承认之；二，承认一切实在之政府，其能力足以统治部分之辖境者。卢氏谓地方政府之设立，足以分裂中国，而一分再分，分之不已，若必于各政府之设立一一承认之，则必添设无数外交官，于中国及列强均有不便也。顾欲承认全中国实在之政府，势既有所不能，而欲取消承认北京政府，则其困难及危险更大，此举是否将危及中外人所共同管理之永久机关之地位乃一问题，盖其一切进行，全赖关系各国政府之援助，而列强若不愿与北京政府有所交接，则此项援助殊难维持也。今试察一取消承认北京政府或其他任何政府后之情形，则知其不便将更甚于今日，因治外法权之存在，须维持与任何派握权者之直接交通，否则各国惟有以武力方法维持其在中国之权利耳。”

然则美国及其他帝国主义者援助曹锟政府之最大理由，原来不外二点：

（一）维持中外人所共同管理之永久机关——指北京政府；

（二）因治外法权之存在，须维持与任何派握住北京政府者之直接交涉。

《大陆报》虽然用了几笔很弯曲的笔墨，然而他到底没有《字林西报》（英国机关报）那样的本领，不但没有将狐狸尾巴藏住，而且反将美国帝国主义帮助曹贼的阴谋和盘托出：要使北京政府成为列强共同管理的永久机关，要将治外法权、协定关税、共管江河铁路财政等方法永远将中国奴属于列强之下，这就是美国帝国主义帮助曹锟的真正目的，也就是华盛顿会议的真正目的。

（载《向导》第45期

署名：和森）

外舰联防之另一用意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七日)

《大陆报》社论云：“美英日三国政府，现均筹划增加长江上游之防舰，兹一事也，足证与长江商务有关系之各国；于警务实有取一致联合政策之必要。但据近来上海各报所载之上游消息，此主要三国，显然未能一致合作。劫掠日船益阳丸及捕禁船员事，中国方面，乃得以该船输送军火为借辞。按之最近报告，英国军舰当局，准许中国军人登该国长江商船，搜查有无军火，赖佛生提督并声明反对于悬挂英国商旗之商货船只运载水兵，以防兵匪；而美国则与英国各趋一端，凡悬挂美国旗之轮船船主有要求请载水兵者，皆派水兵驻之，而绝对不许中国军人上船检查有无军火。吾人由此可知注意于长江商业之三主要国，各抱不同政策，而此种事实之结果，自必使此后中国中央及地方政府力所不能管辖之长江上游地方，益趋于纷乱。

故在本年春季，美法日长江舰队司令乃集议于上海，意在对于此保护外侨生命及长江上游商业事，得互相谅解。会议结果，至今未曾宣布。但据现状观察，各国海军将领及其本国政府意见，显然未能融洽。为长江上游计，此事实为不幸。第长江商业，甚属重要，吾人焉能轻易放弃，中国既不能加以保护，吾人无论如何当自行保护之。惟既欲保护，则关系各国政府必应取一

致之政策，盖如美英日三国能具此一致之政策，长江情形必立见进步而无疑也。”

“凡悬挂美国旗之轮船船主有要求载水兵者，皆派水兵驻之，而绝对不许中国军人上船检查有无军火”，这是美国帝国主义长江舰队的政策。这种政策是何用意呢？不用说是要无阻拦的给杨森、赵荣华、卢春山、袁祖铭、赵恒惕等输送军火，并替曹吴巩固长江上下游的势力。英国军舰当局对于中国军人登该国长江商船搜查有无军火的允许，在美国帝国主义者看来，实为长江商务之主要国未能融洽的“不幸”事实。照《大陆报》的主张，英日二国若能与美国一致采取“绝对不许中国人上船检查有无军火”的政策，长江情形必立见进步而无疑。这是确实不错的，美国舰队向围攻长沙的蔡巨猷的军队严厉示威，蔡军便不能不退走宁乡；若英日二国舰队与美国舰队联合以援助杨森、袁祖铭，自然四川地盘又不难失而复得。长江流域的人民要在这些处所来领略美国帝国主义的“亲善”，而国民党同志也要在这些处所来领略美国帝国主义的“友谊”！

（载《向导》第45期

署名：和森）

单独侵略与协同侵略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七日)

范源濂君，游欧美各国归来，以其所视察，在北京《京报》欢迎席上发表关于华盛顿会议后中国国际地位的意见，其言颇有价值：

“在华盛顿会议以前，各国对华政策，多为单独进行，例如某国要求某处租界，某国经营某处铁路军港，则每处有关系者只为一国，我国亦可以筹单独应付之方；然华盛顿会议以后，则一变单独行为而为协同动作，凡国际间大问题发生时，各国对华必取一致之步调，如临案通牒，不问与此案有无直接关系，而十六国公使全体署名，可谓最著之一例。此种变化之影响，固属有利有害：言其利，则各国步调不易完全一致，对华政策之发展，或较诸单独行动，稍见迂缓；然言其害，则一完全同意，协以谋我，我国即处于孤立而无可如何。且如日本独占山东，英国独占威海卫，因其为单独性质，我国尚可单独应付以收回也；然如海关之为各国共同管理，虽因欧战而排去德人势力，然承德国而平分其权利者仍为各国，而非我国，可见一处各国共同掌握之下，我国即永无收回之望，其危险不待言矣。至如华会所定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之原则，何谓门户，何谓开放，其范围如何，程度如何，解释可以不同，结果毫厘千里，前途祸福之关键，仍视我国之有无自觉。

若我国而能力图振作，积极方面增进国际之地位，消极方面勿贻各国以机会，则上述原则范围程度之解释，自可稍事缩小；若从希望各国关系之从此和平，友邦对我之停止进展，殆可谓为必无之事。以现在各国对华态度言之，英国殆为最知我国之内情者，其经营我国之手段，即以对西藏一事言之，吾人在英游历时，随处皆可发见说明西藏之材料，足证其处心积虑之一斑。英国在华之根据，无论财政方面（关盐），交通方面（铁路）只须再进一步，即达最后之境界，但欲希望其永远停止而不再进，天下安有如是现成乐观之事。吾前既言各国今后对华之行动必为协同动作者，则希望他国之互相牵掣，亦属自欺之谈。试就英美关系而言，美国加入欧战之最大原因，乃缘资本家之保持巨额债权，与畅销多量商品（军用品等），战事终了，各国对美，皆负极大之债务，关于偿还方法，曾发生种种疑问，然英国则因与美国同为资本主义极盛国家之关系，竟减缩一切支出（如小学经费亦被减削致教员有罢工之举），忍痛以偿还美债，而因英国财政手腕之敏活，同时英之殖民地，如坎拿大等处，仍吸收美国所投之资金，使两国之经济上，成立不可分离之关系。故当无事之日，英美两方之对华态度，固如各不相谋，一旦大问题发生，左右两国之外交者，仍为处于背后之大资本家，少数学者之主张，殆无多大影响，则从英美两国资本家之关系言之，其步调一致，殆有不得不然者矣。美国以外，如法之与英，又何如乎？法国之占据罗尔，原欲以缺煤致德之死命，然英国则以煤接济德国，即此一端，似足以明两方关系之尚待改善，且两国国会中，亦每相继而有种种怀疑之议论，则法与英或不克完全一致，然即不一致，而竞争之行动，亦不啻一致之行动也。例如英殖民地之处，法每有之，英对我国

要求权利，法亦必对我要求权利，此已往外交之历历可证者。然则英国而果进一步，法必不加阻止，而追随恐后，可断言矣。法国以外，尚有意大利，欧战以来，顿为各国之所重视，而英帝乃纡尊降贵，亲临意国，以图两国之亲密，此非可寻常视也。然意之与我，数次外交，皆持强硬之态度，临案发生，意亦为重要分子之一，其与英美等国一致，更待何言。最后则东邻之日本，在震灾未发生以前，其外交政策，随时皆保与各国协同之步调，震灾以后，自惟强国之趋向是遵。故苟以各国对华关系，加以精密之观察，我国在国际上所处地位之危险，诚未有甚于此时者。”

因为美国及其走狗外交系的宣传，中国一般大商人、新闻记者，及智识阶级对于列强协同宰制中国的华盛顿会议何等的歌功颂德，何等的忻喜慰藉。他们闭着眼睛，仿佛从不看见二五附加税会议无限期延长，撤消治外法权的调查公然反污，旅大威海卫更确定的被英日永远鲸吞，而共管铁路共管江河干涉内政……无一不是以华会决议为根据。协同侵略比单独侵略更为危险更为可怕，本报无一期不以此警告国人。但读者诸君每喜给我们一个这样的回答：“《向导周报》的言论太激烈了”。现在一位老于仕途的大员，经过一番切实观察之后，不期与本报发出同样的意见，可见本报的言论并非故为激烈，不过是常常本着忠实的科学的观察以警告我国人。当国人觉着本报的言论过激时，便是国人的见闻还是囿于外国人的宣传及其走狗的欺骗之中。

（载《向导》第45期

署名：和森）

山东人民为威海交涉之奋斗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全国人民竟忘了这回事!

威海交涉，关系全国命脉，而起来奋争的，始终只有山东人民，全国人民竟忘了这回事！一方面我们不能不对孤军独战的山东爱国民众表示敬意，别方面我们不能不为全国漠不关心的人民痛哭！

现在事更急了。不仅包尔温(英内阁总理)克松(英外相)麻克类(英驻京公使)日日威吓中国立即签约，而顾维钧和陈干两个卖国贼也同时发表欺骗国人立即签约的理由。

顾贼的意见，是由他交与某通信社做《某著名外交家的谈话》发表的，大略是说：“闻山东各团体于主张无条件收回威海卫以后，竟有‘若有条件则宁作悬案’之主张。在理论上言之，所见极是，吾人且佩其爱国心之坚定。但外交问题，内容复杂，吾人不可不考究经过事实，以求比较有利之结果。夫英人何以在华会中忽有宣言交还威海，当时实含有转变外交空气之作用。且英之远东侨商，及海军部等，皆不赞成此举，幸英国外交当局，可以不受他方之牵掣，非如他国有‘二重外交’之弊，(替英国宣传得好听!)故卒能在华会中宣布之。然以后反对纷起，英之外交当局，于既利用此种一时的手段以后，亦雅不愿真个实行，最后

故意坚持委员会报告书，不能更改之议，即欲引起我国民对于外交偏重理论之弱点，可以终不交还，若我国民而有‘宁作悬案’之表示，是诚英人所日夜求之而恐不得者，果尔，是中其计也。”

陈贼的意见，是用一种公开的电文发表的，大略是说：“威案解决有三利，（一）土地收回；（二）外交不至孤立；（三）可进行旅大及广州湾。不解决有三害，（一）土地放弃，英人在威海尽可从容经营，将来结果，契约有效与青岛案受同等之害；（二）外交孤立，所有各种收回之事，恐说不上；（三）此关已破，恐各国协以谋我，虽欲呼冤，不知向何国呼起。”

顾陈二卖国贼的话，无一句不是欺骗国人的，无一句不是替英国帝国主义宣传的。所以当陈贼大胆跑到济南去的时候，济南市民义愤填胸，人手白旗，列队包围连升客栈，以期扑杀此獠，不幸事机不密，该贼业已先期远颺，以致未得结果。然旅京鲁人，继此有举行三十万民众示威运动之说，可见鲁人爱国精神之强烈，势非达到目的不止。

然现在事机迫切，这个目的决非“请愿”与声言“若有条件则宁作悬案”所能达到；倘不采取迅速手段，与英国帝国主义以直接的打击，则山东同胞数月以来的爱国奋斗与热诚，将在转瞬之间付之东流而莫可如何。迅速手段怎样呢？便是：

立即动员，排斥英货！

只有这样才能挽回迫切的危机，只有这样才能给英国帝国主义以直接的打击，也只有这样奋斗几月才能激起全国已死的人心而达到最后的胜利！

可敬的山东爱国同胞们，你们努力呵！

（载《向导》第46期 署名：和森）

原来是吴佩孚 委托外舰运军火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申报》北京电：宜阳丸案赴渝专员江华本已回京，川军以日船贩运军火，要日使保证以后不运军火，并缴罚款一万可释，日使谓运军需，系吴使委托，请吴代任罚款。

哼！原来是吴佩孚委托外舰运军火。可知扰乱长江上流的责任，不在外报所宣传的川军与土匪，而在外国帝国主义与吴佩孚。

现在呢，不仅日本帝国主义挟宜阳丸案向中国反坐；外交团且据此为组织宰割中国的长江警备案理由之一。请看下面消息：

日本电通社云：例闻在长江方面之各国（英美法日意）舰队司令官中，去年由美国提倡，今年由日本提倡，各国共同防备长江流域。至“最近因在宜昌上流，各国轮船时被炮击，故愈觉有共同防备之必要”。美国舰队司令官代表各国来京，将上海各司令官之意见陈述于外交团，将以外交团之力，实现联合防备长江，有目下正在陈述中之说云。

各国轮船何以被炮击？因为为吴佩孚运军火。各国何以要组织宰割中国的长江警备舰队？因为“各国轮船时被炮击”。呜

呼！被外国帝国主义生吞活剥的中国人民！

（载《向导》第46期

署名：和森）

何东的狐狸尾巴现出来了！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香港政府的侦探何东，秉着英国帝国主义别出心裁的鬼计，跑到上海来发起外使列席的和平会议，一面尝试中国“顺民”的空气，一面愚弄或利用南方的国民领袖，企图灭亡中国的事业轻巧巧的成功。

他是很有计划很有步骤的，不是随随便便浪漫的尝试一回便会打止。所以当曹锟未上台的时候，他从广东下手，讨得孙中山先生的同意，以为宣传南方人民的先声。然后跑到上海来吹法螺。果然，法螺吹得好响亮，总商会、江苏省教育会、银行公会、钱业公会以及其他团体等，莫不逊听下风。

现在呢，英美主助的曹锟既已登了台，不仅津派谋臣的“和平统一”策与这位英国侦探遥遥相应，就是“传位长子”——吴佩孚的“宪法统一”与“武力统一”也与这位英国侦探遥遥的吊膀子，于是这位英国侦探便踉踉跄跄的跑到湖北汉阳去了。他和萧耀南会见的结果，既由路透电宣传“满意”，至于和吴佩孚会见后的结果与勾当是更不待说了。

所以这样一出英国侦探的骗剧，不仅上海“体面的”商人、银行家、教育家、新闻记者上了他的当，便是国民革命的领袖也白白受他一回利用。

（载《向导》第46期 署名：和森）

被外国帝国主义 宰制八十年的上海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上海开港，到本月十七日恰好八十年了。这个日子，现在志得意满的洋大人是安顿兴高彩烈来庆祝的，我不知道凡住在上海的中国人对于这个日子有什么感想？

上海为什么要开商埠辟为租界？因为鸦片战争，中国民族屈伏在英国帝国主义炮火底下；英国帝国主义不仅强迫中国人吃鸦片，而且强迫中国割香港，开五埠，——上海就是五埠之一。

上海未开埠以前，一草一石，那一点不是华人的？但是既开埠以后，租界以内，最初是不准华人居住的，而“华人与犬不得入内”的标揭，至今还悬挂在外国公园的门上！

自同治三年会审公堂成立以来，华人即被其治理，然犹有上海道为华人上诉机关。辛亥革命，外国侵略家趁火打劫，华人从此遂完全被治外法权所统治。租界法庭之偏颇与黑暗，外国法官、狱吏、捕头、律师之苛暴与敲诈，凡属久住租界的“顺民”，类皆冤屈无申，敢怒而不敢言。最近惨无人道的乐志华案，便是这一类事实的显例！

外国侵略家在租界里面的强固权威，完全建立在界内华人严重的负担之上，然而纳如此重税的华人，至今不能参预租界的

市政。所以住在租界里面的华人，简直当不得一条洋狗！

最初租界的范围，不过东至黄浦，南至洋泾浜，西至泥城桥浜，北至李家场，而现在则何如？现在驻沪外国领事团不仅有公共租界扩张至吴淞口的要求，而且逞其浚浦之阴谋，以图囊括黄浦与吴松江！

上海现在诚然是一个近代的大都市，而且是一个极繁盛的近代大都市，但是这种繁盛属于谁？这种繁盛建立在什么基础上面？不用说，完全是建立在外国商品上面，而且完全属于外国侵略家！

体面的商人们！亲爱的同胞们！然则你们到了这个开港八十年的纪念日子，应当作如何的感想？

（载《向导》第46期
署名：和森）

华人营业的自由也没有了吗？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请看美国机关报可恶可愤的暴论！

《大陆报》社论云：昨日本报所载张家口华官干涉外商汽车运输业之报告，当为华人所注意。柯尔曼氏被戕一案所引起外人之愤怒及美国之要求道歉与给恤，显然尚未使华官醒悟。美国所要求之赔偿，为数太微，既不足抚恤死者之家属，尤不足为侮辱美国国旗之相当惩罚。或者华官之冥然罔觉，即由于此。美国对华政策向不苛酷要求（欺谁？），此种宽仁态度，殊不足以警觉华人，其效力远不逮他国所用之较严厉方法，今已日益明显矣。

柯案出后，张家口华官曾有一时颇为安分，盖因外人注意彼等行动之故。然吾人苟希望该地情形已有永久的改良者，闻最近之报告，必为之爽然若失也。考目下之纠纷，其主因盖有二端，出入张家口之汽车捷运事业，原为外人所创办，华人见有利可图，遂起而竞争，组织一种机关，意在把持此事业，终将开创外人排斥。现时此机关经济上非常困窘，但彼等绝不措重意，专待排斥外人后，立将运费抬高，借收巨利。

此项机关即所谓公会是也，而华官则有利于助此计划之成熟。盖华人公司均纳厚捐于华官，洋商则否。华官为抵制洋商

计，莫妙于赞助华人公司，既可得金钱上之利润，又可免外人之烦琐。最近所颁新章规定洋商运输公司，只许运送自有之货物，自用之人员，其用意在于排挤洋商公司，以免与华人竞争，显然可见。

此最近之情事，谓非华官与华人公会有意排挤筌路蓝缕开创运输新业之外人，其谁信之？果尔则诚可谓特别厚颜，彼都统或抱排外观念，或欲染指于非彼所应得之款，吾人皆不注意之。唯美国政府对于一美公民之被戕，既向中政府抗议，而效力绝微，不足阻其他形式干涉美人之正当业务，此则吾人所甚忧虑者也。

吾人并不主张吾人应抛弃其向来对中国及中国人之宽仁政策，唯吾人许多对华行动中之宽仁性质，是否被华人视为软弱而非强固之征象，此则显已成一问题，亟须加以考虑。迄今吾人所提出之抗议，毫无效力，从此以往，吾人在张家口之地位必至减弱，当地华官之无礼举动将层出不穷。此种官员如在他国，当早已受惩戒矣。今欲保吾人之权利自莫善于要求将该都统撤任，且坚持必须办到。若许彼继续目下行为，他处势必纷纷效尤。总之，以后外人如对各使馆有所陈诉，各使馆应即为剧烈举动，务使负责之人真受惩罚，如此始足使张家口华官憬然醒悟，知其现时行为之不当也。

现在为提醒读者的遗忘，对于《大陆报》所愤愤不平的柯尔曼案当补述一笔。这是怎样一回事呢？是美国奸商柯尔曼及美国驻张家口领事，伙同中国奸商运送六七万元现洋出境，经守关兵士照章拦阻其所乘汽车盘查，柯尔曼开枪以击守兵，守兵回枪击之，因而伤死；结案是中国反而赔偿了大宗现款，办了一些守

职官吏与兵士，且强迫中国高级军官张锡元都统向为奸商保镳在中国境内做违法勾当的美领事谢罪。这算是年来中国外交上一件丧尽体面与主权的不平国耻；而美国帝国主义者至今还是“得了便宜臭骂不休”！

营业自由，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通则，而保护本国工商业，尤为各大强现行的天经地义。无论柯尔曼案曲在美而不在华，即使在华，难道赔偿谢罪结案之后，还要永远剥夺张家口人民的营业自由吗？保护华商营业的地方官便应要求撤职，我不知道美国帝国主义者根据华盛顿会议那一条法典？

（载《向导》第46期

署名：振宇）

赴洛赴日请示之王正廷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督办中俄会议的王正廷，因为仰承东交民巷外国帝国主义的意旨，与苏俄代表加拉罕非正式谈判决裂后（参看本报上期《中俄交涉的近况》），乃又鬼头鬼脑跑到洛阳去“请示”。

洛阳与中俄交涉有什么关系？不过因为洛阳是“传位长子”——吴佩孚所在的地方，现在北京政权实隐操于传位长子的手里。又因为洛阳的传位长子与外交部的“看门大爷”——顾维钧是相表里的，而这位别显身手的王正廷又常常与看门大爷争宠吃醋，所以更不得不赴洛请示。

听说王正廷所委身臣事的并不是传位长子，但是安顿做“西北大王”的冯玉祥。基督徒为基督徒的利益奔走，仿佛耶苏给了他一身神通似的：旬日之间，北走胡，南走越，大显其纵横捭阖的手段。所以跑到洛阳请示之后，又要跑到东京去请示呢。

然而只此“赴洛赴日请示”之六大字，已完全足以显出王正廷“奴隶外交家”之真性质！

（载《向导》第46期）

署名：和森）

外国帝国主义者果为 维护内债基金而反对 国立八校的俄款运动吗？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字林西报》十九日北京电云：今日《远东时报》载辛博森社论，竭力拥护加拉罕退还庚子赔款以充教育经费之主张，是不特十一年公债之担保将无着，且俄国未付赔款，已拨充内债基金，因此又将发生问题也。中国政府对于加氏退还赔款之议，以为赔款与借款不同，当取消承提俄国时，已将此项赔款取消，故实无可退还，加氏之言，特以取悦于北京教职员学生，使与政府及安格联为难耳。北京人士以为此议于十一年公债（以停付五年赔款为担保）及整理公债（以未付赔款充基金）之地位，未必有影响，故公债市面，不因加拉罕之言而动摇。惟投资者，则恐加氏之言将激起学生运动，胁迫政府，而使公债市面低落，故官场亟应向公众声明，俄国已无处分赔款之权，当将全部充作公债担保品。辛氏为政府顾问，而使学生堕入俄国之计，以抗政府与安格联。且今外交团方谋以内债担保品充偿付外债之用，则移动俄款，尤非其所。……

看以上《字林西报》的论调，好象外国帝国主义者反对俄国

赔款拨充教育经费的理由，全为中国银行界巩固内债基金说法。这到妙极了，外国帝国主义者竟有这样的善意维护中国银行界！

我现在得着这个机会，可与读者诸君谈谈中国银行界年来的一大恐慌。这种大恐慌却不在《字林西报》所挑拨的区区俄国赔款之移作教育费，而在外交团要攘夺历来明定为内债基金的关余为外债担保。金融界自从得着这种噩耗，无日不在飘摇恐怖中过生活。他们没有法子想，只得一旬半月向安格联“跪禀”乞怜。今且把最近天津银行公会打给北政府及总税务司的电报抄在下面，醒醒读者的眼目：

近日报载四国公使照会外部以全部关余，统归内债担保之用，谓足阻挠他项债务偿还之担保，质问将来关余用途，是否有趋于外债担保之意向。闻之殊深骇异，查关余担保内债，载在历次内债条例，并于整理内债基金案内明白规定，其优先权成立已久，中外具瞻，岂复有丝毫变更之余地？此项内债，关系中外人民财产及国内市面金融，基金苟有动摇，无异骤夺人民资产，破坏全国市面，为害何等酷烈！应请政府将无担保之内外债，切筹整理方法，一面迅速筹开增加二五附加关税会议，使外债基金有着，以保国际信用，至内债基金原案，确定已久，务请全力维持，不能稍有变更，是所悬祷！

这样的哀声，各大埠银行公会、钱业公会，及总商会等，年来不知发过几百遍。最近安格联过沪时，沪上银行界和总商会何等的向他奉承与拜祷；然而除假仁假义几句套话外，什么结果也没得到。至于二五附加税会议，英美法日除却时常拿着来做外交上敲诈中国的法宝外，他们是安顿永远不实现的。二五附加

税会议不实现，便是关余权利终必为外债所攘夺；而国内金融界由恐慌以至于破产，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字林西报》若果为维护内债基金说法，便应倡议反对动摇内债在关余上面的优先权，而主张迅速召集二五附加税会议；然而《字林西报》乃是鼓吹无限延长二五附加税会议的主干，他那惯于臭骂中国人吓诈中国人的滥调，沪上商界银行界的明白分子无不恨之入骨！

然则《字林西报》反对俄国赔款移作教育经费的目的在那里？大约不外两点：第一是想根本取消中国的爱国运动，因为国立八校常为爱国运动的领袖，当此护路案、威海卫案、长江警备案紧张之时，任其停闭，实予外国帝国主义以莫大之方便；第二是想待国立八校停闭后，由英美日法以退回一部分庚子赔款的名义，有条件的来重兴及把持中国的高等教育，使全中国的教育洋奴化，也可说是“教育共管”。至于什么“学生堕入俄国之计”或怕中国教育界与苏联亲近，这不过是外国帝国主义者宣传挑剔的鬼话。至于如何才能打破东交民巷及《字林西报》这种阴谋，则全在八校学生及全国人士的努力！

最后我还有几句话要敬告北京银行界诸君：你们上年因八校教育基金的运动，曾与教育界发生一点无味的争议；你们这一次决不要因《字林西报》的挑剔又与教育界发生冲突或恶感。须知破坏内债基金的危险在外人攘夺全部关余，而决不在区区俄国赔款之移作教育费。俄国赔款即不移作教育费，除供军阀政府的浪费外，也决不会落到你们手中来。

（载《向导》第47期

署名：和森）

美国奸商又在张家口横行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申报》北京电：美人满查里，在张家口私运现洋，不服检查，张锡元请政府与美使交涉。

本报上期因美国《大陆报》对于张家口华商组织汽车公司要求中国撤销地方官吏的暴论，曾将前此丧权辱国而美国帝国主义者至今臭骂不休的柯尔曼案复提一笔，以促读者对于这个问题的注意。谁知墨沈未干，《申报》又来了上列专电，可见洋奴外交家办理上案之如何遗患无穷，和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奸商之如何在张家口无法无天的横行不息。

柯尔曼也是因为私运现洋出境，不服检查，以致酿成“巨案”俾美国帝国主义向中国敲了一笔大竹杠。事隔数月，现在又出了第二柯尔曼——满查里。这不是柯尔曼案的味道太佳，吃开了美国帝国主义者的胃口，故又举箸来尝试吗？

可惜张家口与吾人相距太远，不得详知这次满查里擅运现洋出境的情形。然据上次情形推测，大约总相去不远。上次柯尔曼擅运现洋出境时，有堂堂美国驻张领事同坐在汽车上面为之保镳，这次虽不能断定美国领事必与满查里同坐一汽车，然而也不能断定必不同坐一汽车；上次柯尔曼是异常的凶恶，不服检查，这次满查里也必是异常的凶恶，不服检查。但是有一不同之

点：上次柯尔曼首先开枪以击盘查兵士，这次满查里似乎没有此事，这是什么缘故呢？这也不难思索，正如《大陆报》所说：“柯案出后，张家口华官曾有一时颇为安分！”自高级长官以至守关兵士，经过上次撤职，谢罪，记过，或“永不叙用”的严惩（这都是北京卖国政府照美国的命令施行的）之后，这次那还再有勇气忠于他们的职守？守关兵士不敢如上次一样的要检查，自然满查里这个强盗也不必开枪酿成“巨案”。所以“安分”可怜的张锡元，只得忍辱含羞电请北京卖国政府去与美使交涉。

虽然，张锡元也太不识时务了。这次没有酿成“巨案”，在美国帝国主义已属失掉一次敲诈掠夺的机会，在免避了这次敲诈掠夺的洋祸之中国还有什么交涉可言？

临了，我要特提一笔请读者注意：外国帝国主义制造敲诈掠夺机会的方法，除了扶植军阀酿成内乱与匪祸外，现在又采用一种新方法——就是放些行同强盗的奸商到中国来，扰乱中国的法纪与秩序，柯尔曼案与满查里案，即为这种新方法的尝试。

（载《向导》第47期

署名：和森）

外人替曹錕策升平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申报》北京电：某外人建议政府，设裁兵筹备会，曹兼会长，吴齐萧冯为副会长，并谓黎之失败，并不代表何种势力，今直系大可凭借固有势力，多做几件有益国家事，则未尝不可顺守。

这个专电，看来虽空洞得很，然却有一种事情隐藏在背后，并且不久便会要出面。这是什么事情？一定是什么裁兵借款，所谓裁兵筹备会便是这种大借款的幌子。

“五月内平定川湘粤”，这不但吴佩孚心里痒，英美帝国主义者心里更痒。所以美国公使舒尔曼不远数千里由香港跑去云南，何东爵士也在同时北跑京洛（现在不过因病折回汉口），而北京政府又居然有何东的主张组织和平委员会以高凌霨任委员长之说（见《申报》）。这么一来，研究系某君所说的太平景象还不可以实现吗？大借款还没有堂哉皇哉的名义吗？

（载《向导》第47期

署名：和森）

英国的政争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英国自上届选举保守党波拉劳派胜利以来，即把混合政治打得粉碎。然保守党中的张伯伦派犹与鲁易乔治保持相当的关系，故不加入波拉劳内阁。同时鲁易乔治与爱斯葵也还没有取消国民自由党(以乔治为领袖)与独立自由党(以爱斯葵为领袖)的对垒。波拉劳死，包尔温(波拉劳派)组阁，形势渐变，张伯伦派与波拉劳派复合之趋势渐见明了，而鲁易乔治亦于此时遨游美国，有所企图。

现在有两个大问题横在英国：一是赔偿问题，一是失业问题。包尔温内阁上两月虽然与法国冲突得厉害，后来却一天软弱一天，而对于失业救济亦坐视无策，于是大受工党的弹劾与自由党的攻击。在这样情形之下，包尔温乃用很敏捷的狡计，一面拟定保护关税程序，一面宣布解散国会，举行新选举。

在此仓促的选举战争中，张伯伦派宣言赞成包尔温保护政策。保守党完全复合为一；鲁易乔治宣言拥护自由贸易，而自由党也完全复合为一。工党与共产党亦各宣布其独立的政纲。今将四党主张列举于下：

A.保守党——采用保护关税政策，并征收制造品税，其目的为：(1) 以对于国内出产较为公允之方法筹集入款；

(2) 以特殊之资助给予因外人不公允之竞争而受累之工业；(3) 利用关税，以便磋商国外税则之减轻；(4) 在关税全部范围内，予帝国以实在之优待。

B.自由党——自由党由爱斯葵与乔治二人署名发出宣言书，谓一年前根据五年宁静大纲所选出之政府，今忽以未曾证明，且莫能证明之改革税则可救失业说，陷国家于选举之骚扰地位，政府举动，操切可危，此实办理与英国生活极有关系之外交大事一败涂地所致。政府无远识无决断。致使英国不复操左右欧事之势力。即东方政策亦复如是。可耻之洛桑条约，竟断送英人在土商务之安全。而英国在远东有价值之市场，恐亦将有与此同样之命运。自由党政策主张(1) 迅速解决赔偿问题，辅以协约国债务之考虑。(2) 并主张竭力与美国合作。(3) 及对俄恢复完全关系。宣言书又谓资本税有损无益。自由党所期向者，为英国与帝国之发展。如改良运输，多植森林，减低力价，开辟领土利源，增设殖民地与印度铁路，便利海外移民，减轻帝国间运费，增进资本家与劳动家合作等是。至于农业所需者，为巩固物价，充裕财力，固定农田租期，改革运输方法。自由党主张政府予农民以借债之便利，助其组织销售合作机关，撙节公款，改良地制。

C.劳动党——工党宣言书痛诋保护税则，谓无以补救失业，反足祸国病民。积极挽回失业之方法，仅工党有之。宣言书主张，(1) 扩张国际联盟会而谋国际合作之政策；(2) 英国立即召集国际会议修改凡尔塞和约；(3) 恢复对俄关系。宣言书指斥政府未能减轻战债，谓财政一席若属

诸工党，则工党定即施行征收个人资产税陆续缴付战债之方法，凡个人资产超过五千镑者，须纳此税，专以偿债，如是所得税可核减，食物税宴会税及公司利益税皆可取消，而社会事业之款，将来亦可取给于此。

D.共产党——英国共产党选举宣言书，要求（1）没收停工各工厂，及荒芜之土地；（2）每星期工资至少四镑，每日工作六小时；（3）赡养赋闲之工人，而为建居屋；（4）并建设劳工政府。

保守自由劳动三党的分野，在这次选举战争中比上次更为明白。张伯伦演说：“保守党最大劲敌不为社会主义，但为由分而合之自由主义”；鲁易乔治演说：“保守党烦倦时辄乞助于税则，犹人之因烦倦而乞助于酒”。保守党代表银行资本，故主张保护关税并征收制造品税；自由党代表工业资本，故主张关税自由（如此则原料能自由输入而其价廉），并反对征收制造品税。工党一面反对保守党的保护政策，一面又反对自由党的不主张收资本税。故不仅保守党与自由党无联合之可能，自由党与工党也无联合之可能。三党的分野愈明了，便是证明英国的阶级斗争愈剧烈。工党在上次选举中既获次多数，若在这次更为胜利，则完全可以实现共产党的政纲而建设劳工政府。

（载《向导》第47期

署名：和森）

由华盛顿会议 到何东的和平会议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一日)

华盛顿会议，在美国帝国主义和英国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上说，真是一种惊人的大成功。他的效力不仅等于万斛麻醉剂，麻醉得中国人民神智皆昏，他的效力不仅打破日本独霸远东的雄图而代以英美共霸远东的鬼计，他的效力尤在利用中国人民的昏聩，给中国立了一种共同宰制共同管理的根本大法，使他们以后的侵略皆有所根据而成为法律化。

吴佩孚要统一中国而主张定国宪，赵恒惕要割据湖南而制省宪，与美国帝国主义及英国帝国主义要共管中国而订立所谓华府条约，用意正同。

由华盛顿会议到现在，为时不为不久，中国得到什么好处？中国国际地位有什么变迁呢？当英美帝国主义者华盛顿会议发出增加关税，退回租借地，考查撤消治外法权的口惠时，中国幼稚无识的资产阶级何等的讴歌，何等的感戴。然而事实怎样？直到现在不仅旅大退回无望，而威海卫反有永远被鲸吞之势；不仅考查撤废治外法权为欺人的鬼话，即二五附加税也要千方百计拖延打消。至于国际地位不仅没有丝毫增进，而其危殆奴化之日趋严重，正为本篇之所欲论。

在理，中国国民受了这样可耻的欺骗，似应翻然觉悟而发挥排斥外国帝国主义的民族精神，然而事实不然，他们不仅没有这种觉悟，没有这种精神，而且反因此增加崇拜外力、迷信英美的程度。他们只知道把华会决议不能实现的缘因归罪于军阀，而不知道中国军阀实完全倚仗外力而存在，更不知道华会决议是灭亡中国的陷阱。

然而中国人民这样的昏聩决不是偶然的事体。在十二年以前的半世纪中，中国人民实富有爱国的精神和排外的思想，每次外交问题发生都足以激起国人的注目与呼号，对于外国人（尤其是英国），用武力与流血手段强迫中国人吃洋烟、信洋教、买舶来品等无礼残暴的欺凌，莫不泣血饮恨而思报复于万一。彼时中国人之视洋人，只有凶恶，强暴，掠夺，无礼，野蛮的观念，决引不起现今中国人对于洋大人谄媚，尊敬，崇拜的奴隶心理。不但如此，中国革命运动及一切政治改革运动之起源，根本即起于抵御外患之一念，因要抵御外国帝国主义之侵略，急起推翻满清误国的政府；因恐交通命脉握于外人之手（铁路风潮）迅速实行辛亥革命，这是何等伟大的民族精神，这是何等自觉的爱国精神！

现在呢，中国的民族精神和爱国精神真是薄弱到了百二十分，不但远不如前清时代，而且根本变成媚外与崇拜洋大人的奴隶性质。这样的转变，比中国现在任何的坏现象还要更坏更危险，这不但是民族衰亡的预兆，而且成为衰亡民族的普遍事实。最近十二年以来，固然也曾发见国民的爱国运动，如五四运动便是最著之一个，然而这种运动的背面实含有美国帝国主义者利用与教唆的作用，以致国民运动丧失其真实的性质而变成为狭义的偏畸的对日运动。当著日本帝国主义积极的向中国侵略时，

中国人民对之起高度的反抗，这是很应该很伟大的；然而当著英美帝国主义积极的侵略中国时，中国人民不特无积极的反抗，连一声半响也没有。这种奇特的现象，只有迷信英美而被其催眠与奴化的缘故才能够说明。

我前已说过，中国人民这样的昏聩决不是偶然的事。远东第一把交椅英国帝国主义在任何他国之前即坐定了的，珠江和扬子江流域是他固定的势力范围，关税盐税及全中国的经济生命归他操纵，他的商品占中国全输入的第一位，中国大部分的铁路抵押在他的掌握，最重要的商埠及南北国防咽喉（北如威海卫、南如香港、九龙）通在他的手里。他在中国占了如此重要的地位，固然是得意忘形，而中国人因无处不遇著“大英”的势力，并且大英势力在各大都会成为个人生活与社会生活的主人，于是不特与之帖然相习，而且崇拜洋大人的新习惯遂渐渐成为社会化。

至于美国前此在中国虽未获得何等重要的地位（因为彼时为他自己发展的程度所限，还未达到严厉侵略中国之需要及能力），然自麦荆莱于光绪二十五年间英德俄法宣言开放中国门户以来，这样鬼巧的政策，一面不费一兵一矢得插足于宰制中国的均势，别面又滥便宜博得中国人民的好感。从此更专用文化侵略的政策，退回赔款增加留美学生，广派教士，在中国内地遍设青年会与教会学校，造成几十百万的亲美派，换过说，无异造成几十百万的内应队。然后再临以可怕的经济侵略——即新银行团，以全世界的债主资格（美国现在为全世界的债主）号召华盛顿会议，一跃而为领袖列强宰制中国之主人。

华盛顿会议是一种“欲取先与”的政策，又是一种“名归而实

不至”的骗局。在这样的骗局之下来愚弄近视而无识的中国人，自然是容易成功的。他方面，欧战中及欧战后的短时期中，中国人看不见英美在北京政局中播弄的阴谋鬼计（如参战及帮助袁段等），而只看见日本显明的侵略，因而只发生排日的感情，把英国过去在中国的侵略及美国未来在中国的大患通通忘掉，这犹情有可原；初不料时至今日，英国帝国主义借临城细故，敲诈全国路权，强迫续租威海卫及津汉租界，而前此轰轰烈烈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爱国群众竟充耳无闻，半声不响。

临城土匪架去一二打洋大人去保镳，这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我们试以此与华侨同胞在美国、坎拿大、新旧金山、古巴、秘鲁、南洋等处所受的虐待与横逆比较，这算得什么事？又试以此与乐志华在上海租界巡捕房所受之肉刑比较，这算得什么事？又试以此与近日英国赴日救灾船之船员恶意抛投大批被难中国男同胞于海中而将中国女同胞奸得落花流水之事相比较，这算得什么事（沪上各报载云）：（据九月十六日由日本开进天津港某轮船船员之谈，认英国普里悠华拉尔轮船，由横滨载难民至神户，闻途中厌黑人华人等之下级船员，乘难民疲劳之际，袭击船室，将男子全部投之海中，女子则加以非礼，后被发觉，将该船扣留，因恐激动众怒，故未发表云）？又试以爪哇英人最近杀毙华侨十二名，伤四十二名之事（见九月二十六日申报）相比较，这算得什么事？然而华洋血肉价值的贵贱不仅在外国帝国主义者视之有天渊之别，即在全中国的舆论代表，绅商领袖视之也有天渊之别。故对于前者连篇累牍，如犯圣明，叩头谢罪之丑态日不绝书；而对于后者则噤若寒蝉，视同蚁命，这样卑贱的民族心理经过这一翻试验，洋大人得着把柄，遂再准备下文。

下文不是别的，就是临案通牒和共管铁路的护路案。军阀是外国帝国主义扶植的，土匪也是外国帝国主义直接（如土匪之军械皆来自美国、日本、意大利及其他各国）间接（因外国商品的输入，以致乎工业农业破产失业而流为土匪）养成的，论理，临城案的责任及中国内乱的责任，外国帝国主义比中国军阀更要多负一些。现在英美各国帝国主义者反借著临案细故敲诈中国的赔偿，侵害中国的主权（如要求田中玉等永不叙用），攫夺中国的铁路。国民及国民党对于外国帝国主义这样严重的侵略不仅不反抗，而且反打电给各国公使请其借此干涉中国内政，撤销承认北京政府。

中国之大患不仅在军阀，尤其在外国帝国主义。军阀在中国的势力根基业已动摇，而列强在中国的势力则根深蒂固，方兴未艾。万恶的军阀固应急于打倒，但当以国民革命的力量来打倒他，决不当引虎拒狼，请求外力来干涉中国的内政。在这一点上，借临城案请求外国干涉内政的举动，不仅犯了“宁赠外人”的罪过，而且缺乏政治的常识。外国帝国主义借著这种呼声，一面可加重分量敲北京政府的竹杠，别面又可借此证实他们所说的“中国人民欢迎共管”！不特如此，在他们还未完全达到共管目的以前，一定是继续帮助军阀，决不会帮助中国人民，如现在美国帝国主义命顾维钧上台为曹吴撑持门面，英国帝国主义命盐务稽核所会办韦尔敦承认北京政府向金城、盐业、中南、汇业、东陆五银行举借大选费，就是明证。

洋大人现在似乎成了昏聩可怜的中国人的上帝，华会决议又是洋大人播弄昏聩可怜的中国人的乾坤；上帝的权威愈大，乾坤的变化愈无穷，昏聩可怜的中国人的便愈不相信自己有力量解

决时局而益拜祷于上帝——洋大人之门。十二年以前，惟恐交通命脉握于外人之手，因而激起革命；十二年以后，惟望洋大人共管铁路，断绝军阀的饷源，兼便货物的运输。十二年以前，惟恐外人干涉内政，因而推倒满清的统治；十二年以后，惟恐外人不干涉内政，绅商领袖日夜祷祝，只想建立洋大人统治之下的和平。这样反常的奴隶心理，有的说是人心厌乱的反映，有的说是中国人自己能力不够的必然趋向，然而实际又是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长期宣传与愚弄的结果。他们有教堂、牧师、青年会、教会学校、报纸、无线电、通信社、亲英亲美派的外交家或留学生、变相的侵略队——侨华的外商和商会，以及上年新发明的万国公民大会以制造或散布无形的势力，他们给中国人建立了改造神经系统的大工厂，不愁中国人的神经感觉不随洋大人的意向为转移。

新发明的万国公民大会，不用说是华盛顿会议脱胎换骨的产物，居然以美国公民的资格在中国发起国民运动，满拟领袖沪江京津的总商会来运动废督裁兵理财，其目的是要在外国政府和外国商人的“帮助”之下建立商人政府或商埠同盟。这要算是华府会议新辟远景之第一幕。

华府会议新辟远景之第二幕，不用说为临城案与护路案。而其愈接愈妙的第三幕，就是英国侦探何东爵士公然号召中国人民邀请外国公使列席的和平运动。以英国商人和贵族的资格居然敢到中国来号召这样的和平会议，可想见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制造的奴属空气已到了何等程度；以这样“请君入瓮”的英国侦探的阴谋，总商会、银行公会、钱业公会、江苏省教育会、《申报》及其他各报各团体居然为之摇旗唤呐，大吹大擂，可想见中

国居重要地位的社会阶级死心塌地崇拜外力的奴隶心理已到了何等程度！即以现今的国际法而论，那有一个未被保护的国家或非确定的殖民地，能容许外国人代其发起国事会议而为之监督或仲裁？以总商会、银行公会、钱业公会、江苏省教育会，及《申报》诸君的知识，岂不能洞见及此？只缘他们此时充满了妄自菲薄、倚赖外力及苟且的和平心理，遂不惜昧着良心，不顾国家之独立与主权，饮鸩止渴，只想在英国及列强保护之下过洋奴式的和平生活。呜呼！外国帝国主义在前清末叶只能征服中国的政治经济，还不能征服中国的民族思想；现在呢，不仅征服了中国的民族思想，举国喁喁惟望洋大人之速临兹土俾我以和平。呜呼！不亡何待？

总商会与江苏省教育会不仅本身赞成英国侦探的和平运动，而且通电全国各省的商会与教育会请其赞成，不久应声四起，举国若狂，便可蔚成“华人实愿共管”之大观。即使此会（即各国公使列席的和平会议）开不成，而外国帝国主义得着这次无形的大成功，已足壮其共管与干涉之胆略，而毫无所踌躇。呜呼！哀莫大于心死，而总商会、江苏省教育会、银行公会……诸君的心就这样的死了吗？当万国公民大会要来与你们合作裁兵制宪理财的运动时，你们尚知以“有碍主权”或“有干涉中国内政”之嫌谢绝之，当侨华美国商会打电回国说华商欢迎共管，速美政府大派兵舰来华时，你们也还知道否认，奈何这一次竟不顾国家的独立与民族的人格而附和比前两项阴谋更甚的英国侦探的鬼计？世上丧心病狂可惊可骇可鄙可耻之事，宁复逾此！

这样英国侦探给中国发起的延请外使列席的和平会议，不

是天上滴下来的，实有华会决议为之根据。外国帝国主义者及其侦探对于中国人民客气些说，则云这是外人关切中国之善意的发起，官式些说，则云中国战乱妨害外侨生命财产，这样的会议是根据华会决议之精神的。现在请看英国机关报《字林西报》解释列强代表应参与会议之理由：

“此计划中有一最易引起非难之点，且已略有非难之声者，即列强代表列席是也。其反对理由，至为浅显，即谓讨论之事，纯属内政，应由华人自决之。夫华人果欲自决者，尽管自决可耳，但不得谓列强之列席别有作用。即如华会中讨论中国事情时，列强极能加惠于中国，证据昭然。且此次会议亦宜有外人之赞助，如裁兵问题，非有借款不克实行，此即有待于列强之助力者；再则会议果须成功者，中国已表示赞成开会之各领袖，必须亲自到会，若派代表，决不能成事，而欲各领袖亲临，莫善于以列强参加为号召之具。至列强方面，自亦须妙选名流以参加之。或者此项会议可与华会所决定之海关附税会议联带举行，我国内（指英国）舆论，固屡有人提议此附税会议之讨论范围应加以扩大矣。”

岂特英国帝国主义的机关报如此解释，而“中国”的全国商联合会代表张维镛、马炎文更代替英国侦探解释得上劲。今摘录这两位“中国”商联合会代表与英国侦探何东爵士的一段谈话于下：

“……此外并讨论及于外人襄助问题。张马两君谓日来报纸宣载，有一部人士对于此点颇有怀疑，恐因此惹起外人干涉内政之嫌，斯固慎重主权之论，然以先例证之，似尚无甚大碍。盖辛亥改革之时，友邦方面，怵于战祸之延长，重令吾民涂炭，略忆当时，似由汉口英国领事提倡南北议和会议，卒致实见，并闻会

议于上海英大马路之议事厅。由是清廷宣布退位，民国遂完全成立，足下主张之请友邦人士赞助一切，此正本诸华府会议议决各国力助中国速谋统一促进裁兵之精神，外人若果立于赞助及顾问地位，决无妨碍。何氏深以为然，……”

呜呼！国之将亡必有妖孽，现在的妖孽岂止张维鏞与马炎文！

这样前此未有的亡国现象和倚赖外力解决国事的奴隶心理，一面固然是外国帝国主义文化侵略长期宣传的结果（全部的宣传工程中当然以华盛顿会议最为收效宏大），他面我们又可在本身发见一种所以致此的重大原因。原因维何？就是还没有一个真正为民族利益而奋斗的国民革命党。假使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这样的党，我们试想：当华会骗局发生及发生以后，这个党应如何在民众中宣传揭破列强对华政策的新式假面具；当旅大与威海卫之退回发生问题时，这个党应如何领导全国人民反抗英日帝国主义；当临城案发生列强小题大做借口敲诈中国的主权与利益及全国报纸昏天黑地的媚外时，这个党应如何出头，顶天立地，竖起民族的正义，向外国帝国主义说硬话，向本国人民指示应持的态度与方针；当护路案发生时，这个党应如何拚命的号召全国人民抵抗英国帝国主义亡我的侵略；当美国公民大会及英美侨华商会干涉中国内政制造共管空气，诱奸中国总商会及人民团体时，这个党应如何出头无情的反对，并多方洗涤人民浸渍于外论的不正观念；当上海商人发起裁兵运动、民治运动及主张召集国民大会解决国事时，这个党应如何的出来领导他们指示他们组织这种运动，成功这种运动……。呜呼！凡此种种拯救我中华民族的伟大使命与奋斗工作，凡属真诚爱国之士，莫不

属望于具有三十年革命历史的国民党，而我国民党则何如？国民党以临城案中不仅不能纠正或挽回商界舆论界昏天黑地的媚外风气或“开门揖盗”“宁赠外人”的风气，而自身且躬犯之。旅大问题，全国汹汹，国民党一声不响；威海卫及护路案，全国静如死海，任人宰割，国民党也半言不发；外国商人与外国报纸日在中国肆其广长之舌，制造共管空气，未闻国民党出一言半语之反驳；上海商人的裁兵民治及召集国民大会的运动，国民党全不注意诱掖他们而与之接近……。假使国民党做了以上各重大而必要的工作，何致外国帝国主义于临城通牒之后又敢提出共管铁路案，何致媚外与崇拜外力倚赖外力以解决国事的奴隶心理如此伸长，何致英国侦探何东于万国公民大会的圈套之后又敢公然来沪号召延请外使列席的和平会议？

英国侦探公然能在中国人民面前号召列强主宰中国内政的国事会议，并受各界昏天黑地丧心病狂、恬不知耻的欢迎，这决不是中华民族一件小事。这样英国侦探号召宰割中国奴隶中华民族的会议，不但未受国民党的反对，而且大得孙大元帅的赞成而许以亲自出席。这样的赞成不是一种小而可恕的疏忽，他的恶影响，不止于“资寇兵资盗粮”，至少也等于给洋大人以“革命领袖也赞成列强共管中国”的口实，而实际又无异于不知不觉中助长开门揖盗奴属外人的奴隶心理。

在民族主义上说，是不容许犯这样危险的错误的。借临城案以反对曹吴二大军阀及借外人之和平号召以证明曹吴不愿和平之罪，这样的政策不能不说是见小忘大而且根本不智。这样政策的结果，除了“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徒供外国帝国主义的利用与证实“华人实愿共管”之外，国民党及愿意和平的商民得不

到丝毫利益。质言之，就是英美之帮助曹吴如故，曹馄之做总统与吴佩孚之武力统一如故。反一面说，倚赖外力与奴隶的心理既成而不可挽，岂特打倒军阀的民众势力永远不能形成，而外国帝国主义与军阀结婚的共管家庭，不久即将建筑于见小忘大，苟且偷安的中华民族之上，永世不得翻身！

虽然，往事已矣，来日方长。全国商民及上海商界同胞苦兵灾战祸亦既十二年之久，希望和平，本不为过。不过和平当以自身的力量致之，侵略中国的外力，帮助军阀的外力，怎能倚靠他们为中国人民致和平；纵然人民力量现还薄弱，然而只应横厉无前，向前做去，总有达到目的之一日；决不应妄自菲薄不顾民族人格与独立而摇尾乞怜于累世侵略我疆土，戮辱我祖先，鲸吞蚕食方兴未艾的外国帝国主义之前，并且羊乞狼助，决无幸理。你们现在应翻然觉悟，拿出前此拒绝美国公民大会及否认侨华美商通电的精神，无情的反对英国侦探何东爵士亡我奴我的阴谋；只有贯彻你们前此召集国民大会的主张，才能组织人民推翻军阀的真势力而达到和平的目的，你们决不应妄自菲薄，你们这种主张是很对而且很有力量的。“迷途不远，回头是岸”，你们快快醒觉罢！

复次，我们仍不能不希望国民党毅然决然改变前此的错误政策，顶天立地竖建民族精神与国民革命的大义，系统的宣传并组织反抗外国帝国主义临头的侵略与共管；领袖全国商民组织国民会议以解决国事，建立真正的人民政府，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和平而奋斗！

（载《前锋》第2号

署名：和森）

为收回海关主权事告全国国民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代表你们利益的革命领袖已在英美炮口的威胁之下!

你们应拥护广州政府与外国帝国主义为光荣的奋斗!

自广州政府收回海关的消息传出，英美等国即大派军舰进逼省河，并遣陆战队上岸游行，向广州政府示威。同时英美帝国主义者在香港、北京、上海各大埠散布的宣传空气是说孙中山要将海口开放为自由港，并且要摇动内债基金。

炮舰政策与宣传政策并施，果然错乱全中国人民的耳目：有的打电报替外交团和安格联助威(如总商会银行公会等)，要求孙中山不要破坏关税以裕内债基金；有的腮腮然忧虑广州政府的非常行动足以惹起外力的干涉和共管，其责备爱国领袖的论调，也不啻间接为北京卖国政府张目(报载北京政府忠告孙文勿惹起外力干涉!)；有的分散其注意力去讨论自由关税制是否适宜于中国，因而对于所谓“孙中山开放海口为自由港”的政策不免发出些反对的议论。以上三部分意识虽然各不相同，然其被英美宣传政策所蒙蔽，而忘记收回关税主权的大目标，都是一样的。

据本报所得确实消息，孙中山氏的惟一政策，在收回关税主权，此外并无所谓自由港之拟议。虽其入手办法，自然要控制粤

关收入，然此项政策的性质并非局部的，但为中国国民党改组的新政纲之一，将来尚须全国大会通过施行，发展为普遍的全国的运动（参看本期国民党改组消息）。故此项政策不仅无丝毫损害商界银行界的意义，而且是专为国家的主权和中流阶级的利益设定的。

可怜的中国商人和银行家及一部分新闻记者，未免太缺乏政治上的关心与常识。他们不知反抗外债担保侵及内债基金的优先权；他们不知此时英美帝国主义压迫孙中山便是打消与他们利害切身的收回关税主权的必要运动；他们以为孙中山也是利己主义者，只顾巩固自己的地盘，而不惜招惹外力干涉与摇动内债基金。其实中国自最近八十年以来，已无日不在外力干涉之中，无时不在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与宰割之下，国境以内，租界厘然，水陆要塞，大半割让；各大都会，莫不有外兵的驻扎；长江内河，简直任外舰横冲直撞；海关盐政早已共管，铁路交通，现又继之；外交内政，无一事能容中国人自主；文化教育也几乎全归外力支配……。然则这样早被外力占据和宰割的中国，还有什么方法可避免外力的干涉？

现在中国人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永远屈伏为奴；一是起来与外国帝国主义奋斗。而孙中山氏对于收回粤关主权的坚决表示，便是这种奋斗的第一步。

孤军独战的孙中山，他负了中国国民革命的唯一使命，所以他不仅是盗窃国政的直系军阀的唯一敌人，而且是帮助曹吴的英美帝国主义之唯一敌人。他对于外国帝国主义没有遵守什么“条约”的义务，也如他对于直系军阀没有“提供广东关税以打广东”的义务是一样的。英美军舰既在长沙帮助赵恒惕打走了谭

延闯；现在于陈炯明大败之后，又借口海关问题开到广州来示威，原来毫不足奇。所以现在代表中国国民运动的领袖与英美帝国主义的冲突是没有方法可以妥协的，因而外力干涉的招惹，自然也没有方法可以免掉。只有善于卖国的北京政府，才有常常免除外力干涉的本领！

亲爱的全国国民，你们快快醒来罢！代表你们利益的革命领袖现在已在英美帝国主义的炮口威胁底下，你们还不迅速起来为他的后盾吗？！

附录：孙中山告《字林西报》记者格廉氏，谓广东一省，独负护法军全部战费，已越多年，而北京依列强承认之便利，得收广东之关税以打广东，事之不平，无过于此！依彼计算，两广关税收入，年约一千万元。此本两广人民之钱，故当然为两广所有。彼拟令饬关吏，缴出税收，若关吏拒绝，则撤换另委。至于外债部分，广东应摊之数仍当照缴……格廉氏问此计划拟何时实行？孙答数日后即将着手，且事前不先通告列强者，因税款属于广东，与列强无涉也。……格又问若外交团承允拨付广东部分之关余，如民八故事，则此事是否中止？孙答曰然，然亦必将历年应拨未拨之数如数付彼而后可，但彼意外交团对于此层不能办到。……格又问今外舰云集于广州，若各国武力干涉，则将与之战乎抑否乎？孙答以广东兵力，决难胜外舰联队，但彼若有与外舰接仗之机会而遭败衄，则虽败犹荣，将视为一种荣誉，且亦尚有第二步办法。第二步办法如何虽未明言，格廉氏之意，以为指联合苏俄，因苏俄代表婆罗廷氏近在广州也。……格又言干涉关税，影响债票市面，若各省群起效尤，势必破坏全国之关

税制度，国家将蒙不利。孙氏答言，国债担保，除关余外，尚有盐税及交通收入，果切实整顿，何难弥补。若虑各省效尤，债基无着，摇动国信，则补救之法，亦甚易易，只须外国撤消对于北京政府之承认可也。

（载《向导》第48期

署名：和森）

英国选举中工党之胜利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关于英国选举竞争，最近路透社传来下列几节最可注意的消息：

A 选举竞争现有捣乱行动，最甚者为伦敦与苏格兰两处。被扰者大都为自由党与保守党。据被扰者云，此种捣乱行动，乃极端派工党或共产党所为。自由党胡格平氏在北巴特细境内屡开演说会，辄被人喧扰阻止，故已决计停止公开演说会，而肆力于个人之运动。自由党丁丹特氏在格拉斯戈某处演说后，被人殴辱，抢去金時計与链，现常有警察保护之。保守党贺恩昨晚在格拉斯戈演说，场中有人喧扰不息，致不能毕其词。卒有工党中人立于椅上，相继狂呼。自由党爱士葵在巴斯莱亦受同样待遇，有若干人执旗而入，盘踞会场，旗上有欢迎劳工主义之俄罗斯字样，复高唱红旗歌，爱士葵乃不得不下演讲坛而去。统一党候补女议员罗伯森女士，昨晚在斯特罗洛之某学校内演说时，为狂徒所窘，跌伤其腿，而唾其面，罗女士因受惊恐，今日不能起床云。
(一日伦敦电)

B 纽朴特之保守党候选议员克拉里氏夫妇，昨夜为反对之群众所围，掷以砖石污泥，克妇为污泥所中，腿部被跌受伤，今日不能出旅馆。裴西勋爵夫人，昨夜在海斯汀会场演说赞助其夫

时，受重伤。裴西勋爵发言时，为众阻挠。有人以破杯一，掷上演坛，险中主席之面，但中其侧之裴西夫人。散会后，众复围裴西勋爵之汽车，扰攘中，夫人之右臂为汽车门轧伤，当汽车驶去时，众笑喊不已。（五日伦敦电）

C 保守党阁员六人失败，而农部大臣桑德斯氏之失败，尤为现政府在农业区域失利之最大者。盖政府初以为提取农业津贴之政策，定可得农民之欢迎也。

D 工党今晨对于目前已得之结果，非常得意，谓政府多数业已消灭。工党此次胜利，乃过去两年中惨淡经营所致。而其对于失业问题之态度，始终如一，坚决不变，亦为致胜之一原因。凡工党固有之席，迄未有被保守党夺去者，此乃极可注意之一点。工党甚以汉德森氏失败为惜，盖自由党与保守党联合敌之，故汉氏不能胜利也。

E 保守党总部不愿在选举结果完全发表以前，发表意见。但以此次失败，全由于民食昂贵之呼号。政府党困于仓促选举之情势，未及切实驳正之云。包尔温已返此，有不豫色，不允发言。保守党蒙德氏称，包尔温将辞职，而稍重自由贸易之窦比氏或将组阁，暂行维持。

F 目前政状为政治史中所未有，三政党皆无权支配之。彼此意见甚深，联合为不可能。唯一解决法，殆在协定暂时行政办法耳。政界大为震动，预料包尔温必辞相职，英皇将召窦比爵士组阁云。工党兴高采烈，自由党尚怏怏不乐，盖以胜利不若工党，犹为三小党中之最小党也。

G 孰组政府，未易推测。报纸批评，颇不为包尔温表同情。自由党报纸，当然以咎由自取相嘲；而保守党报纸，亦痛惜不从

保守党领袖劝告，轻自牺牲安稳地位之愚。各报皆讨论各党能否商定一大共同计划，利行政之问题。如能有协定，则短小时期内，不致复有选举。若再选举，恐仅再造成现状。若混合内阁，则亦不为人欢迎。各报大都谓宜由一党组织政府，而得另一党扶助某种议案之允诺，但应入阁者，究为何党，则言者不一其词。保守党现自认保护政策将于许多年内未能实现，自由党则谓保护政策业已消灭。（以上七八两日伦敦电）

由以上七节消息，可知工党胜利的形势：不仅摇动了保守党和包尔温内阁的地位，而且摇动了自由党的地位；不仅使资产阶级各机关报建议各党抛弃竞争而从事于协商，而且建议立刻停止选举。

这是代表些什么意义呢？这是表明英国资产阶级政治已整个的破产，而劳工政治正在那里顺利的诞生，怎样说英国资产阶级政治已整个破产呢？现在英国大多数人民不仅不信任保守党的欺骗政策，而且也不信任自由党的欺骗政策。保守党的政策固然足使失业恐慌愈益严重，物价愈益昂贵，英法冲突愈益激烈；而自由党的政策又何尝能救济失业，轻减物价，解决英法冲突，而挽回欧洲资本主义的厄运？保守党在选举场中固然到处受人民的殴辱与咒骂，而自由党又何尝不受人民同样的厌恶与待遇？鲁易乔治对于不能救济失业和败衄于赔偿问题的现政府之抨击固然振振有词；然一年以前，他自己又何尝不是以同一原因被人攻击而下野？所以现在不仅保守党没有挽回英国资本主义颓败的法宝，自由党也同样的没有挽回英国资本主义颓败的法宝；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的破产，已在此次选举现象中完全表露出来了。

在资产阶级政治破产的尽头，业已开了劳工政治的远景！上年选举胜利的工党，今年又连续加倍的胜利起来，这决不是一件等闲的事件。这虽然是一种和平的而非革命的变化，然和平的变化尚且到了这步田地，可见欧洲资产阶级政治是怎样的临了他的末日而无存在之余地了。

最后我还要附缀一点很有趣味的消息：路透社二十八日伦敦电白明汉工党开会时，首相包尔温之子名阿里佛包尔温者，登台演说，批评政府之办事不力，谓过去一年中政府所为之事，无异无辜拘禁若干人，后卒认赔损失而已，今国人所需之唯一保护，即在反对此种政府云；又主张采乔治亚与南俄之所行社会民主党之政纲，组织工党政府。

（载《向导》第48期

署名：和森）

苏俄在欧洲国际地位之复振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自上年英意反动势力得势以来，苏俄在西欧国际地位上颇为不利。事隔一年，现在形势又忽转变：在英国方面，不仅保守党早已收回反对苏俄的口号，而自由党更以“承认苏俄”为这次选举政纲之一。在意大利方面则更为有趣：前此极力反对劳工共和国的墨索里尼，自从柯夫岛事件受英德及国际联盟严重的压迫以来，完全改变他的态度。然而这样的事情，决不是英意二三政治家感情上或心理上的变化，不过是苏俄本身的重要，反映在商业国家的经济需要里面和被头等国压迫的次等国里面罢了。

现在试看路透社的罗马电：意相今日在众院宣称，政府不反对承认苏俄政府，且谓现有莫斯科委员团驻罗马。意国之目的，乃在恢复意俄寻常商业关系，谈判已臻美满之阶段，未受政治原因之影响，惟尚须缓缓进行。彼钦佩俄人之自尊，盖彼等皆热心保卫国家利益之人，两国人民智识上之关系颇深。欧洲各报当意军占据柯夫时，表同情于意者，惟莫斯科之报纸。承认苏俄政府，实利于意国。意政府可因此恢复西方各国对俄国政治外交上之和好，俄政府将以订结商约及原料之让与权为报，此意国所急需者也云云。

(载《向导》第49期 署名：和森)

又是一个乐志华案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汉口电：俄租界日商本多洋行厨役华人田仲香，号日(二十)被该行诬窃表链，先打断田臂，送日捕房，用毒刑拷问，继用麻绳痛绞，今晨(二十一)因伤致死。捕房通知洋务公所会审员杨培往殓，杨见田伤痕遍体。多数华工往捕房质问，又被武力驱逐。日本义勇队消防队武装上街。

今年四月间，上海虹口巡捕房，出了一个惨无人道的乐志华案；事隔数月，现在汉口日本巡捕房又出了一个同样情况的田仲香案。西崽乐志华，被他的洋主人疑他偷了八百块洋钱，引到虹口巡捕房毒打，“吃雪茄”，“浇冷水”(见本报二十三、四期)，打得血肉横飞，死去三次；结果，英国帝国主义者，用种种手段注销两个施刑探捕——加布德和鲍尔庆的罪名，以顾全“西人在租界内的文明和威信”。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者则更凶恶的痛快，把田仲香毒打到乐志华的田地，率性用麻绳把他绞死，免得他如不死不活的乐志华一样，留在中国社会，以表彰“外人的文明”。英国人在上海干了乐案的大惨杀后，一面用枉法贿赂的手段，一面还要高谈西人的威信与文明，以镇压上海华人的愤怒；而汉口日本帝国主义者则率性派遣军队上街示威。呜呼！租界内的中国人！

(载《向导》第50期 署名：和森)

东南大学要圈民田五百亩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西乡东七西十八等图农民农业产会，昨日发出公启云：查上海县布告，以国立东南大学，呈准省令，圈购农田五百亩，设工商两科校舍，此项地价，现府库空虚，暂先设法筹垫，俟将来公家财力稍裕，再行呈请酌量拨还，或募捐等因。自奉该告，手足无措，不独无地可耕，生计顿绝，即庐墓亦不保，并田圩蔬菜无地栽哺，一旦违法勒圈，则数千户口何以生活？况十一月十二号报载，大西路之地价飞涨，每亩值银一二千两，或三四千两不等，在稍形繁盛之区，更为居奇，现该布告勒圈是区，出价每亩五百元，但农民等并非博利，实不肯卖，系保耕田活命，所以分投护军使暨道尹，呈求保全。詎料由东七图董杨桂生，引指西十八等图，勒圈恫吓，已非一日。兹于二十二号谎报县署，将农民金小弟在田单应诬拘，至二十三号桂生之子，诱令男女数十人，捏称侵毁，预伏警兵，围闭私室，殊不知杨桂生素抖地皮，该校何忍欲心辣手，试问设全校之需或另校之用，若觅校地，何处无地，何必强勒，忍心残害，谁无庐墓，竟滕请省令。断绝农民生命，誓不甘服云云。

上海近来有三件极可注意的“小事”：一是工部局强购华人朱紫君的地皮，朱因祖宗坟墓所在，不允出售，于是洋大人把他控于公廨，票传拘讯，再三不休，朱家斗遭这场天外飞来的洋祸，

自然是刀上鱼肉，没有幸理。二是闸北水电官办民办的争执，官力赫赫，闸北市民也还敢于不知天高地厚的反抗。三就是东南大学郭秉文、黄任之诸人，不顾数千户口的生死，仰赖韩国钧一纸文书，要来强圈民田五百亩。

哼！江苏鼎鼎大名的“教育家”对于小百姓竟具有与洋大人同样的威风与魄力！

（载《向导》第50期

署名：和森）

国民党大会宣言与国民

(一九二四年二月二十日)

国民党大会宣言已公布了，国民党对于中国底现状的批评，并国民党底主义及其政纲，已说得一目了然了。有些没有明白国民党的人，至今也应该明白了。

我敢说凡是中国的人民，对于国民党这次的宣言都是不能故意反对的，都是满意而欲实现的。可是自国民党这次的宣言公布以后，在国内的报纸上竟少见有批评，难道国民已默认了吗？或是没有注意吗？

如已默认了，那么请以后，不但要单独责成国民革命党人去执行起来，并要各个人责成自己一齐去执行起来。在从前我们国民因没有正大的政纲及策略，以致不能团结一致的革命。然而至今已确有了正大的政纲及策略了，若再不采此正大的政纲及策略去执行起来，这是与冷血动物无异。

没有注意的人，难道受痛苦还不觉得要求解放吗？国民党底主义及其政纲是否适于中国民众的解放？请自动的想想，不宜再作麻木不仁。

此宣言究竟能否实行？全在于我们国民能否了解她和容纳她？我们国民底程度的高低如何？也可以从此最后的判别了！

国民注意!

(载《向导》第 53、54 期合刊)

署名：和森)

外国帝国主义最近进攻之一览

(一九二四年四月二十七日)

一，美国众议院海军委员会议决拨一万万一千万元建造巡防中国内河炮舰六艘。

二，外交团初议联合组织三大舰队：第一舰队任辽东直鲁沿海之警戒；第二舰队任长江一带之警戒；第三舰队任浙闽（编者注：因原件残缺，故此处缺一句话。）

三，美国极力向曹锟齐燮元张季直父子活动三千万导淮借款（以一千万元给曹吴做统一费；一千万元给齐燮元进行副座；一千万元给张南通父子弥补所办各项实业的亏累）；以改在苏州建筑无线电台为条件（因何丰林反对在上海建筑）。

四，外交团要求扩张上海租界及港口，以为允许上海租界内华人与华人民事诉讼交与中国法庭办理之条件；但会审公廨依然继续存在，华人与华人之刑事案件仍归其处置。

五，上海工部局的帝国主义者，提出增加码头捐。

六，丰台一个军官和一个英国人互相殴打，陆军部卫兵李义元因要游览自家的城墙（东交民巷水关）和几个英国人互相殴打，英国公使要求特别法庭并要派员会审；小题大做，企图借此扩张治外法权于中国的首都。

七，临城案赔偿额进加至五十余万。

八，法国联合意、比拒绝关税预备会议，以压迫中国用金偿付庚子赔款。

九，法英美各公使极力破坏中俄交涉。

十，法国干涉中国接受苏俄退回汉口租界。

以上不过是最近十几日的侵略账，我的职责只在一笔一笔给他们记过清楚；至于在我们受者的国民生计上将发生怎样的政治影响，权且不必絮说。现在只提出下列几个问题，问问读者：

一，照一般美国留学生，外交系和教徒散布的空气，美国是帮助中国而不侵略中国的；现在他要借三千万给曹锟、齐燮元、张季直去瓜分，花一万万一千万元建筑六艘炮舰来巡防中国内河，为的是什么呢？

二，照顾维钧、王克敏，及被外交系和东交民巷收买的报纸所造的谣言，苏俄退回前俄帝国主义所强夺的一切权利（如协定关税，治外法权，租界及庚子赔款等）与中国，而向北京学界用去几十万鼓吹接受苏俄善意并恢复邦交的贿赂费；何以外交团退回区区一部分华人与华人间民事法权，不向上海学界或报界用几十万鼓吹收回治外法权的贿赂费，而反向中国扩张上海租界及港口呢？法国何以不用几十万奖励希望快开关税会议的舆论，而反向中国提出敲诈七千万巨款金佛郎案，以为关税会议开会之条件呢？

三，照东交民巷及英美法日各机关报的宣传，苏俄仍未抛弃前俄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何以未抛弃侵略政策的苏俄要花几十万元去运动退回租界庚子赔款及治外法权于中国，而已抛弃侵略政策的英美法日反借着薄物细故及虚伪敲诈的政策要挟建立治外法权于北京，扩张租界与港口，赔偿五十余万的临案

“损失”硬敲七千万的佣金偿付，以及干涉退回汉口租界呢？

（载《政治生活》第1期

署名：和森）

何以救济智识劳动者？

（一九二四年四月二十七日）

四月十八日上海申报时论栏内，有一篇举一君做的文章，题目是《何以救济智识劳动者？》他的起首一段是说：“自来一国之进步必依赖于智识劳动阶级，而迩来智识劳动阶级之失业者触目皆是，良非国家与社会一种好现象！是虽由一国之政治腐败经济混乱有以致之；然而智识阶级之自身，亦对于救济失业之问题不甚厝意。长此以往，智识劳动阶级之次第凋落，其影响于国家进步社会文化者，夫岂浅鲜，有心人不能不为之殷忧也！”他的结论是：“要之智识劳动者今已成为一阶级，上有资本家，下有筋肉劳动者；上下交相煎迫，而智识劳动阶级日处于不安定之地位。观于吾国智识劳动者失业之多，良足令人寒心！然彼冥行盲索者，尚不知其谁为为之，孰令致之，于是怨天尤人，愤懑不平之气充塞于国内；甚至徼幸行险，挺而思乱，而国家社会交受其敝。不宁惟是，即为智识劳动者自身计，若不早为自卫之策，必有一日匍匐于资本家及筋肉劳动者革履之下也！”

我很感激举一君提出这么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现在中国的智识阶级真是哀鸿遍野，触目皆是；除极少数做了猪仔政客洋奴西崽之外，最大多数真是上不著天下不著地流离失所穷困无告的可怜品！（编者注：因原件残缺，故此处缺一句话。）帝国主义攫住

中国一切主权，协定中国的关税，使中国工商业不能自行发展；即一面摧残中国资本阶级，一面摧残中国劳动阶级，同时也摧残了中国智识阶级。中国的现象：不仅工人农人普遍的失业，便是资本家也抵不住外国的压迫与竞争而失业（如上海的纺业资本家）；智识阶级的失业当然是更不待说的。

假设中国的工商业能自由发展，中国的智识阶级何致这样哀鸿遍野穷鬼饿肚皮？假设中国海关邮电盐务以及铁路机关之用人行政能够自主，中国的智识阶级何致这样失业凋落触目皆是？

单就海关一项而说，任用外人的统计，有如下表：

英国	四七七	意国	二一
日本	二八二	那威	一九
美国	五二	瑞典	一五
法国	二九	荷兰	六
俄国	二八	比利时	五
丹麦	二五	西班牙	五
葡萄牙	二五	其他	五一

共为千〇四十人；就中税务司之职位英国占三十名，法国七名，日本二名；副税务司英国十七名，日本四名。日本商人以他们所占位置尚未能与英国平均，现正向日内阁建议，要求中国海关增用日人。

然而岂只海关高级员司的位置尽落外人之手？盐务，邮电，铁路及至内河轮船上之司机领港，何或莫不为外人的独占特权？

外国帝国主义不仅使中国工商业不能发达并剥夺中国智识阶级的职业地位而令其普遍的失业无出路；同时在无形方面又

令中国智识者的智慧异常萎缩（编者注：因原件残缺，故此处缺两行字。）“东方文化”的荒谬，“欢迎太戈尔”的狂热，莫不为外国帝国主义从物质侵略到精神界的反映。

然则何以救济中国智识阶级？惟一的道路只有打倒压迫中国的外国帝国主义，收回海关及一切主权，使中国实业与文化能自由如量的发展。不然，中国智识劳动者，将有求拉洋车给洋人做马骑之日尚不可得呢！

（载《政治生活》第1期

署名：和森）

英美协会欢迎太戈尔

(一九二四年四月二十七日)

唉！不到半年光景，来了两个英皇御赐的爵士光临敝国：一个是来鼓吹“和平会议”；一个是来提倡“东方文化”。

何东爵士鼓吹的和平会议是延请外国公使列席监的和平会议；太戈尔爵士提倡的东方文化是“无抵抗主义”，不反抗外国帝国主义的东方文化。何东爵士是前属敝国版图香港地方的土产；太戈尔爵士是被统治于英国的印度诗人。两个都是亡国奴，也都是被英国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中之一个；而两个都光临敝国替外国帝国主义有所鼓吹！

若说我是诬蔑这两个英皇御赐的爵士的，我也不必再提英字报纸路透电：英国要人怎样替何东爵士捧场；现在只请大家注意注意前日（四月二十五日）英美协会在六国饭店怎样欢迎太戈尔爵士；唉！做欢迎席上主席的不是别人，原来就是双手握住中国经济命脉的总税务司安格联；首先宣读欢迎辞的不是别人，原来就是东交民巷后台老板美国公使舒尔曼。谁知道太戈尔爵士之来于研究系的关系之外，还有帝国主义的关系呢！？

（载《政治生活》第1期

署名：和森）

社会进化史

(一九二四年八月)

绪论 有史以前人类演进之程序

自生物学昌明以来，吾人始知人类不过为哺乳动物之一种，和猿类同出于一个共同的祖先。人类达到现今这样的程度，也如其他各种动物一样，完全由于过去无虑亿兆年载之历史的演进。原始人类自从前二足演进为两手和脑力逐渐发达而能制造工具之后，才与动物时代完全分离，并且优胜于其他一切动物，而建立人类的社会。

自发生学，化石学，和比较解剖学渐渐发达，各种生物演进的程序略已彰明于世。然而有史以前 (Prehistoire) 人类演进之程序怎样？这个问题，直到十九世纪下半叶摩尔根 (Morgan) 的著作出世才有确定的解答。所以十九世纪学术界空前的大杰作：于达尔文的《种源论》 (Darwin-Origin of Species) 和马克思的《资本论》 (Marx-Capital) 之外，还有摩尔根的《太古社会》 (Ancient Society)。

摩尔根真是发明原始人类演进程序的第一人；他身居美洲土人印第安民族 (Indiens) 中，前后考察凡数十年；他从“群”“家

族”以至“国家”的形成，挨次追溯社会的进化。他不知道马克思，也不知道唯物史观的学说（La theorie materialist de l'histoire）；然而他于不知不觉中，竟在美洲从新发明并且系统的应用了这种真理（马克思是在他的前四十年发明的），他所研得的主要结果，大致与马克思是一样的。

摩尔根的著作初发表时，欧洲研究有史以前的原史学家或人类学家，始而惊讶，继而攻击，争论四十年之久，最后才默然而剽窃其次要的发现以为己有；至于《太古社会》中之重要的部分，他们故意含默不宣。至恩格斯著《家族私产与国家之起源》（Engels-L'origine de la famille, de la Propriete Privee et de l'Etat），将摩尔根和马克思两人的意见联合一致，至此摩氏不朽之业才发扬光大于世，而历史学亦因此完全建立真实的科学基础。

现在首述摩尔根所划分之历史的理论时代，以为本书全部之纲领。

摩尔根分人类历史为三大时代：

- （一）野蛮时代（Etat Savage）
- （二）半开化时代（Barbarie）
- （三）文明时代（Civilisation）

而野蛮时代和半开化时代之中，随其生存方法之进步，又各分为：初期（Stade inferieur），中期（Stade Moyen），与高期（Stade Superieur）。

A 野蛮时代

野蛮时代的初期——这是人类的幼稚时期，人们分部生活

于树上,以果子、胡桃、树根为食品。所以热带森林为人类最原始的住居。这个时期重要的产物仅为简单的语言。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历史时代的各民族莫不经过这样的幼稚时期。纵然这个时期经过几千年之久,我们现今已得不到直接的证明了;然而跳出动物时代而成为人类,我们不能不承认必须经过这个摆渡。

野蛮时代的中期——这个时期开始发明用火;人们取鱼类(如虾蟹介壳之类及其他水生动物)以为食。鱼与火是同时发明的,因为鱼非煮熟不能食。由这类新食品与火的发明,人们遂能渐渐离气候与地方独立起来,沿江沿河的去寻生活。于是人类才散布于广大的地面之上。

这个时期重要的产物还有粗糙的石器。制造石器的方法,大约是利用石头去打碎石头,拿那锐利的大石片做刀斧,小的用以打禽鸟或小兽。原始的武器(石斧与石棒)就是这样发明的;并且石头打石头而生火,火也是由此发明的。所谓石器时代,大部分或全部分,即属于这个时期。

由此人们更散布于各大陆,他们既时常占领新地带,而发见的本能也更加敏捷。他们有了烤火石,随时随地可以造新食品,树根与淀粉质的块茎常可煨煮于火灰及地灶之中。随着原始武器的发明,禽兽又为人们食品中不时添加之美味。从这个时期起,人们渐渐知道打猎;所谓渔猎时代,便是这个时期形成的。然猎的产物不一定很多,有时也许一无所获。食品的来源常不确定,因而发生食人的习惯。这样的情形,有为时很暂的,也有为时很久的。如非洲与澳洲的土人,至十九世纪还停滞于这个时期。

野蛮时代的高期——这个时期开始发明弓箭。因此禽兽成为定规的食品,打猎成为通常的劳动;并且脱离前此的江河漂泊

生活而入居于广大森林地带之中。人们既能造弓、箭、弦这样复杂的工具，技术程度已属不低；这种发明，足以显明这个时期人文演进的特征。然而这不是偶然的事，必须积聚长期间的经验始能成功。

这个时期的人们虽然知道制造弓箭，但还不知道制造陶器。石器则更为进步，能制造精致文雅之石器而形成新石器时代。木工亦渐渐发明而能制造独木舟及木器用具，并且渐知用树干树枝建造简陋的房屋，脱离以前巢居穴处的生活；而村落的建设也在这个时期开始。纺织工亦初发明，如用手纺树皮纤维，及用树皮或灯草编织篮篓。

由此：火、石斧、弓箭、木具、手织物、独木舟、木屋、村落等生存方法日益演进，生产权威日渐确定，而人们生活亦渐复杂而丰富。这个时期演进的程序，摩尔根曾举美洲西北部印第安人为例证：这些地方的印第安人已经知道造弓箭，而不知道造陶器。

B 半开化时代

半开化时代的初期——这个时期始发明陶器。依照摩尔根的研究，陶器的发明为由野蛮时代到半开化时代的摆渡。陶器发明之初步，不过就木制器皿或树皮织物之外部涂以粘土，使其能煮食品耐火而不燃化；然后才渐知不需此等内部里物而纯用粘土烧铸成器。

陶器不过为使用工具的进步；而这个时期生产上的重大进步则为家畜的发明。家畜的发明，实为这个时期主要的特征。因为家畜的饲养，而某几种植物的种植也随着开始。畜乳与畜肉

为主要的生产品；而皮、毛、角又可制为各种用具。

半开化时代的中期——这个时期东半球已经具有各种适宜的家畜及饲养家畜的各种植物与谷类——只缺少玉蜀黍一种；西半球的家畜除骆驼外，其余各种哺乳动物都还未得驯养，谷类在起初的时候，亦只珍珠米之一种——不过这是一种最好的。农业初步的园圃亦已发明，并且知道用人工灌溉法以种园蔬。建筑术也随时进步，人们已知利用泥土与太阳以作干砖或应用石头以建筑房屋。

家畜繁殖成为大群之后，最先进的民族遂远离其祖先居住的森林地带，向水草平原散布而入于游牧生活。所谓游牧时代，便是由此形成的。

因为人们与牲畜需要的食品渐渐增加，播种麦子的要求也逐渐扩大。此时牲畜既丰富，五谷的种植又因牲畜与人口的需要而扩大，由此食人的习惯遂致消灭。

铜器的发明，大约也在这个时期。不过因为铜的硬度很低，所以石器还有作用，石器时代还没有完全终止。

半开化时代的高期——这个时期始发明铸铁与简单的文字。铸铁与文字为人类进于文明的渡桥。借着铁器的发明，耕种地面才有扩大之可能，人类生产才向农业时代演进；山林荒野，日被开垦而成为耕地与牧场；实际生存方法无限增加，活动能力亦异常激进，人类生活至此遂别开生面。

酿酒与制油之业至此亦已大备。因为铁器的发明，建筑、造船，及多轮车各种技术亦跟着精进；五金工作更成为熟练的技艺，武器方面的进步与完成自然更不待说。

吾人单就武器一端，亦足表明各大历史时代之特征：即弓箭

为野蛮时代的武器；铁剑为半开化时代的武器；枪炮为文明时代的武器。

由此城市繁兴，而其周围环以铤眼之城墙；文明降临，而有神话或歌谣之记述。先进的民族遂向极繁盛的新时代进发。这个程序在东半球特别显著：埃及、巴比伦、希伯来、腓宜基、波斯、希腊、罗马，以及日尔曼和诺尔曼各民族遂接续跃登了文明舞台。

以上所述人类发展的大概，经过野蛮时代和半开化时代以至文明时代的发端，每个时代的变化，有每个时代的新特征，而这些新特征即直接为生产方法的变迁所引起。今再就摩尔根的分类，简括以明之：

野蛮时代——这是人们只知攫取自然的生产（自果食树根以至禽兽），而人为的生产（如弓箭等）不过为辅助这种攫取之用的时代。

半开化时代——这是人们从事于畜牧耕种，对于自然生产（牲畜与土地等）加以劳动而获得积极的创造方法的时代。

文明时代——这是人们借着工业与技术，把自然的生产（如各种原料）制造为人为的生产的时代。

注一 以上所述每一时代或每一等级的进化，具有普遍世界一切民族之通性；只在时间上有演进迟早之距离，决不因各民族所在地之不同而发生根本异趣之特殊途径。即如半开化时代，东大陆与西大陆因自然条件之不同，以致两地所具家畜植物显然歧异；这种生产上的歧异，在一定时期内虽足影响于该地民族的生活及其演进的程度，然决不能根本破坏人类进化的普遍步趋。

注二 欧人征服美洲时，东部印第安人刚入半开化时代。他们耕作一定地亩的园圃，所种的是玉蜀黍、南瓜、甜瓜、及其他园蔬；他们重要的食品即取给于此。他们住的是木屋，一些木屋形成一个村落，村落的周围环以篱笆。西北部印第安人则还在野蛮时代的高期，他们既不知道制陶器，又不知道耕种任何植物。反之，墨西哥、新墨西哥、秘鲁和亚美利加中部的印第安人，在被征服时已达到半开化的中期。他们住的是砖与石砌成的屋子；他们的村落中筑有堡垒。他们耕种玉蜀黍及其他各种随地带而不同的植物；他们用人工灌溉的园圃，就是食品的主要来源。他们已驯养了几种家畜：墨西哥土人所驯养的是白露鸡及其他鸟类；秘鲁土人所驯养的是骆驼。他们已知开采各金属，但还不知道铸铁；所以他们的武器还不能不用石器。他们正在演进中；然而横被西班牙征服，以后自动的发展便打断了。

注三 上古史主要的民族有三：一为哈密的族(Hamitie)、一为闪密的族(Semmitie)、一为亚利安族(Aryon)。自埃及(属哈密的族)、巴比伦、腓尼基、希伯来(属闪密的族)、以至希腊、罗马、日尔曼(属亚利安族)之文明，皆为三族所演成。而使它们能成为历史的主要民族之枢纽，则在半开化时代家畜之发明。家畜与众多畜群形成之后，遂使闪密的族与亚利安族从其余各未开化的种族中分离出去，远徙于欧亚各地，于是幼发拉底河(Euphrate)与底格里河(Tigre)流域成为闪密的游牧民族的牧场；印度阿克苏(Oxus)、雅克萨底(Iaxarte)、顿河(Don)以及腾尼河(Dnieper)流域成为亚利安游牧民族的牧场。前此他们的老祖宗——野蛮时代与半开化初期的人们——所不居住并且不能居住的水草平原，至此成为人类的新摇篮。反之，要这些新后裔脱离平原绿野而复反于老祖宗所居的森林地方，那是决不可能的事了。闪密的族与亚利安族因为兽肉兽乳之丰富，故其儿童之发育异常优良，从此两民族遂成为天之骄子而发达到最高的文明。此处我们可取美洲新墨西哥的印第安人来比较；此处的印第安人几乎专限于蔬食，不容易

获得兽肉与鱼类，故其头脑比较半开化初期的人还更小。

第一篇 家族之起源与进化

第一章 原始家族史之概要

人类进化的主要动因有二：一是生产，一是生殖。前者为一切生活手段的生产，如衣食住等目的物及一切必要的工具皆是；后者为人类自身的生产，简言之即为传种。人们生活于一定时期与一定地域的各种社会组织，莫不为这两种生产所规定所限制。这两种生产在历史上的演进：一面为劳动发达的程序；别面为家族发达的程序。

原始家族史，在社会进化史中，居一个重要地位。然而这门科学在一八六〇年前，还未萌芽；历史家关于这个领域，尚全在摩西(Moise)五部古书的影响之下。书中详细描写的为宗法式的家族形态，除掉一夫多妻制以外，几乎与近世的家族同条共贯。这样一来，仿佛一般的家族没有什么历史的演进可说了。然而人们不能不承认在近世的一夫一妻制之外，东方还有一夫多妻制存在，西藏还有一妻多夫制存在；这三种家族形式，照一般的历史家看来，在历史的排列秩序中似乎是不相联属的。

原始家族的历史，至一八六一年，才有巴学风(Bachofon)的母权(Droit-maternel)出世。书中重要之点有四：

(一)原始的人类，两性生活为乱交。

(二)这类性交，不容父性之确立，子女只知有母而不知有

父,因而发生母系制,换过说,即母权制。上古一切民族,莫不由此起源。

(三)这样的结果,妇女与母性成为后嗣惟一确认之尊亲,其享受尊敬之程度,照巴学风的想象,遂达到母性统治权。

(四)后来转变到一夫一妻制,妇女才专属于一个男人。然这种转变违犯原始的宗教律(即实际上违犯别的男子在这个妇人身上的传种权利);妇女只有用暂时或定期卖淫的方法,才得赎此破坏旧习惯之罪,而获单一结婚的权利。

巴学风在家族历史上,要算是第一个开荒的功人。他的书中,有许多论证虽未免落于空想的神秘的窠臼。然而有两点功绩是决不可磨灭的:第一,他极力从古籍中搜集许多证据,证明原始的两性关系完全为乱交,不仅一个男子可与几个女子发生性的关系,一个女子也可与几个男子发生性的关系,并且全无遮盖的习惯。第二,就是他所证明的母权和女系地位在原始社会之重要,简直为世人梦想不到的惊奇。他这些发见,在历史科学中,等于做了一个大革命。

继巴学风而起的为麦克林兰(Mac-Lennan)。麦克林兰以冷酷的法律家的面貌,代替巴学风诗人的天性。麦克林兰从上古与近代的许多野蛮民族半开化民族及开化民族中,发见一种掠夺婚姻(Mariage par rapt)的形式,即一个种族的男子,全靠用腕力掠夺别个种族的女子。这种掠夺婚姻怎样发生的呢?照麦克林兰的意见,一是因为族内女子不够;一是因为族内禁止结婚;然亦有按照习惯,务必使男子与自己族内女子结婚之种族。麦克林兰叫前者为族外婚姻(Exogames),后者为族内婚姻(Endogames);因而建立族外婚和族内婚的种族之对偶法则。族

外婚的种族只能娶别种族的女子为妻，由此种族与种族之间发生永远战争的状态。然而这种状态适合于野蛮时代；掠夺婚姻也就从此开始。

族外婚姻的习惯从哪里来的呢？麦克林兰也以为血统与乱伦婚姻的观念，在当时是绝对没有的；这些观念不过在很迟才发生。惟当时杀女的习惯（女生后即杀之）很普遍于各野蛮民族，由此各孤立的种族遂致男子过剩。男子过剩的结果：第一，发生一妻多夫制，几个男子共一妻；第二，发生母系而排斥父系，子女只知认母而不知认父；第三，妇女之缺乏并不因一妻多夫制而解决，遂只有野蛮的或组织的掠夺外族的妇女，于是遂成族外婚姻之习惯。所以麦克林兰在他的《原始婚姻》(Primitive Marriage)里面说：“族外婚姻与一妻多夫，是由两性人口不均之惟一原因而产生的，我们应视一切族外婚的种族即为原始一妻多夫的种族”。

麦克林兰第一个功绩在指明他所称的族外婚姻之普遍的通行及其意义；第二个功绩在承认原始的嗣续制度从母系而不从父系。这一点，巴学风前已发明了，不过再经麦克林兰重新肯定。

麦克林兰只承认婚姻有三种形式：一夫多妻 (Polygamie)，一妻多夫 (Polyandrie) 与一夫一妻 (Monogamie)。但是在未开化各民族中，还有一团男子和一团女子共同结婚的某几种形式之存在，并且发见的证据一天一天繁多。一八七〇年，刘博克 (Lubbock) 在他的《文明之起源》(The origin of civilisation) 中开始承认群体婚姻 (Mariage par groupe) 为历史的事实。

一八七一年，摩尔根带了许多新材料和决定的见解跃登舞

台。摩尔根以他在美洲各种红色印第安人中之考察，建立一种特异的“伊洛葛 (Iroquois) 的亲族体系”。伊洛葛为美洲一切土人——即一切印第安人之通称，而这种亲族体系即通行于全大陆的印第安人。一八七一，摩尔根发表《血统与亲族之体系》(Systeme of Consanguinity and Affinity)后，在原始人类历史中辟了一个新天地；因为群体婚姻之确认，而麦克林兰内婚外婚对偶学说的根基遂不免为之动摇。

麦克林兰要辩护他的学说，遂指群体婚姻为人为的捏造。其实，外婚与内婚的对偶设定，本身便发生矛盾而不能说明。比如有两个独立自主的种族：一个绝对禁止和外族通婚，一个务必娶外族妇女为妻，两者显然互相排斥，如何能成对偶呢？

照摩尔根的研究，外婚与内婚并无何等对立的形成；所谓族外婚的“种族 (Tribu)”，实不存在。族外婚的真意义，为在群体婚姻还盛行的时代，一个种族随着母系分成为几个氏族 (Gens)，氏族之内严格禁止通婚，这个氏族的男子只能与别个氏族的女子结婚。然而一个种族包括几个氏族，即一个氏族的男子可与同种族的女子结婚。故在氏族为严格的族外结婚，而在种族则为严格的族内结婚。由这种证明，便把麦克林兰对偶的学说打得粉碎了。

但摩尔根并不以此自满，他更以美洲印第安人的氏族为自己开拓的领域而建立第二种决定的进步。他发明原始氏族的形式是按照母权组织的，这样原始的母权氏族为后来父权氏族——如上古希腊罗马各开化民族的氏族——之所从出。希腊罗马的氏族，直到十九世纪下半叶，还为一切历史家莫可猜测之谜子，至此才为摩尔根所发见的“伊洛葛的氏族”所说明；原始历

史，至此斗然获得新基础而辟一新纪元。

原始母权氏族，为后来各开化民族父权氏族之前站的新发明，在原史学中异常重要。换过说，即原始历史的全体，以母权氏族为枢轴。自母权氏族发明，原史学家才知怎样研究怎样汇类。所以自《太古社会》出版后，原史学遂特别长足的进步。

注一 母权之名，摩尔根和恩格斯著书皆沿用之；然而这个名词，恩格斯指明是不正确的，因为原始社会还没有发生权利问题，并且没有法律的字义。

注二 氏族：拉丁文为 Gens，与 Clan 同义；摩尔根与恩格斯用以指明由种族滋乳之血族团体；在希腊叫做 Genas，罗马叫做 Gentes，亚利安叫做 Gan。Gens 这个字，在原始历史上异常重要，国家未产生以前，Gens 为人类社会组织之主要模型。这样的社会，原史学家又叫做图腾 (Totem) 社会，实际就是氏族社会。

第二章 家族发生之理由

家族和两性的组织，为一切民族发展之基础，然而此处有一种不同的意见存在。西宾兰斯(Espinas)在一八七七年出版之《动物社会》(Des societes animales)里面说道：“据我们在各种动物中所观察，群(Penplade)——是最高社会团体。群——好似是由各家族组成的，但在源头上说，家族与群是相敌对的，他们彼此为一种反比例的发展”。照西宾兰斯的意见，群与家族，在各种高等动物中，不是互相完成的，但是互相抵抗的。西宾兰斯极力论证当春情发动时期，由雄性间的竞争，怎样将群的社会关系暂

时弛缓或取消。所以他又说：“自有紧密团结的家族，我们便看不见群之形成，除掉很稀少的例外。反之，乱交或一夫多妻制盛行，群便自然的成立。只有使家族关系弛缓至于几微，群体才得发生，个体才得恢复自由。所以有组织的群在鸟类中是很少的；反之，我们在哺乳动物中发见微有组织的社会，正是因为其个体不全为家族所吸收。所以群的集合意识常为其最大敌人——家族的集合意识所阻而不能发生。故吾人敢断言：建立在家族高层的社会，开始不过是将一些受了根本变化的家族编织而成，除开更迟一回在他的内部荫庇一些无限的顺利条件才能容许他重新构造”。

要在动物社会中分别其谁为家族的集合或谁为群体的集合，本为极不容易之事；但西宾兰斯之所说，于动物社会至少有一部分是真理。动物社会在交尾时期，因为雄性的嫉妒，确有群体涣散或不能发展的事实。然而这样的事实，只足证明动物家族与人类的原始社会是两桩不可比拟的事。因为原始人类，在他们初超出动物的时代，还没有家族的意识；人类在此初形成的时代，不过是一些没有武器（如锐利之爪牙）而异常软弱的动物，他们的数目是很少的，个体是很孤立的；当着他们寻求一异性做配偶的时候，已经是他们社交心发达的最初形式。人们要使自己超出动物界而实践自然所提供的最大进步，便需要一种新要素来填补其孤立而无防御能力的缺憾，这样的新要素就是联合的势力和共同的行动之所从出的——群。而两性与家族的结合，实为群之起点。但是男性间相互的宽恕与嫉妒心之轻减，在动物时代进化到人类时代的过渡中，确为形成坚固而广大的人群之先决条件，没有这种先决条件是决不能完成这样的进化的。

然则男性间的嫉妒，怎样得轻减呢？这个问题显然与家族的形式发生关系，以下各章当详述之。

生存竞争，一切生物都不能逃过这种原则。然上面已经说过，由动物时代初入人类时代的人们，不过是一些软弱无力的动物，他们既没有天赋的强有力的爪牙，又没有后来逐渐发明的各种工具；周围四境晦蒙否塞的自然界，无处不给他们以困难，环居邻处的毒蛇猛兽，无时不与他们以恐怖。然则他们怎样生存、怎样竞争呢？惟一的方法，只有团结成群之一途。这种群的成立，最初自然是由于两性的结合；然亦可说最初还没有后起的家族之意识。群的本身——也可说家族的本身，就是一种生存的元素或经济的元素。具有这种元素之后，人们才能以群体去采取食品，和以群体与其他动物或其他群行其竞争；至于人们的个体，此时既不能单独竞争，也不能单独采取食品。

人类进步的大时代，是直接和食品来源的扩充相适应的。而家族的团结，便是直接适应这种需要。由自然的逼迫，范围人们于这种经济生活的集团后，低弱程度的共同劳动与共产生活遂横贯有史以前的时代之全部；而其演进所呈之定律，则为：生产程度愈益低弱，则社会秩序愈益凝固于血族关系之下。

第三章 家族形式与亲族制度

由摩尔根发见的原始人类的家族形式为群体婚姻，即一群男子和一群女子互为所有，而使嫉妒心理不甚发生，因而人群之团结得以巩固。其后，群体婚姻发达到一定程度，又发生一种后起的例外形式——就是一妻多夫，这也是排除嫉妒的方法之一

个。然而这种方法在其他各种动物是不知道的。比如各种哺乳动物的性的生活已经具有：乱交、群交、一雄多雌、一雄一雌之四种形式；而独缺少一妻多夫，好似一妻多夫只有人类才有。

但是在群体婚姻之上是否还有更古的性交生活呢？吾人试研究群体婚姻的各种形式，其演进的程度已属不低，而其伴随同来之各种条件实甚复杂。由此可知群体婚姻之前，必定还有更原始更简单的性交生活存在，——这就是乱交时代。乱交的作用恰好适合于由动物时代到人类时代的过渡。

追溯过去家族历史的构成，自巴学风以下，大部分原史家都承认原始时代——尤其是野蛮时代的初期，各种族内部莫不盛行无限制的性交：即每个男子属于每个女子，每个女子属于每个男子。一切男子尽是多妻之夫，一切女子尽是多夫之妻，这就是真实而普遍的乱交。不仅平辈男女实行普遍的性交，即親子间亦实行普遍的性交。这样无限制的性交，在后人看来乃是一种很奇怪而不道德的乱伦婚姻。然而在原始时代是不奇怪的。两性人口的发展若不平均，没有这样的乱交是不可能的。

然而一般囿于现代道德观念的学究先生和原史学家，盛唱一种否认原始时代无限制性交的高调，他们不认此为人为的捏造，便认此为玷辱人类的尊严，他们以为只有劣等动物才有这样乱交的事实。其实现代的性的观念以一夫一妻为道德之极致；然而单是这一点并不足以证明人类高过其他动物。比如动物学家在鸟类中所发见的一夫一妻之忠实，实非现代名实不符的文明人所能比拟；又如槟榔叶上面的条虫，每一条具有五十至二百个体节，每个体节具有一副雌雄两性的完全机关，每个体节各自营其一夫一妻的性的生活，这样岂不更值得现代道德学家的赞

叹？

人类发展的各历程，各有其自己的生产条件；因而每个时代亦各有其特殊的道德律。适合于一定时期的风俗为道德；质言之，道德乃是对准一个确定时期的社会需要。所以无限制的性交在后代人视为不道德，而在原始时代的人则适成其为道德。不仅原始时代兄弟姊妹是天然的夫妇，即至今日亲子间的性交尚盛行于许多野蛮民族中。据斯脱纳博（Strabo）的报告，阿拉伯土人常与其母亲及姊妹过性的生活；潘克洛（Bancroft）亦证明北美洲中部加爹克人（Kadiaks），天尼斯人（Tinehs）也是过这样性的生活。即厌恶无限制性交的黎笃诺（Letourneau）也在智璧威斯（Chippewys）的印第安人中，智利的古古人（Coucous）中，低印度的加朗人（Karens）中，汇集一些同类的事实。

摩尔根大部分的生活是在伊洛葛里经过的，他并加入其中之一族，这一族叫西尼加斯（Senekas）。他在伊洛葛中发现一种亲族制度，这种亲族制度与他所目见的伊洛葛人之实际的家族关系相矛盾。摩尔根在伊洛葛时，伊洛葛人正盛行一种彼此容易分离的一夫一妻制，摩尔根叫这种婚制为“对偶家族”。只有这样夫妇生出的子女，社会公认为合法。但是父、母、儿、女、兄弟、姊妹等名称之使用，显然与一夫一妻的家族相矛盾，伊洛葛的男人不仅呼自己的孩子为儿女，而且呼兄弟的孩子为儿女，兄弟的孩子都呼他为父；至于姊妹的孩子则呼他为舅，他呼姊妹的孩子为甥儿甥女。反之，伊洛葛的女人不仅呼他自己的孩子为儿女，而且呼姊妹的孩子为儿女，姊妹的孩子都呼她为母；至于她的兄弟的孩子则呼她为姑母，她呼兄弟的孩子为侄儿侄女。因而兄弟们的孩子和姊妹们的孩子显然分成为两个阶级：一面兄

弟的孩子互相呼为兄弟姊妹；别面姊妹们的孩子互相呼为兄弟姊妹；而兄弟们的孩子与姊妹们的孩子之间则互相呼为表兄弟表姊妹。这不单纯是名称问题，这些名称里面包含血族亲疏与同等不同等的实际意义。伊洛葛人用这些名称建立一种充分完备的亲族制度之基础，由此每一个人可表现几百种不同的亲族关系。这样的亲族制度不独遍行于美洲各种印第安人之中，而且遍行于印度各种土人之中。南印度达米尔 (Tamiles) 族与伊洛葛、西尼加斯族，亲族间各种不同的称呼多至两百多种。在印度各民族也如在美洲印第安各民族一样，他们的亲族关系也显然与现行的家族形式相矛盾。

然则怎样说明这种矛盾呢？血族在一切野蛮民族和半开化民族的社会秩序中占主要的地位，要想费辞否认这些散布极广的亲族制度之重要，乃是不可能的。这样的亲族制度，据巴学风在原始各民族中的研究，摩尔根在美洲的研究，以及居诺甫 (Cunove) 在澳洲黑人中的研究，不仅普遍实行于一时一地，而且普遍实行于美洲亚洲非洲澳洲及全地球各民族（其形式当然不无多少变更），全地球各民族的发展莫不以家族和两性的组织为基础。父、母、儿、女、兄、弟、姊、妹……不单是一些名称，并包含一些严格实践的相互间之确定的义务。这些名称就是各民族社会组织的总体中之一部分极主要的形式。这样亲族制度与伊洛葛及其他民族现行的家族形式有不相符合之处，至摩尔根才找得解释之理由。

据摩尔根的研究，海洋洲夏威夷群岛的土人，在十九世纪上半纪，他们的家族形式恰好与伊洛葛的亲族制度相符合，父母兄弟姊妹儿女伯舅姑姊甥侄……的实际都与伊洛葛的亲族制度为

一致。但是很奇怪的，在夏威夷存在的亲族制度又不与夏威夷现行的家族形式相符合。换过说，按照夏威夷的亲族制度，兄弟和姊妹的儿童一律互呼为姊妹兄弟而视为共同的儿女，不仅他们的母亲与其姊妹辈或父亲与其兄弟辈的儿童没有区别，就是全族的兄弟姊妹的儿童也没有区别。由此看来，可知伊洛葛存留的亲族制度原来建立在一种比对偶家族更古的家族形式之上，这样的家族形式在美洲已不存在了，而在夏威夷却还存在。别方面，夏威夷存留的亲族制度比伊洛葛存留的亲族制度还更古，他原来所根据之更原始的家族形式不仅在夏威夷不存在了，即在全世界也不存在。然而这样更原始的家族形式，在从前必然是存在的，因为没有这样更原始的家族形式存在决不能发生与之适应的亲族制度——即现在不适合夏威夷家族关系之实际的亲族制度。于是摩尔根对于家族与亲族制度下了一个定义：

“家族(Famille)是能动的(积极的)要素，他决不是停滞不进的，社会由低的程度向高的程度发达，他也随着由低的形式到高的形式。反之，各种亲族制度(Les systemes de parente)是受动的(消极的)，他们不过是在一长距离的时间登录一些由家族在多年的进程中所造出的进步。只有当着家族起了根本变化的时候，他们才起根本的变化。”

摩尔根这个定义是很显明的。马克思又加着说道：“亲族制度同各种政治、法律、宗教及哲学的体系是一样的。”家族营永续的生活，亲族制度即于其中脱胎而由习惯的势力以维持其存续，然家族总是超过亲族制度的范围而发展的。据摩尔根的研究，人类从无限制性交的原始时代出来之后，次第演进到下列四种家族形式：

- A. 血统家族(La famille consanguine)
- B. 伙伴家族(La famille punaluenne)
- C. 对偶家族(La famille syndiasmique)
- D. 一夫一妻家族(La famille monogamique)

第四章 血统家族

无限制性交发展到恰当的时候，形成一种比较高等的性交形式，摩尔根叫做血统家族。血统家族之中，实行按照代辈而分配的群体配合：一切祖父与祖母辈，在家族界线以内，他们之间成为夫妻，这是第一个共同配合的阶级；祖父祖母的儿女，换过说即一切父母辈，为第二个共同配合的阶级；父母的儿女辈——即第一阶级之孙辈，为共同配合之第三阶级；第一阶级之曾孙辈为共同配合之第四阶级。在这样的家族形式里面，与无限制的初期性交完全相反，大辈与小辈的性交是被排除的。换过说，父母与儿女，祖辈与孙辈之间不得有结婚的权利与义务；性交的范围限于兄弟姊妹，表兄弟表姊妹，或其他疏远的兄弟姊妹辈之间。他们一面互为兄弟姊妹，一面又互为共同的夫妇。年龄平等，为这个性交时代的主要理由。

血统家族虽早已绝迹，然而我们不能不承认他从前确曾存在。例如夏威夷名存实亡的亲族制度，从前即建立在这样的血统家族之上。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样的血统家族一面为乱婚的进步，一面又为后来家族发展之必要的预备阶级。

第五章 伙伴家族

每个原始的家族——即血统家族——发达到几代之后，分裂为几个原始的共产家庭。这样的家庭一直统御到半开化时代的中期以前，他所散布的幅员很广大，并且限定于每个一定的地域。

血统家族何以凋谢呢？因为人们发生血统性交不适宜的经验与观念，于是旧家族之间起了一种有力的分裂作用，而形成一些新的共产家庭；而一个或几个姊妹成为一个新家庭的中心。用这类方法，由血统家族产出的新家族形式，摩尔根叫做伙伴家族。

按照夏威夷的习惯，一定数目的同母姊妹或疏远姊妹为她们的共同丈夫之共同的妇人，但是她们的兄弟不得为她们的丈夫。做了他们丈夫的男子们虽属兄弟，再也不得互呼为兄弟，只得互呼为碧兰侣(Punalua)。同样，在她们自己之间虽属姊妹，再也不得互呼为姊妹，也只得互呼为碧兰侣。碧兰侣的意义犹云伙伴(Canpagnan 或 asocie)。这样的家族形式虽有些连续的变化，但其主要的特性总是：在确定的家庭范围以内，男女互相共有，起初排除妇女之同母兄弟，复次又排除她的一切疏远兄弟。所以伙伴家族的进步，不仅排斥亲子间的性交，而且排斥一切兄弟姊妹间的性交。这样的进步，比较年龄平等的理由更为重要，而且更为困难。所以这样的家族不是骤然完成的，乃是经过长期的天演，渐渐完成的：开始不过在某几种特殊情境中，按照母系，排斥同母异父的兄弟姊妹间的性交，其次渐渐成为规律，最

后乃禁及旁系兄弟姊妹间的结婚。

在伙伴家族中，建立下列的亲族关系：母亲姊妹的儿女即为母亲的儿女，因为母亲姊妹的丈夫常为母亲的丈夫；父亲兄弟的儿女即父亲的儿女，因为父亲兄弟的妻子常为父亲的妻子；但母亲兄弟的儿女则为母亲的侄儿侄女，父亲姊妹的儿女则为父亲的甥儿甥女，而均为我之表兄弟表姊妹。兄弟姊妹间的性交为社会所不许，故将兄弟的儿女与姊妹的儿女划为两个阶级；从此兄弟的儿女与姊妹的儿女不得互为兄弟姊妹，不能有共同的两亲，他们只能互为表兄弟表姊妹。侄儿侄女表兄弟表姊妹等名称，在从前血统家族里面虽也使用，但是至此才合实际，才有意义，而成为必要。这样的家族形式，十九世纪还存留于夏威夷；这样的亲族关系，十九世纪还存留于伊洛葛。

伙伴家族所以成立的主要原因，大约是因为血统婚姻生殖不繁，不足以应付生产上（畜牧及其他）人力的需要。所以摩尔根说，这是自然淘汰的原则具有何等作用之显明的图解。伙伴家族发展的结果，乃超出于他的目的以外而产出以后一切民族之社会基础的“氏族”组织。氏族发展的主要原因，大概由于婚制改良，人口增加，有分成众多小群以便谋生的需要。

在最大部分的情境，氏族的组织是直接由伙伴家族产出的；而氏族的基础总是建立在母权之上。无论在任何群体婚姻的家族形式中，儿女总不能确认其父而只能确认其母。所以共同家族的全体儿女，各个母亲皆呼之为儿女，对于他们有同样的母的义务，而没有自己的儿女与别人的儿女的区别。然则这是很显明的，群体婚姻既到处存在，后嗣只能确系于母，由此母权遂成为惟一公认的事实。母系不仅盛行于野蛮时代各民族中，而且

一直统御到半开化时代的高期。

现在可于伙伴家族中举一个具体的形态来说明：在这样的家族中，有一列同母的姊妹们或疏远的姊妹们，同着她们的儿女以及她们母方的亲兄弟，这一个范围的个体，不久即属“氏族”的组成分子；他们全体有一个共同的主母，大约以姊妹们中之年长者为之。这个主母，在姊妹们的几代之后即为女性后嗣的始祖。但是姊妹们的丈夫决不是她们自己的兄弟，所以她们的兄弟决不能在这个家族中传后。并且她们兄弟的儿女不属于这个在后成为“氏族”的血统团体；只有姊妹们的儿女属于这个血族团体，因为惟有母系的后嗣是明确的。一切兄弟姊妹（包括旁系兄弟姊妹）间的性交，在这样的血族团体中严格禁止。这样的血族团体不久即变成为“氏族”，就是由一群相互间不得通婚的母系血族份子组成的。这样的团体渐渐由社会的宗教的各种共同制度而益巩固，遂与同一种族内其他“氏族”各自区别；每个氏族取一禽兽之名以为图腾（即标识之意），而规定蛇氏族只能与犬氏族通婚，或熊氏族只能与狼氏族通婚。由此群体婚姻成为非血统的氏族间的婚姻。这样婚姻的结果，产生极合天演的种族，体力精神皆比血族婚姻的产儿为优。

当摩尔根著书的时候，世人关于群体婚姻的知识极其有限，其时优秀的原史学家只知道些澳洲土人群体婚姻的事实，至一八七一年摩尔根才将他所具有的关于夏威夷伙伴家族的各种报告发表出来。一方面正在伊洛葛盛行的亲族制度完全足以说明伙伴家族，摩尔根即以此为他一切研究之起点；别方面，摩尔根又认定伙伴家族为母权氏族之起源；最后，摩尔根又以澳洲的阶级婚配显明伙伴家族为较高的发展阶段。

英国传教师费森 (Lorimer Fison) 在澳洲研究土人的家族形式多年，关于群体婚姻的报告是很丰富的。他在南澳洲的冈比谷 (Gambier) 山中发见澳洲黑人极低程度的婚姻配合。一个种族分成为两大阶级，一个叫克洛基 (Krokis)，一个叫居米德 (Kumites)。每个阶级的内部严禁通婚；克洛基一切男子为居米德一切女子的丈夫，居米德一切女子为克洛基一切男子的妇人。这不是个体的婚配，但是两个阶级的群体婚配。除掉两个外婚阶级的区分以外，其中绝无年龄差异或特别血统的限制。一个克洛基的男子可以与一切居米德女子结婚；但是他与居米德妇人所生的女，在习惯上为克洛基一切男子的妻，也可说就是她的父亲的妻。然则按照这样的组织，对于本能的冲动虽业已加以限制而不许其在自己的族内传种，但是对于亲子间的性交则还未发见特别的嫌忌。所以这样的阶级婚配或者是由无限制的性交状态直接产生的；或者当两阶级分化时，亲子间的性交即已由风俗禁止，而现在的状态已回溯到血统家族而又做成超出血统家族之第一步，亦未可知。后者的推测大约较为近真，因为在澳洲土人中既未发见亲子间群体配合的例证，而于后起的外婚形式之外又发见建筑在母权之上的氏族。克洛基和居米德二族皆为母权所统御；并且已有母权氏族而尚无伙伴家族。此乃家族历史中极耐寻究之一问题；照摩尔根的推究，则以此种阶级婚配为发展程度低于伙伴家族之组织。

两阶级制不仅发见于南澳冈比谷，而且发见于大林河 (Darling) 以东及坎斯兰 (Guensland) 的东北各地，可见这种制度是散布很广的。在这些地方，母方兄弟与姊妹之间，兄弟的儿女之间，及姊妹的儿女之间禁止结婚，因为这都是属于同一阶级；反

之，兄弟的儿女与姊妹的儿女之间可以结婚，因为他们不是属于同一阶级。

在大林河沿岸及新加尔 (Novelle-Galles) 南部的加米拉洛 (Kamilaroi) 人中，又起了一种新进步，限制血族通婚；于是原来的两阶级分裂为四阶级。四阶级中的各个阶级只能与别个限定的阶级群体通婚。第一阶级和第二阶级的男女，彼此为生成的夫妇。但是母亲属于第一阶级或第二阶级，则其儿女属于第三阶级的或第四阶级；第三阶级和第四阶级的儿女（他们之间又同样的结婚）又从新属于第一阶级和第二阶级。由此，第一第二阶级的后代和第三第四阶级的后代常常展转相属；因而母方兄弟与姊妹的儿女不能成为夫妇，要轮到兄弟与姊妹的孙儿女才得成为夫妇。这样特别复杂的制度，（这确是后起的现象，若系从无限制性交产生的，决不会这样复杂。）因为要与母权氏族接合，所以又增加一层错综。

澳洲的阶级婚姻，为群体婚姻中之很低级很原始的形态；然而伙伴家族之发展程度则比较高得多。澳洲的阶级婚姻似乎为适合于飘流无定的野蛮时代社会情况之家族形式；而伙伴家族则已建立在相当确定的共产村落之上。在这两种形式之间，也许还可发见些居间的阶段；但在十九世纪末年不过初辟一块这样研究的领域，并且现在还没有得到什么进步。

第六章 对偶家族

在伙伴家族之下，氏族愈发达，“兄弟”和“姊妹”阶级愈多，而两者的通婚愈不可能，由此渐渐发生对偶婚姻。因为氏族内

部严禁血族通婚，而每个氏族的亲族关系又异常复杂广大，如伊洛葛及其他尚在半开化初期的印第安民族——他们的亲族关系有几百种之多，即被禁通婚的亲族有几百种之多。因为被禁通婚的范围如此复杂广大，所以群体婚姻遂渐渐成为不可能，而被对偶家族夺其地位。由此家族历史中遂辟一个体婚姻的新纪元。

原始家族历史的发展，范围是很狭隘的，原来包括全种族于家族范围内，全种族的两性间为共同的婚配；渐进始排除近亲间的性交；复次排除的范围及于远亲；最后则使群体婚姻归于不可能，而仅留一暂时的对偶关系。这样的关系是很脆弱的，彼此是容易分离的；分离之后，子女仍属于母，彼此可以从新结婚。

在以前的家族形式中，男性不忧女性之缺乏，女性间或多过于男性；到了初入对偶家族时代则不然，女性很为稀少而难寻。所以对偶婚姻实随女性的掠夺与买卖而开始。女性的掠夺与买卖乃是群体婚姻根本变化到个体婚姻的普遍表征。掠夺婚与买卖婚的遗迹，在现在一些开化民族的婚制中还可以发见。金银结婚为纯粹购买婚的遗传，而男家送给女家之婚礼更为购买婚之显著的遗迹。至掠夺婚在文明各国之遗迹则有所谓结婚旅行，故德人呼结婚旅行为掳掠，因为这是女子被男子掳去而离其父母之乡的显明表征。至于中国抢亲的习惯，现在还是存在。

照美洲印第安人的习惯，订婚不是男女两造的事情，总是委之于其母；在订婚期间，男女两造完全不知道，等到婚期接近的时候，母亲才使子女知悉；婚期将临，男方必送女方亲属以重礼，以为引渡新娘之价格。这样的婚姻，两造可以随意分离；然而多数印第安种族，例如伊洛葛，已渐渐公然严格的反对掠夺婚姻。

当夫妇发生争议时，两造氏族的亲属出为仲裁，如果两造解约离婚，则儿女仍属于母，彼此可以自由从新结婚。

对偶家族的本身既很脆弱，又不坚固，所以对于单独的家庭生活仅止稍微尝试其需要与意愿，然而绝不能取消以前的共产家族。因为共产家族不仅是一个婚制的变化可以取消的，要财产上起有根本的大变化才能取消。共产家族的意义，就是妇女在家庭中占主要地位（因为子女只能确认其母而不能确认其父），母性具有最高的崇敬。这样的观念，在十八世纪的哲学家还视为荒谬。他们以为妇女在原始社会即为男子的奴隶。其实，妇女在野蛮时代和半开化时代的初期、中期，以及高期之一部分中，不仅站在极自由的地位，而且站在极重要的地位。即在对偶家族中，妇女的地位还极重要。据久居伊洛葛西尼加斯族中的传教师佛立特(Wright)的报告：“他们的家族还是同居于古昔的‘长屋’之中，这种长屋就是他们的共产家庭。其中氏族制度还是盛行，妇女取别的氏族之男子以为夫。普通一般，家庭以内完全为女性统治。供给物是共同的；但是共同供给物之配与，不幸可怜莫过于那些拙劣而怠惰的情人或丈夫！家中无论已有几多孩子或几多财产，丈夫无时不要打好他的包袱而准备滚蛋。如果妻要他滚蛋，他是不能抵抗的，须立即跑回他自己的氏族，再找别的妇女去结婚。妇女于氏族中具有绝大的权力，几乎到处是一样的。”

此处有一问题：群体婚姻在美洲是否已完全为对偶婚姻所驱逐？这须于美洲西北部和南部建立一些新研究，这些地方的土人还在野蛮时代的高期。但以北美而论，至少在四十个种族的旧习惯中，凡与一个氏族之长姊结婚的男子，又可以取其全体

妹妹为妻（当她们达到成年时）；所以一团姊妹共有几个男子的事还常发见。这都是群婚还未完全绝迹的明证。据潘克洛说：还在野蛮时代高期的北美加利佛尼岛人 (Californie)，他们于某几个节庆日举行大集会时，有好几个种族的男女从各处来会，目的就在乘此机会互相性交。这就是保留各种族间群体通婚的暂时纪念。同样的风俗，在澳洲也盛行；其中有几个种族，其酋长、现祝、和长老对于妇女有独占权；但是到了某几个节庆日举行大集会时，例须放任其独占之妇女去与少年人寻快乐，而复现原始的共同性交之缩影。威斯特马克 (Westermarck) 在印度好斯人 (Hos)，山达尔人 (Santals)，彭加人 (Pand schas) 和哥达尔人 (Catars) 及非洲某几个种族之间，汇集这类的风俗极为丰富，当各种大祭举行之日，即实行太古的自由性交。

由群体婚姻进化到对偶婚姻的过渡形式怎样呢？照巴学风的发明，即为妇女定期赎罪以购买专一的结婚权利。在赎罪期中，妇女为有限的卖淫，以为违犯上帝律令（即一切男子在这个妇女上面的传种权利）之处罚。如巴比伦妇女，每年须到蜜里达寺 (Mylitta) 卖淫一次以赎罪；此外，亚洲西部各种族，少年女子在结婚之前，必须送到亚兰帝司寺 (Anaitis) 住居几年，任她们在寺中自由选择一些情人去恋爱。同样的风俗，在地中海和干支河 (Gange) 之间的亚洲各民族也普遍的盛行，并变成为宗教的习惯。至于不带宗教色彩的诸民族，如古代塞拉斯人 (Thracas)，凯尔特人 (Celtas)……现今印度土人，马来人，海洋洲人，及多数美洲印第安人，他们的少年女子到了结婚时候，便享有极大的性的自由。

又有一些民族的习惯，未婚夫的亲属与朋友或结婚时的宾

客，在订婚后或结婚时，可以同他的未婚妻性交。这样的风俗，不仅古代非洲阿及尔人 (Augiles) 巴列尔群岛人 (Balears) 有之，现今地中海西岸巴勒人 (Bareas) 和亚比西尼人 (Abyssinie) 还是盛行。此外更有其他民族，他们的酋长，法师或王，有享受本族一切未婚妻第一夜之权利。酋长，法师，王……就是一个尝试一切新婚初夜权 (Tus primge noctis) 的代表团。这种新婚初夜权，在北美亚拉斯加人 (Alaska) 和墨西哥北部达休人 (Tahus) 中，都是群体婚姻的残迹。即欧洲中世纪的封君，对于农人的妻女也还享有这种权利。

对偶家族的出现，恰好划分野蛮时代和半开化时代的界限。对偶家族的发生，通常总在野蛮时代的高期。间或也有发生于半开化初期的，不过为仅见而非通例。然对偶家族的发展，则几乎横过半开化时代的全部。因为自然淘汰的结果，卒至完全排除共同的群体婚姻，使婚姻团体降到最后的单位：以一男一女为配合要素而建立对偶家族。自对偶家族登台，人类社会又发生一种新动力而向新的社会秩序发展。

第七章 一夫一妻的家族

一夫一妻的家族，是从对偶家族发达到文明时代的新界线产生的。她是建立在女权颓废而男权确立的新基础上面；她是母系制度覆灭而父系制度勃兴的新产物。她的显明的目的是生育确认的父性儿童，以承继父系的财产。她与对偶家族的区别是婚姻关系极其坚固而不容易解散；并且只有男子可以决裂这种关系而抛弃女子，女子是很难与男子决裂的；就是贞操也只专

责于女子，而男子则别有方法以保持从前自由性交的愉快。

母系制度的覆灭和父系制度的勃兴，是生产方法进化所携来的一大社会革命，并且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的大革命。这个革命的结果，把从前妇女在氏族社会的主要地位完全推翻；从此以后，妇女完全隶属于男子而处于奴隶的地位，——妇女在历史上要算是首先罹受奴隶地位的人类。

关于母系制的经济理由，居诺甫颇有所发明。照他的研究，女子不仅是原始时代家庭工业的创始者，并且是原始时代的农夫。家庭工业在原始物物交换时代占有重要位置。最初的分工是女子种植园蔬而男子饲养牲畜；在这分工基础之上，一切社会秩序随着排列。而自有两性的结合以来，婚姻并非为双方想得理想上的快乐而起之伦理关系，大部分乃是经济的和劳动的关系。妇女因为在生产地位上之重要，所以在氏族社会上也居重要的地位。这种重要地位，非生产上起有根本的变化是推不翻的。

是故两性的关系，是随着生产方法之变更而变更的。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生产方法，即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婚姻制度。所以群体婚姻为野蛮时代的特征；对偶婚姻为半开化时代的特征；而一夫一妻制为文明时代的特征。

在畜牧与铁器未发明以前，生产方法很不完全，一个氏族的劳力刚足以维持一个氏族的生活，氏族人员全体劳动所获的财产即由妇女分配于全氏族的人员共同消费，而无几多余剩以归于个人，在这样的时代，决不会发生奴隶，也决不会摇动妇女的地位。但是畜牧与铁器发明以后，生产方法异常进步，商业又随着城市而勃兴，扩张土地和劫掠异族的财富或劳力的战争也跟

着发达，由是使直接参与生产交易或战争的男子地位逐渐增高，并使他们渐渐获得丰富的私有财产；结果，便把母系氏族的共产组织根本动摇起来。

就东半球而论，在半开化时代的初期，人类的劳力除维持消费外，还不能产生有价值的剩余物品。他们经常的财富还只限于衣食住以及粗糙的宝玩或调制食物的必要工具——如船、武器、与极简单的家具。他们的食物是得日过日的，并不能先事贮蓄。但是畜牧发明以后，牛、马、骆驼、驴骡、猪羊……等兽群日益繁殖；家族人口的增加，远不及牲畜增加之迅速。即家族内部渐渐发生劳力缺少的问题——一个氏族的人口，不够看管其日益繁殖的畜群。及到半开化时代的高期，加以铁器与农业的开发，劳力缺乏的问题愈增严重。由此遂于上列各种生产方法外，更产生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就是奴隶制的发明。

在从前野蛮时代，各种族间每因互争渔猎而发生战争，对于战俘的处置只有杀死之一法；现在则不然，男的屈伏为奴，女的配与族人为妻。掠夺婚姻与购买婚姻也就从此开始。随着各种助长男性经济地位的交易事业、战争事业逐渐发达，妇女的商品化也逐渐普遍。从前女性的配合是很容易的，现在则劳力渐觉稀贵，而女性亦渐具有相当的交换价值。加以男子经济力发达，不甘屈居女权之下的心理与欲望也逐渐增高，故开始从别的种族掠夺女俘为妻。这样的掠夺婚姻，自然惹起各种族间川常的战争状态。复次乃发见免除母系结婚制的束缚之另一方法，并且是和平的方法，——这就是购买婚姻。用购买的方法，可以限制其妻与她的血族断绝关系，而纯粹成为夫之所有品，给夫育儿以继承其财产。

同时采用母系婚姻与买卖婚姻两种婚制以表示其过渡状态的种族，现还不少。如白尼罗河流域土人里面的婚制，妻只在一定期间承认夫的主权；结婚前，两造的族长例须会合以决定新妇的代价，代价是以一礼拜中承认夫之主权的日数为伸缩的；族长们大声叫喊的讲价与还价之后，结局决定新妇在一礼拜中守几日贞操，其余的日子则任新妇有自由行动之权。苏门答腊的土人也有两种结婚方法：一种是纯粹的母系结婚制；一种是夫把妻完全当作财产收买。如果夫能将妻的身价金全部交完，妻就绝对作夫的奴隶；如果大部分不能交纳的时候，夫就作妻家的奴隶而从事劳役。锅兰土人也有两种婚制：一种是妻在母家招赘或住于母家的附近，有继承母家遗产之权；一种是妻嫁于夫家，丧失在母家一切的权利。在米崖亚高原的土人，一般的婚姻习惯，总是男子移居于妻家；但如男子交完了身价金的时候，即能取妻回到自己家里去。在赞贝希地方的土人，父可以用家畜和母交换子女；但如没有家畜来交换，则子女仍属于母。在非洲巴维亚种族里面，母有典当子女的权利，但事前须得与父商量。在爱福利海岸的土人亦然，母可典当子女，但父亦有赎回的权利。这些都不是稀奇的风俗，乃是全球各民族由母权演进到父权之必经的阶段。

由以上所述种种过渡形式看来，可知妇女发生身价问题并不是妇女的幸事，但是女权衰微的表征。女子因为这样，才成为男子的所有品，与其他商品没有区别，同时又可知道男子对于妻和子女的主权，完全是由卖买这一点确立的。所以男性的胜利，决不是体力和智慧优越的结果，不过是经济优越的结果罢了。

由母系制演进到父系制，由氏族的共同财产演进到个人的

私有财产，都不是骤然突变的，乃是经历长远的年月徐徐进行的。自畜牧发明，新的财富陡增；但这种新财富属于谁呢？原来属于氏族，是不用说的；但畜群发达到恰当的时候，便渐渐成为特别的财产，换过说，即共产家族的族长在这种财产上面渐有特别的权利。按照这样特别的权利，一个氏族的畜群渐渐视成为族长的财产；惟族长有承继氏族财产的资格，因而族长的地位也渐渐变成为世袭的。然而这不过是向个人财产演进之最初阶段，并非个人财产即已确立。

妇女在氏族社会所居地位之重要，其原因不外下列三种：一是妇女在幼稚的生产事业上占有相当地位；二是群婚结果，父性难明；三是母系氏族制和相续制，妇女取夫于别个氏族，男性们——丈夫，儿，及其兄弟皆居于从属地位，而她们居于主人地位。但对偶家族发生，父性即已分明；及各种新财富不停的增加，于是遂逐渐动摇母权氏族的社会基础。由此男女分工，显然开始：妇女保守家庭，男子供给食物与一切必要的劳动工具。等到新的劳动工具——奴隶——发生，男子遂成为一切食物、牲畜、劳动工具与奴隶的财主；更迟，他们即以其财产势力建立性质全然不同之家族。于是由母权氏族发生父权氏族，而真正的母的地位乃代以真正的父的地位。至此对偶婚姻亦长辞人世，而硬性的一夫一妻制遂以确立。

但是当男子的经济势力还没有发展到显然与旧的共产家族抵触的时候，当母权的习惯势力还可支持的时候，父性确认的儿子并不能承认其父的遗产；因为按照原始遗产的习惯，死者的财产，开始是归于氏族的全体人员；其后也只能归于死者的近亲；近亲仍属氏族的人员，即遗产仍归于氏族。并且遗产归于近亲，

乃是归于母系血统的近亲，而不归于死者的儿童；因为死者的儿童不属于死者的氏族。所以儿童们只能承继母的血族及母的自身的遗产，而不能承继其不同氏族的父的财产，即财产还是属于氏族。死者的财产既不能传于其儿童，然则传给谁呢？不用说传于其兄弟与姊妹以及姊妹的儿女，或死者的母亲的姊妹们的后裔；至于他自己的儿童是不能承继其财产的。

财产继续增加，一方面使男子在家族中的地位重要于妇女；别方面又使男子发生推翻母系社会制度而传其财产于自己的儿子的思想。但是这个不是母权系统还在实行可以做得到的；这个须废除母权才能实现。结果，卒把母权废除了。然而废除母权绝不是一桩容易的事，如今日我们所想象的一样；因为这乃是一个人类从来没有的极可惊骇的大革命。

然而这个大革命，却不伤害氏族人员之一丁一口，氏族人员的全体仍然可以如从前一样的在氏族里面；他只须简单的决定：“将来只有男性的后嗣在氏族里面，而女性的后嗣则嫁出于氏族之外。”这样决定的意义，就是把母的地位移于父的地位，把母权氏族变成为父权氏族。由是母系与女性相续权废除，而父系与男性的相续权确立。

这种革命在各开化民族中是何时完成的或怎样完成的，我们不能详知；但总可以断言是在有史以前的时代完成的。据巴学风及其他原史学家搜集的各种证据，以及现还存在于各半开化民族中的母权遗迹看来，确经完成这样一种革命是毫无疑义的。在美洲各种印第安人中，现还正在进行这种革命，其原因有二：一是财富增加和生活变动（由森林移居牧场）的影响；一是欧洲文明和基督教侵入的影响。在北美米索利(Missouri)的八个

种族中，已有六个种族确立了父系和男性相续制；其余两个种族则还实行母系和女性相续制。在夏尼人 (Shannies)、马米人 (Miomies) 和狄拉瓦人 (Delawares)——皆印第安人——采用的习惯，通常总是给儿童以属于父的氏族的名称，俾儿童能承继其父的财产。

注 男子体力与智慧的优越并不是原来生理的天赋，但是几千年中所处社会的和经济的地位之结果。男子因为所处地位优越于女子，并且又隶属女子为其家庭之奴隶，故极自由极完全的发展其本能。白洛嘉 (Broca 法国著名外科医家，一八二四——一八八〇) 与格拉鸠列 (Cratiolet 法国生理学家，关于脑部研究极著名，一八一五——一八六五) 辩论脑部重量与容积的关系之后，也公然承认妇女智慧的低下完全由于教育卑浅的缘故。这种真理，经马诺佛勒 (Manouvrier, 白洛嘉的学生，巴黎人类学院的教授) 的测验更加证明。马诺佛勒测验的结果：近世巴黎男子脑盖的平均容积与石器时代男子脑盖的平均容积差不多是一样的重；而近世巴黎女子脑盖的平均容积则比石器时代女子脑盖的平均容积轻得多。其测验表如下：

近世巴黎人脑盖平均容量表

件数	容积
77 男 性·····	1.560(百分之一立方米突)
41 女 性·····	1.338

石器时代的脑盖平均容量表

58 男 性·····	1.544(百分之一立方米突)
30 女 性·····	1.422

由上表看来：野蛮男子脑盖平均的容积比较文明男子的低一六百分之一立方米突；而野蛮女子的平均容积反比文明女子高八四百分之一立方米突。

第八章 宗法家族

母权的推翻，是女性在历史上一个大失败。男子既在家庭中取得统治权，妇女即成为单纯的生育机械与供男子使用之奴隶。男性的专制权初建立的时候，我们可于上古各开化民族中发见一种中间的形式，——即宗法的家族。这种家族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

宗法家族是个一定数目的自由人与非自由人的组织；全组织在家长式的父权统治之下。如闪密的族的家族形式，家长还是过多妻生活；妻妾儿女皆为其奴隶；全组织的目的，在于一定的地方看守其畜群。

父权与奴隶的组合，是宗法家族的主旨。罗马的家族，也就是这一类家族的完成模型。所以家族(Familia)的字义，原来即是属于一个男子的全体奴隶之总称；而家人(Familus)一字，即等于呼唤“家庭奴隶”。Familia与Familus即为罗马文阐明新社会组织的表辞；故在语原上，并没有如后世感情主义之含义。在这样的社会组织里面，家长之下有妻妾儿女与一定数目的奴隶，家长对于以上所有的人操有生杀的权柄。这样的宗法家族，显然是由对偶家族到一夫一妻制的过渡形式。为的要确定妇女的贞操以确定儿童的父性，妇女遂完全无保留的交出一切权力于男子。即使男子杀她，也是男子应行使的权利。

宗法家族，已经是入了有史时代的领域；实际上也是家族演进的一个大进步。在上古闪密的族和亚利安族各开化民族中，皆经过这样家族形式的阶段。现在在东欧以及亚洲各处，还是

多少存在。

在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存留一种介乎共产家族与近世一夫一妻制之间的过渡程序：在南斯拉夫人民中，共同的大家庭（Zadruga）还是存在；这种大家庭里面包括同一父亲的几代后裔；他们共同住在一栋大房屋，共同耕作土地并且共同消费；生产品的剩余，亦为共同所有。共同家庭的男主人，对内握有全家的管理权，对外有规定一切生产品之价格的权利责任。这样的家主是选举的，并且不须年老者。全家妇女在女家主的指挥下工作，女家主通常就是男家主的妻。妇女们皆有选举权，女婿的选择，例由她们作主。但全家的最高权是属于全家壮年男女的会议；男家长做过各种报告后，由会议解决各种问题，决定较为重要的财产的买卖——特别是土地；家人犯了罪过亦由会议审判。

这一类的共同家庭，在集产村落盛行的俄罗斯还属产生不久。至于中国宗法的大家庭，亦常以“九世同居”或“五代同堂”为美谈。几代同居的老房屋，在各处还存留不少。这种宗法的大家庭，简直统御中国有史以来的家族生活，不过至最近几十年，受着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影响，农业经济和家庭经济根本崩溃，这类大家庭才迅速的崩溃起来。不然，虽世世代代有敢于变法之商鞅，也不能完全剿灭这类大家庭的存在，因为她完全是建筑在农业的经济基础上面。

然而文明初启，一夫一妻制即随之而俱来，何以不能立刻实现如近世一夫一妻之简单的小家庭，而必须长期经过那样复杂的宗法大家庭呢？这没有别的解释，只是因为近世的生产单位已由大家庭移于大工厂，故专为传种与享乐的小家庭才能成立；

在文明初启以至大工业未发明以前的时代则不然，畜牧与农业正要求有此复杂庞大的宗法家族之存在，因为几百几千头牲畜和几千几万顷田亩，决不是一夫一妻的小家庭可以经营的。

所以，无论在何种宗法的大家族中，必定具有一种共通的主要条件，即必定具有一项共同的土地。宗法家族在一切开化民族中尽了一种伟大的作用。为引导母权家族到一夫一妻的小家庭之摆渡。并且其所占的时间是很长的，简直横亘奴隶经济制和隶属经济制之两个整个的时代。由此，我们可知宗法家族是同奴隶制度而俱来的。

第九章 三大时代之三大婚制

麦克林兰以为人类婚姻只有一夫多妻、一妻多夫和一夫一妻的三种形式；其实一夫多妻和一妻多夫不过为两种例外的形式，也可说是家族历史中的奢侈品，并不成其为普遍的婚姻制度。男女人口的比例，总要在约略平等的状况之下，才有成为普遍的婚姻之可能，所以多妻与多夫绝不能成为普遍的婚制。

我们从历史的事实研究，一夫多妻显然是从前奴隶制度中产生的，并且限于某几种特殊的情境。例如在闪密的族的宗法家族中，家长自身及其长子或至多某几个儿子可以过多妻生活，而其余的人则只能过一妻生活。这样的事情，在东方尤然。例如中国，畜妾与多妻，不过是富人的特权，“小老婆”大都是由金钱购买来的；至于一般民众，大概总是过一夫一妻的生活。广东地方的风俗，凡稍为富裕之人，即须畜妾三四，以点缀门面；若在稠人广众之中，问及某富人只有一妻，则被问者及坐众，无形中

皆觉不甚“体面”。这尤足以证明多妻为富人之奢侈品。

在印度与西藏的一妻多夫，也同样的为一种例外，原来不过是群体婚姻的遗迹。在印度的兰夷斯人(Naies)通常总是三个或三四个以上的男子共一妻；但其中的每一个男子又可与别几个男子再共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所以这样婚姻的实际，不过是群体婚姻的特殊形式，女子固然是过多夫生活，同时男子也是过多妻生活。

一夫多妻与一妻多夫存在的条件完全相反：一夫多妻存在的地方是生活富裕的人家，一妻多夫存在的地方是生活艰难的人家；一夫多妻存在的地方妇女数目是很多的，一妻多夫存在的地方妇女数目是很少的；一夫多妻，在东方温带地方(如中国)或热带地方现还盛行，而一妻多夫则盛行于寒带各高原或冰带地方如西藏各高原，南印度的兰夷斯，以及爱斯基马(Esgnimaux在白令海峡之间)等处。

一妻多夫所产生的儿女，只有从母系属为可能。她的丈夫们通常都是兄弟，当大哥同一个女子结了婚，则其余各弟弟都成为这个女子的丈夫。然而女子有更以别人为夫的权利；男子也可有几个妻。

上面已经说过，实行一妻多夫的各民族类皆住于寒带各高原和冰带地方。据《性之病征》的著作者达诺甫斯基(Tarnovsky-Les Manifestation Maladives du Sens Sexnel)说：有个久住于寒带各高原的旅客告诉他，住在这些地方的人们性欲自然的减低。达诺甫斯基以为性欲减低足以说明这些地方人口繁殖率的衰弱。因为人口繁殖率之衰弱，所以不得不勉强妇女过多夫生活。妇女罹受多夫的影响，体力自然更要衰弱。爱斯基马

的女子，普通一般，要到十九岁才有月经；然而热带地方的女子九岁十岁即有月经，温带地方的女子十四岁或十六岁即有月经。所以热带地方性欲增强，而多妻制盛为流行。

热带地方生活甚易；而寒带各高原或冰带地方，生活极其艰难。一妻多夫制完全是适应这种生活艰难的情境产生的。这很足以表明生产方法及于两性关系的影响之强大。因为生活艰难，所以又发生杀死女孩的恶习；因而男女人口永远不均，即一妻多夫制永续不绝。

由以上一切的陈述，我们可得适合人类进化的三大主要时代之三种主要的婚姻形式。而一夫多妻与一妻多夫不过为两种例外的存在：即野蛮时代为群体婚姻；半开化时代为对偶婚姻；文明时代为一夫一妻。三大时代各自有其特别的生产方法，所以三大时代亦各自有其特别的婚姻制度。野蛮时代食物生产停滞于极原始的状态（渔猎），男女在极闭塞的环境中作同样极简单的工作，以满足其极质朴的生活，所以两性生活也同样停滞于极原始的极简单的情形之中（群体婚姻）；半开化时代畜牧与耕地逐渐发达，人口亦比例的增加，有分开以便利用新牧场和新耕地之必要，由此两性生活遂演进到一种不固定的个体组织（对偶婚姻）；及到文明时代开始，男子逐渐成为手工业的工人，商品的所有者，或战掳品的暴富者，以至蔚为一切牲畜奴隶军器工具的主人，在这样新的经济条件之下，遂形成一种新的家庭组织（一夫一妻）和人类前此未曾见过的大革命，将前此在氏族社会处主要地位的女子完全隶属于男子之下。此处要接着说明的还有两点：其一，母权被推翻时妇女采取怎样态度？其二，文明时代一夫一妻的实质究竟怎样？

第十章 母权与父权之争斗

母系的意义建立在原始共产制之上，在共产家族里面，人人是平等的；父系的意义建立在私有财产上面，妇女处于附属地位，并被压迫。这样的大变化，在各开化民族里面不是同一时代完成的，并且完成的方法也是随地不同的。

据恩格斯的意见，这样的大变化大概是由和平方法完成的，只须各种新的权力条件（即经济条件）已经存在，便很可简单的决定将来只容男性的后嗣留于氏族里面，而女性的后嗣则嫁出于氏族之外。这样，便和和平变成了父系的氏族。

巴学风的意见完全相反，他从一些古书中研究的结果，证明妇女对于这样的社会变化曾经做过严厉的争斗和反抗。例如有一部古小说，描写希腊英雄时代住在小亚细亚德马敦流域（Thermoson）的一群女英雄，她们的全体叫做亚麻藏（Amazones），她们就是反抗希腊各大英雄而与之血战的健将。其中一个叫安丢白（Antiope），希腊著名英雄提西欧（Thesel），被她战败于德马敦桥上；一个叫潘提西来（Penthesilee），她援救被希腊英雄亚格棉农（Agamemnon）和亚基利（Achille）等侵掠的特罗雅人（Troyens）与亚基利苦战而被杀……（相传特罗雅太子入谒斯巴达王，悦王后美，掠后以逃，希腊诸勇士亚基利等出师征之，王兄亚格棉农时为密森尼（Mycene）王，饶勇善战，众推为帅）。凡此皆为妇女反抗新社会组织的证据。

据巴学风的研究，雅典母系被父系推翻的时候，也经过一些极强烈的反抗，这种进化简直是一出惨剧。于是巴学风从希腊

神话中寻出下列故事以为母权与父权争斗的例证：

亚格棉农——他是密森尼的王。

克里太尼斯脱 (Clytemnestre)——她是亚格棉农的妻。

阿勒斯特 (Oreste)——他是亚格棉农与克里太尼斯脱的儿子。

伊碧奇尼 (Iphigenie)——她是亚格棉农与克里太尼斯脱的女。

亚格棉农征服特罗雅时，大肆焚掠；归途大遇逆风，舟师不能回，乃杀其女伊碧奇尼祷祭女神，以平女神之怒。克里太尼斯脱闻耗大怒，因为按照母权的习惯，女不属于亚而属于克；乃另与爱奇笃 (Egythus) 结婚；并且这也是从前法律所允许的事情。亚格棉农自特罗雅回到密森尼，克里太尼斯脱与爱奇笃合力弑之。其子阿勒斯特在袒护父权的少年男神亚波龙 (Apollon) 的命令之下，替父报仇，乃并杀其母与母的新夫爱奇笃。

于是一些代表母权的女神爱林尼们 (Erinnyes) 起来追究阿勒斯特杀母的罪恶 (按照母权的旧习惯，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杀母是最大而不可赦免的罪恶；如果族外人杀了族内一个母族，全族男子须起来复仇，由复仇行为引起戕杀是全族男子应尽的义务)；而代表父权的少年男神亚波龙则起来为阿勒斯特辩护。

此时少年女神雅典娜 (Athena) 被请为裁判官；可是她也是袒护父权的。相传亚波龙和雅典娜是没有母的，他们是从希腊名神序时 (Zeus) 头上的武器出来的。

现在且看两造的对辩：

爱林尼们——男神叫你杀你的母吗？

阿勒斯特——现在我不答复这个。

爱林尼们——要办你的罪呵，你尚有何说？

阿勒斯特——我很希望。我父将在墓中帮助我。

爱林尼们——怎样呢？说给你的判者听罢。

阿勒斯特——她是杀了她的丈夫，又是杀了我的父。

爱林尼们——你活而她死，她已偿了这罪恶。

阿勒斯特——但是，假使她生存，你们会追究她吗？

爱林尼们——她所杀的男子和她没有血的关系。

阿勒斯特——我呢？我有我母的血吗？

爱林尼们——哼！你是她怀孕的，你杀了你的生母呵！你还否认你和你母的血脉关系吗？

爱林尼们既不承认夫权，也不承认父权；她们所拥护的只是母权。她们以为克里太尼斯脱杀了她的夫不算什么重要。因为夫是外人，没有血的关系。她们要求严办杀凶犯阿勒斯特，因为照旧社会的习惯，杀母是莫可赦免的最大罪恶。但是代表父权的亚波龙，他的意见完全相反。亚波龙是承序时的命，教阿勒斯特杀母以复父仇的，所以起来为凶犯辩护。

亚波龙——现在我要说几句话；我的话颇多呢。生他的并不是母，不过人们叫他为母的儿子。母不过是种子的食物供给地，然则生他育他的也就是这食物的供给地。母亲接受这种子而保育之，才能求悦于上帝。我的话是有证据的，人们无须母也可以出世。例如序时的女即可给我做

证据。她绝没有在黑暗的子宫里面被养育过，因为没有那个女神能产生这样的孩子。

爱林尼们——少年神，你侮辱你的老女神们！

亚波龙这片强词夺理的蛮话，给父系立了一个理论的基础。孩子可以从父亲的头上生出而无须乎母，自然只有父权独尊了。但这与从前的观念是两样。照从前的观念，孩子的生命与血都是母亲给的，所以孩子皆为母亲所有，而父不过是个外人。故爱林尼们说这位少年男神侮辱了老女神。

两造争讼不决，最后乃用投票方法来解决。但投票的结果，两造票数相等；于是雅典娜以主席的资格和袒护父权的态度，宣告判决：

判官雅典娜——现在我宣告判决。我给一票与阿勒斯特。我不是母亲生的。无论如何，我是完全赞助男性的，不仅在结婚以前。的确，我是拥护父亲的。并且杀了丈夫的妇人没有什么重要，因为丈夫是家长。既然两方票数相等，所以阿勒斯特是胜利者。

爱尼林们是代表临终的旧社会秩序的；亚波龙和雅典娜是代表方兴的新社会秩序的。这出喜剧的结果是：新权力完全胜利；而旧权力完全失败。

巴学风的母权里面，又载了一个神话，很能表现上古希腊女子地位的变迁：

在基克罗普(Kekrops)时代，发生两种奇迹：橄榄树和水，同时在地上涌出来了。

国王惊骇，遣人请示于德尔非斯神(Delphes)。

神的答复是：橄榄树是指女神美丽佛(Minerve)，水是指男神尼普东(Neptune)，在这二神中无论取那一个的名称去名这个城市，这是市民的随意。

于是基克罗普召集人民会议来解决这问题；男女都有投票权。

男子投票赞成尼普东，女子投票赞成美丽佛；因为女子比男子多一票，所以美丽佛得了胜利。

尼普东大怒之下，马上将雅典全土涌入洪水之中。

雅典人要挽回男神的愤怒，乃对于妇女处罚三条：

(一)剥夺她们的选举权。

(二)以后儿女不取母的姓名。

(三)妇女自身丧失雅典人的名称。

希腊妇女的地位，从神话时代英雄时代随时下降；然母权时代的风俗，在精神界还统御了几世纪。女神的地位，在一般民众的观念中，还极其崇敬。由母权时代规定的许多女神的节期，在宗教的习惯上，还是当做重典举行。更迟一回，希腊妇女专门崇奉女神德茂特(Demeter)，每年举行盛大的祭典，一个男子也不能参加。同样的事情，后来又在罗马产生，罗马妇女崇奉女神格来斯(Ceres)，后即成为普遍崇奉之五谷神。德茂特和格来斯的节期，为希腊和罗马宗教习惯中之最大盛典。

第十一章 一夫一妻之实质

英雄时代，希腊的妇女与后代比较起来虽然还是自由的，还是被尊敬的，但是不过因为她是合法儿子的母亲。实际上，因为

男子地位的优胜和奴隶间的竞争，希腊妇女在英雄时代即已急转直下的卑贱起来了。在荷马(Homere)诗中，许多俘获的少年妇女常常是任战胜者随意处置：最高首领选去其最美丽者外，其余的则任各将领在天幕里面或他们的床上分配起来。一夫一妻的旁边有奴隶存在，一些俘来的少年美女，她们的肉体与灵魂皆属于一个男子，而竞相媚事于其左右。一夫一妻的特性原来就是这样组成的：只有妇女过一夫的生活；而男子在实际上则无所谓一妻。这样的特性，直到今日还是如此。

然在同一时代，多利安人(Doriens)与伊欧尼人(Ioniens)的情形完全不同。前者以斯巴达为模型，后者以雅典为模型。雅典妇女通常总是囚禁于隔离的深闺之中，这些深闺通常总是设立在最高一层楼或最后一层楼上，使男子们——尤其是外客不容易与她们接近；男客来家，她们须立刻躲避。少年女子的教育只限于缝纫纺织，至多不过念书习字。妇女没有奴隶同伴不准外出；这些奴婢，是常常紧伴她们身边监视她们的(在中国皇宫里，则有无数阉官太监给皇帝监视几千几百的妃子)。西洋妇人至今犹喜随带猎犬，据希腊最著名的文学家亚利士多芬(Aristophane)说，此即雅典人用以监视其妻及恫骇向其妻献媚之情人。然则犬在西洋文明民族的家族历史中，实尽了一种女监的作用！至于遮盖妇人颜色的头巾面网，尤其余事。雅典妇女除了看家育儿管理奴隶之外，业已不得参与社会一切公众事务。妇女要守严格的贞操，而男子可以放肆的嫖荡。称为赫特列(Hetairisme)的卖春妇公然成为社交的中心。雅典盛时，妓院也随着发达，并且由国家保护。妓馆在法律和强权的保护之下，犹之希腊罗马的神殿、中世纪的礼拜堂，其尊严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始创妓

院制的梭伦(Solon), 极受时人的赞许: 称为维持城市安宁与风化的聪慧组织; 没有这种新组织, 则许多少年男子将因烦闷之围攻而乱上流阶级的妇女。

在一方面看来, 从前的性交自由, 是随着群体婚姻的消灭而消灭了; 但在别方面, 随着文明和一夫一妻制的开始, 性交自由又复活于“赫特列”的新形式之中。卖淫与自由性交不同的, 就是妇女为物质的利益而卖其肉体于一个男子或多数男子; 因满足男子购买妇女的要求, 遂渐渐形成为公开的卖淫制度。卖淫制度, 实为妇女商品化之极点。

在群体婚姻开始崩坏的时候, 定期卖淫不过为妇女暂时牺牲其人格以为买得单一结婚权利的代价; 而金钱的卖淫, 开始亦不过为宗教的行为: 原来定期卖淫是要到女神庙中去实行的, 神殿祭坛之下设有钱柜, 凡来求爱的人们必先置钱于柜以礼神, 这就是金钱卖淫的渊源。如亚尔梅尼(Armonlo)最著名的亚芝帝司寺和希腊最著名的亚佛罗德寺(Aphrodito)都是“赫特列”的实行场所。而印度各大神宫中的舞妓, 印度人叫做白野德勒(Bayaderes)也是原来卖淫妇的遗影。神庙卖淫, 原来是一切妇女的义务; 后来遂专由女巫去执行, 以代替其余的一切妇女。

这样的神庙卖淫, 可说是由群体婚姻直接派生的。到了文明初启, 随着财产的差异, 奴隶的强迫劳动之旁也发生了自由妇女的卖淫, 这都是必然的相互关联。群体婚姻给文明以两重的遗产, 恰好如文明所产生的两重矛盾的面儿一样, 正面为一夫一妻, 反面为卖淫。而卖淫的极端形式就是公开的妓院。自梭伦以后, 卖淫成为一种社会制度, 也如其他一切社会制度一样, 不仅订于法律, 而且列入税收(如中国有所谓花捐)。

公开卖淫制是维持从前的性交自由的，是便利于男子们的，尤其是便利于特权阶级的男子和富人。开始不过强迫或雇买一些奴隶女子与下流阶级的女子为之；后来许多不愿意过囚禁式的一夫一妻生活的良家子女也纷纷逃婚，登籍卖淫。她们的理由是不结婚而做卖淫妇反能得较大的自由。而尤其以没有习惯雅典风俗，不堪骤受严格束缚的外来殖民地女子投入花籍的为多。妓女们与良家妇女大不相同，她们因为与社会自由接触的结果，见闻自然广博，其中多少有点学识的，多半为了希腊第一流政治家学者，和艺术家的朋友。许多卖淫妇的名字与声誉，因为与希腊名人有密切关系而显著，而希腊名人亦无一不与名妓通殷勤。如亚斯巴西(Aspasie)，她是民党首领陪利克列斯(Pericles)的朋友，不久又和他结了婚；弗丽娜(Phryne)，她与演说家伊白立德(Hyphrides)及雕刻家普拉西特(Praxitele)有密切的关系；达兰亚(Danae)，她是快乐主义哲学家伊璧鸠鲁(Epicure)的先生；亚尔克那沙(Archeanassa)，也是柏拉图倾倒的女友。此外，大演说家德谟斯登(Demosthene)，更公然宣言：“我们有妓女以恣淫乐，有姬妾以供服侍，有正妻以生合法儿子而理家政。”

夫的方面既以嫖妓为性的生活之补足，妻的方面便要发现寡居的怨憾。于是一夫一妻制的本身又发生第二种抵触，仿佛是妇女们用以报复其丈夫的。这种抵触是什么？就是私通。

夫的方面有娼妓，妻的方面有情人；妓女与奸夫，成为一夫一妻的补足品。这就是文明初启以来一夫一妻制存在的真相。私通在宗教、风俗、道德和法律上虽然严格的被禁止，可是她毕竟能够与嫖妓对抗，同样的成为不可反抗的社会制度；不过卖淫

是公开的社会制度，私通为秘密的社会制度罢了。所以儿子的父性之不确定，一夫一妻制仍然和从前的群体婚姻差不多。这是文明民族的家族生活莫能解决的矛盾。

斯巴达与雅典完全不同。从荷马描写的诗篇中看来，斯巴达的婚姻情形还是很原始的。对偶婚姻在斯巴达还存在，不过随着国家地方的观念略有变更，并且还很象是群体婚姻的回照。

纪元前六五〇年亚兰山德里大斯王 (Anaxandridas) 因为他的妻不生育，又娶了第二个妻，并且立了两个家庭；同一时代，亚里斯登王 (Ariston) 有两个无子的妻，他又娶第三个，并与前两个中之一个离了婚。别方面，也有几个兄弟共一妻的，朋友之间也可以共妻。据希腊历史家普鲁达克 (Plutarch) 说，斯巴达妇女，只要情人遵守她的条件，她便可谢绝她的丈夫。

这样看来，斯巴达妇女还是很自由的。因此之故，背着丈夫做那不忠实的私通的事体，在斯巴达妇女是绝没有的，至少在最早的时候，斯巴达人还不知道役使家庭奴隶。农奴阶级的希洛芝人 (Helots)，不过赖主人的田地过生活；斯巴达人很少与希洛芝妇女为往来。斯巴达的青年男女，在春情发动以前，皆裸体受共同的教育，所以女子的体格得与男子为同样的发育。凡此种种，皆足证明斯巴达妇女的地位与雅典妇女的地位完全不同。

由上所述看来，可知一夫一妻制完全不是建立在自然条件上面，不过建立在社会条件上面，——特别因为个人财产制胜了原始的自然共产制。男子既然这样在家庭中占了优势，“育儿承产”便在希腊人口中公然宣布为一夫一妻的惟一目的；而结婚亦成为对于上帝、国家和祖宗之必须履行的义务。一夫一妻制，在历史里面，绝不见得为男女两性之调和；反而男性隶属女性，

发生前此未有的两性冲突。男女间育儿的分工，为人类第一种分工；而一夫一妻制里面男女两性间的抵抗，也是随着历史而俱发达的第一种阶级抵抗。一夫一妻制固然是历史上一个大进步，但同时她在奴隶制与私有财产制之旁，开始了一个维持到我们今日的时代——即文明时代；在这个大时代中，每一个进步同时必有一个相当的退步为伴侣，而一部分或一阶级的幸福，即以别部分或别阶级的痛苦和压迫为代价。

家族历史发达到近世大工业时代，一夫一妻的小家庭既不是经济的单位，复不是政治的要素。极少数资产阶级的家庭，赤条条的是金钱联缀起来的性交和娱乐的一种场所（但此外还有多种）；最大多数无产阶级的家庭则早已为大工业所破坏，他们的妻女及小孩都须离开家庭而与男性劳动者同过大工厂的生活。换过说，即两性间家庭劳动与社会生产劳动的分工已为大工业所冲破，而贬谪数千年的妇女至此才渐有恢复原始时代的重要地位而趋于解放之可能。

第二篇 财产之起源与进化

第一章 个人财产之起源

照一般经济学家看来，财产是一种超越统御自然界的演进律(La loi d'évolution)之社会现象，并且是与天地相终始的永远不灭的存在物。他们要完成这个目的，不仅在原始的野蛮人中搜集私有财产(La Propriete Privee)的论证，而且在各种动物

中搜集私有财产的论证：以证明人类生来即具有私有财产的天性，这种天性是永远存在的，所以私有财产也是永远存在的。比如鸠类胸前具有一个饵囊，遇有许多豆类的时候，先把这个囊填满，以后饿了的时候，再把囊里的豆子送到胃里去消化，经济学家便叫这个为鸠的私有财产；又如牛类，食道下端具有一个大囊，吃草的时候，尽量把牧草作一次贮藏在这个里面，然后才安闲的挨次回反于口中细嚼，经济学家们便叫这个为牛类的私有财产；……这样推论下去，即各种植物亦莫不有私有财产了！因为植物在地下的根茎莫不是吸收或贮藏养料的。

原始的人们，最初的环境是很艰险的，他们既没有锐利的爪牙，又没有武器，仅赖生活于血族团体之中，才能与毒蛇猛兽或异族为群体的生存竞争。一个血族团体的人，都靠获取自然物品去维持共同的生活。无论强者怎样强，弱者怎样弱，都不能不努力维持共同生活，因为除了共同生活之外，个体决不能为单独的存在。所以在原始的人们中，是没有个人财产(*Propriete individuelle*)这个观念的。至于土地财产(*La Propriete fonciere*)和资本财产(*La Propriete capitale*)更不消说。就是在现在的野蛮人中，也还是这样，据费森和贺威特(*Howitt*)在澳洲土人中的观察，其中某几个蛮群的人们，仅只以武器、装饰品等为个人随身的用品，并且这些用品在同一团体的各个体中，可以按照需要互相传授，他们决不把这些东西视为个人的财产，只视为全体人员的共同财产(*La Propriete commune*)。

我们要在原始时代中竭力找出个人财产的最初起源，至多也只能找出一种绝不具有物质性的理想形式，即野蛮人每个具有一个名字。这个名字，是他到了成年的时候，由氏族举行一种

宗教的祭典授与他的(欧洲加特力教的国家,男女到了成年的时候,即跑到天主堂去受洗礼;而中国也有所谓冠礼,都是保留这种远古的纪念)所以他得到这个名字,如获极宝贵的财产,决不用以轻示外人,因为恐怕人家夺了去;他若肯将他的名字和他的朋友的名字相交换,这在情谊上就是证明他赠了一种无价宝的礼物。但是这种名字的财产绝对不是属于个人的;摩尔根已告诉我们,这种名字是属于氏族的,并且当他所赠与的朋友死了的时候,这个名字又要复归于氏族。

复次,我们再到野蛮人中来找个人财产的物质形式之最初起源,那末,至多也只能寻出一些附着于个人并且嵌入个人肉体或皮肤之内而不能分离的东西,比如穿在鼻子耳朵或嘴唇上面的装饰品(中国女子现在还带耳环),系在颈项周围的宝石,摩擦筋骨痛的入油,放在神龛上面的结晶石,及其他悬于个人身上的柳皮笼子里面的宝贵骨骸……。这些东西都算为个人所有,一生不离体肤;死了的时候,即把这些东西同着死尸一块埋葬,或同著死尸焚化,以给死者的灵魂享用(中国至今犹有烧纸扎物品给死者的遗习)。如果要使一件东西成为个人的所有,便应使这件东西与他的体肤成为密切而不可分离的关系,才能达到目的。野蛮人如果要表示他想要某件东西的意愿,便要装做一种吃东西的模样,或用口衔著那件东西,并且用舌子在那件东西上面不停的舐著。比如住在白令海峡之间的爱斯基马人,他若买了一点东西——比如一口针,便将这针贯在嘴唇上,为一种宗教的标记,以表示他愿意保守这针为个人使用。只有这样的事实,可以叫做个人使用的财产(La Propriation individuelle)。个人使用的财产,乃是财产之最原始的形式,这种财产不仅过去存在,就

是将来也还要存在，因为自食物以至装饰品，都是人们生活的必要条件。

使用——是物件属于个人的主要条件。因而由个人做出的制品，也只看本身是否要专供他的使用，才视为本身所有的东西。一个爱斯基马人自己只能具两个独木舟；若制造了第三个，便归氏族处置，因为凡自己不使用的物件，便应归为共同财产。

野蛮人每个具有一块拷火石或一独木舟，也如中古手工业者之具有劳动具，近世生理学家之具有显微镜一样，这一类只可叫做劳动工具的财产(La propriété instrument de travail)，与中古大地主具有之土地财产和近世资本家具有之资本财产，其性质根本不同。然而一般拥护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家，他们硬要在没有资本的原始社会中寻出资本财产的起源来：他们不是以原人所使用的石子树枝及弓箭等做资本的起源，便想象各个野蛮人怎样积聚胡桃或鱼虾以相交换而得资本之积聚！

第二章 氏族共产制

原始的人不能有个人财产的观念，最优越的理由是因为他离开他所生存的血族团体不能有个性的认识。野蛮人，不是好玩的，常常有许多实在的危险和想象的恐怖包围着他，使他决不能为孤独的存在，独立的状态是他所想象不到的境界。逐出血族团体即等于今日之宣布死刑。比如在前史时代的闪密的人中，希腊人中，及其他半开化民族中，要犯了凶杀案的人，才处以逐出氏族的极刑。据另一种神话，阿勒斯特——在他杀了他的母亲以后，嘉恩(Cain)——在他杀了他的兄弟之后，立被逐出国境。

就是在许多很前进的文明人——如有史以来的希腊人和意大利人中，放流还是一种极可怕刑罚。希腊诗人特欧格尼(Theognis)说：“放流是极可怜的，既没有朋友，又没有忠实的同伴。”可见离开亲族而营孤立的生活，是习惯群居生活的原始人们顶可怕的事情。

并且生长在原始环境中演进的人们，他们比较开化的人们，更是互相关联而不能分立的存在物，因为要这样才能满足他们的各种需要；所以他们必须与他的群和家族为一体，个人既不是财产的主人，也不是我们今日所谓家庭之主人。在极原始的人们，还没有家庭的形式存在。氏族是全体的，群体结婚的是氏族，共有财产的是氏族，而每代的儿女也是属于全氏族；除了氏族之外，他们绝不认识个人的存在。

氏族内部，一切属于全体，非洲波希曼人(Bushman)若是得了一种赠物，便分配于全氏族的人员；据达尔文的报告，有人给一铺被盖与一个佛爱奇人(Fuegien)，他便将被盖撕成许多小块以分给其同伴；波希曼人若是捕获一条野牛，则分割为许多块数，以送于其余的人，自己只留一极小部分。旱荒的时候，佛爱奇的少年便沿河而跑；若是气运好，遇着一条浅死在滩上的鲸鱼，他们无论饿得要死也不动手，只是迅速的跑回去告知他们的氏族；于是氏族人员立即跑来，由极年长的人将死鲸尸体平均分割于全体。即在比波希曼和佛爱奇更发达的野蛮人中，猎得的禽兽也不属于猎者个人，只是属于他的妻的家族或他自己的家族，并且分配的细则，是按照亲族等级的。

渔与猎——是两种原始的生产方法，通常是要共同去做的，所以获得物品也是共同消费的。波多居岛人(Botocudos)，是南

美巴西地方一些不可驯服的种族，他们全族的人员组织为共同的打猎队伍。凡属他们发见有野兽的地方，便全体都去，那块地方的野兽不打尽，他们是决不离开。共同狩猎的种族必产生共同消费的习惯，原始的共产社会最初便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上面。每次狩猎成功了，他们必集合全氏族的人员公开盛筵，共同享受获得的禽兽。这样太古的风俗，就是在后世也还可以发见。在高加索某几个村落中，若一家捕获一条野牛或十几条羊，便要召集全村的人口举行一个庆日，大家共同醉饱，以纪念历年死了的人们。这样纪念死者的共同大餐，在中国宗法社会的家庭和宗祠里面，现还有其遗迹。

摩尔根在他最后的重要著作《美洲土人的家庭与家庭生活》(House and house life of the American aborigines) 里面，研究一些原始共产时代的风俗。据他描写北美印第安人共同的渔猎生活：那些专靠兽肉供给的平原各种族，都是在他们的狩猎中表示他们的共产主义。在一些黑脚印第安人猎取野牛的时候，便有一些男女和儿童骑着大群的马跟着猎夫走；当开始追逐兽群时，猎夫们便将打死的兽委弃在地上，从后赶上的人，只要谁先碰见这个兽，便归谁所有。这样的分配方法，继续以至人人都碰着打死的野兽为止；他们一碰着打死的野牛，便立即施以宰割，或是在太阳光热下面晒干，或是炎草熏干；猎场中另一部分人则收集没有晒干的肉和碎肉，混和腊油卷于兽皮里面。鱼类丰富的哥伦比亚河(Columbie)，到了渔季的时候，全族的人员便一齐沿河扎起野幕，来共同取鱼；每晚按照妇女的人数分配，每个妇女接受一份均匀的；获得的鱼都是随时劈开，并且在鱼簧上晒干了，然后才收集于篮子里面搬运到村落里去。

当野蛮人停止沿河沿海以获取由自然供给的食品（如沙滩之死鱼等）之漂流生活时，他们才定居于一定的地方，建筑一些房屋。房屋不是属于个人的，但是属于全氏族共同的。故一个房屋可以住好几百人。在北美加罗林岛（Caroline）住居的黑太人（Haidah），每个屋子里面总是住七百人以上。又如拉毕罗慈（La Perouse）在海洋洲波里尼西亚（Polynesie）发见的房屋，长三百一十尺，宽二十至三十尺，高十尺，好象一个独木舟倒转的模形，两个极端开了门户，全屋可住百多人。伊洛葛人的长屋，据摩尔根说，十九世纪的末年才消灭，长百尺以上，宽三十尺以上，高二十尺，其中横一条贯通全屋的走廊，走廊的两边排列一些七尺宽的小房子，各小房子里面住一些结婚的妇女。每栋房屋有两条出入的门户，门上画有或刻有其本氏族图腾（Totem），——即本氏族的后裔用以标识的禽兽。澳洲波尔尼（Borne）地方的达雅克人（Dayaks）的村落是由一些共同住居形成的，房屋是用木棍构造的，所占地面有十五尺至二十尺之宽，与瑞士湖畔的建筑差不多。白天则在走廊中央度日；未婚的成年男女及青年男女夜晚则分离睡于各共同的大厅之中，男性的睡做一厅，女性的睡做一厅。至于墨西哥土人的大屋（Casas Grandes），基础的面貌是很宏大的，上面建了好几层高楼——一层复一层，每层的小房子分得如蜂房一样。考古物学家舒利曼（Schliemann）在希腊阿哥里德（Argolide）发掘出来的古屋，及其余一些考古家在诺威与瑞典的废址上发现的一些大房屋，皆为希腊荷马时代及斯干的那夫民族（Scandinaves）半开化时代之共同房屋。而法国阿文义地方（Auvergne），在十九世纪的上半纪，农人们还是几个家族集合同居，那些同居的房屋恰好与伊洛葛人的相类似。在这些共同房

屋里，一切供给是共同的，制火食的厨房是共同的，每餐都是共同来吃。

同居的伊洛葛人，共同耕作园圃，收集谷物，然后贮之于他们住居里面的共同积谷里面。这些生产品的分配，按照个体具有的方法，只是分配于各家——即走廊两面的各小房。例如玉蜀黍一束一束捆好了的时候，便悬挂于各小房子的壁上；但邻近小房子里面的玉蜀黍用尽了的时候，又可按照需要，到别的房子里面去取用。就是对于渔猎的获物，也是同样的分配保留。一切蔬食品与肉食品都是委给妇人去保管和分配，作为氏族全体人员的共同财产。所以在印第安人的村落里面，常可发现一种“个人所有品还可共同使用”的“奇怪”现象。

据在美洲狄拉华人(Delaware)和蒙西人(Munsees)中住过十五年(一七七一一——一七八六年)的牧师赫克威尔德(Hechewelder)说：“在印第安人的房屋里或家族里面，没有一件东西不为个人的财产。从马、牛，以至狗、猫和小鸡，每个人都认识那一件是属于他的。就是在一胎小猫或一孵雏鸡之中，有时也有几个不同的所有者；如果有人要连母带子买一孵鸡，便应与对于这些小鸡具有所有权的儿童们去商量。纵然种族里面实行共产的原则，然家族的各个人都公认各有财产的权利。”实际上，这不过是在共产主义里面发生个人的分配——即个人使用的财产，并不如一般经济学家所说，是与共产主义相矛盾，反而是共产社会完全必要的分配方法。

在别的印第安人，如新墨西哥拉格兰(Laguna)一些村落里面，食物并不分给一个家族的各母亲去看管，只是交给她们贮之于共同的仓库。一八六九年牧师高尔曼(Garman)写信给摩尔

根说：这些谷仓，普通都是交由妇女们管理；她们常常担心将来缺乏粮食，比其近邻西班牙人还要留心；所以她们日日调节食物，务使贮藏的东西能经过一个全年；所以在这些印第安人若是只遇一个荒年还是可以度日，但若连续两年歉收，他们便要受饥饿的痛苦。

在中美麦野地方(Maya)的印第安人，一个村落中有一个共同的灶屋，上面用茅棚盖的，这个灶屋是供全村的人共同使用的，如欧洲中世纪的共同面包灶一样。斯德芬(Stephen)旅行于中美雅卡登地方(Yucatan)，常常遇见一群一群的妇女和小孩子用木钵盛着烧好的饭菜，从这样共同灶屋跑到各自的家里去。但在伊洛葛人中，共同的伙食，即在每个共同的住屋里面做，每个家族有一个共同的大锅灶，每餐由主母在这个大锅灶上面，按照各人的需要分配食品；每个人用木碟或泥碟盛着自己那份食品；他们既没有桌凳，也没有一块处所象现今的厨房与食堂，每人接着食品后，只要何处与他相适，便在何处蹲着吃或站起吃。但是通常总是男子吃在前，女子与儿童吃在后。剩下来的食品，竟日之中，无论那个饥饿的时候，都可拿些去吃。妇女们每日午后，将捣碎的玉蜀黍煮成汤粥，任它冷却，留到明早以招待外来的客人。他们无所谓早餐，也无所谓晚餐，他们觉到饥饿的时候，便可到屋子里面去吃。

共食的风俗，在有史以后的希腊还是存在，如所谓共同飨宴(Syssities)，不过是原始共产时代的纪念。这种古风遗在中国宗法社会方面的，有各姓宗祠、支祠以及乡社神庙举行祭祀时之各种共食习惯；遗在君主政治方面的，有各代皇帝“大脯天下”、“赐百姓以牛酒”的习惯，然此皆成为皇帝对于百姓的特别恩典。

据柏拉图弟子赫拉克立德 (Heraclide de Pont) 的记述, 这样原始的共食习惯, 在地中海克拉特岛 (Crete) 存在颇久。男子方面, 每个公民对于共食都有接受平均一份的权利; 只有行政首脑的雅康 (Archonte) 为例外, 因为雅康一个人有接受四份的权利。雅康何以有四份呢? 一份是以公民资格接受的, 一份是以共食桌上的主席资格接受的, 而其余两份是为维持食堂与家具的报酬。每一席在一个主母的特别监视之下, 由她切成一块块的食物分配与各人; 但是关于块数大小的选择, 对于在人民会议中的议士与在军队中的战士, 显然有所区别。每一席有一瓶酒, 大家轮流地饮去, 完了的时候, 又从新充满, 一直饮到精光才止。赫拉克立德不过叙述一些男子们的共食; 但是赫克 (Hoeck) 比较在他之前, 又叙述希腊多利安人各城市中的妇女与儿童也有这样共食的习惯。

据希腊历史家普鲁他克 (Plutargue 生于纪元四十五年与五十年之间) 说, 一切共同飨宴都是平等的, 他引了一些贵族的集会做例证; 凡属坐于同桌的, 一定是同氏族的人; 而斯巴达各个共同战斗的军事组织, 便编定坐在各个共同飨宴的宴会席上。野蛮人和半开化人, 一切动作都是共同去做的, 所以坐席也如临战场一样, 是以家庭、氏族和种族做排列的。

共产种族的每个人接受一份食品, 这是很尊严很必要的事, 在希腊文叫做母拉 (Moiras), 其意义就是共同飨宴的一份食品。后来这个字成为最高女神 (Destinee) 后来引申为命运与定数的意义的名字, 一切的神和男子都要服从她; 她是给人们一份生活品的神, 如克拉特分配食物给各人的主母一样。在希腊神话中 Destinee 与 Destinees 的地位是很显著的, 她们都是女

的；母拉以外又有亚萨(Aissa)与基勒斯(Keres)；母拉，亚萨，基勒斯的名称即等于说：“每人有一份生活品或捕获品。”

这样通常的共食只限于共产时代，希腊人叫黄金时代；这样的遗俗，他们便叫做神饭或圣餐(Repas des Dieux 或 Repas Religieux)。荷马那篇《奥地赛》(Odyssee)的诗，是咏特罗雅战役归途之苦况的，其中还叙述碧洛斯(Pylos)的市民举行四千五百人的共食，五百人坐一桌，一共有九桌。这样的古俗在罗马也还存在，罗马举行各大宗教的节庆时，便为全体人民陈设一些筵席于街上。赛诺芬(Xenophon 希腊三大历史家之一)也说，在雅典每年的某几日中，大杀牲畜以祭神，祭肉尽以分配于人民，而城市的耗费与牺牲是非常之大的。

共产主义的共食，后来只在宗教中保留为一种宗教的仪式，因为宗教便是太古风俗的遗物。比如雅典市民的共食，是规定在一定时期跑到元老院(Prytanee)去共同会食的，若是拒绝这种应尽的宗教义务，在法律上便要被严格的处罚。凡傍圣桌而坐的市民，便暂时穿着神圣性质的衣服。这样跑到元老院去共同会食的市民，雅典人叫做巴拉垂啖(Parasites)，就是寄食者或食客的意思。此字后来引申为游惰人之形容词，而在从前，不过是要人们保存太古风俗的一种服务。圣餐既是一种保存古风的义务，所以每每在这个城市里面用铜盘献面包，而在别个城市里面则用土瓶献面包。若违背祖先的习惯而用新盘子去献神，便为大不恭敬。这样纪念太古风俗的事情不仅在上古希腊罗马为然，即在后世欧洲加特力教的各种神祭，以及别的地方各种相类的神祭，皆为野蛮时代共产同食的纪念。

第三章 共产社会之风俗

全氏族共同住居，其中虽分为一些特别的房间而不止包含一个家庭，并且食物也分属于每个家庭的个体，然而实际上还是归全氏族处置。据加特伦(Catlin 一八三二——一八三九年旅行于北美)说：在印第安人的村落中，每个男子、女子，或小孩子，当他饥饿的时候，便有权跑进无论任何人家的住居里面去，就是族长的住居里面也可跑进去拿东西吃。即极可怜极无用的人，很懒得打猎，又很懒得自给，也可跑进任何人家的屋子里去吃东西，不过人家只给少许东西与他吃罢了。然而这一类乞食的人，假若他能打猎，人家便要给他以高价的食物，因为这是鼓励乞丐与懒惰人而启发其羞耻心的暗示。在加罗林岛的土人，旅行不需携带粮食；当他饿了的时候，便可自由跑进他所遇着的人家屋子里面去，伸手到小食桶里面拿些果子捏成的面包吃个饱；入门无须允许，出门也无须申谢。在他们看来，这不过是享用自然的权利，人人都应这样的旅行，人人都应这样的待遇过客。

原始共产主义的住居，斯巴达人出了半开化时代后，在拉塞德蒙(Lacedemone 斯巴达人的根据地)还普遍的存在过许久。据普他克说：照斯巴达第一个立法者来克哥(Lycurgue 相传为纪元前九千年斯巴达善于立法的贤主)的制度，禁止一切住居关闭门户，以便无论何人都可跑进去拿取他所需要的食品和家具，因为这些东西是没有财主的；一个斯巴达人在路上遇着一群马时，也可无须领马者的允许便骑着一匹代自己的步；一个斯巴达

人又可使用无论任何人的猎犬与奴隶。

私有财产的观念，在现在的人看来，好象是很自然的；其实，这种观念乃是慢慢的并且很困难的才浸入人类的头脑里面。人类最初不仅没有私有的观念，而且视一切东西是为一切人们存在的。赫克威尔德说：印第安人相信世界是由一大神（Grand Esprit）创造的，世界上所有一切东西是人们共同的财产。人们繁殖于地上，也如禽鸟充满于林中，并不是为少数利益的，但是为全体。一切东西是给人们一切儿童共有的，凡属呼吸于地上，生长于田野，游息于江河川泽之中的都是属于全体的，每个人都有一份的权利。在他们之中，款待宾客不算一种道德，但是是一种严格的义务。他们宁可自己饿着肚皮睡，但是对于款待来宾、病人、以及贫穷者的义务，决不能丝毫疏忽而使来宾、病人、贫穷者有所不满，因为这些人对于共同财产有取用济急的共同权利。比如家中饲养的禽鸟是要随时款待宾客的，因为禽鸟在未被捕前，本是树林中的共同财产；园蔬与玉米也是要随时供奉他们的，因为这些东西是在共同的土地上发生的，并且非由人力，但是由大神的力发生的。

博爱平等的精神，以及款待宾客之殷勤恳挚，从没有如野蛮人和半开化人的，这是许多旅行北美的游历家之共同的赞词。摩尔根说：无论何人，或是同村的居民，或是同族的人员，或是外客，在任何时间跑进伊洛葛人的家里去，家中的妇女便应立刻奉献一盘食物于客的面前。假若忽略这种义务，便是缺乏礼貌，并且是一种侮辱。奉献的食物，客若饿了，便应立即吃完，若是不饿，也应尝尝味道，然后才叫声“谢谢”。安德尔在他著的美洲印第安人之历史（Adair's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Indians）中也

说：凡不帮助人家需要的行动，印第安人视为一种大罪恶，全族的人都引以为羞。

同样的风俗，罗马历史家达西德（Tacite）在半开化的日耳曼人中也发见过，其时日耳曼人恰好跳出原始共产时代。达西德说：吾人从未见过别的民族招待宾客有这样的宽大；若客人被排斥于食灶之外，无论怎样，大家都视为罪恶；也没有人把自己用过的饮食来奉客；当接了外客的人家食物吃尽了的时候，这个屋里的主人又可领导客人到邻居的人家去，也不须邻居先来邀请，而邻居也决没有拒绝接待的，都是同样宽大的接待；他们对于款待宾客的义务是一律同等的，看人看势的区别，在日耳曼人是从不知道的。

如达西德所述之宽大博爱的风俗，在原始共产时代的人们中，是很发达的，就是在初出这个时代的人们或村落集产时代的人们中也还继续存在，只有到近世资本主义的文明时代才完全消灭。在村落集产时代，每个共同住居，都要保留一部分土地，专供来宾的使用和需要；凡属来宾即可住居一块这样的保留的土地；这种来宾的住居便叫做客房（Maison de l'hôte）。这样的事实不仅印度的集产村落如此，就是在十九世纪初叶法国的阿文义（Auvergne）和莫尔文（Morvan）地方也还存在。

第四章 土地财产最初之形态

野蛮人最初是靠果子树根为食品，到了知道吃鱼的时候，乃沿河沿海的寻生活；跑到鱼类丰富的地方，便停住在那块地方。然他们此时梦想不到要保持一块土地为他们的共同财产，因为

此时他们还不知道打猎,又不知道驯养家畜,就是保持一块土地也没有用处。

在人们发明打猎之后,才渐渐发生保持一块猎地为一个血族团体共同使用的习惯。所以共有猎地(*La propriete commune d'un tereitoire de chasse*),要算是土地财产的第一种形式。后来人口增加,使用猎地的范围也随着扩大,于是在人口稠密的地方,各种族之间,自自然然形成一种土地的分配。

土地的第一种分配是猎地的分配,第二种分配是牧场的分配;牧场的分配是随着畜牧发明的时候开始的。土地个人有的观念,是很迟并且很困难的才慢慢浸入人类的脑中。美洲乌马哈人(*Omahas*)有句俗语:“土地如水火,不是属于个人的。”土地为全种族共有的意义,不仅指全种族已有的人员,而且是指将生的人员。比如纽西兰英国政府要购买马欧利人(*Maoris*)一块土地,第一个条件是要经过全种族人员的同意;第二个条件是每个新生的马欧利人要继续接受一份偿金。因为马欧利人说:我们只能卖出我们所有的权利,但我们不能卖出我们未生的人的权利。所以英国政府只有用按年偿付(每年出世的小儿每个接受一份偿金)的方法才得免除困难。

在佛爱奇人中,各种族的猎地之交界,剩余一些宽大而不占领的空间;这种空间,据罗马恺撒(*Cesar*)的高卢战记,日尔曼人叫做交界森林(*Foret limitrophe*),而斯拉夫人则叫做保护森林(*Forot Proctetrico*),实际都是两个种族或几个种族之间的中立地带。这种中立地带,在美洲印第安人中有下列的区别:同语言的各种族(通常为亲近的或联盟的种族)之间,中立地带很狭隘;异语言的各种族之间,中立地带很宽大。

在旧大陆和新大陆的各野蛮民族与半开化民族都是一样的，凡属中立地带围绕以内的地面，便是他们的生活源泉。只有自己种族以内的人员才有自由狩猎或驯养禽兽于此地面的权利。假若一个外人跑到别个种族的地域里面去侵犯其权利，便要立被驱逐，若是捕获了，有时也有杀死的或残伤肢体的。据赫克威尔德说：印第安人若是捕获侵犯他们的人，割其鼻子或耳朵后，有时还要押送犯者到他的酋长那里去，伤其头皮，以示惩戒。所以封建时代“有土地者亦有战争”的俗话，实际上自从野蛮时代土地以共同财产的面貌出世后便开了始。侵犯猎地，乃是邻近各种族间发生口角战争的主要原因。

未占领的空地，开始是为预防侵占设立的，后来便成为各种族间物物交换的市场，邻近各种族都到这里来交换他们剩余的消费品。

到了农业发明的时候，于是各种族间由猎地和牧场的分配，又进而为农地的分配。种族或氏族的共有土地是共同耕作共同播种的。纪元前四世纪亚历山大大王时代，尼雅格(Neargue)大将，在印度某几处地方，还目击各种族对于共有土地的共同劳动及收获物之按照户口分配。摩尔根得到史蒂芬(Stephen)的报告，麦野的印第安种族，土地是共有的，劳动也是共同的。狄欧多(Diodore)也说：意大利李白里群岛(Lipari)的居民，土地是共同的财产；他们一部分在家耕作，别部分出外劫掠；后来他们虽然把大岛分了，但其余的小岛还是共有的，耕作也是共同的。这样的情形，正与恺撒所说日尔曼民族的情形相同。恺撒在他的记录中也说：日尔曼人为极强悍极好战的民族，他们没有私有的或分离的土地；他们几百郡中的每一郡，每年出一千个战士到远

处去打仗,其余的人则留存家族中共同耕田。

第五章 村落集产制

上面曾经说过,在一个氏族的共同住居中,每个结婚的妇女住于一个私用的小房间里,共同的粮食是交由妇女们保存或按照妇女人数分配,这也可说氏族共产家族里面,业已发生个人家庭的萌芽。这种萌芽的雏形,不过是在共同住居里面分成一些各别的房间,各个已婚的妇女便抚育她的儿童,和未婚的妹妹及兄弟住于这些房间里。由此家庭渐渐个人化,母亲成为各个房间的主人,而家庭的财产亦于此时开始萌芽。

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生产上的必要,每个特殊的家庭便发生分居的需要,于是不能不从氏族共有土地中分一块土地去建立新房屋;而宅地(La terra salica)的分配,遂成为家庭财产之起点。不过这样的事实,要到初步的农业发明之后才会发生。

在氏族共产社会未起分裂作用以前,一个种族的共有土地是共同耕作,共同播种,收获也是共同分配的。在既起分裂作用以后,土地虽继续为一个氏族之下的各血族团体所共有,但耕作与收获都不是全种族共同的了。此时通行的方法是:从一个氏族分离出来的各血族团体,每年将氏族共有土地分配一次,每家各耕一份,并各得一份收获;这样的方法也可叫家族换耕制。但这还不算是变成了土地私有制,不过是土地归各家使用罢了;各家的内部,生活还是共同的,人口也还是众多的。因为从一个氏族分裂出来的团体,不是仅由一对夫妇组成的,但是由几个亲近的家庭组成的;所以还是几个家庭共一住居,共一火灶,以过共

同的生活。其实便是氏族共产制随着农业的发达与需要而变形为血族集产制(La collectivisme consanguin)。

血族集产制,在俄罗斯叫做密尔(Mir),在日尔曼氏族叫做马尔克(Mark);恩格斯和梅英(Maine 他著有 Village communities in the East and the West)及其他原史学家或叫做共产家族(Communaute familiale),或叫做村落社会(Communaute de Village)……。

俄罗斯的密尔制也是行家族换耕制:土地虽为一个种族所共有,而按期均分于各家族去耕作;各家族在一定期限得专有这块土地的收益;这样的期限初为一年,继为数年,期满则再行分配。日尔曼氏族的马尔克制,是村落共有土地,并且共同劳动。据达西德的记载,也是行过家族换耕制的;土地为村落或部落全体所共有,各家族皆有平等使用收益之权;而部落即为若干村落之集合体,军事及各种公众事务,即随着这样的经济单位为组织。

在十九世纪的前半纪,关于有史以前的社会组织,世人还很不明了。自一八四七年哈截荪(Haxthausen)他是普鲁士的官吏,于一八四〇年游历俄罗斯)著的《俄罗斯乡村制度与其民族生活的内情之研究》(Etudes sur la situation interieure, la vie nationale et les institutions rurales de la Russie)出世,西欧原史学家才明了土地共有制是什么东西。接着加以穆勒尔(Maurer)的证明,有史以来日尔曼各种族莫不是从这样的社会基础发生出来的;于是影响所及,便是英国法学派的原史学家也不得不承认自印度以至爱尔兰,社会的原始形式莫不是乡村共有土地。然乡村共有土地果然是社会的原始形式吗?这个问题到摩

尔根才与以决定的解答。

自摩尔根发明氏族共产制的真相后，吾人才知村落集产制还属原始氏族共产社会所派生的形态。所以拉法格在他著的《财产历史》(Lafargue-Histoire de la Propriete)上面便给这种财产形式以血族集产制的名称以与他所从出的原始共产制相区别。但是何以见得村落集产社会是由原始共产社会派生的呢？第一，因为土地在名义上还是属于种族所共有；第二，凡属定期分得一份共有土地的各家族，莫不公认同出于一个共同的祖先。

现在请进言村落社会之实际：一村之中，凡属可耕的土地，分为许多长而狭的片段，配合几个片段为一份，每家各得一份。片段虽肥瘠不同，但各份的配合务使其均平。每家配与的耕地面积，大约等于一对牛耕两日的样子。这样尺度的单位，在印度是说两驾犁，在罗马是说两久格拉(Jugera)，实际都是等于一对牛耕两日的地积。每个村落保留一部分的公地，开始是共同耕作，后来是定期租赁。

每个村落有一个长老会议。当分配土地时，长老会议召集各家族的代表来抽签，哪家抽得哪一份便拿哪一份去耕作。这样的方法，既没有不公平的事情，也没有不满意的事情。期限满了的时候，又从新抽签再分配。犹太圣经(Levitique)说：神吩咐希伯来人，凡神所预许的土地，务必按人口比例，分配于各种族与各家族。这样分配的方法，在希腊与拉丁语叫做 Kleros et Sors，意义是说每家有一份平均的租产。如果某家所受土地有不平均时候，经长老会议审查确系丈量错误或配合错误之后，又可从保留的公地中，拿一块做加补。

凡属主持农地分配的人们，他们可惊的平等精神中含有正

确的丈量技术。据哈截荪说：俄国皇室产业大臣基塞列夫(Kisseleff)伯爵，曾于胡洛尼夏州(Woronieje)某几处地方，派一些测量师与税吏去测量，结果证明农人的丈量，除极少几处稍有差异外，其余完全正确：即就这稍微的差异而说，也还不知农人与测量师两方面究竟谁为正确？

牧场、森林、水道、渔猎区域以及其他公众使用的利益，是要保留为村落全体居民共同享用，而不得分配的。

可耕地虽皆定期分配于各家族，使得享受其收获，然地主之权仍然为村落所保留，因为村落便是各家族组成的全体。

俄罗斯一个密尔的土地，便叫“共同耕种地，其收获即分配于全密尔各家族。顿河流域的哥萨克人，他们的牧场是不分的，所以一个牧场的草是共同去割的，割了之后，才把干草来分配。一八七七年密勒(Miller)写信告摩尔根，新墨西哥大俄人(Taos印第安人之一)的村落，其中每个种族有一块共有的玉米田，其收获物则交由酋长保管，缺乏粮食的人都可去取。九世纪英国加尔(Galles)地方的法律还规定每个家庭应接受两百平方尺的地亩，但每份土地都要一律共同的耕种。

共同耕作地的收获物，有时全村居民无庸分配，便可据为共同消费之用。英国哥摩(Gomme)在他著的《村落社会》(Village Community)中，引了一个爱尔兰茂峙伯爵(Meath)的村落，这个村落共同田原的收获物便是全村用以缴付租税的。在印度某几个村落中，一定地面的收获物，是规定专门报酬铁匠牧师学校教师……之用的，因为他们是为全村居民服务。荷马的《伊利亚》(Iliade)与《奥地赛》两篇诗里面更说希腊人有为地神与军事首领保留一块神田(Champ Sacre)的习惯。苏格兰人怕恶魔作

怪，乃给恶魔保留一块土地，以表示敬礼，这块土地不叫恶魔之地而叫善人之地(Gude man's land)；凡属这样的土地，都是任其荒芜而不耕种。雅典国家所得公共土地的租金，其一部分乃是用以津贴神圣的妓院。这是古代雅典贵族们一种义务的习惯。

耕种是在长老会议或其代表的监督之下举行的，马歇尔一八〇四年，在他著的《土地财产的原理与实际》(Marchall-Elementary and practical treatise on landed property)里面说：“十八世纪英格兰的集产村落，一个家族不得随意耕种自己那份土地；应以同样的种子和同样的方法与全村落其余各家同样的播在自己的田亩上。”当土地分配终止的时候，每个家族不过具有一块使用的地面；地内发现了宝库的时候，不能归自己所有，必须呈送于村落；五金与煤炭也是一样的，要得这种东西使用的人，只有靠自己的劳力，在地面上打洞去掘取。

耕作制度，普通都是采用换耕法，有三换的地亩，也有四换的地亩。凡村落可耕的土地，大要分为均平的三部分，使这三部分土地可以更替的耕种；比如第一部分可在冬季种小麦，第二部分可在夏季种大麦或燕麦；而第三年则任这两部分土地休耕以养地力，而耕种其第三部分。

播种与收获的时日，都要由长老会议规定。据英国刚培尔(Sir G. Campbell)的报告，印度每个村落有一个占星师，专门担任指示播种及收获的吉祥日期。哈截荪也记载俄罗斯集产村落的田野劳动具有极完备的秩序，仿佛象军队的纪律一般。当耕种或收获的时候，全村落的农人都同日同时去工作，这部分耕，别部分锄……，工作完了，然后共同回去。哈截荪说：“这种

规律，不是村落的长老命定的，乃是表现俄罗斯民族精神的特性，需要联合与共同秩序的社会性之结果。”这种特性，未免惊骇了普鲁士的哈截荪，他以为这是俄罗斯民族特别不同的地方；其实，这样的特性乃是集产制赋与的，凡属同样历程的地方，到处都可以发见，比如日尔曼各民族即经过同样的历程，不久便由穆勒尔证明了。

自来欧洲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于财产的研究，绝没有历史的观念，他们以为私有财产是与天地相终始的，故对于原始共产制或集产制皆目为海外奇谈。自哈截荪的发见公布后，他们对于集产制才不再怀疑。然哈截荪自己并不知道他的发见在历史的见地上之重要；他以为密尔是圣西门乌托邦（Utopies saint-Simoniennes）的实现。故不久巴古宁（Bakounine）及其学徒便热烈的宣传斯拉夫为引导人类向进步方面走的特殊种族；并预言密尔是将来社会的模范。

在哈截荪以前，英国印度的官吏们，在他们所管理的地方即已发见这种特殊的财产形式，不过他们的发见埋没于一些官场的报告之中，而不能公布。自从学术界提出这问题争论后，才有人考证十八世纪末，大它西（Grand d'Aussy）福尔尼（Valney）等即已认识集产制，不过到资本制度统治欧洲以后，这种过去的制度才为人所忘记而成为海外奇谈。

村落社会共同劳动的纪律，常常使近世学者闻之惊骇：大名鼎鼎的梅英，他是印度英政府的法律顾问，他对于印度的集产村落颇有研究。他说：“长老会议绝不要发号施令，他仅只宣告历来的习惯便是；所以他不须有世人所相信的最高势力发出的告示。凡极有权力来说这桩事情的人们，莫不否认印度土人需要

一种政治的或神的权威为他们的习惯基础，只有盲从可视为他们太古风俗的充分理由。”其实，这并不是“盲从”，乃是自然界所加于半开化人的强制道德，因为若不具有这种纪律，他们共同劳动的效率必至低减，而一年的食粮必不充足。

收获完工之后，各家族分配的土地又复成为共同的财产；全村落的居民都可放出他们的牲畜到这共同的田野中去吃草。这样的习惯，便是在经过几千年采用私有土地制的民族中，也还有保留的。

土地原来不过分配于各家长，这些家长便是最先占领这土地的祖先之后裔；所以村落的每口人丁都应认识并证实他的来源。在印度某几个集产村落中，专门有一班人员掌理其种族的谱系；他们对于祖先全体的名称能一气数出，不遗忘一个。上古雅典家族的登记，也是一件极小心极严重的事体，倘若谱系中登入一个不属本族的合法儿子，便要蒙严格的处罚。这样的事情，到了宗法社会更严格。

第六章 秘鲁及印度之村落社会

上面所说的，不过是概举一些已知的村落情形，以为血族集产社会的完全模型。这样完全的模型，只可视为长期存在和长期演进的结果，决不是各民族集产村落初形成时便骤然达到了这样的境界。现在试述一低级形态的村落社会以为例证：

秘鲁在被征服的时候，土著的印加人(Incas)是原来统治秘鲁的种族，他们初入村落集产的阶段。他们土地的三分之二名义上都是属于太阳神，其实便是印加人的共同财产。住在村落

里面的各家族，每年在耕种以前接受分地，他们是共同为太阳神的土地耕种的。一切收获物，经过祭祀用费之后，由印加人公众管理，以为普通一般的公益及全体居民之用；分配标准是以他们的需要为原则的。丰富的骆驼毛与种满各大平原的棉花，也是一样分配的，每个家族全体人员要几多材料做衣穿，便可充分的取得几多。他们的共同劳动是很有快乐的社会情趣的：农事开工的时候，每日黎明便有人站在高岗的塔子上召集全村的居民；然后男男女女并且携带一些穿花衣的小孩子跑跑去，一群一群的共同工作；一面还要高唱颂祝印加族的山歌。

印加人对于共同土地的耕种，以及收获物的管理，比从欧洲出来的文明西班牙人要完善得多。西班牙的移民，大都是些间日而食的穷鬼、乞丐、娼妓、盗贼……如此等等的文明人竟纷纷不绝的在一块仓廩充实（贮着丰富的玉米子），没有穷鬼乞丐娼妓盗贼的“野蛮”地方登岸！登岸之后，用炮火破坏印加人的天国而变成为文明人的殖民地，然后文明人还要口口声声宣传印加人的“凶恶”和“野蛮”！美国历史家普勒斯哥（Prescott他著有History of the conquest of peru）曾得一个征服秘鲁的兵士李奇斯曼（Lojcsmn）的记录，据说印加人是很善治理的民族，其中没有盗贼，没有怠惰者，没有嫖客。也没有卖淫妇……。山林矿山牧场猎地以及一切财产都管理得很智慧，并分配得很智慧，他们各得一份使用的财产，绝不知道怕人偷窃，他们之间也绝不有口角的事体；他们看见西班牙人的住居常关门闭户或加以锁钥，他们只以为西班牙人是怕印加人杀害，他们绝想不到是防偷窃；假若他们发见西班牙人中有盗贼或引诱妇女之男子，他们对于西班牙人便看不起。

秘鲁共产天国的各种公众工程的废址，也如古代共产的埃及遗下来的废址一样，能使近世的艺术工程师惊叹不置。横贯孔第绥县(Condesuyu)的水道，有六至八个基罗米突长，用以帮助自然的湖泽及山中的贮水池以引水。从基多(Quito)至居斯哥(Cusco)的通路，长约二千五百至三千基罗米突，每距十五基罗米突有些堡垒及用极大直径的石墙包围的军事草棚。道路宽约七尺，上面铺以大石，某几处曾覆盖一种极坚硬的西门汀土。在一个万山之中的地方，许多的瀑布与深谷上面都架有木桥。亨博乐(Humboldt)在十九世纪初年游过秘鲁，对于印加人的各种工程发了下列的赞叹：“这样大石头镶成的道路，很可与我在意大利法兰西西班牙看见的罗马道路比美，……印加人的道路是极有用的工程，同时也是人力做出的极伟大的工程。”然而这种伟大的工程竟是不知使用铁器，和还没具有家畜的共产民族完成的。

此外我们更看外力高压下面的印度村落社会：据英国印度总督梅特加夫(Metcalf)一八三二年的报告，各村落社会都是一些小共和国，他们都能生产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几乎完全脱离外界而独立。无论朝代怎样变换，革命怎样频仍(如 Hindous, Patans, Mogals, Mahratta, Sicks 和英国人轮流为他们的主人)，但村落社会还是常常一样的。到了危乱的时候，他们也武装起来，并筑堡自卫；但敌人的军队如果要横过国境，他们只好收集家畜关于屋子里面，让敌军过去，以免招惹。假若敌军对于他们大肆劫掠，而其势力又不可抵抗时，他们便远天远地的逃走，或跑到别的村落去避难；等着劫掠经过了，他们又复跑回家来。然若惨剧连续几个年头，把他们的地方破坏不堪居住了，全村人民

只有散亡在外；但一旦可以居住的时候，他们便要立刻归去的。子孙归去复占了祖先的田地，那末，村落一切情形又要恢复如从前一样。这样的迁徙很不是容易的事，他们常常要坚持久长的岁月，经过各种的危险与扰乱，才得制胜敌人的劫掠与压迫。梅特加夫更忧闷的叹息道：“这样外部的打击倒还无伤，只有我们的法律与法庭却容易破坏这些村落社会！”

俄罗斯的村落也都是独立自主的；他们都能在自己的村落里面生产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以自给；他们之间，不过在一种很不完全的状态下发生一点关系。有时似乎有点联合，也常常容易被俄政府所压息。印度也是一样的，英国只用五万人的军队便统治了一块比俄罗斯人民更多的广大土地；印度各村落之间因为没有联合，所以不能有丝毫的抵抗力。

第七章 村落社会在中国之遗迹

村落集产社会不仅为母权到父权，半开化到文明的过渡，而且横亘在各开化民族中的宗法社会也是由她产出的。因而她的遗迹在最老的宗法社会或封建社会里面，每每可以为长期的残存。不仅在俄罗斯如此，在中国也还有其遗迹。

原始母权氏族的共产社会，在中国久已淹没无痕迹了，独村落集产社会的痕迹还多少可耐寻索：不仅“张家村”“李家村”等现在还遍存于各地，而所谓三代以上的“井田制”及以后模仿或梦想井田制而发生的“授田”“均田”“班田”“限田”等制度与学说莫不为远古集产制度之遗影。相传一块井田为九百亩，中为公田，以其余八百亩分配于八家，每家得一百亩，即所谓“一夫

百亩”。“夫”就是指已婚成家的家长；授田年龄，以三十娶妻成家者为合格，到了六十岁又要将所授土地复返于公，而不得买卖或私相授受；然地有肥瘠，有的年年可以耕种，有的要休一年或二年才得再耕种，故周礼说：不易之家地百亩，一易之地二百亩，再易之地三百亩（郑司农注：不易之家，岁种之，故家百亩；一易之地休一岁，地薄，故家二百亩；再易之地休二岁后种，故家三百亩）。在村落或部落时代，土地主权属于村落或部落所共有；后来政治统一，遂集中于统治者天子诸侯之手，又由他们的手以再分配于人民，故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之言。“王”一面为统治权的代表，一面又为领土主权所属的代表。耕地分配之外，又有宅地的分配，各家皆得宅地五亩；耕地须按期缴还于公，宅地则许其永业，至于山林川泽以及牧地，则概由公家保留。

此外，还有所谓“籍田”与“园囿”。相传籍田是为天子躬亲农事而设的，地面有千亩之多；实际则为统治者保留从前村落集产时代共同耕种的纪念。故到了每年举行籍田典礼的时候：

由掌理观察天时的大史（即印度村落占星师之变相）择定一个吉祥的时日，先几日通告掌理稼穡的后稷，

后稷据以通告于王，王乃使司徒遍告公卿百官庶民，

司徒即设坛于籍田上面，并饬大夫们都准备那一日的农具与用品；

先五日，又有一个什么瞽师报告有一种和协的风发起来了，于是王即斋戒沐浴，百官也跟着他吃斋，

斋戒三日，乃举行一种简单的农品（什么鬯与醴）祭典，百官庶民都跟着王去祭；

到了籍田这一日，后稷出来监工（在村落时代是长老监

工),膳夫与农正陈设籍礼,大史引导王亲耕;

王耕一壟土,各级官吏递加三倍,然后庶民把一千亩都耕完;

耕完之后,后稷省察王及百官的工程,大史做监督;

司徒省察庶民的工程,大师做监督;

这样省察完毕,然后宰夫陈餐,膳宰做监督:各级官吏次第吃一点;

最后庶民大吃特吃,把所陈的饭菜一概吃完(参看国语虢公谏周宣王不籍千亩)。

这样一出籍田的喜剧,完全是一副村落集产时代共同耕种的遗影,所不同的,不过涂饰一点封建的礼文与点缀罢了。

狩猎为野蛮时代生产方法,园圃为半开化中期的发明,及农业发达二者都成为副业。中国古代帝王于籍田之外,又设园设圃以存太古之遗习,其后则完全变成为游乐场所而忘其本。在周朝的时候,圃中豢养禽兽,以供习田猎并备军国之用。相传文王之圃方七十里,是向人民公开的,其后齐宣王有四十里之圃,则已成为他独乐的场所(见《孟子》)可见帝王诸侯的园圃也同籍田一样,都是太古遗下来的痕迹。

第八章 宗法家族与集合财产之性质

据科凡来甫斯基(Kovalevsky著有《Tableau des origines et de l'évolution de la famille et de la propriété》)在斯拉夫民族中研究的结果,宗法家族是从集产村落派生出来的;她也是几个家庭的集合体;她的命运与财产的集合形式有密切的关系,因

为财产的集合便是宗法家族存在的主要条件。

家族与财产是以同一步骤演进的：就家族方面说：最初，氏族是全体人员的共同家庭；久之，氏族分成为几个母权家族；复次又分成为几个父权家族。父权家族还是几个家庭的集合体，所以也可称做父权氏族；最后，父权家族又分成为一些个体的家庭。就财产方面说：氏族共同的财产分成几个母权或父权家族的集合财产，又由集合财产变成为一个或几个个体家庭独占的宗法家族的私产。可见两者演进的步骤完全是相同的。

上古一切社会，莫不承认财产在家族地位之重要。比如在斯巴达，若是一个公民丧失了家族的财产，或减少了家庭的财产，而不能供公共衣食的消费时，这个人便排除于惟一具有政权的贵族阶级之外。雅典人的国家对于家族财产的管理也很注意的监督；凡属公民皆有要求干涉或禁止不善管理家产的家长之权。家族集合的产业，既不属于家长，也不属于存在的人员，但是属于子子孙孙永续不死的家族集合体；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家族财产都是这集合体的。然而这集合体属谁呢？属于他们的祖先。所以每个家族的厅堂中都有他们祖先的祭台、神主或坟墓。生存的人们虽为实权的享受者，但其职务在担任继续祖先的遗产，和维持祖业的繁盛以传于后人。

房屋是家族财产的中心。雅典的法律，只准卖土地，而禁止卖房屋。土地的财产是不可让与的，既不由家族人员瓜分，也不能拿出家族以外，只能代代相传于男性的后裔。希腊习惯：父若不将财产遗与男儿时，女可为相续的人的过渡，然后与父的一个亲族结婚，使这个男子成为正式的相续人。佛兰克人及其他日尔曼人的法律也说：“假若死者不遗财产于其子，则银子和奴隶

属于女，而土地则属于父系的近亲和后裔。”

管理家产的家长，有时是被选举的。他应好好监督耕种的执行和房屋的维持，务使能供给家族全体人员的需要；并且要常常想到他将来对于后任家长打移交时，务必使财产如他接受于前任一样的繁盛。为的要完成这些责任，便应赋他一种专制的权威；所以他不仅是立法者，又是裁判官与刽子手；凡属在他命令下面的个体，都可由他裁判、处罚、或惩戒；他的权力一直到可以卖出儿童们为奴隶，和对于隶属者处以死刑，——包括他的妻在里面。

每个家族授田多少，通常是以组成她的人口数目做比例的。家长要想增加土地，便要先设法子增加其人口的数目；于是便发生早婚的习惯，使其幼年儿童娶一些壮年女子做家庭的奴婢。据哈截荪的报告，他在俄罗斯各村落里面，常常看见一些高大强壮的少年妇女，抱着小丈夫在她们的腕中。

此处可借用一句普通的成语：“国之本在家”。这句成语在从前一般道德家和政治家用之早已不甚正确；而在我们用之，确可为集产发达到一定时代的真实表词。凡建立在集产基础上面的村落，俨然是一个独立自给的小国家。由各家长（都是平权的）组织的长老会议就是他的政府。比如俄罗斯的农人，生死于他的村落之中，凡属村落以外的东西，于他都没有关系；所以密尔的字义在我们译作村落，在他们便视为“世界”。印度村落社会的财产制和分工，在还没有受英国的统治及“文明国”征税制度的破坏影响时，已达于充分发展的地步。印第安人中虽然也有分工，但比较印度人的低得多。印度每个村落具有一些公众服务的人员；如各种各色的匠人（造车匠、织匠、裁缝匠、挑水者、

洗衣者，……)，在沙子上画字的教书先生、给每个家族登记种源与苗裔的修谱先生、预言播种与收获时日的占星师、给全村居民看守畜群的牧人、掌理宗教的婆罗门僧侣以及为各种族宗教祭祀跳舞的舞女；这些人员都是以村落的公费维持其生活，他们只应给土着的各家族尽义务，而不应给从新建成村落的外人服务。据刚培尔说，各种奇怪事情中之最可注意的，便是铁匠及其余某几种匠人的报酬多过于司祭的人员。

此外每个村落还有一个或几个首领及许多职员，有的是管理本村落各种关系及与外界之关系的，有的是管理犯罪和侵犯事务的，有的是管理招待旅客之义务的，有的是保护田野，测量土地的，有的是看管灌溉预防水旱的，这些人员，也都是以村落的公费维持其生活的。村落的首领，是以他的能力、知识、管理的才干以及善使魔术等资格被选举的。他是共同产业的保管者，购入自己村落中一切不能制造的各种用品，及卖出自己的剩余物品。

第九章 土地私有财产之起源

充野蛮人与半开化人的逻辑精神，纵多只能想象到自己所制造的物件和自己所常要使用而不能离身的物件为个人的财产；但是决不能想象到自己所不能制造和自己年年只能在共同家族中使用的一部分土地会成为个人的财产。所以土地私有的观念，在人类的脑中，原来是很难贯入的，除了经过长久的岁月，迂回曲折的浸渍。

用篱笆围着，和用人力开辟的土地，并不是土地私有的发

端；认此为土地私有的发端，不过是卢梭的感情学说。我们要找土地私有的起源，最初只能找出一种“宅地”的分配。因为房屋可以为构造的人或住居的人之所有，所以宅地也被视为一种动产。在中国井田制时代，宅田也准许个人永远使用，而不复返于公。在许多野蛮人和半开化人中，房屋与其他动产（如武器、装饰品、衣服及其所宠爱的牲畜等），是随着死者而焚化的。英国极古的法律，和法国以及其他地方的习惯，都把房屋列入动产之中。

房屋是家庭的中心。家庭是不可侵犯的，所以房屋也是不可侵犯的。即在原来住居的家族丧失退出其房屋之后，房屋还是永远保持不可侵犯的权利。各社会中的公民可以被捕，可以监禁，也可因负债而卖为奴隶，但房屋是始终不可侵犯的。人们不得家长许可，不能擅自跑到人家的房屋里面去。原始的人们无所谓正义，无所谓裁判；正义裁判之始——始于各个家屋的大门；假若是一个犯了罪的人，便拒绝其跨过大门的门限；若是罪人触动了大门的插锁，便是犯了社会公诉的重罪；要免避这重罪，只有逃到其父亲的领域里面去，因为父在自己的地域以内，有立法兼行政的威权。纪元前一六八年罗马一个犯了死刑的元老，和几个酒醉的罗马妇人，犯了扰乱公众安宁和道德的罪过，官厅只有将逮捕的职务要求各家长去执行；因为妇女住居家中，除家长的权威外，国家的法律是不能及于她们的。家屋之不可侵犯，在罗马已达到这样的地步；任何罗马人都不能要求法官和公众势力，跑到人家去逮捕一个抗命的犯人。

村落社会各家族的房屋不是相联的，但是孤立的，并且每个房屋包围一带土地。据达西德及以后许多历史家说，这种孤立是半开化人预防火灾的方法，因为各个住居通常都是用树枝与茅

草盖搭的。但这种很普遍的习惯，不是这样的理由可以说明的。野蛮民族和半开化民族的猎地莫不剩余一些中立地带为界限；各个独立的邻居之间，剩余一些不占领的空间，当然也是同一理由。这些包围每个住居的土地，后来遂同着房屋宣布为私有财产。

各个独立的住居，开始是用篱笆围着，复次才用岩石筑成墙围。墙围以内，在半开化人的习惯法，叫做法定的家屋围绕地（*Curtis legalis*, 或 *Hoba legitima*）。在罗马十二铜版律中，邻近各个独立住居的距离是必须审定的：城市房屋的距离则规定为二尺半（铜版律第七版，第一条）；不仅一切住居是独立的，每个家族的每块土地也是独立的。这可证明决不是为预防火灾了。铜版律第七版第四条又规定：各家田原之间，应空五尺宽的地带以为界线而不耕种。

第十章 集合财产之分裂

集合的财产，是由氏族共产起分裂作用时产生的。当半开化时代到了尽头的时候，这种分裂作用又轮到了集合财产的本身：包括众多家庭的大家族渐渐的解体，集合的财产也渐渐的分成为个人的财产了。

氏族与村落两种不动产的继续分裂，都是由动产的事实限定的。动产为转移不动产的积极原动力，不仅过去如此，现在也是一样的。

不动产的个人化，不过随着动产的个人化才发生；动产的性质，是天然的准备个人化的。当氏族共产社会起分裂作用时，各

家主母从共同住居中携带几件动产(如家具、构屋木料、牲畜等)分离出去,各立门户,建筑新住居;纵然她们的建筑是很幼稚的,然而我们从此已可看出动产在实际上即已如此重要。房屋下面的土地,隐约之间,便已具有个人财产的性质,因为房屋与土地是不可分离的。房屋所在的地方,这种性质自然容易扩张到周围屋宇的一带土地。由此每个家庭随着房屋的建筑而建筑了家庭的财产,其势是很顺易的。集产家族发达到恰当程度,自然又要分裂为几个大家庭,而各家庭自然又要瓜分集合的财产以自膨胀。

这种膨胀,借着动产的增殖而益迅速。凡位置适宜的村落便于商业的发展,因而动产愈益繁殖。这样一来,村落中各家族之间的平等便破坏了:这几家日看日穷,日看日负债;而别几家日看日富,并运用其财富势力以图吞并集合的土地。凡不能还债的各家族,其土地遂次第落于横领者之手。

财富的功用,在集产的本身也是一样的觉得。起初,一切财产都是共有,家族中没有谁人具有个人的财产,也只有使用的东西才成为个人的所有品。在印度各集产村落中,钱币不用以做任何的买卖,但用以做装饰品,把他缝在衣服上面;无论任何人获得的东西都属于全家族。但是到了动产增加的时候,人们的心理便要大起变化。斯拉夫人有一句俗话说:“我们应当把母牛引到外面去走走,因为她日日贴在分娩的栏里面!”这句话的意义是:要使个人得发财便应与集合的家族分家,也如要使母牛分娩得快,便应引她出去走一走。

动产的来源,开始不外两端:一是劫掠,一是战争。战利品(*peculium castrense*),在罗马人的习惯,是归个人有的第一种

动产；斯拉夫族各国也是一样的。男子由动产的权威在家族的不动产上发生特权，而排除女子于财产地位之外；女子出嫁于别家族时，至多只能得一点“嫁奁”。掠夺品或战利品是有出息的，故由此又可派生一种准战利品(Peculium quaoi castrense)。准战利品怎样产生的呢？一是高利借贷；一是经营商业。商业的范围，开始是很狭小的，至此遂渐渐的扩张，以至可以贩卖牲畜、宝石、金银、奴隶及不动产。因此集产家族的各家庭与个人之间，随着财富而渐渐发生不平等的阶级，一个阶级是贫人，别的阶级是富人；家族的调和遂从此破坏了。每个家庭为谋个人的利益，有时甚至反对别个家庭的利益；所以集合的家族卒至于解体而建立个人的家庭。这样的家庭初建立的时候，我们便可完全清楚他的性质和内容了。

在那些不成为商业中心或流动财富的中心之各村落，是要慢慢地才能达他的极点。在这样的情形中，假若不为外来的打击所摇动，好象这种财产形式很能永续几个世纪。因为实际，集产社会的本身就是整个的经济单位：在她的内部可以生产自身一切需要的物品，以供全体人员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这样自给的社会，假若其中产生扰乱调和的因数（也可说是革命的因数，如以上所说各种动产）很少，尽可将很宝贵的祖业一代传一代的维持下去。并且当这种村落社会其农业与工业发达到恰当程度的时候，她很能供给居民不多欲望不大的各种简单的需要，在她的本身中似乎再也找不出进化的因数了，只有来了外界的接触才能使她再向前进。专制政府与资本帝国主义好象是专门担任这种工作的。“沙”之于俄罗斯，英之于印度，便是著例。所以他们可算是村落社会之最后的破坏者，如印度各村落

社会，骤然遇着“文明国家”严重的财政负担，大商人、大银行家等可怕的剥削，怎得不破产解体呢？

以上所说集产社会崩溃之原因，偏于动产支配不动产之一点。现在更从别一方面来说：农业进步的结果，也可自自然然引起集合财产的分裂。第一是铁器完成，各个劳动者渐渐认识一己之力量，因而共同劳动渐渐解体而发生孤立劳动之趋势；这种孤立劳动在以前是不足有为而必须纳入共同劳动中才有作用的。第二是耕种方法进步，使农产品丰富到发现于各市场的时候，耕种者自自然然发生这样的企想：延长其分配土地的年限，因为他们在所得分配土地中，既加了许多人工，又下了许多肥料，所以他们不得不想要收获这些劳动与肥料的利益；最初是要求将分配年限延长两年三年，复次是七年以至二十年。这样一来，一个种族的全部份或一部份的分配土地，由长久的期限，卒至可以成为各家庭久假不归的财产了。

第十一章 动产之发达

在野蛮时代，雏形的动产是很少的，如拷火石、武器、渔猎工具、小船、极简单的家具等，开始皆视为共同财产，也如一切获物及土地谷物之为氏族之共同财产一样。

在半开化的各种族中，畜群、宝石、贵金属等动产虽然逐渐增加，然共产制也还依然存在。然而这些东西卒致促成人类第一次可怕的大革命，剥夺妇女在社会中的最高地位，使不自觉的男子高蹈在原始共产制和血族集产制的废址上面而建立私有财产制的文明社会。

在原始共产社会中，农业与工业是很幼稚的，所以找不出奴隶的地位。战俘大都是置之于死地，只有氏族中发见劳动不够或战士减少时，才采用收容的方法。及土地开辟，家畜与工业进步，才开始采用奴隶制：为经济的利益而保留战俘，并使之调供各种生活上的需要而从事于各种劳动。战争，原来不过为各种族间争夺或防守猎地而偶发，至此遂成为增加各种动产和掠夺畜群奴隶谷物以及贵重金属的直捷方法。半开化高期的战士与猎夫，类皆厌恶劳动；他们要规避艰苦的农业劳动，便专门努力于劫抢和战争，遂现出劫掠事业为增殖动产之习用途径。

前史时期的希腊，强盗们是异常大胆异常发达的，他们沿着地中海各岸打劫，劫得货物，便携着回来藏于城墙之最高处；希腊沿海各城墙上面的强盗窠，正如岩石上面的鹰巢一样。希腊英雄歌中，有一段很好的东西，足以使我们知道半开化高期战士的生活：

英雄歌：

我有长枪和利剑，
并且还有盾，
把我的胸膛做战垒，
为的要发财！
我用这些东西耕，
我用这些东西获，
我用这些东西制造甜蜜蜜的葡萄酒，
我用这些东西使奴隶们——
叫我做领主！
并且还要使那些不敢荷枪带盾的人们——

跪在我的面前如跪在主人面前一样，

我还要使他们叫我做大酋长！

又有一个英雄歌，是芬诺人(Finnois)的叙事诗，也是一样的腔调：

我的黄金和月亮一样的老，

我的白银与太阳同年；

他们都是从战场中勇敢夺来的。

从战争中得来的一片小钱，

比由犁头翻出的——

一切金与银，

价值大得远！

陆地上和海面上的劫掠，在半开化高期的民族中，占极优越的地位。纵然他们一面从事农业，一面还是做强盗。据恺撒的记载，日耳曼各民族每年留一部份战士在家里耕田，遣一部份战士出去劫掠；远征队回来了，耕田队又出去，两部分人年年都是这样互相轮流。至于战利品的处分，最初都是分配于全体，因为留在本地的人也是为大家而耕作；所以他们全体，在农业与劫掠业中，还是共产主义者。然而这样的共产主义，后来卒致消灭了；但劫掠业还是永续存在，——到近世资本帝国主义的国家而达于极点。私产制充分发达的雅典人，还保持他们从来劫掠的风俗；大贤梭伦执政的时候，还维持雅典一些的劫掠团体。据都昔第(Thucydide 希腊三大历史家之一，纪元前四六〇——三九五年)说：“凡属长老，对于劫掠事业，绝不为羞耻”；而近世资本帝国主义的国家，亦以掠夺殖民地和弱小民族为莫大之荣誉！

文明初期的英雄们遍布于地中海沿岸各处。他们不仅劫掠

畜牲、谷物以及各种动产，而且劫掠男子和女子，做他们的奴隶。最初奴隶是共同财产，土地也还是共同财产，在后才起瓜分。克拉特岛在亚里士多德(Aristote)时代，还有些共同奴隶的群众，叫做诺慈(Mnotx)，为公共产业做耕种的工作，其收获则供全体公民之用。希腊共分奴隶为两阶级：其一为公共奴隶，(Koineodouleia)，属于国家；其一为私有的奴隶(Klarotes)，属于各个贵族的家庭。雅典也有许多公共奴隶，其职务不是耕种土地，但是做刽子手、警察、一切行政机关的下级属员或听差等等。公共奴隶，在印度也可发见；印度可说是过去种种习惯的大陈列所。贺吉森(Hadyson)在他著的《亚细亚社会记》(Transactims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一八三〇年出版)里面说，建立在马德拉(Madras)西北四十五基罗米突地方的村落，其中的居民关于他们一切的农业劳动，都有奴隶们帮着做，这些奴隶是他们的共有财产。这些奴隶，一部分是贩卖来的，一部分是由没收抵押品来的。贫的家族，原先以共同土地做抵押品，向富的家族借贷，等到土地被没收时，附着于土地的人们也随着没收为奴隶了。

第十二章 封建财产之起源及其性质

封建的财产(La propriete feodale)有两种形式：一是不动产，如田庄采地第宅等，封建派叫做附身财产(Corporelle)；一是动产，如年役徭役什一税及各种赋金等，封建派叫做非附身财产(Incorporelle)。

封建的财产是从集产村落社会产生出来的；她发达到一定

的程度，便毁损了村落社会而形成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并且由此演进几百年之后才达到个人财产的真正形式，——即资产阶级的财产 (*La propriété bourgeoise*)。所以封建的财产乃是上古血族集合财产和近世个人私有财产间的摆渡。

在一切封建时代中，地主对于农奴们所附着的地财产并不能如近世资本家对于其资本财产一样，具有独立自由的使用权和享用权。土地不仅不能由封君买卖，而且是农奴们的代理相续人；地主对于土地只能按照习惯和法律相传授，此外绝不容许其有违犯旧习之余地。封君不仅对于上层阶级要履行各种义务，对于下层阶级也要履行各种义务。

怎样说封建的财产是从集产村落社会产生出来的呢？当承平而未发生继续不停的战争或外族入侵的时候，村落社会的生活是很平静而很平等的，首领(或酋长)与居民并没有什么区别。但战争不停的发生，则上述状况逐渐破坏；前此平淡无奇的族长地位至此便要变成赋有许多必要特权的军事首领，村中居民不能不集中势力于其首领的保护与征调之下，由此徭役(如掘战壕，筑城垒……)赋税等必要服务随之而生，久而久之，便成为普遍的社会制度。至其详情，余将于第三篇述之。

封建财产之下，又派生一种教会财产 (*La propriété ecclésiastique*)。教会财产的起源是伴着封建财产而来的。当维护封建制度的无形武器——基督教——发展到恰当的时候，他便广开天堂以接受农民的土地与物质之贡献，而给农民以教会权威之保护，以对抗虐待农人之封君和诸侯。

今将封建财产之要项，分条述之于下：

徭役 (*Corvée*)。——部落酋长还未成为军事首领的时候，

他也是一个平常的居民，从本村中接受一份耕地；后来因为外敌压境，他的土地只有交给全村居民替他耕作，而自己专门担任防守的职务，并且渐渐变成为封君。据哈截荪的报告，俄罗斯每个村落的土地，封君只领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交由全村居民去耕种。

当封君和教会的产业扩张时，他们所具有的农奴还不足以耕种其土地，则只有交给自由的农人村落去耕种。耕种者无论是自由人或农奴，他们对于封君的劳动时间是有定的：大部分劳力是耕种封君给与的自己的土地；小部分劳力是耕种封君领有其收获的土地。

在商品生产与商业还未发达时，封君与农人成为自己供给一切需要的制造家。封君的宫殿和教堂里面都设有制造一切需要品（自武器农具以至衣服等）的工厂。农人和他们的妻女，每年都要在这些工厂里面做一定日数的工作。妇女的工厂由宫娥管理，并取名为奇尼西亚（Gynecia）。教会里面也有同样的女工厂。这些女工厂不久便变成为封君牧师及其臣仆的公娼室。奇尼西亚的名词简直与卖淫同其意义。

家臣与自由农给封君耕作的劳动时间，开始是很少的：某几处地方，每年不过三日；有几个王国也不过规定每年十二日。农奴的徭役虽然比较繁重，然每个星期通常亦不过三日。农奴得享用封君一部分土地，只要不被驱逐；此外对于封君的收获和牧场皆占有一部分的权利。

收获之宣告（Bans de Moisson）——集产村落社会之劳动纪律，以上既已说过，收获和播种的日期是由长老会议规定的。这种习惯，在封建社会里面还是保留，不过其权限由长老会议而

移于封君。一切谷物、小麦、牧草、葡萄园的收获，皆须由封君宣布时日。这不仅是一种形式，乃是一种经济上的利害关系：比如某个封君要使他的收获早于邻近各村落的收获而在市场上占优势，则他的播种与收获的宣告，都要早于别的地主。

公用租借(Banalite)，——前面已经说过，在集产村落里面，有些职务是由公众设置并由公费维持：比如牧人和匠人等皆由全村雇用；而公共熔铁炉、屠场、手磨、兽栏等都是共同使用的。这种习惯，在封建社会还是保存；所以公用租借制也还带有原始共产制的意义。这种制度也是建立在经济的必要上面的：比如为减少燃料计，所以设立公用面包灶，使每个家庭不要另起炉火。维持并看管这公用面包灶的责任，以前是属于长老会议，以后是属于封君。凡使用这公共面包灶的，都要征收少许的税额：照一二二三年勒姆(Reime)总教主的法令，凡每灶烤三十二个面包的，应缴纳一个面包做租税。照阿奇斯(Boucher d'Argis)所引一五六三和一六七三年的法令，凡使用公用手磨的，缴纳其所磨小麦十六分之一与十三分之一。然而这样的制度很能阻碍商业和个人营业的发达，所以只有在商品生产还未发达的时代才能存在。一七八九，法兰西资产阶级的革命后，便正式宣布废除这些封建制度的束缚了。

教堂(L'Eglise)。——凡被乡村人民所供养与爱戴的牧师，他们与人民之间建立一种密切的关系，造出许多仪式与宣传的方法以系人民的感情，并且帮助人民以对抗封君。牧师与人民间的联合，显然足以表示教堂所具有的性质。教堂本来是牧师、封君和农人的共同财产；不过后来才成为教会专有的财产，除却祷告时间以外，便关门闭户不许人民进去。中世纪教堂上面的

钟楼，本是专为农人预防火灾，警告劫掠，及召集会议之用的；所以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法兰西的司法文库里面，常常发见农人控告教堂不许其使用钟楼的案卷。

什一税 (La dime)。——什一税是教区居民付给教士的工钱；她同各种封建的赋税都是用农产品缴付的。这种税的轻重，是以收获的丰歉为比例。资产阶级革命后，这种税由教会移于国家，而叫做租税 (impote)；无论收获的好歹，租税的征收是一样的，这是租税与什一税不同的地方。

这种帮助教会的什一税，原先本是随意的；但后来成为一种强迫的义务。所以封建时代的俗语说：土地没有了，什一税和负担也没有了。什一税一经成为官式的权利之后，世俗的封君也征收起来，于是农人的负担增加两倍。

封建制度发达到一定程度，封君对于他的家臣，自由农和农奴便停止其保护地位而居压迫地位；对于人民强征暴敛，以扩大其封建的财产。如英格兰和苏兰格的封君，用野蛮敏捷的手段，把乡村农人的土地没收得干干净净（参看马克思《资本论》二十七章）。这个时候，封建诸侯已成为破坏共同财产的蠢贼，与从前的性质完全相反。

封建贵族霸占村落的土地常常使用种种的方法：他们或托词于农人占有土地不合于他们的财产名义；或主张变更财产的权利而没收土地上一切剩余的利益；或用暴力破坏以前的契约，而使农人从此以后不得具有土地。

然封建财产的特性，始终不是自由的和个人的，但是家族的；所以既不能买也不能卖，每代封君只有实际享受其利益而担负遗传于其后嗣之责任。教会财产的性质也是一样的，虽然不

是属于世俗的家族，却是属于加特力教的大家族（贫人、牧师、尼姑、教主等）。教会财产超出于租税范围以外，所以献地之农人愈多；直到资产阶级革命以前，神圣的财产是超越于世俗的财产以外的。

村落土地虽被封建贵族所没收，然共同使用的古风并未斩断；谷物收获以后，土地又向全村居民所有的牲畜公开而复成为共同的财产。葡萄园也是一样的；山林川泽的共同使用也是保留的。这些遗习，直到资产阶级革命后才完全推翻；所以惟有资产阶级是土地私有财产的创造者。

第十三章 商业之起源及小工商业之发展

前面已经说过，动产发达，一面产生劫掠业，别面产生商业。由商业的发展，又产生近世劫掠的资产阶级社会，这是很值得注意的。

在自给经济时代的集产村落里面，本来没有商业的地位；当分工在这社会内部初起的时候，不过采用一种换工制（*échange de services*）：如农人给铁匠织匠耕种土地，而铁匠织匠给农人打铁织布。至村落间的交换，不过在一定的时间由各村落的族长做经纪以交换各自剩余的物品。但动产发达城市勃兴的时候，逐渐形成一种商人阶级，专从事于城市间和城市与乡村间的交换事业。这种商人阶级，人们最初是很鄙贱的（印度中间人的阶级叫做贱族），视她如同盗贼；然而她卒于不声不响之中，隶属一切生产者，夺得全般生产的支配权。她的性质原来便是两种生产者间的居间阶级，两种生产者都由她盘剥与掠夺。

初步的商业是物物交换，对方需要何种物品，都由双方的商人去选择。最初是用牲畜做交换价值的标准；复次是用金银的重量做标准；最后才用铸成的货币做标准。金银货币成为一切商品的货币；这种货币，其中包含一切事物的潜伏状态，他的魔力足以转变一切事物的志愿。

自给经济的村落社会，除却几种匠人外，无须与外界发生关系。然外来的匠人，最初也是不许入境的，只容许他们住居于村落的边境和城寨以外；在必要时虽准其入城，然居留时间通常不过一年一日。但这种限制是不可以永久的，所以匠人居留权随时扩张，渐渐得受村落一土一屋以为公众服务；公众替他耕作土地，每年给他以粮食。他若解除公众职务的时候，村人对于他的制品是要随时以谷物去交换的。

在地当要衢的村落变成为城市之后，城市居留权是很不容易获得的；要获得这种权利，便应缴纳一定的年金。凡属新来的人，不在农地分配，共同使用，以及城市一切公众机关之列。这些权利只有最初占领此土的人们之后裔才得享受。这些后裔，不久便形成为特权团体，贵族社会，豪强城邑，以至封建的贵族政治；而在别一方面与他们相对抗的，则有各种各色的手工匠，外来人，没来历的人。他们为保卫自己对抗豪强贵族封君的继续暴敛计，便组成了各种各色的行业社会(Guild)。这样城市居民的划分，为中世纪全时代阶级争斗的源泉。后来城市既成为生产交易以及增殖流动财富的积极中心，封建财产的范围遂扩张于乡村一切集合财产的上层，而为后来资产阶级的财产做了一个大准备。

城市有由村落变成的；也有由各种匠人聚集而成的。河口

或交通方便的地方，匠人们每每从各方跑来，以交换其制造品和必需品；这些地方不久便成为市场：开始是暂时的，后来遂成为永久的。在这种市场中，不仅各种匠人间互为其需要而互相服务，并且在市集之日(Jours de foire) 趸卖其制造品于外来的商人及与邻近各村落的农人互相交换。

由此手工业便要逐渐变更其性质，而匠人们也开始从贱民的地位中解放出来：村落社会，不仅轻视商人，而且轻视工匠，因为工匠多半是没有来历与谱系的外人，所以村落容纳工匠居住之屋叫做贱民之屋(Maison du client)。现在贱民的地位是增高了，他预先制好一些工业品，堆积于自己的小店子里面，只等外来的原料来和他相交换。从此以后，他再也不须人家有求于他才去制造物件，但是预计售出之可能而制造物件。从此以后，他于生产者的资格上又加一商人的资格；他把买进的原料制造之后，卖出的时候要变成为三倍的价格。由此，他的小店子自然也要扩大起来，而组合一些的学徒和伙计做他的助手。为购买原料与给付工钱(给与在店主管理下做工作的工人)计，他不得不领有其剩余价值；但这种剩余价值的量是很有限的，雇用的工钱劳动者也是很少数的，所以他决不能成为资本家(至多只能说是资本的萌芽状态)，他还要同伙计学徒们一样的劳动。

行会的组织，一面是反抗城市专制的贵族，别面是防止同业间的竞争。行会最初的性质，是完全平等的，并向一个地方的全体劳动者公开；后来因为利害的关系，逐渐采取防止生产者和生产品过剩的方法而兼调节生产机关之作用，所以每个行会只紧紧的团结每一业的工人，而严格限制其同业的人数。不仅如此，工具和生产方法的发明与变更，也要严格禁止。每个行会有每

个行会的特性，对于全体会员有严格限制其工作之责：比如同属于靴匠工会的人员，做新靴的只准做新靴，修理旧靴的只准修理旧靴。至此行会完全成为一种贵族的组织。

关于卖货的习惯，也有许多嫉妒的规定：到了市集之日，人人皆须遵守固有的习惯，卖货的人不许在街上牵拉行人，要任行人走到他所选择的货摊去买货；若行人已跑过这个货摊而这个货摊的主人越界去兜揽时，便要受严格的处罚。

然而从矛盾方面看来，个人主义的生产，反能在这样的行业社会里面尽可能的存在。中世纪的匠人是一个综合的劳动者，他一方面是生产者，别方面是售出者；一方面是体力的劳动者，别方面是智力的劳动者（如管理生产等）。他单只有依靠几种工具和一种生产便能到处生存。不仅个人可以独立生存，就是城市与乡村也可独立生存。在中世纪的整个时代中，每一省，每一城市，每个村镇，每个封建的田庄，以及每个农人们的住居，莫不年年具备全体居民所必需的粮食与副产品；他们所售出的不过是剩余的谷物，所购入的不过是农具和奢侈品。至于消费品的输入，是没有这样一回事的。所以中世纪的城市，在经济上都是自主的，故各城市都能孤立自存；并且在普遍的相互间的战争中，形成一些小国家。

当战败者灭亡，相互间的战争停止后，土地皆归战胜者所有；战胜者要得人民的欢心，必尽可能的建立道路交通上的安宁。由此城市间和各省间的商业大发达，市场大扩张，而形成手工业的中心。比如十四世纪干德城（Gand）纱罗织业的劳动者竟达五十万之多；商业之盛，可以想见。商业这样的发达，封建城市的社会组织根本的动摇起来。

第十四章 近世资产阶级财产之发达

自十五世纪末，印度航路和美洲发见后，墨西哥和秘鲁的金子流入欧洲，因此创立一种太平洋上的商业，而使土地财产的价值日益跌落，并且给资本主义的生产以决定的动力。由此遂开一近世的大革命和阶级斗争的新纪元。

自上述新地方发见后，欧洲的工业制造品陡然增加并创立一些广大无垠的新市场与殖民地。然崛起的新人物并不属于行业社会，但是一些运用资本经营商业与生产事业以起家的制造家。他们不仅不遵行会的旧规与约束，而且完全违反行会的生产方法而建立新式的生产方法；生产量与雇用工人的数目，丝毫不受行会的限制。然而他们的制造厂，因为行会工人的严厉反抗，在各城市里面都不容许他们设立；他们只得逃到既没有城市贵族又没有行会组织的郊外、乡村以及新辟的地中海沿岸各地方去设立。所以巴黎和伦敦城外的圣安敦（Saint-Antoine）、威斯门特（Wesminster）、和苏瓦克（Southwark），便成为他们破坏行会和推翻小手工业的阴谋策源地（他们设立一些制造厂于这些地方）。

但新市场不停的扩张，制造业又不能应付其需要；于是大机器与蒸汽机发明，遂完全成功了产业革命；由此近世的大工业又夺了制造业的地位。近世大工业的特性，便是把一切散漫的生产手段和劳力集中于极少数人和大都市里面，吸收极丰富的剩余价值，迅速的积聚并发展其资本。

大工业既不须攻击行会的组织，也不须对手工匠的主人

之特权；她只用很有利的方法根本拆坏一切旧生产方法的墙脚，如使劳力极其集中，规模极其扩大，工钱极其增高。此外更破天荒的采用极其精细的分工制，使工匠熟练的技能降到至低限度，而生产力反因此异常的增加。如从前的针匠，每人擅有制造一口针的全部技能；现在一口针分为二十种工作，每一种工人只知道一点极简单的技能。由此工人的个性与独立完全破坏，而成为极单纯的附属的机械，离开他的厂主的工厂便不能生产。至此生产成为集合的事业，以前个人主义的生产完全归于破灭。

大工业一方面破坏小手工业者个人主义的生产，别方面又要影响于乡村的农业生产。以前生活于乡村和小市镇的小手工匠，人人都有一个屋子和一块小小的土地；他们在一年之中，有几个月是做工业劳动，有几个月是做农业劳动。到了大工业发达，把这些小手工匠脱离自己的土地或大地主的土地，抛弃农业的劳动，而集中于城市的大工厂里面。乡村人口从此减少；大地主从此日受打击而不胜其苦恼。然大工业一面夺去农业的手臂，同时又要求农产品增加以供给新组成的城市的人口。由此又发生资本主义的农业。

中世纪的城市是一种独立的经济单位；城市间的商业是偶然的，并且限于很少数的奢侈品。资本主义的生产发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破坏这种独立的经济单位，涣散各种行会，而把许多孤立的地方集中为一个或几个大区域，以便利于他的大规模的发展。从此，每个城市或每一省的生产，决不限于单只制造供给自己居民所需的物品，外国和海外各民族所需要的东西都由他制造起来。

从前的经济单位是复杂的，凡属居民所需要的各种生产事

业都集中在一个城市里面。近代的经济单位是简单的，每个城市只有一种主要的大工业以及几种补助的工业。各种大工业的城市，不仅不能独立，而且互相密切的依赖；这个城市若没有其余各城市的物品的供给，便不能生活一个星期或一个月之久。不仅城市之间如此，就是资本主义的国家之间亦然。资本主义的国家，各有其社会生产的特性，比如甲国产煤乙国产铁，甲为工业出产国乙为农业出产国，则两国间互相需要的关系必密切而不可分离。所以资本主义的发达和旺盛，不仅建立在工厂和城市的分工上面，而且建立在国际的分工上面。

资本主义经过长时间的发展，连续不停的改革生产和交通的方法，于是完全破坏了地方的城市的和国家的经济单位，而代之以国际的经济单位。由世界市场之不停的开拓，遂使资本主义的生产发达至于极点。资本主义在百余年中所创造之各种伟大的生产力，比以前一切时代（自原始共产时代以至封建时代）的生产力之总和不知超越若干倍。机器的发明，各种自然力的征服，化学工业的应用，大农业的发达，轮船火车的便利，各大陆的开辟，桥梁水道的建筑……好象魔术师使用魔术，把人们陡然换了另外一个天地，不但可使冬季变热夏季变冷各大陆之距离缩短至于至低限度，而且可使中国农人因外国商品的输入而破产，上海金融要视伦敦纽约的行情为涨跌。

但这样伟大的生产力一从封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掀天揭地的发展之后，魔术师似的资本家再也不能驾驭或调节这种莫可思议的势力。由此，商业恐慌和工业恐慌定期而来，如瘟疫一般，起于一隅，即要轮流传染全世界。这种经济恐慌每起一次，不仅糟蹋许多生产品，而且要糟蹋生产力的本身，各国失业的工

人动以几十万至七八百万计算。各国资产阶级要解决这种难题，只有准备异常强大的武力去争夺殖民地；但新的征服事业愈多，即新的经济恐慌愈益严厉；而资本国家之间的战争，势非使资本主义根本破灭不止。于是人类的历史又朝着共产主义的方向进行了。

第三篇 国家之起源与进化

第一章 伊洛葛人之氏族社会

国家这种东西：有些人视他为神圣；有些人视他为万恶的渊藪；有些人以为他是几个野心家设立的；有些人以为他是从有人类以来便有的；有些人想在二十四小时内把他废除；有些人想把他维持到万世万万世。这样主观的歧异意见，此处可以不必骤然下论断；但逐章揭橥客观的历史的事实，使学者既明其本源，复知其究竟。

摩尔根说：假定人类的生命到现在有十万年，大约其中有九万五千年是行过共产制的时代。这句话初发表时，未免太惊骇了资产阶级的学者。其实并没有什么稀奇。原始时代各种幼稚的生产方法是自然而且必然的历程，所以原始共产社会也是自然而且必然经过的阶段。这在以上各篇已经详细阐明了。

在原始共产社会（村落集产社会不过是她的变形）中，既没有国家，又没有政权，惟一的组织只有氏族。所以书契以前完全是氏族的历史，书契以后完全是国家的历史。然而国家并不是

忽然从天上落下来的。所以与氏族之间必有一定蝉递的关联，今欲明了这种关联，势必再举摩尔根别一种重大的发明——即伊洛葛氏族社会——于本篇之首。

美洲印第安人每个种族内部有几个以兽命名的血族团体，与希腊的 *Genea* 罗马的 *Gentes* 性质是一样的；不过印第安人的形式是原来的形式，希腊罗马的形式是后来转变的形式罢了。并且希腊罗马原始时代的社会组织，如氏族之上有宗族 (*Phratry*)，宗族之上有种族 (*Tribu*)，现在在美洲印第安人中恰好发见了惟妙惟肖的同类组织；更进一层追溯我们今日的根源，则这类组织乃是一切半开化民族至文明初启时的共同构造。自从摩尔根在印第安人中获得这种例证，于是希腊罗马上古史中各种极难索解的部分涣然冰释，并且同时使我们对于未有国家以前原始社会制度的根本性质格外的明了。

第一篇已经说过，氏族是由伙伴家族产生的，伙伴家族是氏族集合的原始形式。伙伴家族是由一些伙伴结婚的人们组成的，因为在这种家族形式里面父性不能确认，所以一个种族的后裔只能认同一母亲为元祖，而这个母亲即为氏族的创造人。兄弟们不能在自己氏族里面同他们的姊妹们结婚，他们只能跑到别的氏族里面和别的氏族的女子结婚；他们和别的氏族女子生下来的儿子，按照母权，只能属于别的氏族（妻的氏族），而不能属于自己的氏族。所以无论那个氏族里面只能保留每代的女性后裔；至于每代的男性后裔总是属于其母的氏族。

人口不停的增加；于是由原始的母氏族 (*Gens-mere*) 发生一系列姊妹氏族 (*Gens-Soeurse*)；又由姊妹氏族发生一系列女氏族 (*Gens-files*)；由此兼摄几个氏族的母氏族形成为宗族，综合几个

宗族又形成种族。然而在一个种族中，发生一些同类的血族团体之后，将怎样的区别呢？摩尔根乃以伊洛葛和西尼斯族的氏族为原始氏族的典型。在西尼加斯族中有下列八个氏族，每个以兽名或禽名名之：

第一个氏族叫做——狼

第二个氏族叫做——熊

第三个氏族叫做——龟

第四个氏族叫做——海狸

第五个氏族叫做——鹿

第六个氏族叫做——山鸡

第七个氏族叫做——鹭鸶

第八个氏族叫做——鹰

每个氏族遵守下列的各种习惯：

(一) 每个氏族选举一个平时的首领和一个战时的首领，平时的首领叫做萨响(Sachem)，战时的首领叫做酋长(Chef)。萨响是要在氏族以内选举的，其职务是世袭的；不过此处世袭的意义并不是传位于其子孙，只是缺出的时候又从新选举。酋长是可在氏族以外选举的，有时并可虚悬而不必举人。伊洛葛人中，母权就盛行，前任萨响的儿子决不能被选为萨响，因为他的儿子是属于别的氏族。每个氏族中，一切男女皆与选举。但选举的结果须由别的七个氏族批准；批准之后，被选举者由伊洛葛全体联合会议举行盛大的仪式任命之。萨响在氏族内部的威权是纯粹道德性质的尊严，并没一点强制的方法。职务方面，如西尼加斯的萨响，他是西尼加斯族的种族会议之一员，又是全伊洛葛各种族联合会议之一员。至于酋长，不过在战争发生的时候，才得发

号施令。

(二)每个氏族可以随意废除其萨响和酋长。在这样情形中，男女全体又来从新投票选举。但被废除的萨响或酋长便成为单纯的战士，如别的战士或剥夺公权的人一样。此外，种族会议也可以废除萨响和酋长，又可以反对氏族的意愿。

(三)氏族内部最禁通婚。这是氏族的根本规律，氏族的关系恃此才能结合。伊洛葛人关于氏族内部结婚的禁止，严格的维持而莫可侵犯。摩尔根发明这种简单的事实，要算是第一次揭露氏族的真性质。

(四)死者的财产只能遗于本氏族的人员；财产不能出氏族。死者若是男子，其财产由亲近的氏族人员——如兄弟姊妹及母的兄弟等承继分配；死者若是女子，则由她的儿女和她的姊妹承继分配，但她的兄弟则除外。同样的理由，夫与妇彼此不能承继财产，儿女也不能承继父的财产。

(五)全氏族的人们是互相援助互相保护的，对于受了外人欺侮的报复行动尤其是要帮助的。每个人都有尽力保护自己氏族的人员和其安宁之义务；纵然损伤全氏族也所不惜。由氏族的血脉关系而产生复仇的义务，这是伊洛葛人绝对公认的。若别氏族的人杀了自己氏族一个人，全氏族的人皆须起来为之复仇。但是开始必有人出来谋调解；由凶手的氏族召集会议，向牺牲者的氏族提出和解条件，通常是提供一些道歉的表辞和重要的礼物。如果这些条件由牺牲者的氏族接受了，事情就没有了；如果不然，则牺牲者的氏族指定一个或几个复仇者去寻找凶手而置之死地。这样被处死的凶手，他的氏族对于他不能有所惋惜；如果是这样的情形，便算适当了事。

(六)氏族具有一定的名称或一系列的名称，但只能应用于种族以内；所以个人的名称即随其所属的氏族名称为标识。氏族人员的名字与氏族人员的各种权利是有密切关联的。

(七)氏族内部可以容收外人，又可使之接近全体种族。这种方法业已成立。战俘不置之于死而容收于氏族内部使成为西尼加斯族的人员，并在实际上使之同样享受氏族和种族各种充分的权利。容收外人，开始是由于氏族人员个人的建议；建议容收之人若是男子，则以其容收之人为兄弟或姊妹；建议容收之人若是年长妇女，则以其容收之人为儿女。个人的建议，必得氏族的批准；批准后，必须于氏族里面举行庄严的容收仪式。常常有些孤单的氏族，人口格外稀少，但是容收别个氏族一群人员之后，又可从新巩固；不过这样大群的容收，须预先商得别个氏族的同意。在伊洛葛中，氏族里面的容收仪式是在种族会议的公开会场中举行的，实际上乃是一种庄严的宗教典礼。

(八)在印第安人中存在的各种特殊宗教典礼，是不容易说明的；惟印第安人各种宗教仪式多少系连于各氏族。伊洛葛人通常每年有六个节期，各氏族的萨响和酋长例担任这些祭祀，而执行各种神父的职务，因为他们是伊洛葛人的忠实保卫者。

(九)每个氏族有一个共同的坟墓。这种共同坟墓现在在纽约的伊洛葛人中已不存在了，因为纽约现在已是文明人的世界，但从前是存在的。至于别的印第安人如都斯加洛拉人(Tuscaroras)中，共同坟墓还是存在。共同坟墓中，每个氏族有个一定的排列，每个排列以母为主，而其儿女挨次旁葬，但是没有父亲。在伊洛葛中，死者下葬时，全氏族送之，并宣读一些悲痛的哀词。

(十)每个氏族有一个氏族会议。这个会议是由全氏族的壮年男女组成的,是一种纯粹德漠克拉西的会议,男女有同等的投票权。由这个会议选举或废除萨响和酋长;同时又由这个会议选举别的忠实保卫者;为一个被杀的氏族人员复仇时,决定血的价格的,也是这个会议;批准外人加入氏族的也是这个会议。简单一句,氏族的主权属于氏族会议。

这就是古典的印第安人一个氏族的各种职务。一切人员都是自由的个体,彼此互保其自由;他们都具有权利平等的人格,无论萨响与酋长,都没有什么特权可覬觐;他们由血脉关系的联合,形成一友爱的集合体。自由、平等、友爱,绝不是一些形式的设定,但是各氏族的根本原则。这些原则自然的流行成为一切有组织的印第安人的社会基础,和一切社会制度的本位。在美洲发见的时候,北美一切印第安人才组成为一些母权的氏族。只有很少几个种族,如达加塔人(Dacatas)的氏族已经消灭了;此外还有某几个种族如乌及瓦人(Ojeibwas)、乌马哈人(Omahas),则已组成父权的氏族。

在多数印第安种族中,每个种族包括五个或六个以上的氏族;而三个氏族或四个氏族(或四个以上)又集合为一种特别的团体,摩尔根沿用希腊的旧名,把印第安人这样集合的特别团体忠实的译为宗族。如西尼加斯族有两个宗族:第一个包括一个到四个氏族;第二个包括五个到八个氏族。这些宗族——通常总是代表些原始的氏族,一个种族开始就是由这些原始的氏族分裂孳乳而成的。因为氏族内部禁止结婚,每个种族至少必须包括两个氏族才能独立的存在。种族的数目陆续增加,每个氏族又分裂为两个或几个氏族(当她们的每一个成为特别氏族形

态的时候,即从母氏族分裂出去);原始的氏族(母氏族)乃兼摄几个女氏族而为宗族的存在。在西尼加斯和大部分的印第安人中,一个宗族之下的几个氏族,她们皆为姊妹行,所以她们之间成为姊妹氏族;而别方面的一列氏族,便是她的表姊妹氏族(Gens-Cousines)。原来西尼加斯人,没有一个准在宗族内结婚;然而这种习惯到恰当的时候便抛弃了,乃只限于氏族以内不准结婚。据西尼加斯人中的传说,熊与鹿是两个原始的氏族,其余的氏族是由这两个氏族分裂出来的。

宗族的职务,在一切伊洛葛人中,一部分是社会的,一部分是宗教的:

(一)各宗族间常举行竞技游戏。每个宗族争先选出最好的技手,其余的人皆为观看者。每个宗族的人们站做一列,他们之间互赌胜负。

(二)在种族会议中,每个宗族的各萨响和酋长都有共同的坐位;通例总是分为两列面对面的坐著,每个演说家代表每个宗族说话。

(三)假若一个种族中出了凶杀案,而凶手与被杀者不属于同一宗族,则被杀者的氏族乃讦告于她的姊妹氏族;姊妹氏族乃召集一个宗族会议,并通知其余各宗族,最后乃开一联合会议以调处其事。

(四)一个宗族的著名人物若是死了,对方的宗族须为之担任丧事和殡仪的组织,而死者宗族只传达悲哀。若是一个萨响临死的时候,对方的宗族即须向伊洛葛联合会议通告缺职。

(五)当一个萨响被选举的时候,宗族会议例须干与。一个氏族选举的结果,虽经姊妹氏族考虑批准了,但别个宗族的各氏

族还可提出抗议。在这样的情形中，宗族会议又须开会，抗议若被赞成，则选举作为无效。

(六)伊洛葛人中有些特别的宗教的奥术，行奥术的会社，白种人叫做医寓(Medicine-lodges)，行奥术的人，白种人叫做术士(Medicine-man)，因为实际上就是一些驱邪治病的人。西尼加斯的两个宗族，每个宗族有一个这样的宗教会社，其中的术士是很有名的，他们对于族内的新人员，有启发的法定权利。

(七)当美洲被征服的时候，有四个宗族分居于特拉斯加拉(Tlascalala)的四个营屯里面，由此又可证明宗族为一军事的单位，也如上古希腊及日耳曼民族中的军事单位一样；四个宗族的每一个去赴战的时候，犹如一个支队的编制，且有一面特别的旗帜，服从自己的酋长之指挥。

照规则的编制，几个氏族组成一个宗族；同样，几个宗族组成一个种族。但是有时候在很弱的各种族中，人数不多，则宗族一级也可以缺。

上面所说的是印第安人氏族和宗族的特性与职务，以下是种族的特性与职务：

(一)每个种族有一块自己的地盘并且有个特别的名称。每个种族于日常居住的地方外，还具有一块重要的渔猎土地。邻近各种族的交界具有一带广大的中间地带。邻近各种族特有的土语是各不相同的。

(二)每个种族各有其特别的土语。实际上，一个种族一种土语乃是一种重要条件。随着种族的分化，一些新种族必和一些新土语同时形成，这样的事实最近还在美洲进行而莫能完全停止。也有两个亲近的微弱种族合并为一个的，故在同一种族

中也有说两种土语的不过是极稀少的例外罢了。印第安各种族平均的人口,大约一个种族有二千人;合众国中,人口最多的印第安人要推柴洛葛种族(Tscheroquois),——约有二千六百人,然皆说同一的土语。

(三)各氏族选出的萨响和酋长,任命的权利属于种族。

(四)种族有罢免萨响和酋长的权利,又有权反对氏族的意愿。萨响和酋长都是种族会议的会员,关于种族的各种权利便是由他们自身去解释。各种族联合起来又形成一种各种族的联盟,以联合会议为代表机关,各种不能解决的权利问题皆可移于这个联合会议去解决。

(五)各种族具有一些宗教思想(神话)和共同礼拜的祭仪。印第安人,可说是半开化状态的宗教民族。他们的神话还没有何种批评研究的对象。他们在人类的形式之下,想象一切精神,以诞生其宗教思想;但是他们还在半开化初期的程度,所以还不知道崇拜偶像以为具体的表记。在他们之中有一种自然的宗教并且很初步的向着多神教进化。各种族各有特别的节期,每个节期有一定的仪式,特别是跳舞和游戏;无论在何处,跳舞成为各种宗教祭祀的主要部分。

(六)一个种族有一个种族会议以办理一个种族的共同事务。种族会议是由各氏族的萨响和酋长组成的,他们是各氏族的真正代表,因为他们是随时可以撤换的,种族会议是公开讨论的,凡属种族中的人员在会议中皆有发言权,并有权使会议谛听他们的意见,然后由会议取决。按照一般的规则,凡属与会的人都是要求听取他的意见的;妇女有意见的,也可在会议中选择一个男演说家说明她们的意见。在各种伊洛葛人中,最终的决议

是要一致通过的。种族会议是要特别担任规定与外族之各种关系；接待或派遣代表，宣战与媾和，都是种族会议的责任。战争是否要爆发，通常总是看种族会议的意愿何如。通例，每个种族如果考虑她必须与别个种族发生战争的时候，种族会议便不会有媾和的表示。这类出征敌人的军队，大部分是由一些著名战士组织的；这些著名的战士踊跃赴战，无论何人都可宣言加入，参与战争。远征队一经成立，便即动员出发。在这样情形之下，被攻击的种族便要立刻募集志愿队，执行防守土地的职务，这类军队的出发与归来，通常总要举行公众的大祭典。远征队是不能受种族会议的节制的，所以既不要由他发令也不由他要求。这类队伍，人数是很少的。印第安人极重要的远征队，每每人数很少，而散布的距离极大。当几个队伍集合时，他们中的一个只服从自己的酋长；作战计划的单位，是由酋长会议随意决定的。

(七)在很少几个种族中，也有萨响兼酋长的。然而其职权是很薄弱的。在情形紧急要求一种迅速行动时，萨响中之一个，也可在会议召集前采取一些临时的办法或最后的决定。在这样情形中，只有一个职员有执行的权力，由此遂产生最高的军事司令(不是种种情形如此，不过大部分如此)。

大多数印第安人，因为种族的集合，不能跑开太远。然亦有很少几个种族，由继续不停的战争弄得很弱，彼此分散于广大的边境之上，他们以很少的人口占住很宽的地盘。由此，几个血统相近的种族遂发生暂时联盟之必要；在某几处地方，有几个原来血族相近的种族，涣散之后，又从新集合为永久的联盟，并且开始为民族的形成。在合众国的伊洛葛人中，也发见这类联合的最发展的形式。他们十五世纪前住在墨西哥西壁(Mississippi)的西

方,大约为达加塔族的一支,他们做了些长期的游历后,乃抛弃从前的地盘,分为西尼加斯、加儒加斯(Cajugas)、乌龙达加斯(Onondagas)、乌内达斯(Oneidas)、马哈克斯(Mahawks)——五个种族,移居于现在的纽约。他们还是过渔猎的生活,具有些粗大的菜园,并住在村落里面,大部分的村落围以巩固的篱笆,他们人口的总数不过二万,他们五个种族中的氏族数目是一样的,他们说同样的语言,土语也极相近。当他们占领一块广大的土地时,五个种族之间便平均分配。他们既得了这个新地盘,乃以他们五族的团结力驱逐原先住在此地的土人;在十五世纪的上半纪,他们便结合为“永久同盟”。这样同盟的结合,使他们顿然觉到自己的新势力,所以永久同盟便带了积极的性质;在一六七五年的时代,他们极拓土开疆之能事,强盛达于极点。此时伊洛葛人的永久同盟,是半开化初期极发展的社会组织。永久同盟的根本条件是:

(一)永久同盟对于五个种族一切内部的事务,具有充分独立平等的原则。五个种族都是同血统的,所以血统为永久同盟的真实基础。在五个种族中,有三个叫母种族(Tribus-meres),并且她们之间为姊妹行;其余两个种族叫女种族(Tribus-filles)。有三个最老的氏族,在全体五个种族中还有最高的代表资格,其余三个氏族则在三个种族中有代表资格;每个氏族的人员,相互间呼为兄弟,即在全体五个种族之间的人员亦皆呼为兄弟。语言是同样的,仅只土语有点不同。这是原来同种的证据与表现。

(二)永久同盟的机关有一个联合会议,是由五十个萨响组织的。他们一概平列而坐以讨论或考虑各种事情。这个会议,为同盟中一切事务的最高决定机关。

(三)同盟初创的时候,五十个萨响,由各种族各氏族分配,于原来萨响的职务外又加了一些新职务,这显然是由于适应联盟的需要而规定的。有一个萨响出缺的时候,相关的各氏族便从新选举一个以补之。如负这样新职务的萨响,无论何时,都可由相关的氏族撤换;但是任命的职权属于联合会议。

(四)联合会议的各萨响,同时又是相关各种族的萨响,在种族会议中有他的地位与表决权。

(五)联合会议的一切决议应一致通过才发生效力。

(六)一切决议案,开始是由各种族投票表决,所以一个议案,要经过每个种族会议的人员全体通过才算有效。

(七)五个种族的每个种族会议,可以提议或要求召集联合会议;但是不能由他本身召集。

(八)联合会议的各场会议都是在会众之前公开的;每个伊洛葛人都能发言;不过惟有会议才能决定。

(九)永久同盟没有独断的领袖人,也没有行政首领。

(十)反之,永久同盟有两个最高军事酋长,两个酋长的职务与权力都是同等的,与斯巴达的两个王和罗马的两个康桑尔(Consuls)差不多。

这样就是四百多年以来,伊洛葛人的政治组织。因为此处有机会供给我们研究国家还未发生以前社会组织究竟是怎样的形态,故按照摩尔根的研究,将伊洛葛的社会组织,详细描写于上。伊洛葛的社会组织,可看做一切民族未建立国家以前的社会模型。这样的社会组织,以公众权利为骨干,所谓“主权在民”、“纯粹德谟克拉西”和“自由”、“平等”、“友爱”这些话,只有这样的社会组织才合实际而非虚伪。这样的社会组织与公众一般保

持密切而不可分离的关系；后来的国家一经建筑于特别的公共权力之上，便与组成他的全体公民分离，而成为多数平民莫可接的特别强权的集团，与原始的社会组织恰好成为两样。这样的鸿沟，自从有历史以来就划分了的。所以有史以后的社会莫不是阶级争斗的社会；而有史以前的社会，既没有阶级，更没有阶级争斗，如伊洛葛的氏族社会就是显明的例证。

我们研究以上所述北美印第安人各种情形，便知原始氏族社会怎样的建立，种族怎样的形成，怎样的分化，怎样的联合而成为民族，怎样的逐渐散布于大陆之上，以及语言怎样的变化（有时不仅变成不懂，甚至原来的语根完全消灭），母氏族怎样以宗族的形式在种族里面继续存在。狼与熊，在多数印第安种族的氏族还喜欢用这两个名字。以上所述，大概可以说明一切印第安人的社会组织，所不同的，只有许多血族相近的种族还没有联盟罢了。

氏族是主要的社会单位，一切宗族，和种族的组织都由这个单位产生出来的。三种组织是一个血统递进的不同团体，虽每个自成一体，自理其各种事务，但又互相联带互相完成。无论在何方面的民族，我们都可发见氏族为原始社会的单位，并可找出其种族的组织与以上所述的相类似。我们不仅在渊源可寻的希腊罗马中可以发见同类的事实；就是源头湮没，传说不存的各民族中，亦可用伊洛葛的氏族社会为钥匙，以启发各种疑难和隐谜。

氏族社会，是一种单纯而幼稚的组织。她虽然那样单纯幼稚，但是既没有宪兵警察侦探，又没有君王贵族，督军知事，更没有法官监狱和诉讼；然而一切行动，“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各种

口角与冲突，由氏族、种族或各氏族开会解决，便可了事；复仇行动不过是极端的方法，应用极少。氏族社会中的共同事务，如家庭经济，是一列家族共同的，并且是共产主义的；如土地是全种族的财产，仅只一些菜园指定属于各个家庭；然而这些共同的事务，并不需要我们今日这样广大复杂的管理机关；各种要管理决定的事情，大都照几百年以来成立的习惯做去便是。氏族社会中，只有共产主义的家庭，既没有特别的穷人，也没有特别的富人；至于老人病人以及因战争而残废的人，氏族对之皆有一定的义务。氏族中，人人都是平等自由的，并没有男女的区别。在以上所述伊洛葛各氏族中，除降服外族的通例外，其中还没有奴隶地位的存在。当一六五一年，伊洛葛人打败爱利亚人（Eries）时，他们即向爱利亚人提议以平等权利加入他们的联盟；不过因爱利亚人拒绝这种提议，他们才把爱利亚人驱逐出境。

这样可嘉的氏族社会，与我们今日阶级悬殊、贫富不均、法令森严、强权可畏的文明社会显然不同。然而这不过是许多方面的一方面；在社会进化的历程上，我们不要忘记这样的氏族社会是必然灭亡的。氏族社会充其量只能发达到种族——再也不能向前进了。各种族间的联盟，——如伊洛葛五族联盟，——已经是氏族社会盛极而衰的起点。按照氏族社会的根本法则，凡在种族以外的人，亦即在权利以外。这样的法则，只在各种族孤立而不相接触的时候为适用。若一旦与外族接触，则种族与种族之间势必发生战争；战争的结果——或是完全降服异族，或是有条件的媾和；在拓土开疆的时候——即生产发展的时候，势不宜将降服的异族完全处死，也不能将（凡在种族以外亦即在权利以外）的原则订在和约上面。然则到了这样的的时候，氏族的门户

是不能不洞开以容纳异族了。氏族社会发展到洞开门户以容纳异族的时候，也便是氏族组织开始破坏的时候。

氏族社会之所以成立及其繁盛，是与原始时代极初步的生产，和扩张到了广大地盘之上的稍强盛的生产有密切关系的。以上所述北美伊洛葛的情形就是明证。原始时代的人们，几乎完全是服从他们所不了解的外部自然界的。这样莫可了解的外部自然界反映于他们的脑中，便形成他们幼稚的宗教思想。种族是团结人们的圈子，又是对付外族的团体。种族与种族的界限是很严明的。种族、氏族以及他们各种组织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些组织由自然给他们建立一种最高的权威——即族制的权威：每个人在他的感情思想行为之中，都要无保留的绝对服从这种最高的权威而住居于种族或氏族的界限，生于斯，食于斯，共同劳动于是以终其天年。这个时代的人们，在我们看来，都是一样尊严的，彼此之间很少不同的差别；正如马克思所说，她们都是一样的系住在原始共产社会的凹线之下。这是谁给他们系住的？也是自然给他们系住的。所以这样的原始共产社会是必然要打破的。结果，果然把她打破了。这是些什么势力把她打破的呢？不用说是由私有财产的势力，以及一些贪欲、利己心、盗劫、掠夺、强暴、盘剥、吓诈、高压……的可耻方法把她打破的。由此古朴纯良而无阶级的氏族社会从高坍台而葬于海底，阶级鲜明的新社会遂或迟或早遍涌于全球各大陆之上；而几千年以迄于今日的文明社会，总括一句，不外是最少数人损害最大多数人之偏畸不平的发展罢了。

第二章 希腊人之氏族

希腊人，也如伯拉斯基人(Pelages 希腊最初之土人)及其他同类的民族一样，在有史以前的时代都建立过与美洲印第安人相类似的氏族、宗族、种族和各种族联盟的一系列组织。在印第安人中，宗族可以缺，在多利安人中宗族也可以缺；种族的联合不是到处都必须形成，但氏族的单位是在一切情形中都要形成的，这也无间于希腊人与印第安人，两者都是一样的。在初入有史时代的希腊人，他们即已发见在文明的门限上面；他们与以上各章所说的美洲各种族之间，殆展开为进化的两大时期，英雄时代的希腊业已走在伊洛葛的前面。并是希腊的氏族，再也不象伊洛葛氏族一样的古老；群婚的痕迹，在希腊也开始大大的涂抹；母系家族业已代以父系家族，因而最近起源的私产也在希腊氏族组织里面开了第一个破口；当相续财富的命运随着父系制的采用转变过来之后，自然接着第一个破口又开了第二个破口。从前婚姻的习惯，氏族内不得结婚，丈夫必须是别个氏族的人；到了初入文明的希腊人，便把这种氏族的根本法完全推翻，他们不仅允许，而且有时为保持氏族(父系氏族)财产计，竟命令少年女子在氏族里面结婚。

照格洛特(Grote 英历史家，一七九四——一八七一)著的《希腊史》，雅典人的氏族特别维持下列团结的状态：

(1)——有些共同的宗教的祭祀；并许司祭长老以神名为氏族祖先的冒称之特权。

(2)——有些共同的墓地。

(3)——相互的相续权。

(4)——被侵犯时,有援助、救济、保护的相互义务。

(5)——在某几种情形中,氏族内部有通婚的相互权利与义务,特别行之于女相续人或孤女。

(6)——在很少某几种情形中,具有共同的财产,连同一雅康与特别会计。

(7)——后裔从父权系属。

(8)——除有女相续人的特别情形,氏族内部禁止通婚。

(9)——氏族有容收外人的权利;家庭也可容收外人,但须以公众的仪式和例外的名义举行之。

(10)——氏族有选举与罢免酋长的权利。每个氏族有一个雅康;但这种职位决不是在某几个限定的家庭里世袭的。

然而格洛特对于氏族的研究终归失败。因为他把氏族看成几个家庭的集团,所以对于氏族的性质和起源,完全不能理解。这样失败不仅是格洛特、尼博尔(Niebuhr)、孟森(Mommsen)及其他古典的古代史家莫不如此。在氏族组织之下,家庭绝不能为一个组织的单位,因为夫与妻必须属于两个不同的氏族。氏族包括在宗族中,宗族包括在种族中;而家庭则一半在夫的氏族,一半在妻的氏族。即后来国家抬头,公法里面尚不承认家庭,殆到私法里面才承认家庭的存在。然而前此一切历史家的著作,都把下列荒谬的原则当作神圣的原则:即他们把稍微老的文明的一夫一妻家庭,当作是社会与国家徐徐围着而结晶的中心。这样的谬说,在十八世纪特甚。

所以马克思说:我们可使格洛特注意:“即令希腊人从神话中产出他们的氏族,这些氏族决不会丝毫老于由他们自己造作

的神与半神的神话。”

格洛特更进一层说，雅典每个氏族都有一个所从出的假定的远祖之名称；在梭伦前后，死者没有遗嘱时，财产遗于氏族人员；亲族间出了凶杀案时，被牺牲者的氏族人员与宗族人员都有向法庭告发的权利与义务。格洛特并说，雅典各种最古的法律都是建立在氏族与宗族的区分上面。

宗族，如在美洲印第安人中，一个母氏族分出几个女氏族后，他便成为这几个女氏族的连锁，并且她尚往往从一个远祖诞生一切后裔。照格洛特的记载也是一样的，“当时赫加德（Hecatee 纪元前六世纪，希腊历史家）宗族的全体人员是奉一个神为他们第十六级的祖先。”然则这个宗族的各氏族，在文字上也是一些姊妹氏族。

希腊人的宗族，在荷马时代还现出为军事单位的面貌。在尼斯铎（Nestor 英雄之一）劝告亚格棉农的著名故事中，还说军队要以种族与宗教为编制，使宗族援救宗族，种族能援救种族。此外，宗族有惩罚戕害其宗族人员的凶手之权利与义务；有时宗族还有复仇的义务。宗族有些共同的神庙与祭祀。宗族有一宗族长（Phratriarchos）和宗族会议，会议有司法行政及号令之权。后来国家成立，还任宗族执行某几种公众职务。

几个亲近的宗族集合起来，便成为种族。在阿替喀（Attigue），有四个种族，每个种族有三个宗族，每个宗族有三十个氏族。至于四个种族怎样（何时？何故？）自然的成立有系统有意识的类似团体这是希腊历史所不能解答的，只有希腊人自己在英雄时代才保留一点过去的记忆罢了。

聚集在狭小领域上面的希腊人，他们语言的变化，比较的不

如散布在广大森林中之美洲人一样发达。我们在希腊只能发现同语源的各种族。其团结的人数非常众多；即使在小小的阿替喀能发见一种特别的方言，然特别的方言后来又成为散文的普通语。

在荷马的一些诗歌里面，我们已发见希腊各种族大概都是集合一些小群成立的，然而在这些集合中，氏族、宗族与种族都还完全保持各自的独立。这些小群已经生活于设有城墙的城市里面；人口的数字是随着畜群农业以发端的手工业之扩张而扩张的。同时，财富的差异，与由这差异而产生的贵族政治的要素，也随着在原始的民主政治内部扩张起来。而各自独立的小民族之间，为占领好地盘和获得战利品的驱使，常常发生不停的战争；于是以战俘为奴隶的事业，遂成为公认的制度。

此时各种族和各小氏族的组织，大概如下：

(1)永久权力机关的议会(Boule)。原始大约是由各氏族首长组织的；后来各氏族的人数过多不得不用选举方法，由此便给贵族政治的要素以发展和强固的机会。据狄尼斯(Denys奥古斯都时希腊历史家)的记载，希腊英雄时代这种会议，显然是代表贵族们(Kratistoi)的组织。议会为各种重大事务的最后决定机关。随着国家的建立，这种议会后来遂变成为元老院。

(2)人民会议(Agora)。在伊洛葛人中，我们已发见一些男男女女的人民包围着他们的会议中发言，而影响于各种问题的取决。在荷马时代的希腊人，“陪席者”(古代日耳曼裁判所的用语)业已成为人民的普通会议；就是在原始时代的日耳曼人中也是同样的情形。人民会议由议会召集，决定各种重要事务；每个人都有发言权。一切议案由举手表决，或喝采表决。人民会议

为最后的主权机关。萧迈(Schoemaun)在古希腊里面说：“一桩事情要执行时，而人民要求参与执行，我们从未见过荷马说要用什么强制方法，违反人民的意思。”在这时代，种族的全体壮年男子都是战士，还没有什么离开人民的公众权力可以强制人民。此时原始的民主政治尚未荣盛，并且应以她为判正议会与军事首领的权力及地位为起点。

(3)军事首领(Tasilnis)。习惯为君主臣仆的欧洲学者们，总当把希腊的“巴士留”译成为近代世袭君主的意义；摩尔根与马克思根据他们的研究，是极力反对这种观念的。在伊洛葛人和其他印第安人中，最高职位的世袭意义，我们在前面即已说明：一切职任都选举的，大抵都在自己氏族里面选举，并且在自己氏族里面世袭。如在空位时，则再举回氏族最亲近的人(如前任萨响的兄弟或姊妹的儿)继任；在没有避开以上亲近人员的理由时，即可顺次选出。纵然希腊在父权势力之下，巴士留的职位，照规矩要传于其儿子或其儿子的某一个，然这只能证明其儿子有由人民选举以继任的或然性，决不能证明无须人民选举即有世袭的权利这样情形，在伊洛葛人和希腊人中，只能视为氏族里面已发生特殊贵族的最初萌芽；然此时希腊人的程度已高过伊洛葛，也只能视为将来的元帅或君主的最初萌芽。所以在希腊人中，或然的事情只有这样：巴士留或者是由人民选举，或者是由人民公认的机关(议会或人民会议)任命，——而且他实际行事时可以如罗马的王(rex)一样。

在荷马的伊利亚叙事诗中，人民领袖亚格棉农，并不象希腊最高帝王的态度，不过是一围攻特罗雅城的联军司令。这个资格仅被叫做——幼黎斯(Ulysse)。当联军发生内讧时，希腊人有

句名言：“许多司令同时指挥是不好的，应当归一人发号令”，可见当时亚格棉农的权力，并不如帝王之大。幼黎斯关于军事的计议，也没有什么政府形式的会议，不过由他要求人们服从战时司令的号令。在特罗雅城前的希腊人，不过现出为一军队，一切事情都要很德谟克拉西的经过人民会议。当亚基利在军中论战利品的分配时，既不是由亚格棉农担任分配，也不是由别一个巴士留担任分配，但是由“亚根(Acheens)的儿子们”自己分配，——即人民自己分配。

各种军事职务之外，巴士留还有些宗教的和裁判的职务。司法的职务是无定的；至于宗教的职务，则只有他为种族或各种族联合的最高代表之资格。至于政治上管理上的职务，怎样，此时还没发生这个问题。然而巴士留，按照他的职任还是议会之一员。所以把 Vasileus 翻译为 Koenig(英文 King 是从此字变的)，在语源上并不错误，因为 Koenig 是从 Kuni, Kiimere 出来的，意义为氏族的族长。但古代希腊的巴士留与现今王字的意义绝不符合。都昔第士，还明白的称古代 basilbns 为 Patrike 就是指明巴士留是从氏族出来的；都昔第士还说，巴士留有些规定的权能，这更足以证明他的权能是有限的了。亚里士多德也说，巴士留是指挥自由人的司令，又兼裁判者和大司祭。然则他没有如后世王者一样的统治权的意义，是很显明的。

由以上所述，我们一面可从英雄时代希腊的构造中看出氏族的旧组织还有些活气，但别方面我们又可看出她的崩坏的发端：以男子相续为附随的父权制，足以促进个人家庭财产的积聚，并使家庭成为与氏族对抗的势力；贫富的差异反映到政治组织上面，便有世袭贵族与王族的萌芽之形成；奴隶，开始不过包

含战俘的全体，但渐渐在同种和同氏族的“自家人”之中也开了一个隶属的远景；往昔种族与种族的战争，业已变成组织的掠夺事业。在海上与陆面都以掠夺牲畜奴隶财宝为目的，并且成为正规财富的来源。简括一句：财富已成为很尊重的东西而被人们视为至宝；氏族的老组织要为强抢来的财富赃品做辩护，便根本变坏了她的性质。

然而人们至此还缺少一种这样的制度：这制度不仅要能拥护个人的新财富以反抗氏族共产制的遗传，而且要使原来很被轻视的私有财产神圣化；不仅要使这神圣事业成为人类社会的最高目的，而且要以一般社会的名义使次第发展之各种获得财产的新形式为法律所确认。换过说，这制度不仅要能永续社会阶级的新分裂，而且要能永续有产阶级掠夺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支配无产阶级的权利。果然这制度不久便来了；人们遂创立了国家。

第三章 雅典之国家

国家是怎样发展的呢？当氏族的各机关一部分变了形态；一部分由一些新的机关僭夺其地位；而最后则完全代以国家的各种官厅。从前氏族宗族与种族用以自卫的真正“人民武装”，至此代以国家一切行政机关使用的武装“强权”，复次便用以对付人民。我们论证这种进化的初步，最好莫如古代的雅典。关于形态上种种变化的要点，是由摩尔根陈述的；至于产生这些变化的各种经济情形，大部分是由恩格斯补足的。

英雄时代，雅典人的四个种族尚住在几个隔离的地方；构成

四个种族的十二宗族，也还住在西克鲁伯斯(Cecrops)的十二个城市里面，好似各保其特殊的古迹。此时政治组织即是英雄时代的组织：人民会议、议会和巴士留。更追溯成文历史的纪载，则土地业已瓜分，并且随着相当发达的商品生产(在半开化高期的末日即已相当的发达)和与之适应的商品交易，而转变为私有财产。各物以外，又能生产酒与油。所以爱琴海(Egen)的海上贸易，渐渐推翻了腓尼基人(Pheniciens)的霸权而大部分落于阿替喀人之手。由不动产的买卖与农业手工业渐渐分工的结果，商业与航海业益发达，而氏族宗族与种族所属人员亦忽然互趋于混淆。不但如此，因为以上事势所趋，各宗族与各种族的领地不得不改变旧规容收不属于他们团体的住民或市民，复次又不得容收异种人于他们自己的住居以内。

在各宗族与各种族分离居住时，每个宗族和每个种族各自管理自己的事务，无须选代表到雅典议会和巴士留那里去。虽然无论何人可居于不属于他们的宗族或种族的地域上面，但也自然不能参与该地宗族或种族的管理与行政。

氏族组织的规律活动，在英雄时代即已显出失了均衡的破绽，而有补救之必要。由是雅典人便采用提西欧(Thesee)的政体。提西欧的第一种制度在变更各种族的独立行政，而在雅典建立中央行政机关，前此各种族独立自治的事务之一部分，至此宣布为公共事务并属于在雅典的总议会管辖。由此，雅典人比美洲印第安人更进一步，印第安人只有邻近几个种族简单联合的雏形，而雅典则已融合为单一的整个的民族。由此在种族与氏族的习惯法上，产生一种普通的人民权利。即使是异种族的人，只要他有雅典市民资格，便得接收些一定的权利，和法律上

的保护。然而这又是使氏族崩坏的第一步，因为这乃是容收阿替喀各种族以外和完全在雅典氏族组织以外的异种市民之第一步。

提西欧第二种制度是不计(也可说是打破)氏族宗族和种族的组织，区分人民为三个阶级：贵族(Eupatrides)、农人(Geomares)与工人(Denurges)。并且规定职官为贵族独擅之特权。这是真的，除贵族独占职官一点外，这种区分没有什么别的影响，因为她还没有建立各阶级间别的法律上的差异。但是这种区分是有重大意义的，因为她已把一些默默发展的新要素提供于我们。这种区分所表示的氏族职官之占有(习惯于某几个家族里面)，业已变为各“世族”的一种权利；由此各世族更与一些财富的势力，于他们的氏族以外，开始联合起来，——便成为一个特权阶级；而呱呱堕地的国家，便是专应这种要求产生的。至于农人与工人分工，也是竞胜从前氏族或种族的区分之很有力的方法。卒至氏族与国家之间宣告不可调和的抵抗；国家形成的第一个功课便在打破氏族制度，把每个氏族的人员分成为特权者与非特权者，并且把农业与手工业的劳动者也分成为两个新阶级，使他们彼此对抗。

雅典以后的政治史，到梭伦时还不充分知道。巴士留的职位后来是废止了，而代以从贵族中选举的雅康(Archontes)为国家的首领。到纪元前六百年的时候，贵族的权力渐渐增加到不堪支持的地步。其压制一般人的自由之主要方法，是现银与高利借贷。贵族们的主要住所为雅典及其附近，因为这便是海上贸易以及劫掠机会的所在地，由此可以无限的增加财富，集中一切现银于他们的手里。从此，现银交易的流行，便酸化了旧社会

的生存条件，——因为他是建立在自然品的交换基础上面。氏族组织与现银交易是绝对不能两立的；阿替喀小农的破产是与保护他们的氏族旧关系之解纽同时而起的。债权与抵押权（雅典人已发明抵押法），既不是氏族所尊重的，也不是种族所尊重的。氏族既不知道现银，也不知道贷借，更不知道现银的债务。然而富豪的金力政治不停的扩张，便由她（金力政治）创造一种担保债权的新习惯法，使现银所有的债权人对于负债者的小农之盘剥神圣化。由此阿替喀一切田原上面树满了抵押的标柱，在这些标柱上说明这些土地由谁某抵押于谁某，抵押的银及利率为若干。就是一部分未指定为担保品的耕地，因为不能偿付本利也只得卖与债权人而成为高利贷的贵族之财产。农人若得保持下列情形，尚欣然自以为幸：即土地卖了之后，若被允许以佃户资格仍得留居于故地，靠着自己的劳力过收获物六分之一的生活，而将六分之五当作地租，缴纳于他的新主人。更进一层说：当卖出土地的结果不够偿债务时，或债务积累至没有抵当物的保障时，债务者便应把他的儿子卖与外人为奴隶（多半是卖与债权者为奴），以偿清他的债权人。——父亲可以卖儿子，这便是父权与一夫一妻制的第一个结果——虽然如此，然而吸血鬼还没有满足呢。复次，债务者便应把自己卖为奴隶。这样——便是雅典民族文明初启的曙光！

在过去人民的生存条件还适合于氏族组织的时代，以上一类的变化是没有发生之可能的，以上一类变化之所以发生，现在已无须怎样辨明了。暂时我们又可回复到伊洛葛人里面来。在伊洛葛人中，欲以强迫施之于雅典人的状态，去施于伊洛葛人——不得他们的协力或不顾他们的同意而施于他们，这简直

是想象不到的事体。无论年岁的好歹，他们总是年年岁岁以同样的方法去产必要的生活资料，决不能发生以上一类外部压来的冲突，也决不能发生贫富间以及掠夺者与被掠夺者间的任何抵抗。纵然伊洛葛人隔征服自然的程度尚远，然在加于他们的自然限度以内，他们得为自己生产的主人。即使他们小园圃的收获恶劣，山林川泽的禽鱼竭尽，然其结果只足以使他们从新发明些生存方法。以这样的结果来维持他们的生活，多少是比较丰裕的；并且决不致因此掀起社会意外的大变革，撕破氏族的关系，把氏族和种族的人员分裂为互相争斗的对抗阶级。生产固然还是在极狭隘的界限中进行，然生产者还是他们自己生产物的支配者。

至如希腊人里面，完全不同，由畜群与奢侈品变为私产的进步，以致发生个人间的交易，并把生产品变成为商品。这样的变化，便是以后一切革命的种子。一到生产者的本身不直接消费他们的生产品，且把他们的生产拿来交换，他们对于自己的生产品便失掉了主人资格。而生产品换出不到几目，人家又有拿来盘剥和压迫原来生产者之可能，这样猝然而来的事情更是他们所不了解的。所以没有那个社会在开始不逃脱个人间的交易，而还能以固定的方法支配自己的生产品，或在生产过程上还能维持其对于社会作用的管辖。

但在雅典人，一到生产品转变为商品和个人间的交易开始，他们便知道用怎样的速度使生产品支配生产者。而为个人自己计算的土地耕种，也随着商品生产而出面，并且不久便成立土地的个人财产。后来现银出世，他便变为可与一切商品交换的共通商品；然而当他们（指雅典人）发明货币时，谁能梦想到他们又

因此创造了一种惟一普遍的新势力，这惟一普遍的新势力可使全社会降伏在她的威权下面。并且这种新势力是从创造者的自身忽然涌现出来的，纵然他们的暴性还是在少年时代，然已足够使雅典人感受其威力了。

然则在这中间怎样做呢？氏族组织业已自行证明无力抵抗所向无敌的现银势力之进攻；并且在她的范围内绝对不能寻出她对于——现银的交涉，债权人与债务者的关系，以及用势力收回欠债等行为——有丝毫的地位。但是新社会势力业已存在那里；而人们并无热烈的希望和意愿想把现银与高利驱出社会而回复到旧时的善境。

此外又有一列次要的罅隙，接二连三在氏族组织上面开了些破孔。

在阿替喀全境各氏族和各宗族的人员之混合（雅典市的本身更为混淆），一代盛似一代；从这时候起，一个雅典人有权把土地卖出他的氏族以外，而且住宅也不拘了。

生产上各派的分工有农业和手工业，而在手工业中又有无数的细别，如商业航海等等。以上的分工随着产业和交通的进步愈益发达，由此人民遂按照其职业而区分为各种很固定的团体。这些团体的每一个，都有其共同的新利害；而这些共同的新利害在氏族和宗族里面没有存在的余地，所以必须设立些新职员以拥护他们的利益。这样一来，氏族的地位又不知削弱了多少。

这个时代，奴隶数目的重大增加，已经超过雅典自由人的数目非常之远。然而氏族组织原来不知奴隶制为何物，所以也不知用什么方法制驭这般不自由的氏族群众于羁轭下面。

最后，由商业招徕的一群外种人，只要他们在雅典能赚得现银，则定居于雅典也极容易。不过这样的事情，显然与旧制度相抵触，所以纵然有因袭上的默许，然他们在人民间依然是一种由旧制度剥夺各种权利与保护的外来分子。

总括一句：氏族组织业已到了她的末日。新社会日益生长，旧氏族日被排出。眼前发生的各种害恶，氏族既不能阻止，又不能消除。由分工（开始为城市与乡村间的分工，复次为城市各派产业间的分工）建立的一些新团体，不仅创设一些以保护他们利益为目的的新机关，而且创设各种各类的新职员。

复次，少年国家的第一种需要，是需要一种自己的武力。这种武力，在航海业雅典人，最初不过是用以保护商船，对付各种小小战争的海军力。在梭伦以前的不确定时代，雅典人按照十二个种族划分一些小领土区域，叫做诺克拉利（Naucralties）。每个“诺克拉利”应供给一个各具全副武装（水兵，军需等等）的战船，和两个骑兵。这个制度给氏族组织以两重打击：第一，她自己创立一种再也不与全体武装人民相混合的公众势力（*force publique*）；第二，她初次在政务里面区分人民，便不按照血族团体而按照居住地域（*L'habitation locale*）。这种区分具有什么意义，以后还要详说。

氏族组织既不帮助被掠夺的人民，于是只替他留一新生的国家或者有一线的希望。梭伦的立法，似乎是国家帮助被掠夺人民的事实；但实际上不过是牺牲旧组织，把国家从新巩固起来。然而在梭伦手中要算开一系列所谓政治革命的先例，并且第一次侵害了财产权，原来前此一切革命都是拥护一类财产侵害别类财产的革命；各种革命要拥护这一类的财产自然不能不侵

害别一类的财产。法兰西大革命是牺牲封建的财产来救济资产阶级财产的；梭伦的革命是损债权者的财产以益债务者的财产的。照梭伦的改革，一切债权简直等于宣告无效。虽其改革案的详细，我们不得精密的知悉，但梭伦在他的诗中自专业已把负有债务的田原上一切抵押标柱推翻，并且把那些因债务而自卖为奴隶或逃走于外国的人们释放归国。以上所说的事情，惟有公然侵犯财产权力才能做到。实际上，各种各色的政治革命，从最初一次以至于最后一次，都是借着没收或强夺甲类的财产以保护乙类的财产的。所以从三千年以来，财产权惟靠侵犯财产权才得维持，这确是一种真理。

梭伦的大改革，是在纪元前五四九年举行的。第一步是改造新货币，质量比旧币为轻，以减贫民债务。其办法约可分为四点：（1）以土地为抵押的债务得以新币偿还；（2）不得鬻奴偿债；（3）禁止质身借债；（4）限定人民有田之数。

可见梭伦第一步的注意是防止雅典自由人堕于奴隶同等的地位，所以开始设立普通的预防方法，禁止人身为质之债约，复次规定个人具有土地的最大限度，以限制贵族们对于农人土地的贪欲。最后他乃改变政治组织，其重要各点如下：

设立四百议员的人民会议，每个种族选举一百个议员。种族虽然还是政治制度的基础，但这不过是把古制度摄收于国家的新组织之中。梭伦按照不动产的收入，区分公民为四个阶级：（1）收入五百米丁（Medinnes 雅典斗量之单位，一米丁等于法国 52 litres）谷物者为第一阶级；（2）收入三百米丁者为第二阶级；（3）收入一百五十米丁者为第三阶级；（4）不及百五十米丁或完全没有者为第四阶级。一切官职只有前面三个阶级才能占

有；而最高的官职（如雅康等）仅只第一阶级有此特权；第四阶级惟在人民会议里面有发言权和投票权。但一切官职都由人民会议选举；并且都要对人民会议负责任；一切法律也由人民会议订立；而第四阶级在人民会议中占多数。所以贵族的特权虽能在财富的特权形式中复兴一部分，而最高的权力则为人民所保留。

改革案的别方面，又把四个阶级组成为军事组织的新基础：第一阶级与第二阶级供给骑兵；第三阶级供给步兵；第四阶级为不着铠甲的轻兵，或在海军里面服务。征发或动员的时候，前三阶级的人民以财产的等差供给军食，并自备军器；只有备征募的第四阶级的人民有时或可得到军需与军饷的给与。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梭伦改革案的真性质，便是采用一种完全的新要素——私有财产——于政治组织里面。国家公民的权利与义务，都是按照他们不动产的地位规定的。随着有产阶级的势力陆续增加，旧的血族组织日益退处于无权而被驱逐，从此氏族又罹受一种新失败。

梭伦制度最可注意的，便是极力保持希腊民族“自由人”的地位，给后世立了一个统治其他民族的广大基础。在梭伦改革后的八十年中，雅典社会渐次朝着这个方向进行，并且继续发展到几个世纪。一方面如梭伦以前一样的集中土地和高利贷借，确是实行遏制了；但是别方面利赖奴隶劳动，商业手工业和美术业渐渐大规模的发达，而成为生产上主要的分业。于是雅典人越发聪明了，便专以掠夺非雅典人的奴隶和贱民（Clientele）文明的方法来代替从前掠夺自家公民的野蛮方法。动产、货币、奴隶和船舶益益加增，但是获得的手段和目的却与从前有限的时期不相同：从前获得不动产的手段是极简单的，现在却比较的复

杂了，并且各种财产都成为一己的目的物。

由工商业新兴的富者阶级，一方面竞胜了旧贵族；别方面又推翻了氏族组织残留的最后根据。氏族、宗族和种族的人员一经散居于阿替喀全境，便完全混合而不可区别；由此氏族宗族和种族遂一概不适合于政体的组织。一群一群的雅典市民，从此再也不属于任何氏族；外来的移民倒很能得各种公民权利，而在旧的血族团体里面的反乎没有。故外来移民的数目日日增多，而氏族组织不得不日趋于瓦解。

在这个时代中，起了一些的党争：有所谓平原党，代表贵族政体派；有所谓山岳党，代表平民政体派；有所谓海岸党，代表调和宪法派。贵族力谋恢复其特权，并且在某个时期，果然把他们的权力暂时恢复了。希腊遍地都是贵族专政。但是等到克立斯特尼(Cleisthenes)的革命一起来(纪元前五〇九年)，贵族的地位遂确定的被推翻了；并且随着这次革命，而氏族组织的最后残留也打得粉碎。

克立斯特尼，改变梭伦的旧制：在他的新宪法中，完全没有建立在氏族与宗族基础上面的四个老种族的地位。他换了一副完全的新组织，这新组织系以按照公民住居地域为分配的基础。这样以地域籍属人民的新方法（旧氏族社会系以血族籍属人民），本来在梭伦以前的十二“诺克拉利”里面业已发端，现在不过更为完全罢了。从此公民分配的决定再也不属于血族团体，而专属于居住的地域；也不属于人民，但属于人们所区划的土地；一切居民不过在政治上成为领土的单纯附属物罢了。

在横的方面：克立斯特尼，区分阿替喀全境为一百个行政区域，叫做地米斯(Demotes)。每个地米斯为一自治的行政单位。

每个地米斯的公民(Demes)选举一个首长和财政官,及三十个裁判官,办理各种细微的诉讼事件。每个地米斯有一个特别的神社与保护神,或一个英雄,并由公民选举一些祭司。每个地米斯的最高权属于公民会议(L'assemble des demotes)。这恰好与摩尔根所指示的美洲地方自治团体的都市原型是一样的。雅典初生的国家与近世完成到极点的国家,都是以同样单位做出发点;所不同的,不过是程度高低问题罢了。

在纵的方面:克里斯特尼,综合十个地米斯为一个种族。不过这样区分的种族与从前以血统为区分的种族完全不同:所以现在只能称为地域的种族。地域的种族不仅是一个自治的政治团体,而且又是一个军事的团体。每个种族选举一个种族首领(Phylargne);种族首领便是统率骑兵步兵以及种族领域内征集的全般军队之司令。至于十个种族对于雅典国家的权利与义务,系:(一)每个种族选举五十个议员于设在雅典的议会(梭伦定为四百名额,现在改为五百名额);(二)每个种族供给五只具有水兵与指挥的战船;(三)每个种族从阿替喀接受一个英雄为保护神,并且以这英雄的名称为种族的名称。

集合以上一切分子组成的雅典国家,是由十个种族举出五百议员组成的议会统治的;而最终的决定则属于每个雅典公民都可出席投票的人民会议;并且各种行政事务和司法,分由几个雅康与各种官吏掌理;从此雅典便没有最高权力的执政官存在了。

克里斯特尼的新制度,既撤废梭伦的四阶级制,于是遂增加极多的保护民——一部分是外来的移民,一部分是解放的奴隶。由此氏族的各种机关都被逐出于一切公家事务之外而成为废

物。但渊源于氏族时代的无形势力，和因袭的见解与思想，还是依然存在；不过延绵到几个世纪，才渐渐的完全消灭。从此以后只有国家的制度为人们认识的对象了。

由此我们可以认识国家的本质，在于一种与民众区别的公共势力。在这个时候的雅典，不过是由人民直接供给海军与国民军。这些海陆军不仅是用以外防敌人，而且是用以内防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奴隶。只缘公民的对面有奴隶，所以需要这公共权力。公共权力，最初不过以警察的形式而存在，即以强力监察奴隶的劳动或压制奴隶而使之服从，所以警察制度是同国家一样老的。十八世纪天真烂漫的法兰西人叫文明国家不用 Nations civiisees 的字眼，而用 nations policees，而 policer 在法文字典上早已训为“文明”的意义！雅典的国家和警察——徒步或骑马的宪兵队，殆是同时创设的。但这种宪兵队是以奴隶组成的。雅典自由人对于警察的职业是很鄙视的，他们宁为武装的奴隶所逮捕，而不肯做这样的贱事。可见已经在新的政治生活中的雅典人依然是从前氏族社会的旧思想；他们不知道没有警察，国家是不能存在的。不过此时国家还很幼稚，并还没有充分的道德权威使人尊重这种国家所视为必要而氏族所目为鄙贱的职业。

财富和工商业突然的发达，雅典国家怎样适合于这些新的社会状态，我们业已论证其大概。从此建立在各种社会制度和政治组织上面的阶级对抗，遂移其地位于奴隶与自由人之间和被保护民与公民之间；而往日贵族与普通社会的冲突，至今不复存在。在最繁盛时代：雅典自由公民的总数为九万人（妇女与小孩包括在内，成年男子不过两万人之谱）；男女奴隶为三十六万五千人；被保护民（外来移民与释放的奴隶）为四万五千人。平均

每个成年的公民，至少有十八个奴隶和两个以上的被保护民。这样巨大数目的奴隶，多半是在工场里面的监督秩序之下共同劳动，但是随着工商业的发达，财富积集于少数人手里，自由公民群众的贫穷又复显露于世。此处只有两条道路任这些贫穷的自由公民去选择：或以自己的手工劳动与奴隶劳动去竞争；或做社会的寄生虫。必然的结果，他们是选择了后者而抛弃前者，因为前者大家都视为可羞的贱事，并且可希望的利益很少。由此寄生虫渐渐形成为广大的群众，并且引导雅典国家至于完全破产。所以引导雅典至于破产，决不是民主政治，——如欧洲曲学阿世的学究先生所说一样，但是驱逐自由公民回避劳动的奴隶制度。

雅典国家的形成，是一般国家形成的典型：第一，雅典国家没遭外部或内部的暴力干涉便自然完成了（如 Pisistrate——山岳党首领，梭伦之侄，——在他的短期篡位中，并没留一点痕迹）；第二，雅典国家是直接由氏族社会产生出来的，并且是以极完成的——民主共和的形态出现的；第三，我们由雅典国家的形成，可充分理解其各种重要的特性。

第四章 罗马之氏族与国家

相传罗马最初是由一百个拉丁(Latines)氏族形成的种族建立的；不久既与较后移来的萨白种族(Sabiens)合并，这个种族也是一百个氏族；最后又由各种分子组成第三个种族，并且也是以一百个氏族为单位。这种传说，我们一见便完全知道除氏族以外绝没有别的自然的源头；并且氏族大抵不过是从继续生存于故乡的母氏族分出来的一个蜂巢。各种族的构成大都非异种

族的分子，并且是模仿古种族的模型；古种族的形成是自然的而非人为的，所以各种族的额面上也没带有他们人为构成的烙印，所不能排除的，不过为三个种族的各自核心（老种族的实在体）。介乎种族与氏族之间的为宗族，宗族是由十个氏族组成的。罗马人叫氏族为肯多（Gente），叫宗族为苛列（Curie）。三个种族合拢来，共有三十个苛列，和三百个肯多。

国家未产生前，氏族为社会的单位。美洲印第安人的氏族是原始的形式；希腊人的氏族是很发展的形式；罗马人的氏族也是很发展的形式。

罗马氏族，在城市时代的初期，至少还保持下列的组织：

（1）一切氏族人员有相互的相续权；财产在氏族以内。父权在罗马氏族中也如在希腊氏族中一样的盛行，女系后裔排除于相续权外。照吾人所知道的最古的《罗马法》——十二铜版律：第一位的相续人为儿子；没有儿子时，为男系近亲（如兄弟姊妹等）；没有男系近亲时，为氏族人员。无论如何，财产不能出氏族。此处我们可看出由财富增加和一夫一妻制惹起的新法律规条已渐渐采用于氏族的习惯中。相续权，原来在氏族人员中是平等的；在上面所说的变化之初期，开始限制为男系近亲，最后为儿子与男系后裔；而演进到十二铜版律的时候，自然更进一步，所以相续权的第一位为儿子，而第二位为男系近亲。

（2）有一块共同的墓地，叫做氏族墓（Gentilitins tumulus）。

（3）有各种共同的宗教祭祀。叫做氏族祭（Sacra gentilitia）。

（4）氏族内没有结婚的义务。这种规律在罗马从没变为成文法，但是一种永续的习惯。在罗马无数的配偶中，没有一对夫

妇是同一氏族的名称的。这种规律又由相续法证明了：女子结了婚，即丧失其男系近亲的权利，她便应出氏族；无论她自身和她的儿子，都不能承继她的父亲与兄弟的财产，因为她业已出嫁，在父的氏族里面没有一份相续的权利。这种规律的意义，便是立在女子不能与本氏族男子结婚的前提上面。

(5)土地共有。土地共有，始于原始时代种族土地的分配；但在各拉丁种族中，我们发见一部分土地归种族所有，一部分土地归氏族所有，即各家庭也有一部分土地。相传个人土地的分配始于罗慕路(Romulus，前七三五到前七一五年，罗马的第一个王)。罗慕路的分配方法：系将土地划分为三大部分，三个种族各得一份；每个种族的那一份又各分成为十份，十个宗族各得一份；每个宗族的土地又复细分于各家庭，每人所得地面为两久格拉(Jugera 两驾牛耕一日的样子)。然而我们在后还是发见土地仍然在各氏族手里。

(6)氏族人员有互相帮助互相救济的义务。

(7)氏族名称的权利。这种权利一直维持到帝政时代。释放的奴隶，也许其取他从前生人氏族的名称，但是不与他以氏族人员的权利。

(8)氏族里面，有容收外人的权利。开始是容收于家族(如印第安人一样)，这样便自然牵连到氏族的容收。

(9)族长选举与罢免的权利虽然没有书面的记载；然罗马初期的王、祭司及一切职官，都是由宗族选举或指名的，可知氏族的族长(Principes)也是一样的。纵令此时已规定要从氏族内一定的家族选出，然其必须经过氏族的选举，乃是毫无疑义的。

以上九项，是罗马氏族的特性。除掉父权一点外，与伊洛葛

氏族的各种权利义务是很相象的；所以此处只须把这异点去掉，便要显然透出伊洛葛人的面貌。

关于罗马氏族的组织，一般著名的历史学家常常陷于昏谬，此处不过举孟森（德历史家，一八一七——一九〇三年）为一个例证。孟森：“氏族的名称，除奴隶外，家族的男女全体并包括被养者与门客，都是一样给与的。种族（实际的，或虚构的）是从共同始祖产生出来的共同团体，祭祀埋葬与相续都是共同的，一切自由的个体——女子在内，都有属于这共同团体的权利与义务。已婚女子的氏族名称，到是发生困难。这种困难，只有使女子可与本氏族的人结婚，才能消灭。许久以来既已证明女子结婚于氏族外比结婚于氏族内多一层困难；在第六世纪，族外结婚还是一种特许的权利，须以报酬的名义行之……但在原始时代也有这样一类族外婚姻，是女子出嫁于丈夫的种族……这是绝对确实的，在古代的宗教婚姻中，既已规定妻须完全属于夫的共同团体而脱出她自己的团体。人人都知道已婚女子，对于她自己氏族的人员已丧失其能动的或被动的相续权利；但在反面，她又与她的夫，她的子，及她的夫与子的氏族人员之相续权相结合，所以她又被她的夫收养了。并且又入了他的氏族，她怎样还能站在氏族以外呢？”

然则照孟森的推论，罗马女子除许其在氏族内结婚外，便不能属于原来的氏族；从而罗马氏族是族内婚制而非族外婚制。这种意见与我们所知一切民族的经验完全相反。孟森全般的推论，都是根据泰特里夫（Tite-Live 拉丁历史家纪元前五九年至纪元后一九年）所记录的一节故事。这节故事是说纪元前一八六年，罗马元老院，对于一个寡妇——费西尼亚（Fecenia Hisba-

lla), 做了一个决议: 任这个寡妇如她已故丈夫给她的遗嘱权利, 听其自由处置或耗费其财产, 并任她在氏族外选举一个后见人去结婚, 且认这样的结婚妇人既不算为罪恶, 也不算为耻辱。

元老院允许费西尼亚(她是释放的女奴)可以在氏族以外结婚, 这是毫无疑义的; 因为在元老院未允许前, 她的丈夫既遗嘱在他死后其妻有在氏族以外结婚的权利。但这是在什么氏族以外呢? 是在夫的氏族以外, 还是在妻的氏族以外, 或是在同姓夫妻的同一氏族以外呢? 照孟森的肯定, 罗马女子应在氏族内结婚, 并且结婚后, 她还在这氏族内。那末此处所指的氏族以外, 一定是同姓夫妻的同一氏族以外了。由此便发生这样的问题: 罗马氏族既是内婚制, 在理, 费西尼亚的丈夫之本身便没有令其妻再嫁于氏族以外的权利; 费西尼亚的丈夫若擅自破坏罗马氏族内婚制的根本法而创此破天荒的遗嘱, 元老院对于这种违背宗法的遗嘱不加以否决而反加以承认, 决没有这样荒谬的法理。

复次, 假设罗马女子是同外氏族的男子结婚; 结婚后, 她仍然住在自己原来的氏族里面。那末, 照孟森所引费西尼亚的故事, 她的外来的丈夫竟有权许其未亡人到氏族外去再婚, 这简直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事体了。

最后, 只有这样一种设定才有成立之余地: 即罗马女子是与外氏族的男子结婚, 并且因结婚而出嫁到夫的氏族里面去。这样推论, 才可把以上一切疑难立即解释。女子因结婚而嫁出她的老氏族并且加入夫的氏族; 她以结婚的关系(非以血统的关系)而成为夫的氏族之一员。夫死了的时候, 她自然有承继夫的财产的权利。至于寡妇再嫁的问题, 为财产不出氏族计, 自然以在夫的氏族中重婚为最宜; 因而后世历史家便误认为氏族内婚

制。寡妇再在同氏族中重婚，这在一定时期必然成为普通的规律；然亦可以发生例外，即夫临死的时候，只以一部分财产遗与其妻，许她可以携此出氏族而与外氏族的人重婚，这亦是很简单很自然的事体，只须我们抛弃罗马氏族内婚制的奇怪观念，便可完全理解。因为孟森所误认的罗马氏族内婚制，原来就是摩尔根所说的氏族外婚制。

氏族外婚的表词(*Enuptio gentis*)，不过在这节引用文中才发见，此外在罗马全部文献中都找不出这样的字眼；外婚的表词(*Enubere*) 在泰特里夫的书虽然发见三次，但并没指明为氏族的外婚。所以仅凭这节故事来证明罗马女子只许在氏族内结婚，实是一种幻想。这种幻想是绝对不能成立的。因为泰特里夫的话，或是仅限于说明女奴解放的特殊事件，而非说明一般处于自由地位的妇女；即使是说明一般自由地位的妇女，也不过是在反面证明一般妇女都是氏族以外的结婚，并由结婚而引渡于夫的氏族。所以从泰特里夫的话深究起来，乃是反对孟森而赞成摩尔根的。

罗马建立后约三百年，氏族的结合还很强固。例如发宾人(*Fabiens*)的氏族(贵族的氏族)，得到元老院的同意，独力担任与邻近凡雅人(*Veies*)的城市战争；据说，全氏族三百零六人皆出阵赴战，全体为敌人的伏兵所歼没；仅残留一个少年男子继承氏族的生命。

上面已经说过，十个氏族组成一个宗族，罗马人叫做苛列；罗马宗族所赋的各种公众的职权，比较希腊的宗族更为重要。每个苛列有些实际宗教，神殿，和特别的祭司；这些祭司的全体又组成一个祭司的团体。十个苛列组成一个种族，每个种族有

一个首长，兼军队司令与大祭司的职务。三个种族总合起来，即组成为罗马民族(Populus romanus)。

罗马民族既是三个种族形成的，那末，不是氏族，宗族和种族的人员决不能属于罗马民族，在最初一定是如此的。罗马民族最初的政治组织大略如下：一切公众事务最初是由元老院管理；元老院是由三百个氏族的首长组成的(德国历史家尼博尔为最初了解罗马元老院组织的第一个人)；这些元老都是各氏族的长老，族人呼他们为父老(Patres)；父老们的全体，最初组成为长老会议(Conseil des anciens)，后来叫做元老院。每个氏族的父老渐渐习惯在同一家族中去选择，由此种族中便造出一种最初的贵族；这样的家族后来自行叫做世家(Patriciennes)，并且要求有独占元老院和其他一切官职的特权。这样的要求经过一些时日，得到人民的认可，遂变成为真正的权利。

罗马的元老院(Senat)，等于雅典的议会(Boule)，许多事务归他议决，极重要的事项如新立法等，尤其归他预先审议，然后交由人民会议投票通过。人民会议，罗马人叫做 Comitia Cur iata，实际上就是苛列会议，是由三十个苛列组织的，每个苛列有一表决权。一切法律的通过与否决，一切高级官吏的选举，都由苛列会议取决。至于宣战与媾和，前者属于苛列会议，后者属于元老院。此外，苛列会议又为最高裁判机关，只有他能宣告罗马公民的死刑。

最后，元老院和人民会议之傍，又设立所谓 Rex；这个字义恰好等于希腊的 Basileus，原先毫无孟森所想象的具有专制权威的“王”的意义，不过是氏族长或种族长的称呼。勒克斯(Rex)为军事首领，兼大祭司与裁判长。勒克斯于军事首领的惩戒权

和裁判长的判决执行权以外，对于公民生命财产和自由，是没有什么权利的。勒克斯的职位不是世袭的；大约是先经前任者的推荐，复次由苛列会议选举，最后，由第二次会议举行庄严的授职典礼。勒克斯不称职或发现其他不良情形时，可以由人民会议罢免，如达克苏贝勃(Tarquin Superbe，相传罗马建国后，行王政二百五十年，七王相传，始于罗慕路，终于达克苏贝勃)被逐，便是明证。

在罗马有所谓王政时代，也同希腊有所谓英雄时代一样，实际乃是一种建立在氏族宗族和种族基础上面的军事的民主政治，并且是直接由氏族宗族种族产生出来的。即令各宗族与各种族不过成为各种人为的组织之一部分，然她们不啻仿照真正自然的原型，做成由她们所产生并且又包含她们全部分于其内的新社会。即使血统贵族(Noblesse Potricienne)自然要占得地位，而勒克斯们自然要逐渐扩张其权能，然这也绝不能变更氏族政治组织原来的根本性质，不过与原来的根本性质有关系罢了。

在这个时代中，罗马城市的人口，随着征服领土的扩张而增加，一部分是外来的移民，一部分是归服领域的居民。罗马国家全般的新附民（关于门客问题此处丢开不说）都是生活于旧的氏族宗族和种族以外，所以也不能组成为真正的罗马民族(Populus romanns)之一部分。他们在人格上都是自由人，只要纳税与服从军役，便得购置田产。但是他们既不能就任何官职，也不能参与苛列会议，更不能分受国家征服的土地。由是这般被排除于一切公权以外的自由人，便形成为平民(Plebe)，平民的数目不停的增加，他们的教育与军事智识亦不停的演进，于是他们对于深闭固拒的老罗马人(Populus)便成为一种威胁的势

力。加以后来老罗马人与平民之间，土地的分配，似乎已成为很均等的形势，然而工商业（虽然还不很发达）的财富大部分属于平民而不属于老罗马人，主宾之间，遂有相形见绌之势。

罗马上古的传说史，完全隐藏于莫名其妙的大黑暗之中；这种黑暗，后来加以法学派和纯理派各种各色的解释而益甚。罗马氏族的古制，果以什么缘因而灭亡？以及关于这种革命的经过情形与时日，究竟是怎样？从来不能有明确的判断。这种历史的大秘密，直到摩尔根和恩格斯才得到完全的解决。现在我们是容易明白了：罗马氏族政治崩溃的主要原因，便是由于普列白(Plebe)与波彼流(Populus)的争斗。

要去掉这种大冲突，而使国家的基础扩大巩固，便不得不根本改变制度。于是到了勒克斯，——色维特吕(Servius Tullius)相传为罗马第六王，纪元前五七八到五三四年)的时候，模仿希腊梭伦的改革，制定新宪法，创立新的人民会议，去掉波彼流与普列白的区别，把两个阶级的人民都包在人民会议里面，其惟一的限制只看他们是否能服军役。从前罗马有骑兵六队，只有固有的罗马贵族才得加入；现在色维特吕变更前制，把全体能服军役义务的男子，按照他们的财产，区分为六个阶级：有十万亚斯(as 罗马铜币)者为第一阶级，须出步兵八十队，骑兵十八队；七万五千亚斯者为第二阶级，须出步兵二十二队；五万亚斯者为第三阶级，须出步兵二十队；二万五千亚斯者为第四阶级，须出步兵二十二队；一万一千亚斯者为第五阶级，须出步兵三十队；财产不及一万一千者为第六阶级，叫做下等人民(Praetaires)，得免除军役与纳税的义务，但在形式上亦出步兵一队。总合拢来：骑兵十八队、步兵一百七十五队，合计为一百九十三队。每一队

为一百个武装的公民。由此，色维特吕更创立——百人队会议 (Comitia Centuriata)，把有财产的各阶级公民都纳于这个会议之中，每一队在会议中有一投票权；全体票数为一百九十三；一切案件只须九十七票便算为多数通过；然而第一阶级在会议中有九十八票（因为第一阶级所出的步兵与骑兵，合计有九十八队）。第一阶级在会议中既占固定的多数地位，所以无论其余各阶级怎样联合一致，若不获得第一阶级的同意，是不能议决什么事情的。

因为百人队会议的设立，于是从前苛列会议的一切政治权利都须移交于这个新会议。由此罗马的苛列与肯多，也如雅典的宗族与氏族一样，完全贬黜于无权，而变成为私家的团体和宗教的团体，不过在长久的岁月中还苟延其形式上的残喘；然苛列会议，不久便完全消灭了。不仅如此，罗马国家又把三个血统的老种族完全破坏，而另外创立四个地域的种族；并且把城市分为四区，令每个种族住一区，每一区赋与一些政治的权利。

所以罗马在所谓王政废除以前，旧社会秩序还是立在血统关系上面；现在这种旧制度完全打得粉碎，而让其地位于建立在领土区划和财产差别上面的国家之真正组织。此处的公共权力，便在于服从军役的公民所构成之武力的集团。这种武力的集团不仅是对付奴隶的，而且又是对付被排除于军役与武装以外之所谓下等人民 (Prolitaires) 的。

新政治组织成立不久，便把最后的勒克斯——达克苏贝勃驱逐了，达克苏贝勃确可算为篡立王权的一个人。从此，所谓勒克斯在新组织里面不复存在，而代以两个职权平等的康桑耳 (Consuls)，实际上就是两个军事首领(如伊洛葛的一样)，不过使

政治组织扩张一度罢了。以后罗马共和政治的全部历史，就是从这新组织内产生出来的。然而罗马共和时代的历史是同着贵族(Patriciens)与平民(Plebeiens)间的各种争斗开始的：最初是争官职就任权，复次是争国有土地的分配；而血统的贵族(noblesse Patricienne)卒致消灭于握有大动产与不动产的新阶级之中。这个新阶级不仅消灭血统的老贵族，而且次第吸收因军役而破产的农人(罗马制，兵士饷械概归自备；一般农人有战事则以身家田产为质以贷于富人；积不能偿，二者皆被没收；而战争得来的土地又尽数分于新旧贵族，农人既失其旧，又不得新，只得为奴。)之一切田产。这样广大的产业，新主人尽皆付于其奴隶去耕作，由此老的意大利民族的人口遂异常减少。这样的新形势不仅向以后的帝政时代开了门，而且向帝政之后继者——半开化的日尔曼人开了门。

第五章 凯尔特与日尔曼的氏族

凯尔特(Celtes)各种族，包括高卢(Galles)、不列颠、苏格兰、爱尔兰和皮克特(Picts)五种人在里面。凯尔特各种族的氏族制度，在其最古的法律中足以表现其充分的生气。即如爱尔兰和苏格兰两个种族，虽然被英格兰强暴的破坏了，然氏族制度至少在人民的感情和本能中今日还有几分残存；并且在十八世纪中叶，苏格兰的氏族制度还极盛行，其后不过都为英格兰的武器、法律和裁判厅所消灭罢了。

至于高卢，在英格兰未征服前数世纪的古法律，或至迟在十一世纪中的成文法，除掉往时普遍习俗的遗迹不论外，尚表示为

村落社会的共耕制；每个家族除五亚克(acres)的自耕地外，还有一块共同耕种地，其收获是分配的。这些村落社会就是由各氏族或各氏族的分支演成的。

克尔特各种族在十一世纪中，一夫一妻制还没完全夺掉对偶婚姻的地位。高卢人的婚姻，除开始七年不能离婚外，是很不固定的。在这七年中，只要是缺少三夜不同宿，夫妇便可离婚。离婚的财产的分配，夫取一份，妻取两份。至于家具的分配更须按照下列有趣的规则：如果要求离婚时的是夫，则嫁具应尽退与妻，夫至多只能留几件；如果要求离婚的是妻，则嫁具的大部分归于夫，妻只能得一小部分。小孩的分配，通例是夫取两个，妻取一个年幼的。离婚以后，即使女的已与别人重新结了婚过了门，她原先的丈夫要求要与她复合时，她例须承认其要求；由此夫妇两人再过七年的共同生活，而无须举行从前结婚的形式。未婚前女子的贞操问题，在他们既不十分注重，也不十分要求。妻若与别人通奸，夫有打她的权利，但除此以外，也不能有别的满意的要求。夫的气息若很恶臭，妻得据为要求离婚的理由，由这样理由而离婚，不要丧失她的丝毫权利。至于种族首领或王在一切婚姻中的初夜权(Jus primx noctis)，在法典中是占很重要的地位；要免除这种实际，故在法典中已规定购买的价格；这在后来便成为中古隶农的结婚税(Marcheta)。至于妇女在社会的地位，她们在人民会议中都有投票权。

爱尔兰妇女的地位，同高卢妇女是相类的。暂时的对偶婚姻非常之普遍；男子若是娶了第二个妇人，而与第一个离异时，须得赔偿她历年在家庭中的服役；至于遗产的分配，也没有合法儿子和私生儿子的区别。这样的对偶婚姻，与盛行于北美的婚

姻形式正相仿佛，在十一世纪恺撒所目见的群婚生活还未绝迹的时候，更不足奇怪。

爱尔兰的氏族制度，不仅见于陈古的法律中；实际上，到十七世纪英格兰遣去的法曹，才把氏族的土地变成为英王的产业。在此以前，爱尔兰的土地还是氏族或种族的共同财产，并没成为族长的私产。一个氏族人员死了，或一个家族绝了，族长又将其全部土地重新分配于各家族。

* * *

日尔曼诸民族，在迁徙以前即已组成为氏族，是没有疑义的。他们不过在纪元前几世纪才占领多瑙、莱茵、威斯笃尔(Vistule在波兰)和北海各流域；新伯里人(Cimbres)和条顿人(Teutons)，在纪元前二世纪的时候，还在盛行迁徙中；而绥耳夫各族(Sueves)亦到恺撒时才寻些一定的住居。

据达西德的记录，有一节最足以证明日尔曼人的氏族制度。他说：日尔曼人看重他的外甥如同他自己的儿子一样；在某几种情形中，外甥与母舅的血脉关系，比较儿子与父亲的关系还要更亲密更神圣；所以敌人每每要求以他们姊妹的儿子为质，比较要求他们自己的儿子为更进一层的担保。日尔曼人若以自己的儿子为质，其后自己不遵守条约而牺牲其儿子，这不过是他自己的事；若是以其姊妹的儿子为质，因不遵守条约而牺牲其姊妹的儿子，这便侵犯了氏族最神圣的权利；所以氏族的近亲在这少年质子还未被敌人处死以前，必千方百计保护，或是原先不把他交出来，或是事后完全遵守条约。由此可见达西德为此记载的时候，原始的母权氏族组织还是存在。不过到纪元前几世纪，向东方与西方大迁徙之后，即已由原始的氏族社会渐渐入了村落社会。

所以初移居于多瑙河南方的血统社会的表示，叫做Genealogia，这个表词的意义与“村落社会”差不多。而原来高峙民族(Ga-ths)与其他高部日尔曼民族定居后的社会组织——所谓 Fara者，亦为村落社会之异名。据恩格斯的考证，Fara为Faran的转变；Faran的意义为“行”，或“旅行”。可见日尔曼各民族在大迁徙后，即已渐渐由氏族制度变为马尔克(Mark)制度了。

在达西德时代(纪元后五五——一二〇年)，日尔曼民族的母权制方衰而父权制方兴：父的财产由儿子承继；没有儿子，则由父方的伯叔或母方的舅爷承继。容许母的兄弟可以承继财产，可见父权之兴还是达西德时代最近的事体。

母权恰好消灭之另一痕迹，是日尔曼人对于女性之尊重；在罗马人看起来，几乎不可理解了。与日尔曼人订条约，最确实的质证，莫如贵族们的少年女子；若是他们的妻与女有没为捕掳或奴隶之恐怖，便可激起全体日尔曼人奋战的勇气；他们若在妇中发见什么预言，便视之如神圣；即在极严重的情形中，他们亦喜倾听女子的意见。比如罗马威斯巴(Vespasian)帝即位(纪元六十九年)后，著名的西威理(Civilis)的大叛乱，即以女巫威尔达(Velleda)为日尔曼人和比利时人的首领，而摇动罗马在高卢的一切统治权。妇女在家内的权威是很大的，她们无论老幼都从事于各种劳动。

如以上所说日尔曼人的婚姻形态，已为近于一夫一妻的对偶婚；然而还不是严格的一夫一妻制，有势力的人大都可以过多妻的生活。女子的贞操，通常都要严格的遵守，与凯尔特人的习惯恰好相反。达西德在他记载中极力说明日尔曼人婚姻关系之固结性，只有其妻犯了通奸的事情才成为离婚的理由。但是他

的叙述中包含许多缺点，因为他是带着罗马人的文明眼镜去评判半开化的日尔曼人的。

这个时期的日尔曼人，由氏族制度产生一种“父之仇敌也应有遗产权”的义务，有这样权利的仇敌或与他是亲属关系，或是友谊关系。因此日尔曼人在法律上便产生一种和解律（Wergeld），用赔偿金来代替复仇。这样的和解律在十八世纪还被人看做日尔曼人的特殊制度，其实这乃是一切经过氏族制度的民族调和复仇行为的普遍形态。此外，达西德所述日尔曼人款待宾客之详情，几乎与摩尔根所述印第安人的情形是一样的。

至于土地的分配，日尔曼民族也如其他各民族一样，经过下列各阶段：（一）最初是氏族共有；（二）是分配于共产的血族团体；（三）是定期分配于个人的家族。恺撒与达西德的记载，同是日尔曼民族的重要史料；然恺撒所目击的土地分配情形是第二个阶段，而达西德所目击的土地分配情形是第三个阶段。故前此关于达氏记载的解释纷争极烈，现在则已完全不成问题，因为达氏的记载后于恺撒一百五十年，在这一百五十年中日尔曼民族的经济生活由村落集产时代刚刚演进到土地私有时代的发端，这是毫不足奇的。达氏的记载中也说：“他们的耕地是每年交换的，此外也还充分保留一些共有土地。”这种农地分配情形恰好适合于当时日尔曼人的氏族组织。

在恺撒时代（纪元前一〇一——四四年），大部分日尔曼人恰好得着定居，并且尚有一部分还在寻觅之中。在达西德时代（纪元后五五——一二〇年），日尔曼各民族定居已亘百年，而获得生活资料的生产方法也随着进步。此时他们所住的是丸木小屋；所穿的是粗野的羊毛或兽皮外套，女子与贵人的下衣也还是

麻的，大都还未摆脱原始野蛮时代的风味；他们的食物有乳、肉、野果以及麦酱。他们的财富是家畜；但家畜的种数还很恶劣，比如牛体窄小而无角，马也只有小马而没有大马。货币，只有从罗马输入少额的罗马货币，而不大使用。他们对于金银既不知道加工制造，也不知道尊重可贵。铁是很稀少的，仿佛只有莱因与多瑙河流域各种族才有少量的输入。他们模仿希腊拉丁的文字，不过用为秘密的书写或宗教的符术。把人做祭神的牺牲，还是他们通常的习惯。简括一句：这个时代的日尔曼民族，恰好由半开化的中期过渡到半开化的高期。

在直接邻近罗马的各日尔曼种族中，因为罗马制造品的易于输入，反阻碍了他们自己五金业和织布业的发展。除了远居于东北或波罗的海沿岸各种族以外，这类产业之不能自行发展，乃是全然无疑的。比方在谢勒威奇（Schleswig）湖畔发见的一些武器碎片——铁长剑、战甲、银盔，等等，同着一些罗马二世纪末的钱币，以及日尔曼民族的五金制造品；这些日尔曼人的五金制造品，本来是模仿罗马的，因为技术不大完成，遂呈现出一种特殊的模样。后来半开化的日尔曼民族一经移入文明的罗马帝国，便到处把他们自己的固有产业终止了；只有英格兰一处为例外。

最后，我们又可研究其适应于半开化高期的政治组织：据达西德的记载，处处都有首长（Principes）会议和人民会议存在。最重要的事件归人民会议议决；次要的事件由首长会议决定。在半开化初期，人民会议只有氏族有之，种族或种族的联合还不能有此组织。首长之外又设有军事司令（Duces）。首长与军事司令很不相同，完全同伊洛葛的情形一样。首长们的生活之一部分

还是与其他氏族人员是一样，所不同的不过以家畜谷物等为其荣誉的赠与；他们也如印第安人的萨响一样，是在同一家族中选举的。后来变迁到父权制，遂同希腊罗马一样，渐渐成为世袭的选举地位，而各氏族中也就因此形成一种贵族。这类上古的贵族，叫做血统的贵族 (*Noblesse de tribu*)，其大部分都消灭于迁徙之中，或迁徙以后。至于军事司令的选举，则不问其来历如何，而只问其能力。各军事司令的权力很小，并且一切行动均须遵守先例。而真正的权力乃属于人民会议；种族长或王为人民会议的主席，一切由人民决定；否决的时候，大众喧嚣表示；赞成的时候，大众的喝采声与武器声一齐喧叫起来。

人民会议同时又是裁判厅，诉讼的判决在此，死刑的宣告也在此。各氏族及氏族以下各团体，皆于一个首长的主席之下为集合性的裁判；事实上，主席的首长不过是辩论上和问讯上的指挥者。在日尔曼各民族中，一切原始的裁判所莫不带有氏族社会的集合性。

日尔曼各种族间的联合，自从恺撒时代以来即已形成，当时在某几个种族之间，已经有后世史家所谓“王”者存在；最高军事首领渐带独裁的意味，有时也竟达其目的，如希腊罗马的故事一样。然而这些幸运的篡夺者并没有绝对的权威，不过初由他们开始打破氏族组织的约束罢了。

例如解放的奴隶因为他们不能属于氏族所以居于下级的地位；然而新王身边所宠爱的奴隶常常容易跻登富贵尊荣的阶级。这样的事情，在那些军事首领征服罗马帝国而成为各大国之王以后，尤其盛行。比方在弗兰克，奴隶与解放的奴隶，最初在宫廷中占重要的地位，复次在国政里面占重要的地位；大部分的新

贵族，便是从他们中产生的。

这样随着军事组织而来的政治组织，自然容易助成王政之出现。在美洲印第安人中，我们已知道在其氏族制度之傍，怎样因战争的计算而创立些特别的组织。这样的特别组织在印第安人中不过是暂时的；而在日尔曼人中则已取得永久性质的地位。此时日尔曼的军事领袖，业已成为赫赫夺人的大头领，由他集合一些贪得战利品的少年于麾下：这些少年对于他须负人格的忠诚之义务；而他对于这些少年也须留意于怎样满足其掠夺欲望，以及怎样尽其抚循士卒之能事；并且把他们分划为若干等级的组织。比方若是小出征，则头领之傍有护卫团之组织；若是大出征，则又有高级将校团之组织。征战的目的，完全在掠夺；也只有继续不停的掠夺，才能维持日尔曼民族团结的状态。这样掠夺的战争事业发达到恰当程度，一面破坏从前氏族制度的自由，一面促成最初的王政之出现。后来完全征服了罗马帝国，王的扈从的人们，遂与罗马宫廷的臣仆奴隶成为将来贵族的组成要素。

总之，日尔曼各种族形成为大民族的时代，与希腊所谓英雄时代罗马所谓王政时代同一政治组织：（一）人民会议；（二）各氏族的首长会议；（三）渐谋获得实际王权的军事首领。这种政治组织比较她所从出的氏族组织自然更为完全，并且为半开化高期的政治组织之典型。氏族组织到了完成这种新组织的时候，社会情态已经超越原来的各种界限与秩序；最后遂把氏族完全推翻而代之以国家。

第六章 日尔曼国家之形成

日尔曼人是一人口非常众多的民族。我们据恺撒的记载，便可估得各个民族人口的约略观念：当时住在莱茵河左岸的兩西伯特人(Usipotes)和陶克特人(Teucteres)的人口约有十八万头(妇女与小孩在内)；然则每个民族的人口已近十万头左右，比伊洛葛全盛时期人口不足二万头的数字大了五倍。

当时日尔曼人散布的地域——到威斯都尔河(Vistule)止，约有五十万平方基罗米突。每个种族的人口平均有十万头；每个种族所占的土地平均有一万平方基罗米突。准此计算，日尔曼人的总数在五百万以上；而每平方基罗米突平均有十口人(即每一方哩有五百五十人)。这样人口散布的数字，在现今看来已属非常稀少，而在半开化民族的集团看来则是非常重大。到第一世纪初期，日尔曼人的总数恐怕至少也有六百万。

日尔曼人定居以后，人口迅速的增加，工业也随着进步。照谢勒威奇湖畔发见的土品中之罗马钱币看来，当时波罗的海沿岸业已发达，金属工业和纺织工业；而开始以其剩余品与罗马帝国交易，这都是人口稠密的表征。

这个时代的日尔曼人，更在莱茵河多脑河和罗马边境的全线——自北海以至黑海，开始举行总攻击，这更是人口愈益增加，势力愈益膨胀的直接左证。这个战争绵亘三百年之久。在这长期的战争中，高峙各族之主要的全种族皆向东南进攻，组成为攻击线之左翼；向莱茵进攻的法兰克人(Francis)组成为攻击线之右翼；而以高部日尔曼人(Hante-Allemande)和多脑河上流

的日尔曼人为中坚。佛兰克人征服不列颠 (Bretagne) 之后,到第五世纪末,虚弱无力的罗马帝国对于日尔曼人的侵入遂完全洞开了门户。然而这种“蛮族”怎样能具这样不可抵御的势力呢?据达西德的意见,他们的武力所以那样强固,完全因为是一种血族的组织。

希腊罗马为上古文明之摇床;然而至此业已老死而入了棺木。在罗马世界的统治之下,从前各种各色的民族和语言的差别不复存在;古的亲族团体及其最后遗留之地方的或民族的自治团体也烟消云散。“罗马公民”的性质不仅绝无若何民族性 (Nationalite) 之表现,而且只是表现其缺乏民族性。纵然各种新民族的要素到处存在,各州的拉丁语次第分化,而从前意大利高卢西班牙等独立领地的自然界限还依然保留;然这些要素都不能结成为新国民的势力,在罗马国家的大刀阔斧之下,其进化力抵抗力和创造力都不能存在。统括偌大领土和那样众多的民众之唯一连带,只有罗马国家。而罗马国家便是这广大民众之最恶的仇敌和压迫者。各州皆为罗马所破坏;而罗马本身也同各州一样——成为一个州的都市,纵然有些特权,然却不是京城,不是皇帝或副皇的驻在所,因为他们不是驻在君士坦丁堡,便驻在特来福 (Treves) 或米朗 (Milan)。罗马国家是一架巨大而错杂的机关,专以掠夺其人民为目的。各种各色的租税、徭役和征发,使大多数人民日益陷于贫困的苦海。自总督、税吏以至兵士,所加于人民的压迫,已达到不可支持的程度。罗马国家以此赢得支配世界的统治权。罗马国家的存在权,对内在维持秩序,对外在防御半开化人。但他的秩序比没有秩序还更恶劣;所谓防御半开化人,在罗马人民看来,无宁谓为仰待半开化人之速来为

他们的救济者。

社会状态,也是同样的绝望。自共和末年以来,罗马的统治权完全建立在征服诸州的榨取之上,并且是无顾虑的榨取。帝政建立后,不仅未取消这种榨取政策,反而使这种榨取政策规则化。帝政衰微,租税赋役愈益苛敛,官吏对于人民愈益无耻的掠夺与压迫。罗马的统治阶级绝不从事于工商业,他们所从事的始终不过高利借贷之一事。从前旺盛的商业,类皆覆灭于官吏的苛征之下;普遍的穷困,使商业、手工业和技艺莫不退步;由此人口减少,都市衰颓,农业也回复于极低度的状况。这便是罗马统治世界的最后结果。

农业为上古最主要的生产。自共和末年以来,意大利全境差不多都成为使用奴隶的大田庄制(Latifundia),其所行的方法约有两种:或将土地置为牧场,只畜少数奴隶牧养家畜;或将土地置为田庄,畜多数奴隶群众从事于大规模的园圃农作,其出产品一部分供地主奢侈,一部分贩卖于各都市的市场。各都市既衰落,田庄产业遂随着这种衰落与其地主之贫困而破产而灭亡;只有各大牧场还得维持或扩张。于是建立在奴隶劳动上面的大田庄制不能再产生赢利(纵然这制度为当时大农业唯一可能之形态);所以小农业又复成为收支相抵的唯一形态。这样一来,各大田庄次第分成许多小片段出租于一些世袭的佃农;每年的收获,佃农所得不过六分之一,甚至仅得九分之一。佃农固着于土地,可以随着一块一块的土地出卖;也可以说他们不是奴隶,然而他们也不是自由人。他们不能与自由女子结婚;他们相互间的婚姻并不被视为完全有效的婚姻,不过看做奴隶间的单纯的交媾。简单一句,他们便是中世纪的农奴之前辈。

由此，上古奴隶制度的职分便到了他的终止时代。大农业和都市的工场里面都没有奴隶制度存在了，因为既没有消纳其产品的市场，又不能获得赢利。帝国全盛时代的大生产，至此皆代以小农业和小工业；这样小农业和小工业里面都无须使用多数的奴隶。所以此时除富家的家庭奴隶以外，社会中再也寻不出奴隶的地位。然当此奴隶制临终的时候，一切生产上的劳动依然被视为奴隶的事业，罗马的自由人皆不屑为。所以正面是奴隶解放的数目增加，反面是佃农和自由的贫民的数目增加。收支不能相偿，所以奴隶制度终为消灭；然而生产上的劳动，在习俗的遗传上又为自由人所鄙视。于是罗马世界陷于两头无出路：即奴隶的劳动在经济上为不可能；而自由人的劳动又为道德风俗所不许。奴隶的劳动既不能再成为社会生产的基础，自由人的劳动又不许其成为社会生产的基础；所以唯一医治这种状况的方法，只有全般的革命。

佃农外，又有些自由的小农。为防避官吏和高利贷借者计，他们只有托庇于强有力的（诸侯）保护之下。不仅个人如此，全社会皆然。所以第四世纪的皇帝对于这桩事情发布许多禁令。但是要用什么代价去换这种保护呢？其条件便是农人将其土地奉献于其保护者，其保护者便成为大地主的封君，以过收益的生活（到了第九和第十世纪，教会又极力模仿这方法，以扩张其势力与财产）。这又是农人由虎口转入了狼口。纪元四七五年的时候，马赛主教萨尔文（Salvianus）曾愤激的起来反对这种劫掠，他说罗马官吏与封君的压迫比半开化人残酷得多；所以罗马人多逃亡到半开化人所占领的地方去。罗马公民托庇于半开化人的统治之下决不如托庇于罗马统治之下的危险。因穷困而卖子

女为奴婢，在当时几成为普遍的现象。

半开化的日尔曼人之侵入，可说是解脱罗马人于他们自己的国家重压之下的好机会。日尔曼人取去他们的土地三分之二；开始是照氏族制度分配；因为征服者的人数比较为少，所以不分配的土地非常之多，而以之为各氏族的共同财产。在每个氏族的各家族团体之间，各有一份平均分配的耕地与牧场；最初是行定期分配法，后来这种习惯在罗马各州里面便丧失了，分配的土地皆成为各家的私有财产，并可自由出卖。森林与牧场依然不分配，保留为共同使用；耕地的分配方法，依古来的习惯由全体议决。许久以来，氏族已固着于村落，日尔曼人与罗马人渐渐混合，因而团体的结合亦渐次丧失其家族的特性而带地域的性质；故氏族遂溶合于马尔克的组合之中，而在马尔克里面也可时常发见原来亲族结合的痕迹。所以氏族的组织，至少在法兰西北部，英格兰、德意志和斯干的那夫诸国（因为诸国皆有马尔克的组织）已不知不觉变成为地域的组织，并且融化于国家组织之中；然而组织氏族之原始的民主的性质还是保存。

氏族、种族，以及全民族中的血统关系，随着征服事业的发展而解纽和衰颓；对于被征服者所建立的统治权是与氏族制度不能并存的。此处我们得见氏族与国家交替之大观：日尔曼诸民族既成为罗马诸州之主人，然则怎样组织其被征服的民族呢？既不能把多数的罗马人包摄于日尔曼的氏族团体里面，也不能以少数的日尔曼人去支配多数的罗马人；罗马的地方行政团体大部分在当初还是保持，所以要统治罗马人至少要设立一个等于“罗马国家”的机关来代替罗马国家；这样相等的机关，除了新建一个国家外，没有别的办法。所以氏族的代表者遂转变为国家的

代表者，这种变化在各种事态的迫促之下是很迅速的。征服民族最直接的代表者是军事首领；因为征服地域对内的防护要求给军事首领以强大的权力，由此军事首领的军权便变成为王权了。

现在且讲法兰克帝国。不独罗马帝国的广大领土，属了胜利的萨利族 (Saliens)，而且还有其他一切宽大无垠的土地，大的，小的，不属于个人的集产村落——尤其是一切大森林地带，都归了他。最高军事领袖变成为王的时候，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全民族的财产变为王的所有，而随他所好以赐给或让与于他的扈从。这类扈从的人是原先的护兵和军官，后来又加以宫廷中宠爱的奴隶与臣仆。最初是劫夺人民的土地恩赐于这类人；复次是采用贡纳利益的形式，砺山带河，食毛践土，以之封建于这类人，实际不过又是从新损害人民以建立新贵族的基础。

不但如此；到了这个时候，再也不要梦想用上古氏族的政制来统治这样广大的新王国了。族长会议，久已废弃不能召集，后来遂永远代之以王的侍臣会议；上古人民会议在形式上虽然还是维持，但她不过渐渐变为新贵族与军队中各低级首领之简单的集会。至于法兰克的自由农人、地主以及平民群众由永续不停的战争与征服事业的破坏，莫不倾家荡产，——特别是在沙立曼大帝 (Chaslemagne) (七四二——八一四年) 之下——简直与从前共和末期罗马农人的破产状况没有两样。法兰克人民从前是全体具有武装的，自从征服法兰西后，因为普通一般贫穷的结果，只有五分之一还能具有武装；最后只能应王之募而成为新贵族阶级的奴隶军队。沙立曼大帝死后，内乱纷起，王权衰弱，诸侯递相篡夺以图继承皇位；最后诺尔曼人 (Normands) 侵入，遂成功法兰克农人的完全破产。沙立曼死后五十年，法兰克帝国

之不能抵御诺尔曼人的蹂躏，也如四百年前罗马帝国之不能抵御半开化人的蹂躏是一样。

此时的法兰克帝国，不特对外不能抵御诺尔曼人的侵入，而且对内不能维持紊乱的社会秩序。法兰克的自由农人，降到从前罗马佃农一样的地位。战争和劫掠的横祸无穷，而王权式微，保护能力非常薄弱，所以农人们不得不自置于封建贵族和教会权力的保护之下，但是这种保护的代价是很贵的。如高卢的农人，他们把自己的土地奉献于上等的诸侯，他们再以种种缴纳租税的形式从诸侯手中领土地去耕作，这在事实上不过是换得些新的服役和负担罢了。他们一经降到这个附属地位，便逐渐丧失其个人的自由；不到几代，已经大部分成为农奴。自由农人破产成功之速度，我们一考圣石门普勒寺（Saint-Germain-des-Pres）的土地册便可想见：在沙立曼时，生活于这教会广大的土地之上的有二千七百八十八户，几乎尽是法兰克人；其中二千零八十户为佃农；二百二十户为奴隶；三十五户为贱民；仅仅八户为自由的村民；然而这尚是在沙立曼时代！从前萨尔文主教对于封君愤激反对与咒骂的劫掠方法，现在又成为教会对于农人所采用的普遍策术。农人奉献其土地于教会，教会又坐过其收益的生活。这样的情形，又要引起以后四百年新发展的起点。

但这样的循环现象，归究起来，不外两事：第一，罗马帝国临终时的社会秩序和财产分配的状况，恰好与当时农工业的生产程度相呼应，而为必不可免之现象；第二，以后四百年中，生产状况既无重大的进步也无重大的退步，所以重新采用从前的分配制度并产生同样的阶级状况，这也是必然而不可免的历程。在罗马帝国的后几百年中，城市对于乡村业已丧失其威权，并且这

种威权在日尔曼统治的几百年中仍然莫能恢复。这也是因为日尔曼人的统治仍然立基在农工业发达的低程度之上。这样全般的情形是必然要产生强有力的大地主(诸侯)与附属地位的小农的。从前罗马使用奴隶的田庄制和新的徭役大耕耘之两个方法都多少不能强加于这样的社会。如沙立曼大帝所征发之浩大的徭役,其所建立之各大都城,类皆不旋踵即消灭不留痕迹;只有各大教堂才得继续存在。可见由他所浪费的广大徭役只能用之于寺院等土木工程,而不能用之于生产事业。寺院是些建立在独身主义上面的不规则的社会团体;实际,乃是封建制度必需具有的“不生产的劳动者”之惟一组织。

然在四百年中,却有几种进步。上古的奴隶制度业已消灭;而鄙视劳动的自由贫民也久已湮没无存。罗马佃农和新农奴之间,有法兰克的自由小农存在。临终的罗马帝国之“无益的回顾与徒然的争斗”都已静寂的死了,并且埋了。第九世纪的社会阶级不形成于罗马衰亡的文明死水之内,而形成于新文明分娩的痛苦之中。强有力的大地主和为他们服役的农人之间的关系遂成为以后新发展的起点。此外,这显然很不生产的四百年中,却又产生了一个大莫与京的结果,——即产生了近代的各民族,为西欧人类以后历史的改造与重兴之张本。质言之,即日尔曼各民族实复生了欧洲;所以在日尔曼民族时代,欧洲国家虽然解体,犹未至为东方回教徒萨拉森人(Normanosarasin)所征服;不过收益与保护的事业已向封建制度进化罢了。这样的变化,再迟两百年,随着生产的增强而益发展,所以十字军流血虽多,尚能支持而无大损害。

临终的欧洲,忽然吸入一支生气勃勃的日尔曼民族的新势

力，得以起死而回生，这不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神秘吗？日尔曼民族，不如一般历史家之所说，是一种天生的神奇势力吗？其实，没有什么神奇，也没有什么不可思议。日尔曼各民族，在这个时代，不过为具有充分发展活力的亚利安种族，并不是天生成他们为复活欧洲的特殊民族；不过单纯的因为他们是半开化人而氏族政体尚有生气，所以能具有那样的活力以复活久为希腊罗马文明所腐化而垂毙的欧洲。

他们的能力、他们的勇气、他们的自由精神以及他们在各种公众事务中之民主的本能，——简括一句，即罗马人早已丧失的一切性格惟他们还是具有，所以惟他们能以罗马世界的余烬去组织他们的新国家，扩张他们的新民族。这不是因为他们具有半开化高期的特性而为氏族制度之结果吗？

他们变化了上古一夫一妻制的形式，他们在家族中的权威很温和，他们给妇女以很高的地位，其高为上古世界之所未闻。这不因为他们是半开化人，氏族的习惯和母权时代的遗风还存在吗？

纵然转入了封建国家的时代，至少他们在德意志、法兰西和英吉利三个主要的地方还保留一部分氏族制度于集产村落的形式(马尔克)之下，并且使中世纪的农人有集中于各个地方团结其抵抗力之可能。所以中世纪的被压迫阶级既不同上古的奴隶一样，也不同近代的无产阶级一样。这不因为他们是半开化人，特别使用一种半开化的家族殖民制度吗？

最重要的是在日尔曼人统治之下，发展一种温和的隶属制度(即农奴制度)，这种制度以前是用于他们的本土，后来渐渐使用于罗马帝国，以代替上古的奴隶制。这种温和的隶属制，无

异是给农人以渐进的与团体的解放方法，而使之远胜于上古的奴隶地位。因为上古的奴隶制度，除个人偶然有立刻翻身或解放的惟一可能（如被主人宠爱的奴隶等）外，全体的奴隶阶级是决没有解放机会的（上古绝没有叛乱胜利而取消奴隶制度的例）；然而中世纪的农奴制度却有渐渐向近全阶级解放的希望之初步。这是什么缘故呢？也是因为日尔曼人是半开化人，他们还不须采用完全的奴隶制，所以既不用上古的奴隶制，也不用东方的家庭奴隶制。

总之，日尔曼人支持罗马世界和统治罗马世界的一切活力都是半开化人的活力；事实上，此时惟有半开化人才能使久为死文明所压迫所枯老的欧洲复返于少年。并且他们是在半开化高期的大迁徙时代振拔起来的，恰好与上述罗马世界的状况适逢其会，疾风扫落叶，自然是极顺利的。这便足以说明一切了。

第七章 由封建制到近世代议制的国家

封建制度是从平等中产生出来的等级权力组织(L'organisation hierarchique de l'autorite)；但卒由平等而演至于专制。欧洲的封建制度，与半开化的日尔曼人之入主欧洲有密切的关系；今欲明了这种制度之起源，必须再述日尔曼人的情形。

侵入西欧的各种日尔曼人，很与美洲发见时的各种伊洛葛人相类似，都是在半开化状态中，并且迁徙不定。据斯脱纳博(Strabou 希腊地理学家)说，定居于比利时和法兰西东北部的蛮族还不知道农业，单靠兽肉和乳制品以过生活；这些危险的野蛮人凶恶如狼，他们自由出入于广大的森林地带中，人类虽多，

只要添买些奢侈品及少许消费品便能在森林中过满足的生活。斯脱纳博又说高卢人的风俗也是一样的。当恺撒入英吉利时，他看见不列颠人与高卢人同其风俗：他们不知耕土地，以兽皮遮身，吃的是兽肉和乳制品，他们怪蓝色的身体可以骇退敌人，他们的两性生活是兄弟间共妻的。

这些半开化人中，平等的精神盛行；习惯与风俗，处处保守一种猎夫与战士的平等气概。当他们得到定居的时候，一部分人开始从事于初步的农业，一部分人依然从事于战争。有名的军事首领不过在组织远征队时号召一些愿意获得战利品与光荣的男子于他的指挥之下，在远征时间中，人人都是要服从他的，如希腊人服从亚格棉农一样。但在食桌上及宴会席上，首领与战士都是并列而坐，没有什么区别；远征队一归村落，他们又都是独立平等的，军事首领便丧失远征时的权威。

日尔曼人征服一块地方，间或也如希伯来人之执行神命一样，把那地方的居民尽行杀死；但通常总只劫掠城市，占领他们所需要的土地而定居于乡村，用他们自己的方法耕种土地，战败的居民仍许其在他们的法律与风俗之下过生活。土地是每个种族授一块的；种族的土地又再行分配于住居各村落的各氏族。几个村落由亲族关系形成一个团体，叫做桑町（centene 也有叫 huntari 的，也有叫 hara.lh 的）；几个桑町形成一个团体，叫做康脱（comte）；几个康脱形成一个团体，叫做都克（Duche）。这就是公、侯、伯、子、男儿等封爵之起点；如法兰克的茂洛维（Merovingiens）王朝，就是与这种政治组织初相衔接的。

凡不属村落所有的土地，归桑町处置；不属桑町所有的土地，归康脱处置；不属康脱所有的土地，归国家（Nation）处置。归

国家直接处置的土地通常是很广大的。在瑞典发见的土地领有阶段也是一样的；每个村落有些共有土地；桑町与康脱有些更大的共有土地；最后是国家的极广大的领域；虽国王宣布他有代表国家的资格，然土地还继续叫做共有土地(Terres Communales)。在封建君主政治里面虽然叫做王土(Terres de la Couronne)，然所有权也都属于国家。

日尔曼人入了定居的农业生活和受了基督教的影响之后，纵然还有少数的种族固守原来的风俗，然多数已逐渐丧失其战争的习惯。如达西德所知道的日尔曼人类皆摆脱了从前半开化的粗野风俗，他们已成为家居者和耕作者；不过如加特人(Cottes 第三世纪组入法兰克联邦)则还专门从事于战争。他们的战线散布得很广，四方八面都采取攻势而立于极危险的地位；他们既没有房屋，也没有土地，也不忧愁生活没有来源。他们到处可以获得粮食，所以到处有他们的足迹。于是别些种族的有名战士，都由他们的宴会，献物等兴奋剂集合于他们的号召之下，而准备随从他们做远征的事业。由此加特族的战士以及受了封地的军事首领遂形成一种永久的军事团体，对于那些专门从事农业劳动的种族，担任一种保卫的责任。

但一部分半开化人，甫脱战袍而归顺于罗马；而别部分半开化人又乘之而兴。连续几百年之中，半开化人不断的蹂躏欧洲。罗马帝国要防御半开化人的侵入，乃募集归顺的半开化人，于边界之上广置屯田兵，给他们以土地谷子牲畜及现银。这种利用半开化人以防御半开化人的政策，当然不能不与他们以土地，委他们以国防的重责；但文明的藩篱便从此破决了。

当各方面的战争静止的时候，半开化人已成为家居的耕种

者，并且复建他们前此所破坏的文明工程。然而又有一种大祸从新爆发：由战争派生的武装强盗到处劫掠；惨杀与劫掠的恐怖在欧洲绵亘几百年之久。

入寇欧洲的半开化人与已经定居于欧洲的半开化人之间现在直接发生冲突。继续不停的内争，使各半开化民族对外全无势力，因为种族与种族，村落与村落之间互相反对而成仇敌，自然对外没有什么力量。半开化人的内讧，很足以宽舒罗马人亡国之惧，所以达西德说：“现在罗马之命运，惟幸敌人之内讧。”

乡村居民，因为要防御强盗劫掠惨杀的危险，乃于村落周围建筑堡寨以自卫。每个堡寨选举一个担任警备的酋长，堡寨里面的居民只要同属于一个种族都是平等的。这种酋长就是后来帝王派遣的封君之萌芽；他最初的职务不过是租税的收集者，人民会议裁判会议的主席，军事的监督者，秩序的维持者。每个堡寨的最高权属于长老会议和人民会议，酋长是要服从这两个会议的权威的。在弗兰克各种族的习惯，凡人民会议命令驱逐的外人而康脱的首领忘记执行，则须处罚两百金钱，这种罚金恰好与杀人犯的赔偿金额相等，可见原先的康脱并没有特别权威。凡后来封君所有的权力，以前都属于村落的全权会议，全村居民都要武装赴会，否则处罚。这样的村落具有一些殖民地和农奴。

日尔曼人一切职务的分工是以家庭做单位的：有专门纺织的家庭，有专门铸铁的家庭，有专门做魔术师和牧师的家庭，父传于子，子传于孙，一种职业与一个家庭成为不可移易的关系；由此遂产生一些特别的种族。村落的首领（对外防御敌人，对内维持秩序）开始是从全村居民中选举，被选的首领既没有什么不同也没有什么特权。后来也渐渐从一个家族中选举。比如在佛

兰克各种族里面，便由茂洛维氏族专门供给军事首领，和希伯来的牧师专门由列维（Levys）氏族供给一样。而最后则成为世袭的职位，连选举的形式也不经过了。然首领的职务开始不仅没有什么特权，而且责任非常重大，地位非常危险，什么责任都是归他负着。比如在斯干的那夫各种族里面，倘遇年成荒歉，便认为神怒之表示，而归罪于其王，有时甚至处以死刑。

村落的首领为防守便利起见，所以应有极高大坚固的房屋，庶被攻击时农人可以跑到这个房屋里面来避难。这种战略上的便利，最初是偶然的，后来成为首领必须具有的条件。印度各村落的边境，到处都有这种房屋以为避难和观察敌人之用。所以在一切封建时代，封君都有坚固高大的宫殿，四周建筑堡垒、城墙、战壕、钟楼和吊桥；正方形的大钟楼里面又要置一个大手磨，以为农人避难时组织防务贮藏牲畜制造食粮之用。这种房屋或宫殿，名义上是首领的，危险时是共同的。所以在集产村落里面，掘战壕、筑城墙、修宫殿等工程全村居民皆须担负。这种习惯便是后来纳税、征发、军役和徭役的权利之起源。

日尔曼人，无论战士与农夫，都要担负防卫本村落及首领房屋的责任；一闻命令，即须全体武装集于首领的麾下以御敌人，整日整夜驻守钟楼以观敌人动静。后来有些农人为不顿停农务免除这种军事服役起见，乃缴纳赋税于其首领，使他专养一些武装的军人担负防守的职务；各种犯罪的罚金之一部分也是特别用以维持其首领及军士的。

在军事上地位上正当要冲的村落，自自然然成为周围各村落的中心；当敌人来侵时，周围各村落的居民必率其牲畜谷物以及各种动产跑到这个中心来避难；在这种时间中，他们必须缴纳

赋税以维持一切军事行动和军士的生活；而这个中心的首领之权威必因此扩张于周围各村落之上。由此自自然然发生封建制度的萌芽。这种萌芽，若没有继续不停的战争与征服事业的催促，集产村落的生活还可停滞几百年之久（如印度村落社会）；否则各自独立的村落必日趋于合并，而这种萌芽必日滋日长而形成一种相互权利义务的社会制度，如中世纪的西欧一样。

村落首领在平时是没有什么特权的；但到了战时，他的地位便变成很重要了；人民不仅要给他以收入，而且要给他以忠顺。这些特权开始是可以撤废的；但战争继续不停，则自自然然变成世袭的特权；不久便形成了坐收赋税和徭役的封君。

封建贵族建立其权威之后，各人为巩固地盘及扩张其统治权计，相互之间便发生不停的战争，彼此企图集中土地财产和社会势力于自己之手。结果，战败的封君或是灭亡或是沦为从仆或是流为土匪头目，而战胜者则变成为头等公爵的大封君。

战败而未至灭亡的诸侯，每每率其败军沿路打劫，不仅劫掠乡村、旅客，而且劫掠富足的城市。由此各城市便武装起来，而托庇于大封君或王的保护之下。

但小诸侯完全消灭，相互间的战争完全停止后，乡村又要恢复安静的状态，而所须封君保护之必要必致大减；这个时候，封君不能不抛弃他的土地而自降为王公之臣隶，前此保护其臣仆及农人之地位便随着动摇。从此农人不须要军事的保护，而封建制度便丧失其存在之理由。所以封建制度是从战争产生的，也是从战争灭亡的。

然上之所述，不过为一方面之事实。当各诸侯互争雄长的时候，对于农人早已施行极端苛暴的专制政策；战争绵延，诸侯

之国力必致极其衰弱，而农人们必致喁喁望大君主之救助与保护。由此，君主专制政治(或是有限的或是无限的)乘势盛兴，多方利用诸侯间之冲突与战争而愈益扩张其威权与势力。有时各诸侯为势所驱，不得不弃嫌寻好，联合以抗君主；至此君主也不得不有所联合以制诸侯。然则联合谁呢？只有联合各个独立自主的城市(见上篇第十三章)。

各个独立自主的城市，在本地封君的压迫和连续不已的战争情况之下，早已自行武装，形成为小小的共和国，就是所谓自由市府或城市国家。城市国家因为抵制本地诸侯的压迫，所以也愿意与君主携手，而直接纳税于君主。城市共和国的主体，是由制造业起家的第三阶级(Tiers-etat)。在制造业发展的全时期中，第三阶级(即后来的大资产阶级)在君主与诸侯的政治争斗里面成为举足轻重的要素，而各大君主专制政治国家之隆盛，即系倚靠第三阶级为柱石。但是大工业与世界市场不停的开拓，资产阶级的势力不停的扩张，于是君主又不得不与诸侯联合以压抑资产阶级而永续其命运。由此，资产阶级的革命到处爆发；结果，到处都由她独占了政权而组织近世代议制的国家。近世代议制的国家，实际不过是资产阶级一切事务的行政委员会；资本主义发达到最高度的时候，便变成为帝国主义的国家，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之恶敌。

第八章 氏族与国家之兴替

我们在以上所述伊洛葛希腊罗马和日尔曼四大特例中，可以追踪氏族社会之所以存在及其如何解体之行程。据我们所具

有而经判正的考证：氏族社会产生于野蛮时代的中期；发达于野蛮时代的高期；到半开化时代的低期已达其繁盛之极点。所以我们不妨认此为进化阶段之起点。

伊洛葛人的氏族，最与吾人以说明之方便，因为我们仅得在此处发见完全发达的氏族社会。一种族是集合几个氏族而成的，原始的氏族人数增加的时候则分出一列姊妹的氏族，而母氏族遂成宗族之形态。种族的本身又孳乳为若干种族，此若干种族之大部分便是从前的老氏族。更进则有种族之联合，至少在某几种情形中，几个亲近的种族，有一联合的组织。这种简单的组织是完全适应于产生她的社会条件的。这种组织不过是自然凝结起来的；在她的内部不能发生后世社会的一切冲突。至于外部的冲突（战争），在这种简单的组织遇之亦容易解决；因为全种族宁可灭亡，而决不降伏。这种简单的组织既不需要统治权，也不需要奴属的地位。这固然一方面是氏族制度的宽大，而他方面也是氏族制度的弱点。在氏族社会里面还没有权利与义务的差别：比方分担一切公众事务，复仇，或容收外人，这是权利也就是义务；吃饭、睡眠、打猎是义务也就是权利，此等事情若还要请求或命令，在他们看来是很荒唐的。至于把种族或氏族分成为若干不同的阶级，在他们的社会里更不能有这样一回事。凡此都可引导我们来考究其各种秩序之经济基础。

这种社会，人口是极稀少的。在每个种族居住的地方不过相当的稠密一点；围着每个种族的住居有一带广大的猎地；其次有一个保护森林的中立地带，以为间别其他各种之用。此时的分工纯粹是自然的分工；换过说，此时只有男性与女性的分工。男子从事战争、渔猎、供给工具的材料以及食物的原料；女子管

理家屋、粮食及做衣服烹饪纺织缝衽等工作。男女都是产业的主人：男子在森林里面，女子在家屋里面。男女都是自己所制造或使用的工具之财主：男子为武器和渔猎器械之主人，女子为家具之主人。家庭是众多的家族共同的；房屋、园圃和船只都是共同使用的共同财产。近世法学家经济学家应用于资本主义社会之“财产是劳动的结果”这句话，惟有应用于这样的社会才算恰当。

但是人们决不会永远停止在这样的程站里面。在亚洲的人们，他们最先发见可以驯养的兽类，然后捕野牛而畜之；每条牝牛每年可生一条小牛，并可供给多量的牛乳，由此畜牧之用大宏。极前进的种族如亚利安族和闪密的族，他们由驯养家畜而入于游牧时代；牲畜愈发达，他们所散布与占领的地面愈远大。于是，这几个游牧种族便从多拉尼亚高原（亚利安族与闪密的族以前皆住在 *Touraniens*）其余的野蛮群众中（在半开化的初中期之间）分离出去，这便是人类社会的大分工之第一次。

游牧民族不仅比其余的半开化人更繁殖，而且比其余的半开化人生产些不同的丰富的生活品。他们具有丰富的兽乳、兽肉以及乳制品；此外还有丰富的兽皮、兽毛以及大宗毛织物的原料。他们剩余的货物既多，于是物物交易开始成为常规的事业。在以前的时候，只有在同种族之间偶然发生一点交易的事情，所以交易不过是偶然的或例外的；但一到游牧种族从其他野蛮人中分离出去之后，各种族间交易的必要条件即已具足，故交易事业遂发展巩固而成为常规的制度。最初，种族间的交易，系互以其族长做经纪；但到了畜群开始成为私产的时候，个人的交易逐渐盛行，卒至成为惟一的形式。游牧种族和其邻近各种族交易的主要商品是牲畜，所以牲畜成为一切商品的价值标准之主要

商品，到处都可用牲畜交换东西。简单一句，牲畜实代替了后来货币与现银的作用。这是必要的，因为在货品交易发达的开始，即迅速需要一种代替货币作用的商品。

园圃的耕种，是农业的先导，在半开化初期的亚洲人或者还不知道，他们迟到半开化中期才发明这种产业。多拉尼亚高原的气候不宜于畜牧生活，因为没有冬秣以度长久而严寒的冬天；所以亚利安人和闪密的人只有率其畜群而他去。可是此外对于谷类的耕种却具有天然的条件；黑海北方各荒原也是同样的情形。但最初人们不为豢养家畜而种谷类，后来才以之为人们的食粮。耕种的土地不用说还是种族的财产；复次分配于各大家族；最后才分配于个人。个人虽有某种限度的占有权利，但还不是固定的。

在这个时期的各种工业发明中，特别有两种是很重要的：第一是纺织；第二是熔矿与金属工作。铜与锡，及二者的混合物之熔制，是很重要的；因此发明一些铜制用具与铜制武器；但仍然不能代替石器而将石器时代取消；这样的事情惟有到铁器发明才为可能，然而此时的人们还不知道取铁与熔铁。金与银是已开始做宝玩与装饰品使用了，并且其价值已比铜属为高。

随着畜牧、农业、手工业各派生产的发达，人们的劳动力已能制造许多他们所未曾有过的物品以扩大其生活。伟大的生产力与每日劳动的总和同时增加，各氏族内渐渐感觉劳力不够。由此自然而然发生一种囊括一切新劳动力的志愿。但以什么方法来满足这志愿呢？便是战争。战争的目的在于捕获俘虏；于是遂把战俘变成为奴隶。劳动生产力增加，所以财富也增加。第一次社会的大分工既扩大了生产的范围，到了一切历史的条件

具足的时候，必致产生奴隶制度，乃是毫无疑义的事。所以我们可以说，由第一次社会的大分工产生了第一次社会阶级的大分裂：即主人与奴隶，掠夺者与被掠夺者。

种族或氏族的共同财产，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法变为各家长的财产？这样的问题，直到现在我们还不能十分明白；然这种变化，大旨应当在这个时期才得产生。这个时期，随着畜群与一切新财富的发展，家族中业已起了一种革命。男子的地位莫不是利益的，由他制造的必要工具与物品，都是他的财产。家畜更成为利益的新方法，开始的驯养，复次的看管，都成为男子的事业。牲畜属于男子，也就是商品与奴隶属于男子，他们可用牲畜交换奴隶。总之，一切利益可以使全生产归于男子；妇女不过随着男子享受罢了。

以前野蛮的战士与猎夫，常以在家中居于妇女之次位忻然自足；现在温良的牧人则不然，他们以财富自雄而居于第一位，贬谪其妇人于第二位。从前家庭的分工即已规定了男女间财产的分配；现在分工虽然还是一样的，可是分工的状态已变更了。从前妇女以专执家庭劳动而树立妇女在家庭中的优越地位，现在妇女以专执家庭劳动而树立男子在家庭中的优越地位；并且男子生产的劳动愈重要愈发展，妇女的家庭劳动即愈被其隐灭而居于不重要的附属地位。由此可知妇女解放与男女平等地位的意义，若妇女仍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专甯在私人的家庭劳动之中，乃是绝对不可能的。妇女解放，惟有当她能参与广大范围的社会生产而家庭劳动缩小至于最小限度的时候才为可能。这样的条件惟有在近世的大工业里面才能实现，近世的大工业不仅容许妇女劳动于广大的范围以内，而且显然要求

妇女参与，并有渐渐使私人的家庭劳动变为公众事业之势。

男子在家庭中的实际权威，最后扫除了一切与之反抗的障碍；这种男性的绝对权威更由母权倒霉父权行世（在由对偶婚变到一夫一妻制的时候）而益加巩固。这种变化又于氏族的旧制度之内生了一个大破绽。由此私人的家庭成为一种势力，并崛起向氏族社会示威。

极迅速的进步，引导人们到了半开化的高期，当此之时，一切已开化的民族都经过所谓英雄时代：即铁剑时代时，也可说是铁犁铁斧时代。人们既有了铁器，遂成为一切重要原料之主人；自金属以至地苹果这些极重要的原料，在历史中实占了一种革命的地位。铁可以开拓极广大的农业地面，与森林地带；而给劳动者一种极其坚硬与锋锐的利器，其坚硬锋锐为一切石器与其他金属工具所不能抵当。但铁器并非起初就有这样的程度，也是渐渐才有的，因为最初的铁比铜还更软。所以石器要慢慢才归消灭；石斧不仅在伊尔德伯郎（Hildebrand）的歌谣中发见，在一〇六六年哈斯丁（Hastings）的战场中还出了面。但这种进步不断的进行，他的态度是很激急的。

山村落变成的城市，现在已包围于石头砌成的城墙之中，城墙上面有些钟楼；城内的房屋也有石砌的，也有砖砌的。这样的城市是一个种族或几个种族联合的集中住居。这样，一面是建筑术的重大进步，别面又是危险与防护的需要增加之表征。财富虽增加得快，但是在个人财富的形式之下增加的。纺织，五金工作，以及其他手工业皆逐渐的专门化，使生产事业愈完成而愈驳杂。农业于谷类外又能供给菜蔬与果食，以及多量的油与酒。劳动既复杂，势不能以一人之身兼做各事，由此手工业与农业分

离，遂完成人类第二次的大分工。

生产和劳动不停的增进，自然会把人类劳动力的价值增高起来。奴隶在以前的时候不过为偶发的新生的事态；现在成为社会制度主要的要素。此时奴隶再也不是简单的助手了，乃成群结队的领到田原或工厂中去做工作。

因为生产分成为农业与手工业两大支，于是生产根本变更其性质：从前是直接为消费而生产，现在是直接为交换而生产。商品生产，就是由此产生出来的。随着商品生产而来的便是商业，此时商业不仅行于种族内部与各种族之边界，而且行于沿海各岸。然而商业还未充分发达；贵重的金属才开始成为货币商品，虽然渐渐有推行普遍之势，但是人们也还不知道加以铸造，他们不过是按照其重量以为交换。

由新分工的结果，又惹起新社会阶级的分裂。所以于奴隶与自由人的差异之外，又发生贫富的差异。因为各家长的财富之不均，遂破坏了从前共同耕种的集产村落社会。耕地开始分属于各个家庭，复次完全为各个家庭所永有。私有财产之渐渐完成，是与对偶婚过渡到一夫一妻制并行的；家庭至此遂开始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

此时人口已比较稠密起来了，对内对外不得不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于是若干血统相近的种族之联合，到处成为必要；几个联合的种族不久便把他们各自的土地合并起来而成为一个民族的土地。于是每个民族的军事首领——或叫 Rex 或叫 basileus 或叫 thindans——也成为必不可少的永久官职。由此更要产生人民会议，——这是以前还没有的。军事首领、议会、人民会议，都是氏族社会向军事的民主政治进化的表现物。因为战争频起，

军事的组织必然成为民族生活的常规职务。

邻近种族的财富，足以惹起最初以掠夺为业的贪欲。他们都是半开化人，掠夺在他们看来是很容易的事，并且以为比较劳动之所得更为可贵。战争在从前不过为复仇，篡占或扩张土地时用之，然而并不多见，现在则专成为劫掠事业的家常便饭。城市的周围从新建筑城墙，也不外是向氏族社会示威。城壕无异是给氏族社会掘了坟坑，城楼无异是表示其高度已达于文明。劫掠的战争足以增高军事首领的权力以及内部首领的权力；后继者的选举，渐渐习惯于同一的家族之中（尤其是父权采用以来），最初还不过是一种宽大的世袭的状态，复次是公然宣布，最后是公然篡立；世袭的王政和贵族政治的基础是从此树立的。

氏族政体的各机关，渐渐拔出其根基于人民、氏族、宗族和种族之中，而政体的全部是颠倒的：即种族的组织系以自由管理其事务为目的，而氏族政体反成为以劫掠与压迫其邻人为目的的机关。氏族既照着这样的目的进行，于是她的一切机关再也不是民意的工具，而成为统治人民与压迫人民的独立机关。但这种变化，若不是氏族内部划分了贫富两阶级，是决不会起来的。

至此人们已入了文明的门户了。文明的门户是由分工的新进步洞开的。在半开化初期的时候，人们不过直接为自己的需要而生产；纵然也有几种交换行为，不过以其剩余的货物偶尔为之。在半开化中期，游牧民族中已发见一种家畜的财产，家畜繁殖成为大畜群的时候，剩余货品遂能有常规的供给。同时游牧种族与落后种族分工之结果，产生两种不同的生产程序与单位，至此常规的交换条件即已具足。到了半开化高期，又产生一种

农业与手工业的大分工，由此直接为交换而制造的物品不停的增加，并且促进两种生产者之间的中间人的地位，使之跻于社会生活的必要行列。文明不仅巩固并且增进一切已经存在的分工，特别是增进城市与乡村间的抵抗，因为乡村的经济常常为城市所支配。此外更有可注意的，便是文明降临，又增加了人类第三次的大分工。这个分工是什么呢？是创立了一个再不从事于生产而专门从事于交换生产品的商人阶级。

以前惟有生产能决定新阶级的形成；参与生产的人不过分成为管理者与劳动者。现在于以上两个阶级之外，又出现一个绝不参与生产而能在经济上普遍支配生产并隶属生产者的商人阶级；这个阶级成为两种生产者之间必不可少的中间人，而彼此都由她剥削。商业的口实是解除生产者的各种困难与危险，而把生产品推销于极远的市场。商人在生产上似乎为极有益的阶级；实际，她乃是社会真正的寄生虫，专赖居中操纵赢得最重要的财富地位，而其最后对于经济生产上的贡献，不过是惹起一些定期的商业恐慌。

商业发展到这个阶级的时候，实际还幼稚得很，当然还没有达到上述重大的事体。然充其发展之可能是必然要达到那样地步的。由商业的发展，又产生金属的货币；铸造的货币渐渐成为不生产者用以操纵生产与生产者的新工具。谁是生产世界的主宰，谁执一切众生的命运？就是执持货币的商人。这种地位是由现银的铸造确定了的。自从现银的妖魔出世后，一切商品以及一切生产者皆五体投地俯伏于他的前面。一切别的财富的形式，逢着这个妖魔的面孔，莫不相形见绌而成为听命惟谨的贱货。这个妖魔虽然还在初生时期，然“自从盘古开天地”以来，从

未见过一种这样凶神恶煞的势力。现银于商业盘剥之外，又成为高利贷借事业的母亲。后世再也没有同上古雅典与罗马高利债权人蹂躏债务者的法律之残酷；然这样残酷的法律，在以上两个地方都是自然产生的习惯法，除了经济的必要外，没有别的强制力使之发生。

不但如此；此时于商品、奴隶和现银的财富外，又出现一种土地的财富。从前由氏族或种族一份一份分配于个人的土地权利，现在巩固为世袭的财产权。最后他们公然宣布这种分配法于他们为一种束缚；他们努力将这束缚解除，于是土地遂成为他们的新财产。这种新财产的意义，不仅是完全无限制的具有，而且可以自由买卖。以前土地还以氏族为地主的时候，出售是绝不可能的。现在新地主完全把氏族或种族的束缚取消，自己为直接的地主并且把以前氏族人员和土地不可分离的关系完全打破。这种变化也是因为现金出世：土地一面成为暂时的私有财产；一面成为可以贩卖得利的商品；再则以土地为抵押品的方法又已发明。抵押制之接着土地财产而起，也如卖淫制之接着一夫一妻制而起是一样的。

随着商业、现银、高利借贷、土地财产和抵押事业的澎涨，财富积聚并集中于极少数的阶级之手；同时民众的贫困与贫人的数目也飞速的增加。财富的新贵族阶级，到处都把从前种族的贵族推倒而使之落于贫民的地位；如在雅典，罗马，以及日尔曼都是一样的。于是自由人又按照财产分成为几个阶级；特别是在希腊，自由人变成为奴隶的数目异常增加；奴隶的强迫劳动，是当时希腊社会一切建筑物的基础。

现在可注意的是氏族社会中猝然而起的革命的进行。新生

的各种要素,氏族没有力量可以管束,氏族社会最重要的条件是一个氏族或一个种族的人员都要固定的集居于同一地方。这样的事情,许久以来已经终止了;到处的氏族和种族已混合了;到处的奴隶,居留客,外人,都杂居于市民之中。氏族社会之固定,不停的由频繁的迁移,住居的不定,贸易的转徙,劳动的变化,以及财产的升降而动摇。氏族的人员从此不能集居以株守从前共同的事务。他们再也没有空间来从事于那些不关重要的事情,如各种宗教的祭节等等。从前适合于保卫各个成员的需要与利益的氏族社会,至此因为劳动关系的革命和社会关系的变化,不仅于氏族社会的旧秩序以外发生一些新利益与新需要,而且这些新利益与新需要是完全与氏族社会的旧秩序直接冲突的。

由分工的结果,各种各色的手工业者组合一些各为其行业利益的团体,又产生一些城市的特别需要,这些都是与乡村的利益及需要相反的,必然要求设立些新的代表机关;结果,果然设立了。但这些团体的每一个,都由一些属于不同的各氏族各宗族或各种族的人员组成的,就是外国人也包括在内。这些新的代表团体都是形成于氏族以外的,最初是与氏族社会并立,复次是反对氏族社会。并且每个氏族组织的内部莫不轮流发生利害不同的冲突;这种冲突,因为集合贫人与富人,债权人与债务者于同一氏族或种族里面而达于极点。由此驱使大批新的平民群众,与氏族组织以外的人们结合成为一个地方的势力;而仍然留在氏族行列以内的人们自然不很多了。氏族组织,此时在群众看来,乃是一种特权的关门的团体;原始的自然民主政治,现今已变成为可憎的贵族政治了。一言包括,氏族制度乃是从没有阶级抵抗的社会产生的,乃是从原始的共产社会产生的,除开

公意以外，没有别的强制方法；现今经济情形既已根本变化，自然一切都要革故鼎新了。

但是按照新的经济条件的总和刚在铸成的新社会，她开始便把人们划分为自由人与奴隶，富的掠夺者与贫的被掠夺者。这样的社会不仅不能调和阶级抵抗，反而使阶级抵抗愈增严重而达于极端。这样的社会只有借着不停的公开的阶级争斗才能存在；或者统驭于公然建立在阶级争斗和利害冲突上面的第三种势力之下，而任对抗的阶级在经济地位上做所谓合法的争斗。氏族社会的生命已经过去了；她由分工——把人们分成为若干阶级——完全破坏了；于是国家乃代之而兴。

由以上各章看来，建立在氏族废墟上面的国家，可以得到三种主要的形式。雅典的国家是直接由氏族社会产生的，其时氏族社会内部所发展的阶级抵抗显然可见，故雅典的国家形式为最完全，并且最古典。其在罗马，当时的氏族社会业已成为闭门的贵族政体，其中多数的平民负担各种义务而被排除于各种权利之外；等到平民胜利的时候，遂破坏氏族的旧政体而建立国家于其废墟之上，不久氏族的贵族与平民遂混合了。至于战胜罗马帝国的日尔曼民族，他们的国家是直接由于征服外国广大的领土而其原来的氏族制度不足以资统驭产生的。因为这样的大变化是由征服事业引起的，所以旧的氏族社会里面既没有起严厉的争斗，也没有起完全的分工；又因为战败者经济发达的程度与战胜者经济发达的程度几乎相同，并且旧社会的经济基础尚是存在，所以氏族还能在马尔克的形式之下维持几百年之久，并且在某几个时期，氏族的面目反觉返老回童。

所以国家完全不是社会以外的强制权力；更不如黑智儿所

说是一种“道德理想的实践”或“理性的实现与想象”；他乃是社会进化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当社会分裂为几个不可调和的阶级抵抗与经济上发生利害冲突的时候，社会自身不能克制或医治这些冲突与抵抗；然而这些冲突与抵抗决不能自作自息；社会无穷的罹受这些无益的争斗，便自然而然要求一种显然统治社会的势力来平息各种冲突而纲维一切于“秩序”的界限之内。这种势力是由社会产生的，但是建立在社会上面，并且渐渐与社会隔离。这种势力是什么呢？就是国家。

以国家和氏族社会的旧组织比较起来，国家的第一种特性是按照地域以分配其组成分子之人口，简单说，便是以地属民。从前的氏族社会则不然，他的组成与维持，完全由于血统的关系以及团居于固定地方之感情；然而这样的事情，许久以来已不存在了。土地是不能移动的，但人们是可以移动的。自从人们知道划分行政区域，于是便任其公民各在所居之地以行使其权利与义务，而与氏族或种族全不相干。隶于国家的人民，按照地域为组织，乃是一切国家的通性。这种组织，在我们现在看来，好象是自然的；但在当时不知经过几许长期的困难与争斗（如在雅典与罗马）才得取到旧的种族组织之地位。

国家的第二种特性是所谓公共势力（Force publique）的组织；这种公共势力并不是直接从以前民众的武装势力而来的。然而这种公共势力（实际是特殊势力）却是必要的，因为自从阶级分化以来，民众自然产生的武装组织已成为不可能之事。平民的最大多数业已成为奴隶；比如雅典的奴隶有三十六万五千人，而成为特权阶级的公民不过九万人。雅典民主政体的武装人民，乃是对付奴隶的贵族阶级的公共势力，用以看管奴隶的；就

是对于一般公民也须设立巡警去管束。这种公共势力，在一切国家中都是存在的；这种公共势力不仅有些武装的军人，而且又有些物质的附属物，如牢狱和法庭之类，——这类东西都是氏族社会所没有的。这种公共势力在阶级抵抗还没发达的社会尚不十分重要；但在阶级抵抗发达到极点的国家，以及近代竞相侵略其邻国与弱小民族的资本帝国主义的国家，这种公共势力的扩张与准备，乃有覆灭社会全人类以及国家的本身之趋势。

为维持这种公共势力，于是公民对于国家要负担租税的义务。租税，在以前的氏族社会是完全不知道的。后来随着文明的进步，租税还不够开支，国家乃创立所谓国债而发行公债票。国家既有公共势力与征收租税的法律，于是由社会设置的官吏便高居在社会上面了。

国家是由于控制阶级争斗的需要产生的；但他的内部又产生一些阶级斗争。照普遍的定律说，国家乃是在经济地位上极占优势的阶级的机械，这个阶级借着国家的设立又成为政治上的支配阶级，并且由此又造成一些掠夺被压迫阶级的新工具。比如上古的国家乃是奴隶所有者用以控制其奴隶的工具；封建的国家乃是贵族阶级用以隶属农人的工具；近世代议制度的国家乃是资产阶级用以掠夺工钱劳动者的工具。然而也有例外：当两个阶级的争斗均衡不相上下的时候，此时的国家好象暂时独立于彼此之间而现出中立者的面目。比如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君主专制政治，乃是建立于贵族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均衡之上的；法兰西第一拿破仑的帝政和第二帝国乃是建立于利用无产阶级以反抗资产阶级和利用资产阶级以反抗无产阶级的背影之上的。这一类的最近产物，就是俾斯马克式的德意志新帝国，

也是建立在资本家和劳动者彼此争斗的均衡上面的。

历史中所有的国家，其给与公民的各种权利都是按照其财产为等级的；由此便可公然证明国家是一种保护有产阶级以对付无产阶级的机关。如雅典和罗马的国家，其给与公民权利的等级都是按照其财产规定的。在中世纪封建的国家里面也是一样的，封建的政权是按照土地财产为分配的。就是在近世代议制的国家里面也还是一样的。然而这种财产差异的政治面目并不是表示国家进化程度之高，反是表示国家进化程度之低。较高的国家形式是民主共和，——这在近世具有的各种社会条件中已逐渐成为必然的产物，并且在这种国家形式下只能激起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最后的争斗。民主共和已不能公然承认财产的差异了。

在民主共和国中，富人只以间接的方法执行其势力，但也是极有力的。一方面是官僚贿赂政治的形式（如美国），别方面是银行与政府联合的形式。这种联合是随国债的日益增加，生产和运输等社会行为日益集中而完成的。美国以外，法兰西共和国又是一个显著的例；就是小小的瑞士也是一个例。但也有资本与政府虽然亲密联合，其国家形式却不必须要一种民主共和的招牌，而普选程度已达于较高之点，如英如德皆在此例；并且资产阶级即直接借普通选举以行其支配。许久以来，被压迫阶级因为自己解放的程度还未成熟，所以她只得承认现社会秩序是唯一可能的，并且自己形成为资产阶级之极左翼。但是她到了自能解放的时候，她便会以自己的代表（非资本家的代表）组成她自己的不同的政党。所以普通选举在现在国家里只可给劳动阶级做一个自觉程度的寒暑表，此外更不能并且绝不能有所

进益了。然而在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之下，只要如此也就够了。到了恰当的时候，无产阶级起而征服政权，则无产阶级民主政治所达到的沸点必比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为更高。

是故国家不是永远存在的。在他所从出的远古的氏族社会里面并没有国家和政权的意义。经济发达的程度到了自然惹起社会阶级分裂的时候，才由这种分裂形成国家的必要。现在生产发达的程度已使我们大踏步的接近了这样的时代：即阶级的存在不仅不必要，而且成为生产上的大障碍。阶级必致于消灭也和其必致于发生一样。随着阶级的消灭，国家也必致于消灭。到那时候，社会将从新组织于生产者自由平等的和有组织的生产基础上面，而将全副国家机关移置于上古的博物院，使之与手纺车青铜斧并排陈列。然这不是一朝一夕可做到，要待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后才能做到。

第九章 各种政治状态与 经济状态之关系

氏族社会之政治形态，吾人于伊洛葛已可概见一般；伊洛葛的政治形态，乃是原始民主政治之完全典型。这种形态，完全是伊洛葛人经济状况的表现：生产者均是生产品的主人，收入状况全然相等；这部分人不得掠夺别部分人；这部分生产者不得凌驾别部分生产者。因为经济上没有分成阶级，所以也没有阶级抵抗，自然不需乎专制的集权的政治。劳动的共同，除却自然强制之外，绝不需要任何人为的强制力于其间，所以经济关系的常态常能按照自然的秩序而发展，人们的关系也能完全确保其自由。

在村落集产时代，村落即成为经济的自治团体。比如日尔曼人的马尔克，耕作者仍是共有其土地，共同其劳力，完全立于平等制度之下。这种经济平等的结果，政治的平等必然与之相适应。所以全氏族人员都能参与人民会议，为马尔克之最高权力机关，播种和收获时日的规定，酋长和各种职员的选择，税额的平定等事项，都由这种会议决定；决定之后，人人都有服从的义务。这种自治团体不仅未与社会分离，并且为有组织的社会之本体；共同政权，实为当时共同劳动和共同经济状态之反映。马尔克法律一面具备共同主权之体制，一面欲使劳力效率增高，对于人员的自由略有几分约束。然这种约束，完全本于生产上之必要，不仅使孤立生产者归纳于共同生产团体，并使共同生产团体足以强制其所属人员，俾有效之共同劳力得以充分发达。组成分子的自由，虽略受几分限制，然而并非出于上层阶级之权力，其目的亦非违反各个人员之利益。共同的意志是由各个人员形成的，各个人员即为这种意志之一份。一言包括，不外为生产者保护自己之利益，而自愿服从这种限制。故在这种社会组织之下，由经济的平等，产生完全自治的制度。即如印度村落之酋长，他行使专制权威的时间，只限于生产时间，即村落居民从事于渔猎耕稼的时候，这也与马尔克的强制同一理由。

共同劳动，为原始共产社会和村落集产社会的基础，这种社会与共同财产制相终始；私有财产制出世，这种社会即归于湮没。私有财产的派生物，第一是阶级，第二是国家。他所及于政治组织的影响，首先是破坏种族组织的编制而代以领地组织的编制。从此，国家的人民并不属于同一种族或民族，故领土日益扩大，人口日益增加。从前因为要使劳力结合于族制以内，故对

于领土的扩张和人民的增加皆有严厉的限制；自此以后，这种限制完全归于消灭。

私有财产不仅使政治组织变化，而且使主权的性质根本变化。在集产制的自治团体——如马尔克，不过在一个村落或部落内具有一种组织的能力，此外完全与社会同为一体而没有区别；及私有财产制确立，政权集中于少数富人之手，国家遂与社会断绝从来关系，仅代表社会中一小部分人之利益，并且为最少数人用以压制最多数人的武器。故国家对于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关系，显然划分为二：有产阶级居于支配和统治的地位；而无产阶级完全居于被压制的地位。国家的强制行为，对于有产阶级可以无限减少；而对于无产阶级可以无限增加。所以由此有产者及其寄生虫得以免除劳动的义务；而治人和治于人的大分工亦因而开始。有产阶级为保护并增殖自己的利益而创立国家，则国家对于最大多数无产的人自然要采取违反其利益之行动；所以国家的强制权力亦不可不强大。故自私有财产制设定之后，国家权力必然增加。国家权力增加，则其实质亦必变化，而成为有产阶级进攻退守之凶具。

豪富自握政权，故富即为权力之表现。通观私有财产演进之各阶段，莫不到处可以发见这种真理。每个时代的政权支配者，即为每个时代经济上的优越阶级，如上古希腊罗马之奴隶所有者，中世纪之地主，近世之资本家，莫不为政治上最高权力之阶级。

当私有财产初盛而国家还未创立的时候，管束奴隶劳动之全权，完全由各个财主之自主，各个财主欲取其财产之收入与谋其财产之增殖，即直接行使其个人的无限制的权威，初还不觉有

团结其同等阶级之人以把持政权之必要。然一旦觉到奴隶人数之众多以及叛乱反抗之可畏，则国家之组织势必迅速促成，而财主个人的权力势必集中于国家的形式之下，使国家运用其阶级的权力以对付其奴隶。这类上古的国家，最初虽然是种族的贵族占优势，然不久即为财产的贵族所承继。通观上古的变化，在政治上常占优势的，完全是经济的主权。

中古的隶属制与上古的奴隶制很有差别，所以政治的组织亦远不相同。上古末叶，土地生产力衰退，奴隶制与束缚劳动者身体的方法，渐渐不能适用，所以隶属制代之而兴。隶属制是为救济衰退的生产状况与改良劳动情形产生的，所以比较奴隶制宽大温和得多。隶属制内，从属的人数虽然扩张（因为自由贫民的沦入），但其压制程度则较前大减。从前财主对于奴隶的身体有处置之全权，故得榨取最大的利润；在隶属制则不然，凡隶属者所受分配土地，对于地主只纳一定的租额，地主的收入是有限的，远不能如前此财主对于奴隶之尽量榨取。并且封建制度把主权分于个人，行使主权者非地主之全体，但为每个地方的地主。还有一层，地主亦不能专有其政权，必须再分与教会的僧侣及其所属的家臣。僧侣与家臣为维持封建制度之要素，既受收入之分配，又得政权之参与，故收入制度若有变化则政治主权也随着变化。

及至中世纪末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迅速完成，隶属制度不能适用，于是“自由劳动”始随着“自由贸易”等口号同时宣布。资本家以领有资本和生产手段之一事即可收得最大的利润，所以对于劳动者的身体无须具有什么主权。于是个人的主权复与财产关系分离，而再现团体的或阶级的主权之形式。然这种形

式与上古的形式有一种重要的差异：上古须自由民才得享受政权，须有财产才得具有自由民的资格，即财产自由和政权成为三位一体的东西；近世则不然，法律上的平等自由无关于财产，而具有这种资格之无产者亦无关于政权之实际。上古制度，法律上之自由与财产有密切关联，而阶级的主权之分配亦包含于其中。然至近世，法律上之自由早已与财产的差异分离，最大多数具有平等自由资格的无产者实际不能参与政权，故政治主权实归资产阶级及其不生产的劳动者（资产阶级的政党、律师、新闻记者等等）所独占。资本家无须以个人的主权来维持其收入制度，故主权形式不如中古之单独的享有，而为阶级的享有，这完全是由经济事实决定的。

奴隶制和隶属制时代，财主和地主得依当时生产制的便利，免除其蓄财经营之俗累，可以全力从事于国家事务。如希腊罗马诸州之家庭经济，生产上若不遇特别刺激，则财主或地主无使用其智力于私事之必要，因此，他们遂以政治生活为其毕生行为之目的。所以上古世界不视公民与国家为一体，即说人们为政治的动物。近世工资制度则不然，资本家须以全力经营其生产事业商业机关或银行机关，绝不能人人直接行使政权，其行使政权的方法只有借着他们所豢养的政党去执行，这就是近世代议制盛行的原因。

这样看来，经济和政治组织之关系约可分为四期：在原始共产时代，经济为共同连带性质，故雏形的政治组织全然为共同的形态；奴隶制度时代，自由人对于政治上的共同连带仍视为生存必要条件，不过范围只限于富人阶级而非全民族；封建时代，政治的组织，除却自治城市之政治连带外，纯然以个人主义为其特

征；至于近世资本主义时代，经济上纯为个人主义，政治情形也完全与之相适应。

在奴隶制和隶属制之下，财主和地主都可致力于公众事务，故代议制决不能发生。及近世工资制成立，资本家经营生产与行使政权，二者势难兼顾，所以必须设立代议制。故工资制开始之英国，同时又为代议政治之先导。英国议院政治实行许久，德国始废古昔的族制政体而采用代议制，因为德国的大工业发达很迟。由此更足证明政治组织完全随着生产机关之变化而变化。

财富的收入，大别有地租和利润的区分。由此区分常使权力阶级分裂为二，而形成利害各殊之二政党。代表地租者常常反对生产的改良，故形成为保守党；代表利润者常常认改良生产为其利益，故形成为进步党。这为经济的冲突必致发生政治的冲突之通例。政党的组成分子，即为不生产的劳动者。不生产的劳动者，在政治上具有很大的势力，支配阶级的各种收入，必须分割大部分于他们，以充他们的工资。

不生产的劳动者外，还有不生产的资本（如银行资本等）。不生产的资本于资本收入之存在与扩张，具有极伟大之作用；所以不生产的资本在政治上也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资产阶级虽间接于议院表现其“民意”，然单靠这样还是不够，乃更进而直接操纵行政机关，其惟一手段在通气脉于银行与政府的财政部之间，阴为不法的勾结，使政府愈感依赖银行之必要。不生产的最好标本莫如公债，发行公债可使政府于若干时间无须加课新税而免议会之控制。美国不生产的资本对于政府的威权比欧洲更为伟大，银行和铁路公司的代理人常常在议院休憩室里面横冲直撞，

对于其收买的议员施行不可抵抗的威力；党人俯伏于不可思议的资本势力之前，一言一动莫不听其指挥；所以立法行政二部完全为资本家颐指气使的机关。

不生产的劳动者在政治上的势力与不生产的资本同其重要。在某一时期，不生产的劳动者得丰厚之收入，则在政治上对于支配阶级必尽其忠诚之义务，而对于被支配阶级亦与以几分宽大，以减杀其不平之气，故其政绩特别显著。例如中古之僧侣，为压制并调剂农奴社会以确保封建财产之必要人物，故特占重要地位；不仅得享收入，而且得享政权之分与，以调节或操纵于农奴与地主之间，使封建制得永续其命运。其后宗教与国家起有趣之纷争，即因全般收入减少，地主要谋收回其已经给与之利益，而在僧侣则乘权仗势，更要求特权之增加。及入资本主义社会，僧侣既非保护资本财产之要具，所以其经济上之地位与封建制度同归破灭；由此资本国家的雇员官吏律师新闻记者医生文学家等所组织的新团体或政党即代之而兴。这类不生产的劳动者，当着动产与不动产冲突之时，或阶级争斗严重之时，则其所处地位愈益重要；然若其所从来拥护之财产制度和生产关系已达末运，而其收入大大减少，则经济上之恐慌必致政治上之恐慌，经济上之破产必致道德也要破产；这类不生产劳动者必翻然变计，离叛其故主而与被压迫的反抗阶级携手以革旧制度之命。此如上古之门客，中古之僧侣，以及现代一部分极进步的智识阶级和自由职业者之投入无产阶级的阵线，皆其明证。

当氏族制度，奴隶制度和封建制度成为人类生产力发展之障碍的时候，也就是他们临终的时候；这种时候现在又轮流到了资本主义的社会。资本主义的大生产，不仅为将来共产主义社

会准备了各种必要的经济条件，而且为她自己养成了最大多数的掘墓人——近世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多年的利用和训练之下，不仅增加了教育程度和管理生产的普通知识，而且形成了自己独立的革命的政党；所以她的双肩不仅担负破坏为资本主义所弄僵的社会，而且担负建设将来既没有私产又没有阶级和国家的共产主义社会。然其过渡必须组织自己的扩大的民主共和国家（如苏俄联邦制），以为破坏和建设之起重的机械。无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国家演进之最高形式，亦即为国家消灭前之最终形式。从此以后，人类将复为生产之主人而还复到自由平等的共产主义的广大而丰富的生活。然将来共产社会与原始共产社会有很不相同之异点：即原始共产社会建立在人类生产力极低的凹线之下；而将来共产社会则建立在人类生产力极其发达的水平线之上。

第十章 近世社会之必然崩溃

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崩溃之理论，科学的社会主义之创造者在他们有名的著作中早已深明著切的阐明了；兹之所言，惟限于最近现象之事态。

资本主义发达到二十世纪的初年，全人类五分之四以上已成为最少数资本家的奴隶（或为工钱劳动者或为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的民族）。各国资产阶级因为生产的过剩和紊乱，早已准备异常强大的武力以争夺殖民地。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世界形势急转直下入于革命时期，而资本主义社会一切平衡的基础遂根本动摇而濒于破产。今试首述战

后欧洲经济状况之衰颓：

战前交战各国财富之总和为二万四千亿金马克；每年生产收入之总和为三千四百亿金马克。大战之耗费为一万二千亿金马克，恰好等于交战各国财富总和之一半。大战中，交战各国每年收入之总和减少三分之一，即每年收入只达二千二百五十亿金马克。总括一句，战后交战各国财富之总和，由二万四千亿减至一万六千亿，即减少了三分之一。不但如此，各国于战费外，每年消费之总和约占每年收入百分之五五；而战费每年又短少一千亿。大战四年，各国共计短少之收入为四千亿，短少战费亦为四千亿，两共合并短少八千亿金马克。

然则用什么方法来弥补这八千亿短少之开支呢？只有提取生产资本而置生产机关之改进事业于不顾，其方法便是大大地发行纸币与公债，国家借此吸收各地的现金而耗之于战争。国家开支愈多，即现金耗费愈甚，亦即纸币堆积愈多。各种名义的债票充斥市场，外貌好似国家财富异常增加；实际，经济基础日益衰弱动摇而濒于破产。各国国债由大战增到一万亿金马克，约占各国财富总和百分之六二。

战前各国流通纸币与各种信用券仅二百八十亿金马克；战后则增至二千八百亿，即增加十倍。由此金本位制完全变为纸本位，而入于所谓虚金资本时代。信用券、国库券、各种公债票和银行券等等，一面代表死资本之回忆，一面代表新资本之希望。

为生产事业而发行公债，与为战争而发行公债，性质显然不同。战债愈多，即票额实价愈跌落而渐等于零。资本家保留千百万纸币于其口袋，作为国家之负欠；千百万现金皆耗毁于战争

而不复存在。然则债券之执持者还有什么希望呢？若是法国人，只有希望法政府向德国连皮带血的挖取几百亿以偿还其债项。然德国愈加毁坏，即全欧资本主义愈不能复苏。

战时及战后，资本家为制造军需品而获巨利，但于生产机关之改建则甚为漠视，这在城市房屋问题中便可看出。他们只将破坏不堪的房屋分配于工人，而不建筑多量的新房屋。房屋的需要，在战后是很迫切的；但这种必要工程竟因普遍的穷困而完全停止。资本主义的欧洲，在现在与将来的长时间中，不能不缩小其活动的范围而使劳动者的生活降于水平以下，亦即使生产力降于水平以下。

现在再就各国情形，分别言之：战前德国全国财富为二千二百五十亿金马克；每年收入为四百亿金马克。现在全国财富不过一千亿金马克，收入不过一百六十亿，即不过战前收入百分之四十。德国现在的国债为二万五千亿，超过其财富总和之二倍半。到一九二一年，德国纸马克已达八百一十亿之多，所以纸马克跌得一文不值。工商业状况表面虽呈旺盛之势，而资本蓄积极其低减，劳动生产力极其衰弱。资本家因为要使他们的商品廉于英法的商品，所以极力减少工钱增加时间，而他面又抬高国内的物价；所以工人及一般人民的生活异常穷困，而生产力亦因而极其衰弱。德国资本主义已完全达于破产地位，而莫可救药了。

法国因为战胜的关系，资本主义之衰颓比较德国虽略胜一筹；然农业生产和煤铁生产皆比战前衰落。一九一九年法国商业上的入超为二百四十亿，一九二〇年为一百三十亿。两年间的入超共计为三百七十亿，法国资产阶级在战前从未遇过这样

可怕的入超数字。

战前法国纸币为六十亿弱；到一九二一年加到三百八十亿以上。金佛郎价格，在英国市场上不及战前四分之一，即此已可看出法国的财政降至何等地位。现在法国经常预算增至二百三十亿佛郎，其中百五十亿是付国债利息的，五十亿是维持军队的。法国政府加此严重负担于人民身上，实际抽得之税不过百七十五亿。故法国财政异常困难，不够偿付国债利息和维持军队之用。然占领军费在一九二一年已超过五十亿以上，战区修复费亦达二百三十亿之多。所以法国财政的出路只有遮掩的破产（无限制发行纸币）和公开的破产之两途。

英国在大战初期颇发了财，但到第二期开始失败。大陆与英国的商业关系已由大战打断，英国在商业上财政上都受莫大的打击。加以战费浩繁，经济日趋衰落，劳动生产力也大大减低。商业不及战前三分之一，某几派重大工业更受影响，所以失业人数常在五六百万以上。主要产业的煤矿，一九一三年有二万八千七百万吨；一九二〇年只有二万三千三百万吨，即比战前减少百分之二十。铸铁在战前为千万吨以上；一九二〇年只八百万吨，亦比战前减少百分之二十。一九一三年输出煤额为七千三百万吨；一九二〇年只二千五百万吨，仅及战前三分之一。

英国国债，在一九一四年八月一日只七千一百万英镑；在一九二一年六月四日增至七万七千万以上，即增加了十一倍。预算也增加了三倍。

英国经济的衰颓，又可于英镑的价格中看出。战前英镑在世界金融市场上居第一位，为全世界金融之主人；现在完全被美国洋钱夺去其地位，他的价格比战前低减百分之二四。

以上所引种种数字，足够证明全欧资本主义之衰颓。交战各国，以奥国为痛苦之极点，而英国则处另一极点（然犹如此）。德国介乎两极点之间；巴尔干各国则完全破坏而退到农业经济与半开化时代去了。欧洲收入总额至少比战前减少三分之一，但这还不算最重要；最重要的是生产机关之根本破坏。现在农人再也得不到化学肥料与农业机械；矿局只愿意煤价抬高，而不改良矿业机器及工人生活状况；火车头的储藏业已虚空，铁路之修复亦不充分。因而欧洲经济生活愈益衰落而莫能挽救。由此我们对于欧洲全般经济情形，可下一最正确的评语：即战后各国都是拿着他们根本的生产资本去供消费；生产机关的改善，因为资本平衡的破坏，国际间的冲突，和战争状况之莫可停止而永远归于不可能。

现在再看欧洲以外的美国，美国乃是大战中之暴发者。战前美国的输出物为农产品和原料（占总输出三分之二）。战时的输出异常增加，一九一五至一九二〇年的六年中，美国的出超总额约值百八十亿美金。同时输出品的性质也根本变更：工业制品占百分之六十；而农产品和原料等仅占百分之四十。以下数字可以显明美国在世界中之经济地位：

美国人口占全球人口百分之六；面积占百分之七；金的出产占百分之二十；商船吨数占百分之三十（战前不过百分之五）；钢与铁占百分之四十；铅占百分之四九；银占百分之四十；锌占百分之五十；煤占百分之四五；矾占百分之六十；铜占百分之六十；棉占百分之六十；煤油占百分之七十；米占百分之七五；汽车占百分之八五。现在全世界的汽车为一千万辆；而美国占去八百五十万辆，平均每十二人有一汽车。

美国生产力虽无限扩张,但因欧洲贫困,购买力减低,所以市场常感停滞之痛苦,失业工人在战后曾达八百万之众。欧洲做了美国的楼梯,帮助美国上了屋顶;但美国方在屋顶上趾高气扬的时候,楼梯已经腐坏拆断了。富足的美国与贫穷的欧洲隔绝,即世界经济的平衡完全破坏。现在综括世界资本主义正在崩溃之情况,约有下列之六点:

一、地域上的推广阻止了并且缩小了。以前资本主义之昌盛由于不停的推广殖民地及常常获得新市场;但地球面积有限,资本主义发达到今日已是无孔不入,亚洲非洲的穷乡僻壤,都有了大工业国的商品;加以劳农俄国成立,占全地球六分之一的地方,已不是资本主义的范围了。

二、有些资本主义国家,回复到资本主义以前的经济状态去了。这种状态在中欧与东欧特别显著;因为纸币的跌落,农人渐渐回复到自给的经济状况,既不愿将其农产品卖于市场,又不愿买市场的商品,而以家庭生产自给;从前以现银纳税,现在以货品纳税,从前用货币交易,现在用谷物交易;资本不投于生产事业而投于不生产的投机事业。

三、国际的分工破坏了,世界经济生活的单位摇动了。比如美国从前是农业国,英是工业国,因有这种国际的分工,所以资本主义发达非常畅利。现在不然:美国由大战一跃而兼为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同时英国也高唱发展自己的农业;各大工业国皆极力恢复几百年前的保护政策,增加进口税(如英美税则之增高),以防外来商品之输入,巩固国内的市场;因而国际贸易额大减,国际经济的协作衰颓。

四、世界经济生活的统一破坏了。战后,资本主义的中心

由欧洲移至美国，但以前欧洲的旧中心能借水陆交通，将高量的生产匀送于低量生产之各地，故世界经济生活常呈统一平衡之观；现在不然，因为国际经济的平衡破坏，中欧东欧纸币的跌落，生产高的国家不能将其生产品匀送于生产低之各地，高量生产与低量生产遂失其调剂而分为两种半身不遂的经济状况。

五、生产减低，财富的积聚也减低了。战后，中欧东欧完全破产，丧失其购买力。故工业恐慌，在英美特别显明，失业者常自二三百万至六七百万，所以生产异常减低，财富之积聚自然也要异常减低，这种状况在战败国更甚。

六、信用制度崩坏了。战前欧洲各国皆采用金本位制，纸币与金币价格相等；战后几乎完全变为纸本位，纸币与金币价格相差悬殊；国际间汇率率尤为奇变，国际经济之平衡异常倾畸，国际交易也就异常衰歇。比如金价高的美国很难与金价低的德国做买卖，因为高价物品只能换些一文不值的马克。

资本平衡是由种种事实，种种现象，种种复杂因数决定的。战前资本平衡建筑于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之上：如美洲为欧洲生产一定数量之小麦；法国为美国制造一定数量之奢侈品；德国为法国制造价廉物美之日常用品。然而这种分工决不是永久不变的，常因种种情形而决定。总括一句，世界经济是建筑于这样的事实之上：一切生产必多少分配于各国。现在这样事实，已归于不可能了。国际分工由上次大战彻底破坏了。

从前在各国中，农业是为工业品而生产的。反面，工业是为供给乡村需要并制造农具的。所以农业与工业之间有一定的相互关系。工业本身之内部，又有制造生产工具与日常用品之别。在这样分工之间也常常成立一种一定的相互关系。这样一种相

互关系，常常纷乱，亦常常在一些新基础之上复建起来。

但大战把以上一切生产关系都破坏了：欧美及日本的工业都不大制造日常用品及生产机械，而专门制造破坏的工具。纵然多少制造点日常用品，但是专门供给破坏者——军队兵士之用。城乡间关系，以及各国工业内部之分工，也被大战破坏无余。

阶级的平衡是建筑在经济的平衡之上：战前，武装和平不仅存在于国际关系之间，而且存在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关系之间。其方法即为权力集中之资本团体与权力集中之工团协订团体的契约。但是这种劳资间的平衡又由大战破坏了。于是全世界发生异常可怕的罢工运动。

在资产阶级社会中，阶级间的平衡是异常重要的，没有这种平衡一切生产都成为不可能。阶级平衡与政治平衡有密切关系。大战前及大战中，资产阶级借着社会民主党的帮助维持工人阶级于资产阶级平衡的范围之内；为的是便于资产阶级对外作战。但是这种平衡也由大战破坏了。

更进一步研究国际平衡的问题。这即是资本国际间的共存问题。没有这种平衡，资本主义的经济改造是不可能的。然而事实已完全证明其不可能了。

上次大战的爆发，便是因为生产力已觉到资本主义各大强国的范围太窄狭了。资本帝国主义的倾向就是要取消一切国界，取消一切关税，取消一切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障隔而占领全地球。这就是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次大战的总原因。

结果怎样呢？由凡尔赛和约的规定，欧洲的国界和关税比前更多，简直为前此所未有。现在欧洲建立了许多小国，一打一

打的税关横过了奥匈的全领域。各小国都被禁锢于关税制度之中。这在经济发达的见地上说，乃是把中世纪的癫狂政策移到了二十世纪。巴尔干各国退到了半开化时代，而欧洲则已巴尔干化了。

现在德法的关系，有排除欧洲任何平衡之可能。法国不得不劫夺德国以维持其阶级平衡，德国不能不为这种劫夺的牺牲。

欧洲铁矿之最大部分，现已入了法人之手。而煤之最大部分则在德国。法国之铁与德国之煤之联合，本为组成复生欧洲经济之先决条件。但这样的联合虽于生产发展为必要，而于英国资本主义则为致命之危险。所以伦敦政府必用全力或激烈或和平以停止法德煤铁之联合。

由上次大战，英国打败了德国，然而在现在国际市场上以及一般世界形势上，英国反比战前为弱。美国因英国之损耗而强固，比较英国因德国之损耗而强固的程度高得多。

美国现在在他工业进步的事实上已经打败了英国。美国工人的劳动生产力，高于英国工人劳动生产力百分之一百五十——两个美国工人借著极完全的工业机关可以等于英国五个工人的生产。据许多的统计，英国与美国的竞争，屡次遭了失败，这点足够使英国与美国永远冲突。

美国的煤，在全世界及欧洲市场上篡夺了英国固有的地位；然而英国世界贸易的基础，正建筑在煤的上面。

煤油现在工业上及军事上为决定的要素。现在全世界的煤油美占百分之七十，若到战时则一切煤油都可以归华盛顿政府使用。此外美国又具有墨西哥的煤油——占全世界产量百分之十二。然而美国人还诋毁美国国境以外的煤油集中在英国人手

里，英国油矿百分之九十拒绝美国参加，深恐己之所有，数年后即有用尽之虞。假若这是真的，那么将来英美的冲突必更促进得快。

欧洲负欠美国的债务问题，现在已属紧迫。其总额约为一百八十万美金。因此美国可常常给英国一些财政上的困难，要求偿还他的欠款。英国屡请美国取消英国的债务，英国也取消欧洲大陆欠他的债务。假若这个成功了，当然英国可得很大的利益。因为英国欠美之债远过于大陆各国欠英之债。然而这是美国一口拒绝的。

英国赖其原有的海军势力，在海军上还占优势，但是这还是一种消极的地位，并且渐渐地会要降于第二位第三位，而让其海洋霸权于美国。

所以上次欧战，虽然解决了欧洲问题——即英德战争问题，现在反而发生了丰富的世界问题——即统治世界的是英国还是美国呢？此为制造新世界战争之根源。现在海陆军费的增加，超过于战前的准备：英国军事预算增加三倍，美国增加三倍半。一九一四年一月一日（此时为高倡武装和平之时）全世界只有七百万兵士，一九二一年一月有一千一百万。这样重大的军事负担加于疲竭要死的欧洲之上，资本家口里还要谈什么复兴欧洲！

世界市场缩小的结果，经济恐慌日益严重，资本国家间之争端达于极点，国际关系之平衡异常动摇，不仅欧洲成了疯人院，全世界亦成了疯人院。在这样情形之下，还说甚么复建国际的平衡？

现在我们再看战后社会冲突之发展：经济的进化，并非全然

是自动的历程，是要由人们的工作与活动才能完成的。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以及阶级与阶级的关系，从经济的见地说，到了甚么境地？在德国及其他欧洲的某几国，经济程度已退后了二十年或三十年。但从社会的（即阶级的）见地说也是一样的退步么？绝不是这样。在德国的各种社会阶级，不但在战前二十年以来随资本主义之异常繁盛而异常发展异常集中，就是在大战中及大战后也异常发展。

经济进化的两要素：一为国民财富；一为国民收入。此两者在欧洲现在都减低了。此两者虽然减低，然而阶级的发展反一天天的进步；无产阶级的数目日看日增多；资本越集中于最少数人之手，各大银行日趋合并，各大企业愈益联合为托拉斯。所以阶级争斗随著国民收入之减低而愈趋愈严厉，乃为必不可免的事实。这就是现在社会冲突的症结。

物质基础越有限，则阶级争斗越严厉——即各派社会阶级瓜分国民收入之争斗愈激烈。欧洲国民财富落后了三十年，这就是在经济的见地上，减退了三十年；而在阶级争斗的见地上，则增进了三百年。此为现在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关系。

大战初期，因军队极需要面包与肉类，农产品价格不停的昂贵，所以全欧农人发了财。但农人收入口袋里面的尽属纸币，最初以此等纸币清偿旧债，自然于他们是很有利的，但后来就不同了。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以为农人经济之繁盛足以担保战后资本主义之巩固。但是这个计算完全错误，农人虽然清偿了旧债，但是农人经济不在付金于银行，而在于耕种其土地改良其工具种子技术等等。这些，在大战中都被阻碍。

别一方面，因大战而劳力缺乏，农业减低，经过一时半虚伪的繁盛后，农人就开始破产起来。欧洲农人破产的程度各有不同；但在美洲特别不同，从欧洲破产不能购买国外面包之日起，南北美及澳洲的农人便开始感受可怕痛苦。小麦价格一天跌落一天，于是农人不满与不平之气发酵于全世界。至此农人阶级不能再守秩序，工人阶级便有使贫农加入阶级争斗，中农中立，富农孤立之可能。

工程师技术家医生律师账房官吏雇用人，他们的地位处于资本与劳动之间，为半保守的社会阶级。每每主张调和，并赞成民主制。

大战中及大战后，这个阶级感受的痛苦比工人更甚，他们生活水平之降低，也比工人更甚。纸币不值价和购买力之减低，为其主要原因。所以全欧知识者技术家一切中等阶级人民之中，充满了不平之气。如意大利吏员罢工，西班牙银行雇员罢工，即是一例。

吏员银行雇用人员等等当然不会组入无产阶级，但是他们因此也丧失了他们保守的性质。因为他们不平与反抗，所以他们是动摇了的，对于资产阶级的国家也不再维持了，而且想拆坏他的墙脚。

资产阶级知识者之不满，常常随著工商业中等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之不满而扩大。工商业的中等阶级及小资产阶级日觉压迫，日觉摇动；而大资产阶级日联合于托拉斯之中，其横蛮的霸占日日减少国民的收入，国民愈贫而他们愈富。于是不属于托拉斯的资产阶级及新中等阶级或相对的衰落或绝对的衰落而倾向于革命。至于无产阶级纵然他们生活条件已减低，而他们

普遍的都要负担国家的严重税收。工人阶级对于国家的负担现在比战前严重得多。属于托拉斯的资本，他们总想把他们对于国家的负担完全加在工人的肩上。

农人不满意于农业经济的颓败，知识阶级日觉贫困，中等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日形破产而愤怒，所以阶级争斗的严厉非达到社会革命不止。

战后工人阶级的新现象，从一九二一年德国三月事变中可以看出：这次事变之主要分子为中部德意志的工人；他们在大战以前是极落后的分子，然而这次起事，他既不要统率，也不顾成败，自发自动的上了革命的战线。由此可知社会革命必然要一天一天扩大，一天一天成熟；不仅在各大工业国内有农人阶级中等阶级及资产阶级的落伍分子和进步分子为之呼应，而且有全世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运动为之呼应。世界革命的成功，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

（此书由上海民智书局出版1924年
第1版，1926年6月第3版

署名：蔡和森）

义和团与国民革命

(一九二四年九月三日)

中国农民群众反抗外国帝国主义的起事，第一是鸦片战争中广东的平英团及各乡团，第二是一九〇〇年蔓延北方各省的义和团。二者都是对于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直接的与间接的)不堪忍受的反射运动，而后者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比较的更为严重更为悲壮。

然而义和团运动不仅被他的敌人外国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者普通宣传为中国野蛮的排外举动，就是他的连带责任的同胞——甚至于革命党也公然这样的指斥他。他们不是向外国帝国主义者声明这是少数无知愚民的罪恶，便要把自己的革命说为比较满清或军阀更进一步的尊重对外条约保护外人生命财产的文明行为!

自从外国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来，中国的革命已经不是单纯对付某一朝代某一军阀的内政问题，但是对付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之野蛮酷烈的侵略问题，而某一朝代某一军阀不过为这问题中之一部分。在这一点上，义和团运动是最足以代表中国革命之客观的需要与性质的；也只有由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义和团的精神与价值。

这时候，农人群众迫切的需要是反抗洋人。因为帝国主义

武装送来的外国商品、鸦片烟、传教师，不仅使农人手工业者不停的破产与失业，而且使他们不停的吃洋官司，懊洋气，洋教的势力横行乡里，莫可谁何。这时候，自方镇总督以至地方官，自李鸿章袁世凯以至二毛子三毛子，莫不渐渐成为孝顺洋人的机械；独在朝之顽固的王公大臣富有排外思想。于是这些王公大臣遂成为一时的历史的工具，起来利用并领导这种“扶清灭洋”的反帝国主义运动。

因此，反动派与开明派之间成为这样一种可耻的对照：前者顽强不屈的去反抗外国帝国主义，后者奴颜婢膝宣告不顾北京形势如何，对于外人条约权利保护不怠（这是当时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闽浙总督许应騤联合通知上海领事团的话）去讨好外国帝国主义。袁世凯（山东巡抚）在这时候更以“保护外人剿讨逃匪”树立他以后在外国帝国主义者中的被雇人地位。

义和团排外的精神，是中国国民革命精神头一次充分的表现，可是这种本能的幼稚的国民革命运动并不是没有缺点。他的缺点是在方法上面；然而这种缺点是历史限定他的，并且是必然的。在尚未发明铁器的美洲土人和非洲土人，他们或在半开化时代或还停滞于野蛮时代；当欧洲“文明”人携带近代的新式武器与技术来侵略他们的时候，他们怎样去抵抗呢？自然，不仅只能运用已有的腕力石器弓箭等去抵当大炮与机关枪，而且只能运用半开化的或野蛮时代神秘的宗教势力去团结他们并鼓舞他们的勇气；除了这些已有的物质与精神的武器之外，他们一时是无可如何的。义和团亦然，按照当时中国历史发展的条件，当然只能容许农人拿着刀、枪、矛、锄、张真人、吕洞宾、神兵、天

将……去与大炮机关枪以及帝国主义者一切近代的知识技术去决胜负。

没有近代的知识与方法，这是义和团的致命伤。所以义和团的失败，乃是经济落后的中国民族之历史的必然的结果。然而这种历史的失败包含着神圣的意义；换过说，被侵掠者抵抗侵掠者的战争乃是神圣的战争；这种战争虽败犹荣。是故义和团虽因没有近代知识与方法而失败，但决不因没有近代知识与方法而减其运动之历史的神圣的价值。

义和团失败后十一年，即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起。以辛亥革命与义和团运动比较，形式与精神都大不相同：辛亥革命一面完全采取了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形式；别面完全抹煞了庚子起义的排外精神。不仅完全抹煞排外的精神，而且于此精神的反面再三向国际帝国主义宣言革命政府将怎样加倍的尊重“友邦”条约及个人权利，怎样革除（满清时代）通商与实业之障碍以待外资之开发，怎样期望跻于所谓文明国家之林，以享文明国家应享之权利与应尽之义务。

这种非革命性（对于外国帝国主义）的精神与期望，现在已经证明其完全错误与无效。引起这根本错误的原因，大约不外下列三事：第一，没有认清中国革命运动之国际的性质，即没有认清中国的革命为普通一般殖民地之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而非单纯对内的民主革命。第二，不知道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决不会帮助他所欲永远掠夺的殖民地经济落后国之独立自主的民主革命运动。第三，鉴于洪杨革命（太平天国）未与帝国主义列强讲外交之失败。

自资本主义发达到帝国主义，显然把地球各部分经济落后

的民族圈定于他的隶属地位，而不容其翻身。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与从前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显然不同。从前的资产阶级不自觉的在各方面(主要的是经济与政治方面)都尽了一种革命的作用，他不仅完成了自己的革命，而且要帮助别国同阶级的人完成其革命。现在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则不然，他反而成为全世界一切反革命的中坚，尤其是对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他必出死力以维持这些地方封建的半封建的旧制度与旧势力(在印度、在中国、在高丽，都是一样的)，因为这样于他是极便利的。所以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闭着眼睛模仿一二世纪前单纯对内的民主革命，简直是牛头不对马嘴；而希望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与他以帮助更是莫明其妙的昏谬。这种昏谬在洪杨革命中是没有的(洪杨李秀成等皆耻求助于外人——侵掠者)这正是洪杨革命的卓越。不然，岂有真正独立自主的民族革命能与外国帝国主义讲外交而成功？

然而这些昏谬的趋向，在辛亥革命以及在现在国民党的右翼中还是很严重的。他们或是卵翼于外国帝国主义之下的革命代表，或是久居租界受惯外人之保护的元老，他们不仅不赞成反对外国帝国主义，而且攻击如此主张之左派诸人为破坏国民党，嚷为什么“开罪友邦”！

所以辛亥革命，表面上似乎比义和团运动进步一些，因为形式上和精神上都似近代资产阶级化；然而实际上，这次革命是完全失败了，他的意义远不如义和团之重大。义和团是因为没有近代化而失败，辛亥革命却反因为效颦近代资产阶级化而失败。这是怎样说呢？因为革命党不知按照殖民地革命运动的性质和人民群众反帝国主义的忠实需要去把革命弄实在，他们只知拘

守从前欧美资产阶级改革内政的目的，一天一天的把革命弄虚空。因此，他们只知以军事行动，建立政府，求援“友邦”为惯用方法，而不知道这些方法都是离开群众的需要而得不到结果的。不仅得不到结果，而且要使革命濒于危险与破产。群众对于军事行动与革命政府之不满意，对于抽象的主义宣传之厌听，一切实际的政治宣传与群众组织工作之不能施行，甚至于有时宣布禁止排外……，这些都是危机的兆朕。

然则可知陈旧的方法和资产阶级的精神是于中国革命无益，而且可以杀死中国革命的。要挽救这危机只有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联合而受其感化之一法。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革命弄实在，才能与国际帝国主义及其爪牙——中国军阀作战。由资本帝国主义剥夺了生存方法的中国农民群众，本来是国际无产阶级天然的同盟。这样同盟的结果是要使义和团的遗烈先被于东方的。

最后我要在义和团与国民党之间说几句话，以做这篇文字的结论：

国民党自今年第一次大会改组以来，他已具有一个顶好的明确的政纲；假设当时义和团具有一个这样反帝国主义的政纲，义和团是可以领导中国国民革命至于成功。反之，现在具有这好的政纲之国民党，若加以义和团排斥外国帝国主义的真精神，国民党更是可以领导中国国民革命至于成功的。义和团是中国国民革命史上悲壮淋漓可歌可泣的遗产——排外精神，我们希望国民党双肩承受这种伟大的遗产！

（载《向导》第81期

署名：和森）

商团事件的教训

(一九二四年九月十日)

这次广州商团事件，可谓极帝国主义、买办阶级、雇佣军阀以及国民党右派分子伙同宰割革命政府之奇观：组织这次叛乱的是英国在广州各机关之职员；领导这次叛乱的是陈廉伯、陈恭受诸买办；公开的袒护这次叛乱的是英国帝国主义的炮舰政策；“武装调停”廉价拍卖革命政府的是范石生廖行超诸军阀；而勾结于帝国主义、买办阶级、雇佣军阀之间的是国民党右派分子。

国民党右派一面勾结帝国主义与香港广州的买办阶级，一面勾结雇佣军阀以把持广州兵政、市政、财政诸权利，这是自从设立广东政府以来公然不可讳言的事实。这次事变的罪魁陈廉伯不仅是汇丰银行的买办，而且是国民党右派把持的广州市党部之职员；这次主张罢市反抗孙中山最力的先施公司、大新公司及西关各大商店的经理职员以及陈恭受等莫不尽是国民党右派的党员，至于范石生、廖行超、李福林辈之属于右派更不待说。所以这次一面是英国帝国主义打击中国革命运动，一面是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

国民党右派之必然的趋于反革命，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外国帝国主义要根本破坏中国的革命，单从外部施以压迫还是不够，必须培养一支反革命的势力于革命党的内部，这支势力便是

国民党的右派。

所以这次事变的教训：第一是证明国民党右派为反革命的法西斯蒂。第二是证明雇佣一些军阀来做革命的军事行动及过早的设立革命政府之失策：

全部政权的取得是革命党必要的目的；但在革命形势还没成熟以前——即本身在民众间的势力还没成熟以前，是不宜于亟亟掌理一部分的政权或建立偏安一隅的革命政府。不幸中山先生竟然采用了这种过早的政策，由是显然暴露下列各弊害：（一）广东政权之取得，并不由于革命势力之完成，但是由于利用根本与革命相反的军阀财阀的势力，所以广东政府不仅不是革命的工具，适足成为雇佣军阀、交通系、政客、买办阶级以及升官发财的右派之狐城鼠社；（二）党员对于政权的争夺早已根本毁坏了革命的目标与精神；（三）雇佣军阀以养寇纵敌为长久敲诈军饷之法宝，军役不停，苛税繁重，因而引起人民对于革命之反感与不信任；（四）全力用于毫无结果的军事引动上面，党务以及在民众间的发展完全因而停止；（五）苟安于香港英国政府的炮舰政策之下，不仅不敢发展国民革命的宣传，而且时常要受内外勾结的威胁，如这次商团事件便是明证。

这种不幸的政策不仅可使革命完全破产，而且危及于中山先生个人之生命与人格。军阀的工作是拥兵敲钱，右派的工作是争权夺位，而老头子的工作却是打前敌当炮火！军阀是利用革命做买卖，反革命的右派是利用政权做生意，而老头子遂常常的被强迫而成为他们的商品！

我们为挽救革命的破产计，为爱惜中山先生个人计，都希望中山先生在受了这次奇耻大辱的教训后不仅要毅然决然与英国

帝国主义宣战,而且要毅然决然抛弃以前不幸的错误政策,澄清党内右派反革命的法西斯蒂!

(载《向导》第82期)

署名:和森)

北伐呢？抵抗英国帝国主义 及反革命呢？

（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七日）

现在有两个关系重大的政治问题横在孙中山先生和国民党的前面：一个是怎样对付英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陈炯明、陈廉伯右派诸叛徒及滇军等都包括在内）在广东做成的反革命；一个是怎样对付美日两派帝国主义在全国做成的直系与反直系两派军阀间的战争。

对付商团事件的正当政策，只有坚持没收全部扣留的军械，否认范廖二军阀与商团私订的六条件，进一步完全解除买办阶级（商团军）的武装，实际抵抗英国帝国主义的干涉，以唤起全国人民之同情与助力，而开始努力推翻帝国主义之新时期。对于直系与反直系的军阀战争，站在国民革命原则上的国民党，只有代表人民的利益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对于人民的屠杀，反对帝国主义构成内乱借口干涉的阴谋，号召全国反对战争反对帝国主义的人民群众集中于自己的旗帜之下，发展并组成国民革命的真实力量。

但据最近上海各报所传消息：中山先生对于前一问题，于痛斥英国帝国主义的宣言公布后，忽然又向粤人发表一类似“罪己诏”的宣言，悉率客军北伐，以广东还诸广东人民；对于后一问

题，则已决定实行北伐，响应浙卢。这种政策的内容：第一是中山先生离开广州而赴韶关，以避免与英国帝国主义的冲突；第二不仅发回扣械，而且以广州市政交与反革命的商团（商团军干事李郎如已代理公安局长）；第三是与陈炯明妥协，所谓以广东还诸广东人民，便是以广东还诸英国帝国主义的走狗陈炯明及买办阶级。这就是现在北伐政策的背影。

所谓“护法”“北伐”虽是国民党以前的传统政策，但这种政策曾经屡试屡败，而且按照国民党第一次全国大会决定的新政纲，这种过去的错误政策尤属成为废物而不应该复活。现在居然复活起来，我们敢大声说，这又是右派包围中山先生的成功。右派因为恐怕中山与英国帝国主义冲突而打破他们的巢穴，因为要成功与陈炯明的调和以巩固他们与左派对抗的武装势力，因为要讨好段、张、唐继尧等军阀以遂其蝇营狗苟奔走南北升官发财的勾当，所以又包围老头子出此名为“北伐”而实属投降英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陈炯明陈廉伯）的下策。

退一步就北伐政策的本身而说，我们亦完全不能予以赞同：第一，这种政策只能助日本帝国主义及反直军阀张目呐喊，完全隐没了自己独立的革命的政治号召。第二，这种政策完全不能影响或动摇军阀制度和国际帝国主义侵略之政局。第三，从新成就西南军事局面不过又是从新成就唐继尧、陈炯明、沈鸿英、唐绍仪等军阀政客将来与任何一派战胜的军阀做买卖的基础。

或问你们这样主张不怕右派指为破坏革命暗助曹吴吗？我可大声回答：只有勾结英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右派是破坏革命，只有主张交还广东于陈炯明和商团的右派是暗助曹吴。我们在革命的政策上和理论上素来不赞成雇佣军阀的军事行动，

素来反对在广东设立有害革命进行而徒利于官僚份子非革命份子的革命政府；我们现在更坚决的主张：与其强颜交还广东于英国帝国主义的走狗而上什么北伐政策的鬼当，无宁抛弃广东而与英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决一死战，以开始全国反帝国主义的真正工作！

（载《向导》第83期

署名：和森）

警告国民党中派诸领袖

(一九二四年十月一日)

这次广州商团事件，对于国民党内部各派之革命成分要算实际做了一次最良的试验。右派反革命的原形，勾结帝国主义的劣迹，在这次事变中业已暴露无遗，此处无庸赘述，所最可注意的是中派在这次事变中的态度。据本报巨缘君广州通信所纪述，中派诸要人在这次事变中的态度可以“犹夷妥协，居中取巧”八大字包括之。这种态度若在俄罗斯革命史或西欧革命运动史中遇着，吾人绝不奇怪，因为若干被实际革命潮流所淘汰的妥协派，无不源于这种病根而破产；但如过早的在中国现在的革命运动中便发见着，吾人诚不胜其遗憾！

革命的方向只有一个，违背这一个便要趋于反革命。所以真正的革命领袖，决不妄想执两端之术，因为如此便要离开革命的立场而丧失自己的信用与地位。比如沙面罢工，反映到国民党内部，天然的只能引出两种倾向，一种如左派始终忠于群众的利益反抗帝国主义到底，一种如右派马超俊等谄媚帝国主义欺骗并威吓罢工群众使其迅速屈伏；犹夷动摇于这两种倾向之间，实际上无异间接做了帝国主义的工具而丧失群众的信任。商团事件亦然，或是站在右派反革命及勾结帝国主义的方面，或是站在左派主张果决解除反革命武装抵抗帝国主义方面；调和

妥协于这两种倾向之间，实际上亦无异间接做了反革命与帝国主义的工具而引起群众深深愤激的反感。

革命所需要的是真本领(适合群众要求的政见与口号)真勇气,专靠使巧,不仅没有用处而且容易弄到自杀的绝地。国民党中派诸要人,吾人颇重视之,常勉以成就中国革命大业;在左派领导之下的广东工农群众,对于他们亦有相当的好感。可是沙面罢工商团事件一来,群众对于他们的观感业已大不如前。中派诸公不于此时有所觉悟以图挽救(即毅然决然没收扣械以开始镇压反动和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工作),反而想用暗渡陈仓的方法,回避革命和一部分商团份子妥协,以成立半军阀(李福林)半买办阶级(李朗如)的新局面。这样一来,吾人不仅为革命前程危,而且为中派诸公自身危!这样回避革命巧取政权的下策,不仅要使广州政府完全葬送于买办阶级帝国主义的池沼之中,而且中派诸要人势将蹈右派的覆辙而丧失自己革命的政治命运。

现在我们可以简单的警告中派诸公:做官与革命,截然是两途,你们这次上台的目的,革命的群众是完全不了解的;你们上台后怎样解决扣械问题,怎样对付反革命和帝国主义,革命的群众却正在加倍的注视你们。现在木已成舟,你们暗渡陈仓的幻想完全要归于失败而且是不荣誉的失败,你们若还不愿从此断送革命的前途,决心挽救这种失败,那末临崖勒马,仍然只有赞成中山先生及左派,没收扣械与一切反革命势力及帝国主义决裂之一途。不然,你们的政治生命是要完全破产的!

(载《向导》第85期)

署名:和森)

南洋烟草资本家 打破罢工之恶辣手段

(一九二四年十月一日)

工人一日不做工，便马上要饿肚皮。一个工厂逼到七千多人都采用罢工手段，饿着肚皮来要求免除苛待，其被苛待到甚么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南洋烟草资本家本来比别的资本家要会使乖些。他那双慧眼早已看清“工人团体结得坚牢”足以制他的死命。所以他对付罢工的战略，第一便是拆散工人团体：为返厂者给双资；升散工为长工；以开除威吓罢工工人；雇用山东打手，拦击罢工工人，贿买巡捕，捉拿罢工工人。

工人肚皮饿到了十多天，一点解决的消息也没有，已经有点心慌胆怯，那受得起这般欺骗和威吓，所以一部分最软弱的便首先忍辱含酸的进厂，于是资本家乃借此大大的宣传：返厂的工人已有了若干，限工人九月十四日一律进厂，否则开除，这样一来，于是含酸忍辱进厂的便更加多了，然而坚持到底的还有两千之众，其势仍不在小。资本家乃别出奇计：一面贿通穆安素和斐斯两律士出任调停，满口担承他们可以为工人取得法律上的胜利，借此缓和工人感情，以便资本家从容宰割。可怜的工人，他们那里会懂得这个迷人的八卦阵呢？！一面却又收买少数工人，挟制多数工人发表五千人具名的启事，认此次罢工为少数人之煽动，

继乃挟制多数工人改选被收买工人充当职工同志会职员；一方将此次工人阶级与资本阶级的争斗变成为工人与工人的内讧；一方从保护资本家的法律上根本取消此次罢工的根据。

到了这时，因被苛待而反抗到底的工人，已经是有冤莫伸，孤立无援，加上“抢掠会内什物”罪名的罗织，所有工会旧任职员都在通缉之列。这种消息见南洋职工同志会启事及南洋职工同志会新任委员长启事，本月二日三日的《民国日报》和《申报》都大登特登著。坐牢罚款的苦痛，贫苦无告的工人在此次罢工中已尽尝够了，惊弓之鸟一听著这消息，自然会吓得屁滚尿流，逃之夭夭，而资本家却于是乎大唱其凯旋之歌了！

一出狠凶险诈的恶剧，我们看到这一段落，便可推想他最后一幕的悲惨！我们试将九月十二日南洋烟草工人万急呼救的传单，仔细翻阅，乃知此一出恶戏并非偶然，完全是邝公耀、李援得了资本家厚贿，阴谋推翻十七条协约和解散工会，故意挑衅（无故开除二女工）制造成功的。一切恶辣手段，都在事前预备停当，可怜的工人，竟不自觉的被他们“请君入瓮”！现在职工同志会的职员，既都换过一班资本家的御用奴才，已把工会的性质变成资本家御用的性质了。从此，工人只安排受宰受割，再也莫妄想靠他（工会）来谋工人的福利！

前年与资本家所订的十七条协约，已在本月三日南洋烟草职工同志会启事，“……本会图记文件业经散失概行作废……”的一句话中，无形无声的自己把他取消了！以后再莫妄想根据那十七条向资本家有所要求了！资本家真聪明透顶，工人著了道儿还睡在鼓中呵！此外，减薪加时资本家也在九月二十七日的南洋烟草公司制造厂启事中，“……但战期长短莫可逆料……”

的一节回文中，明明白白暗示了，实行就在眼前；罢工失败的工人，好象解除武装的军队，除了束手受死，还有甚么话说！受了骗的数千工友，到那时候，也许可从鼓洞里睡醒过来了！

明决勇敢坚持到底的工友！现社会的报纸，官厅，律士，法律，警察……究竟是为谁服务，保护谁的？你们痛受这一次教训，大概可以完全明白了。你们为工人利益勇敢奋斗的精神，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工人阶级有了你们，好比有了保卫队一样，工人阶级的解放全靠你们。资本家压迫工人的事实，是常常有的，一次罢工失败算不了什么，你们不要灰心，要好好团结这两千多极坚决、极勇敢的分子，把他们散布在上海各香烟厂内，将这次罢工所以失败的教训，告诉大众，组织更有力的雄军，机会到来，和资本家再拚个你死我活，我敢断定：“最后胜利终是你们的”。

此次，我们还要警告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和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国民党改组宣言政纲上，大书特书著拥护工农的利益，要为工农利益而奋斗，现在国民党的右派党员邝公耀、李援帮同资本家把守正不屈反抗奋斗的工人，弄得要死不活了！上海执行部始终不开除违背党纲的叛徒，而且听任《民国日报》上继续不断地登载替资本家助虐的广告，越登越凶！这显然证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和《民国日报》本身已向国民党宣言政纲上拥护工人利益，为工人利益而奋斗的一条，宣布叛逆！

（载《向导》第85期

署名：振宇）

护 党

(一九二四年十月一日)

有人说,国民党右派惯以护党自命,这次孙中山这样受帝国主义的侮辱,何以一声不响!

我说你错了:右派认帝国主义为友邦,那末当帝国主义与孙中山发生冲突时自然只有护友邦而不护党了;何况广州这次的反革命本自右派勾结帝国主义起来的呢!

(载《向导》第85期)

署名:和森)

护党与护卢

(一九二四年十月一日)

有人说，孙中山前后发布反抗英国帝国主义的宣言及通电，何以《民国日报》主笔叶楚伦先生在评论栏内一声不响？

我说你错了：楚伦先生此时忙于护卢，那里有这样的闲工夫；而且他要使《民国日报》护卢的宣传比较卢永祥机关报《新申报》等更为出力，自然是更没有闲工夫了，此层你应替他原谅。

(载《向导》第85期)

署名：和森)

亡党之痛

(一九二四年十月一日)

有人说，国民党改组容纳新的生力军加入后，右派天天嚷什么亡党之痛，到底是怎样一回事？

我说改组大会把国民党辟了一条新道路，这条新道路是要由彻底反抗帝国主义与军阀以达到成功，这样一来，对于右派钻惯了的“友邦”“友军”的旧狗洞自然要发生窒碍，他们怎得不反对？其实在我们看来，右派之成为法西斯蒂与帝国主义及军阀的走狗，《民国日报》之成为安福部机关报，新政纲之被他们违背破坏，这才真是亡党之痛呢！

（载《向导》第85期

署名：和森）

军阀战争之一幕

(一九二四年十月十五日)

自九月三日至本月十三，江浙战争整个的打了四十天，而卢永祥与何丰林以出走结局。军阀战争在东南方面要算暂时演完了一幕。

在这一幕大凶剧之中，江浙人民所受奸淫掳掠，妻离子散，家败人亡的痛苦，岂是十年二十载所能恢复？现在惨杀一时中止，自然要哭中转笑，相庆和平。

和平果然降临，战争果然终止了么？本报恳切的预告你们：这不过是军阀战争之一幕；只要军阀与隐在军阀后面的外国帝国主义存在一天，第二幕第三幕……还要接连的演个不穷。你们不见卢何方走，而齐燮元与孙传芳之间便起了暗斗么？

被军阀战争牺牲的江浙人民，你们在军阀与外国帝国主义的宰制之下，不仅永远得不到和平，而且永远免不掉战祸。你们要免战祸而得和平，只有赞成本报主张而跑上国民革命之一途！你们试看本报两年来对于全国人民所说的话，那一次不说中了呢？

(载《向导》第 87 期)

署名：和森)

广州反革命之再起

(一九二四年十月十五日)

政府军警协同商团惨杀工人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不是革命剿灭反革命便是反革命剿灭革命；国民党“中坚人物”对于商团之姑息犹夷，吾人早料反革命不久即有卷土重来之日，双十节果然又大大地爆发了。

胡汉民先生想用暗渡陈仓的方法（参看本报八十五期），援引一部分商团势力与政府合作，吾人亦早已识破这种政策之危险不仅是使广州政府完全丧失革命性质，而且当反动再起时一定要暴露其为反革命所恶化。现在果然灵验不爽，商团一旦宣布再罢市，汉民先生屁滚尿流，立刻向商团表示孝顺，函李福林发还枪械四千枝。

可怜忠心革命的工人与工团军好不识趣，在这个时候不知仰体政府的意旨去孝顺商团，反而义愤填胸切实替中山先生存那一点“天地间的正气”（参看本报八十二期，《广州通信》）去阻止还械，——你看这样愚不可及的革命工人那得不被商团协同政府军警之惨杀？果然不错，他们不仅被枪毙拘捕，而且被挖心剖腹！请看上海各报所传消息：

(1)《新申报》十一日香港电：省商团佳(十九)复接灰(十日)罢市传单，胡汉民函李福林，准发还枪四千，李灰(十日)晨派

舰由黄浦运至海珠起岸，商团集西濠口接收，长堤一带，由商团协同警察守护，下午二时，有工团军，讲武堂学生二百余人，巡行经长堤，与商团冲突，开枪互击。

(2) 同日《时报》电：广州政府十日还商团军械四千余枝，被工团中途截抢，军队与工团冲突，死伤十余，捕获工团数十人。

当局允许发还商团枪械，十日下午三时，由李福林军保卫，将军械起岸，忽与工团军冲突，双方开火，伤亡多人，工团十余人被获，解李军司令部讯办。

(3) 同日《申报》电：灰(十日)午工团军巡行至西濠口，与商团口角冲突，放枪数百响，工团军死伤二三十人，数十人被捕，解返西瓜园商团总部，有四工团军被人刺心；是日商团长陈廉伯、陈恭受、李仲韶布告(好威风！这便是所谓拥护政府了！)，商团武装出巡，如有抢掠，迎头痛击。

呜呼！商团圣明，工人当诛；打死不上算，还要刺心，打伤不上算，还要拘捕！据《新闻报》载，拘捕的人数竟达百余名之多，拘捕的执行者不仅是商团而且是李福林统率之下的政府军警；虽有廖仲恺向李福林请求保释之说，但能否邀准尚在不可知之数。

呜呼！工人当诛，商团圣明；佶佶任从二陈大摇大摆地在广州市虎作为虎不上算，还要命警察协同武装商团维持秩序，退还四千枪械不上算，还要命李福林李朗如为政府全权代表向商团三跪九叩，声明负还械全责！现在请再看下列消息：

(1) 《时报》十二日电：工团因伤毙多命，密谋对付，商团已大戒严，风潮扩大；广州十一日仍罢市，由武装商团军协同警察维持秩序。

(2)《新闻报》电：十一日胡汉民派李福林李朗如为政府全权代表，与商团接洽，谓还械负全责，劝复业；商团代表答，欠械请全发，即开市；李据情复胡，并谓蒋介石等取去之械，已无法收回，请兵工厂分期补还；胡令李请孙文示，旋胡接孙文电，谓械案相机办理，俾风潮速息，并着许崇智、杨希闵、范石生、李福林负省城治安责。

(3)《申报》十三日电：广州元(十三)罢市情形如昔，李福林以市厅名义，真(十一)布告劝商店开市，未还团械，担承寒(十四)点交；又以民团统率处督办名义布告，劝工会团捐嫌，勿听人挑拨。

上列消息中有两事值得特别注意：第一，工人因拥护革命被人打死、打伤、剜心、剖腹，所谓“革命政府”不仅不镇压反革命，反而协同反革命军镇压工人，反而对于工人加以什么“勿听人挑拨”的威胁，——这到底是甚么道理？当然无他，不过是商团圣明，工人当诛罢了！

第二，中山先生上次为反革命及英国帝国主义所屈辱，吾人闻之，此老几乎愤不欲生；而现在政府中居然有人向新闻界散布中山命令速息风潮以免扩大的空气，吾人于此不得不深滋怀疑。吾人深信中山先生革命人格之强固，决不于此时暴露如此之弱点，如一般滑头政客之所为。果然不错，十四日的上海各报中，居然又登载下列的消息：商团消息，孙文电廖行超范石生，令西关居民于三日内离开，彼将炮击商团。——这个消息如果属实，我想中山先生若是了知留守者在广州之所为，如不气死于韶关，定要震怒而回羊城！

呜呼——广州之留守者！你们现在真是以天下之至巧而成

天下之至拙，你们得意的“缓和策”，其实就是你们的致命伤：你们资寇兵资盗粮，商团枪械到手，不仅不会终止罢市，而且将正式向你们宣战。你们以为反革命第二次罢市的目的仅在发回枪械么？你们不聋不聩，难道在双十节以前没有听见反革命领袖在英国帝国主义家里——香港所开之会议，难道没有看见路透电所传“请孙下野”之消息？难道你们还梦想“友邦”不致仇视你们到底；你们可用孝顺商团的手段去间接和缓英国帝国主义对于你们的驱逐策么？呜呼——广州之留守者！你们太聪明了，革命破产的责任已经到了你们的肩上。而现在是最後十五分钟，你们怎样做呢？据我们的愚见，仍然只有采取断然的处置，与反革命及英国帝国主义决一死战，以实践中山先生上次的伟大宣言；所失的至多不过是一块妨碍革命进行的广东地盘；失掉这块地盘，于以后革命的进行不仅不是祸，而且是福；反之，即使暂时幸得苟延政权于反革命与帝国主义的恶化之下，不仅不是福而且是祸。何去何从，你们选择一下罢！

（载《向导》第87期

署名：和森）

对于广州印刷工人 二次罢工感想

(一九二四年十月十五日)

在上月的报纸里面，我们看见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工人部长兼广东省长廖仲恺君在工人代表会议席上斥责印刷工人不应于政府北伐时罢工，我们已深觉诧异：第一，因为真正的革命行动是要建筑在工农群众现实的利益之上，违反或压抑工农群众的利益去革命，不仅于理论不通而且在事实上做不到；第二，广州报业资本家及报界公会与买办阶级反革命的关系素深，广州政府若是代表革命和工人的利益，在这个时候只应命令报界公会承受工人加薪的要求，而万不应迁就报界公会去压抑工人的要求。

据本报《广州通信》所说，在上次印刷工人罢工中，广州政府不仅没有实行保护劳工利益的政纲，而且根本犯了迁就报业资本家压抑工人利益的失策。上次罢工既然是由于一种欺骗手段而终止，那末，第二次罢工的复来一定是不可免的。我们现在且看胡汉民先生执政时代的广州政府对付印刷工人逼不得已的第二次罢工的态度是怎样：

(一)《商报》——香港四日电：公安局劝排字工人勿受煽动，再倡议罢工，如敢故违，决本职权切实办理。

(二)《申报》——香港电：省报界江(三日)分谒胡汉民、廖仲恺、李朗如请照前约制止排字工人罢工，胡、廖、李均允；惟工人决于微(五日)罢工，不顾官厅压力，先将工会房产变卖，为长期罢工用；各报亦决设排字练习所，招生学习，抵制工人。

象这样帮助资本家压制罢工的态度，与北京政府及各地军阀政府有什么不同？前此右派执政时代，压迫工人欺骗工人的事实固已书不胜数，现在汉民先生等又接着这样横来，我真要为国民党的前途痛哭！

有人说，国民党是多阶级的党，不仅要保护劳工，而且也要保护资本家，有时“决本职权”帮助资本家压迫工人，亦未尝不对。我说：你这种说法固然是代表了国民党右派的理论，右派要使国民党成功一个反革命党，自然处处只想结欢少数资本家而不怕得罪大多数工农群众；若谓胡汉民诸先生完全同情于这种反革命的理论，吾人至今不敢相信。

然则汉民先生新上政台的头几日，对于为革命柱子的工人群众便已发生这样恶劣的态度，这是汉民先生等愿意的么？聪明绝顶的汉民先生当然不愿如此愚笨，只是由他那种拿拢一部分商团势力的错误政策使他不得不如此。你看新政府中有了商团军干事李朗如做公安局长，和勾结商团的李福林做市长，这样的新政府——变相的反革命买办阶级政府，怎得不“决本职权”压迫工人呢？我可预言，新政府若得苟延下去，压迫工农群众的事实还要接二连三的方兴未艾，也许比右派执政时代还要变本加厉呢！

我们为爱惜国民党的前程，希望汉民先生等好自为之！

我这短评是上星期做的，广州新政府压迫工农方兴未艾，预

言现在更加证实了。政府军警公然协同商团杀工人捕工人，以后还有什么做不出。兹更觅得公安局对于排字工人的布告，其诬罢工为系人利用竟与军阀政府同一口吻：为布告事，案据报界公会同人到局面称，现查得排字工人，复有罢工举动，前次罢工风潮，业经工人部长劝告，各工人均欣然开工，乃忽又复倡罢工之议，必系有人从中煽动，并非出于各工人同意，请为禁止以免报纸停歇，各方均受影响等语；查报纸为舆论机关，人民耳目，前次排字工人罢工，既经廖部长劝告，皆欣然开工，乃为时未几，复有再倡罢工之议，现当军事未定，敌人思逞时期，难保非系人利用，报纸停歇，闭塞人民耳目，借以造谣煽惑，各工人深明大义，既已复工于前，断不必相率盲从，再行罢工于后，惟本局有维持治安之责，见闻所及，亟须先事预防，为各工人劝告，倘确再有提倡罢工利用停印报纸以图达造谣目的之事发生，则为防卫治安计，不能不以职权切实办理，合行布告，仰各排字工人等一体知悉，移期各安工业，切勿为人利用为要，此布，局长李朗如。

（载《向导》第87期

署名：和森）

商团击败后广州政府的地位

(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迄双十节为止，广州政府对于操纵商团的少数买办阶级委曲迁就，坐令反革命形势一天一天的扩大紧张，记者对于留守当局曾再四加以逆耳之警告；在双十节商团军惨杀工农学生群众的时候，政府军警措置之失态，记者在本报上期尤加以痛切之批评，——这个批评里面曾有两句这样愤激的话：“……我想中山先生若是了知留守者在广州之所为，如不气死于韶关，定要震怒而回羊城”。

果然本报上期付印之翌日，上海各报纷载中山先生已率军回驻兵工厂，对于商团决武力解散。于是反革命的纸老虎，经十五那一日的恶战便完全戳穿了。吾人于此，一面不得不称赞中山先生之英断；别面又不得不太息于前此姑息态度之失策，因为广州政府若早日采取断然手段解散商团，其牺牲与损失决不若今日之巨大可怖，令人不宁！

现在商团虽已击散，不幸的事变虽已演完一幕，但接着便有两个重大的问题值得我们讨论：第一这次商团的击败果然算是革命的胜利吗？第二商团击败后广州政府的地位将怎样？

请先说第一问题。记者于此，实不敢乐观。因为这次商团事件，一面固然是英国帝国主义及其卵翼的买办阶级图谋反革

命；别面这种反革命之所以潜生滋长却是国民党雇佣军阀的武力革命方法之必然的结果。由这种方法产生的革命政府，不仅不能给广东人民以好处，不仅不能实现平日所宣传的抽象的主义，反而只能如军阀政府一样——苛税杂捐，重苦人民以养那一批一批的军阀头领及浩大的土匪式军队。所做的事情，不是今天御沈鸿英便是明天打陈炯明，不是招兵买马便是兴师动众，人民不仅不感需要，而且反感痛苦与厌恶。在这样情形之下，加以帝国主义之阴谋，那得不发生反革命？现在形式上虽击败了商团，同时革命政府精神方面的损失却随着军队的焚掠而益扩大。前此串通商团之范石生、廖行超、李福林辈，此次突然豹变围攻商团，其目的决非忠于革命，但在乘机扩张势力，增加枪枝，劫夺财货，不言可知。至于衣不蔽身，食不一饱的各军兵士，其动机全在乘机劫抢，更不待言。这样抢劫焚杀的事实深印于广东人民的脑中，更加以反革命党及全国报纸的宣传，革命政府精神方面的损失是不可讳言的。所以这次的断然处置，在抵抗帝国主义及反革命方面本来极为必要极有意义，可是这种意义同时又被雇佣军阀及其兵士的抢劫焚杀污染了！吾人于击败商团之后，胜利的感情不得不为忏悔军事行动的感情之所掩，这是一切忠实的革命党人所应当深思反省的！

第二，商团击败后广州政府的地位将怎样？这个问题比前一问题更为重要。在现在英美帝国主义全力帮助直系军阀的形势上说，这次广州政府之难免于白鹅潭舰队所驱逐，本是意料中的事。然而这次白鹅潭舰队竟未鸣炮攻击广州政府，据《新闻报》载，领事团仅于十五日晚九时警告省署，劝即停战，“否则当派兵登岸，武力调停”而止，这是什么缘因呢？没有别的，只是英

国所谓工党政府在革命的左派（即英国共产党党员）压迫之下，炮舰政策究竟有所顾忌罢了。但广州政府的地位便从此巩固了吗？不然，他有两种不同的命运：

（一）国内战事如曹吴绝对的胜利了，英国政局如工党失败而保守党与自由党上台，那末广州政府的命运一定是不能长久的；（二）反之，国内战争曹吴只能获得相当的胜利，英国选举结果工党仍能握住政权，那末广州政府的命运自然又可延长时日。

第一种形势实现（便是英美帝国主义与直系反动政局之完全巩固）固然可怕，但第二种形势也不见得可喜。因为在第一种形势之下，国民党却可因而返于同盟会时代而实践全国改组大会所决定之新途径；在第二种形势之下，这种新途径永远是白纸黑字不得实行，而不生不死的局面与雇佣军阀的军事行动势非引导革命至于完全破产之日不止。

两种形势，究竟那一种会实现呢？这个问题在现在没有什么重要；现在所重要的却在广州政府目前（即两种形势未实现之前）对内对外的应付态度及其如何自处的根本觉悟与倾向。

倾向于保守政权维持现有的军事局面吗？那末对于如在其上的香港帝国主义者自然又不得不讲究妥协谨慎之法，对于如在其左右的买办阶级自然又不得不留让一些地步。倾向于彻底革命，实行改组大会所决定的新途径吗？记者不敏，窃愿于此有所陈说：

军事行动与广州这块地盘，经过这一场反革命的恶剧与军阀头目及其兵士的蹂躏焚劫，吾人更觉革命当局此时应深思猛省，具有改辙易途之决心。为什么呢？因为经过这一场浩劫之后，广州政府更是没有方法可在印象不好的人民之前证明革命

政府是有利于他们而挽回他们对于革命的同情。纵然革命当局有此意愿,然而因为客观事实的限制,绝无达到上述目的(证明革命政府有利于人民与挽回人民对于革命的同情)之可能。所谓客观事实的限制:第一,坐养十几万军队,八十几种苛税杂捐万不能实际废除;第二,军事行动欲罢不能(如北伐的把戏,对于北军及陈炯明反攻的抵抗等),扰民害民之事只有日多一日;第三,滇、粤、湘、豫各军阀之暗斗,必然又有爆发之日,这在人民心目中,时时是恐怖厌恶之标的;第四,因为以上几个原因,广州政府依然一点真正革命工作和有利于民众的事业不能做,这样一来,只有使陈炯明和买办阶级反革命的宣传一天扩大一天,民众的感情一天转移一天。现在商团虽在广州及佛山几个大埠击败了,同时有个更可注意的事实,便是城市的买办阶级与乡村的大地主,城市的商团与乡村的乡团之普遍的联合。反革命的宣传正在一天一天的广布于四乡,这种宣传一旦成功,而且事实上必然会使其成功,那时反革命挟四乡农民以重来(有这样的可能,帝国主义自然用不着露面的干涉了),其势决不是可以扑灭的。所以即使革命当局现在对于广州政权不忍割爱对于军事行动不愿撒手,将来也非完全失败退出广州不可。然而那时候的失败,便是上面所说“引导革命至于完全破产”的失败。

因为在事实上,即使倾向于保守政权维持现有的军事局面仍然免不掉要失败,所以记者希望革命当局,翻然觉悟,自动的准备改辙易途的方法。然则怎样做呢?我们并不是要中山先生汉民先生无所作为立刻退去广州,因为本文主要目的乃在希望决定抛弃广州之前(即目前)怎样做一点结束既往准备将来的工作。

这种工作，因为种种客观事实的限制，吾人并不希望过大。吾人不是空想家，决不希望广州政府在此时能收束十几万军队或改编什么建国军，更不梦想能实施国民党新政纲之全部，因为这些都为广州已成的局势所不容许。吾人只在可能范围内，希望革命当局在未离广州以前做做下列四种工作：

(1)立刻停止无意义的北伐，尽可能缩小军事行动，对于陈炯明及北军只在消极方面采取守势，使人民谅解国民党非好战之党。

(2)以全力向工农及小商人群众宣传帝国主义与买办阶级之勾结，解释前此革命方法之错误，今后国民革命应取之新途径，使一般人民明了国民党有改弦更张实践上次全国大会宣言之希望。

(3)严惩串通商团纵兵劫掠之李福林、范石生、廖行超、路孝忱、易公策等，并将此等军队完全解散；严厉撤废苛税杂捐(赌捐在内)，断绝反革命军阀之饷源，以表示不遗祸于粤人之决心；颁布解放农人之具体法令，以斩断乡绅地主煽惑农民联合买办阶级之后患。

(4)宣布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扶植军阀、助成内乱、压迫革命之罪恶，号召全国开始反帝国主义时代之工作，而以实行收回粤海关主权请求全国人民之援助与同情。

以上四端，皆属可行，记者所谓结束既往准备将来之工作，即系指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若以为然，可向广东人民正式发一宣言，表明：“国民党改途易辙抛弃广州政权之决心；只须民众了知其真正敌人之为谁，以及将来解救他们于二重(军阀与帝国主义)压迫之下的仍然只有忠于革命的国民党，我们便可撤

销革命政府而离去广州，以开始全国反帝国主义时代之工作”。

这样，暂时所失的不过是广东之一隅，而将来所得的却是全中国。一个革命党只有积极促成全国革命形势的成熟才能夺得全国的政权；只有夺得全国的政权才能实施其政纲以系民众的信任，——苏俄十月革命便足证明，因为面包土地和平的三个口号，于十月革命之翌日便实现了。所以革命党不拿政权则已，要拿便要拿一个全的；部分的政权，不仅于革命无益，而且有害，前前后后的广州革命政府便是铁证。广州人民所听闻的日日是什么民权民生……，而所目击与身受的却是全然相反的战爭、苛税、杂捐、开赌、拉夫……等恶政。假如再把这种局面维持下去，人民只见得你是好战多事，行不顾言，必愈益倾信于反革命的宣传。反之，此时毅然决然宣布停止北伐、收缩一切军事行动与准备抛弃广州政权，即使民众感情一时迷于反革命而不易转移，然将来必有翻然觉悟倾向革命之一日。因为他们将来无论在任何军阀与帝国主义统治之下，必更加得不到和平，免不掉战祸、苛税与杂捐……。那时候，革命党才有真正胜利之可言。

广州当局听者：你们是要始终株守一隅呢，还是要获得全国？愿意自动的别开生面呢，还是愿意徘徊于莫知所届的旧十字路中？

（载《向导》第88期

署名：和森）

北京政变之内幕及其结果

(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这次大战表面上是直与反直两派军阀间的战争，实际是英美与日法两派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战争。吾人对于这次战争的观察，早已料定其结果不出下列之三途：直胜则美国宰制中国之局完全成功；直败则日本将恢复安福时代之势力；双方势均力敌或直系形势不利时，英美帝国主义必然采取和平会议的方式勒令双方听命于列强的号召之下，组织买办式的商人阶级与军阀阶级暂时混合统一的政府，而根本剿灭广州和全国一切革命的进步势力(参看本报八十二期)。

我们的预言现在完全证实了。英美帝国主义的宠儿冯玉祥，在吴佩孚不利的形式下，跑回北京，主持停战，代替帝国主义者执行前此预定之计划，号召各势力派领袖，开什么和平会议；这位基督将军一面固然是倒吴自建，别面却是替天(帝国主义)行道，其目的据路透社(二十三日)所传是建立稳健政府，统一国家，并拟大借外债，恰好与四十日前伦敦华盛顿间所鼓吹的干涉论调若合符节。

但事变的进行正在五花八门的摆弄之中，而其枢纽完全系于日美两派帝国主义的暗中操持。冯玉祥的谋臣王正廷固然是美国的走狗，但是与日本的关系亦复不浅。冯等在古北口会议的

原定计划，系以冯（玉祥）、王（怀庆）、胡（景翼）、孙（岳）各军合组所谓国民军，推倒曹吴，推段祺瑞入京为临时总司令暂维政局；一面召集所谓元老会议解决国事。这样的计划在东交民巷的英美帝国主义者看来，自然是太便宜了日本和亲日派，故冯玉祥入京后的步骤便一天一天的变化：第一是暂维曹锟的地位，冯声言此次主和系“要求改良政治，非革命”，以明其纯粹为简单的对吴问题；第二是冯玉祥自为国民军总司令，而不以此俾日本代理人段祺瑞，使段无乘机入京主持中枢地位之可能；第三是冯玉祥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现已完全表现其维持直系优势（即英美优势）而设法阻挠日本及奉方势力侵入中枢之趋向。这不但在冯入京后的举动中可以推测，而且在他所宣布的解决时局之十一条办法中显然可以看出，——现在请看二十七日上海各报所载之消息：东南通信社云，据外人消息，冯玉祥王正廷等反吴派对于时局之善后策，所取方针如下：（1）不明交中央政权于反直派，（2）不即推段祺瑞入京为大总统，（3）暂不更迭直系督军，（4）对于曹锟吴佩孚与以相当优遇，（5）召集全国和平会议于北京，（6）和平统一会议于段祺瑞、孙文、张作霖外，并加入其他要人，（7）解散国会，改选议员，建设有力之中央国会，（8）和平统一会议兼加入民间代表，（9）阻止奉军入京，（10）迫曹锟退位，于国会议会改选后选举正式大总统，（11）在大总统未选出前，中央政府依委员制执行政务。

唉！不明交中央政权于反直派，不即推段祺瑞入京为大总统，不更迭直系督军，阻止奉军入京，以及对曹吴与以相当优遇，这不明明是东交民巷英美帝国主义者拚命教他们的新工具冯玉祥，维持他们在中枢的绝对优势吗？并且据二十七日《申报》专

电，北苑决定召集之元老会议，张作霖还在被排斥之列呢。

这次政变不仅是英美帝国主义者见直系内部解体（即吴佩孚不能维持内部的统一）及吴佩孚军事上没有致胜的把握，（东交民巷的观战者如此报告），故使冯玉祥出此临崖勒马之计，即日本帝国主义者亦用了不少促成这政变的鬼计，以图借此使奉张的势力得直达北京以握中枢的政权。可是老奸恶诈的英美帝国主义者，一面在东三省施行同样政变的阴谋（即使李景林等倒张作霖）以资抵抗，一面在北京自动的使冯玉祥除却牺牲吴佩孚一人外，不仅维持直系原有之优势，而且突然挺出和平号召的权威，来制裁奉张及前此对抗直系的西南各省。这样一来，日本及其代理人在这次政变中不仅得不到便宜，而且反要受制裁。然则日本及其代理人怎样对付呢？

张作霖一时好似哑子吃黄莲，只好向外国新闻记者假谦恭，说：“余武人，不愿赴京干预政治”，“北京政府之收拾，当请段老当之，余与冯玉祥当共辅佐段老”；在天津假大方的段祺瑞，患得患失，迫得如那年直系欲推戴不推戴的黎（元洪）傀儡一样，只好唱“须先定裁兵办法，余始出山”的高调。但读者须知段张虽一时狼狈如此，但他们及他们的主人翁（日本帝国主义者）终不是甘于吃亏做偏头的；果然，现在他们已实行了最厉害的对抗策，——便是纵身陷绝地（榆关）的吴佩孚安安全全率兵回天津与冯玉祥去拚个你死我活；等到两败俱伤的时候，奉军长驱直入，跑进北京收渔人之利而建立日本代理人的狄克推多。现在试看念八日上海各报消息：

（一）联合通信社沪讯云，吴佩孚于二十五日率军车八列部队一万人，由秦皇岛西向滦州，列车组织与由京出发时期相等，

并已撤退已往前线之第三师，并征调天津附近之队伍，预备向北京攻击，京津之间，恐难免一场恶战，奉军方面与冯玉祥原有停战止兵之约，吴军西迫，奉军受该约拘束（决非受此约拘束，乃是故意纵之使去）未便即行追蹶，故吴得安然退走。又讯，冯玉祥自为总司令与奉天拥段入京之意相左，冯张之间，因此不无间隙云。

（二）吴佩孚方面近日散布吴张妥协并力讨冯的空气；奉方虽一面否认，一面却实行了纵吴打冯的政策。

（三）《新闻报》专电，冯玉祥段祺瑞联络已决裂，因冯主张委员制，段不赞同，故胡景翼（与段张关系极深）与冯发生齟齬，已向吴输诚；同时各报所载王怀庆反对冯玉祥电竟有胡景翼列名；徐树铮在香港亦直言段芝老必不与冯玉祥合作。

这样一来，直系的内战愈益严重扩大，便是直系势力的全部要根本破坏而被奉张所铲除，结果便要根本动摇英美在北京中枢的势力而代之以日本的势力。然则英美帝国主义者便任日本及段张遂行其政策，而坐视直系内讧以至完全灭亡吗？不会，决不会。棋逢敌手能相对，英美帝国主义者现在虽无法挽回冯吴二军之接战，但他们决不致坐视冯吴两败俱伤（在必要情形，英美对于冯吴二人，也许牺牲一人，以免直系全体覆灭之危机）奉军长驱直入；他们必一面与日本谋妥协，一面以列强名义干涉停战，号召宰制中国的和平会议——所以北京政变的最后结局，仍然逃不出帝国主义宰制中国的预定方式，即列强主宰的各势力派之和平会议。现在试看二十七日《字林西报》关于北京政变吴回津讨冯后的论文之结论：

吾人始终主张列强对于中国此次战事应守中立，吾人曾欢

迎彼等不干涉之宣言，而诋责日本致北京及奉天之通牒，因此通牒似与宣言不符故也。但吾人目下不禁以为列强应行动之时机已至，此行动之形式，决非干涉，亦非调停，但以为列强不妨请中国各交战领袖全体开一大会议，而各国政府合派代表一人加入，或为主席，或为公断员，此代表宜不取诸北京各公使之内，而由华人于其他外人中自定其选，如此办法，或尚属可行乎？中国各领袖假使一经聚首（其中大半尚未识面），而会议于中立的主席之下。则彼此不同之意见或不难泯灭而归于一致乎？由此方法，凡任何方面曾著有良好功绩之人皆可保留而致力于国家，不致投间置散，岂不懿欤。

全国被压迫的人民，你们看呵！北京政变虽然五花八门，然其枢纽不完全是操于日美两派帝国主义吗？北京政变的结果不仍然是损害中国主权，增加中华民族的奴运，完成帝国主义共管中国的阴谋吗？起来，起来，——你们迅速的起来反抗帝国主义奴隶中国的所谓和平会议呀！

（载《向导》第89期

署名：和森）

北京政变与国民党

(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这次战争与北京政变的结果，必然要完成帝国主义宰制中国的所谓和平会议，已是毫无疑问的。这种和平会议是日美两派帝国主义和直与反直两派军阀势均力敌，互相妥协，以宰制中国国家及四万万人民的成功（如果不是势均力敌，便是一派统一中国，用不着什么和平会议），也是毫无疑问的。所以现在问题是到了代表人民利益的革命领袖孙中山与国民党的身上。中山先生对于军阀而实在是帝国主义在京津之间召集的和平会议采取什么态度呢？这不仅是一个策略问题，而且是革命本身的生死问题，稍一不慎，即要陷于绝境。

中山先生肯亲身去参加他们所号召的和平会议或委员制的政府吗？那末不仅是要上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当，而且无异是向人民宣告自己是与军阀及帝国主义的工具有于同等地位。所以在原则上与策略上，中山先生不仅在消极方面要拒绝参加，而且要在积极方面号召人民起来反抗帝国主义宰制中国的阴谋，根本否认帝国主义的工具有——祸国殃民应受国民裁判之军阀有召集会议冒称解决国是之权限。

或谓联合反直讨曹北伐的事实，中山既已行之于前，现在曹吴倒，反直派起来号召和平会议，中山怎好拒绝参加而不分享

其成？我们早已说过，即使反直成功，其结果也完全是军阀与帝国主义的；中山先生现在若上午入北京，我可断定他在革命上的信用下午便要破产；然后再尝一次广州七总裁的味道，结果不仅是终遭军阀的排挤，而且要被帝国主义玩弄奚落，迫到哭笑不得的时候而下台。这样的去分享其成，岂不是自行入瓮。所谓北伐讨曹，本报早已认为根本错误，结果只有徒为军阀与帝国主义摇旗呐喊而丧失自己革命的旗帜与号召。曹吴倒后的北京，又是谁家的天下，这在事实，岂不甚明？在此时若还顾惜北伐政策的错误，再接着错误下去，我想中山先生决不出此。

有人说，事情决不如此简单，中山先生既北伐讨曹于前，即使现在已觉其失当，也不得不与反直军阀敷衍周旋；以中山之明，亲身去受当是不会的，但派人持条件而赴军阀的和平会议亦未尝不可。不然，国民党徒然站在外面反对他们的和平会议，岂不是反使人民误信军阀与帝国主义是爱和平，而国民党反不爱和平吗？

上面的说话，实际包含两个问题：第一，孙中山应否派代表北去与军阀敷衍周旋；第二，国民党是否应有条件的赴军阀和平会议之号召，抑自行在广州召集人民的和平会议，以与军阀及帝国主义的阴谋对抗。

第一个问题，我们亦绝对以为不可，其理由有三：（一）派代表与军阀敷衍周旋，仍无异是承认军阀及其后面的帝国主义有主宰中国号召人民及革命势力之权威；（二）这样便是成功帝国主义共管中国的预定阴谋；（三）前年中山派四代表驻沪与各势力派接洽和平统一之经验，徒使自己革命的面目蒙混，革命的宣传工作停顿，一言包括，这种举动是损革命以益军阀。

第二个问题，在理论上与政策上，国民党现在本应自行在广州召集人民的和平会议，以打破军阀及帝国主义的阴谋，这是十分必要而毫无疑义的。可是在事实上怎样呢？事实上，这个政策是要党的势力已经发展于全国民众中才能做到。吾人于此真不得不太息恨痛于白费气力的军事行动之误党误国！假使改组大会后，国民党能以七分气力用于全国党务及宣传工作之发展，我相信这种人民的和平会议一定召集得成功，国民党在全国政治上与革命上的地位至少也要比现在高十倍。又使最近二月不把全副力量用于毫无意义的北伐，对于军阀战争与必然附随而来的列强阴谋有所准备与宣传，这种人民的和平会议亦有几分成功之可能。可是中山先生这两个月的气力更白费了，所以现在剩下的出路只有两途：一是俯首帖耳恭听北方军阀与帝国主义的号召；一是毅然蹶起，号召民众反抗军阀与帝国主义继续宰制中国之阴谋。前一途无论中山先生亲自北去或派代表与之周旋，都是绝境上面又加绝境，损失上面又加损失；后一途虽一时见不到偌大效果，然却是亡羊补牢收之桑榆的必要政策。

但是现在右派的态度怎样呢？（一）广州公安局对于北京政变的布告是“和平统一，迎刃而解，西南护法，已底完成”；（二）住在香港的所谓民党揭“推倒曹吴，欢送大元帅北上”的旗帜游街，并燃放爆竹志庆；（三）孙科在奉天语西人云：吴佩孚失败，武力统一之说，自此可息。此后当谋和平统一之策，由自治各省联合成国。又云乃父与奉张同一意思，不久孙、张、段等各省重要人物，当在京津间会商大计。最初当为军政时代，其次为军民两政时代，以养成国人政治之才，最后乃为人民选举议员，实行执政

时代。又云中国重要人物之意见，皆以十年来之议院政治为不适用，此后当使各省和平自治，以谋实业、教育、司法上之进步，对外一时不撤销治外法权。此次战事，不但打破武力统一之主张，且将革除非国会与其所订宪法。中国今日并无政府，亦无国会，无宪法，正可从头做起云云。孙科又谓其父孙文现认惟有军人狄克推多方能解决中国时局，故段祺瑞实为收拾时局之适宜人物，中国革命后采行宪制太早，故与国势不甚适宜云，（见念七八两日的《新闻报》）。

国民党右派这种态度，实在令人难堪！这次北京的政变与附随而来的所谓和平会议，在觉悟的革命党看来，不仅不能予吾人以丝毫可喜之冲动，而且为两派北洋军阀与两派帝国主义互相妥协，联合向中国人民与革命党下最后的制裁之危机；谁知这种危机降临，倒还是右派首领向军阀投机向帝国主义放盘的卖买。呜呼！幸亏孙科先生说得出口：“乃父与奉张同一意思”，“惟有军人狄克推多能解决中国时局”，“此后……对外一时不撤废治外法权”！

附和军阀与帝国主义的右派，固已不必深责；我们所最惋惜的却是中山先生二十五日嘉勉冯玉祥“戡乱安民，举国属望，此后筹维，须谋根本至计，永奠和平”的通电之失当。替中山主张发这个通电的左右，至少也可说他们对于中山先生的忠实以及对于政治的常识，尚远不如徐树铮之于段祺瑞，因为徐树铮尚看到冯玉祥控制的北京形势，比以前吴佩孚控制的形势没有两样，所以他公然在港宣言段祺瑞不能与冯玉祥合作。

既往不咎，我们现在只有希望中山先生赶快发一根本反对军阀与帝国主义合作的和平会议之宣言：一以打断右派在外面

招摇放盘的无耻勾当：一以开始代表人民利益反抗宰制四万万人民的阴谋之革命工作。

（载《向导》第 89 期

署名：和森）

欢迎孙中山先生离粤来沪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抛弃僻处一隅的政权，而从事于全国革命的工作——宣传与组织——之进行，吾人对于中山先生久已有此提议；现在中山先生离粤来沪已成事实，吾人根据这种重大的意义，应当表示充分的欢迎！

中国自受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治经济日见崩坏，辛亥革命，政权转移于帝国主义扶植的北洋军阀而益乱。现在曹吴虽倒，而继曹吴以起的仍然不外传统的北洋余孽之段、张、冯三派军阀，继续争夺宰割之旧局面，战争祸乱不仅无停止之望，而且正在酝酿发展之中。在这种情形之下，国民革命领袖宜如何领导全国人民入于奋斗之途，——这种重大的责任正落在中山先生的双肩之上。

中山先生怎样成就这种伟大的责任？我想他抵沪的第一件工作应根据国民党的政纲发表宣言，拿出自己救国救民的真正主张（如怎样废督裁兵，怎样收回海关主权，增加进口税，以为裁兵、理财、废厘金、停外债及兴教育办实业之用等），一面试探军阀是否有悔祸之诚心，一面唤起全国民众之奋斗；第二件工作应同时致电北京的摄政内阁，立刻废除治安警察法及一切束缚人民言论集会自由的法令，俾全国被压迫的人民得充量发表其政

治意见，然后召集国民大会解决国是；第三件工作应注全力发展长江及黄河流域的党部，及与上列二项有关的宣传与组织。

至于何时北上或是否必须北上，这还是次要的问题，应俟观察情形再为决定。因为现在京津的形势，段、张、冯三大军阀已由暗斗而入于明争之期（详见另篇），奉张提十万大军进驻津浦一带以后，凶焰万丈，目无余子。势危力孤的冯玉祥派（孙岳胡景翼在内），为势所迫，主张略趋新异（如欢迎中山，处置清室，委员制等）已为段张所不喜，冯在中枢之地位业已发生问题，此后冯张是否决裂而至于再战尚不可知，至于所谓和平会议更是邈不可期。以段祺瑞现在之地位尚不肯贸然赴京做战胜者的高等俘虏，难道中山先生可贸然赴京做他们的高等俘虏么？段祺瑞在他未成就自己的势力之前不肯贸然入京，吾人亦希望中山先生在沪作相当时期之勾留，造成全国的舆论及民众的后援，庶几进可制胜军阀退可扩大宣传。故吾人谨以上列三项工作为欢迎中山先生离粤来沪之贡献！

（载《向导》第91期

署名：和森）

段、张、冯三派军阀 暗斗之北方政局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北京政变成功，北方政局遂入于奉张、皖段、直冯三派北洋军阀角智竞雄的新时期。冯玉祥原先本想挟“和平”“停战”四大字号召天下，制奉倒吴；殊不知事出意外，吴佩孚率军回津而奉军随着长驱直入（参看本报八十九期），冯玉祥主宰中枢之地位无形为之动摇，于是才屁滚尿流把曹錕撵走，而去捧段祺瑞的佛脚，迎他进京做什么国民军的大元帅。段祺瑞自然有他自己的算盘，他不仅不愿意做冯玉祥的傀儡，同时也不愿意做张作霖的傀儡，他的主意是要乘机造成自己强固的实力之后才入北京揽持政权。所以他不仅与吴佩孚暗结收拾吴之残部为己有，重要目的还在使吴纠合长江各省直系势力弃曹拥己，所以他对于吴的态度始终只说“子玉拥戴非人”，这句话的反面意义自然是很明了的。

前此路透电及英字报纸常常散布段、张、冯暗斗的消息，因为路透电及英字报纸都是帮助直系的，所以阅者不甚注意。可是这种消息现在在日文报及日本各通信社所发的消息中，几乎日不绝书。现在先把上海日文《日日新闻》（本月九日）论段、张、冯的外交战一文介绍于下，以见此类消息之确实：

“段祺瑞之迟迟入京，盖知在东南诸省形势未定之前，而遽行轻动，将自陷于不利也。对于此次政变，段氏之声望与活动间接固与有力，而直派失势后直接之最大动机，则在奉军之战胜与冯氏之政变。今张作霖与冯玉祥，虽均声明拥戴段氏，段系各省亦表示服从段氏，而不带一兵之段氏，不造成强固之背后之势力，而迳行入京，势必仰承战胜者之鼻息，或为奉派之傀儡或作冯派之招牌，而供其急进政策实行之工具，均有为北京城内高等俘虏之虞。此为段氏之所已见到者，故段氏务迟迟入京，必将本系各省及旧有直系各省联络就绪，以消弥奉冯二派之隐患，且进而造成得号令天下之实势力，而后入京主持。即段氏之计划，在利用张冯之武力威吓，诉诸平和之手段，以支配天下，此段氏之所以不易动也。

至于冯派，甚冀段氏早日入京。冯等幸乘北京之虚，告厥成功，虽一时握有中央主权，而其支配区域，仅限于近畿地方，拥兵数万，而无地方的地盘，知现状难长久维持，乃求段氏出山，权依其名以号令天下，俾时局早日收拾，且由段氏负设施一切责任，故请段氏入京。又奉张之地位，与冯稍异其趣，张之目的，在歼灭直系势力，不与吴氏以再起之余地，因之于方法手段皆所不问，其所惧者即吴氏纠合长江之势力，出于拥戴段氏之态度，而贻留他日之祸根耳。段吴提携之可能性，已为数年来识者间之一问题，以其意气人格之相近，较之张段之关系，仅由利害而结合者不同。在曹锟失势之后，吴固不妨先行纠合长江各省，拥戴段氏，此亦奉张之所熟知也。要之冯等欲利用段氏以固本派之地位，奉张亦欲利用段氏以收战胜之全功，而在段氏，亦欲乘张冯之拥戴，且免彼等之反感，而握天下之实权，表面均标榜和平

妥协，而实则角智以竟取权势。由此以观，目下京津间之形势，可谓奉、直、冯、吴之战争已闭幕而入于段、张、冯之外交战斗时期。”

段祺瑞迟迟进京的原因，《日日新闻》固已论之甚详；我们所更欲了解的，段氏这种老算盘不仅出自个人的心裁，而且是由于后台老板日本政府的决定。如不相信，请再看上月底东京传来的消息：

“电通社东京二十九日电：据东京人士之一般观察，段合肥氏若果出就总理之职，而摄行总统职权时，当首开各省代表会议，而图实行其联省自治政策，且当此财政困难之时，或须对外募集善后借款，以济急需，而其先时当寺内内阁时所成立之西原借款、电话借款等等，此际纵不能偿还其本利，亦当有整理之希望。又日本若遇段氏为实行其联省自治计划，而至仰给其经费于外债时，亦不惜与以援助，藉谋奠安中国之时局云。又同日电：昨日日上院议员，曾往访霞关外务当局，叩其对于中国时局意见，得其答复如次：‘段氏虽终不免于出而收拾时局，但亦必审慎周详，须至万不获已时而后出此，当决不如外间所传之冒昧从事也。且现时段氏手无一兵一卒，若贸然出而肩任艰巨，恐不免为冯氏所操纵，此固为段氏及其左右所深虑者，而奉张此次自恃其功进兵京畿，以制冯氏，亦未可知。果尔，则今后北京政局，殊未易乐观，而段氏对此自更不得不深加审慎其出处矣’”

段祺瑞不贸然以赤手空拳进京受冯玉祥之操纵，及张作霖进兵京畿以制冯玉祥之二点，现在日本政府的代理人业已如法办到不成问题。这三大军阀间的暗斗，一面是段张联合以制冯，别面是段暗联长江直系各省势力以制张。苏、皖、赣、闽、浙、陕、鄂、

豫八省联防拥段内幕，一面固然是吴(佩孚)、齐(燮元)、萧(耀南)等保持直系势力的政策，别面又是段祺瑞扩张自己地位的妙计。这种段吴默契的联合政策不仅给冯玉祥及其所谓摄政内阁以大打击，同时在奉张看来也是一个不堪容忍的眼中钉。所以任从段氏在天津怎样高叫“吾对东南已有办法”，冯氏在北京怎样高叫和平会议，胡大帅对之总是一声不响，悄然提着十万大军进驻天津，马上分部由津浦路南行向山东进发。据各通信社消息，张作霖对于东南决用武力剿灭直系余孽，并且以山东与东三省有深切之利害关系，将令张学良与姜登选军继李景林而入天津济南方面，同时胡大帅的先锋吴光新宣言：“此时欲望彻底统一，无论如何不可不攻取南京而讨伐西南”(见七日东方社北京电)。

现在三大军阀间短兵相接的问题，第一是地盘的瓜分，第二是中枢政权的争夺。关于第一问题，段祺瑞要以他的爪牙卢永祥任直鲁豫的首席巡阅使，而以冯玉祥任苏皖赣巡阅使，并且急不择时，便要求他所不惬意的摄政内阁颁发明令，可是奉张的主意完全与段相反，奉张老实不客气地主张调开冯玉祥离北京去做两湖巡阅使，而以苏浙皖巡阅使俾卢永祥，至于首席的直鲁豫巡阅使胡大帅却默而不言，好教善于参禅的段太师去领会领会。

至于第二问题，冯玉祥本属捷足先登，所谓摄政内阁既未仰承段氏意旨又未征取胡帅同意，基督将军斧柯在握独出匠心，一时得心应手之乐自不待言。然他一方面，与段张之间的磨擦自然要加倍的增高。段祺瑞在天津不仅开府办公俨然自立政府，而且更进一步拟议安福系之正式内阁(十二日天津电：庚电：段派集议，拟推王揖唐组阁，伍朝枢、曾毓隤、叶恭绰等为阁员，但奉张方面尚未赞同)；至于奉张，前此既反对二王(永江，迺斌)就

职而荐叶恭绰钟世铭长交财二席，以现在奉张抵津后的凶势看来，乃有完全排除冯玉祥于北京政权外之趋势，请看下列消息：（一）东方社十二日天津电：奉天军气焰极盛，冯玉祥王承斌失踪；（二）上海各报同日电：天津会议，张作霖请冯玉祥带兵赴热河，冯荐李景林，段未置可否；（三）上海《新闻报》同日电：张作霖与冯玉祥、王承斌争权龃龉，王承斌逃避往英租界，冯玉祥被扣留，现象极为纷乱；（四）连日上海各报电：京奉局长，奉张又委唐文高，未到任前以锦州站长吴藕塘代理，并随张来津，有路员二百余人，沿途更换，查该局长京冯曾委任丁某，今张又委，不知如何决定去留；又摄政内阁新任长芦盐运使刘之龙，天津海关监督徐祖善，天津造币厂长刘人杰，均被张作霖挡驾，不能到任。

从上面这些消息看来，冯张的决裂似乎即在目前；但这种时间的问题，我们实无预言之必要，因为段氏对冯的态度不必与奉张完全相同，则三大军阀头目的暗斗局面自然还可延长到相当的时日；毫无疑问的便是这种暗斗将日趋于严重。即以直隶与天津的地盘而论，冯玉祥的摄阁既已决定维持王承斌和李竟容的地位，而奉张则欲以直督地位与李景林，皖段则欲夺天津镇守使地位与刘询。这类的争夺正在方兴未艾，而总统制与委员制的暗斗又近在眉睫；主张委员制最力的是冯玉祥，在目前段张之对冯自然常处于联合的地位。

现在冯玉祥的地位业已入于危困时代，他介于段张两大压迫之间，他除了自己的军队外没有领袖直系势力的希望，他所联结的同盟只有孙岳与胡景翼两个小军阀，惟因他的地位如此孤危，所以迫得他不得不左倾一点而做些有利于己的投机举动，如高唱中央政府改采委员制，高唱尊崇孙中山，实行取消宣

统尊号改订优待条件，急开中俄会议等等。冯玉祥这些投机举动一面固然可博智识界多少同情，别面却因此大招段张与日本方面的疑忌。现在请看下列几项消息：

(一)东方社十日电：际此天津会议集中内外视线之时，加拉罕与王正廷在北京往来甚频，一般人士推测，或系谋中俄会议之完成起见，但他方面盛传，有人正在运动，将乘天津会议机会，在中国布类似苏俄之委员制度，现内阁中一部分国民党之有力者与加拉罕之间，正在努力进行，有所企图云。

(二)路透社十一日电：段祺瑞虽不以待遇溥仪之手段为然，但力避自相分裂，惟大局颇伏危机，盖冯氏在京所任诸人刻力图固其应急政府之地位，张作霖段祺瑞二人则既利用冯氏之叛吴，显复谋图推翻冯之机关以自定新政府基础也。

(三)《申报》十一日北京电：《东方时报》(张作霖收买之机关报)论孙派太新，须迎合旧社会观念，意在贯彻张作霖主张，而使段为总统，此间官吏亦赞成段来，谓较能筹款发薪，惟北京智识界，均主张实行委员制，免却今后争总统之内讧，苟仍袭旧军阀故辙，则改革徒劳。

三派军阀间的暗斗既如上述，然则隐在他们背后的帝国主义的态度是怎样？此为最堪吾人注意之一问题。试分日本与英美两方面言之：段张得势，日本固然踌躇满意，然鉴于段张间目前与将来之冲突，以及长江直系势力之难于覆灭，亦时常有所危惧而发出悲观的论调，下列十二日东方社所发表的消息，最足以窥见日人之隐衷：

“某要人谈收拾时局之难处如左：(一)张作霖声称推戴段祺瑞为各省联军统帅，一切听段指示，冯玉祥等不问段尚未允，即

以国民军大元帅之礼待段，但内部实并非如此忠实于段氏。(二)王正廷承冯玉祥意，与赤色浓厚之国民党及北京大学之一部通气脉，为迎合急进论者之施設，但如此，则根本上与段张等之主张不相容，北京一带，既为冯之大兵所围绕，段若能如预定之办法，一俟受各方面之推戴，即行入京，则如何能使战胜之冯玉祥从北京附近撤兵乎？(三)张作霖自身，如能依有利之条件巩固东三省之地盘，则其干涉中央政治之念或可淡薄，但其部下诸将借战胜之余威，已成骑虎之势，如李景林之窥直省，张宗昌之窥鲁省，吴光新且有越徐州而更南下之传言，彼等眼中已无冯玉祥，段将何以驾驭此骄横之奉军将士哉？(四)苏齐、浙孙、赣蔡、鄂萧等直系有力者联名发拥段之通电，而从其里面观察之，则彼等表示团结巩固，乃欲合力防阻北方势力之南进，岂真彻底服从段氏乎？(五)南方之形势，尚在混沌中，孙文意见，不足以代表南方，纵孙段二氏之间已有接洽谅解，但国民党员之北上，大有促成北京急进施設之虑。”总之，段氏身不带一兵而欲与国民会议谋自己所主张之根本改造说，在未行之前，不可不先将此等错综纷扰之难题一一措置妥贴，段氏之任务，可谓重且大矣。然则日本帝国主义怎样做呢？他的责任，第一是谋怎样处置冯玉祥而巩固段张的狄克推多；第二是调和段张，使吴佩孚无隙可乘，徐图剿灭长江各省直系之势力。

至于英美，此次因为忙于国内的选举竞争（美国代理公使又病死了），坐令日本势力在中国获得“如此奇异之发展”（伦敦《太晤士报》惊叹之词），本已吃亏不少。但一俟英国保守党内阁与美国共和党政府巩固之后，对于华事一定有积极之举动，这在近日伦敦《太晤士报》及包尔温的言词中，已明白表现出来了。包

尔温本月十日对于中国时局的宣言是“如遇可用外人势力以助中国之机会，则政府定即商诸他国而为之”；《太晤士报》七日的社论是“英国在华政策，今已届应表示更大敏捷与策略甚于许多年来所详示者之时机，英国政府刷新后，今已有对于中国困难问题更为活动注意之机会，合作固当维持，但他国之不活动，或方向不正的行动，未许为英国不活动之理由，英国于保卫其利益与维持其观念时，有更大的独行之必要云”。然则英美怎样做呢？第一当然暗中维持长江各省的直系势力，坐以观冯、段、张之变；第二是经过必要的旁观时间后，采取积极的干涉态度。军阀的和平会议也许要到这时候才能召集。

综观以上种种事实与消息，我们可以得到下面的结论，即继曹吴而起的北方政情，仍然为北洋军阀三派余孽争夺宰割的局面，旧战争未了，新战争的种子正在胚胎萌芽；不仅真正的和平邈不可得，即各军阀间暂时妥协的分赃会议亦相隔尚远。在这种形势之下，人民除了静待军阀及列强的新牺牲外，只有准备上革命的道路；若还希望军阀头目出来收拾时局，简直是梦里做梦。

（载《向导》第91期

署名：和森）

地方的政治争斗与 全国的政治争斗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这次政变显示于吾人的事实，莫过于军阀势力之分化与崩溃。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政治的前途显然表现两条出路：

(甲)若直系军阀之完全崩溃及反直系军阀尚未巩固全国政权而对于民众不免有所顾忌之时，人民急起直追，努力奋斗，则上自中央，下至地方人民，都有收回政权使全国民主政治化之可能；

(乙)反之，人民放弃主人翁的职权，不自努力与军阀奋斗，而反只希望军阀领袖出台收拾时局，或只知天天向军阀领袖做去甲迎乙的呼吁，那末战胜的军阀自然又有从新巩固北洋正统，复建全国(自中央以至各地)的军阀专政之可能。

前者是达到真正和平幸福的新道路，后者仍然是战争无宁的旧乱局。两条道路都有实现之可能，而其关键一系于人民本身之是否努力起来奋斗。

曹吴倒后，自直、鲁、豫以至江、浙、皖、赣、鄂、湘以及三特别区莫不同时发生问题，而与以上各省人民以自治自决解除军阀制度的机会。然而各省人民的努力怎样？

奉军将抵天津之时，直隶人民不自动的起来推翻王承斌而

请命于李景林；张作霖、李景林假谦恭的时候，直隶人民不但不知乘机自决，始终要将该省政权与人民生命奉献于奉系军阀之手。齐燮元地位动摇，段祺瑞、张作霖又先后声言废除巡阅督军制，江苏人民不知乘机自决民选省长，始终任少数绅士去与段、卢、韩（国钧）、陈（调元）做买卖。

现在直隶、安徽、热河已完全落于奉系虎狼、安福狐党之手，江、浙、赣、鄂……各省人民若不急起直追，指日便要陷于同样的命运。这样一来，便是人民让奉皖军阀从新巩固北洋正统复建全国的军阀政治。

本报盱衡时局，敢向全国尤其是江、浙、赣、鄂的人民大声疾呼：你们应乘直系军阀完全崩溃，反直军阀尚未攫住全国及尚戴“废督”“更始”的假面具之时，努力起来自决自治，收回本省之政权，打倒本省之督军制度！你们不应再向段祺瑞请命，要求他任命某某为省长，你们应自己去选任你们的省长！现在是“革命”时代“更始”时代，段祺瑞的临时执政政府便是他及拥护他的几个军阀利用革命二字自作自为，没有什么法律根据，也没有什么人任命他，难道你们反不能在地方革命自决自治，实行民选省长么？你们须知道请求段氏决然得不到好结果，去甲迎乙更不是解脱军阀压迫的方法！

江苏同胞们！你们现在要驱逐齐燮元派的奸徒韩国钧，打消奉军南下的野心与后患，唯一的方法只有即日组织起来，民选省长，宣布民治。江西同胞们！你们既爱戴李烈钧，你们既恐怕去一军阀复来一军阀，你们便自行选举李烈钧为省长好了，何必缘木求鱼，视段祺瑞的任命为定准呢？湖北同胞们！你们须知萧耀南是非去不可的，你们不仅不要任他自图恋位，而且也不要

任少数奸绅官僚在北京做买卖，你们应鉴于直、皖、江苏的失败，
趁快组织起来民选省长，驱逐萧贼，宣布民治！

现在各省已成立及将成立的国民会议促成会，一面固为全国政治斗争的工具，同时也应为该各省政治斗争的工具。必须如此同时并进，才能保证将来全国国民会议有好结果，才能实际推翻军阀政治而代以民主政治！

（载《向导》第95期

署名：和森）

近代的基督教

(一九二四年)

一 资产阶级反对基督教时代

十九世纪以前，无论加特力教或基督教，都是“君权神授”说和贵族阶级的护身符；所以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对于贵族阶级这种无形的压迫工具，攻击不遗余力。十八世纪末，资产阶级攻击宗教最有名的代表约有三批：第一批为福祿特尔、卢梭、屠尔阁；他们虽极力反对天启的宗教，然而还不敢根本否认上帝。第二批为狄洛、墨特黎、黑费鸠斯、霍尔拜施；他们攻击宗教，比第一批更进一步，渐渐入了无神论的趋向。第三批为唯物论感觉论的哲学家加彭年、梅恩、皮芳、冉芳它，他们都是主张革命的宣传家；公然演译他们的学说，应用各种已经发明的自然科学，把基督教和加特力教的立脚点根本推翻，把上帝的观念打得烟消云散。于是贵族阶级的权威日落万丈，资产阶级革命不久就成功了。综合以上三批攻击加特力教和基督教的工具就是理智；拿以来代替宗教的东西，就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中的自由、平等、博爱三大要素。

二 资产阶级利用基督教时代

原来政治宗教都是每个时代的支配阶级用以统御其被支配阶级的工具。资产阶级革命后，既把专制政治的形式变为民主共和，自然也可以把天启的宗教变为理智的宗教。假使自此以后，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面，真能任人们由“理智”推论或分析人为界的现象，真能以人世的自由平等博爱代替死后的“天堂”，人类谁不欢迎呢？可是资本主义的事实，完全与他的教义相反；资产阶级的特权，完全建筑在不平等不自由不博爱的掠夺的经济基础上面。日日由他们掠夺工人、压迫工人、垄断生产手段和全部劳动生产品的事实，就可证明他们所标揭的自由平等博爱之为骗术了。在资产阶级未获得政权以前，这三项自由主义的标语，还有“半上帝”的魔力，可以驱使工人阶级赞助他推倒封建制度；可是在他登台以后，所谓自由不过是资产阶级的“掠夺自由”和“买卖自由”，所谓平等是形式的平等，无产阶级在经济上分配上绝无平等可言，至于“博爱”更不待说。到了这个时代，自由主义的三标语，不但不能组成资产阶级统御无产阶级精神的新宗教，而且根本的赤裸裸的被无产阶级揭破他们欺人的假面具，惹起工人们无限的反抗和纠纷。于是资产阶级就不得不利用他往日所反对的基督教，来消磨工人阶级的革命反抗精神了。资产阶级专政后之利用“上帝”，也和他利用“君主”一样。“君主”和“上帝”，在十八世纪时，都是资产阶级所拚命反对认为不两立的，但是一到十九世纪，无论在英、在法、在德，都成为资产阶级对付无产阶级必不可少的傀儡和魔物。故自十九世纪以来，君主立宪

和民主共和是并行不悖的；科学思想和宗教迷信也是并行不悖的了。

三 资产阶级信仰上帝的根源

资产阶级开始本是利用上帝来驯服无产阶级，但久而久之，又渐渐信起上帝来了。资产阶级信仰上帝的原因，在他们所谓“自由思想”的领域内不能说明的；要说明他，非从他的经济地位上找根源不可。资产阶级自从专政集产以来，他在生产上不仅没有体力的作用，而且渐渐的连脑力的作用也没有，一切管理、计策、登记、经营，都委他们所雇用的智识劳动者了。故自大工业发达以来，资产阶级在生产上即已成为“寄生阶级”，除了专靠他们国家底制度、法律、军警以掠夺工人的劳动结果外，骄奢淫逸，一无所事。工人劳动到死不免于饥寒；他们呱呱下地即可得着几亿几万的遗产。他们生长在这种莫明其妙的不劳而获的幸运中，享受洽意之余，就不由他们不想起有上帝这个东西的存在，对于上帝就不得不起丰富的想象和感激了；不然，他们将自问：“没有上帝，我们的幸运从哪里来呢？何以我们生来就这样的幸福呢？”这就是资产阶级信仰上帝的经济根源之一。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生产的紊乱，资产阶级在这种紊乱状态中自由竞争，愈竞争愈紊乱，因而惹起定期的经济恐慌。这种恐慌乃是社会的生产力对于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起大叛乱。然而资产阶级利令智昏，对于这种不幸的命运之来，也以为是上帝命定的。这在近世科学技术发达的时代讲来，真是笑话；然而这种笑话，在资本主义紊乱的经济关系中是必不免

的。他们所有的企业，无论工、商、银行，或其他种种，都是放在冒险的投机的不可知的状况中，听天由命的去冒试，所谓精确的调查和统计，在他们自由竞争的经济世界中完全归于不可能。从前野蛮时代的野蛮人对于自然界不懂解，便以上帝为世界的创造者和生死的命定者；现在文明时代的资本家，对于他们自己所紊乱的经济界和强过于他们财产关系的社会生产力不懂解，也就不得不以上帝为财富的分配者和幸运不幸运的命定者了。有了这两种经济的原因，于是资产阶级对于上帝的信心，就随着他们的资本主义发达而发达。

四 文明时代的基督教与科学

野蛮时代，人智未开，自然科学未发明，野蛮人对于自然界不懂解，于是宗教就建筑在这种缺点上面，以为人们不懂解的懂解。然则从自然科学发明以来，基督教的命运，应该不能延长到十九世纪了，何以到今日还存在呢？除上述资产阶级利用他为无形上的统御机械外，就是因为资本主义的文明时代文明人对于人为界的不懂解，也如从前野蛮人对于自然界的不懂解一样，于是基督教就由前个颠覆了的立场，移到了后个特别旺盛的立场上面来了。近世以来，科学家在自然界中确实做了许多不偏不党丰富精确的发明，如移着他们发明自然界的利器，来发明人为界的种种神秘莫测的社会关系经济关系，岂不甚易？但是事虽可以如此做，然而资产阶级决不容许他们如此做；因为如此做去，于资本家特权专利的前途很有妨碍。资本主义要保守在这种人为界的神秘状况中才能存在，也正如往日宗教要保守在

自然界的神秘状况中才能存在的用意一样。故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自亚丹斯密和黎嘉它以后，直到今日，毫无进步。在亚氏黎氏的时候，他们还能以不偏不党的科学眼光阐明种种经济的现象，发明他们有名的价值说。可是资产阶级登台以后，情形就不同了。资本家对于他们生产有益的自然科学，虽不惜重钱培植，同时对于他们占有制度有妨害的人为科学，却不惜多方摧残。所以最近几十年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绝无重大发明，都不过毕生做那“拾遗补缺”的工夫。他们的能事，惟在统计一些于工商业有益的数字，既不敢严密分解，又不敢根本批评；因为一经根本批评或严密分解，资本主义的真相和破绽就完全可以给人家看破。故最近几十年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不但没有进步，而且随着资本主义的反动而反动，他们常常攻击黎嘉它劳力一元论的价值说，以为反抗共产主义的地步，其愚妄已与从前仇恨自然科学的僧侣差不多了。一世纪以来，自然科学如此加速发达，而人为科学如此沉寂不发达，就是为着资本主义存在和要保守资产阶级地盘的原故，因此，将死的基督教又得复逞淫威。故自十九世纪以来，基督教的生死问题，不在自然科学的发达不发达，而在人为科学的发达不发达了。最近百年以来，资产阶级科学家和哲学家对于宗教的态度，再寻不出启蒙哲学时代诸贤的攻击态度。换说一句，大部分是取“不闻不问”的态度，“不闻不问”就无异于默认。他们实默认此时还有用基督教来维持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必要。最可笑的，就是这样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对于自然界不能解决的难题，虽多数还能顾惜自己的名誉，把这种难题留待自然科学来解决（但归于上帝去解决者也还不乏人），但一涉人事上的难题，就无不或明或暗承认有用上帝来解决的必要

了。所以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人为科学是决不能如量发达的；换句话说，就是基督教还将同资产阶级延其残喘。

五 资产阶级的社会学与基督教

近世资本主义社会，是建筑在劳资两阶级的阶级对抗上面，这是事实，不是马克思一家之说造成的。一七八九年法兰西资产阶级革命专政后，无产阶级便不断的起来对他反抗，阶级斗争就加速的成为内乱，代表无产阶级要求的巴布夫一流的共产主义，就影响了全法兰西的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一面用政权高压，一面起用已经关门的教会，而别一面就有资产阶级实证哲学的开山孔德出来唱阶级调和的社会学。他要把这种新的人为科学建筑于一大调和的系统上面，所以又高唱人道主义或人道教，资产阶级统治人类的新宗教至此似乎有成立的希望了。可是这种希望之不能实现，与第二节所说的自由主义的教义之不能实现同一理由。因为资本家经济掠夺的事实有加无减，所以孔德的企图又遭同样的失败。资产阶级社会学直到今日，还隐匿分配问题不能开口；讲来讲去，不过搜集一些无关痛痒的上古中古社会形成的条理和将来社会的非科学的空话罢了。所以社会学的权威，连“半上帝”也不能成，至此资本家更不得不以皈依全上帝为稳妥了。故此时法兰西和德意志的加特力教徒或基教徒，公然组织成宗教的政院，自一八四八年以来，极力与资产阶级携手，推倒无产阶级革命，参与资产阶级的国政。从前资产阶级对于君主贵族所标的“政教分离”的话，便一口吞没了。

六 无产阶级的进化论与基督教

十九世纪人为科学的大发明，莫如马克思科学的社会主义；自然科学的大发明，莫如达尔文的生物学说。马克思以阶级斗争的原则阐明人类社会的现象；达尔文以生存竞争的原则阐明自然界的现象。两者各在其客观的对象中，同为不可摇动的科学真理。然而自这两大发明的学说出，资产阶级的智识者，又起了一个新而有力的企图，他乃立刻移了达尔文解释生物界的原则——生存竞争——来解释人类社会，以反对马克思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学理。这样企图中最有力的代表是斯宾塞，斯宾塞从生物学上的进化论来解释人类社会的渐进而不突进；无论进化论中已有狄匪黎一派发明突进说，而且实际上决不能拿着解释昆虫鸟兽现象的原则，应用到人类社会上来。因为禽兽社会中决没有专一掠夺劳动的资本主义，决没有自身不劳动而坐享特权专利的资产阶级；如其有之，便会起激烈的争斗和革命，最能革命最能争斗的，就是最适最优的生存者。英吉利的进化论半世纪以来，在维持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下，尽了一种好似最强劲的学理上的反革命作用，但“曲学阿世”，一见了然，入二十世纪以来就无声无臭了。当进化主义哲学唱得最盛的时候，全世界资产阶级兴高彩烈，大会于伦敦，集各国资产阶级政府的首领、大资本家、学者、教皇的代表于一堂。到会代表英国帝国主义的政治家有张伯伦、雪西尔诸人，德有俾斯马克诸人，法有克列满梭诸人，俄有奇儿斯诸人，至于举世知道的大资本家，如德之克鲁伯，法之施乃德，以及英国最有名的资本家莫不

在坐。而大会中最尊宠的教皇代表之多，英有斯宾塞，德有赫克尔，法有保罗伯尔诸大哲学家、生物学家。这个大会的总目的，就在推翻社会主义；于是并世的进化论大哲学家，就同着教皇、牧师、神父，做了资本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大傀儡。由此就可想见资本主义的世界，资本、宗教学说之打成一片了。

七 无产阶级不信上帝和基督教之 成为侵略主义的先锋队

自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资产阶级在科学上哲学上反抗社会主义的企图都不甚成功，于是就更想把无产阶级普遍的基督教化；可是这种企图又遭同样的失败。无产阶级不信上帝的原因，并不单由于社会主义的宣传，最主要的根源，也须在他们的经济生活中去找。无产阶级经济生活的基础就是工钱，他一日不作工，一日不能得面包，作一天才能吃一天。所以他生活的来源，是很亲切明了的；他的本身，就无异是上帝。他祈祷上帝是不能得面包的。他毕生做工钱奴隶，年年月月是一样，没有甚么倘来的幸运，所以绝对引不起如资本家一样对于上帝的想象和好感。他在不幸的方面，如失业、饥寒、贫困等等，也容易找着原因，决不如资本家一样想象有上帝从中操纵。因为这些原因都是他们直接领略，简而易明的，决不如资产阶级自由竞争的紊乱经济状态之难于了解。所以基督教在大工业的无产阶级中，无论他怎样用一些慈善手段和物质愉快的引诱，结果总是不行的。基督教徒教工人不要争现世界的愉快、享用，当守现社会的秩序，以图死后升天堂；工人们一听，就知道他的鬼话，便要反诘他

们：“你们祈祷上帝给你们面包，而不祈祷上帝给你们以工作；其实你们的面包，是谁给的，不是资本家给的吗？然则资本家不就是你们的上帝吗？你们不是寄生虫中的寄生虫吗？”这样反诘的话，在英法德各国的工人中，都是常听得着的，然则资产阶级利用基督教来驯伏工人人们的企图，不已根本失败了吗？但对内虽然失败，然而对外正很有作用：就是资本帝国主义发达以来，资本家政府早已利用教徒、牧师，为唯一侵略弱小民族的先锋队；因为弱小民族智识是最不开发的，生活是最摇动最困苦的，所以最容易被他们的宗教所引诱。

八 美国、基督教、中国

美国，人人都知道他是资本主义和基督教最发达最强盛的大国。他在帝国主义大战后的经济地位，真的执了世界的牛耳。现在世界只有债权而没有债务的，就只有美国。英国已是半债务国，在经济地位上已成为美国的半属国，其余更不待说了。他的资本不但胀破了门罗主义，而且已胀满了全世界。全世界除中国以外，这样雄大的资本主义再没有别的出路了。最近几十年以来，英法日在中国已有一定的势力范围，美国几乎插足不进，于是美国政府唯一的政策便是到中国来传教、办学堂、做慈善事业，以收买中国人的欢心。这种政策果然渐渐成功，中国人怨日英法日甚，而对美发生莫明其妙的“亲善”好感。于是美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实行动手的第一着便是组织新银行团，第二着就是国际共管（两年前的铁道共管说和这次华府会议的主题），第三着便是援助财阀与军阀来统一中国，建筑经济上完全

隶属美国的资本政治。由此我们就可知道美国基督教在中国的使命了。

九 结 论

由以上所说的看来，我们就可知道基督教与资本主义是狼狈相依的东西；唯一能征伏这两个阻碍人类进步的妖魔，就是科学的社会主义。最近几十年留美学生于不知不觉中，成为美国资本主义和基督教的走狗，跑回国来恬不知耻，传播这种铜臭血腥的迷信于莫明其妙的青年学子头脑中，竟敢公然在北京清华大学开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凡我误入迷途的青年，你们不当迅速悔悟，倒戈攻击这种无耻的世界资本主义的走狗大同盟吗？

（载《反基督运动》

署名：蔡和森）

孙中山病后 帝国主义与军阀之阴谋

(一九二五年二月七日)

中山在京病笃，而陈炯明又以进攻广州闻。据本报驻粤通信员电讯，陈炯明此次进攻的企图确实得有段祺瑞的资助，而日本东方通信社所故意传播之中山死耗，其作用便在摇乱人心，使陈炯明得迅速动员以推倒国民党之根据地。

帝国主义者和段祺瑞这种阴谋，固早已在吾人意料之中。当北京政变之初，陈炯明由附吴(佩孚)转而附段，东江战事暂时沉寂，说者谓在“孙段合作”之时，孙陈之战亦可暂时停止。然江西事件一来，方本仁、林虎公然围攻谭(延闳)军，段祺瑞对孙的假面具业已揭开一半，现在不过是乘人之危更进一步罢了。

一面拒绝中山主张把人民和国民党摒于善后会议之外，一面怂恿叛徒进攻广州政府，一面又有中山“病已绝望”的消息，北洋正统之段祺瑞踌躇满志，其喜可知！但国人须知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这种阴谋不仅是拆孙中山个人国民党一党的台，而且是要根本剿灭中国革命解放运动。国人若不愿永远为帝国主义的奴隶军阀的牺牲品，便应充分了解这种阴谋及于中国前途之危险——这种危险只有人民立刻起来保卫革命才能幸免！

广东工人们，农人们！我们工农阶级是中国革命运动的柱

石,在沙面罢工,商团事件以及最近广宁农民反抗大地主的争斗中,皆足证明我们工农是南方革命运动之唯一保卫者;现在帝国主义与北方军阀协同广东买办阶级和大地主怂恿他们的走狗陈炯明向广州进攻,为的是要根本剿灭中国的革命和我们工农的势力,我们现在更应无条件的帮助广州政府打倒这不知羞耻的叛贼陈炯明。我们须知广州政府虽然还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政府,尤其在军事行动时期不能充分保护工农利益,然而这块地方不仅是中国革命运动的老巢,而且是我们工农群众比较能于自由发展的唯一场所,我们只有把这帝国主义和北方军阀的走狗陈炯明打倒之后,才能使革命政府给我们以安宁,也只有把这大地主和洋行买办的代理人陈炯明打倒之后,才能使革命政府对于富有阶级少所顾忌而多保护一些我们工农的利益!

广州政府的当道们!你们须知在近年各种巨大事变中试验出来的工农群众是革命的真正保卫者,现在大敌临前,你们应完全信任工农,武装工农,不可专持那些纵横捭阖的纠纠者;我们工农群众始终忠于革命愿为革命而牺牲,但望你们今后勿再有如市选政策的错误,或过于迁就富有阶级的意志而忽视我们工农的利益!

(载《向导》第101期)

署名:和森)

段祺瑞的假和平主义与战争

(一九二五年二月十四日)

近日江浙人民方以淞沪撤兵，兵工厂移交总商会，和平指日可望，因此好似顿然忘记了奉直军阀第二次大屠杀的痛苦，对于段祺瑞裁使废厂永不驻兵的三道命令发生莫名其妙的感激与幻想，尤其是上海那些绅商领袖连日大忙特忙其欢迎事业，拜跪在什么军长部长将军的膝前！谁知军阀不怕欺煞你们，原来又是一场骗局，现在双方军队不但未尽撤退，而且从新动员布防，积极备战。这些军阀们钩心斗角时和时战的把戏真是弄得你们五花八门呀！其实这里面的原因并没有什么神秘：第一，与段祺瑞争霸长江地盘的张作霖及其贪如狼的张宗昌，决不会半途而废，任安福部维持孙传芳的计谋依然无悉；第二，浙孙、鄂萧是直系势力的最后残留，直系余孽必拼命保持以为将来卷土重来之计，故孙传芳备战的背后又盛传有吴佩孚、萧耀南、齐燮元的新结合。所以现在的江浙问题，外面是奉系与直系余孽之争，实际不啻是段张之争。

从第二次以至快要降临的第三次屠杀，不仅使江浙人民饱尝张作霖武力统一的味道，同时也饱尝段祺瑞假和平主义的味道。我现在敢再做一个预言：在段祺瑞的假和平主义之下，江浙的战祸还不止第三次呢！

岂特江浙如此，全国亦莫不然。现在广东陈炯明对于革命政府的反攻，不与段祺瑞的阴谋有关吗？河南憨胡之战，不与安福部牵制国民军来维持萧耀南地位的计划有关吗？假使陈憨这次不完全失败，以后广东河南的战事也要如江浙一样的无穷哩！

此外，段祺瑞的假和平主义里面还包含一种全国战祸最危险的种子。这种子是什么？便是他拒绝孙中山的主张和人民团体的要求之善后会议。这个包藏祸心的善后会议不仅不能解决时局给人民以和平，反而要从新巩固军阀专政，延长内乱，并使奉系与国民军系的战争迅速爆发！

全国人民要免除段祺瑞假和平主义之下的战祸，只有努力真正人民代表的国民会议之实现，收回政权于由这会议产生的国民政府。各省人民要免除段祺瑞假和平主义之下的战祸，只有自动的民选省长，驱逐或拒绝一切段政府任命的军阀。

江浙人民！你们现在快要受第三次的屠杀了，你们对于军阀的假和平主义还有什么幻想？你们前此若能乘机驱逐齐孙，自动的收回省政，何至有今日？你们现在应该觉悟了：还是待那些戴假面具的军阀给你们以和平呢，还是你们自己努力去实现和平？

（载《向导》第102期

署名：和森）

段祺瑞执政后 军阀与帝国主义的新攻势

(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一日)

受了十三年军阀专政的祸乱与八十多年外力压迫的中国人民，一直到曹吴（外国帝国主义之坚固的工具）垮台才发生更进一步的觉悟，主张由人民本身来解决时局，换过说，即由国民会议对外废除一切不平等的条约，对内废除军阀制度实现民主政治。

这种普遍的民众的政治觉悟不是偶然发生的，实具有很长期的痛苦的历史。这种觉悟在袁世凯时代和安福专政时代还不会发生，因为那时候一般人民对于军阀还迷信得很，以为他们有权有势可以治理中国。然而这种迷信的动摇，与历年军阀政治的崩溃同其速度。由袁世凯到曹吴，也就是北洋派的命运由神奇而到腐臭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的末期，人民若乘机起来努力奋斗，在客观上是有废除军阀制度、实现民主政治之相当的可能。

然而这种可能的新变化和民众政治本能之觉醒，于外国帝国主义及其所扶植的军阀都有致命的危险。他们用什么方法渡过这危险，使中国军阀政治又由腐臭而至于神奇呢？段祺瑞包办的善后会议以及不久将由这会议产生的所谓国民会议，便是

这种作用的法宝。

有人以为军阀知道用会议方法解决时局，是军阀向民主政治的进步，由此未尝不可渐渐达到民主政治。现在少数政治思想落后的商人贵族，大学教授和新闻记者对于善后会议多少抱了这种幻想；段祺瑞和隐在他背后发踪指使的帝国主义者，更努力借这种会议方法及少数政治思想落后的上层阶级以扩张这种幻想于各阶级的人民。自然，方在根本觉悟要废除不平等条约与军阀制度的最大多数平民若渐渐传染或接受了这种幻想，岂不是段祺瑞和帝国主义的大成功，岂不是军阀政治与段祺瑞的本身又要由腐臭而变为神奇？

然而这是客观的事实所不容许的。客观事实告诉我们，段祺瑞欺骗人民的会议方法不是趋向民主政治，而是从新趋向巩固军阀政治，并且企图以光棍军阀的资格来挽回军阀政治的末运而使其复达于北洋正统的极顶。因为他是一个光棍军阀，又值民众政治势力之觉醒，所以不得不抛弃从前武力统一的主张而戴一副和平统一的假面具；因为他要以光棍军阀的资格与张作霖冯玉祥两个势力派竞争，所以更不得不利用假和平主义来做明争暗斗的武器。惟其如此，所以段祺瑞将成为北洋派最后而且最反动最狡狴的狄克推多，他那“外崇国信”的卖国事业和搆煽操纵的内乱行为，将来必十倍于从前的安福时代。如现在江浙之战、广东之战、胡憨之战及将来张冯之战，其操纵搆煽的机括全握于这个徐世昌第二的光棍军阀手里，他的立脚点也就完全凭立在以上各势力派间的冲突与操纵上面。

现在他御用的善后会议开了二十多天，试问议决了什么要案，解决了什么时局的纠纷？

全国人民迫切要求解决的要案有二：一是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一是废除军阀制度，把政权归还人民。因为这两件事情是时局纠纷的根源，必须这两个根本问题有所决定，一切战祸的消灭，民政的设施，军队的裁减，财政的整理，实业的振兴……，才能实际进行。

自命以善后会议解决时局纠纷的段祺瑞已经把这两个根本问题提出而有所决定吗？不会的，决不会的。他所以独断独行拒绝孙中山的主张和人民团体之要求而包办这善后会议的缘故，便是要挡住或打消这两个根本问题，而从新巩固那开始动摇的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之特权和历年崩溃将近灭亡的北洋军阀之命运。

二月以前，民众废约运动的怒潮和孙中山宣言之反响，不啻是八十年以来隐痛吞声的中国民族对于外国帝国主义之大反叛，不啻是接着土耳其阿富汗和波斯胜利对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以致命的打击，当此之时在全中国以及全世界的帝国主义者是何等的恐慌何等的狂叫呵！当时他们恐慌错乱的程度已经到了这步田地，便是逼得他们不得不向中国寻找让步的方法。日本帝国主义呢，极力拉笼孙中山，并极力给段祺瑞计划些假和平主义假民治主义的方案；美国帝国主义呢，慌慌张张打发舒尔曼回中国宣布美国无侵掠中国之野心，并极愿实践华会增加关税撤消治外法权等议案，使中国人得自己管理其国家。这些纵然是帝国主义假仁假义的手段，然亦确是逼于中国民族觉醒之威胁不得不思有所让步而和缓中国人民的愤怒。所以此时中国的国际情形，帝国主义列强颇有由进攻而至退让的趋势。

然而自“外崇国信”的段祺瑞就职与善后会议的计划成功之

后，中国开始变动的国际情形忽又回复旧观，——当然中山病笃，及上层阶级政治觉悟的落后与叛逆也不无多少影响。现在帝国主义列强又日看日的复向中国人民取攻势了：金佛郎案的承认呀，参战借款的整理呀，无线电台的独霸与均沾呀，已日迫日紧。这个卖国不眨眼的安福首领什么做不出呢？只要日本再找他五百万（从前参战借款尚有五百万未付清，段即被吴佩孚打倒了），法国给他一千五百万（本月十四日新闻报专电：法使以前昨两年海关扣存法意比庚子赔款折合华币约一千五百万元存储汇丰，大不满意，故要求先付纸佛郎，但财部需款，拟全数提用作为借款，期以二年，正在磋商），什么也可做出。据近日京沪各报消息，存在参议院秘书厅的参战借款档案已全部被人窃去，这是什么一回事？他胆敢公然的尝试国人，说参战借款和金佛郎案都交善后会议解决，这又是什么一回事啊！

不用说，段祺瑞卖国的胆子素来比曹吴还更大，金佛郎案、参战借款案……都是曹吴所不敢承认的，而段祺瑞一定胆敢用种种欺骗人民的方式来承认。曹吴虽然是帝国主义驯服的工具，然而尚敢公然违背帝国主义的意旨与苏俄恢复邦交。段祺瑞怎样呢？他在废约运动的高潮中，公然宣布不赞同孙中山的主张，认中山主张为过激，以此讨好东交民巷的英美帝国主义者，使其与日本一致承认其僭称的临时政府；外交团飭令中国遵守条约的通牒显然是“外崇国信”的宣言招来的，金佛郎案等也显然是这个可耻的卖国的宣言招来的。因此外国帝国主义者顿然改变战略，从新进攻：于金佛郎等案以外，现在又公然通牒干涉中国的路政，以为共管中国铁路之第一声；实行要求扩张上海租界；最近日本帝国主义者以武力和外交的压迫政策来干涉上海日本

纱厂纯经济性质的罢工，尤足以代表帝国主义向中国人民从新进攻的特性。

段祺瑞执政还没有三个月，他卖国辱民的行为快要超过曹锟时代之总和。他用包办善后会议的方法压低了废约运动国民会议运动的潮流，挽回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危机，并给帝国主义以从新侵掠中国的动因与保障。我们现在试看他对于人民注意的另一根本问题——废除军阀制度是怎样？他改督理为督办的愚民手段，维持萧耀南齐燮元孙传芳的阴谋，我现在都不赘说，只问他在善后会议怎样提出或解决这个时局纠纷的根本问题。当然，他要欺骗人民，系住一般上层阶级的幻想，他不得不冠冕堂皇提出所谓整理军政案来敷衍门面，但在提案说明之时，便即声请会议保留此案而不容有所议决。十九日北京电：“今日下午二时，善后会议第二次开会，到百十九人。首议段祺瑞提出之整理军政案，段亲自出席说明意见四项：（一）现各省收税若干，（二）政费若干，（三）军费若干，（四）各省除政费外，能养兵若干，今人心厌乱，善后会议首议此案，即表示应先整理军政等语。段退席后，林长民发言，谓本案仅一表格，无从讨论，应付审查；汤漪谓本案无具体办法，应保留，主席报告政府代表吴光新对本案有意见陈述，吴出席谓政府希望全国兵额不得过五十万，因无各省兵额调查故政府未定办法。刘传绶谓本案非提案人声请保留，本会不能保留，吴光新因代表政府请保留。”这不完全是一出欺骗人民的喜剧吗？

有人以为段氏善后会议的把戏完全要失败，因为他一点时局的纠纷也不能解决，一个军政的重要问题也不能决议。殊不知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包办善后会议的本意，绝不是真正要来解

决时局纠纷，议决什么废督裁兵理财等重要问题，主要作用只在一面借此来欺骗人民，阻止人民自动的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军阀制度的改革运动，一面借此产生安福国会式的御用国民会议，选举他做正式总统。

他这样的目的，现在显然摆在我们面前：由他钦定的国民会议条例现在已经发表了。他限制国民会议的职权只在议宪法，同时剥夺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人农人（因有教育程度的限制）与妇女的选举权。

善后会议既不能而且不应议决什么，然则他何以只准国民会议议宪法而不准其对于军政等重要问题有最终的决定呢？这是不难知道，因为他若准许国民会议对于时局纠纷的根本问题有最终议决权，他便不啻完全抛弃了包办善后会议的主要目的：挡住和阴消人民废约废督的改革运动。这个安福大盗，不仅是窃了国，而且连人民的国民会议也被他窃了！

人民解决国是的会议方法既被大盗窃了去利用，然则人民便消极的反对，听其为恶自毙吗？不应该如此，绝对不应该如此。这个大盗自行晋京称执政已是垂毙的军阀再向人民进攻之第一步，敢于包办善后会议已是第二步，敢于制造安福式的国民会议条例已经是第三步了。人民若再不起来反抗，他的第四步第五步……便要飞速的进行，不至完全从新巩固军阀专制的战乱局面和外国帝国主义奴隶全中国人民不止。

曹吴时代，人民的努力还不充分，现在反对段祺瑞祸国的工作，至少也应加十倍。同时我们须知段祺瑞盗国的命运也决不会比曹锟更长，我们只要现在能努力不懈的贯彻废约废督的改革运动，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人民的，切不要因段祺瑞盗

了我们人民的会议方法，我们对于国民会议运动便采消极不理的态度。一切觉悟的半觉悟的中下阶级各层民众与其团体，现在对于段氏钦定的国民会议条例应有联合的动作，至少也要使段祺瑞复建安福国会的阴谋不得完全实现。这种动作也就是人民防堵军阀与帝国主义之新攻势的起点！

段祺瑞包办的善后会议业已证明不能解决什么，一切时局纠纷的根本问题应归真正的国民会议来决定。段祺瑞僭称的临时政府业已证明为增加内乱外患的源泉，一切政权应当归还于人民。只有这样的要求成为普通的群众的行动，才能贯彻废约废督的目的，才能真正免除军阀的暴政与战祸，外国帝国主义的进攻与压迫！

（载《向导》第103期

署名：和森）

河南战争的祸首——段祺瑞

(一九二五年三月七日)

报载河南战事爆发，段祺瑞大发其雷霆曰：“谁先启衅则免谁职”。因此有人以为胡憨开战是弃髦了执政府前此的休战电，使段祺瑞没有面子，他如何不恼？又有人以为这是他所揭橥的和平主义不能成功之又一表征，他如何不急？这两种看法都错了，都是被他掩耳盗铃的幻术蒙混了，实际此次河南战事的祸首既不是胡景翼也不是憨玉琨，却是段祺瑞的本身。

何言乎是段祺瑞的本身？这并不是本报一家之私言，凡稍知北京政情之内幕者类能言之。今请先看二月二十三日申报的北京通信：“段在豫事未告紧急以前，因欲扶植与胡景翼足以对峙之势力于河南，故拟一任胡憨之自行处置；及豫事紧急，颇悔前此放任之非，乃一面劝胡景翼将所部之留陕者，悉数开回河南，一面则请憨玉琨率所部回陕填防，冀能和平了结。然结果胡景翼虽同意，而憨玉琨则不同意。同时回教将军马良，极欲于晋陕新甘一带，得一足资发展之大地，又献计于段，请姑听鹬蚌之相持，俟一方确占优势，再行定局：胡若占胜着，则下令将助憨之陕西刘镇华免职，调杨增新督陕，而以新疆为本系经营西北之发祥地，若占胜着者为憨，则调刘镇华为豫督，命憨玉琨为省长，以陕西为本系控制西南及西北之锁钥。因之段遂决计仍听其自

然，俟时机成熟，再定办法。”

“欲扶植与胡景翼足以对峙之势力于河南”，这不是河南战事的种子么？切实说一句，这个光棍军阀不仅做了消极的两头蛇，不仅是一个持放任政策的渔翁，而且是河南战事之积极的经营者：胡胜则免刘调杨，而以新疆为安福系经营西北之发祥地；憨胜则调刘督豫，而以陕西为安福系控制西南及西北之锁钥，——无论谁胜谁败，横竖于他有利，他还有什么恼，什么急呢？但是在人民眼前，少不得要装个又恼又急的幌子，庶几利上加利，实至名归。

吾人早已在读者之前，揭破了这个光棍军阀的假和平主义。他是要以假和平主义复兴安福系的势力。打开假和平主义的外封，试看他内里藏着什么？不用说是一些战争的种子与阴谋；江浙之战呵、胡憨之战呵，不过是这些种子中的两颗爆发者。希望这个徐世昌第二的光棍军阀来解决时局纠纷、停止军阀争斗，真不啻痴人说梦。他的本身便是时局纠纷、军阀争斗的酵母呵，他看见张作霖的势力不是他所能驾驭的，于是尽先维持直系余孽齐、孙、萧的地位，他看见冯玉祥的势力于他始终不利，给冯西北地盘（这是用以牵制奉张的）之后，同时嗾使阎锡山刘镇华等进行晋陕甘三省联盟的把戏，现在刘憨发难不过是这种把戏的开演。他外面上号召所谓和平统一，骨子里乃欲维持或制造三种以上的抵抗势力，使其互相争斗互相牵制，而自收巧取豪夺操纵捭阖之利。所以若任段祺瑞临时执政的命运永远延长下去，便是军阀争斗的乱局永远延长下去呵！

（载《向导》第105期

署名：和森）

江苏人民怎样解除 军阀的宰割与战祸？

(一九二五年三月七日)

卢永祥地盘早已不稳，近日看见张宗昌的企图快要成为事实，于是大慷其慨，通电废督请自苏始，其主要目的便在所谓国军调驻国防地点，换过说便是要请张宗昌率领几万奉军离开苏境或专驻徐州而不攘夺他的地盘。这样一面甚投苏人之所好，一面又可做废名不废实的江苏王，如他前此在浙之所为一般，岂不否去泰来，名利双全？

然则江苏人民怎样应付呢？反对张作霖的爪牙张宗昌，反对几万奉军驻扎苏境，这都是很应该很必要的。但若只知做做卢永祥的应声虫，结果只有卢永祥去名不去实的苏王成功，苏人的自治希望决不会成功。

可怜的江苏商绅们，此时一定又是想依草附木，借着拥护卢永祥的政策，去弄假成真。其实，这又错了。设使卢永祥的政策成功，江苏人有什么好处：——可以免掉战祸么？可以免除军阀的统治么？不会的，绝不会的，从前的浙江便是榜样。

所以江苏人现在应付时局的办法，只有如本报屡次之所主张，迅速团结各阶级的民众，驱逐一切安福系、奉系、直系的军阀官僚，民选省长、县长以至市长。只有这个解除军阀统治与战

祸的出路。

段祺瑞没有实力拿住全国政权，故涛张为幻，揭橥假和平主义以骗人民；卢永祥无实力拿住江苏政权，故涛张为幻，请废督以维持其地位。这都是军阀的弱点与衰颓之表征；人民正可乘瑕抵隙，起来奋斗呵！

（载《向导》第105期

署名：和森）

广东反革命势力的覆灭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四日)

陈炯明反革命势力的覆灭，现在已到了我们眼前：潮汕的克复业已证实，剩下的只惠州一个孤城了。

这次陈炯明反攻广州的罪恶举动，于中国前途和革命运动是个严重的危机。本报在一〇一期里面曾指明这是中山病后帝国主义与军阀乘机打倒中国解放运动之阴谋，本报并号召全国人民——特别是广东工农群众，立刻起来保卫革命。

我们这种号召，现在更证明不是徒然的。打败陈炯明的意义，第一是帝国主义与北方军阀在中国南部失去一个强有力的爪牙，其重要不减于吴佩孚在中国北部之失败；第二这次革命军的胜利间接给帝国主义和北方军阀（段张）一种打击，不啻是向他们表示中国革命运动愈有生气，愈不可侮。

何言乎愈有生气，愈不可侮？据本报所得确实消息，这次打败陈军的要素有二：一是国民党新在黄浦军官学校训练出来的党军，报纸上通称学生军，外国帝国主义者目为“赤军”；一是东江农民纷起袭击陈炯明，帮助国民党。几年打不破的陈军，今日所以大破而特破之者，完全因为国民革命的阵线里参加了工农阶级的新势力。

昨日有个新从广东来的友人对我说：“这次战事，滇军可说

没有参加；许军虽然出力，然并不是决胜的要素；真正的生力军还是学生军，洪兆麟的军队看见学生军的旗帜便逃走；然而没有东江农民的起事，也不会这样大胜，陈军之所以大溃而特溃，便因农民纷起扰乱他的后方。”

东江农民何以这样帮助国民党来打陈炯明？因为陈炯明是大地主的工具，是他们可恨的压迫者，他们的农会曾一一被海陆丰军阀打得粉碎。学生军何以这样能战斗？因为他们多属工农子弟，有觉悟的贫苦学生，他们所受外力和军阀的压迫比任何阶级要严重，所以革命战斗的精神格外坚决，加之又受了很正确的革命的政治教育。所以前此在广州政府下的各军多少引起群众的反感，而学生军却到处受群众热烈的欢迎，因为他不仅是革命党的武力，而且成为保护革命群众之利益的工具。

所以这次东江战争的意义，不仅打倒了一个恶劣的帝国主义和北方军阀的爪牙，不仅挽回了革命运动的危机，而且开辟了一个革命军事行动的新纪元，使国民党和广州政府今后得逐渐离开雇佣军阀的旧关系而确立于真正的革命的武力之上。

我们希望负责的领袖们在这军事行动时期中须同时注意民政政策。关于军费的负担，尤须确定一种政策加之于反革命的大地主和买办阶级之上；贫苦的工农群众和小商人皆不宜再加税捐。这样才能发展革命的势力，巩固革命的胜利！

（载《向导》第106期

署名：和森）

孙中山逝世与国民革命

(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

(一)国民革命不会随孙中山之死而消灭么？

自上年一月，孙中山先生从新改组中国国民党，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广州，发表著名的政纲和宣言之后，中国革命运动显然跃进一个伟大的新时期，震动全世界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者之耳目。于是不久便有各帝国主义大批军舰压迫广州政府接收关余之举；又不久即发生买办阶级武装起事之变；再则中山先生宣言北上，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召集国民会议。这些非常的事变非常的举动使革命形势浩浩荡荡急转直下，骇得全世界帝国主义者及其附属物魂消魄散，飞短流长，狂叫其“赤祸”“反共产”，以为抵制之术。全国被压迫的民众方望在此伟大的革命领袖指导之下解放出来，谁知中山先生竟在这个紧急的奋斗关头一病不起！

孙中山逝世后中国革命运动将怎样？这是现在一般人极注意，极怀疑的问题。帝国主义与军阀自来就把中国的革命运动看成为孙中山一个人掀起的乱子，现在他们自然要向自己安慰并向中国人民暗示说：“孙中山死了，中国革命也就完了”；张作霖老早宣言孙中山如果不讳，中国统一上便去了一个主要的障

碍。就是那些认时势为英雄所造的人们，于中山先生之死一定也会抱“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观念。

我们要了解孙中山死后国民革命将怎样，须先了解孙中山死后中国的客观情形是怎样。中国的革命运动不是孙中山个人的理想造出来的，乃是外国帝国主义侵掠中国的形势逼出来的。孙中山虽然成就一些自己的理想和主义来号召并指导中国的革命，但他那些理想和主义都是客观情形的反映。我们试看孙文学说第八章的自传，从他倾覆清庭创建民国的动机（决于中法战败之年），运动洪门会党的方法，以至三民主义之形成，那一点不是斟酌当时中国的情形和国际的背景决定的？

孙中山之死，在革命的主观条件上，诚然是一个严重的损失，因为丧亡了一个具有伟大权威的唯一领袖。但若中国革命的客观情形依然存在，则中国革命运动也要依然存在，而决不会随着中山个人之死亡而死亡。假设革命的客观情形不再存在，质言之即外国帝国主义不再侵掠，中国军阀不再祸国不再战争，那末，就是中山不死，中国的革命运动也会完全停止，何况中山死了呢？然而我们要设想帝国主义不再侵掠，军阀不再祸国，只有先假设帝国主义与军阀完全不存在了才有想象之可能。试问中山死后帝国主义与军阀已经不存在了么？帝国主义与军阀依然存在，中国的革命运动也便依然存在，帝国主义与军阀压迫中国人民的事实依然进行，国民革命运动也便依然进行。所以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生死不是由孙中山个人的生死来决定的，乃是由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生死来决定的，抽象的说便是由客观情形来决定的。只有打倒了帝国主义与军阀，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才会终止。

(二) 孙中山死后中国一般的情形怎样？

现在我们可以审查中山死后中国的一般情形：

第一、帝国主义与最近的国际形势。自一九一五年日本帝国主义强迫中国承认二十一条以至欧战告终，中国完全由日本势力统治着。欧战停后，美国帝国主义力谋打破日本在中国的优势，然而美国在凡尔赛和会中的企图毕竟没有成功，因为当时英法等还要倚赖日本为西伯利亚出兵干涉苏俄的主干。美国帝国主义只得另出一计，组织新银行团，谋以财政资本来减低日本在华的特殊地位，口头上是“和平的”谋调剂日美的冲突，但这个计划又遭日本帝国主义的打击。一九二〇年英美银行家代表纳门德(Lamont)来华，他的目的说是要建立一个国际的新银行团来开发中国的富源；可是日本政府对于纳门德激烈的反对，日本资产阶级的报纸公然向中国人民表示这是美国财政资本企图管理中国的危险，若新银行团借款与中国必以租税为担保，他将有权增高租税，横征各种间接税等。新银行团计划失败之后，美国帝国主义只好主张中国门户开放，而以“保障”中国的主权自任，结果由他召集一个华盛顿会议。一九二二年的华盛顿条约，的确削弱了日本在华的势力，解散了英日同盟而使日本孤立；但美国的目的还只达到一部分，所得的不过是形式上的胜利。要由这形式的胜利进于实际的胜利，只有破坏日本在华所维持的势力，换过说，即创造一个听华盛顿与伦敦而不听东京指挥的北京政府。所以华盛顿会议后不到几个月，就发生直（英美势力）奉（日本势力）战争。结果，英美势力得了胜利而成功曹吴的政权；

但日本势力并没完全破产。这种形势恰好合于日美当时的势力关系。

等到上年日本受了地震的大损害，美国帝国主义要乘机结果他在中国的势力，于是便教齐燮元吴佩孚发难，而爆发这次直与反直之战争。在战争初起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者何等的恐怖，何等的惊惶呵！英美帝国主义者则不然，他们在英字报上公然要求这次的战争要彻底拚个你死我活，不要半途妥协仍然弄成不生不死的局面，以后又“徒苦外人”。但这次战争的胜利不属于自分必胜的先攻者之英美，而反属于忧惶不宁的防御者之日本，这是因为日本政府秘密的外交手腕之成功。日本虽然成功，但英美在华所扶植的势力也没完全推倒；日本自忖这次的胜利已经超乎他的能力之外，所以很小心的不敢任张作霖摇动长江上下游的英国势力范围。这样的形势，也恰好合于今日日美的势力关系。

现在的北京政府又是由日本势力支配着；英国慑于中国人民的废约运动不得不向日本谋妥协，日本也就设法拉拢英国而谋美国之孤立。恰好此时英国保守党推翻向美国资本投降的工党政府而上台，于是美国以道威斯计划隶属欧洲的野心受一打击，而自华盛顿会议与伦敦会议（上年八月）后的英美协调局面又呈破裂。最显著的事实：第一、在对德问题中素来异常冲突的英法近来反互相接近，协调的违反伦敦会议的决议不肯撤退柯罗尼的英法驻军，直接打击德国工业之复兴，间接便是打击美国的道威斯计划；第二、英国保守党政府实行在新加坡建筑军港（这是工党政府宣告停止的）并极力扩张军备，其扩张的速度已令美国赶他不上，这于美国是一个异常的恐怖，换过说，即美国

恐怖的程度还要超过于日本，因为英国至今还未决定他对于日美战争（即第二次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的态度——站在美国这边呢，还是站在日本那边；第三、最近鸦片会议中英美激烈的冲突，美国帝国主义者公然戴一副“人道”的假面具无情的暴露英国的罪恶，以博中国人民之好感。英美的冲突愈厉害，日本帝国主义愈得用小心巧妙的政策企图巩固这次在华的胜利。

曹吴倒后，孙中山领导的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国民会议运动勃兴，各帝国主义对于这种运动的恐怖，骨子里虽然是一样的，而表面的态度却不一样。日本帝国主义呢，表面上反假装接近孙中山并相当的表同情于这种运动，——一面借此高唱亚洲民族的团结以打击美国；一面借此吓起英国与他接近，他不妨悄悄的告诉英国说“这种运动的发展虽然可怕，但你不要忘记现在北京的政权是在我安福派之手，你若有需要我之处，我相信你英国在华的利益不是没有保障的”。当然，“贤明的”英国帝国主义者那里看不到日本现在在华的有效地位。然而这就未免太恼了美国。美国帝国主义者在日本胜利后曾企图过两次的对抗政策：第一是所谓对华的道威斯计划，但这个消息一出，日本全国报纸动员攻击，其激烈不减于从前之反对新银行团和纳门德；第二便是美国帝国主义也扬言将赞成中国用和平方法以达到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运动，并将执行华盛顿会议条约（参看本报九十七期与百〇三期）。他这种政策的作用不外也是一面对付日本并欺骗中国人民，一面威胁英国与他结纳，他不妨悄悄的对英国说“你须知我美国在华并没有象你那样的地位与顾虑，你若不向我让些儿步或复与日本接近，那末我不难赞成中国撕破一切条约”。这对中国说，自是欺人的，而在他们外交之间的确能收纵横捭阖

之效。

这样一来，大家鬼扯脚，弄个不痛快，只有各自努力扩张军备，以图武力解决。我们再看近来每一天的国际消息，太平洋的大战不已是明明白白摆在我们的眼前么？然而他们虽是紧张的准备大战，他们却不是在此武力解决之前暂时停止对华的侵掠，反而是要加紧对华的侵掠，因为各自加紧侵掠之所得，即为保证将来战胜之前提。比方日本现在若能尽可能的扩张并巩固其在华势力，则日本对太平洋战争的准备自然要格外准备得充分；美国，英国，法国，亦莫不如此。在现在中国的局势之下，列强对华加紧的侵掠是可能的么？这完全是可能的，因为现在中国的局势虽然是日本势力的胜利，而英美所扶植的势力并未完全推翻，日本不敢并且不能完全推翻，所以只顾自己尽可能的侵掠，同时也让人家（美英法等）尽可能的去侵掠，——这就是现在列强加紧向中国人民进攻和安福政府“外崇国信”的外交政策之背景。在这种背景之下，必然迫使中国人猛烈的进行国民革命，也只有国民革命是他死中求生的唯一出路。所以现在中国的国际情形完全是战争的与革命的，即一方面帝国主义加紧侵掠，加紧冲突，以至于爆发第二次的世界大战；另一方面中国人民普遍的觉醒，普遍的倾向革命以图推倒帝国主义的压迫。谁说中国革命运动会随孙中山之死而停止？

第二、军阀与最近的国内形势。最近的国内形势是由最近的国际形势决定的。曹吴虽倒而直系余孽依然存在，冯张两派对峙于北，西南联治派不仅存在而且“跳梁”，段派一面与冯张冲突，一面又维持直系余孽以操纵于冯张之间。所以曹吴倒后，中国军阀成为五派对峙之局。这样的局势，一面是军阀愈加崩溃，

愈加无力，愈近灭亡的反映，一面又是军阀愈加反动，愈加冲突，愈加战争。他们绝不因为愈加崩溃愈加无力而对于人民的要求有所让步，对于国家的利益有所保障，他们反因此愈加压迫人民，愈加求媚于帝国主义，愈加掀起他们从新恢复军阀的盛势之野心以及增剧他们的内乱行为。主宰现在时局的段张两派军阀便是这种罪恶行为的祸首。亲日派政府就职三个月以来的卖国行为内乱行为，已经超过曹吴时代之总和，记者在本报百〇三期里面已详细说过，现在可不再赘。人民努力民治的实现，段张则努力恢复军阀的专政，人民要求国民会议解决时局，废除不平等条约，段张则从新宣布遵守一切国际条约，阻止真正的国民会议之实现。中华民国的根本约法被他废弃，而一切压迫人民自由的恶法（如治安警察法，出版条例，惩治盗匪条例等）不仅未随着废弃反而要增订什么治安维持法，共产取缔法。总括一句，现在人民的不自由被压迫被牺牲被战祸的种种痛苦比曹吴时代只有增加而未减少，并且还是方兴未艾，不知段张引导时局到怎样黑暗怎样恐怖的地步。在这样情形之下，人民必然要觉悟到只有革命是死中求活的唯一出路。所以现在的国内情形比曹吴时代还更混乱更反动，换过一面说也就是比曹吴时代还要更革命。谁敢说在这样的客观的革命情形之下，中国革命运动会受孙中山逝世的影响而停止呢？

第三、革命势力的觉醒。中国人民最近几年的政治生活完全为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运动支持着。革命势力的觉醒一天扩大一天，革命宣传的感受一天深入一天。犹忆二年前本报初掲載国际帝国主义侵掠中国之理论与事实时，北京大学教授胡适之目为海外奇谈，现在这种海外奇谈竟成为普遍全中国的政治

常识。几年以前，孙中山和国民党还为全国智识阶级所不谅解；但自从孙中山决心改造国民党和这党的全国大会宣言政纲发表后，你看全国觉悟的智识分子何等的欢迎，何等的景从。现在全中国的民众都欢迎国民革命的理论指导，假若没有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的严重压制，假若言论集会结社能自由，几百万几千万的大群众立刻即会集中在国民革命的旗帜之下。我们又看香港海员唐山矿工和京汉路工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争斗何等猛烈，广东工人群众反对沙面苛例和反对买办阶级反革命的商团事件何等激昂，最近上海四万多纱厂工人反抗日本资本帝国主义和东江农民帮助革命军打败陈炯明的意义何等重大。而最近几月普遍全国的国民会议与废约运动尤为全国民众觉醒之铁证。试问在这样情形之下，国民革命运动会随着孙中山而消灭么？

（三）孙中山死后国民革命的方针怎样？

由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确实的信念：即孙中山死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决不至于停止或消灭；只有完全推倒了帝国主义与军阀，这种运动才会停止或消灭。这种信念不是主观的，而是客观的和科学的。现在我们更须在积极方面讨论孙中山死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方针应怎样？要讨论这个问题，须先了解中国革命运动的特性。中国国民革命的特性是一面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一面打倒为其工具的中国军阀。这种特性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是由中国的国际情形决定的。所以中国的革命也如现在的土耳其、波斯、印度、埃及及其他一切殖民地的

革命运动一样，是世界革命运动的一部分。要中国革命成功，必须与世界革命运动即西方无产阶级的革命相联合，因为两者的敌人是共同的，两者的目的同是推翻资本帝国主义。然则孙中山死后国民革命的方针应怎样呢？中山先生的遗嘱说得很对：“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是谁？唯一的只有工农共和国的苏俄，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之所以不及他的本身而成功，这是毫无足怪的，因为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以前，全世界都是由资本帝国主义的列强统治着，中国革命运动在全世界资本主义压迫之下怎会成功？这正如从前土耳其革命运动之不能成功一样，一直到十月革命胜利，与苏俄联络之后，土耳其革命才有现在的成功。所以中国革命虽不及孙中山之本身而成功，但孙中山积四十年的经验确已获得成功之途径。中山弥留之际遗留这种长期奋斗的经验与他的后身——国民党和人民，全国被压迫的人民当承继中山这种宝贵的遗产以完成中国的革命。当然他的意义不是教人民只去联合苏俄，坐待各国无产阶级的帮助，中国革命便可不劳而获，而是郑重指明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之一部分，联合苏俄及世界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成功的重要条件。此外如人民的奋斗、革命党的组织、适当的政策及战略等，当然皆为革命成功之必不可缺的主观条件。中国革命至今未成功，这种主观条件的缺乏当然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我相信中山死后这种条件必一天一天的具足，而中山遗留的经验也将成为四万万人的经验，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必然的。

(四) 孙中山死后目前具体的政治奋斗

由以上种种推论，我们知道孙中山死后中国国民革命必然不会停止，并且必然会要成功。但我们人民单是理解这种必然的趋势与理论还是不够，我们必须在积极方面承继中山的遗志，不停的进行目前具体的政治奋斗。目前具体的政治奋斗是什么？便是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的条约，并且这也是中山的遗嘱诏示我们的。国民会议和废约运动虽然被国贼段祺瑞阻止了，愚弄了，但我们须知这是救国救民的唯一方法；段祺瑞盗政乱国三个月之后，更证明这是唯一救国救民的方法。国人们，“段张”是目前更恶劣的“曹吴”呀！我们若任他们继续的乱下去，今日一仗明日一仗的打，今日千五百万金佛郎案明日千五百万新公债的花，今日摧残民权明日封闭报馆的反动，我们人民的生命自由以及国家的独立主权不仅将来没有担保，现在即已一天一天的被摧残被送掉。只有真正人民代表的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是人民和国家的真实担保。我们人民努力求得这种担保决不是“过激”，只有阻止这种担保的帝国主义与军阀才真是“过激”。现在段祺瑞御用的善后会议已毫无结果的停会了，并快要闭会了，我们要问他解决了什么？他既一事不能解决，而且愈益增加战乱和纠纷，我们人民便应通通站起来向他说一句话：“请你不要再阻挠我们的国民会议！”还有两件事情也是我们人民目前要起来奋斗的工作：一件是保障革命的根据地；一件是保障一切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这次广东革命胜利的意义是很大的，本报上期已经说过，但革命根据地现在还没有巩固。

林虎唐继尧等军阀还是在那里夹攻，而段祺瑞秘密的勾结和公开任命督办省长的把戏正在积极进行。我们须知这次广东的胜利和河南胡军（接近民党的势力）的胜利，在客观上，于中国革命的形势是很有益的。所以广东这个革命根据地我们人民非出力维持不可；也只有工农学生各阶级的维持，陈、林、唐、段的反革命势力与阴谋才能完全扫荡。复次，现今那更为恶劣的“曹吴”，在革命领袖孙中山死后，必然有大反动降临，我们人民若不自己起来保障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不仅国民会议不能实现，我们人民只有束手以待那黑暗恶魔之牺牲与屠杀。

全国被压迫的人民！“孙中山”是中国民族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的标帜！你们现在只有努力“实现真正的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保障革命根据地”，“保障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才真是向孙中山的敌人表示孙中山之不死呵！

（载《向导》第 107 期

署名：和森）

金佛郎案与国民党

(一九二五年四月五日)

孙中山死了，段祺瑞可以无顾忌的卖国了。这是我们早已料得到的。

当孙中山初抵天津时，许世英以执政府答复外交团尊重条约的复文征求中山同意，中山拍案怒曰：“如果这个卖国媚外的复牒发出去，我马上晋京声讨段祺瑞。”段祺瑞慌了，左右献计，一面以东交民巷空气不佳为词阻中山晋京，一面在复牒上加希望列强实行华府会议条约一节，哀求中山不加反对。可见中山在日，段祺瑞无论怎样勇于卖国，却不得不提心吊胆有所顾忌。

现在呢，中山去世不满二旬，而金佛郎案公然决定签字解决。正在这个卖国大案的关头，日本东方通信社忽宣传国民党决定全体回粤。

距今不久，国民党不曾正式宣言反对金佛郎案么？国民党这个反对宣言是在中山垂死期中发出的，我想现在决不因中山之丧而停止他的反对。

我们只听见孙行轅治丧事务所宣告结束，并未听见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决定全体出京，所以我们对于日本通信社的宣传不敢相信。但是日本通信社这种宣传一定有作用，至少也是卖国不眨眼的段祺瑞急于需要反对金佛郎案的国民党无奋斗无抵抗

的退出北京，庶几他能安然自在的去卖国。

然则在反面看来，我们便可知道：假若国民党还留在北京，至低限度也要使卖国的人不能安然自在。在这一点上，我们敢断言全国人民都是希望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中山的后身——留在北京奋斗的。

我们固然知道段祺瑞早已准备严厉对付中山的后身，我们固然知道段祺瑞又已收买冯自由派捣乱政治委员会使他在北京不能有所作为；但我们更应知道全国新丧领袖的人民实指望中山的后身一刻不停的承继中山北上的志愿去奋斗，——奋斗到山穷与水尽。

现在或还未到山穷水尽人事终了的时期。不仅金佛郎案一发千钧，便是中山垂死时闻之色喜的全国国民促成会代表大会也还没有开完；真正的国民会议，人民还是希望中山的后身有以促成；段政府虚伪的国民会议，人民还是希望中山的后身领导他去应付；段政府治丝益纷的时局纠纷，人民也还希望中山的后身不冷火气地即谋真正的解决。

现在安福政府有三计：国民党自行离开北京为上计，收买叛徒捣乱为中计，高压撵走为下计。所以国民党此时不仅不应离开北京，而且应在民众之前公然阻止临时政府祸国卖国的行为。

现在全国的人民都起来哀悼中山，这决不是一种感情的现象，乃是一种政治的现象。这种现象一面是表现人民的要求，一面是表现中山的权威。在这种现象之中，在北京的政治委员会必须以最善的努力成就中山之政治的遗嘱，决不要悄悄的退出了北京。即使退出是终不可免的，也须是战斗的退出，才不违中山北上奋斗之精神。

同时全国哀思中山的民众，也应把你们的哀思发而为普通的具体的政治行动：立刻起来反对临时政府一切卖国祸国的勾当，要求真正国民会议之实现，拥护中国国民党在全国——尤其北方之奋斗！

（载《向导》第109期

署名：和森）

安福政府对于舆论的摧残

(一九二五年四月五日)

安福政府压迫舆论的举动，近日更变本加厉的进行起来了。旬日之间，封禁北京《民国日报》，控告《世界日报》，逮捕某通信社记者，检查新闻电报，没收现在评论，……大有秦始皇焚书坑儒之概。

有人以为这是段祺瑞摧残民意的开始。可是在这个开始之前，还有本报和其他十九种刊物被段政府通令查禁的事实。

本报老早就警告国人：现在的段张时代将比曹吴时代更野蛮更反动。如今果不其然？

本报是民众政治生活的寒暑表。人们只要测验帝国主义与军阀所加于本报的压迫是怎样，便可推知全国舆论界和民众的命运将怎样。这句话决不是记者夸张的，乃是历年不爽的经验。就最近的事实说，人们只要回想本报如何屡被上海租界的帝国主义者之压迫，便可知道因登载乐志华案与日本纱厂罢工案而被洋大人严重压迫的上海各大报，——他们的不幸命运决不是意外的。这次北京新闻界的灾难亦然，识者早已于本报之被查禁而知其有今日了。

当本报被安福政府查禁时，全国报纸噤若寒蝉，好似与他们无关一样。可是本报的读众感觉异常敏锐，他们看见他们的寒

暑表感受的气压忽然不同，他们都纷纷投函本报表示其愤怒与拥护言论自由之热情，本报接到此类投函前后有百余封之多，限于篇幅未能发表。

现在安福政府对于北京舆论界的压迫，真是行所无事，不遇抵抗；上海租界里面的帝国主义者每次拘询各报记者简直如审盗问贼一般，全国舆论也熟视无睹，一声不响。本报敢预言他们的压迫还会要普遍的严重的施行呵！

（载《向导》第109期

署名：和森）

卖国备战的金佛郎案

(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二日)

安福政府勾结帝国主义进行金佛郎案，大家都知道此案有三大害处：(一)直接损失国库七千余万；(二)意比各国一定援例要挟；(三)关税会议不仅不因法国方面之解决而速开，将反因意比之要挟而愈延期。这三大害处是显而易见的。

现在恶耗传来，于上述三大害处之外，他的主要用途还是为奉张筹战费。此案朝解决，奉张与国民军之大战夕就要爆发。

本报早已警告国人在段祺瑞假和平主义的幌子之下，他所散布之战祸种子与阴谋是如何的可怕。现在河南战事刚了，而猛烈的冯张全国战行复将随金佛郎案之解决而俱来。可见此案不仅是未来政潮之所伏，而且是全国人民生命安危之所系。倘若人民对于此案，不加制止，便无异是欢迎全国的大屠杀之再临！

呜呼！卖国备战的金佛郎案已威胁着全国人民的生命与安宁，还不立刻起来反抗，尚待几时呵？！

(载《向导》第110期)

署名：和森)

冯自由派反革命运动的解剖

(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九日)

——国民党淘汰反革命分子之必要

自中山北上及其逝世后，冯自由派在北京所做之种种反革命罪恶行为，本报北京通信记者曾屡举以告国人。最近上海《民国日报》广州电：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严整党律，监察委员会亦已议复，决除冯自由、马素、江伟藩等党籍。本月十三日上海市全体党员追悼大会时，党众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此举，全场热烈的表示满意；有一人欲起而为马素辩护，马素二字还未说完即被众殴走。可见冯自由派罪恶贯盈早已不容于众，中央执行委员会此举可谓大快人心。顾冯自由派之反动并非始于今日，当中山决定改组国民党时，彼辈即起而反对，一直闹到如今，反革命的毒气随着革命潮流之高涨而散布全国。这决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也决不是一部分“老党员”知识落伍的问题，乃是民族运动中阶级争斗的问题。这个问题关系民族运动的生死。现在我们不妨把冯自由派一年以来反革命运动的真相，从半资产阶级和半封建社会的外翳中解剖出来。

(一)反革命势力的渊源

中国民族革命运动是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侵掠之下，从封建制度转变到资本制度的过渡期中发生出来的。自外国资本在广东设立洋行商馆以来，中国资本主义即以商馆洋行的经纪做媒介，渐渐发展于封建社会的基础之上。这种资本主义是国际资本主义的私生子，所以他的形态极不完全。质言之，国际资本主义不任中国发生自己的工业资本，不过由经纪买办们私生一种高利借贷和商业的资本罢了。由此，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在中国还未发生革命运动之前，即形成了一个反革命的买办阶级。

别一方面，封建社会的上层阶级与封建社会的下层阶级，他们之间的利害是互相冲突的。农民群众不堪外国帝国主义的掠夺，自然而然激成过排外的大暴动（如义和团之役）；而贵族、官僚、军阀和大地主却早已与民众分离而成为帝国主义的工具。

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既在中国产生一个反革命的私生子（买办阶级），又在中国抓住了封建的上层阶级（贵族、军阀、大地主）做工具，所以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异常迂回异常困难。

(二)中山主义的社会基础

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运动发源于海外的留学生与华侨之中，这是人人知道的。这种海外的革命运动，他的社会基础是什么呢？当然还是离不了半封建半资产阶级的对象。所谓留学生大半是大地主和贵族子弟，所谓侨商与内地的买办阶级也脱离

不了关系。他们何以要革命呢？只是因为他们比较在内地的人们多尝了一点大开胃口的资本主义和有利于富有阶级的“民主政治”之味道；他们羡慕外国资产阶级之富强，他们眼红外国资本家大地主之大规模的榨取劳动群众的利益；他们习见外国资本民主政治之新式统治方法比较旧的更有效力，更有利于特权阶级，所以他们也踊跃的起来赞助中山，附和革命。他们参加革命的倾向，开始便不知不觉的投合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而企图夺取国家政权做他们自己阶级的武器，抬高他们的特权，扩张他们的国民经济基础。

以上两种分子，形成国民党改组前支配中国革命运动方针的上层势力。

但中山主义并不完全建立在以上两种势力上面，因为他承继郑成功洪秀全等的遗传，洞悉下流社会劳动群众的革命势力，所以他最初便自觉的把他的革命运动凭立在洪门会匪之上。所谓洪门会匪便是被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压溃的劳苦群众。这些劳苦群众为什么赞助中山参加革命呢？他们参加革命的倾向，亦自始即不知不觉为这样一种愿望所驱使：想得借革命以推翻压迫他们的上层势力，把他们从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阶级的掠夺中解放出来，而改变一切旧社会的关系——尤其是经济关系。由此，中山于民族民权之外，又形成了他的民生主义，以为引导劳苦群众参加革命的理想，——这种理想当然不是共产主义。所以中山的三民主义完全是中国落后的社会关系之反映。

但中山的三民主义在他的党员中自来即不行运。中山常说从他革命的党员自来只知采取他民族主义中推翻满清之一点，至于民权民生完全置之脑后。这是什么原因呢？没有别的，乃

是他们自觉或不自觉的阶级本能之表现。因为他们怀抱的目的多半不是什么民权，但是自己阶级的特权；更不是什么民生，但是自己要获得与欧美“先进”的企业家同样的经济地位。所以中山的党徒自始至终只有极少数人相信他的三民主义，而是为着自己的一民主义去革命。

(三) 老党员之叛逆与改组

辛亥革命后，政权仍操于满清遗孽之手。于是这些从中山革命的先生们和侨商们一天一天的失望，一天一天的不愿继续革命，并且一天一天的叛逆而趋于反革命（当然不是全体，但是大多数）。为甚么这样子呢？因为他们觉得由革命的方法已不能达到他们自己升官发财的一民主义，所以只有趋于叛逆与反革命之一途。袁世凯当权即有投降者，至段曹当权而投降者更一年一年的递增，和平的叛逆日趋日盛，不久遂酿成陈炯明武装的叛逆。

陈炯明的叛逆，是国民党“老党员”反革命之最明显的模型。他的叛逆决不是因为个人间不和的问题（如外传与胡展堂不和等），实含有重大的社会阶级的意义，因为他的反革命的经济来源和社会基础完全建立在一部分从前赞助中山革命的南洋华侨资产阶级与广东买办阶级大地主上面。

这位伟大的天才的革命领袖孙中山，他在陈炯明叛变之后，一天一天的深悟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私生子——买办阶级、侨商、大地主及其代表人物之所谓“老党员”再也不能革命并且再也不愿革命了；他公然宣言华侨以前是革命的，现在是反革命

的；他深悟只有把这个被那些先生们叛逆而且行将弄死的革命运动变成工农群众的运动，并与苏俄领导的世界革命携手并进，中国革命前途才有希望。于是毅然决定改组中国国民党。一面将他抽象的三民主义弄实在起来，——变成为民众要求的具体政纲，以发动广大的工农群众参加革命；一面结合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而与其领袖苏俄缔成反帝国主义的同盟。至此，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有伟大的意义，而且在世界历史上也有伟大的意义。他的毕生事业亦至此才大放光明，受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欢呼，与中国千百万工农群众及一切进步分子的热诚拥戴。

（四）改组后反革命的内容

国民党改组，工农阶级随着他的先锋共产主义者参加国民革命，于是中国革命运动的社会基础突起变化。具体化的新政策新方针显然向反抗帝国主义和不利于其附属物——买办阶级、大地主之方向进行，升官发财的狗洞亦不免为新政纲所堵塞。新政纲甚至规定：只有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才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这样一来，便激起欲效忠于帝国主义而保持其买办阶级大地主的特权之冯自由派的反革命运动。

我们只看冯自由派的大本营设在香港——买办阶级的中心（香港《大光报》为其机关报）便可理解他们行为的性质了。其实一年以来冯自由派反革命的行为并没有什么奇怪。他们现在反革

命的欲求和他们从前附和革命的欲求，原来是一个东西：他们始终是要投合于资本帝国主义，升官发财，以扩大自己阶级的特权；革命不革命，不过是达到这种目的之手段。新政纲不仅违反他们这种目的，而且根本打破他们这种目的，他们如何不反革命呢？

他们反革命的内容：第一反共产反苏俄；第二开除共产派；第三反对罢工，破坏工人阶级的组织；第四各派老民党大团结。第一个口号是全世界资产阶级诏示他们的幻术，想以此鼓动无知识的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恐怖，起来打破西方共产革命与东方民族革命的联合战线，减少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危机。第二个口号一面是反对中国工农阶级最自觉的先锋（因为劳苦群众前此虽然也参加了革命运动，但无知无识，一听富有阶级分子利用践踏，现在他们有极自觉的先锋领导他们一面为民族革命的共同利益奋斗，同时又为其本阶级的特殊利益而奋斗，然则那欲保持富有阶级特权的冯自由派如何不要求开除共产派？），一面是要国民党撕破实现群众要求的具体化的新政纲，退回于从前抽象空洞的地位，以便利他们效忠于帝国主义。第三是他们一面要破坏国民革命的新主力军，一面要破坏工人阶级本身的势力，使其对于中外掠夺者不能发生抵抗。第四更是他们要根本毁灭革命，把国民党这块招牌完全交给帝国主义的工具陈炯明、唐继尧、唐绍仪、陈廉伯等去做卖国罔民的勾当。

（五）阶级争斗与肃清内部之必要

国民党自始即是多阶级的党，所以自始即包含阶级利益的

冲突。阶级的分化，随着革命潮流而促进；所以革命的潮流愈高，阶级争斗亦愈甚。民族运动中阶级争斗是必不可免的，所以党内革命与反革命之争亦必不可免。从另一方面说，革命派对于这种争斗若是不让步，不妥协，则这种争斗不仅不为革命之害，反而是革命进行的推动力。

若谓多阶级的党应容纳反革命派同时并存，这将是一种极不幸的历史的误会。国民党纵然自始即是多阶级的党，但从今以后决不应容纳帝国主义的走狗，反革命的买办阶级和大地主的代理人依然留在党内拆坏革命的墙脚。我们应高声说：凡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的买办阶级封建阶级的分子没有留在国民党的权利。

国民党改组后，国民革命运动已进到了相当的高度，同时冯自由派的反革命也进到了相当的高度。中山在日，所谓猛虎在山，当然还镇压得下来。现在没有中山了，若还容纳反革命派于党内，则中山毕生奋斗之事业与其晚年振作之伟绩，势非尽毁于彼辈之手不止。所以为忠实承继中山主义、巩固党的统一及完成国民革命计，只有肃清内部淘汰一切反革命分子是惟一的前提和担保。

没有中山了，我们十二分的希望国民党统一，但必须是不违背中山主义的统一。怎样才是不违背中山主义的统一？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才是不违背中山主义的统一！

（载《向导》第111期

署名：和森）

今年五一之中国政治状况 与工农阶级的责任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六日)

今年五一的中国政局，我们工农群众人人都可感到一种与往年不同的状况：一面是国民革命潮流之高涨；别面是北方赶走了吴佩孚南方赶走了陈炯明。这都是英美帝国主义最强固的工具，我们工农阶级最可怕的死敌；而且我们北方的铁路工友和广东的工农群众都亲自参加打倒这两个恶魔，这是我们今日可引以自慰的。

可是曹吴虽倒，而代之以起的段张又在北方企图从新巩固军阀专政的局面；英美帝国主义在华势力亦未因曹吴失势而有所动摇，而日本帝国主义在此新安福时代又完全恢复了旧安福时代的盛势；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运动被卖国媚外的安福政府阻止了，真正的国民会议也被段祺瑞破坏了，所以全国几万万劳苦平民依然处在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铁蹄蹂躏底下。

自“二七”大屠杀的祸首曹吴倒了之后，我们被压了两年的劳动运动渐渐复苏。这固然由于政局的转变，但决不是帝国主义与军阀对于我们的压迫有所轻减，不过由于各帝国主义各军阀之间加紧的互相冲突，我们才有此复苏之可能。然而这种可能现在还是很有限的。由京汉路总工会恢复后的现状和上海日

本纱厂大罢工及数月中其他各处罢工的结果观之，便可显明最近劳动运动复苏之性质——还是守势而不是攻势。这种状况恰好是曹吴倒后另一反动的军阀政局还未全臻巩固之反映。

事实告诉我们：若无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压力，我们工农阶级不仅可以成功全国坚固的经济组织（工会），而且将是政治斗争中最伟大的势力。帝国主义军阀知其然，所以自来即极力压迫，不使我们无产阶级有集会结社的自由。现在我们又要起来了，他们将怎样？上海纱厂罢工时，日本报纸已公开的说“曾被吴佩孚解散之工会均渐复活，而其运动之急进大有一日千里之势，故英美法日等国对于此种现象多怀恐怖之念”。

他们既然这样的恐怖，他们对于我们的第二次攻势自然正在准备着呀！同时国际的劳资阵势，还是资本继续向各国无产阶级进攻；资产阶级左派所自诩的和平民治时代业已终止，凶恶的法西斯蒂和军事的狄克推多正在西方一切资产阶级国家中横行。在这种反动的国际形势之下的中国，现在又由最反动的军阀段张宰制着，我们未来的艰难是可想得到的。

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与军阀高压之下，中国劳动运动发生一种特性，即凡经济的运动都要变成政治的事变。自海员罢工，京汉罢工，上海日本纱厂罢工以及衡山、（前年）花县、广宁的农潮莫不如此。这种事实一面足以说明经济争斗与政治争斗的关连，一面足以说明中国工人阶级参加国民革命之必要。中国是国际资本主义的殖民地，殖民地工人阶级天然的负有两重责任：一面应为民族独立的共同利益奋斗、同时应为本阶级的特殊利益奋斗。怎样才能完成这种重大的责任？第一要有明白的阶级意识，第二要有独立的经济组织和政治组织。

我们若以“只问面包不问政治”的态度拒绝参加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那末不仅是一种错误，而且是一种罪恶，因为如此将使中国无产阶级永远屈服于帝国主义之下，而延误自己解放的前途。但若没有明白的阶级觉悟，沈溺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幻术之中，而为什么“全民革命”“阶级协调”的口号所欺骗，其危险亦将不减于过河拆桥，徒供资产阶级的利用。土耳其资产阶级胜利后立即解散工会，捕杀共产党便是榜样。

资产阶级参加民族革命的倾向与无产阶级参加民族革命的倾向是完全不同的。无产阶级是要求彻底解除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经济羁轭政治羁轭的；资产阶级只要帝国主义肯把其特权让一部分给他们，他们老早就准备与帝国主义妥协了。

然而民族革命之客观的趋势，终于要超过资产阶级民主制的范围，因为他的最后胜利是与世界资本帝国主义不两立的。所以在民族革命运动的开始，资产阶级分子和智识阶级都踊跃的来站在这种运动的领导地位；但一俟劳动群众自觉的参加运动时，这些先生们便都会离开从前的立场去谋反革命。这便是我们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者加入国民党后，国民党右派起来反革命的原因（参看本报上期冯自由派反革命的解剖）；也就是今年五一我们工农阶级应当郑重温习的政治经验。

国民党改组一年以来，民族革命的潮流增高，同时反革命反工农的潮流也增高。一些智识阶级随着买办阶级地主阶级的口号，于未参加革命之前即行反革命反共产反工人反苏俄（如《醒狮周报》反动的国家主义者）；或跟着冯自由等涌入国民党，口头唤革命，实际干反革命的勾当。他们利用反共产的口号来抵制反帝国主义。这是甚么现象呢？这完全是“上流社会”帝国主义

的附属物欲永远奴隶我工农而保持其特权之表征。

由沙面罢工、商团事件、广宁农潮，以及一年来各种各色的反革命丑剧证明，只有工农阶级是忠于反帝国主义和民族革命的台柱子。从今以往，我们工农阶级惟有增强反帝国主义的争斗，才可领导中国民族达到真正的解放；亦惟有成功独立的阶级的组织，才更能增强反帝国主义的势力，而完成我们工农阶级历史的使命。然而帝国主义的附属物就是要极力破坏这一点。他们天天散布毁谤共产党的谣言，破坏工会农会的组织，打破罢工，收买工贼组织招牌工会和什么劳工反共产救国同盟会等。资产阶级越在东方越无力，同时亦越在东方越反动，越卑鄙龌龊，无恶不作。

但我们绝不要因此退缩丧气；我们更要勇敢奋斗。世界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兴起是历史进化的必然律。帝国主义若被我们打倒了，这般反革命的附属物至少也要跟着打倒一半。这个责任当然伟大而艰难；但决不应因为艰难而减轻我们自己的责任！

（载《向导》第112期

署名：和森）

今年五一之广东农民运动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六日)

广东农民运动是国民党改组后实行其新政纲之一部分的产物。广东农民运动不仅是全国农民运动的先导，而且最足以显明工农阶级参加国民革命的影响与特性。他的现状和经过想是一切关心中国革命之新动力与工农阶级发展的人们所愿意知道的。兹特将最近所得材料与消息缀成此文，以饷读者。

(一)省农民协会将于五一开成立大会

从去年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颁行农民协会章程及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派出特派员实地宣传之后，广东遂开始有了系统的农民运动。以前海丰虽然成立过大规模的农会，但总不免染着一种狭义的地方主义色彩，而且内部的组织不从基础上着想，只是一乡一乡的组织起来，故被陈炯明拘捕几个上部的办事人便冰消瓦解了。

在国民党和革命政府的扶助之下，广东农民运动理宜进行顺利。但事实上，地主劣绅常与国民党右派军人官僚勾结，极力暗中阻挠破坏，或明施攻击。在这一年中虽然发生过许多次的悲剧，农民运动受其打击不少，但只要国民党的新政策未完全被

右派推翻，广东农民运动仍然是一天一天发展的。

现在广东政府势力范围以内，已经有了农民协会组织者二十县。计：番禺，南海，顺德，香山，东莞，宝安，增城，惠阳，海丰，陆丰，惠来，鹤山，广宁，清远，高要，新会，花县，曲江，普宁，潮安等二十县。已经成立县协会者有广宁，花县，海丰，陆丰四县；在旬日内可成立县协会者至少有番禺，顺德，香山，东莞四县；其他各县均已有区协会成立。会员人数共十六万人。

照协会章程：有五个县协会成立，即可组织省农民协会。今既超过此数，而且事实上亦要求一指挥全省各县协会的统一机关；现时国民党农民部虽未行使省协会的职权，但是以一政党而与一经济的职业团体相混，终觉不大妥当，所以省农民协会的成立，当然事不宜迟。闻主其事者业已决定于五月一日正式召集省代表大会，成立省农民协会。其代表的选出法：先从乡起，每乡召集会员大会，选举出席区会代表，代表人数视该乡的会员多寡而损益之，大概乡会会员十人可选代表一人；各乡代表选出之后，即召集该区各乡之代表开代表会，互相推举若干人（大概每百人选一人）出席各区代表会议；该区代表选出后，更召集该县各区代表开一代表会，由这次会议选举若干人代表该县出席省农民协会成立大会。预计各县代表在百二十人以上。大会议程，闻为：（一）农民自卫军组织法案；（二）农村合作社新组织案；（三）农村教育宣传案；（四）民团问题；（五）土匪问题；（六）对于地方官吏及驻防军队之苛捐婪索取案；（七）修改协会章程。

省农民协会成立大会之日，亦即是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开幕之日，并闻青年军人联合会亦将于是时召集大会，而三个大会将协同举行一次兵工农联欢大会，——一面表示其阶级的带连

义气，一面表示其共同的政治要求。所以今年五一不仅在中国劳动运动史上放一异彩，而且将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放一异彩！

(二) 打倒陈炯明后的东江农民

此次革命军在东江的胜利，农民的帮助是一个重大的原因。本报前几期曾指明过了，此处不用赘述。陈逆走后东江农会复苏的情形（海丰农会一九二三年八月被陈炯明解散，捕去会员二十人，监禁半年；一九二四年三月农会领袖们被释出狱后又开复活大会，到会群众万余人，地主绅士和陈炯明大惊，旋遭第二次武力解散）怎样？本报昨接彭湃君来信，报告甚详。彭君是东江农民运动的领袖，他的来信说：

二月念七日我军入海丰，当时粤军先至县城占住陈炯明之将军府陆军学校。我（彭君自谓，以下仿此）从淡水一路至白云，所过乡民无不痛骂陈军之野蛮——奸淫，掳掠，放火。由白云入鹅埠赤石梅陇一带，农民欢迎我军异常热烈，或插青天白日旗或插农会旗，沿途并插，旗上都写标语；摆茶摆水，欢呼革命万岁者不绝于途。我抵海丰第二日即二十八日，各乡农民来问我，磋商农会进行事宜，及与我欢叙别后三年来受陈逆压迫之痛苦者约有七八千人。三月一日经陆丰惠阳惠来，是日有农民万余人到农会，使我应接不暇。三月三日开海丰全县农民欢迎党军大会，到会者三万余人。海丰城自陈军劫掠后已呈十室九空之状，是日城乡一带行人拥挤异常，各商店亦纷纷开始营业，骤呈盛状。在农旗蔽野欢声雷动之中，平山，加伦两同志及许总司令皆登台演说，农民鼓掌声如巨雷。尤以许总司令对农民声明将海

丰逆产全数之半归农会，十分之三归工会，十分之二归学生会，并主张取消苛税杂捐，农民更热烈的欢呼党军万岁。许总司令加伦同志出发时，数万农民携小旗沿途欢送。并由此大会发出快邮代电，农会亦于此日宣布恢复。在县代表大会未召集前，由旧时职员组织临时县执行委员会，行使会务。我一入海丰境，农民就向我表示要求减租取消苛捐及发给武装。以上三项，尤以武装之要求为最切。在欢迎大会时也有此种要求，经许总司令答应将所缴陈军枪械之中提出四十杆给农会。

陈军此次逃败，枪枝子弹散失各乡不少，多为农会会员所拾，亦有缴到农会来者。农会得此枪枝即成立农民自卫军。陈军溃时，枪械多藏匿于乡间各亲戚家，农民来报者日有数起，此种枪械若不收集诚为后患。当此镇压反革命之时，农民非有武装不成，而且农民协会之根本问题亦非农民有武装不成。所以农会现已决定扩充农民自卫军一百名，训练三个月，养成下级干部人才。同时并组织农民运动讲习所，约四五十人。

现在东江农会运动的发展当已不成问题。只是军队与农民的关系还发生问题。这个问题于党军教导团当然不会发生，因为教导团有铁的纪律并受了充分的政治教育，所以无处不为农民所欢迎。现在问题只在那些还未受政治教育与从新整饬纪律的军队。此次农民充革命军夫役向导侦探等职异常出力，但粤军对于农民夫役仍然不免残酷，凡到一地不肯放回，即放回亦每不给夫价，农民向前理论，每以刀刺之，有一农民手掌制伤长寸许，我带往见总部副官长，该官长只说待查办，夫价依然不给。本来农民向农会报名愿充党军挑夫为党服务者有五千余人，但粤军偏偏不找农会反要自己去拉夫才快意，真不知何故。又党军

来时曾向农民宣言不筹款不拉夫，并取消苛税杂捐等。现在款则筹了又筹，凡从前陈炯明所抽的捐项，除了烟捐禁止之外，其余杂捐亦依旧抽收。以故农民异常怀疑。

以上都是彭君来信中的话。彭君最后提出来的问题，我们认为很关重要的。任何陈林反攻，唐继尧侵桂的问题都没有这个问题的重要，因为革命政府若真获得农民群众的拥护，这些反革命势力是不难制胜的；苏俄便是用这种方法制胜了反革命的好榜样。当陈炯明第二次解散海丰农会时，曾对彭君兄弟说：“群众我是很怕的，尤其是农民，我从前在广西时几乎被乡民赶出来，兵力虽足以战胜桂军，而没法镇压农民，他们出没神秘莫测。”（见本报七十期关于海丰农民运的一封信）。这回陈炯明的命运果然又结果于农民之手，可见革命若得劳苦群众的拥护，抵抗敌人一定不必单靠军事势力来决定。现在问题不在农民帮不帮助革命，而在革命政府本身的财政政策与军队之改造或取缔。这是陈炯明倒后国民党与广东政府急须有所决定的。我们屡次主张而且现在更主张国民党政府应立即将军事行动的负担由小民移于反革命的大地主买办阶级肩上，并仿照黄埔教导团的方法，改造许汝为部下的粤军及其他愿意继续革命的军队。

（三）广东农民之概况

广东是外国资本主义最先侵入的地方，所以农业经济亦最先破产，失业农民远在几十年以前即一群一群的向海外寻生活，流落于美洲澳洲及南洋群岛为华工。别一方面，地主贵族一天一天的买办阶级化，近代式的外国资本主义不仅未打破中国封建

社会的一切束缚，反而极力加以维持，借以镇压那含有平英团、义和团之可能性的几万万农民群众；因此封建社会的旧势力、旧思想、旧习惯在广东社会及海外各属的华侨中特别保持着，（帝国主义早已替中国保存国粹，已不待国故大家、东方文化大家和反动的国家主义者费心了！）直到如今比内地各处都还腐败都还可怕。所以广东农民一面受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特别大，一面受地主贵族的压迫亦特别严。

广东农民，大多数为佃农，其次为半自耕农及自耕农。现在他们所受的经济压迫之显然可见者，第一是田租，大多数五成以上归田主所得；第二是田亩捐，每亩由二毫至六毫，田主佃户各出一半，归民团所有，有时亦为商团所有；第三是军队苛捐，约占农产物价格百分之三四，或名目繁多，且征收不止一次，归驻防军所有，有时亦为土匪所有；第四是青苗债，每年青黄不接之际，农民向地主借钱还谷，大都借两元还一石谷，月息百分之三十至五十；第五临时借贷，农民需用工具肥料种子及吃用等，向地主临时借钱谷，月息由三分至五分；第六私当，农民意外急需时拿自己的东西向地主抵借，利息有以日计算者，农民呼之为“雷公劈”；第七公当，月息三分，赎期半年或一年；第八钱粮预征，政府因筹军费预征钱粮，地主亦有预收田租者。所以他们的经济压迫，概括的说约有四项：就是重租，苛捐，高利债和钱粮预征。

自资本帝国主义侵入以来，农民所受的政治压迫亦与日俱深。帝国主义者利用军阀官僚压迫农民，农民眼见得的就是地方官或军人保护传教师霸占田地山庄为教堂。官僚军阀劣绅互相勾结利用，包揽词讼，挑起农民私斗以敛钱；或借慈善事业

如修县志道路桥梁等来敛钱。田主勾结地方官或驻防军勒租索债；土豪下结土匪，上通官府，对农民敲诈勒索。

在连年军阀战争中，地主阶级利用农民武装自己；如民团乡团之组织，乡镇自治之要求及反对驻防军队等，都是地主们欲在乡村取得本阶级的政治地位之表现。现在地主阶级差不多全有武装，而且潜势力很大。及农会运动发生，地主知农民不易利用了，遂与国民党右派及军阀相勾结，成一地主与军阀之反革命的联合战线，向农民进攻。商团变乱之前后，一面买办阶级与地主阶级联合进行反革命，同时李福林任民团统率处督办，亦到处勾结乡团商团土豪劣绅等实行摧残农会。他们共同的宣传农会为共产党机关，以图反革命之复燃。幼稚的农民运动经不住这个进攻，遂发生踌躇不前或退后的现象。如花县顺德广宁香山东莞等处均有此种现象的表现，尤以花县和广宁更显著。

(四) 农会被摧残之一斑

本报近来搜集广东农会被摧残的事实，所得材料非常之多。现在专举上年十一月中的几个报告，以见农会被地主、劣绅、国民党右派军人摧残之一斑：

A 香山县

1. 小黄埔 小黄埔农民协会自成立以来，进行颇利，一般农民极感团结的必要，对于会务异常热心，但为当地之土豪劣绅所忌。十一月十三日下午，乘正副委员长不在，被劣绅陈思敬陈华翰纠合八人，各持枪械，直入农会，洗劫一空，将所有书籍行李什物尽数捣毁。声称奉香山县长林警魂命

令特派到来解散，若小黄埔有此农会，实属于地方治安大有妨碍。言毕即将孙总理肖像撕毁掷地，谓为怪物。

2. 北側乡 北側东侧农民协会，于十一月八日，突被驻扎容奇顾家祠之福军林响带同兵士百余人蜂拥入乡，将该农会旗帜及总理肖像撕毁，并拘去会员六名，所有会内衣服银两扫数抢去，会之近邻亦受抢，声言搜查乱党，后由省电话，始谓误会，释放会员，然已饱受蹂躏矣。

3. 大冈乡 于前星期为田主劣绅勾结商团围困农会，开枪扫射，击毙会员（农民）三名，捕去数名，捣毁一切而去。

4. 谷都乡 该地已成立一国民党分部，近为土豪恶霸捣毁。此次第二届农民运动讲习学生到该地组织农会，由县派游击队保护宣传，返县城时，中途为土豪劣绅纠党放枪截击，幸未伤人。

5. 小揽沙步乡 该地有组织农会之可能，值演戏机会，派人到地宣传，为地主乡痞凶殴。

B 广宁县

两个月以前政府委任蔡鹤平为广宁县长，但旧县长未允交代，新县长因乏实力拥护，无法入城接事，乃走至江屯与李济源勾结，希望李予以助力，李乃介绍土匪头邵佐助之攻县城。饷项不继，土匪又非钱不行，李与劣绅马月庭等主张抢掠，于是拿去该地农会名册，嘱各匪令其对已加入农会者可以抢杀夺牛。土匪依计而行，现起始在江屯附近江坑宾坡望墨斗塘一带劫牛，遭害者已逾十家。又以前广宁江屯一带保卫团抽收团费，每石四升，现在加扣至一斗或一斗三升不等，农民至感困难。因此二事，多数加入农会之农户

不明真相，以为未加入农会之前无此种种危害压迫，加入之后反受种种痛苦，乃怨及办农会之人，谓为多事。

C 东莞县

1. 宵边乡 被西路军谭启秀营在该地拉夫骚扰，并将该农会执行委员长蔡如平及会员蔡某掳去殴打，受重伤。

2. 怀德乡 十一月九日为该乡乡团正邓远昌副团正邓修国纠合团丁三十余人闯入农会，如狼似虎将总理肖像旗帜撕毁无存，拘去会员二人，淫刑毒打。

3. 涌头乡 被逼缴纳联团费，捕去数人，后得他乡农民援助，才将捕去数人夺回。

D 花县

花县县长谭声咏，勾结劣绅江耀中，联合民团土匪，设立田主维持会，仇陷诬枉农会及办事人。谭声咏未能到任以前即寓田主维持会中，尤属显然。至本月十四日谭声咏得民团（土匪变相）拥护，运动驻防军队成熟，得入县城，旧县长知势力已去，乃不待交替即离城去。是日以田主而兼土豪绅士之江耀中等即在平山开地主维持会大会，提议拘办办农会的人，肇事即在目前。

E 南海县

南浦乡 南浦农团军成立已逾一载，成立之后即为商乡团所嫉视，一般劣绅恶商更多方破坏。在商团未被击散前两月，即为佛山商团勾结乡团土匪，强入南浦，竭河而渔，损失已不赀，以其势力不能与较，忍气吞声而已。及第一二次商团罢市时，商团势力热可炙手，而佛山商团尤横戾，其嫉视南浦商团益甚。其时省城适有农民讲习所之设，旋改

为广东农民自卫军，南浦农团数十人与焉。及击败商团后，附上农民深感受愚，拟改编农民自卫军多处，遂先遣归，未及旬日，而滇军之事作。初南浦划为三区，各区设一分团，第三区分团乃假乡庙为地址；十五日前，忽有称官产处者数人，携同锹斧，指该庙为官产，硬欲拆卸，为该团所拒，乃不能逞而去；五六日后，遂有第三军胡思舜部（滇军）多名到该分团，将团内一切什物捣毁一空，拘去留守者多名，复按家搜索，缴去枪械十二杆；次日势更汹涌，强行拆毁该庙，鸣枪示威，严密布防，如临大敌，该乡男女老幼，惊惶奔逃，无处安身，虽经政府电饬滇军制止，仍置若罔闻。该农团在商团侧目时犹能幸免于难，今于商团败后正可从容扩增团结各乡一致进步之日，乃竟被摧残于政府军，亦奇事也。

F 番禺县

钟村乡 钟村特别农民协会，最近被该村商团掳去会员二人，囚禁于商会，以农会名义去保，置之不理。驻防福军袒护商会。

（五）广宁农潮之回顾

广宁县在广东之西北，人口约四十万，农民占百分之八十。农户中佃农占百分之六十，半自耕农百分之三十，自耕农百分之十。大地主甚多。占人口多数之佃农，其生活极苦，其向地主所佃之田，每年每亩亏本约在六元以上。其收支比较如下表：A 收入之部——在中等年况，每年每亩收获约十石，除纳七石五斗租谷于地主，所余仅二石五斗，以现时每石三元计算，佃农每年每

亩实得七元五角。B 支出之部——种子费每年每亩约三元五角，肥料费约三元二角，农具消耗约一元，工食约六元，共计十三元七角。收支两抵，亏本六元二角。此外每亩尚须缴纳什么乡保卫团费，巡田费，田土业佃保证费，乡联团费等等约二三元。至于父母妻子之抚养费教育费及其他生活必需之种种杂用尚不在上列支出之部。

该处农民向地主佃田，或用契约，或用口订，没有定规，因此地主往往得自由加租及收回耕地；而一般农民亦以地狭人多，互相争耕，如此，地主更得乘机操纵。当农民向地主订田时，地主每亩索取佃信银十元或二十元。地主下乡收租时又有所谓田信鸡一只、菜银数十文及雇工挑送费约每石课米一升。此外还可用加大的斗斛去量租。以上种种条件，佃农稍有欠缺，地主即告知该地保卫团局或警察派兵捕押，任意罚金。若值岁歉，地主更铁面无情，不能短欠升合。广宁农民运动之勃兴，初系广州油业工人回乡宣传活动之所致。上年五月间成立农会，加入者达万人。地主劣绅见将不利于己，乃以保卫团兵力捣毁农会殴伤职员而去。农会领袖，收拾残局继续奋斗，至十月间农会运动又形蓬勃，遂成立县农民协会，并组织农民自卫军，同时实行减租运动。于是东西南三区富豪与前捣毁农会之劣绅江汉英等见农会在各区集众公决减租：以六成归地主，三成归佃农，一成归农会，他们遂先发制人，于旧历十月十六日召集各区田主绅富会议，决定一致反抗，而以“乱世无王，强奴反主，大祸压眉，武力反抗”等口号相号召。一面飞函各处绅富协同反抗，一面标贴“不承认减租，从农会者自误”之长红告白，恐吓农民。当他们集会时，个个摩拳擦掌，大呼“有田主无农会，有农会必攻破”。他们议决收谷时

各人佩齐武装，不承认升合抽交农会；并悬赏格，如有临时勇敢帮打加入农会之佃农者，愿将所耕半造之租谷豁免，若被打死，恤安家费六百元，伤者包医全愈。试看潭乡各垌业主标贴之长红，到是很有趣的：“盖闻八政详于洪范，食货为尚，四计陈自幽风，耕稼最重；故佃人勤劳操作，资粒食以育家人，业主仰望西成，仰斗升以供国课，此田产所关特重也。近有无耻之徒，恒心顿丧；左抽右剥，常存燕食之心，结党合群，每肆鲸吞之计；有此流风日炽，甚于天灾之流行，弊窦潜生，惨于萑苻之洗劫。独不思凡噬人膏脂已非豪杰，夺人财产岂是英雄？且不视乎董卓糜膺恩相尚遭王允所诛，公瑾计取荆州何丧巴丘之地？大祇凡事付诸天命，岂诸人力之图谋。嗣后无论诸款抽捐租谷，各业主概不承认，各佃人切勿混交。倘有违抗，乃为自误，愿各佃共慎之！专此预闻。”同时业主积极准备武力进攻，决定潭垌先成乡团一百二十名，江屯狭溪于旧有五十名外再加五十名，东西南三区联防旧有三十名，添招九十名，并勾结李济源匪军四百名，共八百余人，决于旧历十月二十八日向农会各村总攻击。农会发出减租宣言，并严整纪律：（1）不得僭耕；（2）不得私自抗众背章完纳；（3）不得于应交田主成数额内有所短交，及各种流弊；（4）全体会员一律出身反抗田主无理压迫；（5）无论何村有事，各区农团一律会齐出发援助；（6）全体会员完全听县区乡执行委员会指挥；（7）如有违背纪律时，得由纪律裁判委员会从严裁判。地主既积极准备作战，农军亦出发自卫，因而农会声势甚张，各区未加入农会之农皆纷纷要求加入，即极巽懦者亦停纳租谷，不受田主催促，盼望农军胜利。

县长蔡鹤平，定于十二月一日召集农民开会解决减租问题，

届期农民代表赴县，而蔡宣布改期，不料地主江汉英江淮英等乘此不备，纠集土匪百余人袭击社冈农会，幸被农军击退。农民代表去质问蔡，蔡显然袒护地主。本来中立田主皆允照农会决定成数收租，惟少数恶地主挟其封建的“主人”权威决用武力剿灭农会，中立地主亦无如他们何。农会武力不够，乃电请国民党发兵援助，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派铁甲车队去援助。同时业主维持会一面派人携款往四会属茶等处广雇土匪，一面运动政府军第三师郑润琦部扑灭农会不久第三师果派两连兵士前来，地主们大宰猪牛，欢迎于保卫团局。地主们因此有恃无恐，百倍活动，乘机招兵买马，着着进行，并宣传第三师要扑灭农会，缴农军械，同时到乡收租，强勒十足，一粒不减。

然忠实援助农民的铁甲车队亦到了，农民勇气百倍，异常欢迎，开一农兵联欢大会于杜冈，每家农妇制“革命糍”为午点，糍上印革命二红字。妇女们在这次运动中尤其热心，每次每乡“聚福”会议时“婆姆”们出席参加者不少；四乡鸣锣出队，一般婆姆也很踊跃，在后方煮饭煮粥烧茶，或抬大炮上山，或运兵士食料于前方，因此把乡村的革命精神，提到顶点。

第三师虽被地主运动，只因铁甲车队与农民自卫军连战大捷，敌人望风溃走，不久农会方面即得到胜利的结果。据参加这次争斗者说，农民在此次经验中，对于国民党左右派已完全认清谁是他们的友，谁是他们的敌；此次地主的反革命恰好与商团事件相对照：江汉英是陈廉伯，江淮英是陈恭受；保卫团是商团；第三师是李福林；蔡县长是帮助反革命的右派。

以上是广宁农潮的一大幕；是地主阶级接着买办阶级而起的反革命。这两件历史的大事变，最足以显明工农阶级自觉的

参加国民革命后的影响与特性。

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反动与世界革命潮流的激进，不仅使西方各先进国阶级争斗达到极点，就是在落后的东方如中国亦已达到了这样的程度。难道是谁鼓吹的或谁可设法调和的？只不过是客观上事实上必然不可免的历程罢了。必须理解这个，才能理解广东农民运动之武装的形式；必须理解这个，才能理解工农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亦必须理解这个才能理解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之特性。

自从国民党改组大会发表其具体的政纲，与工农阶级自觉的参加革命以后，中国国民革命再也不是混沌的了。谁要更忠实于革命，谁便应更求明白帮助工农阶级发展的意义。只有这个是一切国民党分子决定其自己对于左右派之争应取如何态度的最好方法：你们或是站在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真正革命阶级（工农阶级）方面，或是站在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十以下的反革命阶级（买办阶级和地主）方面。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出路。

（载《向导》第 112 期

署名：和森）

何谓国民党左派？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日)

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党中有一种最好的现象就是党员群众之左倾。不仅广东如此，上海北京以及其他各处亦莫不然。他们左倾的程度，恰好与右派反革命和段政府招降纳叛破裂国民党的阴谋成正比例。

记者近日会见好几个从北方南方来的朋友，都对我说：现在国民党最大多数的青年党员不仅不愿为右派而且不愿为中派；但他们又怀疑——“我们既不是共产党怎好自列于左派呢？”

这可谓是一个误会。我敢郑重的申明一句：我们共产派不愿居（自然更不愿独占）国民党左派的美名，但愿一切革命的中山主义者成为国民党本身的左派；我们共产派是时时刻刻准备帮助国民党左派的，并且希望全体忠实的国民党员都是左派，成功无派别的整个的国民党，以完成中山主义和国民革命的伟大使命。

一个革命党若任许多反革命的派别同时并存，是决不能成功其革命使命的。俄国共产党之所以成功，便因为他是建立在整个的革命的政纲策略和纪律之上的无派别的革命党。他如何能成功个这样的党呢？因为他不停的和各种各色的反革命派决裂，严格的淘汰一切改良主义分子、投机主义分子以及妥协分

子；不仅不容许党内有右派，而且不容许党内有中派，所以才能成为整个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而成就其伟大的历史使命。

我们希望国民党“只是”左派的国民党么？可说是的，也可说不是的。因为我们希望国民党是整个的建立在中山革命主义上面而成功为无派别的党。但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实践两个先决条件：一是开除反革命的右派；一是全体忠实的党员之左倾。所以在目前这个时候，国民党最大多数党员之左倾是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的。

然而左派决不是一个念头或无条件可以做到的。左派的必要条件至少有四个：（一）彻底的反抗一切帝国主义及其附属物军阀，买办阶级……；（二）恪守中山先生引导中国民众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领袖苏俄携手的方针；（三）与一切反革命右派分子决绝；（四）遵行保护革命中坚势力的工农群众利益之政纲。这四点也就是中山主义最重要的内容。必须具备这四个条件才是真正的国民党左派——才是真正的中山主义的国民党员。

从北方来的朋友又对我说：“许多国民党青年党员不仅以右派为耻，而且听着中派这个名词亦很不高兴。他们现在觉得只有两途：不左即右，没有中立之余地。”群众心理是革命的寒暑表，国民党青年党员这种直觉是很正确的！一九一七年以来的西欧革命运动史早已证实了这种“不左即右”的真理：不仅各国社会党右派是革命的敌人，中派也是革命主要的障碍；结果中派与右派终归同趋于一个反革命的营垒。德国的中派（考茨基派——独立社会民主党，不久仍与右派爱倍尔的社会民主党合并）如此，法国的中派如此（朗格派以至佛洛沙派），其他各国的亦莫不如此。他们开始创立第二个半国际，自谓介于第三国际

与第二国际之间；不到两年，第二个半国际仍然复归于第二国际而与之合并，一切中派“英雄”完全破产。革命潮流愈高，“不左即右”的真理便要愈被证明。中国国民党自去年以来已从新入了这个试验时期；中山死后这个试验将愈加严重。所以我们不仅希望国民党一切青年分子之左化，而且希望一切中坚分子领袖人物之左化。

然则这种左化的意义，是同化于共产派么？不是的，绝不是的。只是真正的同化于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中山主义。中山主义与共产主义显然是两个不可混淆的标帜；不过共产主义者愿意帮助中山主义之实现。共产主义者既无赤化国民党的奢望，更无赤化国民党的妄想；假使不如此，我们便不成其为马克思列宁派了。所以我说，我还应再说：共产派不愿居国民党左派的美名，但愿一切革命的中山主义者成为国民党本身的左派；我们共产派是时时刻刻准备帮助国民党左派的，并且希望全体忠实的国民党员都是左派，成功无派别的整个的国民党，以完成中山主义和国民革命的伟大使命！

（载《向导》第 113 期

署名：和森）

五七纪念北京学生奋斗的意义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七日)

此次北京学生围攻安福政府教育总长章行严住宅事件，在中国革命史上有重大的意义：

第一，此次群众的示威举动不仅充实了五七纪念的内容，而且开始履行今年五七的新使命。这新使命是什么？简单的说，是反抗死灰复燃的亲日派军阀势力的复振。此次北京学生群众的举动，不知不觉是这种反抗的发端。所以决不可把此次事件，视为“学生的”事件，因为他含有重大的政治意味，实是全国被压迫民众将自发自动的起而打倒日本势力之象征。

第二，此次北京学生的举动不仅是章行严一人倒行逆施激起来的，乃是安福政府半年来种种卖国媚外和反动激起来的。我们只要回想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国民会议运动如何被段政府所破坏，金佛案如何解决，舆论如何被摧残，各种集会如何被解散等事实，我们便可了解此次北京学生群众的举动决不是偶然的。

第三，此次北京学生的举动不仅表现日本势力的不巩固，而且表现军阀统治的危机已再不能压伏觉醒的民众。帝国主义与安福政府要强迫民众退回到十四年以前的旧状况下去，所以极力企图巩固军阀统治，取消一切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之可能。因为学生自从五四以来多少成为自觉的政治要素，故安福政府

的教育总长章行严便通令禁止学生集会结社之自由。在这种严重的意义之下，自然而然给全国学生以反抗的强烈冲动。北京学生便是这种反抗之先行者。

北京学生的举动一定要影响于各种被压迫的人民。工农对于段政府之反抗自不消说；就是不甚觉醒之妇女，半年以来，亦已充分表示其对段祺瑞从新巩固军阀统治之厌恶。此后各种被迫的人民之不安与反抗，一定要使军阀政府应接不暇，狼狈失措。军士群众之继起，也将是必然而不可免的事情；段政府禁止军人入党的命令已是这种危机之先声。

我们试以北京学生事件和近来种种民众的表示来测验军阀统治的命运，究竟还有好长呢？我敢大声告诉一切被压迫的民众：军阀统治的末日已降临了，革命情形已成熟了。

怎说军阀的末日已降临，革命的情形已成熟？就是因为各种被压迫的民众再也不愿驯伏于军阀的统治之下，军阀的统治方法再也不能驯伏各种民众了。

各种被压迫的民众，你们希望军阀的灭亡更加迅速吗？那末只有你们纷纷起来，使军阀再也不能制驭你们！

（载《向导》第115期

署名：和森）

在国民党湖南省党部 欢迎会上的演讲词

(一九二七年四月一日)

此次回湘所见所闻，较三年以前之湖南不同，现在的湖南已注意到社会革命基础，这是各位同志努力所致。兄弟对于各位革命领袖，非常表示敬礼。现在革命发展，第一当注重的是农运问题；农运是整个革命根本问题。就历史言，中国历代政变，无不是由农民问题发生，如秦，如元，如明之灭亡，均是农民问题之影响。前清如太平天国，如义和团，均是农民运动之表现。谁能解决农民问题，谁即可以得天下。现在农民问题，较秦以来尤为重要。国民革命如不将此根本问题解决，证之历史，可断定不能成功。贵党中央执委会及湖南省政府省党部对于农民问题已经制定出许多政策，不过实行起来，在贵党及整个革命运动中将起分化，因右派分子、资产阶级、地主，惧怕农运，心存破坏，此时若恐分化，即停止农运进行，与右派妥协。相信左派的革命领袖决不牺牲农民利益，而与右派妥协；因妥协即无异宣布全部政治的死刑。第二当注重者，革命的社会基础；全民革命是一种理论，革命必于全社会中找到一个基础，对于各方，自不能面面俱到。现在革命的社会基础有两方面：（一）农民，（二）资产者，国民党保护资产者抑保护农民，这个路的分歧，关系革命的成败。孙

总理、廖仲恺、汪精卫各领袖均注重农运；右派分子如蒋介石辈注重资产阶级。农民阶级与资产阶级时有争斗，革命愈进展，斗争愈剧烈。贵党左派领袖，应当注意这革命基础。惟有占全国人民百分八十以上的农民是革命的中心军队。第三当注意同盟军；革命基础改建筑在农民上面，究以何种力量为同盟军队，此亦有二：一为资产阶级，一为工人阶级。右派代表资产阶级，左派应选择工人阶级；因工人方是真正的同盟军，资产阶级是压迫工农的，不能领导革命。第四注重者为革命武装问题；现在受国民政府指挥之军队在四十军以上，目下军事虽然胜利，但军队非完全的武装基础，因军事领袖随时有向后转之可能，彼可携带武装加入，也可携带武装遁逃，辛亥往事，可为殷鉴。根本问题在武装农民起来。武汉政治会议与湖南省政府省党部已筹备农民武装，希望中央委员会与湖南省党部在总理主张下充分使农民得到武装，革命基础方不致动摇。第五应注重的是革命中的经济问题；革命不仅使政治变化，且要使经济变化；不仅俄国社会革命须使经济变化，即民主政治亦须注重此问题。法国革命，除改革政治后，亦推翻大地主与没收反革命财产，民主革命方能成功。现在革命不仅在打倒军阀与土豪劣绅，起政治上之变化，经济方面，如第一点所说之农民问题，即土地问题，亦即吃饭问题，生活不能解决，革命断难成功。解决经济问题，即是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二十世纪为世界革命时期，即苏俄社会革命时期。我们的民生主义，当然不能采私人资本方法，这无须多说。又财政问题亦为革命根本问题之一，现在财政成为最普遍、最困难问题，财政问题不是仅言整理可以解决。广东财政整理后每月收入增至一千余万，不过开源节流洁除积弊之技术问题。财政为革命

基础，法国革命，国家没收僧侣及外人财产并收殷户捐与发公债，因此法国革命全国农民均踊跃参加，因财有来源，非取于苛捐杂税之故。此次中央会议及湖南新政纲虽有决定，尚属萌芽，希望全国领袖对于财政政策具体规定，不仅消极的清源节流，并须筹备大宗的收入，又不加重一般人民的负担，以为革命基础。又理论问题，亦当注重。左派分子认为中国革命或湖南已经成功，其实尚在开始时期，左派分子要达到三民主义，发展工农运动，右派即谓为破坏革命，不知农民要求减租，工人要求增加工资，是无办法中之办法。右派理论谓国民革命不是社会革命，是三民主义的革命；工农运动是共产党做的，非三民主义之所应做的。如此立论，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分而为二，以为要三民主义成功，即须打倒共产主义；打倒共产主义，即须破坏农工运动；不知要国民革命成功，须扶助农工，基础方能巩固。要扶助农工，即须与共产党合作。且三民主义之民生主义，其结果即是共产主义。如须包括资本主义，应为四民主义。如谓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不同，则须除去民生主义，应为二民主义。希望各同志拥护总理遗下三民主义，尤其是民生主义，以纠正右派理论。观于总理与列宁可以合作，可以断定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不仅现在即将来亦可合作。

（载《湖南民报》1927年4月2日

署名：蔡和森）

代表中国共产党 向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致词^①

(一九二七年五月十日)

党的第五次全国大会的精神,即在指出目前的革命潮流,并非低落,全国工人农民须在目前加紧争斗为创造本党的前途而奋斗,希望大会的团员同志,一致向此目标奋斗。

(载《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11日)

署名:蔡和森)

^① 此文为发言摘要。

代表中国共产党向 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的致词^①

(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九日)

中国工人自二七以来，工人革命的伟大的力量，已完全表现出来了。现在反动派如蒋介石、杨森、夏斗寅、许克祥都摆在我们眼前，他们无时不向我们进攻，今天到会的，在广东、湖南、湖北、江西、江苏等处代表，都没有不是被迫来的。由此可知反动派的凶狠。同志们，我们都说要打倒反动派，现在我们第四次代表大会开幕了，我们应该在这大会中，整理我们的队伍，作打倒他们的准备。此外还有一点，我们天天喊打倒蒋介石，其实我们要打倒他们资产阶级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我们要建设一个新的民生制的国家。

(载《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21日)

署名：蔡和森

① 此文为发言摘要。

国家统一与革命势力的联合

(一九二七年七月八日)

中国革命根本目标之一就是要求国家的统一。不仅工农有此要求，凡是受过十六年以来，分崩离析、武人割据、内乱频仍的一切人民莫不同此要求。

要求统一，打倒武人割据和内乱，拯救人民于水火，是本报数年以来的主张。此主张至第一期北伐胜利和占领上海时，几乎实现了三分之二。北伐的伟大胜利是军阀快被完全打倒，人民快被拯出水火，国家快要统一的表记。何以有这样可惊的成功呢？这不能不归功于孙中山先生联合一切革命势力的三大政策。

所以革命势力的联合便是国家统一的动力。要求国家统一必须先求革命势力联合。只有革命势力联合才能推翻军阀割据、内乱频仍的残局而拯出人民于水火。

凡是不愿意国家统一、人民解放的人们，他们必定首先反对或破坏革命势力的联合。从冯自由、戴季陶以至蒋介石便明证了这个真理。

北伐胜利的种子是孙中山在国民党改组大会树立三大政策时种下的。蒋介石要反革命，破坏北伐的胜利，阻碍国家的统一，以遂其军事专制的私图，故首先动摇三大政策，破坏革命势

力的联合。这种事实是每个革命分子都明白的，用不着我们多加说明。

蒋介石从动摇两党关系以至公开屠杀共产党人及工农群众，我们并不因此特别痛恨他，因为吴佩孚、张作霖、孙传芳辈对于我们及民众也是同样的残暴，我们对于蒋介石所痛恨的，便是他破坏了北伐的胜利，阻碍了人民的解放和国家的统一。

所以我们主张打倒蒋介石是为人民求解放，为国家求统一。要达到这个目的，首先要求维持与巩固革命势力的联合战线。

现在有唱所谓第三种主张者，主张“反共反蒋”。这种主张听说发源于李宗仁一辈军人。我们并不疑心这一派人与蒋个人没有利害的冲突而完全是替蒋另演一套戏，但是我们要明白的告诉一切革命家：所谓第三派的主张，在客观上不仅不是反蒋，而且是助蒋。这一派的主张至少在客观上是欺骗民众。

倒蒋的真正武器是什么？是由三民主义产生出来的三大政策，是革命势力的联合？试问：在未倒蒋之前，而先拆散或破坏革命势力的联合，这是倒蒋呢，还是降蒋？我想每个明白的人都能答复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希望每一个革命家都不要受所谓第三派主张的蒙蔽。

共产党人不是为自己的或阶级的利益不愿退出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而是为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统一，不能退出此战线。共产党与中国无产阶级若接受帝国主义张作霖以至蒋介石辈的威胁而退出此战线，结果便是放任帝国主义与军阀们永远宰割中国，任中国人民再过十六年纷乱宰割，水深火热的生活！所以共产党人为忠于民族解放与国家统一的利益起见，必须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张蒋之流）的这种威胁奋斗到底！

现在联合战线的问题不是国共两党的问题，乃是人民生死国家存亡的问题。此问题现在摆在全国人民的面前。每个人都应当想一想：假若联合战线被迫破裂，国民党回复到改组前的原况，一个一个的野心家，争权夺利继续混乱下去，……人民有生路吗？国家不会亡吗？

“亡国”问题现在重新提到国人前面来了：你们试看帝国主义毫无顾忌的出兵华北，这是什么现象？这是复活八国联军，武力瓜分中国的现象。

何以帝国主义在此时复活武力瓜分政策呢？有三个主要的原因：第一，蒋介石背叛革命，破裂了革命的联合战线；第二，旧军阀的统治根本破坏，（吴张等）而新军阀（蒋介石）的统治又没有巩固的希望，蒋的内部动摇与崩溃已成为公开的秘密；第三，工农革命势力并没有被蒋李等新军阀的枪炮根本消灭，“卷土重来”不仅不是将来问题，蒋李的枪炮现在即已不能压低珠江流域和长江下游的反帝的高潮，他们反而被革命的高潮所压迫不能不仍然戴起民族革命的假面具。可是由惧怕工农革命势力而酿成革命势力的分裂，也就是促成帝国主义复活武力瓜分的一个主要原因。在这三个原因之下，帝国主义不能不复活武力瓜分政策。

自五卅以至北伐胜利，帝国主义为革命高潮所压迫已经不能不采取让步政策。现在忽而由让步政策回到武力瓜分，这不能不归罪于蒋介石的叛逆。所以蒋介石叛逆的意义不是单纯屠杀 C.P. 和打击工农，乃是背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引导帝国主义复活武力瓜分政策。

另一方面，蒋介石的叛逆是新军阀企图继续旧军阀的统治，

从新扰乱国家，继续内战，宰割人民的开端。他的一切蹂躏党权，破坏三大政策，分裂革命势力的罪恶，无非是要使人民重新再过十几年（如民元以来）水深火热的生活。

有人以为蒋介石或可统一中国。这是梦想。慢说他不能统一李宗仁、白崇禧、吴稚晖、戴季陶、李济琛、何应钦、胡汉民等等，就是他的嫡派军队亲信党徒也不能统一。蒋介石内部冲突崩裂的状况与吴佩孚张作霖内部没有两样。袁世凯、吴佩孚、张作霖等旧军阀不能统一中国，新军阀蒋介石亦万无统一中国之可能，这是可以断定的。

由此看来，蒋介石的政治路线不仅不能统一国家，拯救危亡，只是要重新引导国家走向危亡，人民重过十几年混乱宰割，水深火热的生活。

所以现在有了蒋介石统治的存在，便没有国家统一和人民安宁的希望。要求国家统一和人民安宁、必须打倒蒋介石。

打蒋的意义不是单纯的对人问题，也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首先要在政治上去打倒他，这才算是真正倒蒋。所以从这个根本观点说来，革命的民众对于所谓第三派的主张应有一个判断。

我们敢肯定的说：军阀的统一（无论新的旧的），在中国是永远不可能；现在的蒋介石远不如当年的袁世凯；而现在的革命势力不仅不如民元之易于消灭，并且是机械的枪炮方法所不能消灭的，（广东、上海、湖南的工农势力并没有根本被剿灭）。革命的统一是唯一可能的，但是先决条件是要维持与巩固革命的联合战线。

中国共产党人将以全力维持并巩固此战线到底，决不在威胁之下抛弃这个救国救民的根本政策。

一切饱受帝国主义与军阀宰割之痛苦的人民，不仅应注意这个维持联合战线的斗争，并且应来参加与拥护这个有关国家命运人民死活的斗争。

同时，我们敢忠告一切真正三民主义三大政策的信徒：大家应勇敢地起来领导这个斗争，不要任民众看了只有无产阶级是三民主义三大政策的忠实继承者！

为国家的统一必须维持革命联合战线！

为人民的解放必须维持革命联合战线！

为国民党不离工农而孤立必须维持革命联合战线！

联合战线是救国救民救党的唯一政策！

反联合战线便是反三民主义！

反联合战线便是投降蒋介石！

反联合战线便是迎合帝国主义！

一切革命民众起来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

（载《向导》第200期

署名：和森）

国民党反革命统治下的 辛亥革命纪念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一日)

反革命的统治阶级及其政党，显然欲利用今年辛亥革命纪念日做一番大规模的宣传，以欺骗全国民众。他们不仅宣传辛亥革命事业已由他们完成，中国统一业已成功，他们还要宣传豪绅资产阶级专政之必要（所谓训政时期开始），还要在广大民众之前玩弄什么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及黄色改良主义等欺骗的宣传。因此我们的任务，实有乘此纪念辛亥革命的时机，向全国民众揭破统治阶级国民党之假面具的必要。

中国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的开始，就表现出他的妥协性与不彻底性，孙中山与袁世凯妥协的结果，遂致革命受了挫折，于是怎样继续辛亥事业，成为往后革命运动之主题。彼时资产阶级中还有革命作用的一部分——即民族资产阶级，他的本身找不出解决这一问题的钥匙，一直到世界革命开始，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中国无产阶级跃登政治舞台——即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才使辛亥事业复兴起来，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高潮之发展，的确使中国革命接近了最后胜利的前途——即中国独立统一的前途。可是民族资产阶级国民党就是在这样的重要关头背叛革命，出卖革命，而与帝国主义地主阶级结成

反革命的联合战线来反对农民土地革命，屠杀彻底革命的先锋队——无产阶级及中国共产党的战士，以致中国革命受了现在这样严重的失败。民族资产阶级背叛了中国革命，民族资产阶级不配纪念辛亥革命！

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借着国民党做工具，更残酷的统治现在的中国，所以辛亥革命的客观任务——如驱逐帝国主义，消灭地主阶级，建立真正独立统一自由的平民式的民主共和国等——一个也没有完成。所以客观上的辛亥革命运动，仍要继续向前发展，不仅不会中止而且也不会消沉。民族资产阶级背叛了辛亥革命，完成辛亥革命者只有工农。

因为民族资产阶级背叛革命，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现在成为反革命的领导和组织者，所以往后的辛亥革命运动与以前的区别，就在于驱逐帝国主义消灭封建地主之外还要加上反对反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推翻国民党的统治。这一任务是新的而且是根本的。只有反对民族资产阶级才能打倒帝国主义，只有推翻国民党统治才能建立真正独立统一自由的平民式的民主共和国！

往日的国民党是各阶级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联盟，叛变后的国民党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的新工具。现在的南京国民政府实际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代理机关，这样的卖国政府，只有日益增加中国对于国际帝国主义的隶属性，只有日益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他所揭出的“修约”运动，就是要替帝国主义永久维持不平等条约（不过换一形式），他对于工农革命运动的摧残，就是要替帝国主义压灭中国的革命动力。绝对不要梦想卖国的国民政

府会废除不平等条约，只有建立工农苏维埃政府才能真正废除不平等条约！在国民党统治下，绝对没有中国的独立，只有在工农民主独裁制之下才能达到中国的民族独立与解放！

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在中国存在一天，中国便一天也不会统一。各帝国主义各自在中国争夺市场争夺势力范围，国民党各派军阀各自勾结一帝国主义。这便是说明如何在国民党统治下没有统一中国的可能。所以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才是中国统一之前提！

反革命的国民党现在完全成为反民权主义反政治自由的恶魔。表面用所谓三民主义来遮盖其阶级性，实际完全暴露其资产阶级专政的丑态——所谓训政时期。本来孙中山这些狡猾的资产阶级革命家老早就提出什么五权或党权来预先限制将来的民权，提出什么军政训政来预先否认民众的政治自由。现在反革命的南京政府正是厉行这种反民权主义反政治自由的白色恐怖政治和资产阶级的专制制度。国民党的统治就是豪绅资产阶级的专政，与真正的民权主义和政治自由不能两立。以前的辛亥革命是推翻满清的专制，往后的辛亥革命是推翻国民党的专制。打倒豪绅资产阶级的专制政治，建立工农民权独裁制，才能真正获得自由！

帝国主义豪绅地主资产阶级，他们互相之间以及每一阶级的各派之间，对于共同反对革命固属一致，然决不会消灭他们互相间的利益冲突，反而只有不断的爆发武装战争。现在国民党的各派军阀，完全与辛亥后各派军阀的地位没有两样，都各自勾结一个帝国主义，各自企图伸张其爪牙与势力。他们还要利用“革命战争”的名义来遮掩军阀战争。所以国民党存在，便必然

要继续并扩大辛亥以后的混战状况，这已成为不用解说的真理。只有变军阀战争为阶级战争，准备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各派军阀才能根本消灭军阀战争而获得和平。在国民党统治下绝对不要幻想国内和平！

国民党代表豪绅资产阶级的利益，自非常之需要牺牲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只须计算国民党统治一年以来所增加捐税之种类与额数，便可以证明国民党统治与任何军阀时代没有区别。只有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苏维埃政府才能真正废除一切捐税，实行统一的累进所得税。

国民党的叛逆，是正当中国革命进到土地革命的阶段，是正当中国革命的基本群众——农民为夺取地主阶级土地而猛烈参加革命的当头，所以革命发展到这一阶段，国民党就根本变为反对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的反革命党。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实际就是农民革命，要求消灭封建地主阶级及驱逐帝国主义，只有土地革命彻底深入与扩大，中国这一革命才能达到成功，国民党就在这一革命深入的开始背叛了革命，出卖革命于帝国主义和地主阶级。所以国民党是中国农民的死敌，也就是国民革命的死敌！

资产阶级背叛土地革命，客观上更利于无产阶级取得农民——即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因为不仅是大资产阶级叛变，就是自命为“左派”的小资产阶级上层（汪精卫派）也随着完全反革命，一九二七年的历史是铁一般的证明，只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领导者。

广州暴动是革命对于反革命的一个伟大的回答，同时也就是革命深入到苏维埃的阶段，民族资产阶级在这个革命的深入

之前发抖，同时使他觉到单是白色恐怖不能消灭革命，于是企图采用民族改良主义来暂时和缓群众的革命化，尤其在济案后，这一企图是明显的。他的具体形式的表露，在“朝”者如号召“修约”，在“野”者（汪精卫、陈公博派以及第三党）号召“改组国民党”“恢复民众运动”“注重工农利益”“阶级合作”以及所谓“民生主义”等等。凡此等等无非是资产阶级企图消灭革命的另一方法，并且是帝国主义进攻的工具，因为帝国主义正需要在此掩遮之下来加紧其对于中国的统治。只有不停的将在广大群众之前揭破此改良主义的反革命的假面具，才能打破一部分落后群众对于反革命政党之幻想。

反革命的国民党用种种方法帮助地主进攻农民帮助资本家进攻工人。他于政治的压迫和白色恐怖的屠杀手段之外，又企图散布资产阶级的影响于工人运动中，用黄色改良主义的邪说和口号来蒙蔽工人阶级意识，如“阶级和平”“劳资合作”“强迫仲裁”“分红制度”等等，这些邪说无非是资本家进攻的利器，无非是企图在工人的血管中注射毒气。

三民主义曾经是辛亥革命以来的口号，现在完全变成为反辛亥革命的旗帜。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恰好是代表不彻底的薄弱的狡猾的中国资产阶级之本性，中国资产阶级是从帝国主义和地主阶级难产出来的，故一面与二者冲突（不彻底的革命性之来源），同时又与二者有密切的关系（彻底的反革命性之来源），所以孙中山一开始号召革命，同时即预备了反革命的理论基础。他的民族主义原本是富强主义，与任何帝国主义可以妥协的，他的民权主义加上军政训政的限制，结果只是反民权的党权主义，即资产阶级专制主义，他的民生主义是反对阶级斗争防止社会

革命的，他的平均地权是反对土地革命的……。孙中山三民主义在与中国共产党及国际无产阶级合作时代，提高了不少革命性，蒋派汪派整个国民党背叛以后，就同着民族资产阶级完全消失其革命作用而成为反革命的旗帜。现在只有不停的在群众前面撕破这反革命旗帜，才能达到辛亥事业之最后的完成。

民主共和是辛亥革命的高贵口号，可是辛亥革命没有完成这一任务，直到现在没有完成这一任务。所以现在中国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这一任务的最后完成只有推翻现在资产阶级专政才能达到。用豪绅资产阶级的党权来取消民权，用豪绅资产阶级的专制来取消民众的政治自由。所以很明显的证明：有国民党便没有民主共和。假若说“民主共和”在袁世凯以至张作霖时代为假招牌，那么现在国民党统治之下更是欺骗民众的假招牌，民主共和的真意义不是地主资产阶级专政而是工农民众专政，剥夺地主资产阶级的自由而保障工农民众的自由。所以往后完成辛亥革命的任务，便是要建立工农兵以及城市贫民的苏维埃民主共和国。打倒国民党专制！打倒国民党党权！争取民权自由！建设真正民主共和的苏维埃中国！

当此反革命统治下纪念辛亥革命的时候，我们要向全国革命的群众高高的举起我们的最低限度的政纲：

- 一、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
- 二、没收外国资本的企业和银行；
- 三、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
- 四、推翻军阀国民党的政府；
- 五、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

六、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与社会保险等；

七、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耕地归农；

八、改良兵士生活，发给兵士土地和工作；

九、取消一切政府军阀地方的特捐，实行统一的累进税；

十、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

这十大要求就是中国共产党现在争取群众准备武装暴动以推翻豪绅资产政府的主要口号，也就是完成辛亥革命的大旗。

（载《布尔塞维克》第1卷第1期

署名：和森）

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一日)

自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高潮推动中国革命进到土地革命和苏维埃的阶段，民族资产阶级公开背叛革命，与帝国主义地主阶级结成反革命联合战线，以反对工农的革命势力；这一巨大的变动，显然是革命动力和革命阶段的变动。

中国革命性质问题是一个旧问题同时又是一个新问题。因为这一问题还是在中国共产党生长以前摆在我们的前面，但在理论上从未获得正确的解决，所以这问题是旧的；同时在最近三年伟大的革命时期中，革命进展的速度有如此之快，使革命动力和革命阶段起了上述之巨大的变动，所以在这样历史的事变之后提出这一问题，人们自然要感觉是新的。

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呢，还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或已转变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这一根本问题将决定今后革命之一切战术与策略：

资产阶级革命与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

过去三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先进国的革命运动（如十七世纪的英国革命，十八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及十九世纪欧洲各国的革

命运动)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模式。资产阶级革命的特性:(一)推翻封建制度,建立资产阶级的国家和资本主义的社会;(二)资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三)无产阶级还未形成独立的政治势力。这类资产阶级革命都是在资本主义进到帝国主义的前期。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资本主义经过长期的和平发展,工业资本与财政资本完全混合,达到他的最后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从这个时期起,“民主共和”的口号在资本主义先进国已没有重大意义,因为这些国家都已成为资产阶级的专政(表面上或民主共和或君主立宪);同时无产阶级在数量上与质量上随着资本主义而有伟大的发展和集中,成为伟大的组织的独立的政治势力。所以摆在先进国无产阶级前面的历史任务已不是推翻封建制度的民主革命,而是直接推翻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

然而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在资本主义落后国——农奴或半农奴制的封建专制国家仍然是不可避免的历史任务。可是这一任务已经不是资产阶级所能完成。纵然这些地方的资产阶级需要推翻封建制度,扫除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然而因为财政资本与工业资本的混合,资产阶级已与地主阶级发生密切的经济关系,所以这些国度的资产阶级之革命性是很不彻底的半途而废的;他不仅不能做革命的领导阶级,反之只有无产阶级联合占人口优势的民权主义的及资产阶级性的农民反对这种不彻底的动摇妥协以至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才能使民主革命达到彻底的胜利。所以资本后进国之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与前世纪资本先进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在历史的任务上是一致的,而在革命的动力和革命的效果是不同的,第一、这

一革命的领导者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第二、农民在这一革命中占重要地位，超过于以前任何资产阶级革命中所占的地位；第三、这一革命的彻底胜利只有在工农联合而反对不彻底的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的条件之下才能完成；第四、因此，这一革命的彻底胜利不是资产阶级的胜利而是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胜利，即不是资产阶级专政而是工农民权主义独裁制；第五、这一革命的彻底胜利不仅是彻底肃清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切障碍（封建制度农奴制度等）而必然要转变到社会主义的前途。这一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历史模型，就是俄国一九〇五到一九一七年的革命。

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与社会革命

社会主义革命与民权革命的区别是很显明的，因为无产阶级社会革命是根本推翻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他的政权性质是无产阶级专政，而不是与农民平分政权。在资本主义后进国，无产阶级不能超过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的道路，去达到社会主义革命，不能把民权革命看为是资产阶级的事而把这一最低度党纲（争民主共和）从最高度党纲（争社会主义）排除出去。无产阶级只有坚决的与农民联合引导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到底，在民权革命完全胜利的条件之下，才能开始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民权革命的完全胜利，不外就是工农民主独裁制。列宁说：“无产阶级与农民革命民主的狄克推多无条件的仅仅是社会主义者过渡的暂时的任务，但在民权革命的阶段中不认识此任务，简直是反动。”

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关联，是俄国革命中主要的争论问题。最初是民粹派与马克思派的争论：民粹派整个的理论是否认资本主义，否认产业工人阶级的地位，否认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与政治自由；他们认农奴制度的残余——农村公社为俄国可以立即实行社会主义的基础，他们认反封建制度和农奴制的农民运动，直接是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农民运动，在马克思派看来，不是社会主义的运动，而是民权主义的运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如其他各国一样，没有超过的例外；同时也不能超过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民粹派这种反动的理论，客观上是回避土地革命和民权革命，而欲维持俄国于旧有的土地制度和封建秩序之上的。

此后多数派与经济派，以至少数派的争论也是以这个问题为中心。经济派企图把俄国无产阶级限制于经济斗争的狭隘范围，把政治斗争事业完全奉送给自由主义的大资产阶级。少数派虽然承认参加政治斗争之必要，可是认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为民权革命的主人，忽视农民的地位，忽视无产阶级的领导。因此在俄国革命中，完全形成两个不同的战术和策略的路线：多数派的路线是：

“无产阶级应当引导民权革命到底，使农民群众加入自己方面来，一面用力打破专制政府的抵抗，一面使不坚决的资产阶级疯瘫化。无产阶级应当完成社会革命，使人口中一切半无产阶级成分加入自己方面来，一面用力摧毁资产阶级的抵抗，一面使不坚决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疯瘫化”。（见列宁：《两个策略》）

少数派的路线完全是与自由主义大资产阶级联盟，把无产阶级当做大资产阶级的尾巴，以为无产阶级在这一革命中的目

的不过是政治的自由。少数派以为民权革命的主人是资产阶级，以为民权革命的胜利是资产阶级的胜利，所以他们反对工农民权独裁制，反对无产阶级政党参加这一革命政府。

孟塞维克主义把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与无产阶级社会革命截然划分为两个不相联系的阶段，以为资产阶级民权革命胜利之后，必须在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之下经过一长期的资本主义发展，等到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成熟时再举行社会革命。所以孟塞维克主义绝对不“梦想”从民权革命转变到社会革命。

布尔塞维克就不同，列宁在一九〇五年就肯定的说：“乡村无产阶级与农民资产阶级（富农）间的阶级抵抗是不可避免的，我们预先就要暴露他，说明他，并准备他的争斗的基础。……没收土地给谁呢？我们不抹煞此问题，不发平均分配或‘社会主义’等誓约，我们但说：我们还要争斗，从新争斗，同着那些同盟者到新的战场上去争斗：在那里，我们将无条件的同着乡村无产阶级和一切工人阶级去反对农民资产阶级。实际上，在徭役或农奴式的大财产占优势的地方，在大的社会主义生产和国有的物质条件还没具有的地方，可以把土地移交于农民小私有阶级，在民权革命完全胜利，和大资本归工人社会有的条件下，那时候我们就要开始转变——在我们无产阶级的自觉力和组织力的限度内——开始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是要不断革命。我们不会停在半路上。……我们用全力帮助全体农民干民权革命，使我们无产阶级政党容易尽可能的迅速走到新而高的任务——社会主义革命。……”（见列宁：《社会民主党对于农民运动的态度》）

“……人们知道除了经过民权主义，经过政治自由，没有向

社会主义的其他道路。所以要努力完全彻底实现民权主义以达到最终目的——社会主义。民权主义的斗争与社会主义的斗争难道是一同的条件吗？所以工人在这种与那种的斗争中将不停的有各种不同的联盟者。在民权主义的斗争，工人将同着一部分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的斗争，工人将反对一切资产阶级。同豪绅地主斗争，可以而且应当同着全体农民，中农以至于富农。同资产阶级以及富农斗争，那就只能希望与乡村无产阶级共同行动。”（见列宁：《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联合全体农民反对地主阶级和封建专制。联合乡村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反对一切资产阶级——农民资产阶级在内。”这是布尔塞维克在俄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十月革命的成功，完全证明这一路线之正确。

中国革命是不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

中国的国际地位是与俄国完全不同的。然而中国革命，按照他客观的意义，无条件的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因为国际地位的不同，这一革命的根本任务不仅是反对地主阶级，消灭一切封建残余，而且是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形成为世界革命之一助力并且为世界革命之一部分。这些客观任务无非是要求在帝国主义和半封建半农奴制的压迫之下解放出资产阶级的中国，而扫除其一切发展的障碍。

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占中国人口的最大多数。农民处于帝国主义和半封建半农奴制（佃田制）的剥削压

迫之下，处于不可支持的农业恐慌和普遍的贫穷化之下。封建残余，在全中国还占很重要的地位。农民普遍的革命要求，如抗租抗税，土地农有，反对豪绅地主，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要求农民政权，农民武装，统一赋税，统一中国，凡此等等都是彻底的民权主义的要求。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换过说也就是资产阶级性的农民革命。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自然比俄国更加重要。联共反对派以为中国资本主义受共管海关的压迫，在城市中不能发展因而转向乡村发展，中国农村业已资本主义化，封建残余已不占重要地位，所以现在中国土地革命已超过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性质。这完全是一种无根据的分析之错误结论。

中国是半殖民地，中国革命将成为殖民地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模式。越往东方，资产阶级越卑鄙，他由革命跑到反革命的速度也越快。在民族资产阶级公开叛变之后，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无疑的只有在联合农民反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条件之下才能彻底胜利。然而这不是说前一时期——反帝国主义的全国统一战线时期——联合一部分资产阶级的策略是错误的。因为那时民族资产阶级还有革命作用，还是拿着武器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与他暂时的共同争斗是必要的。托罗斯基派，机械的利用俄国革命经验，以为中国机会主义的错误由于与资产阶级合作的策略。实际是不对的，他们忘记中国国际地位与俄国之不同，忘记前一时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也与俄国的有不同——无论后来怎样叛变和反革命。

我们在中国革命中所犯的错误的，首先在对于中国革命性质之不正确的观点：（一）认“资产阶级力量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在这革命若失了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中便没有阶

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认“国民革命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国民革命成功后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二)认“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固然是重要分子,然亦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幼稚的无产阶级目前只有在此胜利之奋斗中才有获得若干自由及扩大自己能力之机会,所以和革命的资产阶级合作”;(三)忽视农民,偏向于“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四)以为“中国农民运动必须国民革命完全成功,然后国内产业勃兴,然后普遍的农业资本化,然后农业的无产阶级发达集中起来,然后农村间才有真正的共产的社会革命之需要与可能”。这些认识,显然是对于革命动力的估量不正确,忽视无产阶级的领导,忽视农民的重要,而偏向于与资产阶级联盟,根本不知道民主革命的胜利就是工农民权独裁,而认革命胜利一定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根本没有革命转变的观念,以为国民革命成功后,要经过一长期的资本主义发展才有社会革命之需要与可能,——总括一句,这是“二次革命论”,中国原始的孟塞维克倾向。

“二次革命论”之后,又发现“一次革命论”:以为从民权主义到社会主义就是“一次革命”直达社会主义,以为“中国现时的革命既是资产阶级的又不是资产阶级的,既不是社会主义的又的确是社会主义的,这一次革命的胜利终竟是社会主义的”。这“一次革命论”不仅混淆中国革命的性质,要有落到托罗斯基不断革命论的错误,不仅混淆无产阶级政党最低度党纲(工农民权独裁的)与最高度党纲(无产阶级专政的)的任务,而且要使从民权革命到社会革命的“转变”成为没有意义,必致使无产阶级政党忽视此转变的条件与准备,所以“一次革命论”也是不正

确的。

资产阶级叛变后革命性质没有变化吗？

民族资产阶级叛变后，中国革命有什么特殊现象呢？有：

（一）土地革命深入；

（二）开始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

（三）工农革命联盟对抗帝国主义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反革命联盟。

以上现象是证明革命阶段的深入和革命动力的转变，而不是革命任务和性质的转变。只有革命任务改变了，革命性质才会改变。革命的客观任务——如打倒帝国主义消灭地主阶级的两个主要任务；现在不仅没有完成和消失，反而因民族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帝国主义妥协，而愈益加重了这些客观任务的需要与意义。纵然在资产阶级叛变后，于上述两大主要的客观任务外，还要加上更坚决的反对领导反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这一新任务。然这一新任务的意义，并不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代表而应反对，乃因民族资产阶级变成为帝国主义的工具地主阶级的同盟，出卖革命变成为反对民权革命的反革命之领导者而应反对的。所以这一新任务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性质，并不会毁灭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客观上反而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起点。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不一定是社会革命，二十世纪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就只有反对资产阶级才能进行才能胜利。这本是列宁主义关于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原则，并不是中国革命的创例。

土地革命不是社会革命吗？土地革命在前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中也曾实行过。土地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中枢，他的性质彻头彻尾是民权主义的而不是社会主义的：

“在马克思派，农民运动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民权主义的运动。他在俄国也如在其他各国一样，按照他的社会经济的内容，他必然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之伴行的卫星。他并不是反对资产阶级的基本制度，反对商业经济，反对资本。他所反对的是农奴制的残余，乡村中资本主义前期的关系，以及反对为一切农奴制残余之主要抵柱的地主的垄断土地。所以农民运动的完全胜利不是废除资本主义，反之，但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更广大的基础，纯全加速资本主义的发展。农民暴动的完全胜利只能创造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墙基，在这墙基下就完全显然的要发展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按照他的客观意义，农民暴动的完全胜利有什么意义呢？这个胜利是彻底消灭一切农奴制的残余，但完全不是消灭资产阶级的经济，不是消灭资本主义，不是消灭划分阶级——富人与贫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社会。何以近时农民运动是资产阶级民权运动？因为他消灭豪绅地主政权，创造民权制度的社会，这民权社会并没废除资产阶级的基础，没有消灭资本的统治。然则自觉的工人，社会主义者对近时农民运动应当怎样呢？应当维持此运动，以最好的努力帮助农民，彻底帮助他们推翻整个的豪绅地主的政权。但同时应当向农民解释推翻豪绅地主的政权还不够。推翻这政权，应当同时准备消灭资本的政权，资产阶级的政权，为要做到这个，便应立即宣传社会主义的完全，换过说，宣传马克思联合起来团结起来的教训，组

织乡村无产阶级来与农民的资产阶级及全俄的资产阶级争斗……”(以上见列宁论《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可见中国农民的土地革命是彻底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的革命。只有当土地革命深入，民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要背叛此彻底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时便高叫土地革命是社会革命，无耻的宣传“中国共产党实行社会革命来破坏国民革命”！只有豪绅地主反对此彻底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时，便把农民一切革命行动，如打破宗法的礼教风俗，女子剪发放足等事都叫成为“社会革命”！

然则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不是社会革命的政权形式么？苏维埃是社会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形式，也可以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工农民权独裁制的政权形式。苏维埃政权的真意义是什么？对于工农群众本身是彻底的民权主义，工农群众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真正自动手来管理国家政治，是真正平民的彻底的民权主义，是民权主义的最高形式。工农苏维埃政权对地主资产阶级一切敌人，不客气的是所谓“暴民专制”，革命独裁，消灭地主豪绅资产阶级一切复辟和反革命的可能，剥夺其一切权利与自由，保障革命的彻底胜利。所以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胜利不外就是工农民权独裁，不外就是工农苏维埃政权。工农平民的民权共和国，就是工农苏维埃共和国！在民权革命的阶段，苏维埃是保证民权革命彻底胜利而容易转变到社会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好的方法，但决不因为采用这一彻底民权的政权形式，便改变了民权革命本身的性质。

所以民族资产阶级国民党反革命后，中国革命的动力和革命的阶段虽有显明的变化，但是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

权革命。

社会主义的前途及其转变的条件

因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社会主义革命在国际范围内有三个主要的方向：在资本主义先进国，如英美德法等帝国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有最高度的发展，所谓民权革命都已过去，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只是直接实行社会革命，便能迅速的完成社会主义的建设而帮助其他经济落后国；在资本主义后进国如以前的俄国或现在的日本，这些国家资本主义有相当程度的发展，足够单独一国建设社会主义，从民权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的速度是很快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如中国与印度，农民占最重要的地位，还有严重的封建残余，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低，不够独立的建设社会主义，必须社会主义先进国的帮助，所以这些地方从民权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不能机械的想象如俄国一样，同时也不能象机会主义的观点，这个中间隔了一个万里长城。

中国革命是处在世界无产阶级社会革命时期，是世界革命之一部分，苏联社会主义的建设已有十年之久，世界资本主义不停的向前崩溃；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背叛国民革命，客观上更有利于中国革命之社会主义的前途，因为在此革命中，革命的动力已经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而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由于资产阶级的叛逆更确定的建立起来，这就更见开辟了中国革命将来发展的前途——即社会主义的前途。

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不仅有转变到社会主义前途之历史的可能，而且有历史的必要。将来民权革命彻底胜利时，驱逐帝

国主义，没收其一切企业与银行，必致与帝国主义作更残酷的斗争，将不仅有武力的干涉而且有经济的封锁。在此情形之下，勾结帝国主义与革命作敌的各派资产阶级对于工农民权独裁的苏维埃政府，至少也会采取经济怠工的方法，那时候势必使工农苏维埃政府不得不由没收外国一切大企业进而没收本国资本家一切大企业，去组织指挥全国的经济生活。另一方面从农业来说，中国农业生产力是很低弱的，当土地革命彻底胜利，可以从此开始向资本主义发展时，必然就要遇到一个极大的障碍，这障碍也就是上面所指的帝国主义，豪绅地主，资产阶级之联合的干涉，或企图用新的剥削方法，来压制刚从半农奴制企图解放发展的小农经济，使之处于不利地位（如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到那时候，一定迫使最大多数的农民（自然富农除外）提出这样的问题：怎样才能更加集中力量去战胜中国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的障碍呢？彼时所能得到的答复一定是赶快准备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即消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代以有组织的在国有城市大工业统率之下的农村集体经济。到了这样转变的时候，就已经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起点，而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了。

所以中国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到底，就必不可免的要开始社会主义的转变。工农民权独裁的苏维埃政权，便要成为这一转变的起重机，也就是这一转变的基本条件。至于这一转变要到甚么时候才能完成，这一转变将要采取怎样的速度，这些问题只有将来的争斗和阶级力量的对比才能决定，换过说即只有城市无产阶级的和乡村无产阶级以及半无产阶级的自觉力、团结力与组织力才能决定。

这里还有一问题：是不是有和平转变的可能？在纯粹理论

方面,当然不排除这一问题的提出,可是在实际方面决不应预先存此和平转变的幻想。在将来不仅因为有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残酷抵抗的远景摆在我们前面,而且因为中国的富农(乡村资产阶级)之反革命的可能性(他一身兼具资本,田租,高利贷三种剥削资格)是不可轻视的。在有利于全体农民的民权革命阶段中,富农多少还可参加斗争,或保持中立;但到革命彻底深入而要开始转变的时候,这一乡村资产阶级说不定将成为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之破坏革命的剧烈工具。只有经常的保持与发展乡村无产阶级(雇工)及贫农在农民运动中的领导权,只有不停的提高与发展乡村半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与独立的组织,最后,只有无产阶级能巩固在整个民权革命及工农苏维埃政权中的领导地位,只有在这些条件之下,才能保证将来革命转变的顺利与胜利。一九一八年,苏俄胜利的无产阶级很容易的镇压富农反革命的暴动,驱逐代表乡村资产阶级的左翼社会革命党于苏维埃政权之外,就是这种革命顺利的转变之模范。为什么有这样顺利的转变呢?因为无产阶级在苏维埃政府中,在军队中,在城市与乡村的一切组织势力中,都保持绝对的优势和领导地位,平素就监视这种暂时的争斗同盟者如敌人,所以不难在反动开始的时候就解决了他们。

资产阶级曲解中国革命的企图

孙中山用三民主义口号来引诱劳动群众参加革命,他仿效俄国民粹派的把戏,利用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幻想来遮盖其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之本性。他所代表的要求,分明是资本主义

的发展，他却要装做害怕资本主义，其实他所害怕的只是随着革命而必然发展的阶级斗争，和将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他怎样“预防”此社会革命呢？于是他大言不惭的宣布他“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资本主义社会政策，就是社会主义，他的国民党式的革命就是社会革命。他要中国革命在他的掌握中一次革完，他要骗取劳动群众相信他有包办国民革命和社会革命的魔力。这种曲解中国革命性质的骗术，在革命运动还未深入，阶级分化还不显明的时期是可以蒙蔽一般劳苦群众的。

五卅后革命高潮发展到极度时，胡汉民在莫斯科表示要求国民党加入第三国际，表示不满于国民党之小资产阶级立场而要求为国民党建立社会主义的政纲，尤其在他回国时，特别“努力”于反对考茨基。可是这些无耻的“口头左派”——（胡汉民蒋介石汪精卫等都是）到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深入到土地革命阶段时，他们反革命的策略便是：宣布CP企图社会革命破坏国民革命。在分共时期，他们确是利用这一反革命的宣传政策成就了他们万恶的反革命事业。

民族资产阶级投降帝国主义地主阶级不到一年，他的反革命真相完全暴露，他对于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完全破产，于是民族资产阶级所谓“左派”学者政客，曾经叛逆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上层领袖，以及共产党的叛徒陈公博谭平山施存统等他们或用什么国民党左派名义，或用什么中华革命党或第三党名义出来反对“共产党的超时代的政策”，反对农民暴动，反对工农苏维埃政权，抬出反革命化的三民主义国民党臭招牌来涂饰他们自以为已有的“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非资本主义前途”的金坳，他们续演孙中山的骗术，或是否认资产阶级的存在，或是曲解什么民

生主义即是非资本主义，或是把中国革命分成为民主革命社会革命两个阶段，而由这阶段到那阶段的道路，就是节制资本平均地权以及提倡国家资本，奖励私人社会资本的途径！由此他们的共同结论是：中国革命与西方不同，所以马克思与孙中山的革命方法不同，一主阶级斗争一主阶级调和，但目的是相同的，因为都是要达到非资本主义前途；然而第三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的方法——阶级斗争以至武装暴动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来破坏中国国民革命，所以国民革命一定只有在国民党领导之下反对这超越时代的第三国际中国共产党才能完成……。

这些资产阶级的叛徒，学者，政客对于中国革命的曲解，他们目的与作用不仅在遮盖民族资产阶级及国民党各派的反革命，主要是在民族资产阶级要彻底叛逆中国国民革命，利用这些曲解来贯彻其破坏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到底。中国彻底革命的代表者——中国共产党人丝毫不忽视这些曲解的反革命作用，应在全国群众之前揭破这反革命和假革命的鬼脸。

这里有两个完全不同的图表摆在群众前面：彻底代表中国革命利益的无产阶级共产党，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彻底胜利就是以苏维埃为政权形式的工农民权独裁制的彻底胜利，这彻底胜利只有无产阶级领导及联合农民更坚决的反对反革命的组织者民族资产阶级，准备全国的武装暴动推翻豪绅资产阶级国民党和帝国的统治才能完成。彻底反革命的各派民族资产阶级以为中国革命运动的彻底消灭只有联合帝国主义豪绅地主更坚决的镇压工农革命势力反对第三国际与中国无产阶级共产党而成功资产阶级领导的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独裁制。自觉

的工人农民，你们看谁是彻底革命的主张，谁是彻底反革命的主张？

施存统等自以为“民权革命”是他们对于中国革命性质的新发明，他们因此号召“一切民主势力集中”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店东厂主资本家之下，与同他们蒋总司令对崎的桂系封建势力来拚命，他们更装做很革命的腔调说：现在反动的封建势力统治一切，必须一切民主势力集中起来结成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打破现在的反动统治才能完成民主革命。

你们这些叛徒，你们是主张民权革命的么？民权革命进到深入的阶段——土地革命——你们就叛变了！你们是主张民权革命的么？共产党一提出彻底的民权革命的口号——武装暴动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工农苏维埃民权独裁制——你们就大嚷：“共产党实行超时代的政策”，“共产党企图社会革命，破坏国民革命”！你们是赞成民权革命的么？民权革命进到这样深入阶段，阶级分化这样的尖锐，很显然的一切革命的斗争，就是阶级斗争；可是你们不是否认阶级斗争，便是否认中国没有资产阶级，用不着阶级斗争来“削弱”民主势力的集中！你们赞成民权革命么？中国民权革命只有在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及国际无产阶级帮助之下，联合农民反对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才能进行；你们完全相反，你们是要为已经叛变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维持假革命的招牌，欺骗民主革命势力，“集中”于你们资产阶级旗帜之下，联合帝国主义与地主阶级来消灭中国民权革命！谁反对农民暴动没收地主土地？谁反对工农苏维埃政权，谁隐蔽民族资产阶级在反革命中的主要作用而单止揭出封建势力的反动来做号召，谁便是真正反民权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走狗。没有

民族资产阶级国民党的叛变，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那能有今日这样的猖獗？没有你们这些无耻的学者，政客，变节者的出卖革命，曲解革命以回护民族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作用，地主豪绅资产阶级及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那能向前进行到今日？

你们这些无耻的革命的卖淫妇，当民权革命发达到最高点（土地革命）的时候，你们发抖，你们动摇，你们叛变，当革命因为你们的叛变而暂时失败的时候，你们又高谈“民权革命”，“民主共和”，“自由”，“民权”，“反封建势力”，“一切民主势力集中起来”，“工农小资联盟”，“非资本前途”……。你们要用这些高调和空谈，一面遮盖你们过去反叛革命的罪恶，同时替反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维持革命的假招牌，使不自觉的群众认你们的主人和你们自己还是“民主革命的”，企图从精神上来麻痹中国革命动力。可是你们这种企图终于逃不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灯塔，这一灯塔首先就要暴露你们反民权革命的真面目！

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劳苦群众之前，高声的肯定中国革命有社会主义的前途，他的最高任务就是争得此前途之尽可能的迅速的实现；同时他坚决的反对误解或曲解中国革命现在阶段之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性质，他始终一致的认定完成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之至低限度的党纲，谁要抛弃或超过此至低限度党纲的任务，谁便是反革命。

中国共产党明显的告诉全国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中国无产阶级必须联合农民反对反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到底，成功工农苏维埃民权独裁制；以这工农苏维埃政权为出发点，联合乡村无产阶级和人口中一切半无产阶级的成分反对不彻底的富农，使革命迅速转变到社会主义的

前途。

中国共产党明白告诉全国革命分子，只有在工农联合反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条件下，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才能彻底胜利；在此胜利下的平民式的民主共和国，就是工农苏维埃共和国；一切民权革命的斗争，就是尖锐的阶级斗争，现在所谓“一切民主势力集中”主要的除了“工农联合”外，简直没有意义。一切真正的革命分子决不要误听革命叛徒施存统等的诱惑，以为还可与反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或其接近的羽翼联合。

中国共产党不怕第三党谭平山等讥笑他是“孤立”是“单独革命”，中国无产阶级政党有三万万以上的农民革命的同盟军，有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后援。谭平山这些害怕孤单的卖淫妇只有到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中去找她们的姘夫。有巩固的工农革命的联盟存在，终于要打碎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反革命事业，即彻底成功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

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客观上更创造了有利于无产阶级领导权和社会主义前途之可能，但中国共产党决不夸张他的领导权之建立，而丝毫忽略揭破民族资产阶级种种欺骗民众的假革命的企图或民族改良主义的企图，与这种企图作长期的艰苦的奋斗，是中国共产党人一秒不忘的任务。

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统治的猖獗，千百万群众处于极端的黑暗的白色恐怖之下，使完成民权革命的要求在客观上愈加紧迫。但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决不如那些动摇叛变过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一样，只是于革命失败后空谈或幻想“自由呵”“民权呵”“共和呵”……以表示自己还是

“民主革命派”，如施存统谭平山这辈人，恰好只能证明他们是无常的变节者。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家，在革命暂时失败后，只有愈益坚决的深入到确定的革命阶级中去做最艰苦的工作，准备革命最后胜利的必要条件，用这些艰苦卓绝的群众工作去代替小资产阶级“民权派”之虚伪的口头禅。他们只是口头上唤民权革命，“民主势力集中”，共产党人却是要在艰苦的工作中取得工农群众的大多数。无产阶级是彻底的民权革命的实行者，他决不与任何小资产阶级民权派同化，他只有继续不停的同小资产阶级民权派的动摇，不彻底，空谈，幻想，以至叛变的一切奋斗才能引导此民权革命到底。

中国共产党以全力帮助农民运动，以至暴动没收地主土地。中国共产党不因此运动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去帮助她。而是因为此运动是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中枢，是彻底民权主义性质的，故帮助她。叛徒陈公博辈说中国C P自知中国产业工人过少，不足夺取政权，故违反马克思唯物主义而求助于流氓土匪的农民运动，中国C P决不害怕这些物观论的“高等”叛徒的诬蔑，而停止他对于民主主义的农民运动之帮助。可是中国C P对于农运的任务不仅是帮助而且是领导。中国C P决不沉溺于小资产阶级的农运中而失其独立性，决不由农民意识来动摇或影响自己的领导，而是要以自己无产阶级的正确领导去矫正农运中种种弱点和缺点。只有小资产阶级民权派才会把农运看做是完满无缺的社会主义运动，自己不是指导农民而是追随农民。中国共产党不是这样的，他知道中国农运中还有种种大的缺点——如平产主义，无政府倾向，盲动倾向等，须要矫正，客观上主观上都还含有资产阶级的影响须要解除。中国C P并不夸张

他对于农运的领导，乡村资产阶级还有侵占与危害这种领导的可能。所有这些，都愈增加中国 CP 群众工作之艰苦的任务。

中国革命固然有社会主义前途，因民族资产阶级之叛变，愈益增加这一前途之可能与必然，可是若说这一前途现成的摆在前面，这简直是骗子。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决不象叛徒兼骗子的施存统辈一样，以为革命的社会主义前途，是现成的摆在前面，没有什么转变中的任务，也没有什么障碍还须努力斗争。中国共产党人将不客气的反对党内党外这一类非资本前途的油腔滑调，而认真在此贯彻民权革命的斗争中准备此种转变胜利的条件；同时中国共产党人也将不停的反对党内党外一切类似陈公博“物观论”的机会主义，以为民权革命后必须经过资本主义的长期发展成熟经济的先决条件，再来实行社会革命。

（载《布尔塞维克》第 2 卷第 1 期

署名：和森）

论陈独秀主义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日)

一

陈独秀主义是什么？是中国革命运动和工人运动中之机会主义和孟塞维克路线之典型的代表。所有从中国近时革命运动中发生出来的各种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自戴季陶主义，彭述之主义，谭平山主义，以至鲍罗庭主义，都可以且应该归纳在这一中国孟塞维克的总路线之中——即陈独秀主义之中。

陈独秀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翼，而且带着民族资产阶级的理想跑到中国共产党里面来影响中国工人运动，原来是很明显的。他是欧战后中国资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的主唱者，美国式的“科学”和“民主主义”（《新青年》杂志的两个主要口号）的宣传者；哲学上，他是从美国杜威博士的实验主义进到法国启蒙时代的机械唯物论。这恰好是当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从欧洲大战时期中发展起来的思想和政治的表演。这一时髦的表演，在“五四”时期确是起了不少的革命作用。

凭靠在民族资产阶级和学生群众的“五四”反日运动，渐渐的软弱下来，而由此运动所引起的北方工人运动（主要是京汉路工和唐山矿工）和上海以及广东的罢工斗争继续不断的表现

出新的社会阶级带着伟大的革命力量跑出舞台。于是陈独秀首先起来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学生群众说：“工人的力量比我们大些”。此时正当他们对于“五四”运动的前途发生悲观，对于“五四”以后的发展方向发生徬徨，他们的先进分子正想“从下等社会”中找出自己的力量的来源和凭靠，这就不得不使他们看中了时髦的工人运动。因此陈独秀同着他所影响的急进的知识分子就开始与胡适之派（《新青年》杂志中的左翼）分化，改变自己的方向：由资本主义的美国方向改变到社会主义的俄国方向；由凡尔赛会议和华盛顿会议改向远东民族会议（一九二二年在第三国际旗帜之下召集的）。由此，陈独秀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之一。

二

陈独秀主义不是忽然一下形成的，他的发展经过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大约可分为四个时期：一九二三年党的三次大会之前后建立了他的孟塞维克的路线之一般的理论基础；一九二六年三月事变前后以至武汉时期建立了他的机会主义的实际策略；武汉失败至六次大会时，是他的动摇和消沉时期，一九二九年中东路事变后，进到公开的反对共产国际和中共的总路线，由取消主义进到“资产阶级工党”之叛逆的社会民主党地位。

三

首先看他在党的三次大会时期所形成的孟塞维克路线之理

论的基础。这一时期有他最典型的两篇文章：《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和《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这两篇文章最能代表他的一般理论的立场和倾向。

假若在一九一九——一九二二年陈独秀看重过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那末，到一九二三年京汉路罢工失败后，他就跑到孟塞维克的根本立场——不相信工人阶级的势力。他说：“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固然是主要分子——然亦只是主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概括来说，是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产业还未发展，连资产阶级都很幼稚，工人阶级在客观上更是幼稚了。详细说来，产业幼稚的中国，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此时中国工人阶级的理想界分为三愿：（一）大多数还沉睡在宗法社会里，家族，亲属，地方观念还非常之重……有许多目前虽是近代产业工人，而他过去未来的生活并未能与独立生产者（小手艺，小商人，小农等）的环境绝缘，不感政治的需要，并不脱神权，帝王之迷信……工人阶级的思想尤其是宗法社会的而非国家的……。第二，只少数有了国家的觉悟，有了政治的要求，……只在最进步的海员及铁路工人罢工中才表现出来……。第三，真有阶级觉悟并且感觉有组织自己阶级政党的工人更是少数中的极少数，因此，我们可以知道：中国最大多数的工人还没有自己的阶级政治斗争之需要与可能，而且连一般的政治斗争之需要，都不曾感觉的工人，也并不是少数（《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

固然中国工人阶级不是没有缺点的，可是陈独秀经常的乐于从缺点方面来看中国工人阶级。他在三次大会的演说中，简直把中国工人阶级咒骂得不成东西。什么“宗法思想”呵！“不

脱神权帝王迷信”呵！没有“国家觉悟”呵！他举了许许多多的琐细事实来形容中国工人阶级之“穷极丑陋”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上面所引的文章，是在大会开幕后写的，语句口气已经比在大会争论时客气万倍了。他在大会中从中国工人阶级的落后，神权帝王迷信及没有国家觉悟的立场发出来的分析中国革命的动力，拚命的肯定中国工人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之后，他就很骄傲的夸大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动力。他说：“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会阶级固然一体幼稚，然而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国民运动若轻视了资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观念”（同上文）。又说：“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状况既然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在这革命若失了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基础（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此文是大会前二星期写的）。他在大会的答辩中，热烈地辩护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主人。

他对于农民怎样呢？大会中的左翼曾提出工人阶级与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动力的理论与他对抗，这在他看来简直不值一笑，因为中国农民更是宗法观念，反动思想，神权帝王迷信，散漫不集中的“四不象”。大会闭会后，在他的论文中很客气的这样说：“农民占中国人口之大多数，自然是国民革命之伟大势力，中国之国民革命若不得农民之加入，终不能成功一个大的民众革命。但是，农民居住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下，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徙，畏难苟安，这三种环境是造成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的原因”。

在他的革命势力的计算中始终没有农民，因为他看定了三

个原因，农民难于加入革命。试看他所计划的民族革命联合战线：“中国的经济状况，军阀阶级已与资产阶级显然分开，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分化尚未到截然分离的程度，所以革命的资产阶级应当与革命的无产阶级妥协，打倒共同的敌对的军阀阶级……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应当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行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在一切时候，陈独秀是把农民放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之外，并自始至终了解这联合战线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联合，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阶级合作和阶级妥协，在这革命联合战线中资产阶级是居领导地位，而无产阶级是附属的。

陈独秀怎样决定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呢？他说：“半殖民地的经济权大部分操诸外人之手，政治权形式上大部分尚操诸本国贵族军阀之手，全国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在外国帝国主义者及本国贵族军阀压迫之下，有产无产两阶级共同起来，对外谋经济的独立，对内谋政治的自由，这是半殖民地国民革命的特有性质”。

固然在党的六次大会以前，对于中国革命性质和任务全党都没有明确的观念，然而如象陈独秀始终不认识土地革命为中国革命之主要内容，始终不认识而且不愿认识工农民主独裁制，这对于他完全不是偶然的。他说：“在普通形式之下，国民革命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国民革命成功后，普通形式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但彼时如有特殊的环境，也许有新的变化……但是这种未来的机会我们没有预算的可能，也并没有预计的必要，现在只有一心不乱的干国民革命”（同文）。

那末，工人阶级为什么目的要加入这革命呢？他说：“殖民

地半殖民地国民革命的意义就是对外要求民族之经济的政治的独立，对内则要求一般国民在政治上之自由。这种一般国民之政治自由，如集会结社罢工等之自由，正是中国工人阶级目前至急的需要”（同文）。工人阶级参加革命的目的就仅仅在这里——不是为得争取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之领导权，不是为得工农民权独裁制的胜利，更不在争得革命之转变到社会主义的前途。这种转变的观念在他是完全没有的。他同俄国的少数派一样，把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截然划分为两个不相连的阶段，即现在既然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工人阶级只有帮助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和资本主义发展以后，再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他对于农民运动也就是从这样的立场出发，他说：

“所以中国农民运动，必须国民革命完全成功，然后国内产业勃兴，然后普遍的农业资本化，然后农业的无产阶级发达集中起来，然后农村间才有真的共产的社会革命之需要与可能”。

从以上所述，就可明显的看出陈独秀主义在第三次大会时期所形成之理论的基础，——即中国革命的工人运动中之少数派的路线；他对于革命动力的估量——重视资产阶级，轻视无产阶级，而忽视农民；对于民主革命联合战线的了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妥协，无产阶级隶属于资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对于革命性质和前途的观念——看不见土地革命的内量，看不见工农民主独裁而更没有看见革命有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只有“一心不乱的干国民革命”，只有“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自然资产阶级的握得政权”，待资本主义发展之后，将来再来社会革命。所有这些就确实确实形成了中国少数派的总路线。

从他的“造国论”以至“汪陈宣言”以至中东路事变后的三封信，不过把这总路线“一言以贯之”罢了！

为什么使他这样呢？这不是偶然的，因为他自始至终是站在左翼民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影响中国革命的无产阶级。既然自始至终是站在民族资产阶级的立场，所以不能了解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而只能了解资产阶级的领导；不能了解土地革命，只能了解反帝国主义和反军阀；不能了解工农民主独裁，而只能了解资产阶级握得政权和建立资产阶级的国家（造国论之精神）；不能了解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必然要转到社会主义革命，而只能了解革命是停留在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阶段之上，或完全跳过此阶段。

陈独秀在三次大会的立场既然如此，他当时发出些什么具体的口号呢？“一切工作归国民党！”“没有阶级斗争，只有民族斗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独立性此时是鬼话！”“等待和国民党分家后，再组织共产党不迟！”……

三次大会闭会后，陈独秀和马林共同提议响应上海资产阶级的民治委员会召集国民会议的主张，办法是请求国民党发宣言，而不用共产党名义发宣言。当时，我向他们抗议，才把这一个企图打消。难道现在陈独秀的取消主义和叛逆是没有历史的深远的来源？

一九二五年的革命高潮，推动中国党开始由知识分子的小团体变为工人群众的党。党在这一高潮中起了相当的组织的和领导的作用。这一高潮首先就是证明中国无产阶级之领导的能力与作用，打破陈独秀马林以至鲍罗庭等对于中国工人阶级势

力之不信任和轻视。陈独秀在相当的短时期中，似乎多少变动了对于革命动力的机会主义观点。可是一到五卅末期——张学良出兵镇压上海工人，郭松龄事变及吴佩孚攻取河南之后，又使陈独秀对于工人阶级势力发生悲观，对于时局发生不正确的估量。他同魏金斯基立刻修改以前坚决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政策，由此以至武汉时期就实行陈独秀主义之机会主义的实际政策。

第一、改变只要左派国民党的方针（坚决打击右派，削弱中派和强大在中共领导之下的左派）号召国民党右派合作，并送右派首领回广东，这是三月事变的主观原因之一。

第二、对三月事变完全采取无原则的退让政策，并实行乡村联合战线的机会主义策略，阻滞广东的土地革命。

第三、北伐开始后，即将独立的工人运动隶属于蒋介石所要挟的民族利益之下，实行阻止和削弱罢工运动的方针；同时扩大乡村联合战线的口号，去阻滞湖南高涨的土地革命。

第四、在上海工人三次暴动中实行“帮助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工人阶级只要政治自由”的孟塞维克策略。

第五、对于已经开始反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代表蒋介石采取卑鄙的屈伏退让政策。

第六、北伐出发，鲍罗庭同陈独秀完全把广东交于李济琛，盛行“以甲制乙以乙制甲”的小政客式的上层政策。

上面这些机会主义的实际策略，就规定了一九二七年四月间上海和广东之大失败。

现在再看武汉时期陈独秀主义之实际政策。这一时期，陈独秀主义与鲍罗庭主义混合起来，有名的西北学说的理论与实际成为陈独秀主义之变形发展。他的主要内容是：（一）回避帝

国主义离开东南工业中心，接出冯玉祥同到西北去建立革命根据地；(二)停止土地革命，等打到北京后再说；(三)取消所谓工农运动的过火；(四)向小资产阶级让步；(五)承认国民党的领导权，共产党在政治上完全处于隶属地位；(六)完全向汪精卫，唐生智投降，自动的承认退出国民党和其政府，以换得共同打到南京去(详见我的党的机会主义史)。

中国第一次大革命之断送于陈独秀主义及其变形的西北学说之手，难道还不显明？

五

武汉失败后，陈独秀进到消沉与动摇时期。这一时期的特征，他不仅顽固的拒绝承认机会主义的错误，而且开始演进到取消主义和合法主义的阶段。一九二七年七月底，他向临时中央局提议：(一)把一切工会农会及政权机关转交于国民党左派；(二)我们在左派政权下进行下层群众日常工作；(三)暂时专做反帝运动，工农运动不要有所动作，以避回大的牺牲和破坏，这就是他的“保全”自己势力的方法——取消主义合法主义。

以为资产阶级完全胜利了，革命完全没有了。现在要紧的只是怎样回避牺牲保全势力——这就是陈独秀主义发展到取消主义的根本精神。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央扩大会议时，他提出下列主张：(一)苏维埃口号现在不宜采用；(二)农民运动应在四不主义(不纳税，不还债等)的限度下进行；(三)中国共产党不能一党包办革命，如谭平山等仍应与之党外合作。

这一取消主义的“温和”纲领，难道不是中国孟塞维克路线之继续向前发展？

六

陈独秀拒绝出席党的六次大会，违抗两年以来共产国际的电召；他只是口口声声说，共产国际“牺牲了我和平山”。然则他向那方面走呢？早就看得明白：他非走到反革命的营垒不可。南京政府向苏联进攻的冒险事业，就成了他的最后的转变。他向中央进攻的三封信，不外是“资产阶级工党”的大纲。

他对中东路事变的态度根本是站在资产阶级国家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观点上，绝对的与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观点相反。这不是偶然的。因为他自来就是带着资产阶级国家主义的影响跑到中国共产党内来，现在仍然不得不带着这副本来面目跑出中国党的队伍之外去。所以他不关心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祖国之被攻，而且只关心于国民党强盗统治的中国之变为塞尔维亚第二。他们的主要借口是：“此时中国大多数民众尚在眼前的具体的民族利益蒙蔽之下，不能懂得拥护苏联的口号”。他所谓大多数民众自然是把工人与资产阶级混在一起。经过长期激烈的阶级血战之后的中国工人阶级，在陈独秀看来还是这样落后，这样不能了解拥护苏联口号。这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他在一九二三年认定中国工人“还沉睡在宗法社会里”“没有国家的觉悟”，现在经过七年以上的斗争，中国工人已有了“国家的觉悟”即在民族利益的蒙蔽之下，拿这个一九二三年他所说的中国工人对照起来已经是大进步了！陈独秀先生！你不是没有进步

的呵，拿你的进步，与你所想象的中国工人的落后或进步去比较：你是进步得更远了！中国工人只领导中国革命进到苏维埃阶段，而你却领导孟塞维克主义进到资产阶级工党：——进到公开反革命！陈独秀先生，你不必拚命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口号”罢，你自己的“反对误国政策”就是你们自己的阶级口号；改组派同你们一样的采用此口号：

陈独秀对于革命失败后的政权性质取了托洛斯基主义的观点。这完全没有什么奇怪。因为他自始至终的立场是资产阶级的，一切阶级关系都用资产阶级做中心来决定。看他怎样说一九二七年的事变：

“这一种转变时期的特征便是社会阶级关系之转变，主要的是资产阶级得了胜利，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了优势地位，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和帮助，加增了他的阶级力量之比重，封建残余在这一大转变时期中受了最后的打击，失了统治全中国的中央政权形式，失了和资产阶级对立的地位，至少在失去对立地位之过程中变成残余之残余！为自存计，不得不努力资本主义化，就是说不得不下全力争取城市工商业的经济势力，做他们各个区域内的统治基础。”……这“中国历史上一大转变时期”，他所看到的主要的只是“资产阶级取得胜利，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和帮助”，“封建残余受了最后打击，……变成残余势力之残余”。他绝对不会梦想到由这一转变中国革命进到苏维埃阶段，资产阶级投降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无产阶级取得了中国之唯一的领导地位。这些小事情，在他是不会梦见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中国革命的图表素来就是这样预定的：革命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建立资产阶级的国家，在资产阶级民

主政治之下，发展资本主义，再来做社会主义革命。

所以现在陈独秀对于中国革命性质问题完全过渡到托洛斯基主义，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中国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是由蒋介石所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完成了，封建势力不存在了，帝国主义让步了，现在所有的事情只是等待提高生产力发展资本主义以后再来干社会主义革命；所以工农民主专政的口号不要了，以后直截了当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陈独秀主义和托洛斯基主义之共同立场。工农民主专政这一口号，自来在陈独秀脑中就没有设想过，直到现在依然不能设想。因为他所能设想的，只是既然叫做资产阶级民权革命，那末一定是资产阶级胜利，建立资产阶级政权，那里会有什么工农专政这回事。中国资产阶级从一九二七年以来已经胜利了，已经“形成了自己为中心领导的统治者，并且已实现了这样的统治，就是国民党的南京政府”，再则反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在陈独秀看来简直不可了解，他至死也不会了解，因为这与他素来所设想的相去太远了。他素来设想的革命主要动力是资产阶级，若失了资产阶级这革命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然则现在革命动力既然把资产阶级除外，而革命任务又要反对资产阶级，——这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是什么？

所以陈独秀和托洛斯基接着就提出“国民会议”做目前政治任务的中心口号与中国共产党工农民主独裁和苏维埃口号相对抗。陈独秀自来就不赞成采用苏维埃口号。托洛斯基咒骂在武汉失败后，采取此口号是犯了罪恶。不是别的，只是因为它们认为蒋介石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现在所应有的任务只是召集国民会议来做议会行动，合法运动，及“取得一些自由”

罢了。这不是新的，仍是发展他一九二七年七月底的取消主义的大纲。

在这样的取消主义之下他们自然要拚命否认中国革命高潮，用反对“盲动主义”来做阻止与破坏高潮的借口。陈独秀曲解列宁两个波涛间的话来掩饰自己的取消主义，其实他在武汉失败时就宣言革命在很近的将来很难再起。从他看来中国的事变似乎已经证实了他与彭述之的革命阶段论：现在是南京政府稳定发展资本主义的时期——长的历史时期现在所有军阀战争不过是资产阶级发展的过程。托洛斯基在一九二八年就预言蒋介石制度的稳定。国民会议的口号就是建立在他所估量的中国革命低潮上面。

陈独秀把自己装做是革命势力“保全者”极力咒骂八七以来共产国际与中共新的政策如何牺牲了干部如何丧失了革命势力，那么我们首先看他在武汉政变时用什么政策“保全”革命势力；他同鲍罗庭规定投降的政策来“保全”革命势力——自动退出国民党与国民政府，把一切革命领导权政权工农组织交给国民党左派，用“适合工商业利益的政纲”同汪唐共同打到南京去。上帝呵！假若此时没有共产国际坚决的出来打碎你们这一“保全”革命势力的投降政策，还有今日布尔塞维克化的中国党吗？还能取得中国革命中无产阶级之唯一的领导地位么？你们自命为革命势力的“保全”者和反对盲动主义的英雄，实际你们只是可耻的投降者，顽固的叛徒。再看你们七月会议的大纲十一月的大纲（一九二七）以至中东事变后的大纲，难道你们革命势力的“保全”者之假面具还不显明么？

七

陈独秀现在全身投到托洛斯基的怀里，用托洛斯基的旗帜来回护他过去机会主义的错误，来破坏中国革命的新高潮，来进攻共产国际。他无耻的宣言他的错误是在所谓共产国际的机会主义领导之下做出来的。他宣言共产国际的机会主义的路线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及工农民主独裁，而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是盲动主义的策略。他咒骂现在工农革命的高潮为“土匪式的扰乱”侵犯了资产阶级的胜利“与稳定”，使他们国民会议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计划遭遇困难。他不要脸的诬蔑“国际的指导却在当进攻的时候教中国党投降，当退守的时候教中国党胡乱的拚命”。他认为一切罢工斗争、街上示威、游击战争都是盲动主义都是土匪式的扰乱。他不仅咒骂中国党的领导机关为官僚主义，他更咒骂“国际的领导站在官僚主义的路线上”。

还在武汉失败时陈独秀同鲍罗庭就说“如果说中国党是犯了机会主义那末根本这机会主义就是季诺维也夫领导的国际教我们的，国际教我们加入国民党教我们帮助蒋介石”。照陈独秀的见解，加入国民党就是“一切工作归国民党”“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独立性是鬼话”。这样叛徒的思想难道是一九二三年国际教你们的？断送上海暴动的胜利，对蒋介石卑鄙让步与幻想，隶属工人阶级于民族资产阶级之下，停止土地革命，取消工农运动的过火，以至向汪唐投降……难道这些是国际教你们的？现在你们的假面具要算完全揭穿出来了：你们根本否认工农民主独裁的路线，认为机会主义的路线，因为这一路线是在无产阶级的领

导下反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路线，是要建立苏维埃的中国，保证他迅速的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这完全违犯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和陈独秀主义之资产阶级的立场，所以陈独秀同蒋介石汪精卫一模一样的咒骂“共产国际破坏中国革命”。

八

中国革命运动中之有少数派路线和半少数派路线——托洛斯基主义——现在也如俄国一样的，假如托洛斯基主义在俄国革命中表面上能维持一种与布尔塞维克对立的第三种路线和第三种派别，那么在中国他（托洛斯基主义）一开始便与取消主义的陈独秀主义完全混同，以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布尔塞维克路线相对抗。这完全是自然的，因为一九二八年以后的托洛斯基主义已经从半孟塞维克的性质完全进到反革命。所以现在托洛斯基派与陈独秀派在中国所进行的不止是“八月团结”而且立即进到“资产阶级工党”的地位这不是偶然的，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现在中国比八月团结时的俄国，阶级斗争的剧烈与革命复兴的状况要不同些，现在的中国（一九二七年以来）阶级斗争这样的剧烈，与托洛斯基主义混合的陈独秀主义以及托洛斯基主义的本身必然迅速进到社会法西斯蒂主义。陈独秀派马玉夫等在上海工人斗争中的工贼行为就表征了这一社会法西斯蒂的前途——不是远的将来的前途，而是目前的非常之近的前途。

这一社会法西斯主义必然成为民族法西斯主义的补充和助手。

所以对于陈独秀主义和托洛斯基主义的斗争就成为中国共

产党最重要任务之一，对于这种斗争的丝毫犹疑或调和态度就是帮助了反革命。

九

对陈独秀主义的性质阶级基础以及其前途之不正确的了解就要弄弱对于他们的斗争。比如鲍罗庭在讨论陈独秀主义时（在莫斯科中国科学研究院）开口便说：“陈独秀主义与西欧的孟塞维克主义有区别么？我以为在业已走到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欧洲孟塞维克主义，与中国的孟塞维克主义之间是有区别的。半殖民地的国家如中国，说他同欧洲的孟塞维克是一样的——这是不正确的。这个意义就是我们承认在中国已完成资产阶级革命，而资产阶级已站在政权上，孟塞维克已在中国起社会法西斯蒂主义的作用。不能断定中国孟塞维克主义走到欧洲社会法西斯主义，因为中国革命的道路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中国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转变成社会主义革命。所以说不上中国有资产阶级的发展道路……所以陈独秀与他的派别即中国少数派完全不要妄想他们与其欧洲兄弟——即帝国主义国家孟塞维克起同样的作用，换过说，中国孟塞维克没有任何前途”。

又有一个同志用书面这样的写着：“假如我们现在再提出一个问题：陈独秀主义代表什么东西，他的社会基础怎样？那么我们明白看出一种回答，以为陈独秀代表将来的中国社会民主党——这是不正确的。社会民主党有变成社会法西斯主义的倾向，有工人贵族做基础，而且只有在财政资本和剩余赢利发达的地方才有地位。以为陈独秀和他的派别会成为中国社会民主党那

就会错误。因为要做出这样的结论就须要设想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即开始第二个资本主义时代。照我的意见他的社会基础就是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一方面是自己的社会地位与中国资产阶级，一部分买办资产阶级有关系的自由职业者学生等，另方面没有脱离半封建地主的关系。”

上面的见解可以说是补充鲍罗庭的。他们做出陈独秀主义与欧洲孟塞维克主义的区别，在陈独秀主义不会变成社会法西斯主义。主要理由是中国不是财政资本的国家，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没有工人贵族等等。这种不正确的区别和否认，不仅是建立在殖民地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之机械的对照上面，而且建立在对于中国阶级关系之不正确的了解上面。所以对陈独秀主义的性质作用及其阶级基础就发生不正确的估量。

陈独秀主义他在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铁一般的证明是在中国工人运动内来执行中国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影响。无论陈独秀及其派别的个人大都是由上面所引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但当我们正确的判断陈独秀的主义性质，作用及其代表的阶级基础时我们就不得不：一方面指出他是在中国工人运动内来执行民族资产阶级的影响；另方面指出他是代表中国式的贵族工人（工头及少数的高等熟练工人等）及一部分被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影响包围的落后工人。不指出这两点就不能正确的了解陈独秀主义的性质及作用，也就不能正确的了解陈独秀派与改组派及其他资产阶级派别的区别，和他（陈独秀主义）的危险之更大。

陈独秀主义代表中国式的贵族工人和被资产阶级影响的工人，故自来就看不起中国的工人阶级的努力，而欲把工人阶级隶

属于民族资产阶级利益之下。陈独秀主义和欧洲孟塞维克主义在一切根本问题上——如阶级关系，革命动力之不正确的了解（崇拜资产阶级，轻视无产阶级与农民）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性质及政权性质等等没有任何区别，在工人阶级内来执行资产阶级的影响更没有任何区别；代表贵族工人和资产阶级影响包围的落后工人一点上也找不出严格的区别。毫无疑问的现在陈独秀主义是隶属于民族改良主义下的社会改良主义（如四不主义，限制工人运动于部分的斗争，而反对工人的政治进攻，国民会议等等）。所以中国的孟塞维克主义也如西欧一样，必然要变成社会法西主义——而且正在变成社会法西主义。否认陈独秀主义之社会法西主义的前进，就等于否认陈独秀主义之孟塞维克的性质。如果要在他们之间找区别只能说中国孟塞维克主义转变成社会法西主义的速度比欧洲的特别快些。因为在中国发展社会改良主义至社会法西主义的条件远不如西欧之具备。如果这一转变在欧洲经过一个长时期的过程而在中国这一过程却是非常之迅速的。这不仅由于中国是殖民地的国家不能与帝国主义国家之资本主义的发展相比较，而且也是由于世界革命时期，尤其是中国阶级斗争特别剧烈，不能容许中国资产阶级工党如欧洲社会民主党一样经过一很长的发展时期才转变到社会法西主义阶段，只有在这样的观点上，不能笼统的说陈独秀派完全同欧洲社会民主党一样。因为他的命运特别短促和不固定，他的发育特别困难。

以为指出陈独秀主义必然变成社会法西主义——就是设想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这样机械的可笑论证，完全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鲍罗庭主义近年以来显然趋向于完全否认资本

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存在，他把民族资产阶级通看为买办资产阶级。鲍罗庭主义对于中国的阶级关系又复活了彭述之主义的“新”解释。

鲍罗庭主义否认陈独秀主义之必然变成社会法西斯主义——这对于中国党与陈独秀主义的斗争是很有害的。鲍罗庭主义是陈独秀主义的兄弟。这一否认的意义就是辩护陈独秀主义。

十

对于陈独秀主义之狭义的不正确的了解也是很有害的。以为陈独秀主义就是陈独秀个人和其团体而与其他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以至现在还隐藏在党内各种不正确的倾向没有思想上路线上的联系。所以为要充分的制胜党内右倾的危险，现在主要的危险，必须充分的了解陈独秀主义为中国革命中之孟塞维克路线与各种已发生，以及正在发生的机会主义与倾向有密切的思想上的关系。我们单从陈独秀的本身还不能充分了解陈独秀主义，纵然陈独秀自己在机会主义的理论方面和实际方面已做出整个的系统（如以上所述的）。我们必须更从中国革命中之已发生的各种机会主义派别，来观察这一孟塞维克的路线与系统。

首先来看戴季陶主义。他以民族利益为“最高原则”。换句话说，以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为最高原则，把工人阶级隶属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之下；拚命的反对阶级斗争，也无异是发挥一九二三年陈独秀“只有民族斗争，没有阶级斗争”的原则。假若陈独秀主义在五卅高潮时曾反对过戴季陶主义，那末从五卅末

期和三月事变开始陈独秀主义在客观上就成为在中国工人运动中之戴季陶主义的执行者——把工人阶级隶属于民族资产阶级利益之下。一直到中东路事变陈独秀提出的“反对误国政策”的口号还是隶属于戴季陶的最高原则之下。

再看彭述之主义。彭述之主义的特质就在用左的浮词否认民族资产阶级的存在，来帮助陈独秀主义进行把工人阶级隶属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口头上很漂亮的叫“天然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实际上把革命领导权奉送于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彭述之主义的帮助，陈独秀主义在党内之宗法的统治与党外实际机会主义的政策之发展不能那样顺利。

再看谭平山主义。他在戴季陶的最高原则之下宣布“中国革命要得真正的成功，一定要以广大的劳苦平民为中心，联合一切被压迫的民族，构成民族阶级与帝国主义作整个斗争才能实现。故中国革命充满了阶级性就是说中国革命的斗争，就是一种阶级斗争，就是无产者国家与有产者国家的斗争。谭平山的民族阶级和无产者国家，可谓把戴季陶的最高原则发挥尽了。谭平山比戴季陶聪明些，他不反对阶级斗争，只把阶级斗争翻译成为“被侵略的无产者民族与侵略的有产者一种剧烈的阶级斗争”。陈独秀比谭平山又聪明些，他现在率性用托洛斯基主义来防护中国不变为塞尔维亚第二。

十一

最后不能不说到陈独秀主义一个重要的伴侣——鲍罗庭主义。武汉时期鲍罗庭主义与陈独秀主义混合为一个东西，此处

不用赘说。现在所说的，只是一九二七年后，鲍罗庭关于中国问题最近的见解和态度。

在讨论陈独秀主义时（在中国科学研究院），鲍罗庭宣言他在中国革命中的错误，在于他与陈独秀之间发生了重大不同的政见，而他并没有把这不同的政见引到公开斗争；他宣言当时有广东路线与上海路线的对抗；他的结论是：假若他的路线与陈独秀的路线引起公开斗争，那就不会有武汉时期那样的失败。

不是一九二七年以后生长的人，大约不会相信鲍罗庭的话是真实的罢！然而不然，竟有同志公开出席替他辩护。可见鲍罗庭主义在我们党的队伍中直到现在不是没有保留重大的影响和残余。这一残余保留在党内终于有复活陈独秀主义的危险。所以在反陈独秀主义的斗争中决不能把鲍罗庭主义除外。

鲍罗庭在中国革命中起过很大的作用。假若说陈独秀是中国的蒲兰德尔，那末，鲍罗庭就是中国的拉狄克。所以他对于我们党内同志的影响不是值不得注意的问题。

首先看他对于中国阶级关系的新见解：

“帝国主义与中国的相互关系可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当时垄断帝国主义与中国的经纪地位的，是以皇帝为首的高等官僚贵族……第二个时期……即你们所知道的买办阶级；……最后第三个，就是现在我们所处的时期，这一个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已在排挤第二时期的中间人，排挤买办阶级而开始与帝国主义发生各种相互关系”。

“……资产阶级企图废除不平等条约，不外是企图在中国创造一种条件，在这条件下，民族资产阶级更能密切与帝国主义联系。不仅在各大商埠条约上给他与帝国主义联系的可能，而且

在全中国。换说一句即为帝国主义肃清在中国道路上一切的障碍，实现买办性质于新形式中，在新环境中，于极广大的范围中”。这在鲍罗庭主义的信徒看来，要算是极革命的极响亮的高调了。看他的下文说些什么呢：

“讲到这一点还必须说明，民族资产阶级完全是另外一个程序的资产阶级，就是这样的资产阶级。他要把中国工业化的大道上的障碍物扫除，准备同国内的封建势力以及与封建势力勾结的帝国主义作坚决斗争。然而我们所看到的完全是另一种性质的资产阶级”。

“当我们说到民族资产阶级还极弱时，我们所说的民族资产阶级不是指企图垄断中国与帝国主义间之经纪地位的资产阶级，但是有点工业资产阶级倾向的民族资产阶级，那末我们就应当说这种资产阶级现在还不能引导中国到工业发展的道路上去，因为这种资产阶级现在还极弱”。

原来鲍罗庭主义把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阶级同化之后，还保留一“不企图垄断中国与帝国主义间之经纪地位，准备同国内封建势力及与封建势力勾结的帝国主义作坚决斗争”的民族资产阶级，这一极弱的民族资产阶级现在还极弱还不晓得把中国引到工业发展的道路上去。而其将来怎样呢？这点他虽没有明说，但读者不难从他的观点做出结论，就是从鲍罗庭主义的中国阶级关系的观点非走到复活“民族资产阶级还有革命作用”的机会主义不止。

鲍罗庭接着上文就来估量无产阶级：

“这种资产阶级在中国现在是极弱的。由此就可明了中国无产阶级也充分的弱，数量太少，他的年龄，总共不过几岁。他的基

本群众不在中国内地，而在租界，完全与中国隔离的香港一类的地方。在香港，上海，天津，和汉口你们有工业无产阶级基本群众，而在中国其他各地，工业无产阶级在真正的字义上是很少的”。

鲍罗庭新的“租界无产阶级论”的论证仍然回复到自己老的西北主义的结论，就是远居上海，香港等租界之中国无产阶级很难领导中国的农民，中国革命很难凭靠大城市的领导。所以在反动下，职工运动的工作没有什么前途，唯一重要的是农民游击战争。中国全体共产党都要加入游击战争，如欧洲共产党全体参加工会工作一样。鲍罗庭主义的根本精神，自始至终，如陈独秀主义一样，怀疑与不相信中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鲍罗庭主义不仅不相信中国无产阶级有领导农民，领导革命的能力，而且根本不相信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下有用自己的力量完成中国革命之可能。他说：

“中国无产阶级的缺点，在数量上，年龄幼稚上及其他方面，这些缺点之百倍的补偿，就在不能把中国革命，中国无产阶级从其他世界分开。假若拿中国无产阶级从印度无产阶级，和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特别苏联的无产阶级分离起来，那末，自然不待说对于指导基本联盟的农民他要遭受莫大的困难。假若中国无产阶级是分离的，那末就很可怀疑到他是否能成就摆在他前面的伟大任务，即关于指导农民与封建残余斗争，与帝国主义斗争等等。但假若拿他与印度无产阶级，各国无产阶级，特别苏联无产阶级共同来看。那末中国无产阶级之必不可免的历史的缺点就百倍的补偿起来了。从这样的观点看来，中国无产阶级较强于中国资产阶级”。

这是多么漂亮的托洛斯基主义的理论呵！托洛斯基不相信俄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有用自己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之可能，鲍罗庭却比较更进一步不相信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下有用自己的力量成就中国革命之可能。

中国革命之社会主义转变和社会主义的建设之必须依靠先进国无产阶级的帮助，尤其苏联的帮助，这是毫无问题的：中国革命之须要国际无产阶级帮助也是毫无问题的。可是照鲍罗庭的观点，就完全是不对的。从列宁主义的观点，中国革命不仅有自己的充分的力量，而且他能促进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以及东方各殖民地革命；中国无产阶级比资产阶级强有力的理由，不仅在于与国际无产阶级联合的观点上，而尤其在中国内部阶级势力之对比上。鲍罗庭主义完全与列宁主义相反，从他自己的阶级关系的分析，他断定中国无产阶级比中国资产阶级更弱些，只有在与世界无产阶级联合的观点上中国无产阶级较胜于资产阶级。所以他把中国革命的命运完全建立在国际无产阶级的依赖之上。

鲍罗庭主义的信徒以为鲍罗庭同陈独秀“根本不同”的地方就在鲍极看重农民势力，着重游击战争；纵然他在武汉时期与陈独秀共同阻止了土地革命，而现在他却与陈独秀“根本”相反，他“异常”看重土地革命。现在来看他对于农民问题的政见：

“现在说到农民方面。与农民的关系的问题，必须指出下列的根本要点：一、是不是真的在中国乡村中已发生这样的阶级变迁，其结果已使富农分化，而这富农已同着资产阶级组成南京的政权，所以需要与富农斗争。我不否认中国乡村有富裕的农民之存在。但是应当说明富农是什么，其意义就不能如我们（指苏

联——森注)所了解的一样,不能搬运革命以后的我们所有的富农观念到在革命以前的中国所有富农的观念上去。这个不是一样的富农。说到中国农村,那就必然须要一个全体农民的共同民主的战线去反对封建制度,反对军阀制度,反对一切封建基础的上层建筑,反对帝国主义等等(以下大大地引证列宁——森注)。土地革命在中国只有凭靠在中国农村的统一战线上才有可能”。

此外关于国际状况,他做了以下的肯定:“无论怎样还没有牢不可破的论证,证明在最近的将来,在太平洋上美与英日就发生武装冲突。美在中国将采取最谨慎的政策”。

上面一切的话都是从鲍罗庭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日之“中国革命的前途”有名的大报告中引出来的。这是新的变态中的机会主义的大系统,是西北主义之继续发展;在中国革命的一切根本问题上——阶级关系无产阶级领导权对农民的策略及革命前途等——是与共产国际和列宁主义的路线不能并存的。假若拿了现在的鲍罗庭主义与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二九年以及一九二三年的一切机会主义去对照,便可看出中国革命中孟塞维克路线之一贯的线索。这一路线的中心点,是在对于资产阶级的态度和对于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统一战线之孟塞维克的了解:从隶属无产阶级于资产阶级(武汉时期以前),做小资产阶级上层领袖的尾巴(武汉时期)以至联合富农。假若陈独秀在一九二九年用托洛斯基观点来攻击中共中央之业已改正的联合富农的错误,那末鲍罗庭在同年就企图恢复以前乡村联合战线的机会主义策略与谭平山的“民族阶级”和统一战线的理论内外相应。由此不难推想:假若中国共产党真正执行反富农路线到底时,陈独秀主义便会同鲍罗庭主义一样暴露其代表富农的真面目。

十二

陈独秀主义一直到今有他的三个不可分离的机会主义同盟：即彭述之主义，鲍罗庭主义和托洛斯基主义。彭述之主义早已丧失其独立的影响，因为一方面他早已融化于陈独秀主义，另一方面鲍罗庭主义已摄取了他的精神。所以现在托洛斯基主义和鲍罗庭主义实成为陈独秀主义左右之手。假若陈独秀主义与托洛斯基主义的共同点在忽视土地革命，忽视农民为革命的动力及不了解工农民主专政；那末陈独秀主义与鲍罗庭主义的共同点就在不相信无产阶级的势力与领导，轻视中国革命之内部的阶级力量，及把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了解为隶属于资产阶级——自民族资产阶级以至乡村资产阶级的通常的资产阶级革命。所以与陈独秀主义的坚决斗争，同时就要求打击他的左右手，——托洛斯基主义和鲍罗庭主义。

公开的陈独秀派和托洛斯基派在表面上现在虽然已驱逐于党外了，但他暗藏在党内的影响，特别是他的友军鲍罗庭主义的影响还很严重。不少可爱的同志在思想上还不能完全从他的影响中解放出来（如对于富农，对于阶级关系，职工运动和游击战争之不正确的了解等）。这样的现象在反陈独秀主义的斗争中决不应当忽视。为要彻底肃清陈独秀的主义在党内的残余，就要求这些同志在以后能自觉的与陈独秀主义的同盟者鲍罗庭主义在思想上完全脱离关系。不然，党就应该作不客气的斗争。

十三

与“陈独秀主义斗争的任务，尤其要执行于一切实际工作，群众工作，党的生活及一切目前所发现的各种各色的不正确倾向的斗争之中，一切尾巴主义，黄色倾向失败情绪，合法主义，和平发展倾向，党内调和倾向，盲动情绪，保守观念，极端民主化等等，如若任其发展都可变成陈独秀主义的支流；随时随地制胜这些倾向，其意义就是制胜陈独秀主义。中国革命中和我们党中的危险现在主要的是右倾的危险。譬如富农路线的错误，在上级指导机关，虽然改正，但在实际工作上和在下级党部中，严格的说，还是没有改正过来，有些地方还正在发展。反对农民分土地，固然是富农路线，同时就是在分土地之中也发现了富农路线——如闽西分土地定出以生产工具及资本为标准，显然的是富农路线；同时在闽西苏维埃区域中“不要增加工人工资”之不正确的提议也开始发现。

为要制胜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首先要求对于革命的性质，目前阶级关系的变迁，及革命发展的形势有正确的了解和估计；对于这些主要问题的丝毫错误都是帮助了陈独秀主义。托洛斯基主义帮助陈独秀主义跳过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夸大资产阶级，看不见封建残余势力，因此完全忽视土地革命；而事实上是企图帮助资产阶级来建立他们所“梦想的稳定”去实行国民会议制度；鲍罗庭主义帮助陈独秀主义停留于他所了解的资产阶级民族革命的阶段；夸大封建势力，否认民族资产阶级的存在和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企图贯彻把中国革命隶属于资产阶

级利益之下的路线，即把以前隶属于城市资产阶级的路线变成隶属于乡村资产阶级的路线。这一孟塞维克路线的危险在目前是非常之有害而带现实性的主要危险。陈独秀的根本立场，就是要利用托洛斯基主义的遮饰来实现这一孟塞维克的路线。在托洛斯基主义——陈独秀主义和鲍罗庭主义，两者都绝对没有目前阶级关系和革命任务的正确观念，尤其两者都绝对没有革命转变的观念——资产阶级民权革命转变成社会主义革命。

我们有些同志在反对陈独秀主义的过程中，常常发现托洛斯基主义的错误观念，或鲍罗庭主义的错误观点，尤其是后者占多数。常常有人把反对富农的路线与反对地主的路线对立起来，常常不了解在中国土地革命中之反富农是同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中之反资产阶级的总路线是一致的；常常有人过于夸大封建势力而完全否认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因此，又隐隐的发现复活以前的两个革命阶段论的倾向而完全忽视革命转变的观点。这些都证明右倾是中国共产党目前之主要的危险之表征。他们不能正确的了解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及过程；当他们“严格的”区别革命的性质及任务时，便连革命的过程——资产阶级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时，也把他完全划成鸿沟，以为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有一道“万里长城”（陈独秀主义和鲍罗庭主义就是这样看法）；或则完全跳过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而不自觉的堕落到托洛斯基主义的观点。这种“右的”错误实际是帮助了陈独秀主义。

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虽然是长的过程，但有快的速度之可能，因为他具有很优越的转变的条件——国际的和国内的。国内的条件，如一九二七年以来，无产阶

级取得了中国之唯一的革命领导权；土地革命的深入和苏维埃区域之建立，无地的贫农，雇农，苦力以及地少的中农占乡村人口之绝对多数；城市大工业具有相当的经济前提，（此前提在工农民主专政的过程中更会大大的加强）；最后尤其是中国革命之反帝国主义的特性，和反资产阶级的特性，——自城市资产阶级以至乡村资产阶级。中国农民基本群众已在而且正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进行反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资产阶级。国际的条件，如苏联社会主义国家之大工业化与农村的集产化之异常迅速的发展，欧美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及印度等殖民地民族革命之高涨世界资本主义的总危机，资本“稳定”不仅剧烈动摇而且开始崩溃。这些条件对于中国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都有决定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应坚决的明确的站在列宁主义和共产国际的路线上，来执行中国革命目前阶段上的任务，同时准备资产阶级民权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社会前提。他丝毫不为企图跳过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左的”机会主义托洛斯基主义所动摇。同时，更丝毫不为企图停留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右的”鲍罗庭主义所动摇。他一定要彻底的克服陈独秀主义及其左右手的托洛斯基主义和鲍罗庭主义；他一定要领导现在的革命高潮迅速进到直接革命形势，推翻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中国苏维埃联邦共和国，由工农民主独裁转变成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独裁制。

打倒陈独秀主义及其左右手——托洛斯基主义和鲍罗庭主义！

全体党员站到共产国际的列宁主义路线上来！

（载《布尔什维克》第4卷第五期

署名：和森）

蔡和森同志生平年表

- 1895年3月30日** 生于上海，取名泽庸，字润寰，号和仙。生时，父亲蔡容峰在上海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任小职员，家境贫困。
- 1899年** 随母亲葛健豪（原名兰英）回故乡湖南省湘乡县永丰镇（今双峰县）。随后，在外祖父家跟表兄伴读私塾。
- 1908年秋** 到永丰镇蔡广祥杂货店做学徒。
- 1911年10月10日**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
- 秋** 学徒期满。不愿再在该店工作，立志读书，遂入永丰镇小学读三年级。学名蔡林彬。
- 1912年春** 由于刻苦攻读，越级升入本校高级班。
- 1913年春** 小学毕业。赴长沙，考取湖南铁路专门学校。
- 秋** 家境困难，无力供读，遂考入免费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 1914年3月** 湖南省立一师与第四师范合并，和森编入预科一班，原在四师学习的毛泽东编入第八班。从此，和毛泽东同志相识并成为志同道合的挚友。
- 1915年5月** 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签订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并赞助袁世凯称帝。
- 秋** 转学于岳麓山下的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入专修科文学部，与邓中夏同学。
- 9月** 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提倡科学与民主，倡导新文化运动。
- 1917年6月30日** 毕业于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原拟做教员，因无人推荐未能如愿。随后，全家迁至岳麓山饮马堂租房居

- 住。和森和一师毛泽东、张昆弟、罗学瓚等同学经常在“沕痴寄庐”(和森家)聚谈,交流心得,探求真理。
- 11月7日** 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获得胜利。
- 冬** 和毛泽东、张昆弟、罗学瓚、何叔衡等,经过多次酝酿,决定“集合同志,创造新的环境,为共同活动”,发起筹备新民学会。会名由和森提出,为大家所接受。
- 1918年4月14日** 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造人心风俗”为宗旨的新民学会在和森家中开会成立。会上通过了章程、选举了干事,和森被选为干事。新民学会,是我国十月革命后成立的影响最大的社团之一,它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为在湖南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 5月** 为了向外寻求新思想、新文化,在长沙同毛泽东、何叔衡、萧子升等会友“日夕筹议”^①。
- 5月** 和毛泽东从岳麓山下出发,徒步游历了益阳、沅江、岳阳等洞庭湖畔几县农村,作历时半月的社会调查。
- 6月** 杨昌济先生赴北京大学任教。杨先生写信给湖南,报告北京发起留法勤工俭学消息。得知此消息后,蔡和森参加第一师范附小召开的新民学会会员会,与会者有何叔衡、毛泽东等十余人。会议“对于留法运动认为必要,应尽力进行。”^②“自此,留法一事,和森和子升专负进行之责。”^③和森受会友委托,决定去北京筹办赴法勤工俭学事宜。
- 6月23日** 乘船离长沙去北京。临行时对他母亲说:“三年之内,必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④船过洞庭湖,面对波涛浩淼的湖水,联想到祖国的现状与未

① 见《新民学会会务报告》。

②③ 《新民学会会务报告》。

④ 《给陈绍休、萧子暉、萧子升、毛泽东》(1918年8月27日)《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1集第13—14页。

- 来,有感,赋诗一首,题名《少年行》。
- 6月底** 经杨昌济先生介绍,会见北京大学校长,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发起人之一蔡元培。
- 6月30日** 写信给毛泽东,报告到京情况并谈会友今后学习与职业问题。
- 7月** 会见留法勤工俭学发起人之一李石曾。
- 7月** 写信给萧旭东,讨论会友进取及互相协助问题。
- 7月24日** 写信给毛泽东,赞同毛泽东同志来信提出的自由研究,“大规模之自由研究,最足动吾之心,慰吾之情。”^①
- 8月** 赴保定及蠡县(今高阳县)布里村,筹办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在此后半年多的时间中,他不辞辛苦,奔走于北京、保定、布里村之间。
- 8月27日** 给陈绍休、萧子暉、萧子升、毛泽东写信,报告北京、保定留法预备班的创设及对新民学会今后计划的意见。
- 10月6日** 同毛泽东等由北京到保定。是日,同保定留法预备班的湖南学员一起,迎接由长沙来保定的留法预备班初级班学员。
- 10月中旬** 带领留法预备班初级班学员去蠡县布里村,入留法工业学校学习。和森一面教国文,一面学法文,并负责管理这几十人的学习和生活。
- 1919年2月** 由布里村回到北京,和毛泽东、罗学瓚等八人同住三眼井胡同七号。
- 3月初** 和毛泽东同志一起到长辛店留法预备班,组织第一批学员准备赴法。
- 5月4日** 北京爆发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
- 6月27日** “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布里村,和森即赴北京。27

^① 《蔡林彬给毛泽东》(1918年7月24日)《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1集第22页。

- 日，带领湖南部分留法预备班学员同北京法文专修馆的同学一起，参加北京学生在新华门的示威运动，要求中国代表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 6月底** 由北京回长沙，动员母亲及妹妹咸熙赴法。不久，即回北京，继续办理赴法事宜。
- 秋** 在北大图书馆与李达同志会面。
- 10月6日** 自北京回长沙。
- 11月** 和森离长沙到上海，与先期到沪的家人会合。
- 12月25日** 同向警予等一百多名留法学生乘“保尔刀斯”号轮船，离上海前往法国。
- 1920年2月2日** 抵达法国巴黎。
- 2月7日** 到达距巴黎二百里的蒙达尼，入蒙达尼男子公学。
- 上半年** 和森在法国，刻苦学习法文，攻读马列著作。“日惟手字典一册，报纸两页以为常”^①，以“蛮看”报章杂志为事。在四、五个月时间内，收集了大量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各国革命运动的小册子，择其重要急需者“猛看猛译”，翻译了《共产党宣言》、《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共产主义中的左派幼稚病》等著作，研究各派社会主义和俄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成为旅法学生中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道路的先驱。
- 6月13日** 撰写《法国最近的劳动运动》寄往国内，报道本年五月在法国发生的以铁路工人为主的同盟大罢工。该文后在《少年世界》第一卷第十一期上发表。
- 6月18日** 到巴黎，同从国内来到巴黎的萧子暉、陈绍休相会。
- 6月20日** 返回蒙达尼。
- 6月** 和向警予在蒙达尼结婚。
- 7月5—10日** 留法的新民学会会员蔡和森、向警予、陈绍休、萧子暉、张昆弟、罗学瓚、李维汉、蔡畅等十三人及工学励

^① 《蔡林彬给毛泽东》（1920年5月28日）《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3集第1页。

进会会员共二十余人，在蒙达尼男子公学开会五天。会议确定新民学会的方针为“改造中国与世界”，并对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展开了热烈的辩论。和森主张“组织共产党，使无产阶级专政，其主旨与方法多倾向于现在之俄。”^①另一派萧子升则主张温和革命，实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会上，蔡和森同志还把自己从法文中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抄成纸片，贴在开会教室的墙上，向大家讲解。会后，和森分工阅读《人道报》、《共产党月刊》、《俄式评论》及其他有关的小册子。此时，和森同志已是一个坚定不移的马克思主义者。

8月13日 给毛泽东写信，详述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组织共产党的主张。信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而“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为“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②“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③

9月16日 写信给毛泽东，明确提出在国内“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④并对建党理论、方针、原则进行详细讨论。

蔡和森同志给毛泽东同志这两封通信，系统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思想，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出了重大贡献。

9月 工学世界社全体会员在蒙达尼开会三天。和森应邀
(或10月) 出席作了“怎样救中国”的讲演，并参加了讨论。大

① 《萧旭东给毛泽东》《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3集第16页。

②③ 《蔡林彬给毛泽东》(1920年8月13日)《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3集第7页。

④ 《蔡林彬给毛泽东》(1920年9月16日)《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3集第44页。

- 多数社员赞成以信仰马克思主义和实行俄国式的社会革命为工学世界社的宗旨。
- 12月1日** 毛泽东同志写信给蔡和森及在法诸会友，对于和森的建党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①。
- 1921年1月21日** 毛泽东写信给和森，“你这一封信^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③
- 2月初** 数百名勤工俭学生在巴黎找不到工作，靠救济金生活。华法教育会对此不但不予同情，反污学生“有辱国体”，宣布与勤工俭学生断绝经济关系。这批学生向蒙达尼新民学会会员求援。蔡和森、向警予等经过讨论，决定发动一个“求学运动”，声援他们。
- 2月11日** 在蒙达尼写信给陈独秀。宣布自己“为极端的马克思主义派，极端主张：唯物史观、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④陈独秀复信说：“鄙意以为唯物史观是研究过去历史之经济的说明，主张革命是我们创造将来历史之最努力最有效的方法。二者似乎有点不同。”^⑤
- 2月27日** 同周恩来、陈延年等在巴黎一家咖啡馆里召开留法勤工俭学生代表大会，提出争取“生存权，求学权”的斗争目标，决定直接向中国驻法公使馆请愿。
- 2月28日** 和森、警予等率领巴黎近郊四百多名同学向中国驻巴黎公使馆陈策请愿。相持大半天，终被警察驱散。这一天，和森还和萧子璋刻印传单，在巴黎街头散发，揭露中法反动派压迫勤工俭学生真相，获得法国

① 《毛泽东给萧旭东、蔡林彬并在法诸会友》（1920年12月1日）《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3集第32页。

② 系指1920年9月16日《蔡林彬给毛泽东》中的观点，《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3集第35—46页。

③ 《毛泽东给蔡和森》《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3集第46页。

④⑤ 蔡和森《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及附陈独秀复信《新青年》第9卷4号。

- 公众的同情和支持。
- “二、二八”后** 赵世炎同志在由巴黎到克鲁梭工作时，绕道蒙达尼，会见和森，交谈三天，共同表示今后团结一致，学习与坚持马克思主义。
- 上半年** 一个星期天，和森和周恩来登上巴黎圣母院塔顶，在暮色苍芒中，二人讨论建立革命组织事，周恩来说：“当前最具体的问题，就是我们首先要组织共产主义团体，这是最急的要事。”
- 6月初** 和周恩来、赵世炎、陈毅等发起，联合巴黎华侨各团体，组织拒款委员会，反对国内军阀向法国借款打内战。
- 6月30日** 拒款委员会在巴黎召开成立大会，发表拒款宣言。
- 7月1日^①** 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和森同志虽然没有参加党的成立大会，但他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做出了重大贡献，是我党创始人之一。
- 8月1日** 在《新青年》第九卷第四号上，以《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为题，发表和森给陈独秀的信。
- 9月初** 中国驻法公使馆对留法勤工俭学生停发生活费。华法教育会建立的中法里昂大学拒绝勤工俭学生入学。为了争回受教育的权利，和森和周恩来、王若飞等在巴黎召开留法勤工俭学生代表大会，决定发动“争回里大”的运动。
- 9月21日** 吴稚晖从国内招来的学生，预计二十五日进中法里昂大学。和森等便发动留法勤工俭学生组织入校队，先行强占“里大”。
- 9月22日** 由和森等同志率领，一百零四名先发队员开展强占“里大”斗争。结果全部被捕。周恩来、徐特立、向警予等奔走营救。

^① 据考证，召开“一大”的时间应为七月二十三日。

- 10月10日** 和森在监狱发起绝食斗争。
- 10月13日** 法国当局以“扰乱治安”罪名，将蔡和森、李立三、陈毅等一百零四名留法勤工俭学生驱逐回国，强行由巴黎押往马赛。
- 10月14日** 由马赛上船，被押送回国。
- 11月** 在回国途中，为了替归国学生募捐和宣传被迫回国真相，同李立三，罗学瓚等二十七人在香港登陆，经广州到上海。
- 年底** 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留上海党中央工作。
- 1922年3月26日** 参加上海追悼黄爱、庞人铨大会，并讲话。
- 5月1日** 出席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并发表文章。
- 5月5日** 出席在广州召开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团中央委员。
- 5月16日—** 主编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刊物《先驱》第八、九、
8月10日 十共三期。先后在该刊上发表《中国劳动运动应取的方针》、《法兰西工人的运动最近趋势》等文章。
- 7月** 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被推选为宣言起草委员会委员。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分管宣传工作。
- 8月初** 出席在杭州西湖举行的中共中央全会，为时两天，专题讨论国共合作问题。
- 8月13日** 孙中山到达上海。李大钊、陈独秀、马林分别前去拜访，孙中山先生赞成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的主张。
- 8月中旬** 蔡和森及李大钊、张太雷等同志，由张继介绍、孙中山主盟，以个人身分正式加入国民党。
- 9月13日** 根据党的“二大”决定，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创刊，和森从始至终（除一九二五年底到一九二七年初在国外）担任主编。他呕心沥血，亲自写了一百余篇战斗文章，在我党理论战线和宣传战线上作出了卓越贡献。《向导》发行从数千份扩大到十余万份，在中

- 国早期革命中起了极大的指导作用。
- 9月13日** 在《向导》第一期上发表《统一、借款与国民党》。文章指出：“国际帝国主义与封建的旧势力”是“中国人民根本祸患”，要革命就必须“一面与民众为亲切的结合，一面与苏俄结为不二同盟。”
- 9月20日** 在《向导》第二期上发表《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军阀专政与军阀割据》，揭露和批判胡适等资产阶级反动政治主张。
- 9月24日** 同李大钊等十四人在北京《晨报》上发表启事，为陈独秀被捕案募集诉讼费。
- 10月** 蔡和森同志随党中央迁来北京，从事党的工作并指导北方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在此期间，曾为北京高等师范的《劳动文化》刊物撰稿。
- 11月7日** 北京、上海、山西等地工人、学生举行活动，热烈纪念苏联十月革命胜利五周年。
- 11月15日** 在《向导》第十期上发表《国人对于苏俄的同情》，指出中国人民要想得到自由和独立，只有与苏俄结为同盟。
- 1923年2月7日** 军阀吴佩孚对京汉路罢工工人实行屠杀，造成“二七”惨案。中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 2月** “二七”惨案后，北京形势紧张，和森暂时到高等师范躲避，参与领导北方区党的工作。向警予同志留原机关掩护。
- 3月** 到天津视察，指导天津党的建设工作。
- 4月18日** 在《向导》第二十一期上发表《外国帝国主义与军阀协同压迫革命的真势力》，指出京汉路工人罢工失败后，帝国主义与军阀更加反动，只有帮助劳动者早日恢复战斗力，才能阻止军阀们的杀伐。
- 5月2日** 在《向导》第二十三期上发表《中国革命运动与国际之关系》，提出中国革命“不仅是对内的革命，而且是对外的革命”，它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 6月10日—20日** 出席在广州召开的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继续主管宣传工作。党的“三大”制定了革命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和森主张在统一战线中，应保持我党的独立性。
- 6月** 党的“三大”闭幕后，同向警予、毛泽东从广州回上海。在上海和警予同毛泽东、杨开慧以及罗章龙夫妇同住闸北区中兴路三曾里。
- 下半年** 同邓中夏、瞿秋白同志等和国民党上海负责人共同创办上海大学，为革命培养干部。邓中夏为总务长，蔡和森、瞿秋白、张太雷等为主要教员。和森担任的主课是《社会进化史》，他旁征博引，深入浅出，深受同学欢迎。
- 1924年1月**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正式决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大会标志着国共两党的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建立。
- 2月20日** 在《向导》第五三、五四期合刊上发表《国民党大会宣言与国民》，号召各界人民积极行动起来，和国民党一道，共同执行代表大会所制定的政纲和策略。
- 4月** 和向警予同志一起，回长沙家中暂住。
- 4月27日** 在《政治生活》第一期上发表《何以救济知识劳动者》、《外国帝国主义进攻之一览》及《英美协会欢迎太戈尔》三篇文章。
- 5月** 出席在上海举行的党的第一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讨论我党在国民党中的工作、工人运动、农民问题、党与团的关系等。
- 8月** 《社会进化史》由上海民智书局出版。
- 9月10日** 在《向导》第八十二期上发表《商团事件的教训》，文章指出商团事件“可谓极帝国主义、买办阶级、雇佣军阀以及国民党右派分子伙同宰割革命政府之奇观。”并进而指出这次事件的教训：“第一是证明国民

- 党右派为反革命的法西斯蒂；第二是证明雇佣一些军阀来做革命的军事行动及过早的建立革命政府之失策。”
- 9月17日** 在《向导》第八十三期上发表《北伐呢？抵抗英帝国主义及反革命呢？》，文章分析了孙中山此时北伐的不当，指出这一行动正符合了右派反革命的要求，主张在广东开展反对英帝国主义及右派反革命的工作。
- 10月22日** 在《向导》第八十八期上发表《商团击败后广州政府的地位》，主张放弃广州政权，开展全国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 年底** 撰写《近代的基督教》，文章分析基督教的本质，指出近代基督教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和对殖民地、半殖民地进行侵略的工具，并揭露美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的种种罪行。
- 1925年1月** 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
- 3月12日** 孙中山先生在北京病逝。
- 3月21日** 在《向导》第一〇七期上发表《孙中山逝世与国民革命》，文章指出，孙中山的死对革命“是一个严重的损失”。但是“中国的革命运动不是孙中山个人的理想造出来的，乃是外国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形势逼出来的”。文章号召被压迫人民以孙中山为旗帜，继续进行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的斗争。
- 5月15日** 工人顾正红被日本帝国主义惨杀，激起上海工人阶级及青年学生的义愤。
- 5月16日** 沪西纱厂爆发二万余工人大罢工。
- 5月下旬** 罢工坚持十余日，和森提出：应当把工人的经济斗争转变为民族斗争。
- 5月28日** 为了更好地领导和推动上海群众的反帝爱国运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召开会议。和森出席，他提出，要使工人的经济斗争与反帝斗争汇合起来，而

- 使工人成为反帝统一战线的中坚力量。他反对陈独秀对工人力量估计不足的右倾主张,进而提出,五月三十日在租界里组织反帝示威运动,声援沪西工人罢工,会议通过了“扩大反帝运动和组织五卅大示威的决议”。
- 5月30日** 数十万工人、学生游行示威。当游行队伍经过南京路时,英国巡捕开枪射击,造成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 晚** 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和森提议,号召全上海人民罢工、罢课、罢市,以反抗帝国主义的屠杀。
- 31日** 上海人民再一次组织大示威,举行市民大会,通过总罢市的决议。
- 是日,在党的领导下,二十万上海工人成立上海总工会。
- 6月1日** 在蔡和森、李立三、瞿秋白、刘少奇等同志领导下,以上海总工会为核心,联合上海学生联合会、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实现了轰轰烈烈的“三罢”。
- 晚** 在党中央会议上,蔡和森同志又提出新策略:在上海应立即成立工商学联合会,以巩固和发展“五卅”运动。同时,尽快把这一运动扩大到全国去。
- 6月7日** 上海反帝运动的最高领导机关——工商学联合会成立。
- “五卅”运动如燎原烈火,迅速遍及全国,持续达四个月之久。运动的发展充分证明,和森同志预见的英明、正确。同时,在参予领导这次运动中,显示了他马克思主义战略家的杰出才能。
- 10月** 去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
- 年底** 在莫斯科中共旅俄支部会上作《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长篇报告,报告运用马列主义观点,叙述了我党产生的政治背景、历史使命以及党内初期的政治生活、思想斗争等,为研究党史的重要文献。

- 1926年2—3月** 代表中共中央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扩大会议。
- 9月26日** 自莫斯科来信给李大钊同志，谈我党同冯玉祥建立统一战线诸问题。该信后在《中央政治通信》第十期上发表。
- 1927年3月31日** 从莫斯科归国，到达长沙。
- 4月1日** 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在教育会坪召开欢迎大会，和森在会上发表演说。他着重指出：“现在革命发展，第一当注重的是农运问题，农运是整个革命的根本问题”。“建立革命武装，根本问题在武装农民起来。”对蓬勃兴起的湖南农民运动给予充分的肯定和支持。和森同志敏锐地觉察到蒋介石等国民党右派在破坏革命，特别指出：革命派不要“牺牲农民利益而与右派妥协。”
- 是日下午，离长沙去武汉。
- 4月27日—** 出席在汉口召开的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
- 5月6日** 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暂代秘书长工作。在会上作国内形势报告。
- 5月10日**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汉口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森同志代表党中央到会致词，号召团员为贯彻党的“五大”精神而奋斗。
- 5月下旬** 五月十八日夏斗寅在湖北叛变，二十一日许克祥在长沙叛变。消息传到武汉，和森同志建议党中央“立即调动与集中我们武力于湘鄂路，迎头痛击夏斗寅，同时发动武汉民众势力，扩大纠察队武装，起来肃清反革命，并准备夺取两湖。”^①
- 6月上旬** 党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郑州攻下后的北伐与东征问题，陈独秀及李立三、瞿秋白主张东征；鲁易、谭平山主张南伐广州；蔡和森同志则提出所拟之《湖南湖北

^① 蔡和森同志《在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讨论政治报告时的发言》。

- 决议案》，主张“肃清两湖反革命，巩固两湖为我们自己的根据地。”^①
- 6月上旬** 在武汉血花剧社为国民革命军各部及各师政治部党员干部作国内形势报告，报告从党的五大讲到夏斗寅、许克祥叛变，指出了当前革命的危机和武汉国民政府的前途。
- 6月19日** 代表中国共产党出席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开幕式，在会上发表演说。
- 6月25日** 和森患病，前往武昌毛泽东同志家休养。此时，和森听说唐生智回湖南后公开叛变，曾写信给中央常委：“……我们坐此静待人家来处置，直无异鱼游釜底！”建议“中央及军部应即检查自己的势力，做一军事计划、以备万一。”^②
- 6月28日** 回汉口，参加陈独秀召集的紧急会议，讨论决定党中央及省委机关移驻武昌，指定和森负责布置。和森当即过江去武昌。
- 6月29日** 中央政治局在武昌新机关开会，和森参加。
- 7月1日** 出席在武昌召开的中央扩大会议。
- 7月2日** 哮喘病复发。
- 7月3日** 中央常委决定，送和森入汉口医院。
- 7月15日** 汪精卫在武汉叛变。国共合作最后决裂。
- 7月中旬** 和森在汉口出院，在七月十六日后，曾七次给中央常委写信：建议中央组织示威，反对汪精卫分共；主张中央留两湖，反对迁九江或上海；自己要求留两湖工作。
- 8月7日** 参加在汉口召开的党中央紧急会议并在会上作了发言。发言指出：“过去一切错误都无五次大会后的错误厉害”，对于这些错误“应由政治局负责”，“并建

① 蔡和森同志《在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讨论政治报告时的发言》。

② 见蔡和森著《党的机会主义史》。

- 议党中央将“这次的错误要传达到群众中去”。他建议毛泽东同志进中央政治局，参加中央领导工作。自己要求留两湖工作。
- 8月9日** 中央派和森到北方，领导北方局的工作。
- 9月初** 到达北京。
- 9月22—23日** 到天津召开北方局扩大会及顺直活动分子会改组省委。在会上作《党的机会主义史》长篇报告。报告总结党中央从五次大会后至“八七”会议这段时间内，在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的危急关头所采取的种种动摇和错误政策。
- 10月8日** 由北京到天津。当晚，在省委作报告，说明土地革命是北方革命的总方针。
- 10月10日** 回北京。当晚在市委会议上就北京举行的传单运动提出批评。
- 10月中** 京东玉田农民暴动失败。
- 10月下旬** 北京党组织遭到大破坏，王荷波等同志被捕牺牲。和森仍留北京，恢复组织。
- 10月30日** 出席北方局及顺直省委会议，提出所拟之《第六号通告》，纠正盲动主义。
- 11月** 去上海，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撤销北方局。和森仍以巡视员名义再来北方。
- 12月底** 由上海到天津。
- 1928年1月** 赴唐山，举办工人训练班，发动煤矿工人斗争。
- 1月27日** 从唐山回天津。
- 1月28日** 写信给中央常委及政治局，报告工作。
- 2月中** 中央命令和森同志来上海汇报工作。从此，结束为期半年的北方巡视员的工作。
- 4月中旬** 准备由上海北经库伦去莫斯科参加即将举行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到达天津。
- 5月4日** 同领导北方革命运动的刘少奇同志长谈，研究顺直省委工作。

- 5月5日** 因经库伦去莫斯科道路不通，乃由天津折回上海。
- 6月** 在莫斯科出席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
- 6月22日** 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作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发言。
同日，在关于大会政治报告讨论时发言。发言反对关于中国革命形势是革命潮流一直高涨的分析，认为当前既非高潮亦非低潮，乃是处在两个高潮之间。指出摆在党的面前的主要危险仍是盲动主义。
- 7月2日** 在大会讨论关于农民土地问题时发言。发言就土地关系、豪绅阶级、乡村雇农与手工业工人、富农地主、游击战争等问题发表了意见。反对张国焘的“土地分配的全国形式”，坚持“农民打倒土豪劣绅取得乡村政权，可没收土地，部分的政权建立和部分的没收土地，在斗争过程中是有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 7月6日** 在大会讨论职工运动问题时发言。着重指出职工运动要注意改良主义的影响，在组织上应先建立工厂委员会，然后在斗争中逐步建立赤色工会系统。
- 秋** “六大”后，和森由莫斯科经北方回上海。
周恩来同志到闸北和森家中谈话。
- 11月1日** 在《布尔什维克》第二卷第一期上发表重要论文《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文章对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性质及由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作了精辟的分析。文章指出，资产阶级叛变革命后，中国革命的动力和革命阶段虽有明显地变化，但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反对“从民权主义到社会主义是直达社会主义”的所谓“一次革命论”，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不仅有转变到社会主义前途之历史的可能，而且有历史的必要”。
- 11月** 就顺直问题向中央作口头和书面报告，总结在巡视

- 工作期间北方党的工作。
- 1929 年初** 赴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党驻第三国际代表团团员。
- 年初** 在莫斯科写信给在德国的成仿吾同志，嘱托他根据德文原著翻释《共产党宣言》。
- 7 月** 在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十次执行委员会的扩大会议。
- 年底** 在莫斯科步兵学校对中国党员作关于陈独秀问题的报告。
- 1930 年 9 月** 同瞿秋白一起回国，参加在上海召开的中央六届三中全会。会上撤销了李立三同志的领导职务，停止了立三路线的错误。
- 11 月** 李立三同志前去莫斯科。
- 12 月** 在莫斯科，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开会讨论立三路线。和森和立三同志出席，并在会上作了发言。
- 是年** 撰写《论陈独秀主义》。文章就陈独秀在党的三大前后、一九二六年三月事变前后、武汉失败及六大大会和一九二九年中东路事变后四个阶段，对陈独秀主义的发展、性质、阶级基础及前途作了分析。该文在一九三一年九月《布尔什维克》第四卷第五期上发表。
- 1931 年初** 由苏联回国，住上海。和森向中央写报告，要求去中央根据地工作。因广东党组织遭破坏，中央遂派和森任中央代表，到香港指导广东工作。
- 3 月** 离上海赴香港。
- 6 月 10 日** 出席海员会议，被叛徒指认被捕。不久，英帝国主义即将他引渡给广东军阀陈济棠。
- 夏秋之交** 蔡和森同志惨遭酷刑，壮烈牺牲。

说明：我们掌握的材料有限，这份年表还很不成熟，有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编 后 记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蔡和森同志诞辰八十五周年，我们编选了这部《蔡和森文集》。

这部文集收集了蔡和森同志从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三一年牺牲前的绝大部分著述，共一百九十九篇。本书以年代为序编排，编者仅作了必要的技术整理工作，对于著述内容未作任何增删改动。

这部文集是由中国革命博物馆负责编选的。参加具体工作的同志有：梁大为、王凌云、袁钟秀、范春荣等。

在编选文集的过程中，得到了中央档案馆以及蔡和森同志的亲属刘昂、蔡博等同志的支持和协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

附注：本书付印之际，我们又发现蔡和森同志的著述三篇：《在上海黄爱、庞人铨追悼大会上的演说词》（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六日，载《劳工周刊》第二十期）、《批评“好政府”主义及其主张者》（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日，载《先驱》第九期，署名：和生）、《妇女运动》（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三日，载《中国青年》第一一七期，署名：HS）。待以后再版时补入。